



国外青年文化
研究译丛

通过仪式抵抗： 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英]斯图亚特·霍尔 托尼·杰斐逊 编
孟登迎 胡疆锋 王蕙 译
孟登迎 王行坤 校

中国青年出版社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国外青年文化研究译丛

本丛书选取西方学术界有关青年文化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涉及芝加哥学派的越轨文化理论、伯明翰学派的仪式抵抗理论以及后伯明翰时代的混杂认同理论等理论流派、研究模式和研究个案。丛书主要着力展现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有关青年文化的基本理论研究；第二，对“青年”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力量而出现所作的历史研究；第三，对文化传媒和文学作品中建构的“青年形象”的个案研究；第四，西方学界对于中国青少年文化身份的研究。

上架建议：文化



ISBN 978-7-5153-3042-6



9 787515 330426 >

定价：46.00元

通过仪式抵抗： 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英]斯图亚特·霍尔 托尼·杰斐逊 编
孟登迎 胡疆锋 王蕙 译
孟登迎 王行坤 校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英)霍尔,(英)杰斐逊编;孟登迎,胡疆锋,王蕙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2

(国外青年文化研究译丛)

ISBN 978-7-5153-3042-6

I.①通… II.①霍… ②杰… ③孟… ④胡… ⑤王… III.①青年—文化—研究—现代

IV.①D756.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6002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01-2009-1007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中国青年出版社独家出版并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Taylor & Francis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责任编辑:王钦仁

书籍设计:瞿中华

出版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57350507

门市部电话:(010)57350370

印刷: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28.5 插页:2

字数:400千字

印数:1—3000册

版次:2015年2月北京第1版

印次:2015年2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价:46.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目 录

译丛总序 / 1

民间恶魔、身份认同还是仪式抵抗? ——西方青年文化研究的历史和
多重视野 孟登迎 / 3

编者简介 / 23

各界评价 / 24

内容简介 / 25

新版序言 / 27

再谈《通过仪式抵抗》 斯图亚特·霍尔 托尼·杰斐逊 / 29

初版序言 / 69

序言 斯图亚特·霍尔 托尼·杰斐逊 / 71

第一部分 理论 I / 75

1 亚文化群体、文化群和阶级

约翰·克拉克 斯图亚特·霍尔 托尼·杰斐逊 布莱恩·罗伯茨 / 77

2 关于社会控制文化、新闻媒体以及社会治安运动建构之间关

系的几则研究笔记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抢劫研究小组” / 169

第二部分 民族志 / 175

3 泰迪男孩的文化回应 托尼·杰斐逊 / 177

4 摩登族的意义 迪克·赫伯迪格 / 183

5 光头党与社群的神奇恢复 约翰·克拉克 / 197

6 无所事事 保罗·科里根 / 203

7 吸毒的文化意义 保罗·E.威利斯 / 209

- 8 穿越镜像的民族志研究 杰弗里·皮尔森 约翰·托劳治 / 226
- 9 群居公社 科林·韦伯斯特 / 235
- 10 雷鬼乐、拉斯塔法里教信徒和牙买加小混混
迪克·赫伯迪格 / 246
- 11 一种生存策略 伊恩·钱伯斯 / 275
- 12 (社会)结构、文化群和个人经历 查斯·克里彻 / 290

第三部分 理论 II / 299

- 13 风格 约翰·克拉克 / 301
- 14 阶级意识与世代意识 格雷厄姆·默多克 罗宾·迈克农 / 323
- 15 女孩和亚文化群体 安吉拉·默克罗比 詹妮·嘉柏 / 343
- 16 关于边缘性的一则注释 雷切尔·鲍威尔 约翰·克拉克 / 361
- 17 青年文化的政治 保罗·科里根 西蒙·弗里斯 / 363

第四部分 方法 / 383

- 18 研究亚文化群体和越轨行为的自然观察法
布莱恩·罗伯茨 / 385
- 19 参与式观察法的调查逻辑 史蒂夫·巴特斯 / 398

参考书目 / 423

索引 / 436

译后记 / 449

译丛总序

民间恶魔、身份认同还是仪式抵抗？

——西方青年文化研究的历史和多重视野

孟登迎

“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通常指青少年(adolescents和teenagers)将自身从父母所属的成人文化社群当中分离出来的种种方式。正是由于青年文化具有这种与成人社会相区别的特征,人们在认识青年文化现象的时候,一般都将其纳入到各类青年亚文化群体(youth subcultures)当中来进行。从这一点来说,研究和探讨青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研究和探讨“青年亚文化”(youth subculture)。青年亚文化这一概念更能凸显青年有意识与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社会保持区分的抵抗意识,更能体现青年的一些具体行为表现形态和文化政治诉求,被广泛用于社会学、犯罪学、伦理学、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和传媒研究等诸多领域。

“青年亚文化”作为一个复合概念,与现代意义上的“青年”概念和“亚文化”概念均有直接关联。因此,对于“青年亚文化”的讨论可以从考察“青年”和“亚文化”的形成入手。“青年”和“亚文化”作为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等学术领域的基本概念,虽然在形成和出现方面有不同的语义内涵和社会阶层区分意义,但却有着共通的现代性背景。从概念范畴上看,“青年”和“亚文化”都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形成才出现的新词语,并最终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获得了相对稳定的人群区分意义和政治文化内涵。

“青年文化”的发现史

法国历史学家菲立普·阿利耶斯(Philippe Ariès)通过对历史文献进行语源学考察,发现18世纪以前的人们还没有我们今天称之为“青春期”(adolescence)的观念,他们对“童年”(childhood)、“青少年”(adolescent)和“青年”(youth)尚未进行明晰的区分。^①我们今天一般主要以能否独立生活作为区分“青年”和“青少年”的标准,而在前工业社会时期,“青年”这一概念的所指本身是不清晰的,它仅指一个时限不确定的持续年龄段。它可以指10多岁,也可指20多岁的人。由于尚未出现大量的中产阶级和核心家庭,没有“青春期”这一过渡阶段的观念,就出现了不少“小大人”(young adulthood):在做工、穿着、交往等方面被成人化了的儿童或青少年。^②这意味着,尽管每个时代都会有年轻人,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年轻人的看法却很可能大相径庭。

年轻人能够成长为真正有影响力的社会群体,能被当作“青年”来看待,一般被认为是现代西方社会才出现的新事情。美国学者约翰·吉利斯(John R. Gillis)等人的研究表明,作为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的现代“青年”概念,大约是在18世纪7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换句话说,现代意义上的“青年”概念至今也不过200多年的历史,它本身就是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产物。^③与此相比,18世纪晚期的两位伟大的欧洲作家——卢梭和歌德,则在他们的文学著作中生动描绘了青春期特有的情感骚动,表达了他们对于青春风暴的浪漫想象。这些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成人对于青春烦恼和青春易逝的敏锐感受,以丰沛的情感表达方式体现着那个时代对于青春的理解。

① Philippe Ariès,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Robert Baldick,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62, p.29.

② John R. Gillis, *Youth and History: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European Age Relations 1770–Present*,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pp.5–7.

③ John R. Gillis, *Youth and History: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European Age Relations 1770–Present*, p.38.

到 18 世纪末, 经济和政治的剧烈动荡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的青年观念。工业革命引发了一场从乡村到城市的大迁徙, 开辟了一个建立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大规模生产基础之上的新社会。青年和儿童进入陌生拥挤的城市, 以前所依附的工作、邻里和家庭的传统结构被破坏, 作为苦力和劳工的青年和童工形象出现在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等人的作品中。^①而 1793 年法国议会通过的新《人权宣言》更是明确宣告: “任何一代人不得迫使其后代隶属于他”, 这表明政治上的剧烈变革 (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进一步为青年人获得激进的平等权创造了合法条件。但是, 青少年随父母进城务工而大量迁移或移居大城市, 或者从一开始就诞生并成长在城市的边缘阴暗地带, 也滋生了大量的青少年犯罪行为。这些越轨男孩大多来自移民家庭或贫民家庭, 充满着一种无法自控的情绪暴动, 直接威胁到成人社会的秩序和制度, 影响到人们对于未来一代的看法。

1899 年, 专门针对 16 岁以下青少年犯罪的“青少年法庭”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设立, 由此迈开了人们将青春期看作生命中一个独立阶段的关键一步。针对更多的无法接受全日制学校教育或在学校教育中被放任的青少年, 政府和一些帮教人士开始创办更多的教育和教化机构, 争取让绝大多数青少年能接受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延缓了少年的成人化进程, 客观上为青春发育期 (puberty) 设定了一个“半独立”的生命阶段。如何理解青少年生理和心理发展必经的这个特殊的过渡期, 成了摆在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学术使命。

1904 年, 遗传心理学家 G. 斯坦利·霍尔 (Granville Stanley Hall, 1844-1924) 积 10 多年心血准备、花 5 年时间完成的《青春期: 心理状态及其与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性、犯罪和教育的关系》(*Adolescence: Its Psychology and Its Relations to Physiology, Anthropology, Sociology, Sex, Crime, Religion and Education*) 一书出版, 为人类重新认识青少年必经的这段特殊的生理和心理阶段提供了里程碑式的解释。霍

^① Jon Savage, *Teenage: The Prehistory of Youth Culture: 1875-1945*, New York: Penguin, 2007, p.13.

尔将青春期锁定在 14-24 岁这段从青春期萌动到成年期形成的独立过渡期,并宣告“青春期是一次新生”。在他看来,青春期是个体对青春发育期当中或之后自身出现的各种生理和心理的变化的一种自然的响应。在向成人期的最终状态过渡时,青少年必将在身心方面表现出混乱、创伤、突变和恐慌等特征。他同时认为,青春期充满活力且一去不返,需要特殊的庇护,需要一点安逸和懒散,当然也需要浪漫和理想。学校应该让青年人在青春期获得最完美的发展,教育者应该从心灵深处点燃青春之火,青春期应受到同情、欣赏和尊重。^①

G.斯坦利·霍尔对于青春期的阐发,不只在心理学界,而且在社会学领域和商业主导的大众传媒出版领域掀起了一股关注青少年问题的热潮。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就率先对移民中的犯罪青少年亚文化群体展开了系统的研究。据加拿大学者迈克尔·布雷克(Michael Brake)的研究,到 20 世纪 30 年代,青年和青少年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学界最为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1934 年美国社会学协会在耶鲁大学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将讨论主题留给青年问题就明确显示了这一学术动向。社会学家 E. B. 路透(E. B. Reuter)于 1936 年和 1937 年分别发表了《青少年的世界》和《青少年社会学》两篇论文,提出青少年生活在一个不同于成年人的世界,并创造了一种脱离于成人社会的包罗广泛的社会秩序。而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随后也提到青年人有着他们自身特有的文化形态。^②需要补充的是,这类认为青春期是特殊阶段的观点在当时的美国也遭到了其他一些学者的批评。早在 1928 年,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她出版的《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一书当中,就通过对正值青春期的萨摩亚少女的性行为与当地家庭风俗的讨论,批评了美国社会对待青少年的这种流行的观点。

① 转引自 Jon Savage, *Teenage: The Prehistory of Youth Culture: 1875-1945*, New York: Penguin, 2007, pp.70-72.

② Michael Brake, *Comparative Youth Culture: The Sociology of Youth Cultures in America, Britain and Canada*, London: Routledge 1995(c1985), p.39.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E. B. 路透也强调有一种独立的青春期文化,但他对美国思想界受 G. 斯坦利·霍尔影响而普遍接受的如下观念——青春期是充满“风暴和压力”、充满情感混乱和骚动的第二人生阶段,具有明显的个体精神焦虑和社会失序特征——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这种流行观念对青春期出现的各种剧烈的变化进行了戏剧化、夸张化的描绘(比如通俗文学文本或连环画都想当然地、以大人的设想来展现孩子们厌学的情态),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发现有些孩子在经历青春期的时候过渡得相当自然,并没有出现多少困惑和混乱,并进而指出,生理的和社会的现象之间没有固定的时间联系,青春期的社会行为与性成熟关系也不直接,而与文化的作用有较大关系;同时,青年的行为特征与青年所属的群体也有密切关系,它取决于许多具体的因素。他甚至认为,现代都市社会没有给青年人提供可供他们与朋辈共担重大责任和相互交流的真实空间,使他们被迫处在一种寄生处境当中。由于缺乏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的机会,青年们转向体育运动和其他好动的形式和扰乱性的行为。^①E. B. 路透实际上注意到了影响青春期行为的文化传统、文化群体(阶层)、教育体系和劳动法等因素,为研究独立的青春期文化提供了更多样的社会政治维度。

不难看出,关于独立的青春期文化的观念已经产生了,但这种文化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这些特征因何生成,其实是一个需要落实到社会学层面来解释的具体问题。学界一般认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在 1942 年生造了“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这一概念,他试图用这一概念来进一步阐释青春期文化的问题。^②他发现,当时的美国中产阶级青少年大都热衷与异性的社交,沉浸于消费和享乐(“玩得爽”)而不想担负社会责任;男孩尤其注重展现自己作为“酷哥”(swell guy)的健美形体和性魅力,女孩尤

① E. B. Reuter, “The Sociology of Adolescenc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3, No.3 (Nov., 1937), pp.414-418.

② Talcott Parsons, “Age and Sex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 Parsons ed.,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4, p.91.

其关注自己能否被称为“美眉”(glamor girl)。由这些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所建构的青年文化,不但涉及青少年受教育的过程和年龄问题,更关系到从童年期的依赖性向成年期的独立性如何过渡的问题。在帕森斯看来,“青年阶段是一个有很大压力和不安全感的阶段……青年文化在这一阶段中会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有助于减缓从性别定型的家庭童年期向婚姻、职业中的完全成年期过渡时产生的紧张感和不安全感”。^①帕森斯用“青年文化”来概括年龄和性别角色在青春期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注意到了代际关系、家庭角色、职业选择和社会责任等社会文化因素对于青年生活方式、行为和角色认同的影响。显然,这个新创的“青年文化”概念扩展了观察青年社会文化交往的范围,有助于对不同年龄段的青年参与的各种带有社会文化色彩的活动(如投票、性行为、抽烟、喝酒和驾车等)进行社会文化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帕森斯这里所说“青年文化”,基本上是关于美国中产阶级青年的事情,广大的工人阶级青年和出身边缘群体的青年其实并不在他的观察视野当中。因为,后者更难以成功实现所谓的年龄和性别角色的过渡,而经常会用逃学甚至犯罪来反抗学校和秩序。对于这些移民阶层(有色人种)和工人阶级青年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由芝加哥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来完成的。

芝加哥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

作为最早对亚文化群体进行系统研究的机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对移民、犯罪青少年等亚文化群体展开了研究。经过几代人近半个世纪的努力,芝加哥学派贡献了一系列研究“越轨亚文化”和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杰出成果。

芝加哥学派早期领军人物之一罗伯特·E. 帕克(Robert E. Park, 1864-1944)于1915年所写的《城市》一文,就开始注意现代城市社会当中各种亚文化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从1921年到1931年间,帕克

^① Talcott Parsons, "Age and Sex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 Parsons ed.,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4, p.101.

指导自己的博士研究生进行了 15 项有关城市生活和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其对象包括非法团伙、流浪汉、职业舞女、妓女、吸毒者、青少年犯罪者以及犹太移民等。他们要考察这些群体之间的冲突与调控关系,考察他们的交际和隔离、休假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出现的新变化。帕克鼓励他的学生们深入到各类娱乐(职业)场所,以“参与式观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去考察“都市环境中的人类行为”。他们最终发现,在快速的都市化进程中,传统社会结构和道德秩序正逐渐解体,对新的都市人际关系已经失去了约束力。而对于新出现的各类职业和各类边缘群体,传统规范和社群关系无法实施必要的规约和监督;由此,导致了大量越轨亚文化行为和越轨亚文化群体的产生,尤其以移民家庭的青少年为甚。帕克以“社会解组”(social disorganization)理论来解释都市亚文化社群产生的根源,为研究亚文化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①帕克和他的学生们开创了美国社会学关注边缘群体的现实调研传统,将移民越轨青少年和下层劳工(如出租车舞女)等非主流人群纳入正式的社会学研究。可以说,“青年亚文化”概念的逐渐形成和正式提出,与芝加哥学派关注边缘“越轨”青年群体的学术努力有着直接的联系。

就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米尔顿·戈登(Milton M. Gordon, 1918-)大概是第一位自觉考察“sub-culture”一词的构成及其意义变化的社会学家。他在 1947 年发表的《亚文化概念及其应用》一文中,将“亚文化”概念的出现追溯到 1944 年在纽约出版的《社会学词典》(*Dictionary of Sociology*)所收录的“culture-sub-area”一词。他发现该词与“亚文化”非常相近,指在一个更大的文化区域当中那些有独特而完整的文化特征的亚区域(sub-division),尤其比较强调这些特征在地域和物理方面的接近性。^②戈登还发现,另一位学者阿诺德·格林(Arnold W. Green)在 1946 年也使用过“highly organized subcultures”这一表述,字面意思是“高度组织化的各类亚文化群体”,用以讨论个体在现代社会所承受的

^① Ken Gelder & Sarah Thornton ed., *The Subcultur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23-25.

^② Ken Gelder & Sarah Thornton ed., *The Subcultures Reader*, p.43.

种种人群区隔(population segment,如性别、年龄、阶级、职业、宗教和种族团体)以及这种区隔所导致的精神困惑问题。在戈登看来,格林在“人群区隔”意义上所使用的“亚文化”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敏锐而深刻的工具,有助于我们去进一步认识影响青少年成长的各种文化环境因素(阶级地位、种族背景、地域的和乡下或城市的住处、宗教归属等),认识这些因素之间多种多样的组合方式。^①

到了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艾伯特·科恩(Albert K. Cohen, 1918-)在其著名的《越轨男孩:帮伙文化》(*Delinquency Boys: The Culture of Gang*)一书当中,专辟“亚文化概论”一章阐述他的亚文化观念,并从理论层面来深入探讨越轨青少年亚文化现象。科恩能够较为系统地探讨青年亚文化问题,得益于他的“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理论(假设):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在试图解决自己在社会中遭遇的各类麻烦问题。在他看来,下层阶级出身的青少年所面临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地位挫败(status frustration)带来的苦恼,而这些青少年形成的亚文化就是他们解决地位挫败问题的特有方式。科恩发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以物质成功、个人实现为目标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和评判标准已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而这种价值观和评判标准最终将出身于下层阶级的青少年排斥到了主流社会的边缘地带。“一些孩子由于无法满足体面社会阶级地位体系的标准,他们的地位就被体面社会所否定。越轨亚文化通过向下层孩子提供他们可以适应的地位标准来应对以上这些被排斥的问题。”^②这些处在边缘社会的青少年与占据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和矛盾,他们无法融入那些能够适应中产阶级竞争规则的青少年,开始以他们自身处境结成的帮伙作为文化归属群体。最终,在他们当中形成了一套与中产阶级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价值体系,后者成为越轨亚文化群体产生的观念支柱。因此,他认为青少年亚文化——尤其是青少年

① Ken Gelder & Sarah Thornton ed., *The Subcultures Reader*, p.41.

② Albert K. Cohen, *Delinquency Boys: The Culture of Gang*,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6, p.121.

犯罪文化,就是越轨青少年群体对主流体面社会的反叛性回应。

霍华德·贝克尔 (Howard Becker, 1928—) 继承芝加哥学派关注“越轨人群”的传统,进一步发展了文化符号互动理论 (symbolic interactionism)。他对功能主义的越轨行为理论 (即认为越轨行为是由社会系统中的结构性压力造成的) 提出了质疑,并在《局外人:越轨社会学研究》(*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1963) 一书中提出了“贴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这一理论认为,越轨行为是社会人群互动的产物;越轨行为和越轨人群不是天生就有的,“越轨是由社会群体造成的”,尤其是由强势人群造成的。“这些群体规定了若干规则——违反它们就构成了越轨行为,并将这些规则用于那些被称为局外人的特殊个体。根据这种观点,越轨的根据不是人们行动的性质,而是一些人将那些规则和制裁方法应用于‘冒犯者’的结果。越轨者是那些被成功地贴上了越轨标签的人,而越轨行为则是被人们贴上了这种标签的行为。”(着重号为原著作者所标)^①贝克尔这种不无极端色彩的表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亚文化偏差行为的某些社会成因,尤其强调了“越轨亚文化”被命名、被标签化、被刻板定型的社会阶层根源。这种揭示不但体现出了社会学的人文情怀——社会学家对于弱势群体和越轨人群的同情,而且在方法论上对后来的青年亚文化研究 (尤其涉及主流意识形态或传媒对青年反叛群体的舆论定型时) 产生了深刻影响。英国学者斯坦利·科恩 (Stanley Cohen) 正是受到“贴标签理论”启发,研究了英国主流传媒对于两类青年亚文化反叛群体 (摩登族和摇滚派) 的“妖魔化”描绘,于 1972 年出版了《民间恶魔 (公害) 与道德恐慌》(*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一书,揭示了青年亚文化群体被贴上的“民间恶魔 (公害)”这一标签与成人主流社会“道德恐慌”之间的深层联系。斯坦利·科恩的独到见解促使媒体从业者和青少年文化研究者去反省:反叛青少年到底有没有像我们所描绘的那么恐怖,成人社会是不是在“制造”恐慌和反叛者?

^① Howard Becker,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3, p.9.

1970年,约翰·欧文(John Irwin)结合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美国文化语境,再次对“亚文化”概念进行了扩充和修正。他指出,这一概念已经不再仅仅指某个具体的社会团体,还可以指某种显在的生活方式、行为体系、社交空间和共享的观点。这一强调对于研究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及其象征意义和将符号学带入青年亚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帮助。

可以看出,芝加哥学派对于越轨人群和越轨行为的研究,实际上为青年亚文化概念注入了生动而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他们从城市迁移、偏离和“生活圈”角度来描画亚文化身份,通常以经验主义的和民族志学的方法去接近青年亚文化群体。在他们那里,亚文化身份是由一个人所处的环境所决定的,因此与那些处于弱势或从属地位的社会团体有紧密关联。可以看出,芝加哥学派对于亚文化的这种界定,为考察边缘群体的亚文化行为(尤其是青少年犯罪)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但是,在探讨边缘群体与主流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时,芝加哥学派也暴露出较为明显的理论缺陷,即更多地看到了笼统的结构对于个体的强大塑造力量,而对边缘群体的主动反抗以及这种反抗的多样化表现并未作更深入的文化政治分析。

到了伯明翰学派,才明确将“阶级”维度引入到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当中,并且开始重视青年亚文化实践的“仪式抵抗”意义。这一转变,至少在理论阐释层面极大地释放了各种青年亚文化风格的丰富政治文化内涵和活力。

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早期,青年亚文化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了英国伯明翰大学。该校1964年成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开创了具有政治实践旨向的文化研究事业(Cultural Studies),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伯明翰学派。^①他们不但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有重大突破,而且极大地扩展了

^① 尽管20世纪70年代曾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担当核心领导角色的斯图亚特·霍尔

研究领域,在流行文化、亚文化、教育、种族、劳动就业和妇女研究等领域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中对于青年亚文化和流行文化的研究,取得的成果尤为显著。该研究综合调动了阶级、性别和种族等多重理论视角,从更深的社会政治语境当中去分析各类青年亚文化行为的符号象征(风格)意义——尤其是“仪式抵抗”蕴含的政治实践意义。

伯明翰学派除了借鉴芝加哥学派的亚文化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比如,关注越轨亚文化群体、“贴标签理论”和“问题解决”理论等)之外,尤其继承了英国本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开创的从社会历史语境分析文化现象的“文化与社会”的学术传统。在伯明翰学派的主将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人看来,要谈“亚文化”先得划定“文化”概念的范围。而依据雷蒙·威廉斯从“社会”角度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达艺术或学识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而且表达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意义和价值”^①。霍尔对此定义作了进一步推进,认为“文化”概念有其明确的实践和物质指向,指的是“社会群体形成自己独特生活模式,并且给他们的社会和物质生活经验赋予表现形式的社会层面……‘文化’是以有意味的形式和形态去实现或具体展现群体生活的一种实践”。^②不难发现,霍尔等人更强调文化所包含的那些有意味的符号化表现形式,这一点与青少年亚文化群体夸张化、仪式化的行为举止表现更为切合。

霍尔等人认为,“文化”与“阶级”有密切关系,“在现代社会,最基

(Stuart Hall, 1932–2014)到1990年还否认存在“伯明翰学派”,但这个机构培养研究生的独特方式(以学生小组讨论的形式自主研究)、共享的左派理论视角(阶级、年龄、种族、性别、殖民关系等)和培养出的20多位知名学者,都足以证明以它为中心的文化研究实践确实具备了学派特征。参见Stuart Hall,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the Humanities”, *The Humanities as Social Technology* (Summer, 1990), October, Vol. 53, The MIT Press, p.11.

①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1, p.57.

② Stuart Hall & Tony Jefferson ed.,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2006, p.4.

本的群体是社会阶级,并且在最基本、虽然也是最间接的意义上说,最主要的文化结构形态也将是‘阶级文化’”。^①由此判断出发,霍尔等人反对笼统使用“青年文化”这一术语,认为其掩盖和压抑了许多差异(尤其是阶级差异),主张使用更具阐释力、更能体现不同阶层青年真实处境的“青年亚文化”概念。他认为新闻媒体和公众所说的那些关于青年文化的流行话语,“只从音乐、风格、休闲消费等最为常见的现象方面来界定青年”,而没有深入揭示青少年市场工业、时尚工业和公众对于“青年”的利用(盗用)甚至剥削,因而也就“缺乏或没有阐释的力量”。^②他们认为,应该首先将“青年亚文化”置于一个它“所属的更大的阶级-文化系统”来考察,把它看作“一种亚系统——即更大的文化网状系统中某个部分之内更小、更地方化、更具差异性的结构”。^③因此,伯明翰学派对于各类青年亚文化现象的分析,必然涉及阶级、世代(generation)、性别、种族甚至性倾向等诸多维度。他们眼中的青年亚文化,也都必然是带有阶级色彩、代际冲突、性别差异或种族特色的青年亚文化,而绝不是公众话语仅从年龄或消费等表面特征区分出来的大一统的“青年文化”。换句话说,伯明翰学派要分析一种青年亚文化现象,必然要考察它与“父辈”文化、所属阶级或种族的文化、社会主流文化以及自身的性别(甚至性倾向)、其生活的区域和从事的工作等诸多要素之间的动态关系,考察这诸多因素之间相互产生的错综复杂的渗透关系。

伯明翰学派广泛关注和考察“二战”以后在英国兴起的那些与主流社会标准有偏离倾向并且有自己独特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小众青年人群,如泰迪男孩(teddy boy)、光头党(skinheads)、摩登族

① Stuart Hall & Tony Jefferson ed.,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p.6.

② Stuart Hall & Tony Jefferson ed.,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pp.8-9.

③ Stuart Hall & Tony Jefferson ed.,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p.6.

(mods)、嬉皮士(hippie)和朋克(punk)^①等,并对这些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刻而饶有趣味的阐释。比如,他们从光头党的行为和服饰当中发现了对于工人阶级传统阳刚男性形象的想象性复兴,对于社区地盘的强烈捍卫,对于黑人音乐和黑人文化的挪用,对于巴基斯坦籍移民和同性恋人群的歧视和欺凌,甚至看到了这些不无“嚣张”的工人阶级青少年形象背后所隐含的深层社会政治危机:工人阶级的共同体和共同体观念正在式微,市场消费主义日益侵蚀工人阶级青少年的精神生活,工人阶级青少年文化以此类极端的符号化方式来缓解自己身份认同的困惑,等等。这些既充满同情性理解又不乏批判性审视的阐释,对我们深入理解形形色色的青年亚文化现象提供了生动的启示性参考。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伯明翰学派的一些学者开始综合运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主体建构理论以及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欧陆思想资源,如列维-斯特劳斯的“修补拼贴”(bricolage)理论和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的神话符号分析方法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和文化抵抗思想,对伯明翰学派产生了尤为重要的方向性影响。结合符号学理论,他们逐渐将“青年亚文化”看作某些小众的青年社群展现(represent)日常生活的“有意味的形式”,看作一套构成青年小众群体特定生活方式的符号系统——“风格”(style)。风格不仅包括一个群体的衣食住行所用的各类“物”件,而且包括他们如何穿用这些“物”件的方式,以及这类人共通而特定的言谈举止方式等符号要素。伯明翰学派将前面提到的阶级、代际、性别或种族等带有社会阶层冲突张力的维度最终都融合到了“风格”这一概念当中,努力从“风格”当中发掘那些处于弱势的青年亚文化群体所蕴藏的“仪式抵抗”潜能。在对这种“仪式抵抗”进行充分肯定的同时,他们还提醒要时时警惕主流强势群体和商业文化对青年亚文化风格的“收编”企图。

① 有关泰迪男孩(teddy boy)、光头党(skinheads)、摩登族(mods)、嬉皮士(hippie)和朋克(punk)等称谓的注释,见后面的正文部分。

从这一视角和立场出发,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就不再停留在对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多重文化分析这一层面,还试图挖掘青年亚文化现象背后的“革命性”能量(能指)。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群体的一些生活行为(如光头、飙车等),就被伯明翰学派的一些理论家阐释成以象征性的、想象性的方式进行的“仪式抵抗”和政治反叛。在伯明翰学派看来,自“二战”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英国出现的各种青年亚文化群体和亚文化现象,基本上都具有明确的“仪式抵抗”意识和身份认同诉求。也就是说,青年亚文化群体都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去挑战和颠覆那些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所拥有的文化“领导权”。他们甚至认为,“青年亚文化”是以想象的方式、象征性的方式“解决”现实政治社会难题(由阶级、代际、种族、性别等现实不平等要素造成)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①虽然伯明翰学派也明白,青年亚文化群体进行的这种仪式性抵抗和符号性“抗争”,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以阶级为基础的社會秩序,但是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依然对青年亚文化群体寄予了过高的政治热情,甚至让人感觉有“过度阐释”的嫌疑。

20世纪70年代末,伯明翰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在他的名作《亚文化:风格的意义》(*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1979)当中,不无遗憾地承认:现有的所有亚文化风格的抵抗性,最终都会被时尚工业所收编或者商品化,都会失去战斗锋芒而变成折中的东西。正如《亚文化之后》(*After Subculture: Crit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Youth Culture*)一书的编者所概括的,伯明翰学派在此既看到了青年亚文化的成就,也看到了其具有的不可避免的局限。^②显然,伯明翰学派由于对青年亚文化寄予了太多的情感和政治期待,在面对无法回避的现实法则时难免会感觉有些无奈。无论如何,他们对于青年亚文化所做的这些富有开创性和想象力的研究,在很大

① Stuart Hall & Tony Jefferson ed.,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2006, p.37.

② Andy Bennett & Keith Kahn-Harris, ed., *After Subculture: Crit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Youth Cul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6.

程度上改变了成人社会对于下层阶级青年日常生活方式的看法,而且会启发并激励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研究者去探究青年文化独有的奥秘和魅力。

“后亚文化”理论及研究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的盛行,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以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阶级政治和阶级意识在全球日渐衰落。而与此同时,全球性的消费模式却更显同质化色彩,符号消费和全球互联网文化日渐勃兴,出现了日益多样化的新的亚文化群体和亚文化“风格”。这些新的亚文化群体及其身份表现行为在当代(后现代)社会呈现出多重混杂的状态,这使得伯明翰学派曾经坚持的阶级亚文化、种族亚文化立场和阐释面临严峻挑战。

实际上,伯明翰学派提出的亚文化抵抗模式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于该学派内外学人的批评。这些批评意见至少可归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这种研究忽视了女孩在青年亚文化群体中的存在和作用。提出此类批评者正是伯明翰中心自己培养的女研究生们(以安吉拉·默克罗比和詹妮·嘉柏为代表)。第二,这种研究本质化地假定了青年消费行为的政治抵抗性,甚至想当然地认为生活消费品一律都会被用于各种抵抗策略,从未真正考虑过青年人为了“娱乐”而扮演各种“亚文化”角色这一问题。第三,这种研究忽视了青年亚文化的流动性和变异性,没有考虑到青年对于音乐和时尚的响应会随着地域的变化而出现一些本地化的变种。第四,这种研究没有认识到媒体在亚文化和亚文化身份方面的创造作用。第五,这种亚文化研究方法最致命的缺陷,是它提出的关于“青年”的定义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把青年看作一个年龄范畴(16—21岁),认识不到风格的象征意义,认识不到可以把青年转变为意识形态范畴、精神状态而不是生活特定阶段的其他流行文化资源,因而无法解释成年人对于“年轻态”(youthfulness)的保持和纪念。^①

^① Andy Bennett & Keith Kahn-Harris, ed., *After Subculture: Crit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Youth Cul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6-10.

平心而论,对于伯明翰学派的这些批评有些地方不无刻意曲解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和政治追求的意味,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抓住了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模式的理论局限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青年亚文化研究已经进入了“后伯明翰时代”。如何解释在新的媒介传播和消费时代出现的各种更富流动性、虚拟表现性和混杂性的青年亚文化风格,确实是一个摆在当今青年研究者面前的新课题。

有些学者开始借鉴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表演”理论,对新出现的各种青年亚文化现象重新进行探讨,提出了“亚文化资本”(subculture capital)、“场景”(scene)和“部族”(tribe)等一系列新的范畴。这些新范畴有助于从符号政治经济学角度和群体交往空间方面来解释各种新兴的混杂性亚文化风格。比如,萨拉·桑顿(Sarah Thornton)提出的“亚文化资本”(subculture capital)概念,就有助于揭示夜总会亚文化在商业娱乐文化时代所依赖的深层文化经济逻辑。当“颓废”和“玩酷”成为一种被时下青年所崇尚的“亚文化资本”时,会催生出一系列与“颓废”和“玩酷”相关联的文化产业链(衣食住行及其展示方式)和“场景”(夜总会、酒吧、广场、马路,尤其互联网)来。这意味着,“亚文化”成了某一群人的“消费”对象和“表演”内容,有资格“消费”亚文化的人群可能形成一种共通的品位感和群体归属感。从这些观点来看,“亚文化”几乎成了亚文化消费和被消费的代名词。这是不是也有些夸大和简单化的嫌疑?这里难道一点也不涉及经济购买力、阶级政治或阶级文化趣味的问题?

到了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西方学术界确实出现了“后亚文化研究”(post-subcultures studies)^①或“后亚文化理论”(post-subcultural theory)^②之类的提法。“后亚文化”概念的提出,旨在阐释亚文化人群在

① David Muggleton & Rupert Weinzierl, eds., *The Post-subcultures Reader*, Oxford & New York: Berg Publishers, 2003, pp.3-9.

② Bennett, Andy & Kahn-Harris, Keith, eds., *After Subculture: Crit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Youth Cul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11.

多变繁复的新传媒时代和日益普泛的文化符号消费时代所产生的身份混杂现象,比如全球化网络时代的虚拟社群身份、消费主义弥漫下抵抗意识的消解等。这些学者受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基本得出了如下的判断:芝加哥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时期有比较明确区分的全球/本地、虚拟/真实、商业/独立、日常/边缘等二元区分层面,在当下的符号消费时代已经不复存在,即使存在也变得极其交错混杂,呈现出高度变异的文化面貌。在他们看来,伯明翰学派以前看重的那些因弱势身份归属(如无产阶级、青少年、有色人种、女性或同性恋等)而聚结在一起的亚文化群体,在身份极度混杂和变异的当下消费文化时代,已经失去了自身能够依附的现实社会基础,也就自然失去了进行“仪式抵抗”的“英雄精神”,甚至没有进行“仪式抵抗”的可能。

在这些学者看来,当下的青年亚文化社群活跃于各种亦真亦幻的“夜总会亚文化”或亚文化“场景”当中[如锐舞派对(rave party)、网上冲浪族等],已经演变成为碎片化、混杂性、短暂性和“无关政治”的“流动身份”。^①在这些新出现的亚文化“场景”(如全球互联网平台)中“游走”的流动社群以及他们诡异多变的“再现”方式,成了“亚文化”的“能指链”,像雅克·德里达所说的“踪迹”(trace)一样时隐时现,飘忽不定。这样的“亚文化”概念当然缺乏伯明翰学派所说的那种“抵抗”型亚文化的反叛性,简直成了身份政治的“自恋”式表演。

显然,这些有关“后亚文化”的表述对身份的流动性和媒介的虚拟性给予了过度的关注,但它们却无法解释这些在虚拟化、碎片化的文化空间“游走”的青年亚文化群体与自身真实的经济政治处境之间的复杂联系。一个只顾上网冲浪、衣食无忧的“宅男”或“宅女”,一个崇尚绿色简朴消费、骑自行车上街的后现代青年,一名在建筑工地流汗流血但也有时上网聊天的青年民工,都可以用这种“后亚文化”符号消费理论来概括吗?

^① David Muggleton & Rupert Weinzierl, eds., *The Post-subcultures Reader*, Oxford & New York: Berg Publishers, 2003, p. 52.

青年文化研究的未来

通过以上对青年文化研究史的追溯,我们不难发现,“青年亚文化”一般都指社会阶层结构框架里不断出现的那些带有一定“反常”色彩或挑战性的新兴社群或新潮生活方式。但是,一旦涉及对这些青年新兴社群或生活方式进行研究的时候,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立场和不同学派的想法就有了很大的差别,当然,也会有一定的关联性和连续性。

早期芝加哥学派认为,亚文化一般是指无家可归或移居的街头帮派、犯罪的黑社会以及同性恋等非正常群体,这些人通常在外观上就与普通人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判断虽然有简单化之嫌,但发现了亚文化群体的一些外观特征,这与后来人们重视亚文化群体的符号化表现有深层关联。后期芝加哥学派开始关注主流社会、大众媒介对于越轨青年“贴标签”、越轨青年如何认知自身等深层问题,将社会阶层、成长环境、认同危机等社会因素纳入对于青年亚文化群体的分析当中。而到了伯明翰学派时期,则将青年亚文化研究纳入到范围更为广泛的文化研究事业当中,得以从阶级、代际、种族、性别等维度来深入探讨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符号表达。他们强调青年作为弱势群体而面临的身份政治问题,并将青年亚文化看作是对各种大众文化形式和主流社会“收编”行为的“拒绝”或“仪式抵抗”。他们发现这些“拒绝”和“抵抗”也有区别,有些是明显展现出来的,如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英国朋克族;有些并不完全是对抗的,如滑板运动族、冲浪族等,而只是为了克服在社群当中日常生活刻板模式所带来的束缚。到了当今时代,伴随着各种夜总会文化的崛起,伴随着科技虚拟因素的大量渗入,亚文化群体日益多元化、短暂化,这一概念原来被赋予的“抵抗”意义、阶层区分意义,在亦真亦幻、无处不在的符号消费王国,似乎都变得更难以落实了。因此,就有学者开始新造“后亚文化”这样的概念,试图重新掌握对这种充满流动性、分裂性和混杂性的青年亚文化身份的理解。

可以看出,一方面是青年亚文化群体自身随着社会政治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是主流成人社会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而后者

更值得关注。正如《亚文化读本》(*The Subcultures Reader*)的编者肯·盖德尔(Ken Gelder)所总结的那样,人们对于亚文化的描述和研究“始终在以下两种方法之间来回徘徊:一方面将亚文化社群描述为各种独特的社交形式,另一方面又把他们的身份复数化、模糊化;以前曾经认为他们的文化角色是单一的,具有一套为所有成员都认同的共同兴趣和信仰,现在则更多强调他们的异质性、多方位渗透性、可变性和短暂性”。^①人们对待青年亚文化群体的这种复杂的态度,一直贯穿于自芝加哥学派、伯明翰学派和当今的亚文化研究当中。

青年亚文化研究方向的变化(包括“后亚文化”的提法),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已经超出了青年人群的范围。比如,现代社会的人们如何看待自身与他者(群体)的关系,现代“个体”与新兴的“社群”究竟会结成什么样的关系?在符号化消费日益扩散、个体与群体关系日益混杂交错的当今时代,社会学家、文化研究学者应该以何种态度、何种方法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对于新兴的青年亚文化的界定和研究,如何在保持相对客观分析的同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研究者的政治指向——比如对弱势青年群体,对各种新兴的、健康的反主流生活方式的关注、理解和支持?如何看待随着全球化进程加深,尤其是互联网传媒深刻影响下出现的诸多新兴的全球性的青年文化现象——比如那些通过网络联动而兴起的全球青年志愿者运动、全球青年环境运动?

诸如此类的问题,必将成为未来的青年文化研究应当面对的研究对象。对于青年文化的研究既需要研究者能够进入青年亚文化社群内部去感受和体验,又要求研究者能够与其拉开一定的距离,发现该青年亚文化社群不同于其他群体的异质性和指向未来健康生活方式的创新性。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成人社会和大众传媒终于可以俯下身段去倾听被他们无数次“描绘”过的“青年”发出的心声。那些行为

① Ken Gelder, ed., *The Subcultures Reader*, 2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11.

乖张、穿着奇异、打架斗殴甚至纵火抢掠的青少年,再也不能被媒体简单描述为“民间恶魔”或“社会公害”,而应该得到真正的重视和对待。那些为数不多的、举止平和、喜好新奇、崇尚消费或者抗拒科技、寻求简朴生活的遍布于这个星球的青少年们,因其承受着身份日益碎片化、混杂性和流动性的风险,更应该受到研究者和成人社会的同情性理解和帮助。

从根本上讲,对于青年文化的研究,都必然会涉及成人社会对于未来社会的理想期待和想象。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学术工作,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和推动。因为,我们不只是在对青年文化进行研究,还在塑造我们自己的未来。

2014年2月北京

编者简介

编辑小组成员: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斯图亚特·丹尼尔斯(Stuart Daniels)、詹妮·嘉柏(Jenny Garber)、安吉拉·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雷切尔·鲍威尔(Rachel Powell)、布莱恩·罗伯茨(Brian Roberts)。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传媒和文化研究以及政治学方面有重要贡献的文化理论家。他于1968年担任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主任,并在此期间写出了许多有影响力的著作。

托尼·杰斐逊(Tony Jefferson):英国基尔大学犯罪学教授,对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有重要贡献。

各界评价

任何一位对青年流行文化和风格真正感兴趣的人,都不能忽视这部著作。

——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泰晤士高等教育副刊》

我们应当感谢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它最初划定了真正的讨论范围。

——《新社会》(*New Society*)

此书……为研究“二战”之后在青年人当中出现的各种社团性的亚文化群体提供了一种权威的视角。它关于反叛传统的诸多说法,值得所有关注青年或试图理解青年的人学习。

——《内伦敦教育局通讯》(*ILEA Contact*)

内容简介

此书为《通过仪式抵抗》的修订扩充版,包含一篇新序言。该序言向读者全面介绍了自从这本著作1975年在《文化研究工作论文集》(*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简称WPCS)合刊上初版以来所发生的变化。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由于富有历史性地引领了一个新的文化研究领域而闻名;该中心产生的这些论文,也成为许多攻读文化研究学位的学生们必读的经典著作。此修订本包括了初版收录的所有富有独创性的论文,并增加了本书主编在该书出版30年之后所作的反思,后者进一步充实了这些论文的内容。

当青年文化已经广泛呈现在公共视野的时候,却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是社会政治变革最为显著和引人注目的表现;这些论文正好在此时发表,从而改变了这种状况。《通过仪式抵抗》通过详细考察战后英国出现的广泛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从泰迪男孩、摩登族[mods]、光头党[skinheads]到黑人拉斯特法里派[Rastafarians]),讨论了青年文化究竟是如何反映和应对文化变革的。

该书体现了这个引领当代文化研究的伯明翰中心的集体认知,有助于在新世纪对20世纪的一些重要文化著作进行重新定位。

新版序言

再谈《通过仪式抵抗》

斯图亚特·霍尔 托尼·杰斐逊

30年前(1975年)的夏天,《通过仪式抵抗》最初发表在伯明翰大学原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的年刊——《文化研究工作论文集》(*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第7/8期合刊上。次年,哈钦森(Hutchinson)出版社以书籍形式再版,自那时到现在一直以此版本印行。本次推出的这个新版本保留了路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1993年)版本的部分内容。鉴于这本论文集多年以来一直受到持续关注,人们有理由而且有必要提出如下疑问:《通过仪式抵抗》这个研究项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是如何确立的,自出版以来又经受了哪些争论和批判?对当代而言它到底还有什么样的相关性?

一 关于该项研究计划

这一版保留的初版“序言”,将该论文集的写作放在研究中心当时开展得更广泛的研究工作中来介绍,这是非常有益的。它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共鸣和响应。序言明确了该书的任务,就是把那些出自各类学者之手、范围广阔的研究成果聚集于一本书当中。这些学者包括研究中心的许多研究生,如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伊恩·钱伯斯(Iain Chambers)、雷切尔·鲍威尔(Rachel Powell)、詹妮·嘉柏(Jenny Garber)和查斯·克里彻(Chas Critcher)等人——他们并不是“亚文化研究小组”(Sub-Cultures Group)的正式成员;还有其他几位作者,包括保罗·科里根(Paul Corrigan)、杰夫·皮尔森(Geoff Pearson, Geoffrey Pearson)

的呢称)、约翰·托劳治(John Twohig)、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罗宾·迈克龙(Robin McCron)、西蒙·弗里斯(Simon Frith)和史蒂夫·巴特斯(Steve Butters)等人,他们实际上根本不是研究中心的成员。该序言指明了这本论文集必然带有试验性、未完成性和需要改进等特征,并指明了它在学术方面广泛受益于他人研究成果的情况。它还指出了这本书与研究中心其他小组正在开展的研究以及随后出版的著作——尤其是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Learning to Labour*, 1977)和《世俗文化》(*Profane Culture*, 1978)——之间的联系,并且指明了一些最终促成《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 Hall 等编, 1978)一书的相关的、独特的侧重点。该序言强调了研究中心的学术实践所具有的集体特性以及随之出现的困难——该论文集充分展现了这些困难,并强调它本身是一本松散的、以论题组织起来的文集,而不是单个作者的专著。

重述这些历史条件,是为了让当代的读者再一次了解这本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涉及的历史内容。由于《通过仪式抵抗》已经脱离了具体的时代和背景,而且呈现出它自身的活力,因此,它像其他所有此类文本的命运一样,不可避免地会被人们以各种方式有选择地挪用——而这些方式有时很难被它的作者们所认可,或者经常在那些远离了它最初产生地的学科和话语当中被广泛批评和讨论。我们对此并无任何抱怨,这是推论性的(*discursive*)和阐释性的工作本来具有的内在构成要素。然而,作者们尽管不再比阐释者享有更高的特权,但他们也不会像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所想象的那样已经“死亡”,因此,也不能阻止他们在不断展开的链条的另一个地方、另一个环节再次介入这场讨论(*discourse*)。

从建制方面来说,研究中心的各个分组最早是以各个在研项目汇报会的扩充形式出现的,这些汇报会最初被称为“研究进展”研讨会。“亚文化研究小组”在“经验研究”层面与其他研究小组并行开展工作,其他小组的研究成果随后陆续发表于研究中心的各卷年刊和哈钦森出版社出版的丛书当中。所有这些小组开展的研究工作,都是由每周一次的理论研讨会上进行的更为广泛的理论争论“设想”出来的;在这

些研讨会上,我们要大力推进一项范围更广的涉及跨学科阅读和概念讨论的学研计划。“亚文化研究小组”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共通的参照点,以便把研究中心那些考察“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现象诸方面的研究生单个研究项目全都汇聚在一起。在《通过仪式抵抗》当中,亚文化就被认为是这种比较广泛的现象中带有特别明显结构性特征的一个方面。“亚文化研究小组”因此提供了一个讨论、争论和介绍这些研究项目的空间;它使得背景阅读“集体化了”,有助于把该研究中心围绕共同主题的研究项目融为一体,以便于开展“基础理论建设”(grounded theorising)。

“亚文化研究小组”处在范围更广的文化研究规划之内,这一点在后来的讨论中已经被忽略掉了。亚文化的研究工作对于该中心这一时期出现的独特的“文化研究”方法的进展历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它也是一个差异化的(differentiated)、“相对独立”的成分。在我们看来,青年文化的兴起是当代英国文化最独特——确实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因而就把战后社会和文化的变革过程确定为优先研究的对象,在该中心的研究工作刚刚开始启动之时,我们就对其进行了理论化的探讨。在那个时期,青年被普遍表述为“社会变迁的象征”(metaphor)。各种引人注目的青年亚文化群体,引发了对文化变革必然带来的争议性和矛盾性的诸多怀疑,并且促成出各种各样可以让“这些抵抗”获得表达的形式。

本书中的许多文章,尤其像《亚文化群体、文化群(cultures)^①和阶级》这篇理论性的综述,都充分地阐明了该项研究计划的关注点:既要具体而深入地考察当代文化的一个“领域”(region),也要搞清这一领域是如何以解释性的、非还原的(non-reductive)方式与更大范围的文化和社会结构连接起来的。该研究计划试图把青年亚文化现象与一种对于社会形态结构(social formation)所做的普遍的社会文化分析结合

① 结合本书第12章的辨析,作为复数cultures一词指的是附属于社会结构、对个体的文化认同有具体直接影响的、群体性的文化因素,同时也指某群体因这种共同的文化因素而结成的文化群落。本书一般译成“文化群”,少数时候译成“文化群落”。——校注

起来。对于前者的关注,表现在该计划对于风格化的或“表意性的”(signifying)实践及其象征意义的关注,以及对于可用来描述实践主体及其“生活经验”之文化意义的那些恰当的定性分析方法的探究。而后者则体现在对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现象的持续参照上,体现在对于我们(也许有点幼稚地)所说的二者之“同源关系”(homologies)[该词借鉴威利斯(Willis, 1972)的说法]的研究方面。

尽管文化研究将“文化”作为研究的优先关注点,而且很早就在这一点上显示出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但是它的目的并不是要用文化决定论来取代马克思所说的“经济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论断。其目标是要分析和理解那些“相对独立”但并不相互排斥的关系系统——所谓“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在其早期著作《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 and Society 1780 - 1950*, 1958)当中以对举的方式提出了这两个术语,并且在这种意义上对处在形成阶段的文化研究事业有关键性的影响——尽管正如《通过仪式抵抗》所显示的那样,文化研究其实涉及一些非常不同的研究。《通过仪式抵抗》不同于常规的社会学调查,它要给予符号象征和社会以同等的重视——如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简明概括出的“亚文化和风格”(1979:1),并且要对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和相互影响进行理论化的探讨。亚文化研究计划处处都受到这些在该中心的理论领域已经掀起波澜的较大的理论问题的影响,这些理论包括:葛兰西(Gramsci)的“领导权”理论,阿尔都塞(Althusser)的“相对自主”和“个体与其真实存在状态的想象关系”理论,罗兰·巴特和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修补拼贴”(bricolage)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仪式抵抗》是其所处的那个(理论)时代的产物。

亚文化研究计划使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它既有别于主流社会学对于“社会”的理解,又不同于主流的文学和人文学科的“文化”观念,而总是不断地返回到文化与权力的联系(nexus)这一话题上。代际脱离(generational disaffiliation)在何种意义上会成为更广泛的社会矛盾的征兆?当“政治”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文化而扩展,并被赋予了非常宽泛的定义,此时文化运动的政治意义和效能又是什么呢?正是在

这一点上,本书使用的各种不同的方法作为一种共通的基本线索,对“通过仪式抵抗”(强调号是我们所加)的政治效能提出了一些质疑;高度风格化的、在文化方面精心推动的社会运动与阶级文化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文化政治与其他社会争辩形式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一点在一些讨论和质疑中得到了细察,例如,对“协商性的和情境性的解决方案范围”的理论概述的讨论,对各种亚文化作为“想象性的关系”(imaginary relations)或“神奇性的解决方案”(magical resolutions)——菲尔·科恩(Phil Cohen,1972:23)创用的术语——的质疑。

《通过仪式反抗》有时被看作研究中心对社会学调查的一项贡献。但是,更确切地说,可能应该把这个研究项目看作文化研究与社会学传统之间进行广泛交战(engagement)的场所。这一点已经在更广阔的理论化层面上展开了。选自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些重要文本有助于跨学科的“混合”,而研究中心独具特色的理论方法就是从这种“混合”中涌现的。韦伯(Weber)、涂尔干(Durkheim)、毛斯(Mauss),德国体验(verstehen)传统,狄尔泰(Dilthey)和舒兹(Schutz),还有马克思和列维-斯特劳斯等,都是理论研讨会的“奠基性文本”。还有一点当时根本没有指明,即要把社会学当作一门已经完成的学科纳入进来,然后接管和应用它的方法。通常存在的基本问题是,这种情况以何种方式促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这种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可以同其他构成要素一起被融入更广泛的理论框架当中,而且,这种融合会有什么样的分析和概念效果?

总之,(文化研究与社会学传统之间的)这种博弈是整个研究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寻求一套非实证主义的、定性的方法论和各种更适合于对文化领域进行研究的跨学科社会调查,寻求研究计划所必需的这种“双重符合”(double-fitting),后者最终涉及这种对文化形式和文化意义的分析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之间有何种关联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做社会学研究”,而应依据我们的目的,从某种外在于“这一领域”的角度去努力发掘和重构旧的社会学思想传统。这些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美国战后社会学领域泛滥的实证主义、帕森斯理论范式(Parsonian)和功能主义所淹没。转向亚文化研究,特别有助

于我们去发现某种适合于对这些问题和疑问做文化研究的关联性,因为在当代美国社会研究沿用的那个重要但“较弱”的定性传统之内,这些问题和疑问还继续存在并发生演变。

这个传统包括一系列的成果:那些受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的影响而产生的符号互动论研究(symbolic interactionist studies),试图恢复行动对于行动者的主观意义或“符号意义”;那些问题高度集中、观察极其细致的民族志的个案研究(ethnographic case studies),则是在芝加哥学派及其他地方的城市社会学当中发展起来的;还有那些借自社会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把被考察者和研究者的主动参与当作从“内部”勾画文化世界的方法。这些方法被大量用于有关越轨反常(deviancy)、违法犯罪(delinquency)或其他反社会行为方式的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实证主义方法的矫正。在最近这几年,这些方法对那种批评它们的观点(后者认为它们完全排除了更广泛的社会因素)做出了回应,把“社会反应”(societal reaction)纳入思考范围,包括所谓“越轨反常”行为已被传媒、管制权威和机构赋予了一种特定的含义——即“被贴标签”(labelled)——这种思想方法。

这些方法论对于以文化研究的方式去研究各种亚文化群体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不但关注有关意义的问题,还验证行动者的经验和观点,可以恢复行动者一定程度的能动性(agency),许可(empower)行动者的某些解释,而这些解释都是那些更客观的研究方法所不允许的。那个时代的美国社会学经常喜欢说,社会学的问题就是“社会秩序问题”。然而,这些另类的(替代性的)方法却削弱了这样的假设:社会是一个大家一致同意的(consensual)、规范的秩序,只有少数人因为“病理”原因偏离了这个秩序。在《通过仪式抵抗》当中,几乎没有一例个案研究是由持续不变的民族志学或参与式观察法所带来的成果;相反,这项研究中那些较为“民族志学”的解释都借用并改编了这些方法论,以达到吉尔兹(Geertz, 1973)所说的“深度描述”。此处依据的最基本的方法论假设是:必须联系日常实践行为(practices)来细致地考察各种意义;在对文化现象与更广泛的社会联系进行“双重符

合的”考察之前,必须对其有具体的、充分完整的理解。简单浏览一下这本书就会证实如下的论断:尽管所谓的“民族志学”水准对于这个研究计划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确切地说,《通过仪式抵抗》不能被称之为“民族志学研究”(ethnographic study)。

二 扩充、批评和争论

《通过仪式抵抗》自最初发表以来,不仅在相对狭窄的亚文化研究领域内部,而且对于许多有关青年的研究工作来说,基本上都已经成了一种检验标准。实际上,它最初在教学当中被用作英国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一门课程的配套课本,这门课程的编号为E202,主题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毫不奇怪,这样的影响也引发了大量的批评,最近出现的一种批评观点开始宣称自己是“后亚文化的”(post-subcultural)(Muggleton, 1997; Muggleton and Weinzierl, eds., 2003)。这是一个提出了诸多问题的自负的断言。这本书中提出的亚文化观念已经过时了吗?它从一开始就被误解了吗?亚文化在根本形式上发生了改变吗?我们试图与亚文化相联系的那些社会领域与过去的情况相较有很大的差别吗?“亚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吗?我们是不是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后亚文化的”理论语言来理解部分的或所有的这些变化?这些重大的问题都或隐或显、或整体或部分地支撑着对于《通过仪式抵抗》的批判性回应。它们也会提供一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些回应所展示的主要质询思路进行概述。

关于亚文化的那套话语尽管存在问题,但它依然被大家继续使用着。路特里奇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亚文化读本》(*The Subcultures Reader*, Gelder, 2005)第二版,保留了第一版(Gelder and Thornton, 1997)所收录的55篇文稿中的30篇,并重印了18篇新文章。最近一段时间媒体大量地关注“带帽外套”(hoodie)的含义,就像它们过去关注泰迪男孩(Teddy boys)^①、摩登族(mods)^②、摇滚派(rockers)^③和光头党(skinheads)^④等群体

① 泰迪男孩(teddy boy)又被称为Teds,是英国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白人青年亚文化群体。其成员(主体是白人男性青少年)喜欢穿着模仿英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执政时代

一样。事实上,《卫报》(*The Guardian*)对这一现象长达一周的考察,明确承认了这个亚文化的世系。该报的一名记者(McLean,2005:3)还求助于本书的一位原始稿件撰写人——安吉拉·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对此现象进行评论。据报道她是这样说的:

这一现象的源头显然是美国黑人的嘻哈(hip-hop)文化,后者

(1901-1910)的高档服装样式:上衣领子很长,多以天鹅绒饰边,内穿带有松弛领圈的高领白色衬衣;下身穿高腰瘦腿露袜子的裤子;脚穿粗糙度高的牛皮鞋、厚实的粗革皮鞋或小山羊皮的软底男鞋。这一群体20世纪50年代在伦敦开始出现,迅速波及英伦,并很快与摇滚乐产生紧密联系。它是第一个明确区分自己青少年身份的群体,1956年南伦敦区一些泰迪男孩在观影时发生小规模骚乱。有些泰迪男孩组成黑帮,与其他帮派时有械斗发生,1958年由于参与攻击黑人群体的诺丁山种族骚乱(Notting Hill race riots),其恶行遂被传媒夸大。据说最初该群体被称为Cosh Boys,“Teddy Boy”一词是《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1953年在一个新闻标题中发明的,是将Edwardian一词缩写为Teddy的结果。国内学者又译为“泰迪族”、“无赖青年”、“阿飞男”等。——译注

- ② 摩登族(Mods)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中期在英国出现的青年亚文化群体。他们经常通宵出入夜总会,热衷时尚和音乐,爱穿做工考究的西服,喜欢听灵乐(soul)、斯卡乐(ska)和节奏布鲁斯(R&B)等黑人音乐,出行喜欢骑时髦的意大利兰美达牌(Lambretta)或黄蜂牌(Vespa)小型摩托车。——译注
- ③ 摇滚派(Rockers)又称“皮革男孩”(leather boys)或“开飞车男孩”(ton-up boys),指那些积极参与摩托车亚文化群体(biker subculture)的白人青少年,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出现。这一群体喜欢穿彪悍的摩托车皮夹克、牛仔裤(或皮裤)及高帮摩托车靴,尤其热衷于摇滚乐和赛摩托车。经常在咖啡馆前一字排开进行骑摩托车比赛,许多人不戴头盔或只戴开口盔,显示他们不怕危险的男子汉气概。到1965年,英国人更流行用“小痞子”(greaser)这个词来称呼他们。——译注
- ④ 光头党(Skinheads)是源自20世纪60年代英国白人工人阶级青年的亚文化群体,该名称源于他们所留的光头或短发型。在时尚、音乐还有生活形态方面,光头党受到牙买加小混混(Rude Boy)文化和英国摩登族(Mods)的影响,常穿带有吊带的合身短款Levi牛仔裤。这身行头最初只具有文化象征意义,并没有政治或种族意图;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一些英国北部的光头党开始发动对南亚移民的暴力事件。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有些学者认为,光头党青年以符号化的方式试图复兴其对父辈工人阶级社群的文化想象。——译注

现在已成为艾米纳姆(Eminem)和其他乐队的主流音乐和全球音乐经济的核心成分。采用日常穿的休闲运动衣,意在显示与办公室[套装]或学校[制服]世界的距离。说唱文化(Rap culture)歌颂反抗,因为它叙述的是被社会排斥在外的经验。无论是从音乐上还是风格上,它既突出了威胁和危险,也突出了怨恨和愤怒。[带头套的上衣]是由青年人,通常是男孩从一长排外衣中挑选出来的,并被赋予了一种这些年轻人“不怀好意”的暗示意味。在过去,这种挪用(穿这种带头套的衣服)通常被限制在特定的青年文化群体——皮夹克、紧身裤(bondage trousers)成员——之中,但现在它在青年人当中已成为以这种方式标识他们音乐和文化偏好的模范式样,因此,男孩们对带帽外套的采用已经跨越了年龄、种族和阶级的界线。

这种论证的一般方法——试图确立带帽外套现象的“起源地”;分析其风格化的因素;说明它们的某种意味(远离工作世界,突出威胁和挑衅,等等)——宽泛地讲,感觉依旧在《通过仪式抵抗》的传统之内进行。然而,它从其他方面又超出了这一传统:例如,认为带帽外套的使用跨越了年龄、种族和阶级界线。对我们来说,这种“双面性”(double-sidedness)——承认新事物但不丢掉旧事物当中依旧可以适用的东西——似乎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有意义的主题;它也许在预示一个端点,预示我们的批评者们通常还没有着手做的某些事情。

“传记/现象学/经历”

“通过仪式抵抗”的理论框架中存在的大多数问题,都以某种方式出现在理论的第三个层面:亚文化是如何被它的担当者(bearers)实际经历的。此处令人困惑的一点,就是当事人所经受的这些生活、自我和身份认同通常与人们期望它们所代表的东西并不一致。

(Cohen, [1980]2005:167)

斯坦利·科恩(Stan Cohen)是最早批评我们理论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我们的理论所显现的“学术方面的天花乱坠”与我们的参与者在具体情境中的行为所表现的“直觉的情绪基调和满足感”并不匹配(Cohen,[1980]2005:168)。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种抱怨都时不时地会重新出现,最近的一次出现在詹克斯(Jenks, 2005:128)的观点中,他认为我们对年轻人的生活施加了太多的“理论控制”,尽管其他学者实际上已经看到了我们的研究基础是民族志(Redhead,1997a:2)。斯坦利·科恩的观点再次雄辩地肯定了民族志的方法在验证和鉴别主体视角(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s)方面的价值。然而,我们以前就做过说明,我们的大多数个案研究并没有依据严格的观察式民族志方法论。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误解,部分的原因在于,这本书未对此做出比较清晰的区分。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通过仪式抵抗》的“传统”通常被认为包括了威利斯那些纯粹的民族志著作(Willis,1977;1978),尽管他的研究并不属于“亚文化研究小组”的工作,但与《通过仪式抵抗》是同时进行的。

像往常一样,在研究中心内部也出现过一些非常严厉的批评。在斯坦利·科恩提出批评一年之后,加里·克拉克(Gary Clarke)撰写的《防守的滑雪族(defending ski-jumpers)》一文,也作为研究中心的工作论文发表了。此文严厉指责“《通过仪式抵抗》中讨论的亚文化群体”是以“本质主义的和非矛盾性的”、具体化的抽象物而存在的:

任何经验性的分析都会显示出,亚文化群体在形式上都是分散的、松散的(diluted)和混杂的。例如,某些外观可能表达了“时髦风格”(smartness)的价值观,却被本书的作者们认为仅限于摩登派青年所有。对于各种独特的亚文化群体所做的人类学分析,意味着缺乏对于各种过程——他们通过这些过程而得以持续、改变和交织在一起——的描述。同样,分析的精英主义本性(即对于“原作”的关注),意味着我们除了对原创风格被腐化、被合并的情况进行简单化的讨论之外,根本无法获得对风格以什么方式、为什么流行(以及它们最终以何种方式、为什么不再流行)这类问题

的认识。

(Clarke,[1981]2005:170)

此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倾向于把亚文化群体本质化?或者,他们在那个时候的表现,事实上是不是比他们此后变成的那种样子更像一些富于凝聚力的“运动”?也许两者都是真实的(这些问题是我在下面要探讨的)。的确,这里提出的对于“本质主义”的批判,预示着后来的理论转向。随后,这就成了后现代主义所偏爱的一类批评,并且常常与一种对于更基础的、更经验主义的研究的吁求结合在一起(Muggleton,1997:167)。

几乎没有几项研究成果实际上能超越这种批评,并能指导针对亚文化参与者的主观生活世界所进行的研究。我们可以想到的是三个研究项目:大卫·摩尔(David Moore)对于澳大利亚西部城市帕斯(Perth)的光头小团体进行的参与式研究(1994);马格莱顿(Muggleton)为考察“风格的后现代意义”而搞的新韦伯主义式的访谈式研究(2000);霍德金森(Hodkinson)利用他自己的“批判性知情人”(critical insider)身份,对“哥特族”(Goth)所做“多重方法的、民族志学的”研究(2002:4-5)。每一项研究都很有趣,都不尽相同,每一项研究最终都肯定了《通过仪式抵抗》所采用的老方法的某些方面,同时又以新的方式超越了它。大卫·摩尔的研究中出现的这种宽泛的裁定,非常明确地显示出旧成分与新要素的并存:

当一个光头党,牵涉到要在亚文化层面(表现在打架、喝酒和勾搭女人上,对有关本真性的论断给予明确的赞同)与个人层面(包括大笑、安静饮酒与定期伴侣的情侣关系,依据真诚性来衡量)之间进行持续的互动。

(David Moore,1994:143-4)

马格莱顿的结论(Muggleton,2000:162-3),也试图将旧的因素和新的因素黏合在一起。他发现,亚文化群体既不是由“战后现代主义线

性时间”组成的“有高度凝聚性、以团体为中心的工人阶级”实体,也不是由“战后亚文化时间”组成的松散的、跨阶级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无组织的混杂体”。相反,这些群体

是自我表现、个人自主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显现,而且……这些特性与波西米亚式的(bohemian)价值观——越来越频繁地被用来界定战后工人阶级和中下层阶级青年阶层的体验——有一种选择性的亲近关系。在这种意义上,出现了一种后现代的(或最低限的)工人阶级亚文化感性特征(subcultural sensibilities)及其与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会合(convergence),这种现象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

(ibid:167)

马格莱顿将亚文化感性特征中的阶级会合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这也许有些太过了——亚文化群体在那个时代与更广泛的阶级文化似乎还有更明晰的关联。只有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后朋克(post-punk)^①文化,特别是在锐舞或夜总会(rave / club)文化当中,我们才会看到某些类似于“阶级和性别会合”的东西。从这一点来说,我在很多

① “后朋克”(Post-punk)是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伴随着最初的朋克摇滚乐(punkrock)发展起来的一种摇滚乐流派。punk 又译“庞克”、“鬍客”,是一种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人们有时候也把痴迷这种音乐的青少年称为“朋克”。朋克最早源起于音乐界,但逐渐转换成一种整合音乐、服装与个人意识主张的广义文化风格。朋克乐队鄙视 20 世纪 70 年代主流摇滚的过度滥情和明星崇拜,努力创造大众容易接近的、配器精简的、思想有棱角的、篇幅短小精悍的、有政治意识的、反现存建制的叛逆音乐。他们崇尚自己动手的伦理,很多人乐意自我生产唱碟并通过非正规渠道发行。而“后朋克”(Post-punk)继承了朋克乐在音乐上的反传统与大无畏精神,但比朋克乐更丰富、更具艺术化。后朋克乐队的实验性很强,热衷于吸收各种音乐元素。后朋克与无政府主义的硬核摇滚和向主流靠拢的新浪潮摇滚都有清晰区别,形成了自己阴郁、黑暗的特色。它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广受关注的另类音乐 / 独立场景音乐之一,虽然很难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但对地下摇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译注

方面赞同马格莱顿的论断。

最后,霍德金森(Hodkinson,2002:196)发现他重新概括的亚文化概念——强调“相对独特性”,提供一种“身份认同”感,一定程度的“信奉”(commitment),以及它自身运行的相对“自主性”——正好体现出哥特场景的特征。不同于马格莱顿的“波西米亚族”,哥特族的“特征更多是由他们的实体存在而不是流动性来体现的”(Hodkinson,2002:9)。这一点可以视为是对某些旧的亚文化观念的认可。从另一方面来说,哥特族在这一点上可能是趋向早期阶段亚文化形式的一种异乎寻常的“返祖者”(throw-back)。然而,他的书也避免去涉及他自己认为属于“传统亚文化理论的关键问题”:比如,亚文化是“共有的结构性矛盾的自发表达”的观念;“抵抗”的概念;“真实性”与“媒体和商业”以及“谋利动机”之间的虚假对比。

这些都是很值得关注的研究,它们既表明了在“旧”的亚文化群体与新的“后亚文化”世界之间出现的变化,也显示出了二者的延续性。它们确实都对亚文化“担当者”的生活体验提供了很多说明,远比我们在《通过仪式抵抗》中所做的要充分,因此很符合那种批评我们“缺乏民族志-真实性”的观点的主旨。但是,除了这一点以外,我们还能从更宽广的图景中获悉到什么呢?这些建基于经验层面的亚文化群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政治的、经验的和社会文化的变化发生着“基础性的”联系?答案是,就算它们有联系,这种“联系也并不特别密切”。这一点并不特别令人奇怪,因为它是一个带有民族志叙述的特定的(endemic)问题。一般来说,它们的主要目标是“实话实说”。内部人说出的生活体验被置于优先探询和解释的层面。的确,它们有时候从理论角度出发,也明确反对在生活体验与结构现实之间建立联系观念。不论是对还是错,这正好是文化研究立志于要做的事情,为什么《通过仪式抵抗》就不是民族志研究,并且,为什么把这样一种被提议的思路看作是对我们研究计划的批判性发展就是咄咄怪事。

在这一方面,很值得回忆一下斯坦利·科恩的著作;他研究摩登族和摇滚派的著作对我们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的研究把民族志的方法与对警察、媒体及其他规训机构中呈现的“贴标签”(labelling)和“社会

反应”(societal reaction)的强烈关注结合了起来。这种结合正好对我们的思想产生了影响(促成了《监控危机》中的某些关键的理论发展)。值得记起的还有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一书,他在此书中对于“小伙子们”(the lads)所做的民族志研究颇受赞扬;这项研究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它超越了以前的教育家们——如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 1967)——所写的民族志著作,试图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为什么工人阶级的孩子选择去做工人阶级的工作?”换句话说,威利斯试图通过考察“学校教育”提供的这种在“小伙子们”的生活经验和更广泛的阶级结构与文化之间存在的关联(“同源关系”),去理解社会阶级的再生产。他的回答包含了一个理论贡献,这有助于推动当时出现的关于阶级与社会性别相互依赖的讨论——“小伙子们”推崇的是重体力劳动的男性阳刚气概,拒斥“笔头工作”和办公室工作的女里女气,有效地保护了他们的阶级命运。就这一点来说,这一理论贡献也没有得到它应该享有的声誉。无论如何,这个更广阔的领域正是文化研究中的亚文化研究打算对待的领域,而最近的民族志式的亚文化研究恰恰缺乏占据这一领域的雄心壮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多亚文化研究事实上并不是在处理《通过仪式抵抗》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框架。

阶级和亚文化:粗糙决定论或者很不确定?

我们对于阶级和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论概括,也是很早就受到批判的一个论题。例如,当时研究中心有一位成员罗斯·考沃德(Ros Coward, 1977),他就曾批评我们在讨论阶级和文化的关系时采用了“表现的”(expressive)视角(即文化仅仅是阶级的镜像反映,阶级是决定性的),因此没有赋予文化自身以自主性。与此同时,研究中心的另一位成员科林·斯帕克斯(Colin Sparks),则从另一方面批评我们犯了相反的“罪”:即为了提出更有文化色彩的马克思主义而抛弃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Sparks, 1977)。我们用来凸显阶级的任何一种方式——还原决定论的或者很不确定的方式——在随后的批判中依然是被持续关注的因素。这可能是有、也可能是没有根据的。也许因阶级相连接的(class-articulated)文化群体在那个时代显得比较醒目和比较

统一 (consolidated)。也许在那个时代被调动起来的各种理论资源当中,阶级被毫无疑问地“赋予了”参照意义,而今天的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了;理论的变化也容易受制于时尚的波动,而且一场名副其实的理论洪流毕竟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就已经从这座桥下流过了。也许所有这些因素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然而,必须强调的是,简单用阶级对亚文化现象进行解释,绝不是我们的研究计划所要做的。这本书当中展开的许多理论概括,恰恰是我们持续进行如下努力的成果,即思考和确定亚文化与阶级之间的联系,但绝不是简单地将一方简化为另一方。另外,许多其他的维度——它们的精心阐述激发出随后时代的很多理论活力,如代际、种族和社会性别等——也找到了自己进入这本书的方式(像社会性别,就是内在批判的成果),尽管在今天看来它们在形式上还处于相对不完善的状态。

我们现在如何认识这一问题?这一争论是如何进行的?自 20 世纪 60 年代和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当代的后工业社会(societies)的确已经变得更个人化、社会碎片化和多元化了,这使得阶级和文化之间的关联比以前更加弱化了(disarticulated),整个亚文化领域也变得比以前更加分散了。在晚期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转折中,阶级的性质也可能已经发生了改变。事实上,英国似乎在一种较早的阶级结构形式(嵌入在社会形态结构的历史当中)与一种相当“美国式的”或“大洋彼岸式的”阶级形式(更多扎根于金钱及其可以购买到的生活时尚当中)之间“四处移动”。阶级不能再被断定为是产生或解释风格化“解决办法”的首要因素。

然而,如果我们要问:作为一个讨论社会秩序的意义范畴,阶级是不是已经消失了?答案肯定是一句响亮的话:“没有。”阶级分化不但存在,而且对所有生活领域的生活际遇和机会继续施加着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穿越了几代人,并且已经深嵌在社会秩序内部。实际上,阶级作为一种思考社会失序(disorder)的思想方法,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又重新出现了。我们在此应该注意保守派关于“下层阶级”的争论;一般说来,他们都把社会底层看作是“一个不工作、犯罪和不合法的亚文化群体”(Morris, 1994: 86)。社会底层已经成为聚集在撒切尔主义

(Thatcherism)周围的诸种话语的关键术语,而撒切尔主义的话语是切断旧的阶级/文化形态(cultural formations)的首要政治力量。这一术语越过了政治的范围,在世俗的或学术的话语中已经被广泛地当作一个工具,用来思考那些伴随着去工业化进程(de-industrialization)而出现的“新贫困”(new poverty)和扩展出来的更多不公正现象(Murray,1984 and 1990;Dahrendorf,1985; Morris,1994;Wilson, 1978 and 1987; Auletta, 1982)。我们无法在此展开这场争论的诸多细节,例如它的历史根源,以及构成这一争论的那些基础性的联系——结构与文化、种族与阶级之间的联系——等(但可参看 Wacquant,2002)。粗略地看,保守派赞同文化方面的解释,而自由派更认同结构方面的解释。然而,对我们而言,这场争论提供的相关性就在于试图阐述后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这一点上。我们把亚文化与这些变革联系起来,这种关注必然会涉及与这一争论及其试图描述、理解和阐明(尽管并不完美)的新“现实”的思想对话。正如默克罗比简洁地指出的那样(McRobbie,1998.3-4),尽管阶级到20世纪90年代成了一个事关人生机会的“流动性的宏观结构”,但它“依然提供了一幅关于机遇、期待和结局的整体结构图”。

社会性别盲视和“缺席的女孩”

对《通过仪式抵抗》的另一种反复出现的批评,是指责它没有看到社会性别问题;以当代女性主义的后见之明来看,这种盲视似乎显得更为明显。尽管这本文集中也有一些探讨这一话题的尝试(参见 McRobbie and Garber,以及 Powell and Clarke),但基本上还保留着这样一种状况——年轻女性被认为在青年亚文化群体中处于边缘地位,在我们对青年亚文化所进行的理论化努力中,她们是不重要的。就此而言,我们没有像后来的研究那样,把社会性别和性征(sexuality)作为建构性的维度来看待。这导致了我们的几乎只关注亚文化群体内部的男孩子,(相应地)也就看不到:我们对于男孩及其以休闲为主的更大范围的活动领域的关注,如何又导致我们会疏忽那些不在场的领域的理论重要性以及伴随它们的社会性别维度。自此以后,我们已经看到了,出现了对于身处各种公共场所和家庭场所的年轻女性的更多关注,同

时也出现了从社会性别化角度对于“男人和男性气质”的关注,这两者如今构成了诸多比青年亚文化研究要广泛得多的研究领域。

多恩(Dorn)和索思(South)很早就认为,需要“结合[一种扩大的]社会劳动分工概念来重新思考”涉及男孩和女孩双方的“环境、文化和意识”(Dorn and South, [1983]1999:35)。他们由此想表达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凸显社会性别,并且包括家庭、家务、育儿和性关系等“私人”领域,还包括服务业和非正式经济领域。然而,大家不应当忘记(尽管我们在当时已经做过),菲尔·科恩早期那篇认为亚文化是阶级矛盾的“神奇性解决方案”的开创性论文,也曾经把亚文化视为有世代特征的符号体系(generationally specific symbolic systems),并认为它们的一种作用是去缓和工人阶级家庭(现在是核心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的冲突(Cohen, 1972:22)。一旦女性主义学者开始普遍将妇女的世界呈现在这种新的、对社会性别敏感的(gender-sensitive)凝视之下,就必然要重新关注我们早期使用的这种比较狭义的亚文化研究方法了。如果不考虑家庭关系、育儿责任和家庭消费领域,不考虑女性日益进入更广阔的经济领域以及劳动人口的“女性化”等问题,我们就不可能全面理解女性的生活。(一旦包括了这个家庭维度,当然也会使得对于男人的研究显得有所不同,并有助于理解研究的关注点从“妇女研究”向“社会性别研究”的普遍转变。)在我们所谓的青年研究——完全不同于亚文化——领域之内,这种更为宽泛的再定位促成了许多出色的成果。例如,克里斯汀·格里芬(Christine Griffin, 1984)对青年妇女从学校到工作这一转变过程所做的细致考察(追随威利斯在《学做工》当中对“小伙子”的经典考察),以及贝芙·斯凯格斯(Bev Skeggs, 1997)对一群工人阶级妇女受制于阶级因素的女性气质(class-based femininities)所做的精彩调查。

在亚文化研究这一特定领域内部,最为坚持不懈地回应这一挑战的人是默克罗比(在这本书中,这一挑战最初是由嘉柏和默克罗比提出的)。她紧随那种批判去探索以下问题:当人们谈及性征、(由社会性别界定的)女孩的不同空间以及她们的各种不同的抵抗和调整方式之时,亚文化研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最初,这需要追踪家庭领域以及

“闺蜜和卧室”文化中的女孩,而不是亚文化群体、“帮派”和休闲场所的女孩。默克罗比认为,女孩在私人领域的大量呈现,预示出她们的未来是做妻子和母亲。在随后的生命周期当中,她们作为母亲,休闲的机会将更加受限,这一点通过如下方式被预示出来,即对在青春期找到一个男朋友、与他共度良宵以及准备结婚这些事情赋予了重大意义(McRobbie,[1980]1991a:33)。在这个阶段,“浪漫的个人主义”这套话语(McRobbie,1991b:131)——她认为这套话语就等同于在保护和保持与一个好男孩的爱情——似乎成了这种传统的女性气质观念——“少女最典型的精神气质(ethos)”(同上;着重号为原句所加)——的意识形态枢纽。这种气质生动地表现在这一时期的少女流行杂志《杰姬》(Jackie)当中。她认为,与少女女性气质相关的意识形态成分牵连到保持性别体面(sexual respectability)的重要性,以及这种体面所暗示的女孩应当如何避免过度饮酒或吸毒的隐含意义(McRobbie,[1980]1991a:29)。

这些研究随后为关注社会性别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些新的坐标,如休闲时间的家庭利用意义,交友群体、浪漫爱情以及男友的重要性,少女杂志等。默克罗比开启的这种参照研究方法现在还被用于离最初的《通过仪式抵抗》亚文化传统很近的领域当中。起初,这种研究还与《通过仪式抵抗》这个研究计划共同拥有一些相关联的关注点。例如,抵抗依旧是一个问题——至少,就在这些物质上或意识形态上受限的空间里还有抵抗的可能性这一点来说,它依旧是个问题。然而,默克罗比在这个时候认为,女孩的“文化”趋向于颂扬女性气质的那些特有的方面——浪漫爱情、时尚、美丽,而这些方面也是她们受压迫的根源。她后来的著作是对这种观念的扩充,也是对她的思想的扩展,我们在后面(第三部分)会重新探讨这一问题。

在亚文化研究领域当中,这一时期再没有出现关注青年女性的其他重大成果,原因可能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重要的工作开始转向别的领域。[我们故意忽视了日益增多的关于“反叛女孩”(riot grrrls)的文献(如 Gottlieb and Wald,1994; Kearney,1998;Piano,2003),因为在我们看来,她们有中产阶级色彩,并且带有公开的政治目的,构成了一种

反主流文化而不是亚文化。]然而,在犯罪学领域,开展了一些针对女孩和街头帮派的重要研究。这种以社会性别化方法研究“帮派”(在青少年犯罪研究中已经被确立为一个焦点)的转向,与一些年轻的城市妇女在文化方面的演变是一致的,她们逐渐远离默克罗比认定的那些浪漫性的、家务性的兴趣点。然而,我们应该记住,在美国已经开展过许多这样的研究,亚文化理论和黑帮理论一直是紧密相连的。艾伯特·科恩(Albert Cohen, 1955)在他的《帮派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Gang*)一书中对“亚文化通论”有经典的阐述。克罗沃德(Cloward)和奥林(Ohlin)的“回应”就用了《犯罪帮派理论》(*A Theory of Delinquent Gangs*, 1960)的标题。这些“少女帮派”研究的关注焦点是街头生活,还有与社会性别化行为和完全中立的规范相关的诸多问题。少女帮派的行为类似于男孩帮派的行为,还是与后者不同?少女帮派是增强还是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规范?它能够向我们显示哪些涉及当代社会性别关系的信息?坎贝尔(Campbell)较早对纽约街头的少女帮派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民族志研究,她得出一个结论,尽管“女孩日益以姐妹名分而不是以匪徒姘妇身份出现在帮派当中”,但她们依旧处在“男性帮派的附属”地位,屈从于男性的限制性控制:“在帮派内部,依旧有‘好女孩’和‘坏女孩’、假小子和妓女之分。女孩们被告知应该怎样穿着,被允许后才可去打斗,被激励去做良善母亲和忠诚之妻”(1986:266)。米勒(Miller)随后的研究,也发现存在“一种明显的性别等级制”(2002a:442),以及许多充满矛盾的关于性别平等的信念。非常富有争议的是,性别平等在这里显然意味着跨越性别分类,认同男性气质并以此成为被男性帮派成员平等接受的人[因此米勒精心拟定了一个富有挑衅性的书名《小子们中的一员》(*One of the Guys*, 2001)]。无论女孩帮派在“扮男人气质”(Miller, 2002a and b)或“‘坏女孩’的女人气质”(Messer-schmidt, 2002),这两种观点都指明了当代女性文化和性别关系在性质上的重要转变,也表明了当代女性主义对于青年研究的影响。然而,在英国几乎没有人开展过类似的研究工作。笼统地说,这种转变可能显示的是对青年研究中的两种分化——一方从犯罪的、越轨的和反社会的角度,另一方则重点关注受媒体引导的都市流行文化——的一种重

现，或许也是一种深化。迪克·赫伯迪格很久以前在谈及“两类意象群——阴冷的青少年罪犯肖像”和“充满活力的青春期生活特写”——在“反复闪现、交替出现，有时交叉呈现”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Hebdige, [1983]2005:295)。就我们的目标而言，这些“女孩帮派”研究所忽视的地方，就是对帮派“风格”的文化问题和象征意义缺乏认真的关注。

进入后现代主义：从亚文化到“夜总会文化”

默克罗比的评论——带头套的穿着超越了“年龄、种族和阶级的界线”——与后亚文化的观念是一致的，即认为那些以阶级为基础的、狭义的亚文化观念已经不能把握(如果它们过去可以)当代青年群聚行为中明显出现的那种更强烈的流动性。有学者已经做了许多努力，来对这些明显缺少结构性关联的群聚行为重新进行归类：不再称亚文化群体而称“新部族”(neo-tribes)(Bennett, 1999)；或者称为“新社会运动”的构成元素(Martin, 2002)。最通行的看法是，亚文化已经变形为“夜总会文化”。依照这种观点的主要鼓吹者史蒂夫·瑞德海德(Steve Redhead, 1997b:X)的观点，“‘亚文化’的时刻”就处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朋克出现和 20 世纪 80 年代锐舞兴起这两者之间，现在它已经成为历史。他认为，由撒切尔主义所开启的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新政治环境，需要用新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表述来替代他所谓的伯明翰马克思主义方案。由此产生的诸多“成果”(Redhead ed., 1993a and b; Redhead, 1995; Redhead, 1997a and b; Redhead et al. eds., 1997)是一种折中的混合物，而不是一种扩展核心观念的有计划的努力(通常要去缓慢返回以填充概念的缝隙)。

桑顿(Thornton, 1995:8)对夜总会文化的研究被广为赞赏，她的确对这一现象进行了非常全面的、极具理论创新性的考察，这是一个在广义的“现代主义”框架之内尝试建立新概念的实例。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她发现伯明翰中心留给后学的理论框架“在经验方面是不可行的”。因为她选择的经验考察对象是舞蹈俱乐部或者锐舞，“特别是那些界限有流动性的群体”的忠诚参加者，而不是那些由某种特定

风格界定出来的团体。另外,她还发现了考察对象进入“有共同音乐趣味”的圈子内部所蕴含的重要意义(ibid:3)。这促使她以一种高度创新的举动,采用布尔迪厄(Bourdieu)的文化资本和区隔概念,并且将各种亚文化重新界定为趣味文化(taste cultures)。在这种新的思维框架中,“亚文化”被当作这样一个术语来使用——既包含“那些被媒体标记为亚文化的趣味文化”,也包含“(被用作)与夜总会成员所称的各种‘地下’文化行为同义的‘亚文化(subcultural)’一词”(ibid:8)。这意味着“各种亚文化意识形态就是一种手段或方式,青年通过这种方式来想象他们自身和其他社会群体,声称他们自身的独特性,断言他们不是一群毫无差别的大众当中毫无个性的成员”(ibid:10)。换句话说,青年人能够成功地表演那些与亚文化精英有意识形态关联的行为——例如,扮时髦,“先知为快”,熟悉该结交的人,不同于主流,等等,能够用这些东西来标示与他人的“区别”,就这一点来说,他们可谓占有并调动着“亚文化资本”(subcultural capital)(ibid:11)。然而,由于音乐在“青年亚文化圈子”当中所起的核心作用,由于“在考察音乐趣味时年龄是最显著的人口统计学指标”,因此,亚文化资本有别于(布尔迪厄所界定的)文化资本,与阶级的联系较弱,而与媒体的联系较多。

由于共同关注夜总会文化和那些可用来理解这些文化的新概念的扩展工作,诸如瑞德海德这样的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接受桑顿的著作时一直倾向于把它当成同一种后现代主义批判的构成要素。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误解。桑顿转向布尔迪厄在概念上是有风险的,但她显然将自己的研究保留在“现代主义”的框架之内,而不是后现代主义的阵营之中。而且,她的这种努力试图回答一个由《通过仪式抵抗》的传统所带来的不同的问题。宽泛地讲,她的的问题是:产生和调动亚文化价值的是什么样的社会进程?我们的问题是:特定的亚文化“生活方式”有什么样的意味?后者以更具人类学色彩的文化定义(作为“意义体系”和“生活方式”)为起点,而桑顿显然是以如下的亚文化观念——即能产生可以被用来标示“差别”或创造“亚文化资本”的某种价值——为起点。尽管两者产生于完全不同的理论环境,但都是有效的方法。它们有指向权力关系的共同倾向——我们的方式指向与宏观

权力关系相关联的亚文化群体,桑顿的方式(通过一种细致的民族志学)指向一种以青年为主导的休闲活动场所(或者用布尔迪厄的术语,“文化领域”)所包含的微观政治。

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这种“夜总会文化的重要性”呢?它的新意在什么地方?它具有怎样的普遍性?它是否涉及一种范式的转变?支撑史蒂夫·瑞德海德及其同行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表述,尤其擅长解除各种稳固性,擅长突破各种边界和瓦解各种范畴。它提醒我们要转向新的社会破裂和文化扩散的过程,将我们可称为“旧的”亚文化问题置于当代世界的多元调和性(multiply mediated nature)当中。它使得我们能够接近这种新出现的现象;能够看到我们以前遗漏的东西。更重要的一点,它揭示出了新的“现实”。但是不无反讽的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也会遗漏掉一些东西。记载和描述这种新的碎片化和文化杂交性,肯定是必需的,而且我们需要新的工具和概念来做这件事(不管“后现代”这个词最终是不是描述这种转变的最适当的术语)。但是,同样重要的事情是要尝试回答如下问题——这些事物是从何处来的,是以何种方式、因什么原因而出现的,它们与多大规模的社会和文化进程有关联?批评家们也许会认为这些都是经典的“现代主义”和宏大叙述之类的问题。但是他们也应该意识到,他们自己把描述这个世界是如何的与它是如何被分析和解释的这两者给混淆在一起了。的确,有些社会过程促成了这种历史转变,趋向这些新的、更碎片化的、更分散的、更混杂的、更富中介调和性的文化现实,桑顿把这种转变概述为从以阶级为主导的亚文化向“以品味为主导的”夜总会文化的转变。那么,到底是什么促成了城市青年文化的这种“转向”?这一转向究竟关联到多大范围的社会与文化过程和结构?我们不必完全同意詹姆逊的命题(Jameson, 1984)——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后现代文化不是凭空出现的。但是,这一转向不可能完全脱离晚期资本主义的整个变化——新的市场社会已经在发达国家出现;与之相关的文化商业化现象;从物质货品的生产向文化商品生产的转变;大众消费的发展;文化工业和新技术日益扩张的影响;全球化。最近有一些论述确实也认为如此。马丁·罗伯茨(Martin Roberts, 2005: 575)在一篇涉猎广

泛、富有挑衅性的文章中,将“亚文化日益全球化”与新的文化经济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全球积累体制结合了起来。依据我们以前对于症候式阅读的偏好,我们只想问一个问题:“后现代主义是如何体现在亚文化群体当中的?”

三 多种路径,或“下一步到哪里”?

我们也许可以不去直接探讨这些问题,而以一种更有效的间接方式来进行。可以问一问《通过仪式抵抗》研究项目的主旨实际上推进到了哪一步,因为这可以显示我们应当如何从《通过仪式抵抗》这个研究项目的内部视角来着手回答这类问题。然而,鉴于篇幅有限,我们这里只能陈述性地(indicatively)提一提。

《监控危机》与局势分析(*conjunctural analysis*)

如果要给本节所提问题一个简短的答案,那就是《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 Hall et al., 1978*)。《监控危机》对以前研究的许多关注点进行了扩展和转变。尽管很少有人把它与本书当作一个相关联的项目的共同构成要素来讨论,我们还是应该把它们视为有密切联系的合成整体。《监控危机》始于对青年和犯罪的道德恐慌。然而,它试图将种族政治融合到事件当中;自始至终通过对一个表面上无关紧要的事件的追踪,来对政治危机进行分析。该书开头描绘了在荒凉的城市贫民区发生的一次恶劣琐碎的犯罪所提供的“多棱镜”(prism),这些区域笼罩着内城贫困、族群(ethnicity)和种族(race)的阴影。此书详尽地展示了如下的转变,即从丰裕富足(affluence)和“青年作为变革的象征”转向社会权威的危机和“道德恐慌”的出现——恐慌是由“不守规矩的青年”以及行凶抢劫、黑人街头犯罪和“国家敌人”而引起的。总之,此书对历史转入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这一特殊时刻的过程提供了一种解释。并在结尾部分对随后将变成撒切尔主义的那种公开的分歧(opening chasm)进行了直接考察,可以说,《监控危机》对撒切尔主义有神奇的预见性。就青年文化来说,这是“朋克音乐的时代”——“在充满危机和突变的惯用意象当中,到处流行着先知预言,到处充满朋克

修辞……”(Hebdige, 1979: 27)。这也是“雷鬼乐”(reggae)^①和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所说的黑人“释意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②出现的时代,“(这一社群)围绕英国 1972 年到 1981 年间有关拉斯塔法里教(Rastafari)的语言和政治得以巩固起来”(Paul Gilroy, 1987: 197)。

像《监控危机》一样,《通过仪式抵抗》也提供了一种“局势分析”,尽管在理论上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虽然此书对所谓“丰裕论题”的某些方面构成了挑战,但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正是战后的富裕,传媒的普及,摇滚的产生,新的商业流行文化,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早期的消费革命,以及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在《文化素养的用途》(*Uses of Literacy*, 1958)中所说的“美国化”,共同确定了一个新的各种事件可能并发的时刻(conjunctural moment)。正是这一时刻,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青年“运动”的出现提供了相关的文化“生存条件”(例如,可参看 Chambers, 1985: 7)。亚文化的参与者在早期吸收了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的“符号游击战”(1972: 121)。他们也是在这种迅速变化的社会和文化当中,在特定的社交圈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并不是“没有历史”,但许多消费主义的和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ement)的神话——“青年作为一个阶级”——企图以这种方式“神奇地”构造他们。那么,这里要做的工作,就是既要解释他们在这个变化的世界是如何体验和行动的,同时又要解释他们是如何通过“主体”并在“主体”当中得到社会性的定位,并且是如何“屈从于”更大范围的结构和更长久的历史的。一般来讲,解释的环节和语境化的环节在文化研究中都是

① 雷鬼乐(reggae): 20 世纪 60 年代末在牙买加底层青年中形成的一类结合了斯卡乐(Ska)和慢拍摇滚乐(Rocksteady)的流行音乐。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拍在二、四拍上,对英美流行音乐产生过重大影响,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达到高潮。对于雷鬼乐的详尽研究,可参见本书第 10 章“雷鬼乐、拉斯塔法里教信徒和牙买加小混混”。——译注

② 释意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 也被译为“释意群体”、“解释的共同体”,是指共享同一种解释策略或方法的阅读公众。这一术语源自美国文学理论家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最早出现在费什 1976 年所写的一篇名为《阐释集注本》(*Interpreting the Variorum*) 的文章当中。另参见 Stanley Fish,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80。——译注

不可避免的,正如拉里·格罗斯伯格(Larry Grossberg)所指出的,文化研究一般是“非常情境化的”(contextual)(1997:7;seealso,Morris,1997)。《通过仪式抵抗》强调能动性(agency);《监控危机》则强调历史和结构。然而,这项将“社会关系的整体”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的艰难工作——我们的一些批评家视之为“概念帝国主义化”——并不能仅仅通过将自身移情性地融入现象当中就可以回避掉。

因此,在《监控危机》一书中,我们并没有转而去深化民族志学的维度,尽管后者一直是一条富有启发性的、合理的可供选择的道路(尤其参见,Les Back,1996)。相反,我们更喜欢“描绘”一条批判/分析的道路,从人们熟知的一系列带有描述性和“经历性”特征的“具体”历史事实和事件出发,经由一连串由概念建立的意义“体系”框架和制度层面(“许多决定因素”),以此作为分析社会形态结构特定“时刻”或局势的步骤。的确,有许多亚文化理论家把他们研究的现象与更广泛的社会趋势轻率地联系起来讨论。但很少有人将一个层面与另一个层面之间的相互联系(inter-locking)作为优先分析的对象,也就是说,未对某一特定危局中的各种相互依赖的“决定性层面”进行细心的跟踪。

黑人族群散居(diaspora)文化与种族政治

因此,《监控危机》既是一种局势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种研究的方法,即经由各种不同的途径和内在批判,描绘出一系列被忽视的、富有表现力的黑人散居文化和种族政治。这本是《通过仪式抵抗》中一条有重要意义的线索,特别在赫伯迪格的《雷鬼乐、拉斯塔法里教信徒(Rastas)和牙买加小混混(Rudies)》^①以及钱伯斯的《生存策

① Rasta 是 Rastafarian 的缩写形式,是指信仰“拉斯塔法里教”(Rastafarianism)的人。拉斯塔法里教教徒崇拜曾经带领埃塞俄比亚获得民族独立的前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1892-1975),塞拉西 1930 年登上埃塞俄比亚王位前被称为塔法里亲王,该教因此而得名。“拉斯塔法里教”把塞拉西当作黑人的救星,相信“巴比伦”(白人的殖民权力)即将崩溃,黑人民族会获得解救,重返非洲故乡,通过雷鬼音乐和拉斯塔法里运动传到了牙买加境外的黑人和加勒比海及北美等地。——译注

略》这两篇论文当中，随后在他们的著作(Hebdige,1979and1987; Chambers,1985)和吉尔罗伊的著作(Gilroy,1987)当中,得到了相当大的扩展。我们在这一阶段也做了一些战略性的研究,研究与种族和监控相关的争论话题(例如,Jefferson,1988,1991 and 1992;Gilroy,1982, Sim,1982)。从文化方面来看,20世纪70年代后期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合”时刻。赫伯迪格精心考察他所谓的“黑人与白人文化之间的一种特别不稳定的动力……[一种]冷冰冰的辩证法”(1979:69-70);吉尔罗伊重在考察英国黑人文化更为独立的道路。他认为移民在战后定居的早期“缺乏一种可以将他们联合起来的、有单一凝聚力的(single cohesive)文化”(Gilroy,1987:161)。黑人向移民者身份的转变及其在城市日益明显的出现,依旧只“在‘寄居社会(host society)’的流行文化内部”给黑人留下了“一种模糊的存在”(Gilroy,1987:160)。种族化的伤害体验结合了横跨大西洋的异体受精过程,提供了一个“黑色大西洋”的矩阵,到20世纪70年代,一种独特的、融合的英国黑人流散文化已经出现在英国各个城市当中。这种文化由如下一些因素组合而成:新出现的英国黑人身份认同,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伤害的抵抗政治,拉斯塔法里教教义、“教派成员”(locks)、雷鬼乐和草根音乐的观念和意象,以及源于美国民权运动的“黑人权力”观念。在20世纪70年代日益上升的种族主义和攻击性整顿的背景当中,这种文化融入了“社会运动的维度”(Gilroy,1987:198)。

会合的高潮可能是将雷鬼乐的一些主题转译到20世纪70年代的朋克语言当中,转换成新兴的黑人灵魂音乐(soul music)^①,尤其是

Rudies,也称rude boy(girl),rudi或rudy,译为“牙买加小混混”或“粗野男孩”,是20世纪60年代在牙买加首都金斯顿的街区诞生,后又传播到英国的一种青年亚文化。——译注

① 灵魂音乐(Soulmusic),又称灵乐、灵魂乐,是20世纪50年代发源自美国的一种结合了节奏布鲁斯(R&B)和福音音乐(Gospel)的黑人音乐流派,可看作是宗教音乐形式世俗化、流行化的结果。紧扣节奏、拍掌、即兴形体动作,独唱与伴唱之间交流对唱,演员特别紧绷的发声等,都表现了它的特征。该乐派20世纪60年代后期走向衰落,但在70年代广泛吸引其他流行音乐形式并有新的发展,演奏风格更为现代化。——译注

北方灵歌的跨种族的吸引力,以及“双调”(two-tone)音乐的“兴衰”(Hebdige, 1987: 106ff)。吉尔罗伊认为“双调乐队……推进了鲍勃·马利(Bob Marley, 1945-1981)^①音乐的内在逻辑……最终展现为对源于加勒比地区的流行形式与民粹主义政治的融合”(1987:171)。这种音乐开辟了“一种可能性,即黑人和年轻的白人可以在他们破灭的后工业困境中发现共通的或类似的意义”(同上)。吉尔罗伊认为,这一点“与其说显示了一种相互对立的冲动的会合……不如说显示了流行音乐的持久性及其吸纳各种矛盾元素的能力”(1987:170)。不过,这些会合为随后黑人音乐和时尚的“主流化”提供了条件,为它们在英国青年和街头文化当中获得了优势地位,尽管随后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和分裂,但它们从未失去影响力(see Pool, 2006)。

然而,赫伯迪格和吉尔罗伊两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确认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出现的一场重大“决裂”:尽管黑人的反抗此时通过 1980-1981 年和 1985 年的骚乱达到了高潮,但正在发展的政治势头却停了下来,一种新的态度开始出现了(参看, Hall, 1998)。赫伯迪格敏锐地指出,牙买加音乐和受牙买加音乐影响的音乐场景从雷鬼乐向“舒缓”(slackness)和“舞曲”(dancehall)转变,与之伴随的则是说唱乐和嘻哈文化日益扩大的影响,即他所谓说的“纽约关联”[尽管实际是金斯敦(Kingston, 牙买加首都)/布朗克斯区(Bronx, 纽约北部一区)/伦敦(London)之间的关联](1987:122, 136)。吉尔罗伊确认了“拉斯特法里教领导权的丧失”(Gilroy, 1987:197)。虽然吉尔罗伊认为“1985 年在伦敦西区亚裔居住区人们关注嘻哈文化的热情突涨,是证明其创造力的一个重要例证”(1987:217),但他认为嘻哈文化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发展呈现出日益增多的批判形式(1997, 2000)。考虑到非裔美国黑人音乐、特别是都市时尚急剧增长的影响力,他批判了那些要求种族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观点所带有的生物政治论(bio-political)和排外主义的本性,尽管这些观点支持各种新兴的黑人认同和种族团结

① 鲍勃·马利(Bob Marley, 1945-1981):牙买加著名歌手,雷鬼乐主要创始人,被誉为“雷鬼乐之父”。——译注

形式。他质问道,“当地下音乐现象出现在光亮而富有魔力的文化工业及其贪得无厌的商品化机器当中时”(Gilroy,1997:84),即当“嘻哈的边缘性”变成了“正式的、日常化的、华而不实的反抗,甚至当音乐及其相配的生活方式依然作为不法形式被再现(销售)时”,情况又会如何呢(Gilroy,2000:180)?

后女性主义,“新时代”,女性气质和女孩

另一条已经显示出来的研究途径,源于默克罗比和嘉柏在本书和随后提出的“被遗漏的”女孩以及有关亚文化理论的社会性别批判(McRobbie,[1980]1991a),随后扩展到“女性气质”、家庭生活以及更为宽泛的女性主义和青年文化领域甚至这两者之外的领域。这条思路需要批判性地介入文化和性别问题(McRobbie,1984,1989a, and b, 1991a,b and c,1994,1997)。她早期的研究已经将亚文化的关注点引向由女孩占据的那些更具个人性、更多家务、更有家庭和浪漫色彩的世界。早期进行的一些区分——以阶级为基础的亚文化/商业化的青年文化,女性主义/女性气质,本真的/商业的——已经不再具有它们曾经拥有的中肯性、适合性以及分析和解释的权力。“新时代”表现在《杰姬》(*Jackie*)被《正当17岁》(*Just Seventeen*)所替代,后者成了12-16岁的女孩们当中最畅销的杂志(McRobbie,1994:164)。《正当17岁》体现了一种“新风气”:浪漫的缺席;对于流行和时尚世界的各种幻想占据支配性地位;在性方面更为坦率;“观看”的快感和嵌入消费“逻辑”当中的身体。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一种更独立或更‘个人化’的女孩”的出现。

默克罗比跟随这些更自信、更独立的青年女性进入了更广阔的世界。她考察了她们如何进入新的消费者劳务市场,如何推销和销售,以及亚文化企业家的到来给女性提供的新角色(McRobbie,1989a)。这就把关注点进一步从“女孩”转向青年女性,从休闲转向新的非正式劳务市场和新的文化工业(1998年发表了一份对时尚工业当中的女性进行访谈研究的重要成果)。她继续探讨社会性别及其与新工党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所谓“后女性主义”的反驳性的冲击(contradictory

impact)。

在这条研究路径当中,我们可以再次看到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的亚文化“世界”变成了后80年代(post-80s)更为多样化的“青年文化”空间。我们还可以看到向“新时代”的转变:市场与企业家,私有化,自己经营和合同外租,劳动力的“女性化”/散工化(casualisation),“设计师资本主义”(designer capitalism)和消费社会。这唤起了对那些因消费巨潮而出现的各种“赋权”(empowerment)形式和自我塑形(self-fashioning)方式的再评价,像吉姆·麦圭根(Jim McGuigan)这样的批评家,就极力批判这些新形式带有的“民粹主义”。他认为这种转移——即“从辩证的生产/消费模式转向单单关注消费”——是有害的(1992:107)。毫无疑问,为了追踪和概括这些影响深远的快速变革,这种转变的幅度摆动得太大了。但是,对于旧的生产主义“真理”的重申,不足以说明正在发生的局势转变的深度。默克罗比的强调使得她和别人对于社会变革提出了更为复杂的社会性别化的阐释,并对年轻女性开始占据的处在变化之中的世界提供了更为灵活的理解。而且,默克罗比对于消费和快感的广泛关注,正在实现她最初在1980年提出的计划;那时她在对自己早前的批判进行总结时,“推测性地”提出“由已有的阶级、性别和种族概念构成的概念三联体”(McRobbie, [1980]1991a:31)需要“再用三个概念——平民主义、休闲和快感”来补充(ibid:32)。进一步来看,人民不是“文化白痴”以及他们对于变化通常采取对话姿态——人民理解那些理解他们的东西——这样的观点,本是一项更长远的理论转变的构成元素,但有时被太过简便地简缩为“后结构主义”。这意味着从单向度的社会和经济决定观念向一种带有“许多决定因素”的更具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的转变,这一视角尤其体现在各种消费和自我塑形理论当中,体现在传媒研究中的“积极受众”观念和编码/解码观念当中,还体现在更早时期提到的“修补拼贴”观念当中(葛兰西的广泛影响在此不无关系)。

默克罗比的著作所跟踪的一个总体性的问题,就是消费主义社会看起来在“模仿”某些女性主义的主题和关注点,但同时又在吸收和中和(neutralise)它们的批判意义和影响。对商业赞助性“流行女性主义”

之含混性的这种关注，与保罗·吉尔罗伊后来对嘻哈音乐和匪帮说唱乐(gangsta rap)早期“直率”观念所发生的变化进行的批判并没有不同。另一个关注点是，女性主义学者、教师和研究者如何才能以一种评判的(judgemental)、苛评的(censorious)“对抗的女性主义”和女性快感“游戏”之间指引出一条路线，同时又不丧失它们的意义(bearings)，不会变成与“商品化的女性主义”串通一气的东西(McRobbie, 2007a)。在一定程度上，她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归因于女性主义心理分析的影响和“女性主义作家”全盘说出她们欲望的新意愿：

就像许多其他的女性……对于完美身体、美妙的浪漫爱情和迷人的生活方式的幻想，即使在我们试图否定它的时候，也继续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这种承认开始破除“女性主义”和“女性气质”的对立界限。

(McRobbie, 1997: 194)

许多这些论题在不同领域的工作中找到了共鸣和相似的东西，这些领域是伴随我们可以称之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断层线 (fault-line) 而出现的。

男人和男性气质(masculinity)

阅读默克罗比对于消费和快感的研究——我们可称之为 20 世纪 80 年代“积极向上的一面”，我们容易忘记它“向下衰落的一面”，即冲突的范围和强度以及伴随这种衰落而出现的社会混乱(social dislocation)。骚乱、罢工和国内冲突促成了新企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设计师资本主义”和雅皮(yuppie)^①英国的痛苦诞生。在 1980-1981 年和 1985 年的骚乱中，来自失业、社会排斥和种族伤害程度较高的城

① Yuppies 一词 20 世纪 80 年代最早出现于美国，是比照嬉皮士(Hippies)一词造出来的，专指那些受过高等教育、住在大城市、从事专业性工作、生活优裕并且追求时尚的“唯美”男性。他们更多关注个人的生活品位和享受。另被译为“优皮士”。——译注

市贫困中心区的愤怒黑人青年群体及其白人同伴,在爆发的一系列暴力事件和对抗事件(通常由“拙劣的”管制所引起)当中,清楚地表明他们的不满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警察和市民之间的这种定位进攻式的对抗,注定会成为后工业化景观的一种间歇性的特征。持续很久的罢工也表现得很突出。这些非常混乱的愤怒的决战,就像最初的钢铁工人、此后的矿工、再此后的印刷工人——带有相当大的政治和工业“影响力”的传统产业工人——被国家或私立雇主所“接纳”,最终被挫败,从而为私营公司利益的增长和“市场力量的自由博弈”扫清了基础。后工业化绝不只是“碰巧发生的”:它是被强行赋予的,或被强行推动的并穿过了日益被称之为“旧劳力”(old Labour)的中心地带——在老的工业社区,工人们为他们的的工作、共同体和“生活方式”而斗争;在内城区(innercities)或存在社会排斥和种族不公(racial disadvantage)的地区,工人们也是如此。私营资本“管理特权”的复兴和私营化的蔓延,“动摇并挤掉了”许多工作,为了适应因全球化竞争风潮“必然需要的”残酷的成本削减,又对保留下来的工作进行了“重组”。制造业工作和生产力的丧失伴随着服务业和个体经营(self-employed)部门的迅猛发展,在这些部门,只有极少数幸运的人才会有升迁机会,而对于许多人来说,有太多不定期的、暂时的、低工资的、传统上为女性所干的“低薪无前途的麦当劳式的工作岗位”(Mcjobs)。“隐蔽的”社会成本非常多: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公共支持结构的瓦解和破裂;对“新穷人”——领退休金者,失业者,单亲家庭,年轻人,半失业者以及日益增多的黑人和亚裔青年——的剥夺;精神疾病、吸毒和轻微犯罪的蔓延;家庭破裂。因此,20世纪80年代是充满冲突的、导致社会紊乱和文化转型的衰落的十年,一种趋向新的、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变革残酷地强加在人们身上;工人阶级利益的传统保卫者工会和(老)工党,也顺应了新的形势。

这些变革导向了两条相关联的思路:一条是关于“下层社会”(underclass)的相对短暂的争论——我们之前就简单讨论过;一条是对于男人观念和男人气质的相对持续的关注。有趣的是,基思·海沃德(Keith Hayward, 2006)作为新文化犯罪学的一名开创者,公开承认《通过仪式抵抗》是其要继承的重要传统,他中肯地解释了为什么关于“下

层社会”的争论是短命的。他认为,“傻帽”(Chav)^①这一称号正在代替现在很少使用的“下层社会”这一称谓。换句话说,“傻帽”这一称号在一个崇尚消费和名声的时代可用来显示社会排斥或边缘性。但是,对于“下层社会”生活的值得关注的研究,出现在那些充斥毒品(滥用)和种族主义的文化场所。例如,迈克·科利森(Mike Collison,1996)访谈了一群滥用多种毒品的男性青年罪犯。我们可以将他们看作一个滥用多种毒品的亚文化群体。科利森用了一个较新的描述风险社会的术语,把他们称为“自反性的失败者”(reflexivity losers)。无论怎样,他们都在结构上构成了我们这个充满竞争性个人主义的“美好新世界”里那些被抛在后面的人:“下层社会”成员。可以说,他们的“神奇性解决方案”为了保住他们“邪恶而疯狂的”名声,包含了对成为失败者的“悲伤”的拒绝。关于新种族主义的问题,我们会想起像莱斯·贝克(Les Back)、迈克尔·基思(Michael Keith)和菲尔·科恩等人的那些以民族志为基础的研究著作,而科恩就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老的亚文化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对于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时代、种族特征混杂并以种族划分开来的贫困社区下层社会生活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对亚文化研究的贡献(例如,Back,Cohen and Keith,1999)。

(就这本书来说)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女性主义者对于男性的挑战——即要严肃对待社会性别问题——促成了有关男人和男性气质的研究。非常有趣的是,研究中心的另一位成员安德鲁·托尔森(Andrew Tolson),恰巧在《通过仪式反抗》出版之后出版了一本研究男性气质的书(1977年)。但是,正如麦圭根提醒我们的,这是一本在“那个时代相当孤立的著作”(McGuigan,1992:106)。然而,随后不久就出现了许多研究男人和男性气质的学术成果:论文、著作(根据怀特黑德在2002年的统计,仅20世纪90年代就超过了5000册)、研究报告以及

① Chav 是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经常被用来描述那些出身工人阶级、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追求时髦消费时尚的年轻人。这许多人把 Chav 和一些社会问题联系起来,比如酗酒、暴力、反社会倾向、青少年早孕、缺乏社会责任心、道德感、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等。
——译注

五卷本的“经典”文章读本(2006年出版)。大量出版的这类著作都是以澳大利亚学者鲍勃·康奈尔(Bob Connell)的理论著作作为基本框架,但在我们看来,这些著作对他最初对这一问题所做的讨论——《社会性别与权力》(*Gender and Power*, 1987)一书——并没有什么改进。康奈尔在这里结合并改编了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①、安东尼奥·葛兰西以及托尼·吉登斯(Tony Giddens, 1938—)的观点,创造出关于有多重结构的、充满争论的两性关系领域的观念,这种观念通过社会行动者的实践得以复制。带有历史和文化特点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各种变体(versions)的合成模型(resulting model),由于要与女性气质的各种变体和各种从属性的男性气质(后者扩展到包括“有同谋关系的”和“边缘性的”的男性气质,参看 Connell, 1995: 79-81)相抗衡,已经促成了一系列对于处在不同文化、不同历史阶段和制度背景中的男人和男孩的研究。不同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在(亚)文化研究内部提出挑战,关于男人和各种男性气质的研究在一种比较传统的现代主义或现实主义/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当中占据了绝对的空间。

另一方面,这种研究对学术界之外的事物一直也有很多关注:最初关注所谓“新男人”,由女性主义不时推动的具有更高社会性别平等内涵的大都市的产物;随后,关注那些发动“激烈对抗”的“新小伙”;最后,关注“男性气质的危机”。从政治上看,由于伴随着下层社会的争论,这项研究的出现有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即在英美世界出现了新右翼的兴起、新自由主义的重建,去工业化现象及其产生的各种转型:在性别和种族关系发生转变的背景下,去工业化、散工化以及工作不安全感对于工人阶级青年男子的影响,像各种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已经近乎一场灾难。一幅“最糟的个案”复合图像显示出如下的情形,一个男青年在学校的表现要比女孩差(加勒比裔黑人则被完全排除在外);他很早就辍学了,几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或经济独立的机会;令人厌倦的闲暇时间往往被狂饮和消遣性(或上瘾性)的吸毒所占据;反

^① 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 1940—),英国当代著名女权主义思想家和精神分析学家。——译注

社会的行为和有时与警察发生的争吵,黑人或亚裔尤其如此;没有机会离开家庭去建立另一个稳定的家庭单元;成为“没有责任感的”早熟的“父亲”。由于他处于困境,新的个人主义文化指责他;新的消费主义也拒斥他。由于缺乏以工作或社群为基础来构造男性气质认同的源泉,他会被新女性主义(或者从事一项女性化的服务工作)搞得很困惑或者感到很受威胁;他如果是黑人,会退回到日益孤立的黑人世界,他如果是白人,会感觉到本地的黑人男性既是一种威胁(对“他的”工作、地盘和女人们),又让人忌妒(因为他们的坚强、“酷”和性能力)。许多白人男性对于这一切情况的反应,很可能是对最糟糕的、最退化的传统男性气质特征的一种防御性的强调,是一种复杂而矛盾的种族主义。黑人男性感到的是一种愤怒的失败感,是一种从内心对女性、社会排斥和刑事定罪的贬损。这些“过度男性化的”(hyper-masculine)反应与当代关于青年不端行为的那些表述(discourses)——新粗野性(loutishness)、新少男主义(laddism);游手好闲者(yob);“傻帽”族;“带帽外套”族——构成了一种复杂辩证关系,并带有这些表述相应的治安“解决方案”:在生活 and 表述两个方面均出现了“男性气质的危机”。

当然,真实的图景肯定更为复杂,而且各种实际的研究(这些研究建构了这种复合图景)还有更为细微的差别。例如,琳达·麦克道尔(Linda McDowell)最近对于男性气质以及雪菲尔德(Sheffield)和剑桥(Cambridge)两地白人工人阶级青年的访谈性考察,就发现他们夹在她所谓的“抗议”(仿效康奈尔的研究)和“驯服”这两种男性气质之间,前者是较粗鲁的、更有男子汉气概的、更街头的描述,后者则是更体面的、能“安顿”下来的描述(2003:200)。还有一项规模更小的附属研究,对这种研究的结构目标(structural thrust)有某种程度的批判。这一研究并不探问(根本结构性的)问题:作为阶级主体和种族主体的男人们如何展现“适当的”男性气质(即以各种方式对阶级、种族和社会性别的现存结构进行再生产),而去探究一个带有后结构主义特点的社会心理问题:出身于不同社会背景的那些(而不是全部)男人是如何去认同那些关于男性气质的特定社会话语的。这一问题包括要严肃对待个人经历的心理层面;要考察一个男人独特的幻想史、焦虑史和欲望史,

连同他的社会地位与种种偶发事态(situational contingencies)一道,如何造成了他特有的话语建构(discursive investments)形态(Jefferson, 1994, 2002)。但是,无论是以结构主义的还是以后结构主义的表象呈现,这种研究都会遇到一种“大的图景”,都有一种将(处于变化中的)各种有男性气质的实践行为和价值观与正在变化的现实相联系的企图。正是这种试图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欲望,使得它与《通过仪式反抗》有了关联,尽管这种对于男性气质的研究几乎没有明确地关注到“风格”和文化的问题。

理解 20 世纪 80 年代

所有这些思想路线以它们不同的方式所揭示的东西,就是在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的转折点上出现了一条重要的断层线(fault-line)。令人感到自相矛盾的是,我在第二部分综述的许多常规的亚文化文献,也将 20 世纪 80 年代视为一个转折时期。这些文章的作者们认为,这预示着整个亚文化领域和以前一直用来“思考”亚文化的问题框架(problematics)将发生一次根本性的移位(dislocation)——甚至局部性的消亡。这里使用的一些术语——“部族的”(tribal)、“后现代的”、“后亚文化的”——都在试图以更概括性的术语来描述这种转变的特征。锐舞文化和“夜总会”文化的兴起,可以说体现了这种转变:将各类亚文化“运动”吸收进一种更具异质性的(heterogeneous)、社交性的或性别混杂的、多样化的“青年文化”,受控于音乐、舞蹈、药物、性和对快感的追求,各种风格、趣味和客户群等在其中松散地结合、重叠和增生;参与者被更深地融入音乐工业、新的文化工业、商业化的休闲、消费市场和传媒当中;在这里,一种暂时的、偶然的、恍恍惚惚的(trance-like)“归属感”(togetherness),带有更多新个人主义而不是旧的集体色彩,而且完全有别于朋克音乐和雷鬼乐的瞬间体验,这种归属感一度成为盛行的主流风气。正像伊恩·钱伯斯(Iain Chambers)所指出的,“‘个人的’身体,公共的偶遇”(Chambers, 1985: 209)。

于是,各种趋向和因素就从许多方向开始聚集在同一个“时刻”。这些转变与哪些东西相连接?恰恰是这样一种“多重决定”(overdeter-

mination)的状态构成了我们一直所说的“局势性的转变”(conjunctural shift)。“多重决定”是阿尔都塞在一个不同的语境中提出的影响深远的概念,他明确称之为“‘各种境况’和‘趋势’的会合……尽管这些境况和趋势是完全异质性的——有不同的根源和意义,发挥作用的范围和施力点也不同……但它们却‘会合’成了一个破裂性的统一体(ruptural unity)”(Althusser, 1969:99-100;重点处为原著所加)。由这些“转变”所构成的统一体绝不是单一的;这些转变不能简约为单一的矛盾;它们受多重因素所决定;它们不能简单地被“读取”;它们来自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存在条件;它们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被体验和“经历”。虽然如此,源自这些环节的证据构包含了一种“全面阅读”的邀请,并由此去概括其与更广泛的结构和历史发展的联系。我们一直试图论证的这一点,就是我们认为《通过仪式抵抗》这一项目最独特的地方,而这一点却经常被忽略或被误解。这一点对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必须要做的研究是有效的,就像它对于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有效一样。

当然,还有一种不严谨地指称20世纪80年代这一“断层线”的方式,它使用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术语——“撒切尔主义”。正如莎拉·桑顿(Sarah Thornton)所言,“我所研究的青年,用一句陈词滥调来说,就是‘撒切尔的孩子们’”。这种称谓可不可以、应不应该成为一种超越陈腐或单一描述的姿态?除非以非常指示性的方式,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充分地做到这一点。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有自身的“研究”:更为细致的民族志研究和“深度”描述;将许多分离的历史故事聚集并联系在一起;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历史事件结成联系;更多进行理论化概括。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亚文化研究小组”以及《监控危机》的作者群体中,我们搞了许多这样的概念“图绘”:大部分都是探索性的(heuristic),用粉笔画出来的图表和年表,在很久以前就被擦掉了,从未被保留下来;假设、试验和再假设;不寻求“证据”或完美的答案,而寻求最好的、看起来最可信的、最让人相信“适合”的东西,即使已经知道了也如此。毋庸置疑,这涉及要试用新概念以理解各种新的结构形态(configurations);而且要扩展旧概念以解释那些意想不到的连贯性

(unexpected continuities)。

“撒切尔主义”改变了政治的景观,它不只在 20 世纪 80 年代,而且现在看来它已经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它为英国内部和全球范围内一连串包含各种不同政治看法的政府提供了一种有共识的、中右的 (centre-right) 执政基础。我们今天事后来看,会发现它不仅标示出在选举成功方面的一个戏剧性的逆转,而且也标示出某些更深刻、更长远的东西——实际上,一种与“经济”、政治或“社会”同等重要的关于“文化”的“领导权计划”(姑且用这种传统的分类)。它确实是一个更广泛的、全球性的、跨国的变革过程的组成部分,这一过程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出现的全球化新阶段的各种强制规则(imperatives)强加在经济生活、政治文化、公共制度、社会关系、传媒话语、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它的移位效应体现了一种新的全球性聚合政体——必然也是一种新的“现实政体”——的诞生之痛(McRobbie, 2006)。

新自由主义具有历史意义的规划的核心策略,是释放“市场的力量”,制造横穿所有社会领域的“文化变革”,将它们推进到现在被广泛认定的一个新社会形式——“市场社会”(Bobbitt, 2002)。这迫使所有事情都要服从或效仿“市场化”和交换价值的逻辑,因为只有市场和企业的价值以及作为它们“主体”的竞争性的、占有性的和利己的诸多个体,才被认为有能力去创造财富,推动增长和效率,刺激竞争和利润,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赋予选择权,解决社会需求,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物有所值”(value for money)并提供衡量社会价值的标准。新工党转向了这种新自由主义计划,将其改造成一种更混杂的社会民主主义形式(Hall, 2003);尤其体现在如下一些方面:有关福利、健康、教育和针对性再分配的双重策略,从管理主义出发对社会领域“积极治理”(active governance)观念的重新确立,以及对于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议程的大规模采用。但是,另一方面它已经从根本上控制了同一个领域。不出所料,犯罪、瓦解权威、顺从和尊敬、狂饮以及青年人的反社会行为,已经在那些预示着社会联系和互惠性出现深层分解的、广为人知的症候性迹象当中显现出来。

20 世纪 80 年代的这些发展所形成的这个断层线,已经成为所有

文化生活领域当中的移位(dislocating)力量。那种认为青年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这种重构进程中分离出来的观念,说得客气点,也是非常可疑的。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在高度抽象的层面概述了这些发展。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寻找青年文化与这些更为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之间存在的联系,我们恐怕很难完全理解锐舞文化所带来的那些更加碎片化的、含有多种社会异质元素的、私人化的快感,很难理解“夜总会”社交、名望和全球化休闲文化对于舞蹈文化的兼并(annexation),很难理解政治动力的衰落、对黑人身份的模糊“授权”、“后女性主义”的含混或“男孩气”的反抗以及男性气质的危机——正好专门涉及我们一直追踪的那些思想路径。

当然,探寻亚文化研究的细目与这些广泛的变化参数之间的各种接合点(articulations),是一项远远超出我这篇序言范围的工作。但是,我们通过简单跟踪一个维度就可以瞥见一些会涉及到的问题:可以比较一下,亚文化主体是怎样看待自身在这些不同领域当中的存在状态的,而普通公民在那些关于消费者、消费活动和消费社会的常见的话语范围当中,又是如何被置于一种社会主体的位置的。我们选择消费活动,不仅因为它对于整体的转变至关重要,还因为它以某种形式呈现在整个社会进程当中,因为它是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的场所——人们在这里不但变成了变革之后的社会进程的“主体”并主动适应这一进程,而且同时“受制”(subjected)于它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没有任何新的东西。消费曾经居于 20 世纪之交的福特主义革命的中心位置,福特主义导致了大众社会、大众工业、大众民主、大众政党及大众文化,标志着经济权力和支配地位由欧洲向美国转移——即葛兰西(Gramsci, 1971)在他的《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一文中曾经预言性地提出过的那种局势性的转变。消费主义在“二战”以后被美国再次利用,遂成为战后文化转型——即霍加特(Hoggart, 1958)所说的“美国化”——的核心要素和 20 世纪 50 年代“丰裕时代”的引领性力量。但是,批评家们在他们各自领域进行的研究——如默克罗比在性别和青年文化方面的研究,吉尔罗伊在黑人表

意文化(expressive culture)方面的研究——中已经注意到,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这一点也隐含在对于锐舞和夜总会文化的阐释当中),这就是,消费提供的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场所,在一种充满歧义的(ambiguous)运转中既占据又搁置消费主体;还有,消费主体如何去提供一种特许的(privileged)方式,让主体能够体验他们同自身、同他们正在干的事情以及同他们所处的正在变化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而问题在于,同样的修辞(trope)又重新出现在那些伴随 20 世纪 80 年代断层线而出现的公共话语当中,在这里,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的观念、能动的社会关系的观念[比如说,与国家健康中心(NHS),与学校,与投票,与福利,与民主,与当地政府,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被那种(在范围上)大大压缩但日益受到价格限定的“消费者”的“主体性”所替代,后者让“消费者”与私有化的消费主义建立起个性化的联系,适应“社会的”方方面面。

我们已经论证过,关注那些横跨于各个社会领域的复发现象(recurrences),是最初那个《通过仪式抵抗》研究计划的关键,尽管这些领域本身可能已经发生了许多改变,但关注这些复发现象依然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想搞清楚(而不是简单描述、赞美或贬低)青年人现在是如何看待他们正在创造的事物的话,我们似乎依然需要像 30 年前那样,应努力在一些青年群体的日常行为和表现、更广泛的文化结构形态(cultural configurations)以及正在变化的历史局势等因素当中,去打通并探查这些因素之间的联系。

我们开始时引用了默克罗比关于“带帽外套族”的讨论,她指出了其带有的否定性含意:威胁性的、愤怒的青年男性,“不怀好意”。我们这里将以另一种判断作结,这种含意在这里有了 180 度的转变:

[《时髦》杂志(*Vogue magazine*)]列出的富丽堂皇的时尚律条,已经将“带帽外套族”排到了下一年最令人惊奇的 100 件美妙事物中的第 21 位。

(《卫报》,G2,08.11.05:3)

用《通过仪式抵抗》最初使用的语言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件事看作典型的收编(incorporation)事件,即“扩散”(diffusion)和“拆解”(defusion)风格性的“抵抗”。正像赫伯迪格在本书中讨论摩登派青年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当一份摩登族杂志可以权威性地宣称又有一种‘新的摩登时装秀’(NEW MOD WALK)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承认……这种特殊的白种黑人形象(white Negro)已经……倾覆并死亡了”(p.79)。但是,在目前这样一个非常不同的时局中,两种含义——“带帽外套族”显现“凶猛青年”,“带帽外套族”显现明年“肯定会随之而有”的时尚,“向下的”和“向上的”含义似乎都可以同时共存,其中任何一方都没有要终结的迹象。这肯定会改变每一种对带帽外套族进行当代“解读”的依据;而不会改变要重视症候式阅读这一观念本身。

(孟登迎译)

初版序言

序言

斯图亚特·霍尔 托尼·杰斐逊

这一期的《文化研究工作论文集》致力于讨论战后的青年亚文化群体。我们已经试着对“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这个通常被用来讨论该话题的术语进行了拆解,并把它重构成一幅更精确的概念图景,用以描述各类青年亚文化群体以及它们与阶级文化的关系,描述它们与文化领导权的维持方式(在结构和历史两方面)之间的关系。因此,这刊物是该中心的“亚文化研究小组”在过去3年多时间里集体协作的成果。这项工作不但在中心内部得以持续和扩展,而且与同一领域中的其他研究工作保持着富有成效的对话。因此,这里拿出来的成果和构想只是一些半成品。它们决不会冒充为是不可更改的、最终的或“正确的”思想。我们期待它们会引发进一步的研究、讨论和澄清,并期待这方面的内容在其他场合也能够在学术刊物上发表。

尽管这项研究带有未完成性,我们依然认为它有助于勾勒这项研究的简史,即这项研究的关注焦点在这段时期是如何转移的,我们当下的位置是如何到达的(立场是如何得出的)。像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我们的起点是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的《局外人》(*Outsiders*)。至少在我们看来,这个文本最大限度地表明了主流社会学出现的“断裂”,以及随后被许多社会学家——主要研究越轨行为(*deviance*)、亚文化理论或犯罪学——所接受的并为我们后来所熟知的符号互动论(*interactionist*)、后来的“交互影响”(transactional)理论或“贴标签”理论;这些理论最初在美国,但很快在英国也被接受。然而,我们

在阅读这个文本及随后在这个迅速成长起来的传统中形成的英国研究著作的时候,在通常接触这种理论视角的时候,一直都有一种双重性的感受:对这种“怀疑论革命”(sceptical revolution)所引发的某些观念(例如,认为社会行为是过程而不是事件,最重要的是,认为越轨行为是一种社会创造,是某些人有权对其他人贴标签所造成的结果)的重要意义既感到振奋,又感到不安——感到这些阐释虽然包含许多重要的新洞见,但还是不够全面;尤其是感到越轨行为除了公众贴标签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根源。我们随后对于菲尔·科恩的开创性论文的阅读(此文论述了青年亚文化群体以及它们是如何在伦敦东区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文化当中生成的,发表在《文化研究工作论文集》第2期),为这种不安感赋予了一种具体的经验和理论内容(substance)。这基本消除了我们的困惑感,并且将交互影响分析降归到一个边缘位置,转而关注那些造就英国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结构和文化根源。

在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专心于充实科恩所提供的提示性理论框架。最初是通过数篇论文来进行,这些论文对一些独特的亚文化群体——如泰迪族(Teds)、摩登族、光头党等——提出了更详尽的解释,我们从这些论文当中抽取了一部分,重新发表在本书“民族志研究”一章。我们还努力在许多论文中去发展我们的理论立场,包括对科恩观点的扩充、修正和批评,这些努力为这期刊物所展现的理论概述提供了基础。

在开展青年亚文化研究工作期间,我们又参与了“行凶抢劫研究”项目,这次参与对我们随后的研究工作的进展产生过非常大的、独特的有机影响,甚至影响到我们在这期刊物中所采取的理论和方法论立场的形成。这一项目在两个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政治方面看,由于它最初源于对一个孤立的本地事件的关注,因此带入了一种更切身的斗争(engagement);从理论方面看,它把交互影响论(transactionalism)带回到了我们的研究日程当中。由于我们最初的关注点是因当局对于伯明翰汉兹沃斯事件(Handsworth case)的司法反应过度严苛而促成的,因此,我们不能再忽视社会反应这一问题,而我们在亚文化研究中所关注的各种形式的结构和历史分析让我们不会退回到一种幼稚

的交互影响论视角。因而,我们的目标就变成既要解释社会行为又要解释社会反应,从结构和历史两个方面试图适当地处理各个层面的分析:从分析违法犯罪者与控制媒体(control agents)之间“面对面”互动的动力,到分析更广泛的、更间接的各类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纯粹的”交互影响论者忽略了,要分析这些行为同阶级和权力关系、意识、意识形态及领导权等因素的转变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还要谈谈成果呈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大部分——包括这篇长的理论概述——起于“亚文化研究小组”的研究。不论好歹,为了与研究中心的目标保持一致,这是一项协同合作研究:努力支持一项正在进行的围绕核心理论问题的讨论,并支持集体写作和修改论文。事实上,这种集体研究非常难以维持,也并不总是可行:但已经参与这项研究的人,还是愿意在此记录自己对于研究收获的持续感受,尽管随之也带来了诸多问题。这一领域的许多实证工作也是由研究中心的其他一些成员(他们并不直接属于亚文化研究小组)完成的:这期论文集广泛吸收了他们的成果(比如保罗·威利斯和迪克·赫伯迪格的研究)。亚文化研究小组的成果已经赠送给中心全体成员并经过了集体讨论,其他一些章节就是由这些成员撰写的。我们从许多人那里受益良多,他们尽管不是研究中心的人,但与我们沿着相似的思路在搞研究,而且已经直接进入了与我们的讨论,并给予我们学术上的支持。这一次,我们欢迎他们作为编著者加盟这期刊物,他们是:保罗·科里根、西蒙·弗里斯、格雷厄姆·默多克、罗宾·迈克龙、杰夫·皮尔森和约翰·托劳治。最后要说明一点,这期刊物是由亚文化研究小组和编辑团队共同完成的,编辑团队不但承担了实际的任务,还在讨论、修订和重写论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在本期刊登的一些论文结尾处的一些令人费解的“著作人归属”当中,得到了部分但不充分的确认。)

再说明一下格式问题。这一期论文集开头是一篇概述文章,我们希望它能确立本期的主题。然后安排了一个长的章节,选录了一些用“民族志方法”研究战后青年亚文化群体各个方面情况的成果。这样做的目的有三个:首先,是为了指明(但绝对不可能完全)范围;其次,是为了提供经验性的证据;第三,是想用这些提供的经验性材料形成一

种理论基点、理论问题或理论论据,把“概述”中勾勒出的主题联系起来。这一章后面选了一部分篇幅较短的理论文章,这些文章重提并发展了概述一章当中仅仅提及的一些理论点:“风格”的问题,“世代意识”(generational consciousness),“政治”与女孩和亚文化群体的关系。

在全书结尾部分,布莱恩·罗伯茨(他虽然在其他系注册,但在亚文化研究小组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史蒂夫·巴特斯(他与研究中心数个研究领域有长时间的联系)返回到了方法论的问题。史蒂夫·巴特斯所写的一节是一种开放性的尝试,无论是了解亚文化研究小组的研究工作还是对其持同情性批判态度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开启了一种对其研究方法及这些方法潜在的问题框架的批判。

(孟登迎译)

第一部分

理论 I

1 亚文化群体、文化群和阶级

约翰·克拉克 斯图亚特·霍尔 托尼·杰斐逊 布莱恩·罗伯茨

我们这本论文集的主题是各种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s):我们旨在解释青年文化这一现象及其在战后的表现。当然,各界尤其是大众传媒界对这一话题已有过连篇累牍的讨论。但是,有关这一话题的调查和分析多数都是在混淆视听,并给它平添了几分神秘的气息。由于这些调查只是从青年文化引人注目的外观特征来看待这一现象的,它们本身倒成了我们想要解释的一部分现象。那么,我们首先必须清理一下研究的基础,努力识破那些神话和解释——因为它们遮盖而不是澄清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首先要通过驳倒那些目前被认为已经对青年文化有充分界定的概念,建构起有关青年文化的论题。当然,在洞察这种流行的解释时,我们也需保持谨慎,以免我们在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也一起给倒掉了。

尽管各种青年文化一直有着较高的曝光率,但真要评估它们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还是很困难的。“青年”作为战后英国新出现的一群人,显现了这一时期出现的某种最突出、最显眼的社会变迁表现形式。“青年”成了政府报告、新法规和官方干预的焦点。青年在卫道士们看来已经预示着一种社会问题,成为某种我们“需要加以处理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在建构关于这一时期的那些理解、诠释和准解释(quasi-explanations)的过程中,青年作为一块基石,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正如关于流行出版物和社会变迁的朗特里研究(Rowntree study)所指出的:

不仅在《每日快报》(*the Daily Express*)和《镜报》这两份报纸上,而且可能在这一时期的所有报刊上,青年都是社会变迁的一种强烈而隐蔽的**象征**:从基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来看,青年是已经发生剧烈改变的社会**的缩影**——(不是)以那些蓄意颠覆官方政治框架的方式,而是以那些**用传统政治范畴还无法预测的方式**推动着社会的变迁……

(Smith et al., 1975)

我们恐怕很难同意,像“青年文化”这种被大量呈现的醒目的现象,由于其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和意识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会只是一种纯粹的媒体建构,一种孤立的表面现象。然而,葛兰西提醒我们:“在研究一种结构时,有必要把有机运动(organic movement)(相对持久)和那些可以被称为‘局势性的’(conjunctural)运动,以及那些表现为偶然的、短暂的、甚至是意外的运动区别开来。”这种研究的目标应当是去“发现有机运动和局势性的运动之间的正确联系”(Gramsci, 1971:177)。青年文化这种“现象形式”(phenomenal form)只是为这样一种分析提供了一个出发点。我们既不能对这种发展视而不见(像老左派中的“多疑的唯物论者”[sceptical materialists]一样,参看最近出版的《今日马克思》[*Marxism Today*]上的争论),也不能被它们所蒙蔽(像新左派中那些“好幻想的唯心论者”[visionary idealists]有时遭遇的那样)。

A. 若干定义

让我们从一些最小的定义开始。“青年文化”这个术语把我们引向青年的“文化”方面。我们理解的“文化”指的是这样一个层面:社会群体在其中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生活模式,并且把他们的社会和物质生活经验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化是这样一种方法和形式:群体通过它们“调用”(handle)他们的社会存在和物质存在的原料。“我们必须假设生活经验的原料处于一极,而所有通过各种制度正规化了的,或以最不正规的方式散布的那些极其复杂的人类规则和制度体系——可清晰表达的与难以言喻的——则处于另外一极,后者‘调用’、传递和

扭曲着这些原料”(Thompson, 1960)。“文化”是一种实践,它以有意味的形式和形态让群体生活得以实现或具体化呈现。“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Marx, 1970:42)。一个群体或阶级的“文化”是该群体或阶级的独特的“生活方式”,是体现在各种制度、社会关系、信仰体系、习俗(*mores*)和风俗当中,体现在对于物品和物质生活的各种用法当中的诸多意义、价值和思想。文化是一种有区别力的独特形态,通过它,生活的这种物质组织和社会组织得以表达自身。一种文化就是可以让它的成员去理解事物的“意义地图”。这些“意义地图”不仅仅浮现在人的头脑中;它们还被具体化地呈现在各种社会组织 and 关系模式当中,通过这些组织和关系模式,个体变成了“社会性的个体”。文化是一个群体的社会关系被建构、被形塑的方式;但也是体验、理解和阐释这些关系形态的途径。

一个社会性的个体出生于一套独特的制度和关系中,同时也出身于一种特殊的意义结构当中,后者让他(她)可以进入“一种文化”并在其中给自己定位。“社会的法则”和“文化的法则”(社会生活的象征秩序)完全是一回事。这些社会关系结构和意义结构构成了各种群体的持续的集体存在。但它们也限制、改造和约束群体的生活方式及再生其社会存在的方式。因而,男人们和女人们既被它们塑造,同时也通过社会、文化和历史来塑造他们自身。所以,各种现存的文化形态构成了一种历史的积累——一种预先形成的“带有多种可能性的领域”,它被各个群体采用、转化和发展。每个群体都利用它的起始条件——并且,通过这些“利用”和实践,文化得以再生和传播。但是,这种实践只能在各种既定的可能性和限制条件构成的范围之内进行(参见Sarter, 1963)。“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Marx, 1951:225)。①因此,文化就通过历

① 采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的译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译注

史来具体地体现群体生活的轨迹：通常依赖于那些不能完全由自己创造的条件，使用那些不能完全由自己创造的“原料”。

生存于同一个社会并分享着一些相同的物质和历史条件的那些群体，毫无疑问也会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彼此的“文化”。但是，正如依据他们的生产关系、财富和权力的状况，他们彼此之间被不平等地划归为各种不同的群体和阶级一样，依据“文化权力”的范围，“各种文化群”(cultures)也被划归为不同的排列等级，而且，在支配和从属关系中彼此还处于对立状态。关于世界的种种限定和“意义地图”，显示着那些在社会中掌握垄断性权力的群体的生活状况，它们控制最重要的社会砝码和影响力，私吞最大限度的合法性。依照并通过那些最能直接展现社会中强大利益集团之权力、地位和领导权的结构，世界往往被等级化和秩序化。因此，

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支配)阶级的……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他们在这个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都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Marx, 1970:64)^①

这并不意味着一个社会中只有一套思想或文化形式。在一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内部也不止有一种趋势在起作用。那些并不处在权力顶峰的群体或阶级，仍然会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寻找表达和认识他们的从属地位和经验的方法。在一个社会当中，存在不止一个根本性的(fundamental)阶级(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围绕生产力，把两个本质上有差别的阶级——资本家和劳工——联合起来)，就此而言，在特定的

^① 译文采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的翻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99页。——译注

历史时刻,将有不止一种的主要文化结构形态在起作用。但是,那些最能充分反映最强大的阶级的地位和利益的结构和意义,无论它们的内部有多么复杂,都会在与所有其他结构和意义的关系中,充当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文化秩序**。占支配地位的文化(dominant culture)^①总是把自己再现为文化本身。它试图把所有其他文化都限定、包含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它的**世界观**——除非被挑战——必然要充当那种最自然的、无所不包的、普遍的文化。其他的各种文化结构形态,也将不会仅仅服从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秩序:它们会与它进行斗争,试图修改、谈判、抵抗甚至推翻它的统治——它的**领导权**。因此,阶级之间为了物质和社会生活而进行的斗争,往往呈现为阶级之间为“文化权力”分配而进行的各种持续的斗争。在此,我们想对“文化”和“意识形态”做一些区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从属阶级都会有各自独特的文化。但是,当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占有优势的时候,当从属文化只能用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所规定的措辞来**体验自身**的时候,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也就成了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基础。

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绝不会是一种同质的结构。它是有分层的,反映着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利益(例如贵族的观点与资产阶级的观点就是相对立的),也包含着不同的历史轨迹,既有过去的文化遗留(比如一种相当世俗的文化中的宗教观念),也有目前新出现的因素。处于从属地位的各种文化并不总是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产生公开冲突。它们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之共存,越过其中的一些空间和缺口,突然**侵袭它**,“从内部挤扰(warrenning^②)它”(Thompson, 1965)。然而,尽管文化斗争的本质绝不能被还原为一种简单的对

① “dominant culture”有“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主导文化”、“主流文化”、“主文化”等多种译法,本书采用“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这一译法,如在个别地方因汉语表达习惯所需,会译为“主导文化”并注明英文。——校注

② “warrenning”一词较难翻译,从各种词典仅查到warren的名词意义:“像兔子窝一般拥挤狭窄的公寓或街区”。结合上下文似指工人阶级大量聚居的文化已经从内部侵扰到了主导阶级文化的权威,试译为“挤扰”。——校注

抗,但是用更为具体的、更有历史内涵的“文化群”(cultures)这一概念去取代单数的“文化”(culture)概念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种(对于文化的)更为清楚的界定,它可以更清楚地阐明如下事实:各种文化总是处于支配与从属的相互关联中,在某种意义上,也总是处于彼此的斗争之中。单数的“文化”概念只能以最普通、最抽象的方式指出,在任何历史时刻一个社会中总有大量的文化结构形态在起作用。而我们必须立即做出调整,转向这些结构形态所凸显的、在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与从属的文化之间存在的决定性的关系,转向那些确立了它们之间文化辩证关系的收编过程和抵抗过程,并且转向那些以支配或“领导权”形式传播和再生“这种文化”(即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的制度(institutions^①)。

在现代社会当中,最基本的群体就是社会阶级,同样,从基本的但常常间接的(mediated)方式来看,最主要的文化结构形态就是“阶级文化”。与这些文化—阶级结构形态相关,亚—文化群落(sub-cultures)是一些附属系统(sub-sets),一些规模更小、更具地方化和更具差异区分性的结构,附属于规模更大的文化网络系统当中的某一部分。首先,我们必须通过亚文化群体与其所属的那个更大的阶级—文化网络系统的关系——前者成为后者独特的构成要素——去理解它们。当我们考察一种亚文化与其所属的那种“文化”之间的这种关系时,我们就称后者为“父辈”(parent)文化。大家不要将这种关系混同于“青年”与他们“父母”之间的特定关系,我们会在后面谈及后一种关系的许多方面。我们要说的是,一种亚文化,尽管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其“焦点关切”(focal concerns)、其独特的形态和行为——不同于产生它的“父辈”文化,但也会与“父辈”文化分享某些共通的东西。在现代城市中不时出现的先锋派的(avant-garde)波希米亚式亚文化(bohemian subculture),一方面与它的“父辈”文化(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城市文化)不同,同时又是

① “institution”一词有“制度、机构、体制、机制、习俗和惯例”等多种含义和译法,本书一般采用“制度”和“机构”两种译法,个别地方也会依照中文表达习惯和原文语境做其他选择(此时会注明英文)。——校注

它的一部分(与它共同拥有一种现代化的观点、一套教育标准、与体力劳动者相较的特权地位等)。同样地,“对快乐和刺激的寻求”,虽然曾被一些分析者视为工人阶级“帮派犯罪亚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但它其实也与工人阶级文化分享了某些基础的和基本的东西。因此,各种亚-文化群落,首先必定会与它们的“父辈”文化(它们是这种“父辈”文化的附属系统)有关联。但是,我们也必须从亚文化群体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全面安排整个社会的文化权力——的关系这一角度来分析它们。因此,我们可以在工人阶级文化内部区分出令人尊敬的(re-spectable)、“粗暴的”(rough)、违法的(delinquent)和犯罪的(criminal)等多种亚文化群体;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虽然它们彼此各不相同,它们都首先源自一种“工人阶级的父辈文化”。因此,与占支配地位的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文化相较,它们都是从属性的亚文化群体(我们相信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格雷厄姆·默多克的呼吁——对亚文化群体进行更加“对称的”分析。他的文章见后面的章节)。

亚-文化群落必须表现出足够独特的形式和结构,以便同它们的“父辈文化”清晰地区别开。它们必须在特定的行为、价值或者对人工制品和领地空间(territorial spaces)的特定利用等方面受到关注,从这些方面能让自己从更宽泛的文化当中明显区分出来。但是,由于它们是附属系统,也必然存在一些将它们与“父辈文化”捆绑和联结在一起的重要事物,例如,著名的克雷孪生兄弟(Kray Twins),^①既属于东伦敦区高度分化的“犯罪亚文化”,又属于伦敦东区工人阶级的“正常”生活和文化(事实上,“犯罪亚文化”一直是它的一个可以被明晰辨认的要素)。依照刑事联谊会(the criminal fraternity)的说法,克雷兄弟的行为标示出那一种亚文化的区分轴:克雷兄弟与他们的母亲、家庭、家乡和本地小酒馆的关系正是这种捆绑和接合的轴心。(Pearson, 1973; Hebdige, 1974)。

因此,亚-文化群落是围绕一些群体的某些独特的行为和“焦点关

① 克雷孪生兄弟(Kray Twins)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伦敦东区黑社会帮派的著名头目。

——译注

切”形成的。它们的结合或松散或紧密。有些亚文化群体只是在父辈文化内被松散界定出来的一些分支或“环境氛围”(milieux):它们并没有自己独特的“世界”。另外一些则发展出一种清晰而连贯的认同和结构。我们在这本书里一般只处理那些有相对严格界限和独特形态的“亚文化群体”(不管它们来自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的“父辈文化”),它们是围绕各种独特的行为、焦点关切以及领地空间聚合起来的。当这些有严格界限的群体同时也具有年龄和代际的特征时,我们就称为“青年亚文化群体”。

“青年亚文化群体”形成于社会和文化生活领域。有些青年亚文化群体显现“父辈”阶级-文化中某些固定的、持久的特征:例如,工人阶级青少年男子形成的声名狼藉的“越轨文化”(culture of delinquency)。但是,有些亚文化群体仅仅是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出现的:它们显露出来,身份得到确认,并被贴上标签(要么被自己,要么被别人);它们一度控制了公众关注的焦点,然后淡出、消失,或者得到极广泛的传播,以致最终失去自身的独特性(distinctiveness)。我们在这里主要关注的正是后一种亚文化结构形态。泰迪男孩、摩登族、摇滚派或光头党的奇特服装、风格、焦点关切和环境氛围等,使得他们作为各种与众不同的群体,既脱离了整体的工人阶级文化的广泛形态,也脱离了由“普通”的工人阶级男孩(在更为有限的意义上,也包括女孩)所展示的那些更普遍的形态。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差别,我们还是要强调:作为亚文化群体,它们仍然继续生活在它们来自的那个更具包容性的阶级文化之中,并且与之共存。一个亚文化群体的成员也许在走路、说话、行动和外表方面“有别于”他们的父母或他们的一些同辈人;但他们与自己的同辈和父母都来自同样的家庭,上同样的学校,做几乎同样的工作,住在同样的“穷街陋巷”。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他们与衍生出他们的“父辈”文化拥有同样的立场(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相比而言),同样基本的和决定性的生活体验。通过他们的着衣、行为、休闲活动和生活方式,他们可以对他们所面临的一些难题——这些难题是由他们的物质、社会阶级地位和体验带来的——投射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反应或“解决方法”。但是,一个亚文化群体的成员身份,并不能保护他们可

以免除决定性的经验矩阵(matrix of experience)和塑造他们整个阶级生活的诸种条件的影响。他们经历并回应与他们阶级其他成员**相同的基本问题**,这些成员并没有“亚文化”意义上的那种区分性和独特性。尤其是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相较,他们的亚文化像他们阶级文化中的其他要素一样,依然是从属性的(subordinate)和被置于从属地位的(subordinated)。

在下文中,我们将试图揭示为什么青年亚文化群体的这种**双重接合(double articulation)**——首先与父辈文化(如工人阶级文化),其次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是展开分析的必要途径。对我们来说,各种亚文化代表着一种必然存在的、“相对独立的”但又是**中介性的(intermediary)**分析层面。任何一种试图把亚文化与“整个社会文化结构”联系起来的做法,都必须借用这些必要的差异来把握它的复杂统一性。

单数的、带有大写字母的“**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是一个我们从别处借来的、适用于我们的分析的术语,我们只能且只在描述意义上使用它。当然,这一术语正好普遍出现在流行用语和新闻用语当中。这就是“青年现象”这一术语在战后这段时间一直被合乎情理地广泛挪用的方式。它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而普通的讨论起点,一个简单的概念。但实际上,它已经预设了一些非常复杂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它掩盖和抑制的许多东西——比如,青年在不同阶层中的差异,青年文化的阶级基础,“青年文化”与父辈文化、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之间的联系,等等——比它揭示的东西还要更重要。这一术语预设了一种前提性的观念:“青年”在这一时期遇到的事情同他从前遇到的所有事情都有着天壤之别。这意味着,青年在这一时期接受的所有事情,其重要性都胜过他们加入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青年群体或他们在社会阶级构成中的差异。它支撑着某些意识形态性的解释,比如,年龄和世代(generation)至关重要,或者,青年文化“起初无阶级差别”——甚至“青年”本身已经成为一个阶级。因此它只是从一些最显著的现象方面——如音乐、风格、休闲消费等——去界定“青年文化”。的确,战后的青年热衷于一些独特的文化追求,而且这与针对“青少年市场”的休闲和时尚工业的扩张有密切的关联。但是“青年文化”这个术语却混淆

和等同了这两个方面,但是我们需要是一幅复杂的图景——既反映青少年如何获取和挪用市场提供的东西,反过来又反映市场如何征用和收编亚文化群体产生的东西:换句话说,反映青年和青年市场工业之间的辩证法。“青年文化”这一术语几乎完全是从对青年的商业和广告操纵和利用的角度来盗用(*appropriate*)青年的特殊处境。作为一个概念,青年文化缺乏或者没有阐释效力。我们必须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更深根源上去看穿青年市场现象。简言之,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废黜(*de-throne*)或解构(*de-construct*)“青年文化”这个术语,以支持一种更复杂的分类体系。(这种拆除工作的一部分完成于本书后面有关“风格”的文章中。)

首先,我们会用更富结构意味的“亚文化”概念来取代“青年文化”这一概念。然后,我们想根据“各类青年亚文化”与“父辈”文化,以及通过父辈文化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再扩展一步,根据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与从属文化之间的斗争来重构“亚文化群体”。通过努力构建这些中介层面以取代这种无中介的、笼统的“青年文化”概念,我们试图在不破坏其特定主旨和立场的前提下,揭示各类青年亚文化是如何与阶级关系、劳动分工和社会生产关系产生关联的。

绝对有必要谨记在心的是,我们这里讨论的话题仅仅涉及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青年的某些生活断面——在这里,他们采用一种独特的亚文化方式来回应自身的处境。这一点绝不能同那种试图描绘整个工人阶级青年的社会和历史地位的努力混为一谈。大部分工人阶级青年从未涉足一个有紧密组织或凝聚力的亚-文化群落。这些个体在他们的个人生涯中,也许会在一种或好几种这样的亚文化群体中进进出出。他们同现存的各种亚文化群体的关系可能是短暂的,也可能是持久的,可能是边缘的,也可能是重要的。这些亚文化群体之所以重要,就在于青年人的反应采用了一种特有的有形的(*tangible*)形式。但是在战后的阶级历史当中,这些事情与大部分青年人在大部分时间里的所作所为相比,并不显得特别重要。在青年人各种不同的生活断面中“日常生活”与“亚文化生活”的关系,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问题,而且绝不可能归为我们在此讨论的这个相对有限的话题。正如霍华德·帕克

(Howard Parker)提醒我们的:即使是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群体中的那些“惯犯”,也只是偶尔沉迷于非法的或越轨的犯罪行为当中(Parker, 1974)。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校和工作比风格和音乐有更为重要的建构意义,甚至在意识层面上也是如此(参见以下格雷厄姆·默多克的文章)。

正如保罗·科里根雄辩地证明的那样,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小伙子首先关心的是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获取最大限度的消遣——如何打发时光:“无所事事的辩证法”(参看下文中科里根所写的《无所事事》一章)。

B. 青年:社会变迁的象征

在这一部分,我们打算分三个步骤来讨论:先探讨青年亚文化群体最明显的外观,再转向探讨它的更深层的含义。我们首先要讨论它最直接的外观:青年文化的新奇性(novelty)。其次,要讨论社会变迁中那些最醒目的(*visible*)方面,后者被从多方面认为是促成青年文化产生的原因。最后,我们要考虑一场范围更广的争论,对于这场大争论来说,尽管有关青年文化的这场争论只是附属性的小分支,但也是相当重要的。

我们已说过,“青年文化”这一概念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它在战后表现出的新奇性。我们下面所引用的罗伯茨的一段话,则提醒我们要对这种说法保持警惕。尽管这段话描述的实际上是生活在“典型的贫民窟”里的那种穿着爱德华七世时代服装式样的青年(Edwardian youth)^①,但它几乎可以被看作是在谈论任何一种独特的战后青年文化形式:

那些在美好的夜晚聚集在很多贫民窟街道深处的成群结队的小青年们,遭到了所有正派市民的一致谴责。每年夏天他们都受到城市治安官员的指责,遭受警察们越来越多的烦扰。19世纪

① 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 1841-1910)在位时间是1901-1910年,这一时期的英国受到欧洲艺术与时尚的很大影响,人们的风格意识日益突出。——校注

晚期,北方奔袭者(Northern Scuttler)和他的“情妇”(moll)就获得了恶名,其臭名昭著的程度与任何一个现代帮派不相上下。奔袭者有他自己的服装风格——穿混纺纱衬衫(union shirt)、喇叭裤和厚皮带,上面有用大号的钢皮带扣刺出一些别出心裁的图案,穿那种用铁皮包着的厚木底鞋。他的女友一般也穿木底鞋,戴围巾,穿直条纹的裙子。

(Roberts, 1971: 123)

在对当代现象做任何一种分析时,从历史方面进行考虑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研究)领域的许多缺憾,至少从某些方面可以归咎于历史维度的缺失或缩简。在“青年文化”这一特殊领域里,对于那些极少数的历史研究,我们所能期待的或许只有这种历史的短视。特别是当人们将青年在战后的处境与他们先前的处境(目前依然存在)进行比较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当然,在一种社会历史学的视角的影响下,人们对童年和青年的社会历史、对休闲和学校的兴趣与日俱增。菲尔·科恩和戴夫·罗宾斯(Dave Robbins)1978年即将出版的关于亚文化的论著,^①将会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历史比较框架]。上面引用的罗伯茨的话,清楚地指出了我们无法忽视的历史延续性。

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就出现了一些独特的新历史特征,后者提醒我们要小心谨慎,别犯相反的错误:倾向于采取一种静止的或循环的历史观,最终抹杀“二战”之后这一阶段的历史特殊性。对于“二战”之后这段时期出现的很多明显的结构和文化的变迁所蕴含的意义,各位论者和分析者现在仍然是众说纷纭;不过,大多数的看法都强调新兴的“青年文化”扮演了突出的角色。根据这种论调,青年文化是这些变迁的产物,是它们的缩影(epitome),或者说得最不吉祥一点,是未来变迁的一种不祥之兆。但是,不管强调的是什么,人们总把青年文化以及它的某些方面与如何解读这些变迁

^① 即 David Robins & Philip Cohen, *Knuckle Sandwich: Growing Up in the Working-class Ci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8。Robins 疑为 Robbins 的拼写错误。——校注

紧密地联系起来。

首先与青年文化的出现相关联的一系列重大的变迁,是围绕“丰裕”、市场和消费日益强大的影响力以及“面向青年的”休闲工业的增长而展开的。这些变化产生的最显著的后果,就是马克·艾布拉姆斯(Mark Abrams)所说的“青少年消费者”的出现;相对而言,艾布拉姆斯把“青少年”看成是新富裕的主要受益者:

……与1938年相比,他们的真实收入(即考虑到货币贬值的部分)增长了50%(这个百分比是成年人消费增长率的两倍),他们真正“可自由支配的”消费可能增长了100%。

(Abrams, 1959:9)

这个结论非常接近于这样的观点:青少年的集体消费习惯,“在独特的青少年生活世界构成了一种满足青少年独特需要的独特的青少年消费行为”(Abrams, 1959:10);换句话说,这种消费行为为一种独特的、自给自足的、自我生成的青年文化构建了经济基础。

第二组被认为与青年文化密切相关的变迁因素,就是伴随大众传播、大众娱乐、大众艺术和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出现接踵而至的那些事物。青年文化在这里容易被确定为一种令人遗憾的副产品。

这种观念的核心思想是这样的:越来越多的人正屈从于这种越来越一致的文化过程(其中隐含的顺从性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大众消费的扩大加上大众“政治解放”以及大众传播的增长(这一点尤其重要)所造成的结果。大众传播的普及被等同于报刊、收音机、电视和大众出版物的增长(而不是计算机、国内电视和视频系统和数据库、信息储存和检索等方面的东西——为“传播革命”提供了现实基础设施的商业和管理“用途”)。对于那些在所谓“大众社会主题”框架内部对社会变迁进行的解释而言,英国商业电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诞生成了一个转折性的事件。

青年文化是通过两种方式与这一系列的变化连接起来的。首先,也是最简单的方式,(认为)创建一种真正的大众文化,意味着在全国

范围内开始使用“模仿”和“操控”手段。由此就认为青年文化是青少年“盲目”(mindless)模仿的结果,是被精明的、“操控性的”商业利益培育出来的。这种观点持久地留存在以下所引的一段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评论当中——由于这段话太过平庸,他可能是对于青年(Youth)最缺乏感知力的评论人:

两个电视频道现在每周都播放着给青少年演奏、供他们评判的流行音乐。当音乐响起的时候,镜头粗鲁地停留在观众的脸上,他们暴露的是一种多么无穷无尽的空虚啊!夸大的脸庞洋溢着廉价的热情,用连锁店的化妆品涂得一塌糊涂,嘴无精打采地张着,眼神呆滞,双手赶着音乐节奏盲目地打着拍子,细高跟鞋破裂了,身上穿着冒牌的、千篇一律的“时髦”衣服:这显然是被某种商业机器所奴役的一代人的集体肖像。

(Johnson, 1964)

其次,也是较复杂的方式,(认为)新出现的青年文化是不祥之兆,它的某些方面体现了新兴“大众文化”产生的那些最糟糕的影响——这种观点倾向于“削弱”工人阶级的行动和抵抗“活力”。霍加特在许多方面都是工人阶级文化经验的细微差别的最敏感的记录者,但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对他进行批判;因为他描写了“晚上在光线刺眼的奶吧里听五分钱自动点唱机的……点唱机男孩”(Hoggart, 1958:247),而这些描写由于缺少具体性和“让人感同身受的”品质,几乎就像是敏锐地分析过的那种新的“雇佣”(hack)文人所写的文字:

他是追求享乐的、消极的野蛮一族,他花上3便士坐50马力的公共汽车,花上20便士看500万美元制作的电影,他不仅是一个社会怪人,而且也是一个不祥之兆。

(Hoggart, 1958:250)

第三组据说“生产出了”一种独特性质的青年文化的变迁因素,则

转向了因战争而在社会体验层面产生的裂缝。这种说法通常认为,战争给这些出生于战争期间的孩子所带来的各种破坏性的影响——父亲的缺席,疏散撤离及正常家庭生活的其他破裂,还有持续不断的暴力——应该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出现的”青少年犯罪负责;泰迪男孩就被认为是其中的典型,他们被看作是青年文化中更为普遍的暴力倾向的先兆。例如,法伊弗尔(Fyvel)虽然没有局限于这种“战争”解释,但还是把泰迪男孩看成是“暴力时代的孩子,出生于世界大战当中……”(Fyvel, 1963, 前言);而纳托尔(Nuttall)则更简单地认为,第一颗原子弹的投放这一孤立事件就是造成“二战”前和“二战”后的两代人产生本质差异的原因:

正好以投放到长崎和广岛的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刻为界,世代被决定性地分化开来……还没有到青春期的孩子们……无法构想带有未来的生活……所谓的“代沟”就这样开始形成,从此日益扩大。

(Nuttall, 1977: 20)

第四组被认为给青年文化的“兴起”提供了重要背景的变迁因素,则与教育领域有关。这种解释首先突出了两种新的发展:一是在限定年龄的学校里“面向所有学生”的“中等教育”得到发展;二是高等教育得到大规模普及。人们认为有许多事情为这些发展提供了推动力:为所有人建立初等/中等教育部门的1944年教育法案(Education Act);因这种重组和战后“突然增长”而出现的扩充的“人才库”;主要通过这种教育体制而形成的、含有社会流动性的精英政治意识形态(meritocratic ideology);在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与该国大量受过严格培训的人才之间建立积极联系的尝试;经济领域对于技工和技术专家日益增多的需求,等等。不过,对我们而言,这种影响是很超常的(singular)。很简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11岁开始在限定年龄的教育机构中度过的时间会越来越长——这与“二战”前的情形有很大的差别,那时候有几乎一半超过11岁的孩子仍然在面向所有年龄段人群的(all-age)小学里接

受“中等”教育。一些论者认为,这种现象为一个特殊的“青少年社会”(adolescent society)的出现创造了前提条件。科尔曼(Coleman)在评论一位美国高中生时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他)与社会其他部门相“隔绝”,被迫退回他自己的年龄群体。他开始与他的同伴们一起建构一个小型的社会,一个在内部有着自身最重要的相互沟通的社会,只通过少数通道与外部的成人社会保持联系。

(Coleman, 1961:3)

最后一点,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服饰和摇滚乐上出现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风格——它们强化了人们可能有过的一些关于“独特的”(unique)年轻一代的疑问。在这里,就像在别的地方一样,各类风格和音乐的特性——根据谁在穿什么、听什么并且为什么这么穿、这么听——被关键性地忽略了,并不顾及新的风格化的入侵,不顾及每周被那些新的“青少年”电视节目描绘成“全景进行时”的形象。根据你如何评价流行文化的这种大规模扩张,来断定是野蛮人兵临城门,还是反叛的潮人(hipsters)终于转回来了。杰夫·纳托尔(Jeff Nuttall)再一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放纵和任性的实例:

泰迪男孩们在等待“猫王”埃尔维斯·普莱斯利(Elvis Presley)^①。全世界20岁以下的人都在等待。普莱斯利是大规模营销时髦风尚的超级经销商……他是公众的一个男神(butch god),有着让·热内笔下的杀手(Genet murderer)^②的那种傲慢和粗野……他

① 埃尔维斯·普莱斯利(Elvis Presley, 1935-1977),美国20世纪5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歌手,素有“摇滚乐之王”的称号,并被歌迷昵称为“猫王”,是流行音乐历史上最杰出、最性感、唱片销量也最高的歌手之一。——译注

② 让·热内(Jean Genet, 1910-1986),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诗人、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早年被父母遗弃,曾是流浪者、小偷、同性恋卖淫者,接触社会底层和边缘阴暗

首先被当作坦率的性魅力，并被公开宣扬……普莱斯利引发的这些骚动，就是具有新感受力(sensibilities)的社群首次自发的集会……

(Nuttall, 1970: 29-30)

对于一种独特的青年文化的兴起所做的这些解释，源自一场关于“二战”之后社会变迁的整体性质的更广泛的争论。这场争论的三个关键词，无疑就是“丰裕”(affluence)、“共识”(consensus)和“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ement)。丰裕本质上是指工人阶级消费者的花费急速增长(尽管也有人进而提出了不太可信的主张，即认为工人阶级不仅有了更多的花费，而且生活得相当安逸了)；“共识”指的是1945年以后执行的所有措施——国(私)营混合经济、增加收入、福利国家“安全保障网”——不仅被各个政党接受，也被大多数选民接受，这些措施根据各阶层在国家系统内的共同利益，把所有阶级的人团结起来。它还包含了这样一个命题：所有阶级在所有主要问题上都已经形成了一种广泛的共识；因此，各种主要的政治和社会冲突，特别是那些呈现过清晰的阶级模式的冲突，已经终结了。“资产阶级化”集聚了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的社会趋势(在教育、住房、重建以及向新的城镇和住宅区搬迁等方面的趋势)，同时还连带出这样一种论点：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文化不再是社会中一个有显著区别特征的结构，每个人都在迅速地向中产阶级的模式、志向和价值观靠拢。这几个术语被编织成一个关于“二战”之后社会变迁的、包罗万象的社会神话或“解释”。简言之，普遍的看法是：“丰裕”与“共识”共同促成了工人阶级的快速“资产阶级化”(bourgeoisification)。这就催生了一些新的社会人物类型、社会安排和价值观。比如“富裕工人”——新型“中产阶级工人”(bourgeois worker)——

生活。他的作品受到让-保罗·萨特的高度评价，多描写边缘人、底层人民和被统治者心灵深处的复杂欲望与想象性反抗。他写过一些生动展现谋杀过程中复杂心理反抗情态的作品，如《女仆》和《黑人》等，剧中的谋杀者表面上都很残忍、粗野和傲慢，但热内要通过这些表现传达更为隐秘的反抗(如施虐)等人性欲望。——校注

就是一种类型,这种人很顾家,以家为中心,有安全意识,有工具理性倾向,有区域性流动,利欲熏心(acquisitive-celebrated);在茨威格的著作中,就有这样的例子(Zweig,1961)。另一种类型是新型的“青少年”,他们信奉风格、音乐、休闲和消费;信奉一种“无阶级差别的(classless)青年文化”。

这样,无论是父母还是他们的孩子,就可能把阶级视为一种必然被逐渐削弱的社会主要建构因素和动力因素。人们发现,其他一些因素正在取代阶级作为社会阶层分化依据的角色:比如地位(status),一种建基于教育、职业和消费业绩等一系列因素之上的多重分化的“权势秩序”(pecking order);再比如教育,一条新的、普遍容易取得的、精英化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凭靠工作业绩就可以获得地位;还有消费,一条可供那些无法接受精英教育的人通过“分期付款”购买地位的新的“富裕”途径;最重要的,还有年龄因素。有关工人阶级成人的所有的说法和思考,从此都被提升到了一个与工人阶级青年相关的新高度。由于工人阶级青年出生于战争期间,被人们认为对“二战”前的社会形态结构缺乏起码的体验和认同。由于他们的年龄,他们成了福利国家和新的受教育机会的直接受益者;他们几乎不受传统的花钱和消费模式或态度的约束;他们大多数热衷于追求快感和瞬间满足,却毫无负罪感。而年龄稍长一点的人们,则仿佛处在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过渡地带。但是“青年人”则完全只生活在新的战后世界中,并且只属于这个新世界。而且,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正好是他们的年龄。世代很大程度上把他们规定为“二战”以后冲在所有社会变迁方面最前沿的群体。青年是社会变迁的“先锋”。这样,你何时出生这一简单的事实,作为一种更有效的社会地位指标,取代了更为传统的阶级分类;而各阶级之间在战前存在的深刻分歧,则被转译为在两代人之间存在的一种纯粹的“代沟”。有些论者通过在这个新的代沟的基础上重组阶级,进一步合成了一个神话:青年是一个“新阶级”(例如,可以参见Musgrove,1968;Rowntree和Rownterr,1968;Neville,1971)。

但是整个争论的关键,取决于我们开始就提出的这三个核心概念——丰裕、共识和资产阶级化——的有效性。我们在这里必须开展

一项工作：从这些术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成分或其建构的内容中去澄清真相。

一般来说，人们无法质疑战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真实性——“丰裕”中的真实成分。毫无疑问，如同品托-杜琴斯基（Pinto-Duschinsky）所说的那样，1951-1964年“生活水平的平均提高幅度比20世纪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更平稳、更迅速”；使用“任何一种主要的绩效指标来衡量，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生活水平与两次大战期间和爱德华七世时期的表现相比，都取得了巨大进步”（Pinto-Duschinsky, 1970: 56-57）。然而，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却严重地掩盖了一个事实：各个阶级的相对地位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自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来，当人们再次发现了大规模的贫困现象之时，这种隐藏在信誓旦旦的“从未如此美好”的意识形态之下的所谓丰裕的神话，才逐渐暴露出其虚构性的面相。

在耐用品消费上的大众花销模糊了一个事实：“英国几乎落后于她所有的主要工业对手，而且她没能解决好英镑问题”（Pinto-Duschinsky, 1970: 58；也可以参见Glyn and Sutcliffe, 1972）。事实上，英国的丰裕“奇迹”建立在非常不可靠的经济基础之上，“依靠的是暂时的、偶然的环境因素”（Bogdanor and Skidelsky, eds., 1970: 8），靠的是一种“神奇的”历史形势。比如，保守党人采取的各种“小恩小惠”（Bread and Circuses）政策，“为了获得立竿见影的政治回报而支持那些过分宽大的政策和暂时性的姑息手段，牺牲了那些对国家长远福祉来说更可取的政策”（Pinto-Duschinsky, 1970: 59），或者，更简洁地说，提升个人消费却牺牲公共部门。这些政策只是对这种形势的一种可能性的回应，并不是后者不可避免带来的结果。

笼统地说，共识也有一个真实的基础。战争时期超越阶级的动员、经济规划、政治联盟和强制性的平均主义，为战后工党政府的各项社会改革提供了实施的基础；战时改革和战后改革在某种程度上都为共识搭建了平台。甚至连传统自由市场的代表人物丘吉尔（Churchill）在1951年重新掌权时，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开始了解国家，并知道为了保持权力当务之急应当做什么”（Moran, 1968: 517）。换言之，丘吉尔

以及更精明的保守党领导阶层已经认识到:他们“摆脱控制”的反紧缩方案的成功,从根本上得力于一种“改良的”资本主义,一种在社会方面有关注的、带着一副“人性面孔”(human face)的资本主义。工党的“选举外衣被盗用了”,“潜在的工党投票者被当作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由他合成的形象,时不时萦绕在工党领导层的脑海中,因此他们很容易被保守主义的一种激进的另类方案所惊吓”(Miliband, 1961: 339),于是,工党领导层胆怯了,并屈从于“这个共识”。在20世纪50年代,官方的政党政治被“中间派的政治”所支配,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些最有活力的政治争论,均是在政党斗争之外独立进行的”(Pinto-Duschinsky, 1970: 73, 74)。

然而,在政治共识(或僵局)成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最重要的特征的同时,这种共识的脆弱性就在这些年“政党斗争的本性当中”显现出来了。尽管“保守党最终成功执政达13年,但是在整个时期,政治斗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也是旗鼓相当的”(ibid: 69)。换言之,这种政治共识的观念掩盖了一个事实:保守党的生存常常得力于那些容易想象到的最短视的权宜之计(如1955年4月“泄密的”通货膨胀预算,尾随着一次临时的4月选举,依次又出现了通货膨胀的秋季削减以及1956年的萧条)。对于保守党统治的整个13年来说,尽管存在这种吸引选票的“贿赂政治”,但实际上有一半的选民在每次选举中对保守党投的是**反对票**。结合戈德索普(Goldthorpe)和他的同事们的调查结果——“一般来说,大多数的富裕工人是而且过去一直是工党的支持者”(1969: 172),同时呼应一下其他的社会学调查,我们完全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共识”:认为它在预示英国工人阶级的一种观望态度(在那时常常被误认为“漠不关心”);在这一时期的任何时刻,这种态度作为一条引导工人支持工党左翼的有效路径,也许实际上已经凝结到一个不同的方向上去了(戈德索普和其他一些人做出了这个判断,参见1969: 190-5)。

“资产阶级化”是我们所用的社会学三位一体术语群当中的第三个术语,也是最后一个,它是其他两个术语的产物。就其本身而言,它是一个最具有构造性的(constructed)术语,因为其他两个术语的弱点

都一同混合到它当中了。尽管如此,“资产阶级化”这个概念也有一些真实的基础,连它的批评者也坚持认为:

我们的调查足以清楚地表明:日益增长的丰裕及其相关联的事物如何能够产生许多深远的影响——既侵蚀了已确立的各种生活方式的活力或吸引力,又激发了各种新的态度、行为和关系模式的发展或者对这些发展提出了要求。

(Goldthorpe, et, al, 1969:26)

然而,剑桥研究小组最为重要的结论——把茨威格的“新中产阶级工人”提交给社会学的细察(sociological scrutiny)——也仅仅确认了他们早期论文所提出的观点(Goldthorpe and Lockwood, 1963):

我们谈及的各种变迁所引起的最显著的变化,与其说是体力劳动者以及他们的家庭被最终同化进了中产阶级的社会圈子,毋宁说是一个极不显眼的会聚过程,即工人阶级中的一些阶层和一些白领群体在某些特定的方面、在某些规范取向上逐渐趋向一致。

(Goldthorpe, et, al, 1969:26)

换言之,如果“资产阶级化”真的有所指的话,也指的是一些非常不同的事情;它在范围上会非常有限,远没有它的那些很有力的支持者(如茨威格)所设想的那么广阔。即使在当时,依据此论题做出的一些政治推断看起来也是牵强附会的、意识形态性的,而缺乏相应的经验(如Abrams, 1969)。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20世纪70年代的视角再回头看看戈德索普的“工具性的集体主义”(instrumental collectivism)和洛克伍德(Lockwood)的“富裕工人”,看看汽车工业罢工频频的本质,看看这一劳动部门在持久的工资战斗和富有战斗精神的车间基层(shop-floor)组织中所展示出的“领导能力”,整个“资产阶级化”的论题就会显得非常单薄、非常不可靠,至少就这个论题在当时被普遍讨论的情形而言也是这样。(值得一提的还有如下一种观点:如果不紧

密结合休·贝农[Huw Beynon]1973年对于利物浦[Liverpool]附近的哈利伍德[Halewood]工厂的经验所做的生动描写,学生们就不会理解戈德索普等人对位于卢顿[Luton]的沃克斯豪尔([Vauxhall]工厂的“富裕工人”的描述。)

总之,尽管在态度和生活模式上发生了一些重要的、真实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被有关“丰裕”的持续的意识形态冲击所遮盖,但是在其中最强有力地贯穿下来的东西,就是对阶级的顽固拒绝——那个作为社会结构主要参数和动力的、令人厌倦的、“过时的”阶级范畴在这里失踪了。

C. 阶级的重现

对于“二战”之后社会变迁的各种解释,已经被供奉在由丰裕、共识和资产阶级化所构成的神圣的三位一体变迁观念当中,它们都仰仗一个奇特的社会神话——工人阶级正在消失。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种“阶级消亡论”的前提假定在两个重要的维度上遇到了挑战。

首先,是人们再次发现了贫困现象和在财富上持续存在的极度不平等,蒂特马斯小组(the Titmuss Group, Titmuss, 1962)、韦斯特加德(Westergaard, 1965)和其他一些批评者就揭示了这些现象。这些研究表明:贫困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特征,而不是偶然性特征;财富只是在名义上得到了再分配,福利国家的主要受益者实际上是中产阶级。极少数人仍然拥有绝大部分的私人财富;而且,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所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1945年后大体保持不变。所谓结伴走向财富均等的观念——认为社会的“机会结构”已经被打开,新的流动性的社会结构已经形成——也被证明是一个空洞的诺言。即使阶级之间相对的不平等状态减弱了,但对于生活机会(life-chances)的绝对分配却没有改变。当然,在职业结构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正如有人再次批驳的那样,这些变化的社会意义被过分夸大了。例如,文书工作(clerical jobs)的数量是大大增加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合理化改革(rationalization)和自动化所导致的白领职业的相对地位的降低。这些职业被分成很多的等级,这经常会导致文秘“主管”与“基层人员”之间的差距过

分拉大。日益增强的工会化行动,以及后来银行职员、护士、教师和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表现出的那种出人意料的斗争精神,就是导向同一方向的更重要的发展形式。至少,这些群体最近表现出的斗争精神表明,那种认为白领职业的增加会促成一个均衡的、平稳的、“温和的”中产阶级社会出现的观点,受到了公开的质疑。

其次,出现了这样一种假设,认为通过一些新的变化——财富的全面增长,相对不平等现象的减少,对社会责任管理部门的更大范围的问责,以及所有权与管理控制权的分离——权力已经被分散了。与此相关,又衍生出了这样的论点:工作领域逐渐从日益私人化的家庭生活领域当中分离出来,导致工人对待工会的态度呈现出一种纯粹的“经济工具主义”(缺乏它过去可能具有的任何一种政治内容);的确,这种不断增多的富裕带来了对于产业工人战斗精神的一种永久性的安抚。然而,正如韦斯特加德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虽然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可能发生了改变,但是工人的眼界和诉求也拓宽了,如果不给工人提供各种自我实现的方式,这些诉求就会变成一种引发社会动荡而不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潜在因源。这就是所谓的水涨船高的期待革命,或者是安德森(Anderson)所说的“工具性的集体主义的政治”。

工人阶级在20世纪70年代反抗那些反工会和反罢工的立法议程,就像他们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为了工资增长能够与通货膨胀同步而不断提出诉求(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一样,显然都支持了这种解释(尽管很值得补充一点,这种防守策略和为工资而斗争的精神,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清晰的政治表达)。此外,部分工人阶级对房地产投机者、再开发者侵犯他们的聚居地进行了反抗,对逐渐上升的房租进行抵抗,并且发现他们的政治表达更多体现在一种社群的、非产业工人的政治活动当中,而不是体现在选举政治和工党政治当中;这些反抗和发现也一直被低估、被贬低、被忽略了。事实上,当我们不是从20世纪50年代的共识视角,而是从20世纪70年代的两极分化视角来看待“权力扩散”这一论题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失去了大部分的可信性(尽管我们不能忽视阶级冲突模式发生的各种变化)。正如韦斯特加德所指出的:

……后资本主义(post-capitalism)的说法显然一直无视产生现实对抗的根源,无视对于各种制度和广大民众当中流行的那些关于当前社会秩序的诸多假设的潜在的异议:也就是说,长期以来倾向于将冲突的制度化误认为是共识,普遍不关心那些可以使体制化日益松动、改变或坍塌的持续性的压力。这些压力的存在应该成为一种持续的提醒,提醒人们注意当今社会结构的偶然性外表特征,提醒人们注意各种假设的有限范围——各种政策通常都是依据这些假设搞出来的,它们很少正视社会结构中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

(Westergaard, 1974:38)

如果我们在那时这样问,“是哪一个社会群体或类别最直接地凝聚了这些社会变迁的本质特征?”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给出一个答案——**青年**:即一种新型的青年文化。甚至像科林·麦克因斯(Colin MacInnes)这样敏锐的观察者,也会做出这样的推测:

我们社会的“两大族群”可能不再是“富人”和“穷人”(或者,用过去的时髦术语,“上层阶级”和“工人阶级”),而是这两类人:一方是青少年群体,另一方是所有已经承担成人责任的人。

(MacInnes, 1961:56)

但是,正如(探讨变迁时所用的)丰裕、共识和资产阶级化这几个支配性的概念(the master conceptions)需要一种更谨慎的、更具批判性的探讨方式,判断青年中出现的变化方向和变化方式时所依据的证据,需要得到更详细的分析和更准确的解释。当我们仔细审查那些相关的作者——他们赞同并使用代沟、“独特的青年文化”、福利国家青年和青年文化的“无阶级性”等概念——时,我们发现,他们出示的证据实际上在诋毁他们对于自己提供的东西的解释。比如在有关“无阶级差别”的解释内部,就常常存在一种自相矛盾的张力,这种解释恰恰

依据的就是对青年的阶级建构。最典型的例子,可能就是艾布拉姆斯关于“青少年消费者”的研究(前面曾引用过),它描述了一种建基于“青少年市场”之上的新型的、独立的(separate)文化。然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艾布拉姆斯本人承认青少年市场具有一种清晰的阶级基础。艾布拉姆斯所说的“普通青少年”就是工人阶级青少年:

……青少年市场几乎是工人阶级。中产阶级的子弟要么仍在中学和大学,要么刚开始工作;在以上两种情形中,他们能够支配的收入要比工人阶级的同龄人少得多,因此,很可能有将近90%的青少年消费是由工人阶级的趣味和价值观决定的。

(Abrams, 1959: 13)

青年形象常常携带着一种凶兆:“事情可能要变糟。”法伊弗尔主要从错位(dislocation)的角度解释了一个问题群体——泰迪男孩,这种错位是由战争、日趋加剧的拜金主义(increasing materialism)、对成功的强调以及大众传媒的影响所造成的,存在于国际范围的所有青年人当中。但是他的分析也有一个清晰的阶级维度。例如,他这样说:

工人阶级家庭(也)更容易受到因移居安置产生的各种社会的和心理的有害影响,这些影响显现在当地社群生活的崩溃上。

(Fyvel, 1963: 213)

事实上,法伊弗尔认为泰迪男孩主要是从那些没有技术的青年工人当中招募而来的,他们的收入很低,而且没有多少机会可以参与到比他的境况稍好的工人阶级同龄人所享有的那个资产阶级化的进程当中去(ibid: 122)。

我们似乎由此可以这么认为:青年的地位(它的特征和问题)与社会阶级之间的联系将会受到经验社会学研究更充分的关注。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这样的分析几乎还见不到,人们主要还是把青少年犯罪率的上升作为考虑问题的起点。以此开展的这些研究

基本上带有一种“生态学”的性质,把焦点集中在工人阶级邻里关系的变迁上。然而,马修(May,1954)、莫里斯(Morris,1957)和克尔(Kerr,1958)以及其他人的研究都倾向于关注这些以阶级划界的地区的一个特殊的方面——“贫民窟文化”(slum culture),关注大量“问题家庭”的认同问题。人们通常都搞不明白:其余的工人阶级民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还持有研究者所描述的那些由贫民窟暴力、兴奋和幻想等元素构成的价值观或“焦点关切”(Miller,1958)。更重要的是,阶级分析虽然就在眼前,但却是一种非常技术化的“社会”阶级分析(通常建立在户籍登记局的界定上),一种静止的、去历史化的阶级概念。这些生态区域没有被充分动态地置于城市里的阶级结构之内和当时更为广泛的社会阶级关系之中。这里所勾勒的更广泛的分析,大体上根据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由丰裕、共识和资产阶级化所组成的三位一体范畴。

正如一些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将青年放回到他们所属的各种阶级结构当中,并不能给亚文化问题提供出一个简单的、单维的解释答案。的确,如果研究亚文化与阶级的关系时不是依赖于一个全球性的“新的青年休闲阶级”这一概念,那么对它的解释就要更复杂,对它的探究就显得更有必要。可能最复杂的理论架构是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早期的美国亚文化理论,如艾伯特·科恩(1955)、克罗沃德和奥林(1960)的著作以及唐斯(Downes)对其所做的批评和发展(1966)。这些作者的确试图把青少年亚文化定位于一个更广泛的阶级框架当中。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人的研究非常明确地把个体的青年阶级地位看成是单程的地位阶梯上的一个梯级,它终究会不屈不挠地通向中产阶级的价值和目标。亚文化问题于是被表述为一个脱节(disjunction)的问题——在(假想的)中产阶级成功目标与为了实现此目标而采取的受限的(工人阶级)手段之间产生了脱节。一种青年群体或亚文化被界定为地位受挫的结果,或者是因遭到中产阶级体制(middle-class institutions)拒绝而产生的焦虑所致,或者是因为通向成功的机会被堵塞、未能达到主流目标所致。简言之,这里有一种基于美国梦(关于成功)信仰的、深层的社会共识观念。“青年文化”是

对失败者的一种集体补偿。

亚文化理论在近年取得了重要进步,特别是默多克(1973)和布雷克(1973)的研究。紧随传统的主题——亚文化源于一种集体的“问题解决”方式,默多克和布雷克把青年定位于一种与“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s)分析非常不同的阶级关系分析当中。他们著作的主要缺陷在于:他们把自己的核心概念——“问题”概念——搞得太绝对了。布雷克关于亚文化构成的说法,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如下的论述:

作为解决某些社会结构问题—— these 问题是更大范围的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制造出来的——的各种尝试,各种亚-文化群落(在那时)就出现了……青年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但却有社会给青年制造的一些问题。例如,把大多数青年吸纳进精英教育体系的较低阶层,然后只允许他们从事没有意思的、报酬很低的、无创造力的工作,就会给青年造成许多问题。工人阶级的各种亚文化试图在青年身处学校与步入婚姻和成人阶段这段暂缓时期,给这个暗淡的世界注入激情和色彩。

(Brake, 1973:36)

默多克的构想也非常相似:

通过创造一些富有意义的休闲风格,他们试图解决那些内含于工作情境之中的矛盾,这种努力一般在一种亚文化所提供的语境中进行……亚-文化群落针对大家在工作情境中共同面对的矛盾所引起的问题,提出了一种集体性的解决方案,并且为集体认同和个人自尊的发展和强化提供了一种社会的和象征性的语境。

(Murdock, 1973:9)

两位作者都承认了青年亚文化群体的阶级基础,但是他们没有全面分析阶级对于青年研究的意义。这些忽略或许可以归咎于过分依赖了亚文化作为“问题解决”的观念。概括地说,我们认为,青年在应对整

个阶级共有的“难题”(problematic)时,会从他们的父母那里继承一种文化取向,而且很可能用它来衡量、塑造和显示他们随后隶属的不同社会生活领域的意义。在默多克和布雷克的研究中,就某一种亚文化的具体发展而言,忽视了亚文化群体成员在一种持续发展的附属文化中的处境。这样,一个考察阶级社会化的完整维度在这些分析中就被忽略了,而且,那些在最初定位阶级文化时起作用的协商因素和转换因素,也被过度轻视了。

默多克和布雷克的贡献是在阶级方面重建了青年文化,因此消除了一个普适的和通用的(universal)青年文化的神话。他们也强调了风格在表述青年的阶级经验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它的挪用和意义)。在转向我们自己对于青年文化和阶级关系的分析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讨论一下菲尔·科恩的研究——他富有启发性的分析,阐明了这一问题的许多要点。

D. 亚文化:一种想象性的联系

菲尔·科恩(1972)也提供了阶级分析,但他是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理论层面上提出的;将父辈文化置于一个历史的视角来看,描绘各种亚文化群体之间的关系,探究青年与父辈之间在阶级内部的动态关系。他的分析主要基于伦敦东区的工人阶级社群,他认为,工人阶级的力量本质上依靠三种结构的相互接合。首先是扩展了的亲属网络,它“提供了相互帮助和支持的功能”,“有助于文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其次,这种亲属关系又依赖于生态环境——工人阶级的邻里关系。这种紧密的社会-文化空间“有助于形成和支持传统的工人阶级生活的亲密结构,团结意识,本地归属感和传统”,并因此有助于解决“那些在为生存而进行的不懈斗争中产生的日常问题”。再次,是一种当地的经济结构,既显著地体现在它的多样性上,也体现在如下的事实——“在伦敦东区居住和工作的人们,不需要出门去找工作”——当中。因此,“工作场所的状况及其问题和利益,仍然与工作之外的形势——社群的问题和利益——保持着联系”。

这样,科恩通过给传统工人阶级文化的肖像赋予一种历史背景,描

述了再开发(redevelopment)和合理化重组(rationalisation)对家庭、社群和当地经济造成的影响。战后的再发展和房屋重建,导致了区域人口的流失和传统邻里社区的破裂;这其中混杂着(地产商的)投机开发,伴随着一批新的移民劳动力的涌入,导致了当地劳动力的进一步外流。最直接受影响的就是亲属结构,传统的“大家庭”(extended family)纷纷破裂,一部分被更具核心色彩的“婚姻家庭”所替代。^①“这意味着,任何一种问题都受限于产生它的那种最切近的人际环境当中;同时家庭关系被赋予了新的强度,以弥补先前在邻里和远近亲戚中生成的多种关系……因此,工人阶级家庭不仅在外部分受到了孤立,也在内部遭到了削弱。”(Cohen,1972:17)。以目前新的伦敦东区房地产形式进行的再开发,加重了对城市工人阶级家庭和邻里关系的负面影响:

融高密度与高层建筑于一体的建筑规划所产生的首要后果,是破坏了街道、当地酒吧、街角小店作为社区公共空间联结点的功能。相反,唯一剩下的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私人化空间,以完全孤立的形式一个挨一个地叠落在一起,与环绕在它周围的那些完全的公共空间并置在一起,而且,这种公共空间彻底缺乏那些产生于邻里社区的不拘礼节的社会调节。

(Cohen,1972:16)

随之而来的是当地经济的迅猛改造——各种小手工业消亡,它们经常被该区域外更大的公司所取代,家族商业和街角商店衰落。劳动力逐渐两极分化为两个群体:一些人做“高度专业化的、有技术的、待遇优厚的、与新技术有关的工作”,另一些人做“周而复始的、没有前途的、低报酬的、去技术化的、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服务业)有关的工作”。科恩认为,这些变化产生的影响对于伦敦东区相当多的工人阶

^① extended family 或 joint family 指几代小家庭同居一处的大家庭,类似于中国所说的四代同堂。但目前人们普遍说的现代城市“家庭”,一般则指由夫妇和未成年的子女所结合的家庭,英文称 nuclear family,可译为“核心家庭”或“基本家庭”。——校注

级来说最为显著,他们发现自己被两种相反的社会流动所“裹挟”,并被“强行分开”:向上,变成新的市郊工人阶级精英阶层;向下,变成“无业游民”。

在科恩的这段分析中,也许最重要的是他找到了一种方法,并用它重新界定了丰裕-共识-资产阶级化这一论题中的某些核心主题:他放弃了它们那些公开展示的、意识形态性的框架,把它们重新定位于一个特定区域的工人阶级所面对的特定的历史关系和处境当中,并且得出了一个“命题”,这一命题探讨的不是一个阶级的消失或“资产阶级化”,而是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变革是如何粉碎、分离和破坏这个阶级的内部机制和防卫系统的。“作为一个整体的阶级消失了”这一观点,被更为复杂的、更富差异区分性的概念所代替,后者要讨论一个阶级的不同人群和阶层是如何被那些具有决定性的社会经济环境所驱使,进入各种不同的路径和选项的。这种分析源于(社会变迁)对那些具有基本经济实力的、不同的工人阶级阶层的冲击,但紧接着就拓展到对他们的社交、家庭和文化所造成的影响。

科恩所讨论的各种变迁不仅对伦敦东区工人阶级社区的成年人造成了冲击,也对该地区的青少年产生了影响。尽管人们对于社会变迁的反应会随着他们在年龄、代际循环中的位置和经验方面的不同而出现差异,但是他们所面临的基本的物质和社会处境——阶级困境——却是相同的;对于上了年纪的男男女女,对于年轻的工人及他们的家庭,对于工人阶级的青少年,都是如此。科恩追溯了经济和职业的变化对青年人的影响:

他们在父亲们的行业里寻找机会,缺乏从事新兴产业的任职资格,他们只能从事诸如货车装卸工(van boys)、办公室勤杂工(office boys)、包装工以及仓库管理员之类的工作,并且长时间失业。越来越多的人,年轻人和老人,都不得不开出自己居住的社区去工作,一些人最终选择搬出去,住到能够找到适合自己工作的地方。地方经济从整体上萎缩了,变得越来越缺乏多样性。

(Cohen, 1972: 18)

科恩还对这种分析做了进一步的推进,进而分析青年人的处境在家庭、亲属关系和邻里关系等情境中有何改变和如何改变的问题。

在科恩看来,工人阶级青少年经历了这些以亲属的、物质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形态所呈现的转变和分裂。但他们也是在意识形态层面经历并试图在意识形态层面来“解决”这些分裂。因此,他不仅将这一时期各种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群体”的产生,而且将它们之间的差异,都首先归因于这种尝试性的“意识形态式的解决方案”:

亚文化的潜在功能就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以“神奇的方式”(magically)——父辈文化中隐藏的、悬而未决的矛盾冲突。因此,由这一父辈文化所产生的各种亚文化的接替,都可以被看作是某一核心主题的多种变体——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是传统的工人阶级清教主义和新的消费享乐主义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层面上,是一部分流动的社会精英与一部分新的无业游民之间的矛盾。摩登族、派克族(parkers)、光头党和克龙比族(crombies),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一种企图:试图恢复其父辈文化中被破坏的那些带有社会凝聚力的因素,并试图把这些因素与从其他一些阶级分支中择取的、象征着某一选项的因素结合在一起。

(Cohen, 1972:23)

为了举例说明这种复杂的运转过程,科恩以下面这种方式解释了摩登族的产生:

……最初的摩登族风格可以被阐释为一种尝试,试图在**想象性的联系**中来认识社会流动中白领工人的生存状态。虽然摩登族所用的**暗语**(argot)和仪式强调了其父辈文化中的许多传统价值观,但他们的服装和音乐却显示了富裕消费者的享乐主义形象。

因此,科恩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摩登族、派克族、光头仔、克龙比族是一系列全部对应于相同的父辈文化的亚文化,它们试图通过一系列的转换,来解决父辈文化嵌入到亚文化当中的基本问题或矛盾。因此,可以把亚文化分析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历史分析……抽离出一个个别的阶级分支具有的特定的问题框架……其二是亚系统的分析……这些亚系统所经历的从一种亚文化的契机(subcultural moment)到另一种亚文化契机的实际转换……其三是指对亚文化的传播者和支持者事实上亲身实践这种亚文化的方式的分析。

科恩的分析,就各种亚文化的兴起与一个阶级的命运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种极具启发性的解释。它的优点是把社会阶级的构成放置在一个整体的历史框架中。它从头到尾追溯了经济和文化变迁之间的联系,以及变迁对“父辈”文化的影响和青年人的反应,这一追溯是精细而复杂的。当然有某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这种分析主要是针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情况,现在需要延伸到70年代。一些问题还需要得到更精确的理解:某些压力对父辈文化强加的影响,是如何通过青年人渗透进来并被青年人以不同的方式感受的;同时,这种感受(体验)是如何、又为何最终被构造(crystallised)成了一种独特的青年亚文化。是什么因素引导摩登族去探索一种“向上走”的道路,而引导泰迪族或光头党去探索一种“向下走”的选择呢?在真实的阶级构成与一部分青年人选择这种或那种亚文化解决方案的情形之间,究竟有多紧密的联系呢?什么东西既可以解释这种具体的排序,又可以解释不同的亚文化结构所采取的各种具体方式呢?还有一个问题是:各种“意识形态性的”青年亚文化如何被理解为一种存在?在某种方式上,这种分析中最精细、最富有启发意义的部分与各种亚文化被展示的方式——被用来传达一个共同的阶级难题——有关;只不过,它们试图通过一种“想象性的联系”(也就是意识形态性的联系)去解释它们以其他方式不能超越的那些“现实的联系”。这是一项富有启发性的提

议,但也是最难以考察和描述的提议。人们生活在意识形态当中,生活在与他们的真实生存状态相关的一种“想象性的联系”之中这一事实,并不是专门针对或者仅限于亚文化群体的事情。那么,是哪些更深层的事情引发了这样一种高度结构化的、引人注目的、组织严密的(tightly-bounded)反应?通过对这种想象性的、意识形态性的联系——亚文化群体通过这种联系接受一个阶级的活法——的集中关注,这种解释目前可能在“以意识形态方式”解读各种亚文化的方向上走得太远了。它可能还没有充分考虑那些尤其适合于“亚文化的解决方案”的物质条件、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尽管有这些意见,但在我们看来,这一解释依然是目前最新锐、最精细的一种有效的解释。认为有一种“想象性的联系”处于接近亚文化问题核心的地方,这一主张是富有启示性的——尽管我们在具体使用它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下面还是要采用并拓展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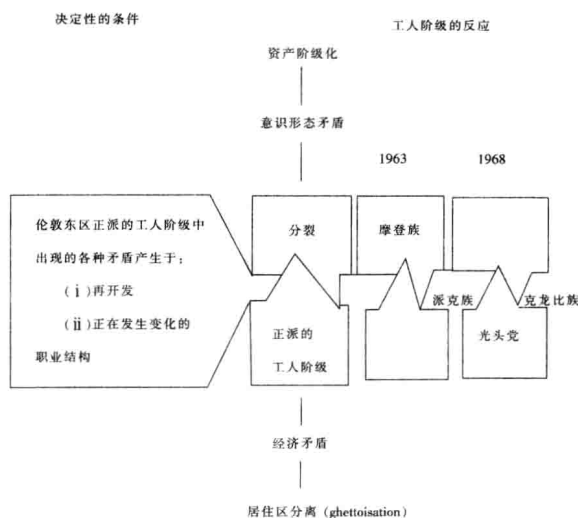


图 1.1 阶级和亚文化:科恩的阐释模式

E. 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和从属性的文化

最迫切的一点,是要仔细观察科恩是如何用阶级来阐明亚文化这一概念的。“阶级”既不能以一种还原的方式简单地取代亚文化,也不能被看成是一套既定的、“作为背景的”社会学变量。阶级和亚文化之

间的关系已经被放置在一个更具动态性的历史框架之中。各阶级与不同的阶级分支内部对于变迁的感受和反应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现在被视为决定性的层面。然而,亚文化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反应,有它自身的意义结构——它自身的“相对自主性”。这样,就要努力进行更彻底的思考,直至考察到整个社会形态结构层面(阶级关系就是在这里起决定作用),这种努力不能通过抑制,而要通过保持“亚文化”这个中介性概念的特性来进行。社会形态结构不能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联合体(“民族”、“文化”),而被看作是一个必然带有复杂性的、差异化的、对抗性的“整体”。那么,进一步尝试去彻底追溯这些嵌入阶级关系的转变,直至考察这些转变对各个特定的社区,对这一阶级中特定的人群,对特定的地方经济的影响,这一努力是开展此种分析的一个关键步骤。

在这一部分,在涉及具体的亚文化问题之前,我们要简要地讨论一下阶级关系在整个时期发生的一些宏观的变迁。尽管这样做会把一些大型运动压缩进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我们因此会牺牲掉科恩在伦敦东区个案分析中提供的许多特定的、具体的信息,但这仍然是讨论必需的第一步骤。

变迁的一个决定性的层面,就是“二战”之后生产被重新组织和现代化的方式;以及其对劳动力的分流、职业文化以及工人阶级的反应、保卫和抵抗方式的影响。战争和战后的局势加快了战争期间已准备妥当的各种变化。(变化带来的)一个总体的后果,就是拉大了经济中“新”、“旧”两大行业或区域——如老工业和新工业,老旧的和新兴的区域和地区——之间的差距。一方面是各种“新兴”工业,立足于现代技术和电子流程,或与消费和出口驱动紧密相连;另一方面是各种“衰落的”工业,它们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遗产。这种片面的、没有规划的“合理化重组”所产生的影响,首先波及劳动技术和劳动分工,其次波及区域和地区的经济生活;这些影响是深刻的,但也是非常“不均衡的”。一些地区(特别是东南部)突飞猛进;其他地区——有时是整个产业和地区——都被抛入一个漫长的衰落期。对于随着这种“不均衡的”发展而出现的劳动分工方面的各种确切的转变,我们在此无法详

尽列出；它们从各种显示职业流动性的图表（主要是数字上的）构成的、经过大洗牌的社会学“牌局”中保留了一张王牌。合理化重组必然给劳动力引入了新的分裂元素，也引发了一场全面的“意识形态”争论——比如北方与南方，“布鸭舌帽”（cloth cap）与白领等，这些争论直接助长并搞乱了“资产阶级化”这一论题。科恩讨论的伦敦东区的例子，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显示了它的实际影响：新的经济力量以一种极端“不均衡”的方式渗透进“落后的”部门和区域。码头工人深陷于临时工资源、政府对码头工作进行“重组”和“现代化”的企图、集装箱化运输的努力等出路之间，进退两难；这就是一个体现“被合并的、不均衡的”发展的典型实例，这种发展摧毁了一种独特的在地性（locality）。

此处重要的并不是某些关于“社会变迁和工人阶级”的一般观念，而是那一部分工人阶级——他们的具体处境正在被各种相当具体的经济力量所重构——特有的社会和文化构成。在这里，经济生产模式的各种变迁很容易表现在由贸易、技术和工厂构成的独特的复合体当中，表现在由各种职业文化构成的一种独特“混合物”当中，表现在不同阶级结构在这些职业文化中的具体分布上。这种广泛的经济动力于是扰乱了一个独特的工人阶级集合体：它们摧毁了一套独特的内部均衡性和稳固性。它们重塑和重建了生产基础，后者构成了生活的物质和社会条件以及“给定的”东西，围绕这一基础，一种独特的本地工人阶级文化得以发展起来。它们扰乱了一套由防御和“协商”（negotiations）构成的独特的历史网络（“伦敦东区”得以形成的复杂历史，仍然是一个绝妙的例证）。

这些生产关系也构成了这个阶级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的基础。在住房和工人阶级邻里生态方面发生的诸多变迁，也是同一模式的构成部分；变迁的不同方面彼此呼应和激发。战后重建对传统的工人阶级邻里关系的影响，从整体上看大致经过了三个宽泛的阶段。其一，战后的房屋重建（新的居住区和新的城镇）打破了传统的居住模式。留下来的区域衰败了；他们只好向下迁往“城市贫民区”（urban ghetto）或“新贫民窟”（new slum）的居住模式，变为高额租金、投机房东所有制（specu-

lative landlordism)和地产多重占有(multiple occupation)掠食的猎物。移民劳工的迁入突显并加剧了隔离化居住(ghettoising)的进程。然后,通过有计划的合并和房地产投机开发,有选择地重建一些贫民居住区。中产阶级家庭“上等阶级”邻里关系和“有规划的重建”(伦敦东区计划在这里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的进入,重新界定了这一区域,促其走向这种日益“提高的”、中等收入的生活模式。再说一遍,这些不单单是对一个区域抽象地起作用的力量。它们还生动地重建了工人阶级生活于其中的真实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

这些重建了工人阶级邻里关系和当地经济的力量,也对家庭结构产生了一种决定性的影响。这些依照职业情况推动工人向上或向外流动的力量,经常也移入房地产和城镇建设当中,后者在它们的布局 and 设计中预设了一种不同的、规模更小的、更具“核心性的”家庭模式。甚至在老区或接近老区之地重建的房产,与战前的相比,也似乎更像是以一种“理想的”家庭——更具中产阶级特征的“核心”家庭——为蓝本建造起来的。工人阶级家庭既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消失”,劳动人口也不会主动接受这种新的“中产阶级”家庭典范。但是家庭或许已经变得越来越隔离了;伴随着对更年轻的家庭成员和女性的影响,孩子们和父母的关系,或者同伴们和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都被改变了。总之,在一种防御性的阶级文化当中,工人阶级家庭的确切地位和角色是不稳定的。一系列具体的关系,一系列包含着知识、往事、经验的网络——阶级文化的支柱——都被搅乱了。在这种情况下,“新”模式也得到了普及,原因就在于它再次侵入和削弱了其他可选择的社会组织模式。

在战后的早期阶段,在复杂机制方面出现的这些变化与工人阶级生活和文化的平衡,均被覆盖上了“丰裕”这一公开炫耀的意识形态。我们现在知道了,对大多数工人阶级来说,“丰裕”产生的真实影响是有局限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甚至从工资和消费的角度看也是如此。事实上,“质的飞跃”并没有发生。准确地说,“丰裕”假定了一种成熟的意识形态的完美比例,正因为需要用它来遮盖现实的不平等与许诺的即将到来的乌托邦——众生平等、消费不断增长——之间的鸿沟。通

过投射这种意识形态的景象,“丰裕”这一神话旨在让工人阶级望梅止渴,从而把这一阶级控制、黏合到领导权的秩序当中。这样,丰裕这种意识形态正好就把战后英国社会的“真实关系”重建为一种“想象性的联系”。这就是社会神话的功能。这一神话一度提供了20世纪50年代政治领导权的意识形态基础。“丰裕”本质上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关于、适用于和针对于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媒体、广告和政治演讲等直接指向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很少有人同意那种与其真实处境大相径庭的说法。因此,重要的不是工人阶级在“丰裕”图景中的被动改造,而是这种图景所导致的移位(*dislocations*)——它激发的反应。在对战后形势做出这种“丰裕”解读之后,工党将其完全纳入自己在国内议会参与选举的角色当中(终结了一条漫长的历史发展轨迹),将其部分地收编到工会的国家机器当中,这种吸纳和收编对工人阶级产生了现实的政治后果,摧毁了现实的防御能力。其他的反应则是不可预知的,出乎意料的。对丰裕(金钱和消费方面)意识形态所进行的这种压倒一切的强调,很可能产生了一种始料不及的后果,即刺激了一种“相对剥夺”感的产生,并因此促成了20世纪60—70年代“为工资而战斗的精神”。工程和汽车公司的富裕工人率先转向争取工作场所方面的权力,转向争取工厂集体谈判权、工会代表组织化和“工资浮动”的斗争——这种斗志昂扬的“经济主义”,正好持续到通货膨胀和衰退期,超越了“为报酬低而反抗”的水平。这些也是对“丰裕”的反应,这恐怕是那些意识形态专家既没有也不能预见到的。

为了在这种分析当中去探究青年亚文化,我们必须首先把青年定位于一种由“占有领导权的”、处在支配地位的文化与处于从属地位的工人阶级“父辈”文化所构成的辩证关系当中——青年只是这种父辈文化的一部分。霸权的/合作的(*hegemonic/corporate*)、支配的/从属的这些术语,对这种分析虽然至关重要,但在引入亚文化的维度之前需要对它们做进一步的阐述。葛兰西使用“领导权(霸权)”这一术语指的是这样的状态:统治阶级不仅能强迫一个从属阶级服从它的利益,而且能对从属阶级实施一种“领导权”或“全面的社会权威”。这涉及一种特殊权力的运作,这种权力约束另类选择,遏制各种机会,以此来赢得并

形成共识，以至于对统治阶级合法性的同意看起来不仅仅是“自发的”，而且是自然和正常的。卢克斯(Lukes)最近将领导权界定为这样一种权力：它可以安排日程，构造选择性的预设，能“将冲突扼杀在萌芽之中”；或者当冲突发生的时候，通过明确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在现存框架之内是“合理的”、“现实的”，以此来遏制冲突(Lukes,1974:23-24)。领导权取得输赢的这个领域，就是上层建筑的领域；是一些市民社会机构(institutions)和政府机构——阿尔都塞(1971)和普兰查斯(Poulantzas,1973)多少有点误导性地称之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从根本上说，利益方面的各种冲突都源于生产领域中阶级结构位置的差异；但是它们对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了影响”。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政治构造了从第一层面通向第二层面的通道。于是，由一些市民社会机构和国家机构所组成的领域，从根本上成了“阶级斗争的赌注，但也是阶级斗争的场所”(Althusser,1971)。从某种程度上，这些机器“通过意识形态”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对于这些机器内部已被体制化的现实所做的各种界定，对从属阶级来说构成了一种历经的“同样的现实”——这至少是领导权试图要去做、要去促成的东西。葛兰西以教堂为例子，他认为教堂要维护的是“整个社会集团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而意识形态就是来巩固和促成这种一致性的”(Gramsci,1971:328)。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秩序试图在它的范围之内规范(frame)所有相互抵触的对于世界的解释。它提供了思想和行动的视野，在这一视野之内，各种矛盾被想办法克服、被挪用(被体验)、被遮蔽(隐瞒为一种可以让所有冲突方团结一致的“国家利益”)，或者被控制(让这些矛盾得到缓和，以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一种占据领导权的秩序预先规定的不是具体的思想内容，而是一些界限(limits)，在这些界限之内各种思想和冲突会发生改变并得到化解。领导权往往依靠武力和强制，“但是在当今实行议会制度的传统地区，领导权的正常行使则呈现出将武力和赞同(consent)相结合的特征……没有武力过度支配赞同的现象”(Gramsci,1971:80)。领导权就这样为统治阶级权力的合法化提供了基准线和基座结构。

领导权通过意识形态来运作，但它并不是由一些错误(虚假)的思

想、概念或定义构成的。它主要是通过把从属阶级嵌入那些核心制度和结构当中来展开运作的,而这些核心制度和结构支撑着占支配地位的秩序的权力和社会权威。最重要的是,正是在这些结构和关系当中,从属阶级体味着它的从属关系。这种从属关系通常是可以确保的,原因就在于统治秩序成功地削弱了、破坏了、取代了或收编了从属阶级提出的那些替代性的防御和抵抗机制。葛兰西非常正确地指出,“那种断言人们在意识形态层面可以观察到根本冲突的论点,并不具有心理学的或道德学的性质,而具有结构的和认识论的”性质(黑体为编者所标, Gramsci, 1971: 164)。

领导权很少能通过一个或单个的阶级阶层来维持。它通常需要统治阶级各分支结成的一个同盟——一个“历史集团”。领导权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要取决于哪些阶级分支构成了这个“占支配地位的集团”,哪些利益因此必须受到重视(这类问题)。领导权不单单是“阶级统治”;某种程度上它需要从属阶级的“赞同”,反过来这种“赞同”必须通过努力才能赢得和促成。这样,社会权威的支配地位,不仅体现在政府当中,而且体现在市民社会当中,体现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当中。当统治阶级不只是在统治或“指挥”,而且在领导的时候,领导权就生效了。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是一支主要的引导力量。它通过对从属阶级的生活进行规范来完成引导。这些机器再生产了阶级关系,因此也再生产了阶级从属关系(家庭、学校、教堂和文化机构,也包括法律、警察、军队和法庭)。

反对阶级领导权的斗争不但在这些机构外面发生,也在它们的内部发生——这些机构成为阶级斗争的“场所”。但是这些机器也依赖于“一整套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信仰、仪式和体制程序(‘游戏规则’)”的运转,它们“有条不紊地持续运转,让某些人和某些群体受益”(Bacrach and Baratz, 1962)。

葛兰西认为,在意大利政府中,统治阶级的统治经常缺少那种能让他们确立“领导地位”的“自然的社会权威”。因此,无论是国家还是统治阶级,甚至分析者,都不能把领导权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当前对这一术语的使用——指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实施的那种无休止的、不成问

题的阶级权力操作,还有对它的对立面(从属阶级)进行的永久的、成功的收编——都完全违背了葛兰西的最初用法。当前的这种用法限制了这一概念的历史特定性。说得再具体一些:我们认为,尽管统治阶级在20世纪30年代持有指挥决断大权,但很难将他们界定为“掌握领导权的”阶级。这一时期,是经济危机和失业把工人阶级规训(discipline)进而不是“引领”进从属关系的。20世纪20年代劳工运动所遭受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统治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高压统治。相反,在我们看来,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真实的“领导权支配”时期,它恰好就是“丰裕”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所扮演的角色,试图摧毁工人阶级的抵抗,并将工人阶级“自发的认同”交付给统治阶级的权威。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领导能力”再次被削弱,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种削弱则更为公开化。社会更加多极化,矛盾在许多层面重现。统治阶级保持着权力,但是他们用于控制的“全部技能”逐渐被挑战,被削弱,被搞得筋疲力尽。在这一时期的后期出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控制的实施(方式)出现了转变,从赞同的机制转向强制的机制(例如,使用法律、法庭、警察和军队、合法镇压、阴谋控告,使用武力来遏制某种对政府、“社会治安”不断升级的威胁)。这标志着统治阶级的领导权出现了一种危机。

因此,对于一个特定阶级的持续统治而言,领导权不是一个永远通用的、“既定的”事物。它必须被赢得,被努力争取,被再生产,被保持。正如葛兰西所说的,领导权是一种“动态的均衡”(moving equilibrium),包含着“赞成或反对这种或那种倾向的力量所构成的各种关系”。它涉及各竞争阶级之间所产生的均衡状态的性质:达成妥协来维持均衡它;用权力关系来维持它;采取一些解决方案来维持它。领导权的特征和内容,只能通过对具体历史时刻出现的各种具体情境的考察来确立。“永久的阶级领导权”或“永久的收编”这类主张应该被抛弃。

与统治阶级的领导权相较,工人阶级明显是一种从属性的社会和文化存在形态。马克思提示我们,资本主义生产以永远对抗的形式对资本和劳动力进行再生产。领导权的作用就是要确保:在社会阶级关

系中，每一个阶级都能以其现有的支配-从属形式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领导权永远也无法从整体上把工人阶级完全地或绝对地吸纳进统治秩序当中。社会看起来处在、但实际上不可能永远处在“单向度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当中。当然，有些时候领导权强大而稳固，而从属阶级既弱小、易受伤害又缺乏保护。但是从属阶级当然也不可能消失。从属阶级作为一种从属结构，通常保持着独立的、不可渗透的特性，但它依然被统治阶级的全面统治和支配所控制。从属阶级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结社自治文化(corporate culture)、自身的社会关系形式，形成了有自身鲜明特色的惯例(institutions)、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阶级冲突绝不会消失。英国工人阶级文化是一种特别强大的、人口稠密的、有凝聚力的、防御性的社团自治结构。那么，阶级冲突根植和呈现于这种文化中：与丰裕这种意识形态相悖，它不可能“消失”，除非产生和维持它的生产关系消失了。但是它可能呈现出半公开、半正式、半体制化或半自治的状态。从1880年到现在的这段历史周期表明，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趋向合并的推动力，而存在一种明显的交替性的节奏。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即使在阶级冲突最为制度化的时候，它依然作为一种根本性的社会基本节奏而存在。

在老牌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比如英国)，文化实际上被一种我们称为“制度性解决方案”(institutional solutions)的网络遮盖着，这一网络安排着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与从属文化在同一社会形态结构中彼此共存、延续和斗争的方式。许多这样的制度不但保护从属阶级的结社自治文化，还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保持着协商关系。这些是从属阶级的文化“参与协商”的方面。例如，在工作中，工人的利益和管理层的权力之间的界限尽管被一些中介结构所掩盖，经常会显得很模糊，但是这种界限却从未消失。只是从一个工作场所到另外一个工作场所，或者从一个历史时期到另一个历史时期，双方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对待这种界限。那种在职场中常见的非正式文化(informal culture)，那些对工作过程实施日常控制的企图，那些随处可见的关于最低工资的交涉，与“静坐”(down-tools)、罢工、罢市、正式争论、占领工厂等行动一道，构成了工人阶级回应其眼前的管理权力和权威以及资本的一整套

保留剧目。它们是一些对抗领导权的(counter-hegemonic)权力形态。许多这样的策略——还没有达到最终取代资本对劳工控制权的程度——继续把劳工界定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构成要素——而不是被收编的要素。它们象征着一道阶级的防线,甚至在管理权力过度支配的(over-determining)架构当中,这些防御工事还在运转。

工人阶级文化“始终不懈地”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那里“夺得空间”。很多工人阶级的机构(institutions)就体现了这种旷日持久的紧张“协商”所产生的各种成果。这些机构有时呈现出适应性(adaptive),有时则充满好斗精神。它们的阶级认同和地位从未得到彻底的“安置”(settled):其内部的力量对比仍然是未决的。它们构成了F. 帕金(F. Parkin)所谓的“统治秩序的‘协商版’(negotiated version)的基础……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与其说遭到了从属阶级的拒绝或反对,不如说被从属阶级改造成了一种由各种情境和受限机遇造就的成果”(Parkin, 1971:92)。这些“协商解决方案”之所以经常会占上风,不是因为工人阶级被动屈从于统治阶级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们的视野被当下的实际顾虑所束缚和遏制,或者受到具体情况限制。(这就是构成工人阶级的“经济主义”的物质基础和“理性内核”。)由此就出现了一些情境化的解决方案,它们要解决的是那些在一个超越了当下阶级视野的更广泛、更具全球性的层面出现的难题。在那些“要求进行纯粹抽象评价”的情境中,“占支配地位的价值体系将提供道德的参照系;但是在那些涉及选择和行动的具体的社会情境中,这种协商版——或从属价值体系——将提供道德框架”(Parkin, 1971:93)。在主要的社会制度秩序(如法律规则)当中被奉若神明的权威,只在抽象的层面上被人们接受了;人们在面对面接触的层面上看待它的时候,态度却是非常矛盾的(如对警察的态度)。英国工人阶级文化就是围绕“我们”和“他们”的态度大规模地联合起来的,即使在这种建构性的差异并没有被工人阶级直接引向对抗领导权的策略之时,也是如此。近来的证据表明,尽管还缺乏从根本上废除产权制度的任何协同的推力(Moorhouse and Chamberlain, 1974),工人阶级对财产和财产权的怀疑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在这一时期,即使像工会这样的阶级机构也与工人拉开了相当大的距

离,转而同政府全面合作,但是在环境发生轻微变化的情况下(例如1970年后保守党政府发起的反对基本工会权力和秩序的合法化运动),工会也开始勉强捍卫基本的工人阶级权力(Lane, 1974)。这样,无论是“美好的”时代,还是“糟糕的”时代,各种对立的文化解释总是在发挥作用。这些解释反映了不同阶级的物质地位、观点和日常生活体验之间的结构差异。在合适的条件下,人们在处境、价值观和行动中的这些差异(矛盾),就为那些更为成熟的、进行公开对抗和斗争的阶级策略,为那些促成领导权决裂和转换的对抗策略,提供了真实的物质和历史基础。当然,从属阶级要把这些不同的协商策略凝聚起来并将其转变为一场持续的阶级政治,还需要一个动员、政治化和组织化的过程。马克思发现的从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向一个“自为的”阶级的运动,正好说的就是这种差异。

工人阶级邻里关系在19世纪80年代及其后的一段时间所呈现出的“传统”形式,代表了阶级之间协商成果的一种独特的范例。在这种邻里关系当中,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已经为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赢得了空间。这种结社自治文化的价值无处不在地显现出来:体现在物质和社会形态当中,体现在用品的形状和用途当中,体现在娱乐和休闲的方式中,体现在人们与共享空间的特征所结成的关系当中;这些空间既是物理的(街道、房屋、街角商店、酒吧和公园构成的网络),也是社会的(亲戚、友谊、工作和邻里关系的网络)。在这些空间当中,阶级开始发挥“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作用,重新界定和挪用这些空间以适应居住于其中的群体的需要:这个空间是一个由权利和义务、亲近和疏远等关系构成的网络,在它真实的纹理和结构中具体地体现着“那种休戚与共的感觉……本地归属感(local loyalties)和传统(Cohen, 1972)。这些“权利”不是所有权或暴力,而是一种领地的、文化的拥有权,是“老房客”(sitting tenant)的那种习惯上的占有权。当然,这些机制(institutions)也会受到外来力量的纵横剪切和渗透。工作和工作场所的结构,或近或远地把当地的劳动力与更广泛的经济力量和运动连接起来。在不远处,就是熙熙攘攘的商业大街和它们的连锁店和超市,通过贸易和消费把家庭和更广泛的经济连接起来。通过这些结构,邻里

关系在社会和经济方面都被绑定了。一方面,也就是从横向层面看,所有的这些联结点都把空间和机构与本地性、邻里关系、本地文化及本地传统捆绑在一起;另一方面,从纵向层面看,这些结构又把它们与支配地位的制度和文化的连接起来。

当地学校是这样一种“双重连接”(double-binding)的典型代表(Hall, 1974a: 49-55)。正是这些靠近房屋、街道和商店的当地学校,“教育”了几代工人阶级的孩子,铸造和彻底改造了他们之间因友谊、同伴和婚姻结成的纽带。然而,从纵向的关系看,学校代表了各种知识,各类纪律和权威关系,认可了一些与当地文化很不相符的经验。它的编班、“跟踪”和升学考试等选拔机制,它的知识边界,它对于正式教育范围之外的语言和经验的排斥,所有这些因素都以某种连接的或断开的(*disconnective*)方式(而且,更要命的是断开的方式)把都市工人阶级的在地性与更广泛的教育和职业领域连接了起来。它依然是一个典范的、协商的或中介化的阶级机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并且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评估一下在这些学校当中形成的那些不同的策略、选择和“解决方案”:那些“奖学金”男孩或女孩;那些“普通的、能力平平的”的孩子;那些“麻烦制造者”;那些逃学者和缺勤者;那些在教育 and 情感上“失教的”(deprived)的孩子;那些被教坏的孩子[如被贴上智力落后标签的(E. S. N-ed)^①的黑人孩子]。同样,与青年人的休闲活动、同伴群体文化和联盟相比,我们必须看到,有一种由抵抗与妥协相“混合”的因素存在于如下一些文化存在当中:比如,非常崇尚“阳刚之气”的街角文化,几近于青少年犯罪的群体或英雄行为,少年旅(Boys Brigade)痴迷者,“帮派”,“足球终结者”(football end),有严格限定的亚文化,等等。

年轻的工人阶级男孩所开发的策略资源库中的任何一种策略,都与其他“同伴”的策略、“成年人”的策略和解决方案、相同年龄段的人

① ESN 是 educationally subnormal 的缩略语,意为“在教育上低于正常的,智力上落后的”。

——校注。

可选择的其他立场(例如光头党与嬉皮士^①)、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及其所有控制手段等因素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任何一种这样的策略在某个历史时刻能否显现威力或缺乏力量,都将部分地取决于当时的历史形势(支配力量和从属力量的对比;“父辈”阶级所处的或稳定或正在改变的处境等)。它尤其会促成阶级“难题”——某个特殊的阶层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遇到的一系列的问题、结构、机会和经历——的变化。它将反映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物质条件——适合于构造某种集体策略赖以施行的支撑条件——的变化。

协商、抵抗和斗争,构成了处于从属地位的文化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之间的多种关系。无论这些关系属于这个关系光谱中的任何一种

① 嬉皮士(Hippie)的称谓据说源于hipster一词,后者是美国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 1923-2007)在他1957年发表的一篇名为《白种黑人》(The White Negro)的文章中首先使用的。字面意思是“赶时髦的潮人”,但梅勒用此词时强调的那些处在困惑、迷惘中但正在崛起的新一代年轻人。hipster是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对于爵士乐音乐家的称谓(另一个称谓是beatnik),这两种称谓被用来指称围绕这些艺术家出现的波希米亚主义的反主流文化。到20世纪60年代,“垮掉的一代”及其后继者(即年轻的反主流文化者)搬进纽约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和旧金山海特-阿什伯里区(Haight-Ashbury district)生活,逐渐自称为“hips”或“hippie”。至于hip和hep两个词,尽管20世纪40年代以来就成为非裔美国人摇摆舞的俚语且带有“深奥的、时尚的、最新式的”等含义,但目前尚无法确定其来源。“垮掉的一代”采用了hip一词,而早期的嬉皮士继承了“垮掉的一代”的语言和反主流文化价值观。另有说法认为,旧金山作家迈克尔·范伦(Michael Fallon)在1965年9月6日发表的一篇描写咖啡屋的文章中,首先使用hippie一词来专指旧金山的异类青年和反主流文化者,但其他媒体在此后的两年中几乎没有再使用过这个词。直到1967年,随着嬉皮士运动的深入发展,hippie一词才被媒体广泛使用并被人们所接受(参见夏学花:《嬉皮士:美国主流社会的叛逆一代》,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总体来看,嬉皮士亚文化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并随后传播到其他一些国家的一场青年运动。嬉皮士们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社群,穿着花里胡哨、不拘一格的衣服,听着迷幻摇滚,信奉性革命,有些人吸食大麻、LSD和神菇之类的毒品,探索意识的变形状态。当然,保守的主流人士给嬉皮士一词赋予了贬义色彩;在他们看来,嬉皮士指的是那些吸毒(尤其吸大麻)的、不愿参加社会活动的、缺乏社会义务感和缺乏卫生感的人。——校注

区域,从结构的意义上看,它们总是非常活跃的,总是充满对抗的(即使这种对抗有时候是潜在的,或者仅仅被当成正常状态来体验——即古德纳[Gouldner]所谓的“正常化的抑制”[normalised repression])。它们产生的结果不是给定的(given),而是被制造出来的(made)。从属阶级给这个“斗争的剧场”带来了一张包含着各种策略和反应的保留剧目表——即各种斗争和抵抗形式。这张保留剧目表中的每一种策略,都利用了某些真实的物质和社会元素:它将这些元素构建为从属阶级借以忍受或反抗其持续的从属状态的支持条件。并不是所有的抵抗策略都同样重要:即并不是所有的策略都有可能对抗领导权。有一些甚至可能是另类的选择——比如工人阶级政治和某些工人阶级犯罪行为。我们也必须看到,一种成熟的、有组织的、革命的工人阶级意识,只是可能产生的所有反应当中的一种反应,而且是一种很特别的、具有决裂意味的反应。试图用(工人阶级)被赋予的这种觉悟状态来衡量该阶级的所有策略,并把所有其他的事情都看作是被收编的标志,这是一种误导。这种做法是在把一种抽象的方案强加给一种具体的历史真实。相反,我们必须努力理解:该阶级通常会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方式使用它的物质和文化“原料”去建构一整套的回应。其中有一些特别针对某一工人阶级的历史的抵抗策略(资源),在该阶级维持生存和“赢取空间”的斗争中,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知识和权力资源库。即使那些在该阶级的历史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别样选择(如改革相对于革命),而是在其斗争传统中为适应完全不同的环境而使用的潜在历史“空间”。我们不能把该阶级某些独特的社会阶层归属于策略保留剧目表中的那些独特的、固定的地位安排。这也是完全非历史的。而一些变通性的事情很有可能发生:“工人贵族”有可能选出非常激进的领导阶层;无组织的人或所谓的“无业游民”有可能组织起来;顺服的投票者可能会摆脱对权威的尊敬;“富人”也可能成为“激进分子”;“办公室职员”可能会罢工;在职妻子和第一代移民也可能占据领先地位,凡此等等。在下面列出的表格中,我们简单勾勒了可能采取的一部分协商、对抗和从属的策略,并以此来强化这一论点(我们的观念直接来自葛兰西的领导权和合作[corporateness]概念)。这张表

格仅用于描述性的目的——它的价值存在于如下事实：它在一种类型学(typology)之中,包括了一些或多或少适应于策略总目两个极点的策略,以及一些在阶级斗争正式的制度化运作内外衍生出的策略。

表1.1 协商和反应策略一览

“天生保守的民族”	“某个民族”	“工业的两面”	“议会道路”	“先于法律的平等”	“战斗性” “极端主义” “让国家来付赎金”	“颠覆” “无政府状态”
顺从投票	工人阶级 邻里关系	工会成员 资格	工党投票	“法律”	工会代表权力	左翼宗派
工人阶级 保守党	“我们”对 “他们”	工会意识	工党主义	青少年犯罪	战斗的“经济 主义”	革命政治

(“虚假意识”)…… (“常规化的抑制”)…… (“异常反应”)…… (对政府的威胁)

F. 亚文化的反应

我们现在可以返回“亚文化”的问题。我们认为,各类工人阶级亚文化群体是在各个从属阶级的社会和文化阶级关系这一层面上形成的。它们本身并不仅仅是一些“意识形态的”构想。它们也给青年赢得了空间:邻里关系和机构中的文化空间,用于休闲和消遣的真实时间,街上或街角的实际空间。它们旨在规划和挪用聚居地的“领土”。它们集中在一些重要的社交场合:周末、迪斯科舞厅和银行公假日旅游,在“活动中心”玩乐过夜,在工作日晚上“傻站着无所事事”,周六的比赛。它们聚集在一些特定的地点。它们发展出一些特殊的互换节奏,在成员之间——青年人与老人,老手与生手,时髦的人与四平八稳的人——建构各种关系。它们探索那些对某一群体的内心生活至关重要的“焦点关切”:那些总是“做”或“从来不做”的事情以及一系列的社会礼仪,这些礼仪巩固它们的集体认同,把它们界定为一个“群体”而不只是各个单独个体的聚集。它们接纳并改写了实物——商品和财物,

并把这些东西重组到一些独特的“风格”当中,这些“风格”表达了它们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的集体性。这些关切、活动、人际关系和实物,在一套由关系、场合和活动构成的仪式当中得到了具体体现。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世界的范围有时是由一些命名或一种暗语标示出来的;这种暗语根据那些仅对它们群体视角内部而言有意义的方面来对外在社会世界进行划分,并维持它的边界。这也有助于它们在立即要开展行动之前,就制订出一种对于当下的看法——各种计划、方案,为打发时间而要做各种事情,各种业绩……它们也是一些具体可辨的社会形态结构,被构造成一种对于自身所属阶级现实的、处境性的体验的集体响应。

尽管各种亚文化不是“意识形态性的”构想,但它们有一个意识形态的维度:在战后那种问题重重的处境中,这种意识形态因素显得更加突出。在对待这些亚文化所源自的那些特殊阶层的“阶级困境”时,这些不同的亚文化为一部分工人阶级青年(主要是男孩)提供了一种与他们的集体处境进行协商的策略。但是它们非常仪式化和风格化的形式表明,它们也试图对那种困境体验提出一种解决方案:但这种解决由于还主要处在符号层面,注定会失败。这个事关从属阶级体验的难题,可以被“经历”、协商或抵抗;但无法在这个层面或通过这些方式得到解决。对于工人阶级的小伙子来说,不存在“亚文化的职业生涯”;对于这一阶级的核心建构经验所提出的诸多问题,在亚文化环境中并没有“解决方案”。

对于工人阶级青年面临的这些难题——失业,在教育方面处于劣势,被迫接受不良教育,从事没有前途的工作,劳动过度程序化和专业化,低微的薪水并且丧失了技能——也不存在“亚文化的解决方案”。对于整个阶级来说,亚文化策略并不能匹配、满足或应答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有结构功能的维度。因此,当战后的亚文化群体在处理它们阶级体验的困境时,经常采取的方式是:在真实的协商和象征性的、取代性的“解决方案”之间再生产出一些差距和差异。它们只是以一种想象的方式“解决了”在具体的物质层面依然未能解决的难题。因此,“泰迪男孩”征用了一种上层阶级的服装风格,想要“遮盖”这样一种鸿

沟：一方面主要是体力的、非技术的、近乎无业游民的职业和生活机会，另一方面却是周六晚上“衣冠楚楚却无处可去”的体验。因此，“摩登族”在对消费和风格的征用和迷恋(fetishisation)之中，来掩盖在永不停歇的周末聚会与周一重新开始从事令人厌烦的、没有前途的工作这两项事情之间存在的差距。因此，光头党通过重新使用一种带有原型色彩和“象征意味”(但实际上有时代错位意味)的工人阶级服装形式，通过把关注焦点转换到足球比赛和足球“终场”的“消遣”之上，重申了(不过是在“想象中”)一个阶级的价值观，一种风格的本质，一种工人阶级成人很少会赞同的“粉丝身份”(fan-ship)：它们“重新呈现”了一种被规划者和投机商正在快速摧毁的属地感和在地感——它们活生生地“宣告”了一场正在被商业化、职业化和景观化(spectacularised)的竞赛游戏(game)。“光头党管辖，很好。”很好吗？但是“在意识形态中，人们实际上表达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这就是说，既存在着真实的关系，也存在着‘想象的’和‘体验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是……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重决定)的统一……这种关系表现为一种意志……一种希望，或者一种留恋，而不是对现实的描绘”(Althusser, 1969:233-234)。①

各种工人阶级的亚文化是对青年和“父辈”阶级文化中的其他成员所共同面临的困境的一种回应。但是阶级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建构了青少年对于困境的体验。首先，在青年人性格的形成阶段，阶级将青年人定位在一种特殊的物质和文化氛围以及各种独特的关系和经验当中。这些要素提供了最基本的文化架构，青年人通过它们来理解困境。这种把青年置入一种阶级身份和地位的“社会化过程”，若要展开尤其需要通过两个“非正式”的代理机构(agencies)：家庭和邻里关系。家庭和邻里关系是非常特殊的结构，它们构成并框定了青年人融入阶级的早期经历。例如，要再生产出那些体现阶级特征的性别角色和责任，不

① 参考了顾良所译《保卫马克思》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30页，译文有改动。

仅要通过家庭中的语言和交谈,而且要依靠日常接触和示范才行。在邻里关系中,社群的社交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老人和青年人的互动结构建立起来的。(霍华德·帕克1974年对街头足球的角色做过分析,认为街头足球是青年人“学习”某种独特的阶级社交能力的途径。)这些亲近的环境也把青年人带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因此,正是主要通过这些朋友和交情,那些遥远但不断迫近的工作领域或直接接触的权威阶层(房东、市政官员、社会保险,警察)也被拉扯上了(appropriated)。通过这些构成性的网络、关系、距离、互动,在青年人当中描画和再生产出一些对于更广泛的世界及其社会类型的认识。

从广义上讲,阶级也构造了青年人的个人生活机会。从统计学的类别概率看,阶级决定着“成功”与“失败”的分布。阶级确定了教育和工作中的某些关键性的职业价值取向——它生产出工人阶级小伙子对于未来机会的那种人所皆知的太过“现实的”期待。它教会了与权威进行联系和协商的各种方法。例如,父母在与学校老师会面时,社会差距、服从、焦虑和着装都可能确证或强化那种将学校当作一种本质上异己的外部世界的体验。

这只是几条将青年人嵌入一种阶级文化内部的途径(这种途径其实有很多),而青年人的嵌入方式也可能在青年人当中促成再生本阶级的困境。但是,除了这些共有的阶级境遇之外,仍然要特别重视青年人特有的那种代际体验。从根本上说,这样做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事实:青年人是在一系列不同于父辈的体制和体验中来面对其阶级文化的困境的;当青年人遭遇同样的结构时,他(她)们也是在自己职业生涯中的某些非常不同的点上与它们相遇的。

我们可以联系前面指明的三个主要的生活领域——教育、工作和休闲——来确认“代际特性”的这些方面。从5-16岁这段年龄,教育是一个制度性的空间,对青年人的生活有着最持久、最强烈的影响。尤其因为(这个年龄段的青年)不能(轻易)回避这种教育,这种“至关重要的现实性”被强加到他(她)们的经验之上。与之相比,这一阶级当中年纪稍长的成员们,则是通过各种间接的、有距离的方式来面对教育的:通过一些记得起的经历(现在“事情已经改变了”),通过一些特殊的交

往场合——如父辈们的晚会等——以及青年人对他们上学经历的解释来面对教育。

在工作领域,这种差异可能并不那么明显,工作中青年人和老年人都要面对相似的制度安排、组织化和职业形势。但是其中仍然存在关键性的差别。青年人面对的问题是选择和进入工作,他(她)们既要学习正式的工作文化也要学习非正式的工作文化,也就是说要面对从学校到工作的转变中的全部困难。我们已经观察到,一些地区和产业当中那些正在改变的产业结构,以各种方式重构了从传统演化而来的“家庭工作-职业结构”,从而使得这种转变变得更加困难。对于这一阶级的年长者来说,工作已经成为相对常规的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已经学会了职业身份和工作文化,包括学会了对付工作中所产生的问题的各种策略——即“对付和敷衍”的各种方法。

在更广泛的环境中,青年人可能比老一代工人更容易受到日益上升的失业率带来的伤害:根据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失业统计数字,没有技术的辍学者失业的比例可能是老一代无技术工人的两倍。此外,在职业“生涯”的不同的阶段,人们对失业这一事实的体验方式(程度)也很可能有所差别。

最后,休闲也应当被看成是一个对阶级有重要意义的生活领域。正如马克思观察到的那样:

……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①

(1964:100-111)

① 参考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新译本,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校注

在工人阶级的休闲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上讨论过的工人阶级所引发的许多“挤扰”社会的效应。休闲和娱乐似乎提供了一个比那些高度纪律化的、受控制的工作处境更具协商性的空间。在大众休闲和娱乐的很多地方,工人阶级已经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它们构成了这种结社自治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对整个阶级的体验和文化认同至关重要。而且,工人阶级成年人和青年人在体验和看待休闲的方式上也有着重要的差别。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随着“青少年消费者”的增长,随着对大量的消费和休闲供给(既是商业的,也是非商业的)——这些供给支持那些精心设计的、旨在吸引青年顾客的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进行重组,成年人与青年人之间的这种差异被强化了。青年文化的这种广泛的可利用性(availability)和高度的醒目性(visibility),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为青年建构了休闲领域。青年人估量消费意义和休闲意义的态度,调整并强化了某些在父辈文化长期存在的价值取向;例如,看重“自由时间”特有的和特许的意义,倾向于把“青年”当作一个“人生得意须尽欢”——“在有限制之前最后一次恣意行乐”——的阶段。这种来自阶级内部的态度重塑,与那些来自阶级之外的、重新安排和重新分配青年人休闲模式的压力结合在一起,促使青年人去强调——事实上是顶礼膜拜——休闲的意义。因此,青年人不只是在那些与其父辈迥异的独特机构(如咖啡馆、迪斯科舞厅、青年俱乐部、“通宵派对”等)当中享受休闲活动;这些机构还强有力地青年人呈现自身不同于往昔的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归因为是他们绝对对青春活力。

到这里我们会明白,这些完全通过阶级产生作用、但在代际之间却以不同方式体验到的力量,是如何为一种专门针对年龄地位(age position)的观点——一种意识,一种代际意识——的产生确立基础的。我们恰好也可以看到,为什么这种“意识”尽管源于阶级处境和在其中运作的力量,但它呈现的意识形态却明显脱离于、无关于它的阶级内容和背景,甚至还在抵消它的阶级内容和背景。尽管我们可以理解这种独特的“代际意识”可能得以产生的方式和原因,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仅凭脱离生存境况来对它再解读一遍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不

能指望通过给青年重新指派一种清晰而简单的、基于阶级的身份认同和意识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可能会导致一些人激烈反对“代际意识”。我们已经指出,尽管一种充分发展的“代际意识”无形中会抑制和模糊阶级这个维度,但是它在工人阶级青年这一阶段特有的体验中确实有一个“合理的内核”;在青年人面对战后各种变迁的诸多机构的特性中,尤其是在代际意识领域被休闲市场的变化所重塑的方式中,也有这个“合理的内核”。这种代际意识也可能存在于(located in)该阶级的青年这一时期的其他世俗经验当中。在那些离开工人阶级向上和向外流动的青年人——如霍加特所说的“奖学金男孩”——当中,可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代际意识”。这一时期在职业和教育方面的变化,促成并拓宽了这些受限的流动渠道。通过教育向社会上层爬升的道路,导致了对于学校和教育体制的特别关注,学校和教育体制被看作是推动进步(追求上进)的主要机制;正是这一点使得安于现状的父辈与想要离开并追求上进的孩子们之间“产生了差异”。这使得青年人给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以积极评价,而亏本甩卖“父辈”文化——甚至在这里还伴随着一种独特的文化迷惘感。他的经验和自我认同将建立在流动性之上,这种流动性专门针对他这一代人,并不专门针对阶级的超强支配力量。支持奖学金男孩接受“代际意识”的一个因素,恰恰就是他的文化隔离——即他的职业不同于大部分同龄人这一事实。当然,对于围绕“一代人”的关注焦点组织起来的集体认同而言,同龄人群体确实是一种真实而稳定的基础。但是对代际特性的感受,也源于个体从一些普遍参与的同辈群体活动中的脱离;尽管这些群体活动是青年人特有的,但显然被理解为是在塑造“父辈”阶级文化的文化学徒身份。这种脱离可能缘于身世的因素:例如,无法参加当地的足球比赛,而足球是当地同辈群体最基本的活动;或者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而刻板的家庭。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一个没有能力度过阶级文化学徒期的青年人,更容易被那种替代性的同辈群体经验所吸引——这种经验是由那种以非常醒目的、广为普及的商业形式提供的青年文化所赋予的。在这种青年文化当中,整个受众作为一个巨大的、有象征意味的“同辈群体”——“我们这一代”——取代了真实的同辈群体。

因此,“代际意识”扎根于整个工人阶级青年的真实经验之中。但是,它在战后依据年龄、世代以及其他因素划分得泾渭分明的各种亚文化群体中,呈现出一种特别强烈的(intense)形式。青年人感受到和体验到了自身的“差异”,尤其是当这种差异被纳入那些首先要凭“年龄”这张通行证才能进入的活动和兴趣当中时,这种感受就更加强烈了。这不一定意味着“阶级感”因此就被抹去了。例如,光头党很明显既有“代际意识”,又有“阶级意识”。如科恩所说的那样:“亚文化是两种相互矛盾的需要之间的……妥协性的解决方案:一种需要想创造和表达不同于父辈文化的自主性和差异……另一种需要想维持……那种支持他们的父辈认同”(Cohen:1972:26)。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这些具有明显代际特征的工人阶级亚文化的构成。

G. 风格的来源

风格问题,更确切地说,一代人的风格问题,对这些青年亚文化群体在战后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个话题在后面的《风格》一文中会有详细的讨论,这里只概括一下要点)。我们这里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在生成独特群体风格的过程中,“阶级”元素和“代际”元素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第二,群体是如何以明显有组织的文化反应方式对可用的材料进行建构和挪用的。

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工人阶级青年生活在由领地、物品、关系、制度和社会惯例所界定的一个特殊的结构和文化背景里面。从亲戚、朋友网络、邻里的非正式文化以及他们周围接合的各种惯例等方面来看,青年人已经被“父辈”文化定位在其中了。他们也会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不期而遇,但不是疏远的、遥远的、强大的或抽象的形式中,而是在各种在地性的(located)形式和机构(institutions)中相遇,而这些形式和机构把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传达给处于从属地位的文化,并因此渗透到后者当中。对青年来说,学校、工作(从做零工开始)和休闲是几个最重要的机构(制度)。尤其对于青年来说,几乎同等重要的还有一些具有公共社会管制功能的机构和代理机构:学校履行了这一功能,但是在它旁边还有一些机构,从强制的“硬”机构——如警察,到那些

“比较柔性的”变体——如青年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

正是在本地的父辈文化与传播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的中介机构所形成的交界点上,出现了各种青年亚文化。当青年们与实施制度条文和控制的各类中介机构发生冲突时,他们借用和改写了“父辈”文化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冲突时精心设计的许多顺应、谈判和抵抗的方式。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群体在组织它们对于这些体验的回应时,采用了一些主要取自本地“父辈”文化的事物;但是他们对其进行了应用和转化,以适应于那些带有他们自己独特群体生活和代际感受的特殊处境和体验。即使在青年亚文化群体看起来与成人、与他们“父辈”文化影响下的其他同辈人最为特殊、最为不同、最为风格化的区分之地,他们也发展了某些明显由父辈文化建构的独特观点。我们此时会想起围绕集体活动(“群体虔诚”)反复发生的组织化,或者对“领地”的强调(泰迪男孩和光头党都是如此),或者是特有的阳刚观念和男性支配观念(几乎在所有战后青年亚文化群体中都复制了一遍)。“父辈”文化有助于界定这些广泛的、有历史根源的“焦点关切”。在这个层面上,“父辈”文化中的某些关键主题,一次次重现在各种亚文化当中,即使它们打算“与众不同”,或者看起来“与众不同”,也是如此。

但是,对于“青年”和他们的处境及活动来说,还存在着一些更切近、更具接合性(conjunctural)、更特别的“焦点关切”。总的来说,关于战后亚文化群体的文献忽略了第一个方面(那些与“父辈”文化共享的东西),而过度强调了那些独特的东西(青年群体的“焦点关切”)。但是,这第二个方面——在世代方面又一次显得非常特殊的東西——必须被非常认真地加以对待。它既包括这一群体为建立亚文化身份认同而采用的材料(服装、音乐和谈话),也包括他们的活动环境(活动、壮举、场所、小餐馆、舞厅、当日旅行、晚上外出、足球赛等)。新闻报道特别容易把事物孤立开来,不关注它们的用途,不关心它们是如何被借用和转换的,不清楚他们“开始行动”时所依赖的活动和空间,不知道将一种风格印刻在某些事情与物品之上的那些群体认同和群体看法。然而,在我们认真考虑这些事情和物品对于一种亚文化的重要意义之时,我们必须要做的一项分析工作,就是破除对它们的崇拜(de-fetishise)。

人们在分辨各种不同的青年亚文化群体时，往往根据的是他们所占有和所用的物品：如泰迪男孩的长靴鞋带式领结(boot-lace tie)和天鹅绒下垂领圈夹克；摩登族的短发、帕克牌(parker)大衣和轻骑摩托车；摩托车男孩(bike-boys)的褪色牛仔服、用卍字和花式字体装饰的摩托车；光头党的街斗钉靴(bovver boots)和光头；鲍伊迷们(Bowieites)^①的芝加哥西装或艳丽夺目的衣服。不过，尽管这些物品都很显眼，但仅仅挪用、穿戴(或倾听)它们并不能创造出一种风格。创造风格是一种风格效仿(stylisation)活动——用各种活动和观点主动把一些物品组织起来，从而制造出一种有组织的集体认同，后者展现为一种一致而独特的“在世”(being-in-the-world)方式和形态。例如，菲尔·科恩试图把研究重心从物品转向符号建构模式——通过符号建构，风格在亚文化群体中产生了。他确认了产生亚文化风格的四种模式：服装、音乐、仪式和暗语。然而，我们不愿把这种“符号系统”局限在这四种特定的模式中，并且感觉难以接受他(在“可塑”程度强还是弱两个方面)做出的这种区分，于是我们发现，这种对于群体代际的强调，要远胜于常见的新闻报道措词在商品对象与群体之间即兴构造的那种刻板化的联系。

如果缺少一种真实的经济基础——“丰裕”时期现金工资的增加，那么工人阶级亚文化群体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更重要的事实是，工人阶级青少年的收入增长要比成年人更快一些，并且其中大部分还是“可支配收入”(可用于娱乐、非强制支出的收入)。但是单靠收入也不能创造出一种风格。如果没有专门以青年为消费对象的消费品市场的增加，亚文化群体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新的青年工业提供了原材料和商品：但是它们无法在更深的意义上生产出许多非常本真的或持久的“风格”，或者它们尝试过却失败了。物品唾手可得，但被群体用于各种独特风格的建构当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是把它们简单地捡起来，而是要主动地把一种对物品和商品的独特选择建构到一种风格当中去。这通常涉及要颠覆和转换这些物品，把已知的意义和用途转向其他的意义和用途(正如我们在“民族志”部分的一些篇章里将要展现的那

① Bowieites：指英国摇滚歌手大卫·鲍伊(David Bowie,1947—)的追逐者。——校注

样)。所有的商品有一种社会用途,因此也有一种文化意义。我们只能观察商品的语言——广告,在那里,正如罗兰·巴特所观察到的那样,没有一种单纯的“圆领毛衣”,有的只是“在秋天的树林中散步时穿的毛衣”或“周日在家休息时穿的毛衣”,或者“偶尔一穿的毛衣”,等等(Barthes, 1971)。商品也是文化符号。它们已经被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赋予了各种意义、联系和社会涵义(social connotations)。许多这样的意义看起来是固定的、“自然的”。原因就在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已经完全地占有了这些意义并为其所用,以至于它归属于商品的这些意义出现时,似乎只能传达唯一的意义。事实上,在文化体系内并不存在这样的“自然的”意义。物品和商品本没有任何意味;它们之所以“有意味”,只因为根据社会用途它们已经被安排到了文化的意义代码之中,这种意义代码给它们指定意义。圆顶硬礼帽、细条纹西装和收起的雨伞,它们本身并不意味着“冷静”、“体面”和有工作的中产阶级男人。但是围绕着这些商品的社会符码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对一个工人阶级的小伙子来说,除非他要么向往中产阶级“形象”,要么看起来明显要戏弄这一形象,否则他是很难打扮成这种样子去上班的。这个小例子证明,人们是可以征用并盗用那些似乎“自然地”具有的社会意义;或者,可以把它们与其他东西结合在一起(例如,给细条纹西装配上鲜红的短袜或白色的跑鞋)并以此改变或转变它们的意义。因为商品表达的意义是社会给予的——马克思将商品称为“社会的象形文字”(social hieroglyphs),所以它们的意义也是可以社会改变或重构的。如前所述,根据罗伯茨(Roberts, 1971)或霍加特(1958)的描述和说法,工人阶级家庭内部再现了一种这样的“重写”(reworking),通过这种重写给一些用品铭刻上新的意义、联系和价值,把它们从提供它们的那个领域剥夺出来,并重新安置在工人阶级的文化当中。

工人阶级青年需要用金钱来购买富有表现力的商品、物品和活动——战后的消费市场有一种清晰的经济基础。但是无论是金钱还是市场,都不能完全支配这些群体如何使用这些物品去表明或表达他们自己。这种重新赋意(re-signification)要借助于许多不同的方式才能完成。第一种方式,是把那些从一个意义系统中借来的物品结合到一个

由亚文化自身产生并通过亚文化的用法生成的不同的代码当中,以此来转变它们“既定的”意义。第二种方式,是用添加意义的方式对那些由一个不同的社会群体所创造或使用的物品进行改造(例如,托尼·杰斐逊在后文所讨论的泰迪男孩对于爱德华时代服装的改造)。第三种方式,是通过对某种既定的意义进行强化、夸张或隔离,从而改变它的含义(如迪克·赫伯迪格讨论到的摩登族对消费和外表的“迷恋”;或者对意大利款式的尖头皮鞋进行加长;或者让借自20世纪40年代的楔形鞋在当下“广为流行”)。第四种方式,根据一种只有某个群体的成员才能解密的“秘密”语言或代码(如许多亚文化群体和越轨群体的暗语;黑人“牙买加小混混”的“拉斯塔法里教”语言)把那些形式合并起来。亚文化群体使用“青年市场”所提供的材料和商品来为他们自己建构有意味的风格和外表,还有多种方式,上面所列举的只是其中的几种。

更为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些被挪用的物品和事物被用来反映、表达和呼应的群体生活的那些面相。正是在一个群体所使用的各种物品与那些建构并界定了这些物品用途的看法和活动之间产生的这种相互作用,才是一个亚文化群体中风格创造的生成原则。这涉及如下的情况,一个亚文化群体的成员所挪用的那些独特的物品,总是与他们的焦点关切、活动、群体结构和集体自我形象有(或者被安排成)“同源性的”(homologous)关系——在这些物品中,他们可以发现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得到了保持和反映。(本书后面的《风格》一文对这一点会做更详尽的讨论。^①)从亚文化的角度看,光头党对靴子、短款牛仔、剃光头的吸纳之所以“饱含意味”,原因就在于这些外在的表现形态与光头党崇尚的阳刚之气、“强硬”和“工人阶级特性”这些观念产生了共鸣和接合。这意味着他们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克服或者处理甚至接管了这些表现形态在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代码中常常被赋予的许多负面的意义:

^① 关于“同源性”(homology)这一重要概念的最初形成,可参看保罗·威利斯的研究(Willis, 1972)。这项研究的简缩版很快将由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社以《世俗文化》(*Pro-fane Culture*, 1978)为名出版。——原注

比如剃光头总是与“监狱平发型”的形象、工作的形象,或者所谓“落伍的布帽劳工形象”等紧密相连。新的意义之所以会出现,不只因为这些被借用来或被恢复的“碎片”被汇总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崭新而独特的风格组合系统(*ensemble*),还因为这些象征性的物品(服装、外表、语言、仪式场合、互动风格、音乐等)被用来构建与这个群体的交往、处境和体验的一种统一性(*unity*):以一种富有表现力的形式完成这一具体化过程,并以这种具体化来界定这一群体的公共认同。这些象征性的外表其实无法脱离于作为社会形态结构的群体结构、经验、活动和看法。亚-文化的风格建立在由群体关系、活动和环境构成的基础架构之上。

这种以一种醒目风格对集体认同、处境和生活轨迹所做的标示,不但把一个群体从一个松散聚集的实体统合为一个紧密结合的实体,而且把该群体与其他相似的或不同的群体明显地区别开来。事实上,像所有其他的文化建构一样,这种通过对事物进行符号化的使用来巩固和表达一种内在凝聚力的做法,同时也是一种对于其他群体的隐含的对抗(此处并不是一种主动的、故意的对抗)——以其他群体为背景,它的认同得以界定下来。在我们的时代,这一过程使得这些群体变得与众不同、刺人耳目,沿着这条风格化的道路,它们把“亚文化的解决方案”推向了极限。反过来,这一过程也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后果,招致社会卫道士、道德捍卫者(*moral entrepreneurs*)、公共界定者和整体的社会控制文化对这些群体更多地施行贴标签、刻板化定型和污名化等手段。

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亚文化只是青年人面对自己所处的处境时采取的一种回应方式,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回应方式。除了指明那些公开提供给青年人的选择范围和变量之外,我们也许可以增加一个假设性的方案,这一方案有助于弄清我们在青年的处境(*position*)与各种文化选项——通过它们将各种特殊的反应组织起来——之间所做的区分。

我们可以概括地区分一下这三个方面:(社会)结构(*structures*)、文化群和个人经历(*biographies*)。(关于扩展这个方案并将它运用到黑人青年的处境分析的相关情况,可参看下文从《二十年》[*20 Years*]一

书中摘取的内容。)我们所说的**结构**,指的是与主要的制度、机构和结构相关的一系列有社会化组织的阶级处境和阶级经验。这些处境产生了一系列共有的关系和经验,而有意义的行为——个人和集体的——就是从这些共有的关系和经验中建构出来的。而**文化群**是对这些基本的物质和社会条件所做出的一系列有社会化组织和模式化特征的反应。虽然各种文化群为每个群体塑造了一套传统——从往昔继承下来的行为方针,但它们必须始终在每一代人手中得到集体性的重新建构。最后,**个人经历**是特定的个体经历这些(社会)结构和文化群的“履历”,是个体身份认同和生命历程从集体经验中得以建构的途径。个人经历识别出个性化道路的因素,这些个性化的道路是个人生命通过集体性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群而选择的,但不能认为它们完全是个人的,或者完全是独立的。个人经历处在个体所处的那些被决定的结构空间和文化空间当中,并通过这些空间开辟各种道路。尽管我们这里还不能非常充分地讨论个人经历层面,但我们坚持认为,由于个体是通过(社会)结构和文化群来建构起来他(她)自己的,因此个人经历只有结合(社会)结构和文化群这两个因素才能讲得通。

H. 反主流文化群体(counter-cultures)的兴起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专门讨论了工人阶级青年的亚文化群体。但是,我们是否能够以相同的方式、在相同的理论框架中去讨论中产阶级的亚文化群体呢?要对此做判断就会面临一些新问题。然而,在战后这段时期,我们见证了中产阶级青年中的各种非常独特的“表现运动”(expressive movement)的兴起,这些运动不同于战前的学校或“学生”文化;而且,越是接近20世纪70年代,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我们会发现中产阶级青年的这些运动比工人阶级同龄人的活动引发了更多的公共关注和反应。当然,我们要指出的不只是中产阶级青年越来越深地介入与“青年文化”相关的商业化的流行文化和休闲活动当中,还要指出那些非常独特的“亚-文化”潮流的出现:嬉皮士运动;各类“离经叛道的”吸毒活动;逃避社会现实者(drop-out)和同性恋亚文化群体;学生抗议运动中的“文化反叛”元素,等等。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广

大中产阶级青年中出现了普遍的文化疏离 (disaffiliation)——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①现象。反过来,与这种现象相关联的事情,是某些中产阶级青年阶层的普遍激进化和政治化(和“去政治化”)。

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不同阶级青年的反应中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结构性差异。工人阶级的亚文化群体是一些明显接合起来的集体结构——常常“类似于”帮派或可以说是“准帮派”。中产阶级的反主流文化群体则比较松散,较少以群体为中心,更为个人化。后者通常促成的不是一些紧密结合的亚文化群体,而是一种弥散的反主流文化氛围。工人阶级的亚文化群体在以下两种生活面相——仍然被占支配地位的或“父辈的”制度完全约束的那些群体生活(家庭、学校、工作)与那些在非工作时间关注的生活(休闲及同辈群体联合)——之间再生产出了一种明显的二元区分。而中产阶级的各种反主流文化氛围则将“必要”时间和“自由”时间以及各种行动混杂在一起,不做区分。更有甚者,中产阶级反主流文化氛围的显著特征恰恰体现在:它们试图探索可以替代主导文化核心制度的那些“另类的制度”——生活、家庭生活、工作甚至“不工作”(un-careers)的各种新模式。中产阶级青年“在过渡期”停留的时间要比工人阶级青年同辈停留的时间长一些。一般来说,工人阶级青年占用的是现有的环境,围绕既定的工人阶级环境——街道、邻里社区,足球场,海边城镇,舞厅,电影院,废墟(bomb-site),酒吧,迪厅——建构他们独特的休闲活动。中产阶级青年则倾向于在主导文化的间隙中建立“飞地”。工人阶级青年的占用表现为一种对“聚居区”的占用,而中产阶级青年则通常表现为对“聚居区”的大批迁离。在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高峰期,中产阶级反主流文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另类社会”的雏形,为反主流的文化提供一种地下的制度性的基础支撑。在这里,每一个阶级的青年再生产了他们所属的“父辈”阶级的地位。中产阶级为那一部分想“脱离”封闭循环的人提供了空间和机会,而工人阶级青年则始终被周六晚上和周一早晨这两个

① Counter-Culture 可译为“反主流文化”或“反文化”,本书根据汉语表达习惯并结合语境灵活选择。——校注

时间段构成的那种支配性的替换节奏牢牢控制着。

工人阶级亚文化群体具有的那种客观的反抗内容在社交方面自我表现出来。因此,它经常被控制文化(control culture)等同为工人阶级“行为不端”的传统形式,被界定为流氓习性(Hooliganism)或破坏行为(Vandalism)。而反主流文化群体采取的是更公开的意识形态形式或政治形式,他们努力阐明自己对于主导性价值观和制度的反抗——即使在这种反抗并没有采取一种明显的政治反应形式时(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形),他们也会强调这一点。与之相比,即使在工人阶级亚文化群体具备了强有力的阶级意识之时,这一方面也容易被控制文化所抑制,后者将他们视为“典型的青少年罪犯”。即使中产阶级的反主流文化群体明显是反政治的(anti-political),他们的真实倾向也被认为具有潜在的政治性。

与其说中产阶级反主流文化是20世纪50年代的特征,不如说它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特征。只有少数知识青年卷入了在英国出现的“避世运动”(Beat movement,即“垮掉的一代”)^①的对应运动。一种带有“后垮掉一代”(post-Beat)、“在路上”^②色彩的风格,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核裁军运动(CND)^③及其他和平运动而更加盛行,比如,与垮

① Beat movement 也被称为 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是20世纪50年代诞生于美国的一场社会和文学运动,后波及英国及其他国家。它的追随者自称为“beat”并被人们嘲讽地称为“beatniks(避世派)”。“beat”一词最初含有“疲惫”或“厌烦”之意,但随后被赋予“欢腾”或“幸福”的含义,与音乐中“节拍”概念联结在一起。“垮掉的一代”用此种称谓表达自己与传统“正直”社会的决裂,在诗歌创作、穿着、行为举止和口语等方面表现惊世骇俗的创造,他们的作品注重个人感官的觉醒,提倡个人解放和精神净化。这一运动20世纪70年代逐渐衰退,但其影响力仍持续了数十年。——校注

② 《在路上》(On the Road)是“垮掉的一代”的代表性作家杰克·克鲁亚克(Jack Kerouac, 1922-1969)于1952年完成、1957年出版的一部小说,被认为充分体现了作者主张的即兴式自发性写作技巧和随意性用语特征。——校注

③ CND是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的简称。1958-1964年在英国爆发的以中产阶级(特别是新左派青年)为主体的颇具影响力的社会运动。运动的基本目标是反对核军备竞赛,主张推迟、禁止、甚至完全取消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核试验,削减核军备。——校注

掉的一代 / 反战分子活跃的时期相关联的就是民谣的复兴和鲍勃·迪伦(Bob Dylan)^①的音乐。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嬉皮士群体是最为独特的中产阶级亚文化群体。它们对这一部分青年产生的文化影响非常大,因此许多反主流文化的价值观都必须追溯到它们的嬉皮士根源。嬉皮士促成了一种完整的准波希米亚式的(quasi-bohemian)亚文化氛围的形成,并塑造了风格、服装、态度和音乐等标志形式。先锋团体(the Underground)的那些另类的制度基本上都出自这一模型。但嬉皮士文化很快就四分五裂了——变成麻醉品吸食者(heads)、瘾君子(freaks)、街头人群(street people)等。嬉皮士滋养了那个时期的“逃避社会者”和吸毒亚文化群体。它渗入学生文化和退学者的文化当中。嬉皮士运动随后受到了中产阶级青年当中出现的那些政治性更强的元素——学生抗议运动、激进的社会工作、社区行动群体以及左翼派别的发展等——带来的剧烈冲击。所有这些政治倾向在1967-1970年——反主流文化的高峰期——出现了部分的融合。这种结构也分裂成多个方向。其中有两种走向最有特色:一种是通过毒品、神秘主义以及“生活方式的革命”进入一种乌托邦式的另类文化;另外一种则是通过公社行动、抗议行动和自由放纵主义目标,进入一种更具行动主义的政治斗争。总之,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处在广义界定的反主流文化氛围之内的、形形色色的反主流文化的分支、联系和分歧,而不是有严格界定的各种中产阶级反主流文化群体(毒品和性亚文化群体除外)。

① 鲍勃·迪伦(Bob Dylan,1941-),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Robert Allen Zimmerman),是一位有重要影响力的美国民谣歌手、音乐家和诗人。他成名于20世纪60年代,被认为是美国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代言人。他的一些歌曲,如《答案在风中飘》(*Blowing in the Wind*)等成为反战抗议和民权运动中被广泛传唱的曲目。他的歌词包含了政治抗议、社会评论、哲学和诗歌,至今还受到人们的推崇和喜爱。——校注

表1.2.1 反主流文化年表(英国)^①

	政治的	文化的
1965	核裁军运动(CND);反越战游行	鲍勃·迪伦巡回演出
1966	越南团结运动 ¹ ;激进学生联盟(成立)	《I.T.》 ² 《OZ》 ³ 《B.I.T.》 ⁴ 准予发行
1967	格罗夫纳(Grosvenor)广场(美国驻伦敦使馆附近)首次反战示威;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生静坐示威(英国首次)	“海盗电台”关闭 ⁵ ;警察突然搜查 I.T.; “解放辩证法会议” ⁶ ; 滚石乐队 ⁷ 歌手因吸毒被逮捕; 伦敦反抗大学运动;艺术实验室运动
1968	格罗夫纳广场第二次和第三次反战示威; 伦敦占领空置房屋运动; 革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R.S.S.F)建立 (在 Essex/Hornsey/Hull/Birmingham 大学)	(海德公园)大麻合法化集会; 《黑侏儒报》(Black Dwarf)创刊 ⁸ ; 海德公园免费音乐会;《暂停》(Time Out) ⁹ ; 苹果唱片公司;《甘道夫的花园》 ¹⁰ 创刊;(反映嬉皮士生活的美国音乐剧)《头发》(Hair)轰动英伦
1969	拒绝给北越代表团发签证——游行示威 反种族隔离的彼得·海恩(Peter Hain)被捕 /阻止南非球队在英巡演赛(S.T.S.T.) ¹¹ 占领皮卡迪利大街 144 号的空置房屋	滚石乐队在海德公园演出; 第一(应为第二)届怀特岛音乐节 ¹² ; 《伍顿大麻无害报告》被驳回 ¹³ 。
1970	剑桥花园房饭店骚乱(抗议希腊军政府); 公平板球运动(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 首届妇女解放会议(牛津大学)/妇女解放 组织破坏世界小姐选美大赛	第二(应为第三)届怀特岛音乐节; 福音摇滚(Godspell);易皮士(Yippies) 恶搞弗洛斯特节目 ¹⁴ ; 《IT》审判;白豹党 ¹⁵ ; “女太监” ¹⁶ ; “戏弄权力” ¹⁷
1971	“愤怒旅”引爆炸弹;就业部长罗伯特·卡尔(Robert Carr)家里;碧玛时装店(Biba) ¹⁸ ; 邮政总局。 “愤怒旅”被捕;Prescott / Purdie 审判 ¹⁹ ; 《OZ》审判;红树林餐馆事件 ²⁰	(地下刊物)《墨水 / 7 日》始发; 《下流故事》 ²¹ 被抓; Glastonbury 音乐节; (重组后的)彩虹戏院开张; 《社会主义妇女》杂志; 光亮节(反对媒体上的暴力和色情)
1972	“愤怒旅”审判;学生会的金融问题; 《头发》剧组(因受攻击)自诉案; 赫尔大学 / 伦敦经济学院学生静坐; (女王)在斯特灵大学(视察遭学生嘲弄和斥责)	(生态主义著作)《生存蓝图》出版 ²² ; (女权主义刊物)《排骨》(Spare Rib); (另类科技思想杂志)《潜流》; 晚间集会法令(限制人数和时长); Bickershaw 和 Lincoln 摇滚音乐节
1973	大学补助金示威; 泰晤士理工学院(Thames Poly)静坐	解救皮卡迪利大街 / 伦敦属于人民; 最后一期《OZ》;另类社会思想联盟 ²³
1974	红狮(Red Lion)广场示威(一学生被射杀); 北爱尔兰要求撤离军队运动; “军队滚出智利”运动; Essex 大学学生闹事	温莎(Windsor)公园自由集会(与军警冲突); 《可能性的清单:能源与权力》 ²⁴ ; 地球之友(F.O.E);英国政府总部的纸质文件

① 本书英文版中的表1.2.1和表1.2.2由斯图亚特·丹尼斯(Stuart Daniels)制作,对所列历史事件未作任何注释。考虑到国内读者参阅需要,校(译)者择取重要事件作简单注释。表中括号内以楷体出现文字为校者补注,有序号的注释内容按顺序分别附于英国和美国反主流文化年表之后。——校注

《反主流文化年表》(英国)简注:

1. **越南团结运动**(*Vietnam Solidarity Campaign*)最初是由一些社会活动家于1966年成立的保卫世界和平的组织,受到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的个人资助。一些马克思主义行动者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该组织1967年在伦敦格罗夫纳广场召集了2万人的反越战和反美示威,并在1968年3月和10月两次再度发起反战示威活动,参加人数最终达20万人之众,这一组织的分部也曾经扩展到英国的许多城市甚至小镇。

2. *I.T.*是*International Times*(《国际泰晤士报》)的缩写,也写作IT。是一份于1964年在伦敦创办的激进地下报刊,刊登过不少连环漫画,1966年开始发行(两周一期),1967年4月起突遭警察搜查,后成功反击警察指控。1972年曾停刊,1975年复刊,至1982年再停刊,后又断续复刊,2011年转为网络杂志。

3. *OZ*最初在悉尼创办,在1963-1969年是一本讽刺幽默杂志。1967-1973年移师伦敦出版后变身为一本体现“迷幻嬉皮士”文化的杂志,属地下刊物,多刊登连环漫画。该杂志于1964年和1971年分别受到澳大利亚和英国官方的淫秽指控,但均以无罪告终。

4. *B.I.T.*应该也是1966年在伦敦创刊的一份地下刊物,具体情况不详。

5. “**海盗电台**”(Pirate Radio)就是在接收国领海之外从船上向接收国发送广播信号的非法电台。英国第一家海盗电台是1964年开办的Radio Caroline,从远离艾塞克斯(Essex)港口岸的船上发信号。1967年已经发展到21个,据估计每天有1000万-1500万听众。主要播放流行歌曲和摇滚音乐,直接冲击了BBC独家垄断的局面。

6. “**解放辩证法会议**”(Dialectics of Liberation conference)于1967年7月15-30日在伦敦举行,由美国心理学家约瑟夫·伯克(Joseph Berke)发起并组织,英美多位知名左翼学者和其他激进人士参会,如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和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 1926-1997)等。主要议题范围是努力揭示各种形式的暴力及其产生的社会制度根源,并试图寻求新的行动方式。

7. “**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是英国著名摇滚乐队,1962年在伦敦成立。乐队主要成员5人:歌手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 1943-)、吉他手兼歌手基思·理查德(Keith Richards, 1943-)、吉他手兼歌手布莱恩·琼斯(Brian Jones, 1942-1969)、贝斯手比尔·怀曼(Bill Wyman, 1936-)、钢琴手伊恩·斯图尔特(Ian Stewart, 1938-1985)和鼓手查理·沃茨(Charlie Watts, 1941-)。滚石以其先锋青年反叛风格在1964-1965年成功登陆美国,并融合为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它也可被视为后期“嬉皮”运动中绝对“自我中心主义”和滥用毒品的代表。40多年来,滚石乐队使自己永葆生命活力,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摇滚乐队之一”。

8. 《**黑侏儒报**》(*Black Dwarf*)是1968-1972年由一群英国社会主义者创办的一份文化和政治报刊。1968年秋季号全文刊登了切·格瓦拉的《玻利维亚日记》以及卡斯特罗为此所写的

序言,在西方青年当中前产生强烈影响。1970年前由巴基斯坦裔学者塔里克·阿里(Tariq Ali,1943-)任主编,编委会后来分裂为列宁主义和非列宁主义两派。

9.《暂停》(*Time Out*)是1968年由托尼·艾略特(Tony Elliott)创办的一份另类地下杂志,号称自己是“城市生活指南”周刊,主要刊登所在城市的各种文化娱乐信息,体现嬉皮士的自由反叛精神。20世纪80年代转型,1990年曾风行一时,激进性现已完全消退。

10.“甘道夫的花园”(Gandalf's Garden)是一个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活跃于伦敦的神秘主义社团,提倡沉思胜于吸毒,是嬉皮地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组织经营一家商店和一本地下杂志,都冠名为“甘道夫的花园”,穆兹·默里(Muz Murray)担任杂志主编。

11. S.T.S.T.是Stop the Seventy Tour的缩写,指1969-1970年英国公民为抗议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用和平示威的方式阻止南非板球队在英国的巡回表演赛,还发起了“公平板球运动”(Fair Cricket Campaign)。年仅20岁的彼得·海恩(Peter Gerald Hain,1950-,又译韩培德)就是这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因阻挠球赛被起诉而令人瞩目。他的父母虽为南非白人,但都是激烈批判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正义人士,并因此遭受政治迫害,被迫在他16岁时移居英国。这是他参与政治运动的起点,他后来加入工党,并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下议员,担任过就业部长等职。

12. 怀特岛音乐节(Isle of Wight Festival)是在位于英国南部海岸线附近的怀特岛举办的音乐节。此音乐节于1968-1970年举办过三届,其中1970年的那届音乐节是至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有名的早期摇滚音乐盛事之一,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一次人类的聚会,据说有超过60万人次参加。英国议会1971年通过“怀特岛法案”,要求在没有特别许可的条件下音乐节聚集人数不能超过5000人(据校者所查材料,推断本书此表中作者或许将第二届、第三届音乐节分别误记成第一届、第二届音乐节)。

13.《伍顿大麻无害报告》(*The Wootton Report on Cannabis*)是英国内政部下属的“迷幻剂审查小组委员会”于1969年发表的一份有关大麻对人体和精神无太大危害的报告。由于负责该报告起草工作的是该审查小组主席、著名社会学家、犯罪学家芭芭拉·伍顿女士(Barbara Wootton,1897-1988),因此被称为“伍顿报告”。

14. 易皮士(Yippies)是对“青年国际党”(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成员的称谓,该组织于1967年的最后一天在美国成立,是一个激进的青年反主流文化组织,没有会员纪律和等级,属于宽泛的嬉皮士运动的一个支派。他们的成员往往采用一些高度戏剧化的、恶作剧式的、符号化的方式来嘲弄权威和社会现状,反对越战。Yippie一词是该组织创立者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1936-1989)和杰里·鲁宾(Jerry Rubin,1938-1994)对照Hippies(嬉皮士)一词生造出来的。1970年11月7日,杰里·鲁宾利用充当英国电视节目嘉宾的身份,与伦敦的易皮士们借用广受欢迎观众欢迎的“弗罗斯特节目”(The Frost Programme)来搞恶作剧。一名易皮士用水枪对准节目主持人大卫·弗罗斯特(David Frost,1939-)刚张开要说话的嘴进行喷射,导致场面混乱,电视直播被迫叫停。霍夫曼作为一代反叛青年的偶像人物,组织过多次恶作剧事件。比如,1967年进入纽约股票交易所狂撒假美钞,引起众人拾检和骚动,以此嘲弄资

本主义;1967年在五角大楼前的反战示威中用“性炸弹”迷幻剂等恶作剧方式,吸引5万人参加游行;1968年在芝加哥民主党全国大会开幕前宣称要给自来水系统投放迷幻剂,导致该市气氛紧张。霍夫曼还是黑客文化的先驱,主动传播对抗资本主义利益交易制度的各种“盗窃”技术——特别是电话盗打技术。因受警方追捕,他曾逃亡多国,改头(做了整形手术)换名(改名为Barry Freed)过了7年地下生活。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贩卖毒品自首并被判刑1年。1989年他在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中掺投了大量苯巴比妥,然后饮酒自尽。

需要补充一点,“易皮士”(Yippies)在汉语学界常被误译成“雅皮士”,其实后者对应的英文词是Yuppies,Young Urban Professionals(年轻的都市专业工作者)的缩写形式。Yuppies于20世纪80年代才在美国出现,也是比照嬉皮士(Hippies)一词造出来的,专指那些受过高等教育、住在大城市、从事专业性工作、生活优裕并且追求时尚的“唯美”男性。他们丝毫没有了20世纪60-70年代“易皮士”的政治热情和反叛精神,更多关注个人的生活品位和享受。另有人将Yuppies译为“优皮士”,也许不无道理。

15. **白豹党(White Panthers)**是1968年在美国成立的一个反种族主义的美国白人极左激进政治团体,是为支持和响应美国黑人激进解放组织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1966年创建)而建立的。创建人有劳伦斯·普兰默顿(Lawrence Plamondon,1946-)、莱尼·辛克莱(Leni Sinclair,1940-)和约翰·辛克莱(John Sinclair,1941-)等。英国的白豹党是由美国白豹党英国地下组织领导人、无政府主义者、作家米克·法伦(Mick Farren,1943-2013)于1970年创建的。“黑豹党”的相关注释见(美国)《反主流文化年表》后。

16. **《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是澳大利亚籍女权主义学者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1939-)于1970年在伦敦出版的一本非常畅销的著作,对国际女权主义运动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17. **《戏弄权力:国际地下组织考察》(Play Power:Exploring the International Underground)**是澳大利亚作家理查德·内维尔(Richard Neville,1941-)在1970年出版的一本书。该书详尽汇录了他在1967-1970年经历的世界各地的地下社会场景中的逸事,表达出反主流文化的乐观精神。内维尔自称是“未来主义者”,长期担任著名地下刊物《OZ》的主编。

18. **碧玛时装店**:波兰裔著名时尚设计师Barbara Hulanicki于1964年在伦敦肯辛顿(Kensington)首开Biba时装店,后风靡英国并成为世界名牌,因此成为激进分子攻击的目标。

19. **“愤怒旅”(Angry Brigade)**是一个小规模英国无政府主义团体,成员多为退学青年。他们在1970-1972年在就业部长家里、碧玛时装店、邮局总局制造了一系列炸弹袭击事件。杰克·普莱斯考特(Jake Prescott)和伊恩·柏迪(Ian Purdie)是“愤怒旅”的骨干成员,1971年11月10日接受伦敦中央刑事法庭审判,审判时间长达3周。

20. **红树林餐馆(Mangrove)**是一个位于西伦敦诺丁山的小餐馆,1968年由一位热衷社区行动主义和民权运动的特里尼达人Frank Crichlow创办。起初是为黑人群体提供交流和会面的场所,也吸引了一些白人激进分子、作家和艺术家,因此成为警方的眼中钉。由于不堪忍受警方的多次袭扰,相关人士于1970年8月举行“勿动红树林”的抗议活动,这场活动最终演变

成暴力骚乱。其中9名示威者被逮捕,1971年被无罪释放,被称为“红树林九勇士”(Mangrove Nine),1973年还被拍成了电影。此案暴露出英国警界素有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此案的审判也成为反种族主义的经典案例。

21. 《下流故事》(*Nasty Tales*)是IT杂志为了缓解经济困难于1971年出版的另一份地下杂志,刊登过色情连环画及故事。

22. 《生存蓝图》(*The Ecologist's Blueprint for Survival*)是英国《生态学家》(*The Ecologist*)杂志编辑Edward Goldsmith和Robert Allen联络30多位著名科学家共同编写的一本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环保主义著作,1972年出版。

23. “另类社会思想联盟”(Alt. Soc. Ideas pool)作为一个编者群体,1973年编纂并出版《一本充满愿景的书:另类社会规划指南1973》(*A Book of Visions: A Directory of Alternative Society Projects 1973*)。

24. 《可能性的清单:能源与权力》(*An Index of Possibilities: Energy and Power*)是一本由一个名为Catalogue的组织撰写的讨论能源危机及其他人类重要问题的书,1974年由Clanose Publishers and Wildwood House首版,1975年由Pantheon Books再版。

表1.2.2 反主流文化年表(美国)

	政治上的	文化的
1965	第一次全国反战游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 ¹ ； (洛杉矶)沃茨(Watts)街区(种族骚乱) ² ； (黑人民权领袖)马尔科姆·X被暗杀 ³	纽约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N.Y.)成立(信仰社会主义、反战教授集中)
1966	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SNCC)——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ey Carmichael) ⁴ ；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发起反战静坐	旧金山市海特-阿什伯里区的嬉皮士掘地派(Diggers) ⁵ ； 肯·凯西(Ken Kesey)的迷幻音乐节 ⁶
1967	黑豹党 ⁷ ；纽瓦克/底特律的骚乱 ⁸ ； 黑豹党人伊休·牛顿(Huey Newton)被拘禁； 五角大楼前反越战示威 ⁹	旧金山首次嬉皮士户外自由大聚集 ¹⁰ ； 蒙特雷(Monterey)流行音乐节 ¹¹
1968	民主党全国大会——芝加哥 ¹² ； 马丁·路德·金遭暗杀； “选一头猪当总统” ¹³ ； 黑人学生斗争	易皮士——生活的音乐节 ¹⁴ ； 安迪·沃霍尔遇刺/瓦莱丽·苏莲娜《摧毁男人协会宣言》 ¹⁵ ； 阿比·霍夫曼《革命只为闹着玩》
1969	暂停越战示威 ¹⁶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 分裂——“气象员”炸弹 ¹⁷ ；同谋审判 ¹⁸ ；弗 瑞德·汉普顿(Fred Hampton)被枪杀 ¹⁹ ；妇 女解放运动；伯克利“人民公园” ²⁰ ； 印第安人占据阿尔卡特拉斯岛 ²¹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²² ；查尔斯·曼森 (Charles Manson)集团杀人案 ²³ ； 白豹党人约翰·辛克莱(John Sinclair)因大 麻案在狱中服刑； 《逍遥骑士》(Easy Rider)出版 ²⁴
1970	黑豹党与警察交火；州立肯特大学杀戮 ²⁵ ； 黑豹党女杰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 被捕；耶鲁大学学生支持黑豹党； 尼克松/阿格纽；向“懒汉”学生开战 ²⁶	蒂莫西·利里入狱又出狱 ²⁷ ； “气象员”被疑在旧金山警局引爆炸弹；曼 森审判； 《美国的青春化》 ²⁸
1971	最后一次全国反战示威； 阿蒂卡监狱暴动 ²⁹ ；黑豹党分裂； 黑人活动家乔治·杰克逊被杀 ³⁰ ； 黑豹党人鲍比·西尔和哈金斯(Ericka Hug- gins)获释	辛克莱在列依和小野洋子帮助下“出狱” ³¹ ； 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猝死 ³² ； 杰里·鲁宾出版《我们无所不在》
1972	安吉拉·戴维斯无罪释放； 尼克松下赌注； 黑豹党“黑人社区生存会议” ³³ ； 印第安人占据印第安事务局	孟加拉国救灾音乐会现场专辑 ³⁴ ； (动画片)《怪猫菲力兹》(Fritz the Cat) ³⁵
1973	鲍比·西尔当选奥克兰市市长； 保罗·索格林当选威斯康星州激进市长 ³⁶ ； 共生解放军 ³⁷ ； 黑人教育家马库斯·福斯特遇害 ³⁸	马荷罗基(Guru Maharaj Ji) ³⁹ ； 蒂莫西·利里在阿富汗首都再次被捕
1974	共生解放军队突袭与蒂蒂·赫斯特 ⁴⁰ ； 水门事件——福特总统对尼克松的特赦	蒂莫西·利里公开认错； 波西格的《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 ⁴¹

《反主流文化年表》(美国)简注:

1. SDS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的缩写形式,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学生行动主义组织,深受新左派思想影响。它开创和实践的参与式民主制度、直接行动、激进主义、学生权力、小本经营预算等组织形式奠定了美国学生运动组织的经典模式。该组织前身是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学生工业民主联盟”(Student 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 SLID),1960年在密歇根大学校园召开成立大会,1962年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著名的《休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后者成为学生反叛运动的宣言书。1969年分裂为多个派别,1974年宣布解散。

2. 沃茨骚乱:1965年8月11-17日,洛杉矶沃茨(Watts)街区的黑人民众因抗议警察随意逮捕黑人青年而与警察发生冲突,导致严重骚乱。黑人抢劫白人的商店,焚毁建筑物,导致34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3400多人被捕,财产损失超过4000万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种族骚乱之一。

3. 马尔科姆·X(Malcolm X, 1925-1965),原名马尔科姆·利托(Malcolm Little),出生并成长于美国,是伊斯兰教教士、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导人物之一。他出身基督教牧师家庭,1946年因加入黑帮犯罪入狱,在狱中受激进的伊斯兰国度派(Nation of Islam)教士感化,完成硕士学业并信仰国度派。1964年后改信逊尼派,抛弃激烈的黑白分离主张,成立宗教性的穆斯林清真寺社团以及政治性的非裔美国人团结组织,寻求与不同宗教、种族的民权运动人士进行合作。批评人士认为他煽动暴力、仇恨、黑人优越论、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肯定人士则视他为非裔美国人权利的提倡者,是对白人对黑人罪行的有力批判者。1965年2月21日,他在纽约曼哈顿一舞厅演说时,被三名伊斯兰国度派成员枪杀遇害。

4. SNCC是“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的缩写,是1960年成立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争取民权运动的学生组织。最初在美国南方的一些大学比较活跃,后来影响到全美。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 1941-1998)曾任该组织的第四任主席,他是一位特立尼达裔美国黑人激进分子,积极推动“黑人权力”运动,提升了民权运动的政治诉求水平。

5. 海特-阿什伯里区(Haight-Ashbury district)位于旧金山市,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最负盛名的嬉皮士聚居地之一。

6. 肯·凯西(Ken Kesey, 1935-2001),美国小说家,参与精神药物和吸毒实验,并且将吸毒迷幻体验写进自己的作品,是20世纪60年代嬉皮士吸毒迷幻感觉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7. 黑豹党(Black Panthers)是一个由非裔美国人组织并旨在促进美国黑人民权的激进左翼组织。1966年由休伊·P·牛顿(Huey Percy Newton, 1942-1989)和鲍比·西尔(Bobby Seale, 1936-)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Oakland)创建。很多成员崇拜毛泽东的武装斗争思想,尝试在黑人社区实行社会主义实践。他们主张黑人应该有更为积极的正当防卫权利,甚

至可以使用武力。20世纪60年代及20世纪70年代非常活跃,搞过一些激进的暴力行动,并得到一些白人左派激进分子的支持和声援(1968年建立的白豹党即是一例)。

8. **纽瓦克/底特律的骚乱**:1967年7月12-17日,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Newark)因黑人不满白人警察随意拘捕黑人司机而发生骚乱,示威黑人中有22人被打死,2000人被打伤,1600多人被逮捕,军警中3人被打死,50多人受伤。7月23-27日,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Detroit)因警察扫荡一个无牌照的酒吧,引发空前规模的黑人同军警的武装冲突,持续5天的骚乱导致43人死亡,467人受伤,超过7200人被捕,2000多座建筑物受到破坏。

9. **五角大楼反越战示威**:1967年10月21日,大约35000名反战人士在一个名为“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动员委员会”(National Mobilization Committee to End the War in Vietnam)的组织动员下,在五角大楼聚集示威,并与大约25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对峙。抗议活动过程中,一幅著名的摄影作品被流传下来——示威者乔治·哈里斯(George Harris)将一束康乃馨鲜花插到了防暴士兵的枪管中,表达“要爱不要战争”的嬉皮士精神。

10. **金门公园大聚集**:1967年1月14日,2万多名嬉皮士聚集在旧金山金门公园,举行嬉皮士户外大聚会,使得嬉皮士文化迅速风靡全美。

11. **蒙特利流行音乐节(The Monterey Pop Festival)**:1967年6月16-18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蒙特利市露天游乐场举办,将反主流文化的摇滚音乐引入,有超过5万人(最多时达9万人)参加。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大型摇滚音乐节。

12. 1968年8月26-28日**民主党全国大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在芝加哥召开,反越战示威群众在会场外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包括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和杰里·鲁宾(Jerry Rubin)在内的7名著名激进人士被拘捕。

13. **“选一头猪当总统”**:1968年8月23日,即民主党全国大会在芝加哥开幕前夕,一些易皮士所搞的一次恶作剧式的嘲讽政党选举的表演活动。他们在集会现场,提名让一头重145磅、名叫Pigasus的猪去竞选总统,引起会场的一片骚动。芝加哥警察很费力地捉住了这头猪,并以妨害治安为由拘捕了赞助这次活动的数位易皮士。

14. 从1968年8月23日(在民主党全国大会召开前夕)开始,多个组织在芝加哥组织了多场反战示威。其中25日下午在林肯公园开始举办“生活的音乐节”(Festival of Life),希望能让人们尽情地自由享受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艺术实践。在这期间发生了民众与警察的激烈冲突,导致多人受伤。

15. 1968年6月3日,极端女权主义分子、女演员兼作家瓦莱丽·苏莲娜(Valerie Solanas, 1936 - 1988)在纽约向波普大师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 1928-1987)连开三枪,致使沃霍尔严重受伤,苏莲娜也被判刑3年。苏莲娜在1967年自费出版过她曾遭受沃霍尔拒绝出版的《摧毁男人协会宣言》(SCUM Manifesto, “SCUM”是“Society for Cutting Up Men”的首字母缩写)一书。此次刺杀事件被看作是对男权社会最前卫的一次冲击与反抗,她的书因此而闻名。

16. **暂停越南战争(the Moratorium to End the War in Vietnam)**:是一场在1969年10月25

日发生的席卷全美的群众反战示威和辩论运动，直接导致了一个月之后更大规模的要求中止越战的向华盛顿进军运动(Moratorium March on Washington)。

17. “地下气象员”(Weatherman或Weather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 1969-1977年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极左派青年组织,由反越战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中的一支称为革命青年运动(Revolutionary Youth Movement)的激进派分裂而来。他们的目标是创立秘密革命党,以暴力推翻美国政府,建立无阶级的社会。其名称来自歌手鲍勃·迪伦的歌曲《地下思乡蓝调》(*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中的一句歌词:“我们不需要气象员就知道风向哪里吹。”从1969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地下气象员以发动多起爆炸案、暴动和监狱骚乱著名。他们在1969年10月8日进行了第一次公众示威活动——复仇之日(Days of Rage),在芝加哥进行暴力活动。20世纪70年代,地下气象员向美国政府“宣战”,炸弹攻击目标大多数是政府建筑和一些银行。后因新左派运动日渐衰落,1973年美国从越南撤军之后开始走向解散。

18. 1968年民主党全国大会在芝加哥召开之际,因群众反越战活动导致骚乱,有7名激进人士被指控为煽动骚乱的同谋而遭拘捕,史称“芝加哥七君子”(The Chicago Seven)。

19. 1969年12月4日凌晨,美国“黑豹党”伊利诺伊州分部副主席、黑人民权运动行动主义者弗瑞德·汉普顿(Fred Hampton, 1948-1969)在公寓居所熟睡时,遭到包括美国安全局人员在内的14名芝加哥警察的突袭,中弹身亡,年仅21岁。同时被杀的还有该组织成员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 1947-1969),另有4名成员严重受伤。

20.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56年从州政府分配到一块2.8英亩的土地,因长年缺乏征用资金而日渐荒废。1969年4月,学生们与当地居民1000多人自发种植花草林木,建成一个自由公园,还经常在此野餐、歌舞,发表反战演讲。后学校计划在此建停车场,遭到学生们的反对。时任加州州长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一直敌视“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反战示威者和同性恋者”在此地活动,授意数百名警察和校警于5月15日开始清除花草,引发与3000多名学生和市民的激烈冲突,期间使用了催泪瓦斯和枪弹,导致100多人受伤,1名学生身亡。5月30日,3万人参加了殉难学生的纪念集会,打出了“让千万个公园绽放”的口号。

21. 阿尔卡特拉兹岛(Alcatraz)是距旧金山湾西海岸约2.2千米的一个小岛。由于海水冰冷刺骨且常有鲨鱼出没,被称之为“恶魔岛”。1934年联邦政府监狱在此设立,因囚徒频发而被称为“恶魔岛监狱”。1963年该监狱关闭。1969年11月20日,“美国印第安人运动”(Indians of All Tribes)为争取合法权利,依据美国政府1868年与当年的印第安苏族人(Sioux)签订的《罗拉米堡条约》(*Fort Laramie Treaty of 1868*)占领了该岛,占领持续到1971年6月11日。这座小岛因此成为代表印第安后裔争取民族权益斗争的“圣地”。

22.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The Woodstock Music & Art Fair)1969年8月15日-18日在纽约北部小镇伍德斯托克镇举办。尽管因参与人数过多举办场地被迫搬移,加之连续几天降雨,导致周边交通严重拥堵,存在食物短缺、卫生脏乱等问题,但32位著名音乐人(如滚石乐队、披头士乐队和鲍勃·迪伦等)为50万人忠实的追随者轮番奉献精彩的户外演出。恶劣的天气和

拥挤的人群使现场变成一场盛大的嬉皮聚会,不少青年人赤身裸体在泥里水里尽情地跳舞、唱歌、嬉戏,“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反越战口号响彻整个露天会场。反叛现实、向往理想与自由的嬉皮士精神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音乐节最终成为60年代嬉皮士运动的象征性标志之一,也被认为是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时刻。它的进展过程也体现了摇滚乐和音乐节在青年文化、反叛、商业与政治之间的多重矛盾。

23. 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1934-)是邪教组织曼森家族(The Manson Family)的领袖,他们对毒品和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的摇滚非常着迷,崇拜和跟随他的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女性。1969年,该组织的成员残杀了导演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有8个月身孕的妻子沙伦·泰特(Sharon Tate)等人,随后遭洛杉矶警方逮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曼森家族令人发指的残杀行为及其对毒品和流行音乐的痴迷,让一般民众逐渐对嬉皮士和嬉皮士运动产生了反感和恐惧。

24. 《逍遥骑士》(*Easy Rider*)是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于1969年执导的一部表现嬉皮士生活的公路电影。影片以两个年轻人长途跋涉为主要剧情,串起嬉皮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吸毒、幻觉、墓园跳舞、卖淫等,是一部充满惶惑、否定、叛逆和悲剧情感的存在主义电影。主要剧情:他们相互做了一次可卡因交易后,乘摩托车赶赴新奥尔良参加四旬斋前的狂欢节。由于留着长发,骑着涂有稀奇古怪图案的摩托车,因此不论走到哪里,哪里就出现怀疑和敌视的目光,甚至旅馆也不让他们留宿。他们只好风餐露宿过“浪人”的生活。他们在新墨西哥州参加流浪浪汉聚会,在得克萨斯因莫须有罪名被警察送进了监狱,幸得一位好心的人权运动律师保释,并一道赶往新奥尔良。然而在一个夜晚,他们遭到当地歹徒的袭击,律师被打死。当他们悻悻踏上佛罗里达的公路的时候,不料却被一个卡车司机莫名其妙地开枪打死。

25. 州立肯特大学枪杀事件(Kent State University shootings):1970年4月美国数百所大专院校学生开始举行全国性大罢课和反战示威,抗议美军入侵柬埔寨,5月4日,当局派国民警卫队镇压,造成肯特大学4名学生死亡,9名学生受伤。这一事件在美国产生巨大震动,400万名学生罢课抗议,极大地影响了公众对于美国政府在越战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看法。

26. “懒汉”学生:1970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和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对学生们的反战行为提出指责,建议警察对学生采取强硬手段。尼克松被媒体揭露称抗议学生为“懒汉”(bums),阿格纽希望警察把学生想象成“敌人”或“纳粹褐衫党徒”加以收拾。这些言论激起了学生和媒体的强烈反弹和对抗。

27. 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1920-1996),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因宣扬迷幻剂(LSD)对人类精神成长与治疗病态人格的效果而闻名。是20世纪60-70年代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对20世纪60年代的各类反主流文化有重要影响。

28. 《美国的青春化》(*The Greening of America*)是法学家、社会学家、作家查尔斯·A.瑞克(Charles A. Reich,1928-)1970年出版的一本赞美美国20世纪60年代青年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畅销书。

29. 阿蒂卡监狱暴乱(Attica Riots):1971年9月9日,纽约阿蒂卡监狱约1000名囚犯(监狱

共有近2200名囚犯)为了要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也为了回应加州狱警之前在监狱枪杀黑人激进囚犯的事件,发动暴动并控制了监狱,还将33名狱警扣为人质。在接下来四天的谈判和僵持中,双方互作让步,州警察最终重新控制了监狱。这次暴乱至少造成了39人死亡,其中包括10名监狱看守和文职人员。

30. 乔治·杰克逊(George Jackson, 1941-1971):美国黑人左翼活动家、马克思主义者、作家,黑豹党成员。他因被指控谋杀白人而入狱,警方宣布他在加州圣·昆丁(San Quentin)监狱实施越狱计划时被狱警射杀而亡。

31. 约翰·温斯顿·列侬(John Winston Lennon, 1940-1980):英国著名摇滚音乐家、歌手、作家与和平运动家,是披头士乐队(即甲壳虫乐队)的主创者之一。小野洋子(Yoko Ono, 1933-)是日裔美籍音乐家、先锋艺术家,约翰·列侬的第二任妻子。

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亦称“甲壳虫乐队”,英国著名摇滚乐队,1960年成立于利物浦,并对美国乐坛产生过强烈冲击和影响。其音乐风格源自50年代的摇滚,之后开拓了各种曲风如迷幻摇滚、流行摇滚、古典音乐的融合等。1970年乐队解散后,各成员以个人歌手身份继续自己的事业发展。披头士被认为是流行乐历史上从商业和社会影响等方面最为成功的乐队之一。其代表性人物除了约翰·列侬(主音、节奏吉他手、作词作曲)之外,还有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 主音、贝斯手、作词作曲)、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 主音吉他手)及林戈·斯塔尔(Ringo Starr, 鼓手)等。

32. 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 1943-1971):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大门”乐队(The Doors)的创建者、主唱和词曲作者。该乐队所唱歌词经常围绕着死亡、暴力、性的威胁等,体现了“迷幻摇滚中比较黑暗的一面”。莫里森是一代摇滚巨星,还写有诗集和剧本。1971年3月乐队解散后携女友去了巴黎,7月3日猝死于自己公寓的浴缸中。

33. 黑人社区生存会议:全称为“黑豹党黑人社区生存会议”(Black Panther Party's Black Community Survival Conference),1972年3月30日在加州奥克兰市开幕。

34. 孟加拉国救灾音乐会(The Concert for Bangladesh):为救助因内战而受难的孟加拉国(原东巴基斯坦)难民,在披头士乐队的摇滚乐明星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 1943-2001)和印度著名音乐家、西塔尔琴演奏家拉维·香卡(Ravi Shankar, 1920-2012)的组织下,众多超级摇滚乐队和明星于1971年8月1日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了两场慈善音乐会。共有4万多人参加,筹措善款达25万美元。音乐会的现场专辑和纪录片也于1972年发行,极为畅销和叫座。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人道主义文化实践行动,并对全球性的慈善音乐义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5. 《怪猫菲力兹》(Fritz the Cat)是美国漫画大师罗伯特·克鲁伯(Robert Crumb, 1943-)于1972年创造出的电影史上首部限制级的动画片。影片刻画了70年代嬉皮“猫”的生活,大麻、滥交、粗口、种族歧视、无政府主义等无所不有,具有很强的针砭现实意义。本片荣获国际纪录片联合会的大奖以及圣丹斯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被认为是电影史的最佳纪录片之一。

36. 1973年, 年仅27岁的**保罗·索格林**(Paul Soglin, 1945-) 作为一名活跃的反战分子, 在威士康辛州麦迪逊市市长选举中击败保守派而当选市长。

*37. **共生解放军**(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是活跃于1973-1975年的一支美国反越战和争取民权运动的暴力革命组织。他们在城市中活动, 称站在下层阶级的立场为弱势群体争取权利, 提出暴力推翻美国政府的口号, 荷枪实弹与政府对垒。

38. **马库斯·艾伯特·福斯特**(Marcus Albert Foster, 1923 - 1973) 是一位黑人教育家, 因开办和主持数所高水准的学校而闻名全美国, 他的教育主张被激进革命组织“共生解放军”的成员们所误解, 他本人于1973年被他们所杀害。

39. **马荷罗基**(Guru Maharaj Ji) 又名普仁罗华(Prem Rawat, 1957-), 印度教灵修大师, 据称很小的时候就对生命有深刻的感悟, 13岁应邀赴伦敦和洛杉矶演讲, 15岁即拥有“伟大导师”(Guru)的头衔, 并在50多国传播他的思想: “你所追寻的和谐就在你的内在, 我可以帮你找到。”1973年美国出版了一本由Charles Cameron编辑的介绍其真实生活的书《马荷罗基导师是谁?》(*Who is Guru Maharaj Ji*), 初版销量高达12.5万册。他呼吁人们回归心灵宁静, 呼唤世界和平, 在美国有许多崇拜者和追随者。

40. “共生解放军”于1974年2月4日绑架了美国报业大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 1863-1951) 19岁的孙女**帕蒂·赫斯特**(Patty Hearst, 1954-)。“共生解放军”要求帕蒂的父母捐数百万美元的食品分给穷人, 后者照做了, 底层百姓欢欣鼓舞。两个月后, 被绑架者帕蒂宣布与自己的家族决裂, 加入“共生解放军”, 改名为“Tania”(拉美传奇英雄切·格瓦拉的一个女战友的名字), 并与“共生解放军”的一个成员堕入爱河。1974年4月15日她参与了“共生解放军”在旧金山抢劫银行的行动, 1975年被美国中情局特工逮捕, 1976年被判刑, 1979年2月减刑出狱。

41. 《**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 An Inquiry into Values*), 美国哲学家**罗伯特·M.波西格**(Robert M. Pirsig, 1928-) 写作的一本探讨工业化时代人的信仰问题的书, 深刻而又有趣。据说该书曾连续被121家出版社拒绝, 因此到1974年才得以出版。但出版后却销售量惊人, 超过500万册, 成为70年代美国的十大畅销书之一, 目前累计销售量已经超过1000万册。

无论是工人阶级的亚文化群体和中产阶级的反主流文化群体, 都被卫道士们和控制文化认为是在制造“权威危机”, 前者的“越轨”与后者的“疏离”都表明, 社会依附和建构制度对青年人的束缚——它们不仅强迫工人阶级“如期”成为愿意从事艰苦劳动、遵纪守法的体面的工人阶级公民, 而且强迫中产阶级成为冷静的、以事业为重的、信奉“占有式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公民——正在被削弱。这即使谈不上是“文

化-阶级”关系和身份认同的再生产过程的解体,至少也是这一再生产过程的一种断裂,是对遵从“上司和长者”这一惯例的摆脱。二者的不同在于:工人阶级亚文化是对从属阶级青年人控制的削弱,而中产阶级反主流文化则是在统治阶级青年内部出现的危机。就像葛兰西所指出的那样,所谓的“权威危机”,“准确地说就是领导权的危机或国家的全面危机”。

朱丽叶·米切尔曾经说过:

每一个阶级都有它自己各个方面的文化,这些方面是相对自治的。这一事实通过下列一些短语——如“工人阶级文化”,“贫民聚居区文化”(ghetto culture),“移民文化”等——以及“中产阶级文化”这个不在场的短语而得到说明。我们谈论的是中产阶级的习俗(mores):礼仪和习惯……而不是一种整体的“文化”。我们不认为“中产阶级文化”是某种单独存在的事物——它只是一种总体性的文化,各种孤立的他者文化都内嵌于总体文化之中。然而,资产阶级思想对于文化领导权的掌握,并不完全等同于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内的统治地位。

(Mitchell, 1971: 33)

中产阶级反主流文化率先对他们自身所属的统治性的“父辈”文化提出了异议。他们的这种脱离主要是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脱离。他们将自己的攻击目标主要指向那些再生产支配性文化—意识形态关系的机制——家庭、教育、媒体、婚姻和性别分工等。这些机制就是制造“依附”、内化思想认同的机器。“妇女,嬉皮士,青年群体,大学生和中小学生在质疑这些塑造了他们的机制,并且试图将它们树立为自己的对立面……”(Mitchell, 1971: 32)。当然,有些反主流文化群体旨在对中产阶级的伦理规范进行系统性的倒转或象征性的颠覆。他们通过把文化中的矛盾倾向推向极端状态,试图从内部并且通过一种否定的方式去颠覆它们。“它的自由放任主义追求(libertarian aspirations)呈现为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否定:一种方法论上的去升华作用(desubli-

mation)”(Marcuse,1969)。这种来自主导文化内部的对于主导文化的“否定”,可以导致在两个极端——全面的批判及其反面,实际上的合并(substantial incorporation)——之间出现持续的振荡。这开启了一种非常矛盾的“否定辩证法”。

需要再次说明的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中产阶级青年反主流文化,就这个时期特有的动力和矛盾而言,必然首先与其所属的“父辈”中产阶级文化有关。中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也受到正在推进的劳动分工的影响。我们已经目睹了中层白领和地位稍低的管理层的增长,在传统职业旁边滋生的新职业,以及管理人员和“福利国家”中非商业中产阶级的增长,以及与传播、管理和市场化革命相关的新阶层的增长。这些人就是葛兰西所说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些群体的标志性特征体现在:他们有“管理和技术能力”,并充当着组织者的角色——既是整个扩大的市场领域的组织者,也是“群众的组织者……投资者‘信心’的组织者……还是其产品消费者的组织者,等等”(Gramsci,1971:5)。学校和大学是这样一些机构,“通过它们,各种层次的知识分子被精心培养出来……教育覆盖的‘领域’越广泛,学校教育的‘垂直’层级越多,文化世界也就越复杂……”(ibid.p.10)。教育的扩张因而对这一阶层的构成、品格和问题的变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这个阶层的青年人当中出现的危机,就明确地显现为教育和意识形态机构的危机。

知识分子阶层和生产界的关系,要“通过整个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体系来‘协调’”(ibid.p.12)。“中产阶级”男性文化,因其受到错综复杂的情感束缚和压抑,具有规则化的约束和放松节奏,具有对于工作、职业、竞争性成功和占有式个人主义等新教“伦理”的承诺,具有对家庭隐私这一意识形态和挚爱家庭这一理念的恪守,这就构成了一层覆盖在生产发展模式四周的、丰富而复杂的保护膜。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在战后进入技术上更先进、更全面的消费阶段,这层文化保护膜就遭到了侵蚀。一些至关重要的裂缝在上层建筑体系中开始显现出来。战后对于社会的技术和生产活力(technical and productive life)的重组,以及那些未能成功将生产模式巩固在更“先进的”水平上的努力,都对

中产阶级文化产生了同等令人不安的、“不均衡的”影响。

中产阶级文化中的许多思想习惯、感情习惯和许多稳定的关系模式,都被随着这场“未完成的革命”而出现的这种文化剧变给扰乱了。这不单单是因为中产阶级——“国家的脊梁”——突然要面对“丰裕意识形态”所包含的那种受控的享乐主义。更根本的原因在于,生产模式的组织方式发生的变化,要求并驱使“精神生产”(mental production)的影响力有实质性的扩张,从而促成了一种现代意识领域的革命。对于资本生产力的管理,不仅需要各种新的社会技能、专业技能和新的政治结构,还需要一个有更多重复性的消费循环,需要一些与这种消费节奏、与这一体系的新生产力和分配能力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没有社会‘头脑’和传输神经的并行扩展,发达资本主义……是不可想象的”(Nairn, 1968: 159)。对于经营性财富的更大范围的共享,促进了意识本身的构成,即促进了社会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的生产——马克思曾经预言这种社会智能“将调节财富的再生产和增长”;同时也促进了一种虚假意识的生产,后者在引人注目的“商品拜物教”之中找到了自己的最高目标。

对于那些在更具“新教精神”的旧伦理当中成长并被它塑造的传统中产阶级来说,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充满矛盾的世界。发达资本主义现在需要的不是勤俭而是消费,不是冷静而是时尚,不是延迟的喜悦而是对需要的当下满足,不是耐用品而是消费品:是“多姿多彩的”而不是庄重严肃的生活方式。工作的信条与越来越集中于消费、愉悦和游戏的生活几乎是不对应的。中产阶级家庭奉祀的性压抑和挚爱家庭的理念,在日益“放纵”的社会变迁中难以为继。不用说,中产阶级为他们的整体生活方式遭到侵蚀而感到惊恐:当中产阶级害怕时,他们就从空中祈求守护神。他们想象中的传统的中产阶级生活,正在被那些主张革新的知识分子、软弱的自由主义者、色情文学作家和反主流文化所结成的同谋力量所削弱。事实上,首先和从根本上把这种传统文化搞乱的对手,并不是来自外在阶级的敌人,而是直接源自生产制度本身内在需要出现的各种变化。很早以前,当《OZ》杂志开始向压抑人的性道德发动进攻之前,这种道德已经被那种

带有放肆的性挑逗语气的 (aggressively exploitative pseudo-sexuality) 大众广告用语给侵蚀和削弱了。当“现代女性”开始她的“长征”——从《妇女界》(*Woman's Own*)^①到《新星》(*Nova*)^②和《大都会》(*Cosmopolitan*)^③——时,她甚至连稍稍停下来顺便向怀特豪斯夫人^④点个头的耐心也没有,就从令人尊敬的家庭至上者变成了广告业当中那些珠光宝气的享乐女孩和放纵的时髦女郎。不用说,挑战旧伦理的借口,不是可以说提供一种更完美的解放,而是说通过商品可以满足人的那些(渴望解放的)需要。马尔库塞深刻而准确地把这种从传统阶级伦理向消费放纵伦理的受控转移,界定为一种压抑性的去升华作用(repressive desublimation)(Marcuse, 1964)。由于传统的中产阶级道德紧紧围绕压抑性的升华过程(repressive sublimation)来展开,那么这种受控的去升华就具有深刻的颠覆性。

这样,在传统的资产阶级(准确地说是“小资产阶级”)阶层与更“进步的”现代中产阶级之间就逐渐出现了斗争。但是,在第一次的富裕洪流当中,中产阶级理念的守护者首先遭遇的是以“青年”形式出现

① 《妇女界》(*Woman's Own*) 是英国最著名的妇女杂志之一,1932年由IPC Media公司创办。近年来改版后主要刊登明星八卦、真人生活故事、时尚、美容、购物、节约、安乐、饮食及旅游方面的文章。——校注

② 《新星》(*Nova*)是1965-1975年间在英国出版的一份被认为“有政治激进色彩、设计精美的知识女性杂志”,创办者Harry Fieldhouse希望将它办成一个“面向新型妇女的新型杂志”。——校注

③ 《大都会》(*The Cosmopolitan*,也被称为*Cosmo*)是一份国际妇女和家庭杂志。1886年创刊于美国,后转型为文学杂志,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转型为妇女杂志。该刊2011年主要刊登的文章涉及各类妇女话题、人际关系、性、健康、职业、自我提升、名流、时尚和美容。该杂志以35种语言出版了64种国际版本,发行到100多个国家。——校注

④ 怀特豪斯夫人(Mrs. Whitehouse, 1910-2001),全名是Constance Mary Whitehouse,英国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反对社会自由主义和主流英国传媒(尤其是BBC),认为它们在鼓动一个更放纵的社会。她是“全国受众协会”(National Viewers' and Listeners' Association)的创始人及首任主席,发起过反对BBC的运动。对于传统基督教的信仰和作为性教育老师的身份,使得她一直积极从事此类反自由、反放纵的运动,当然,她因此也成了英国一些讽刺喜剧嘲弄的对象。——校注

的决裂:首先是工人阶级青年,然后是中产阶级自己的青年。这些守护者以社会的名义来抵抗中产阶级青年信奉的享乐主义、自恋、放纵、对当下愉悦的追求、反权威主义、道德多元主义和物质至上主义;所有这些被描述为是对社会价值的“威胁”,这些威胁不但来自野心勃勃的工人阶级青年,还来自被不良环境塑造和社会化的中产阶级青年。他们把主导文化内部出现的这种危机误认为是对主导文化的共谋反叛。他们没能认识到(许多反主流文化成员也没能认识到):这种文化“断裂”是以创伤性的、令人烦扰的方式对现行秩序的生产基础的深层适应。

“也许可以肯定地说,我们这个时代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很可能会陷入它们自身产生的那些威胁自身内部稳定性的史无前例的辩证冲突当中”(Haitken,引自Nairn,1968:158)。反主流文化萌发于主导文化内部的这种质的断裂中:萌发于主导伦理的新旧变体之间出现的**中断**(*caesura*)。但是在一段时间里,从现象上看,青年似乎是作为这种断裂的最具进攻性、最显眼的载体出现的。对此的反应也明显是双面的:因循守旧者叹息“权威的危机”和旧阶级文化中稳定关系的失落;而改革阶层却在推进、吸收这种断裂,并且毫不留情地用商业方式利用这种断裂。“青年文化”因此成为文化危机的最初的“现象形式”(phenomenal form)。虽然中产阶级青年的反叛没有被这个自适性的框架所控制,但它随后的发展轨迹,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它在现行秩序的两个“道德世界”之间所处的那个自相矛盾的起点,也就是说,要取决于自己在资本主义不均衡的、不完全的转变过程当中所处的悖论性的位置。

如果我们从最纯粹的反主流文化方面来考虑“中产阶级的反叛”,就会发现,尽管它呈现出来的大部分内容都在公开对抗神圣的、传统的中产阶级价值,但是从客观上说,它的一些目标与过渡期的现行秩序有着深层的适应性(adaptive)。“剧变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促生了一个正在发展的社会所需要的各种新观念、新技术、新态度和新价值,但这个社会上层建筑的所有者(proprietors)由于其社会地位不可避免地受缚于现状,自身无法促成这些新观念和新价值”(Silber,1970:11)。让“新教伦理”失效的各种另类价值观,在各种旧的社会结构与

后-新教资本主义时代受控的去升华作用之间,可以构成一个必要的、充满争议和矛盾的联系纽带。

然而,处于领导地位的文化从来不可能在没有遇到矛盾和抵抗的情况下积极地去再生和改善自己。现代资本主义为了自己的生存,大概“需要”一种新的文化-意识形态思潮;但从旧到新的通道受到了损伤——而且很不完整。主导文化当中出现的危机是整个社会结构所面临的危机。当然,对危机的反对和抵抗也会呈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参看Raymond Williams,1973)。一些看起来是“对抗性的”运动,可能只是过去的残存和遗迹(参较:反主流文化中的“田园主义”所包含的有些方面)。一些可能仅仅是“另类的”运动——其实是新旧并存的。马尔库塞就曾注意到,“那种简单的、初级的否定,对立……直接的否定”通常留下的只是“不可把握的传统文化和幻觉艺术(illusionist art)”(Marcuse,1969:47)。其他一些的确是“新兴的”(emergent)运动;不过,它们也必须反对主导文化对它们的重新界定和收编。那些完全“另类的”的运动能够激发起一种强烈的对抗,后者会内在地质拓展并促使它们成为更具有对抗性的运动。它们可能变成“新兴的”运动;也可能依据它们产生于其中的历史局势而被重新界定和吸收。战后出现的各种中产阶级反主流文化,呈现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幅混杂而零乱的图景。

显然,这种文化激变的某些方面是具有适应性的,也是可以吸收的。反主流文化群体在代表现行秩序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通过倡导和尝试一些新的社会形式,赋予现行秩序以更大的灵活性。在很多方面,这些“生活方式”上的革命只是一种纯粹的、单纯的、风靡一时的商业成功。反主流文化在服饰和风格上,在其小规模“技工”和先锋资本家的生产和分配方式中,探测到了人们趣味的转变,而这些转变则被大众消费的连锁店以太过烦琐、太过刻板、太过资本化的(over-capitalised)方式给利用了。当这些风潮安定下来之后,大规模的商业群体就会涉足其中并大捞一把。同样的情形可以说也在音乐和休闲产业中出现了,尽管此处的努力创造出了另外一种真实的、另类的分配网络。尽管在那些道德捍卫者看来,“有计划的放纵”和有组织的冒

犯——一部分另类报刊靠它存活了多年——已经太不像话了,但它们并没有让现行秩序瘫痪。相反,现行秩序对各种为公众接受的(over-ground)出版物和电影更加宽容了——《风流女孩》(*Play girl*)^①开进了连《OZ》当年都害怕涉足的领域。神秘主义的乌托邦和准宗教的复兴带来了更为强烈的双重影响。前者使得反主流文化以一种盲目的方式去反科学,并且过度意识形态化,比如出现了“革命就在头脑里”,“青年是一个阶级”,或伍德斯托克是“一个王国(nation)”等思想,或者,用杰里·鲁宾(Jerry Rubin)的不朽名言就是:“人们应该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Silber, 1970: 58)而后者(准宗教的复兴)则让宗教获得了新生,让人产生如下看法——似乎没有别的事可做了。当“做你自己的事”这种新个人主义合乎逻辑地走向自己的极端时,差不多就成了那种最具残余性和传统性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一幅疯人漫画。

然而,这些还没有穷尽各种反主流文化的反抗意义。从最简单的层面上说,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主导文化遭遇到了失败,无法赢得人们对其“最光明和更美好”的那部分内涵的依恋。这种从“正派社会”的目标、结构和体制中脱离出来的行动具有深远的意义。在这里,各种反主流文化至少提供了可以催生更深层疏离的社会、文化活动空间——文化关系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间隙。它损坏了主导文化的构建模式。“压抑性的去升华作用”是一种危险的、具有两重性的现象。当传统文化的代码破裂时,新的社会冲动被释放出来,它们不可能完全控制住自己。“放任”的大门刚一打开,意义深远的性解放便紧随而至。“自由”的口号刚一喊出,一些人就会给它赋予出人预料的革命腔调和意义。寄希望于技术意味着对意识的拓展,而意识可能会扩展到可以预料的界限之外。传播手段的扩展,人们就有获得印刷的机会,而卷筒纸平版胶印的报刊从来没打算把他们当作受众。“为取得对市场的最终控制而培育出的那些意识形态……是能够以它们自身的方式进行反叛的意识

① 《风流女孩》(*Play girl*), 1973年妇女运动高涨时期在美国创刊的一份女性休闲杂志,专登非常暴露的男性裸体图片,与创办于1953年的男性杂志《花花公子》(*Play boy*)唱对台戏。——校注

形态……如果那些感觉不再是社会希望你感觉到的那类感觉，那么，崇拜‘跟着感觉走’就危险了。按照你自己的脉搏来检测周围环境的质量，可能会引发一些相当奇怪的心搏”(Mitchell, 1971:31)。事实上，一旦各种反主流文化开始对某些新口号信以为真，这些口号便会转变为它们的对立面。尽管这种逆转的本质主要停留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属于“上层建筑”，但传统伦理的系统翻转却给反主流文化提供了一种客观的对抗推力——这种推力是无法完全同化的(absorbable)，也从来没有被完全同化过。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的这种持续攻击，是一个充满剧烈矛盾的时刻；尤其当这种攻击发生在那些越来越明确地依赖各种意识构成机制——它们不但为了建构认同，而且为了对生产过程进行社会控制——的社会当中时，这种情况更为明显。这体现了社会“高级神经系统”里的一种中断(Nairn & Quattrocchi, 1968:156)。这种中断，不仅“把矛盾公布于众”，而且把个人的疏离(private alienation)转变为“街上的麻烦”。它倾向于发动——并且已付诸实施——“通常作为幕后支持而出现的强制性国家暴力的权力”(Mitchell, 1971: 32)。于是，压抑——更确切地说，“共识的沉默与强制的残酷之间的这种关系”——强化了“许可”的事情和不许可的事情之间的界限，创造了团结，把反主流文化置于一个半永久的“免税区”当中，并且把它最初的趋势推向了政治化。在1968-1972年，许多反主流文化的分支都陷入了“另类”道路和乌托邦的解决方案当中。但其他的则继续发展，成为一种更艰苦、更尖锐、更紧张、更漫长的政治活动，包含抗议、行动主义、社区行动和自由主义斗争等方式，并最终寻求与工人阶级政治的某种会合。

中产阶级反主流文化随后的演变过于复杂，在此难以一一阐明。反主流文化连同它那些盛行一时的另类出版物和机构，虽说还没有消失，但已经是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了。另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与激进政治运动相互渗透，是一个持久的特征。某些反主流文化主题激发了一些有组织的政治“抨击”，例如，对于毒品和色情文学的抨击。其他一些主题已经引发了各种新的政治运动，例如妇女解放运动和同性恋解放运动。对于另类生活方式——群居公社(commune)和集体生活——

的乌托邦实验,在政治领域和“后-政治”领域的多个方面依然存在。有许多人差不多已经永久地“退出了(dropped out)世俗社会”,或者在反主流文化氛围的边缘徘徊,进入一种“无职业”的状态。有许多人已经被招募到左翼团体或派系当中了。其他的人已经转向了社区行动主义,或者转向激进的社会工作。有一些人保留了自由放任主义理念的内涵,但给它重新赋予了一些更具政治性的内容——就有了一种“自由放任主义者”,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工团主义者,也有了一种有“马克思主义”指向的“反政治”(counter-politics)。一般而言,中产阶级反主流文化与激进政治运动之间的局部会合,一直受到如下多重因素的制约:控制文化普遍转向一种更专制的“社会治安”(law and order);正在积累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最重要的是,一种更开放、更有力的产业工人和非产业工人的阶级政治又重新启动了,尤其是1972年后,这种势头好像更猛了(参看表1.3)。

这样,中产阶级青年的整体发展轨迹就很难评估了。欧文·西尔伯(Irwin Silber)认为,“工人阶级从内心深处认为‘文化革命’根本就不是什么革命。它并没有把工人从真实的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只留下他们束手无策地去反抗阶级敌人。工人们认为……这种‘文化革命’只是一种稍加伪装的中产阶级精英主义,一种由那些社会要素产生的哲学——认为人们面对阶级压迫的现实仍能够找到局部的个人解决方案。工人阶级在经济安全上脆弱的控制能力,不允许他们去搞那些以‘时髦的’生活方式来反映他们自我解放的个人行动……”(Silber, 1970:26)但是,这种解释不仅低估了“文化革命”所产生的“断裂”的深度,而且低估了工人阶级反抗的经济主义诉求。马尔库塞认为:“在公司资本主义领域,主观的和客观的这两种促成历史转变的因素并不完全一致,它们普遍盛行于不同的甚至相互敌对的群体当中”(Marcuse, 1969:56)。但这种看法既低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度,又假定“生产过程的人力基础”(工人)与“离经叛道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二者之间是完全分离的,而这种分离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辩证的(Marcuse, 1969:56)。尽管如此,我们得承认一个不争的事实:确实没有哪个地方完成了这种融合。在真正的反主流文化价值观和“焦点关

切”得以保留下来的地方,它们看起来不但与传统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和战略背道而驰,而且与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和战略也格格不入。在这种矛盾中,中产阶级亚文化逐渐显示出它们过渡性的阶级特征和迁移性的地位,并且清晰地表达出传统结构在1968年后的断裂所呈现出那种极端不均衡的节奏。(我们下面试图用图表的形式来展现这种双重的背离。)

表1.3 阶级和文化差异

传统中产阶级	反主流文化	工人阶级
地位	风格	阶级
核心家庭	群居村(commune)	大家庭
职业	“非职业”/完全不去工作	工作
亲(支持)商业	反商业和工会	亲(支持)工会
家	“吸毒窝”	家
居住地	“飞地”	邻里社区
工作/休闲	工作就是游戏	工作/休闲
正式的代表	“参与”	正式的民主
精英主义	无领导状态	民主
公民的/私人的	个人的就是公共的	公共的/私人的
分等公共教育/私人的	自由学校/离开学校	大众公共教育
俱乐部(夜总会)	“场景”	小酒馆
高雅文化	生活就是艺术	大众文化
高端时尚	“时尚精品店”	连锁店
高消费	反消费	大众消费
物质主义者	反物质主义者	物质主义者
克制	“自由”	约束
严肃	自由意志	正派可敬
适应角色	超越角色	协调角色
男性气质/女性气质	打破性别角色	男性气质/女性气质
占有式个人主义	“博爱的”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

在某种程度上,中产阶级反主流文化与工人阶级亚文化一样,也在试图解决或努力克服——但是在一种“想象的”层面上——他们阶级处境中的矛盾或难题。但是,由于中产阶级反主流文化栖居于主导文化当中(尽管是以一种否定的形式出现的),它们就得到了策略性地

安排(工人阶级亚文化不会享有这种方式),让它们去概括一种针对整个社会的内在矛盾。反主流文化源于他们阶级的“真实关系”出现的变化:它们再现了一种主导文化内部的决裂,后者随后与领导权、市民社会的危机紧密相连,甚至最终关系到政府本身的危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发源于统治阶级文化内部某一点之上的中产阶级反主流文化,已经成为一股新兴的促使整个社会发生断裂的力量。它们的冲击力不再受到它们起始点的遏制。更确切地说,各种中产阶级反主流文化通过从主导文化内部的一个特许位置来扩展和拓展它们对于主导文化的“实践批判”(practical critique),已经占有、展现和表达了这一体系本身的许多矛盾。当然,社会不可能从这一点上以“想象的方式”得到重建。但这并没有耗尽它们浮现的潜力。因为它们也预想、预料和预示到了那些新兴的社会形式——尽管还是一些不完全的、图表式的和“乌托邦式的”形式。尽管这些崭新的形式只是出现于“反主流文化”的层面,但它们其实扎根于现行秩序本身的生产基础之中;我们因此就可以正确地判断出,直至现在它们在社会母体中还没有完全成熟。它们在其他方面预示了现代生产日益增强的社会性质,预示了那些限制这一社会性质的过时的社会形式、文化形式、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形式。反主流文化充其量是在半道上就将这种基本矛盾显现出来了。一些分析家提出,这一点在马尔库塞所谓的“新感性”(the new sensibility)当中体现得最为清晰。奈恩(Nairn)在同一方向上指明了一种新型“社会个体”的预想。他提到了一种美好的展望:“青年”作为社会机体中的那些压力的载体,预示着崭新的社会,而不是对传统社会的再生产;“青年”第一次在承担生物学意义之外,可以承担积极的社会意义(Nairn, 1968: 172-3)。反主流文化兴起所具有的这些更广泛的意义,在此还无法解释清楚——因为单从历史方面看,它们的演变轨迹还未完成。它们过去所做的事情,就是将这些问题提到政治议程上来。而答案还在别处。

I. 社会对青年的反应

正如我们已经暗示的那样,主流社会(dominant society)在亚文化

出现的整个过程中不会平心静气地坐视不管,只看着亚文化群体在那儿玩。主流社会刚开始的反应是感到困惑和混乱——用一个适当的术语描述就是“代沟”,这种反应在这么多年间逐渐变成了一种强烈的、愈演愈烈的斗争。在20世纪50年代,“青年”开始象征社会变迁最超前的指向:青年作为社会变迁的一种象征(metaphor)被使用。在一个正在发生变化的社会中,往往都是从青年人“在忙什么”这一点来辨认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最极端的趋势:青年是没有阶级性的、后新教主义的、即将到来的消费社会的先锋队。这种将社会变迁所引发的紧张关系转嫁于“青年”的做法是一种充满歧义的策略。社会变迁通常被看成是有利的事情(“你从未有过这么好的生活”);但也被认为会侵蚀各种传统的界标,会削弱传统社会的神圣秩序和体制。因此,从一开始,社会变迁就伴随着一种扩散的、弥散的社会焦虑感。各种社会边界正在被重新划定,道德轮廓正在被重新绘制,社会基本关系(尤其是很长时间以来给英国人生活提供等级稳定性的这些阶级关系)正在发生转变。正如有人通常评论的那样(如Erikson, 1966; Cohen, 1972),尤其对那些对现状的持续性做过绝对承诺的人来说,那些扰乱社会惯常规范的运动标志着多事之秋的到来。当社会焦虑被广泛传播,但人们却无法找到一种有组织的公众表达或政治表达之时,“多事之秋”就会导致将社会焦虑转嫁给那些方便找到的替罪羊(scapegoat)群体。这就是“道德恐慌”的根源。它的产生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某些社会群体感到他们的世界和地位受到了威胁,辨认出了一些“应负责任的敌人”,同时以一种为传统价值大声疾呼的保卫者——道德捍卫者——的面目展现出来;然后,很自然地,青年就成为这种社会焦虑的焦点——成了它的转嫁对象。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最显眼、最容易分辨的青年群体卷入了那些触发了“道德恐慌”的引人注目的事件当中,这些事件以一种取代的形式聚焦了社会的“自我争吵”。这些与泰迪男孩以及后来的摩托车男孩(motor-bike boys)、摩登族有关的事件,促成了典型的道德恐慌。每一事件都被看成是一个缩影,显现了一个更广泛或更深刻的社会问题——整个青年群体的问题。在这种权威的危机中,青年一直扮演着症候和替罪羊的角色。

对于秩序的这种“道德恐慌”最初主要聚焦在“工人阶级青年”及其外围的情况上面。那些有严密组织的亚文化群体——泰迪青年、摩登族等——仅仅体现了这种反应的最明显的目标。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回顾在1958年的诺丁山种族骚乱(Notting Hill riots)^①中,青年是如何开始与其他潜在的、被转移的社会焦虑主题——种族——连接起来的;必须回顾对日益上升的青少年违法行为和青少年犯罪率的普遍焦虑,对于校园暴力、破坏行为、帮派械斗和足球流氓的恐慌。对“青年”各种表现的反应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式:从修改青年服务条款、扩展社会工作机构开始,经过对家庭影响力衰落、学校对旷课和违纪行为的制裁等问题的持久讨论,到法官在审判摩登族与摇滚派的冲突案件时所做的评论——都把他們看作不过是一些“草包首领”(Sawdust Caesars)而已。随着以领地为基础的光头党、足球暴乱和破坏铁路财产等现象的出现,道德恐慌的涌流也达到了新的高峰。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又增添了一系列新的“道德恐慌”,这次主要关注的是中产阶级青年和“自由放纵”的问题。工人阶级青年群体被视为更深层的国内动乱的症候。而中产阶级青年群体——由于他们对于主流社会的公开疏离,他们对于“正派社会”(straight society)的意识形态攻击,对于快感和满足的无休止的追求,等等——被认为在自觉地、故意地开展削弱社会稳定和道德稳固性的行动:青年现在被看成了引发社会动荡的积极动因。这一领域里的第一波社会反应具体围绕各种社会的、道德的和文化的问题展开:毒品、性欲、放荡、色情、青年的腐化——“放任的革命”成了核心主题。[作为一种反弹,这招致了卫

① 诺丁山种族骚乱(Notting Hill riots):1958年8月底到9月初连续几晚在伦敦诺丁山发生的一系列有种族指向的骚乱。“二战”后加勒比地区移民大量进入英国,到20世纪50年代白人工人阶级“泰迪男孩”对当地黑人家庭显示敌意,一些右翼组织趁机鼓动所谓的“保持英国白色”运动,致使暴力攻击黑人的事件增多。一周之前在另一城市诺丁汉(Nottingham)就发生过白人青年袭击黑人和亚裔移民的事件。由于受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影响,警方在执法时经常会有侵犯黑人权益的事件,因此尽管逮捕了多名白人青年和少数黑人青年,而且9名白人青年肇事者受到了法律的惩处,但加勒比-西印度裔黑人与警察的关系日益紧张。——校注

道士们第一次有组织的反放任的“强烈抵制”,如怀特豪斯夫人反放纵运动、《朗福德勋爵反色情报告》(*Longford Report*)、光亮节(the festival of light)^①和“未出生婴儿保护协会”^②等]。第二波社会反应具体针对反主流文化的“政治化”问题——学生抗议、新的街头政治、示威等。“青年”在这里不仅被视为变迁的自觉的主体,还被认为在故意把社会推向无政府状态:青年被当成了从事颠覆活动的少数分子。过去,警察(The Law)时不时就会被动员起来,用“标准的”常规方式去处理足球流氓和破坏财物的暴行,而现在它被调动得更为正式、更为积极。控制文化内部发生的这种转变——从非正式的愤怒和道德讨伐到正式的约束和法律控制——有更广泛的起源(我们在这里不能对此做深入讨论,可参看霍尔等人编撰的著作《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1978]第三章)。但这种转变对青年产生了严重而直接的影响:与连续的审判和法律行动(对《OA》和《IT》的审判,以持有毒品为由逮捕反主流文化的风云人物,《红宝校训》事件,^③警察进行的“禁毒”和“扫黄”等)相配

① 朗福德勋爵(Lord Longford,1905 - 2001),原名Frank Pakenham,1961年继续其兄的伯爵称号,英国著名政治家、道德教育家。他于1971年领导发起了全国光亮节运动(Nationwide Festival of Light),这一运动有浓厚的教会道德意味,抗议英国传媒和艺术对于性和暴力的商业炒作,并认为基督教育是恢复英国道德观念稳定性的关键。此外,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还发起了反色情运动,并到一些性产业公司做过广泛考察,编辑成一份自费出版的报告,史称《朗福德勋爵反色情报告》。——校注

② SPUG是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born Child(未出生婴儿保护协会)的英文缩写。该协会成立于1967年,是英国的一个相对保守的反堕胎组织,它主要反对流产、协助自杀、同性婚姻以及有些节育方式。——校注

③ 《红宝校训》(*The Little Red Schoolbook for Students*)是由两名丹麦教师(Søren Hansen和Jesper Jensen)于1969年出版的一本极富争议的书,20世纪70年代初被译成多种语言出版。该书鼓励年轻人质疑社会规范并教育他们如何去做。全书共200页左右,但用20多页篇幅讨论性的问题,用30多页讨论吸毒、饮酒及抽烟;还提到成人都是“纸老虎”以及教师、纪律、考试、智能和不同学校的责任问题。英国政界和宗教界保守人士攻击此书将导致学生的放纵和道德堕落,有人依据《淫秽出版物法》(*Obscene Publications Act*)在地方法院起诉此书的英国出版商,但上诉法院(Appel Court)和欧洲人权法庭(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却给出了支持的结论。英国政府后来只允许此书的审查版另行出版。——校注

合,还出台了一些同样引人注目的、打击更多青年政治派别的法律管制行动(对“剑桥花园房骚乱”的审判,对彼得·海恩和(南非)跳羚橄榄球队巡演抗议者的审判,对“愤怒旅”的审判以及对同谋指控手法的广泛使用,等等)。把这些管制与其他一些事情——警察和警察局政治保安处(Special Branch)饱受争议的行动,法律的触角延伸到劳资关系、罢工和纠察活动等多个方面,并涉及5名码头工人及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纠察队员事件^①——综合在一起来考虑,我们就可以说,从1970年前后至今(果不其然,与希思^②政府掌权相一致)控制文化的性质和行动出现了一种质的转变,一种急剧趋向“封闭”的运动——一种社会“治安”的诞生。尽管在这种分化的气氛中,青年绝不是攻击和控制的唯一目标,但它依然为更有组织的、更精心协调的公众运动提供了一个旋转枢轴。在这些运动中,政客、警察局长、法官、报刊和媒体与卫道士们齐心协力,异口同声地“打压”“青年”和“宽容社会”。这种控制的加强在警察、法院、当地法庭和居民防备黑人青年的各种行动——在1972-1973年产生的道德恐慌,近似于对“行凶抢劫”恐慌的同谋指控——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但事实上,从1969年至今,黑

① 1972年6月,英国码头工人、建筑工人等为争取全国最低工资制和每周工作35小时,在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 TGWU)和建筑行业联合交易和技工联盟(Union of Construction Allied Trades and Technicians, UCATT)支持下,选择一些主要的建筑场地举行罢工,一些工人承担了罢工的安全纠察工作。罢工于9月中旬结束,工人在工资方面的斗争获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内政部长罗伯特·卡尔(Robert Carr)于10月份要求郡警察局调查罢工中发生的暴力纠察活动,于是,在什鲁斯伯里市(Shrewsbury)有31名建筑工人遭到官方指控。初审时陪审团认为所有纠察员无罪并被释放,但随后官方又对其中5人再次进行审判,由于有些指控理由相当荒唐,工人们认为这是官方想通过这些工人判刑来威慑其他工人的罢工行动。尽管各地的工人不断以零星的罢工抗议官方的不公正审判,但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最终还是抛弃了这些工人纠察员,并没有对他们提供相应的法律和政治支持,致使他们最终被判刑入狱(1975年、1976年陆续出狱)。直至2006年,这个审判的公正性依然受到一些民众的强烈质疑。——校注

② 希思(Heath)即曾在1970年至1974年出任英国首相的爱德华·理查德·乔治·“泰德”·希思(Edward Richard George ‘Ted’ Heath, 1916-2005),他1965年至1975年出任保守党党魁。——校注

人社区,特别是黑人青年,在贫民聚居区不断受到“监控”。)

我们绝不能忽视这种对青年的“控制”反应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在20世纪50年代,就在媒体宣传青睐泰迪男孩的同时,消防水龙头就被架起来控制那些排队争看“昼夜摇滚”(Rock Around The Clock)的青年人。“摩登族”出现在法庭,同时也出现在彩页增刊的头版。摩登族和摇滚派最后对决之时,也是伦敦国王大街(Kings Road)被“摩登族”风格“接管”、“摇滚伦敦”歌曲诞生、“摩登族”时尚开始急剧风行之时。嬉皮士穿着配有花环的衣服招摇过市,越过电视屏幕到达瘾君子的聚居中心。米克·贾格儿(Mick Jagger,1943-)^①登上了直升飞机,实际上是直接从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出来去与国家权力结构的那些德高望重的人物会面,共同讨论世界局势。对于这一时期的流行音乐的命运和未来,学术水平较高的刊物有一种持续而典型的双重思考。在这里我们既不能仔细考察这种矛盾心理的细节,也不能考察其根源,尽管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充分揭示这种对于青年的社会反应所具有的两面性——一边是公开宣传和模仿,一边是道德焦虑和愤怒,两者都植根于社会中更深的社会和文化危机。然而,当工人阶级青年的疏离变成了更显著、更传统的“青少年犯罪”的形式,当反主流文化变成了组织化、政治化的行动的时候,当政治分歧的其他来源(特别是来自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更多地被呈现出来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当经济“丰裕”的首次浪潮让位于危机和停滞通胀的时候,一切都如同昙花一现。每当社会“治安”发起运动之时——就像它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日益频繁地做的那样,有一部分青年永远都是社会关注和社会控制的中心。但是,从整个时期来看,对青年更为明显的“攻击”,与主导文化自始至终在“青年”中寻找和发现民间恶魔(社会公害)的偏好相比,很难估计出哪个更重要或者更不重要。这个噩梦其实是社会的噩梦:它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已经失去了对青年人的支配和权威,很难赢得青年的心灵、思想和认同,实质上正动荡地悄然走向“无政府主

① 米克·贾格儿(Mick Jagger,1943-),英国摇滚乐手,滚石乐队主唱及创始人之一。

——译注

义”，在它内心会分泌出鲍威尔先生(Mr. Powell)^①意味深长地描绘出的那个看不见的无名“敌人”。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发生的这种转变，已经雄辩地证明了霸权统治的整体崩塌，后者已经通过“青年人的”笔线被书写或铭刻了下来。

(胡疆锋译)

① 鲍威尔先生(Enoch Powell,1912-1998)，英国政治家和保守党国会议员，1972年发表过有严重排外和种族主义色彩的演讲。——译注

2 关于社会控制文化、新闻媒体以及社会治安运动建构之间关系的几则研究笔记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抢劫研究小组”

1 媒体和控制文化：一种共生关系

(1)控制文化作为最初的规定者：媒体作为复制者

越轨事件 → 控制文化作为最初的规定者 → 媒体作为复制者

(例如,新闻界将1972年8月17日的谋杀事件描述为“行凶抢劫失败”,这不过是对警方发言人观点的直接复制。)

注释:

a. 新闻生产的常规结构——公正性与客观性——首先将媒体导向外部的、权威的消息来源;就各种“越轨”事件来说,这实际上意味着媒体成了控制文化(如警察、司法部、内政部)的代表。这样,新闻部门就依据这种由控制文化提出的最初界定来复制信息。

b. “平衡”的结构需要认可其他各种可替代的界定,但是这些界定总是姗姗来迟,而且被要求在最初的界定所划好的范围内做出应答;并且,它们也必须来自权威的替代性资源(社会组织或“专家”),而不能来自“越轨”群体自身。

(2)媒体作为生产者:转换、客观化和“公众舆论”

越轨事件 → 控制文化作为最初的规定者 → 媒体作为生产者 (假定的受众)

(例如《每日镜报》[*Daily Mirror*]1973年6月12日的头条新闻,用“寻衅滋事的英国人”[AGGRO BRITAIN]来概括《警察局长关于1972年的报告》的主要观点,而在警察局长的报告中其实并没有用这个词语。)

注释:

a.一旦最初的界定开始“启用”,媒体就通过把这些界定转译成自己的公共语言来**转换**(transform)它们。这种语言建立在报纸对其读者及其语言的独特假设之上。

b.像所有的新闻条目一样,这种转换过程是一个**客观化**的过程,即它将一个事件制作成一个具体的、广为人知的公开事件。除此之外,这种“公共的”语言使得媒体看起来好像与最初的界定者无关,自己在独立运作。

c.另外,媒体依然可以承担一种更积极的角色,它实际上可以通过社论或评论自称自己在用“公众舆论”来说话,并以此方式参与某个议题的**论战**。

(3)循环的闭合

越轨事件 → 控制文化作为最初界定者 → 媒体作为生产者 → 控制文化作为复制者 → 媒体作为复制者

(例如,考尔菲尔德法官先生在莱斯特刑事法院(Leicester Crown Court)引用了《每日镜报》1973年3月21日的一则报道:“新闻报纸已让公众知道,对高速公路袭击案的判决不会再那么轻了。”))

注释:

一旦媒体以它们自己的声音代表那些无声的公众来说话,最

初的界定者就可以利用媒体的陈述和主张,作为给他们的行动和陈述提供合法化理由的依据(神奇的是,它们之间并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以索取新闻界——通过新闻界到达公众——的支持。反过来,一向热心帮忙的媒体去复制控制文化的声明,然后完成了这个神奇的循环,由此产生的效果就是:已经不再可能分辨出究竟是谁首先开启了这一过程;它们相互交替取得合法化。

2 社会治安运动的构成机制

(1) 道德恐慌:三种历史类型

(i) 分散的道德恐慌(例如,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摩登族和摇滚派)

引人注目
的事件 → 公众的担忧,
道德捍卫者(敏感) → 控制文化的
行动

(ii) “神圣讨伐”——把分散的道德恐慌组合在一起,生产出一个“加速的”续发事件(例如,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色情文学和毒品)

敏感
(道德捍卫者) → 引人注目
的事件 → 控制文化
的行动

(iii) 后-社会治安运动:一个变异的续发事件(例如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行凶抢劫)

敏感 → 控制文化的
组织和行动 → 引人注目
的事件 → 控制文化的
强化行动

注释:

最后一个例子中,我们必须注意到控制文化的行动倾向:期待让某种特殊的“恐慌”曝光于公众面前。

(2) “意指的螺旋式上升”(signification spiral)

对某些议题和问题公开赋意(signifying)的方式,从本质上是逐

步升级的,也就是说,通过让一个议题变成所指(signified)的方式,强化了那种让人可以感觉到的潜在威胁。

原理:

(a)对特定议题的确认。

(b)对“从事颠覆活动的少数分子”的确认。

(c)通过贴标签把特定议题归入其他问题,进行“汇聚”或连接。

(d)“阈限”这个概念一旦被逾越,就会导致此问题对社会的“威胁”“逐步升级”。

(e)解释和预言的成分经常涉及与美国——这个范例——的比较。

(f)需要一些强硬的举措。

注释:

从1968年至今,这已经成了整个国家日报新闻媒体处理威胁性问题的范式(例如,《周日快报》[*Sunday Express*]1968年10月27日的社论,《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1969年4月27日的社论;两者都是针对学生的。)

(3) 汇聚

或明或暗地通过贴标签,将特定问题与其他问题连接起来。

三种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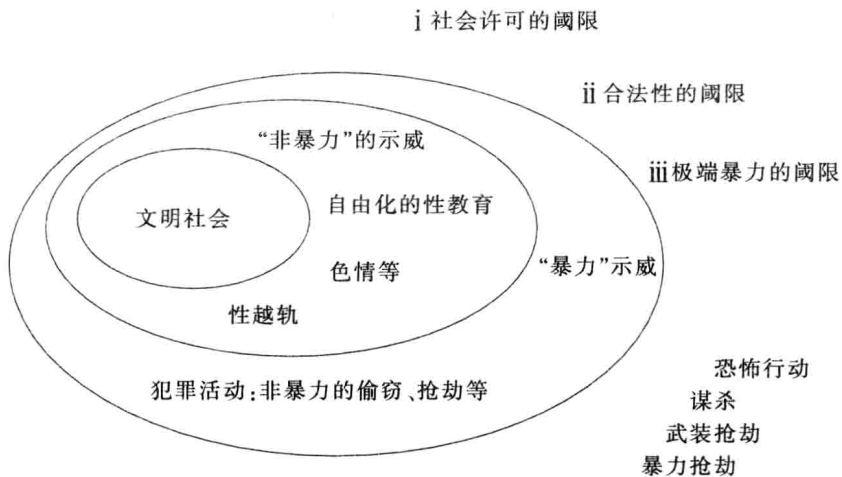
	真实的运动	例证	意义
i	真实的汇聚	同性恋——男同性恋解放阵线(BLF)	有可能准确
ii	有些汇聚	男同性恋解放阵线——马克思主义左派——“红色”同谋	日益包含一个纯粹的意识形态维度
iii	没有汇聚	学生——小流氓	纯粹意识形态的

注解：

随着时间的进展,出现了一种倾向,把不断增加的大量问题“汇聚”起来,组成一种单一的威胁,而这种“汇聚”包含了一种越来越纯粹的意识形态建构。(例如,可以参看1970年7月14日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所刊登的鲍威尔在诺斯菲尔德的演讲。)

(4) 阈限

各种界限逐步标示出社会容许的限度



(i) 逾越社会许可的阈限会威胁并削弱社会权威(道德标准)

(ii) 逾越合法性的阈限会威胁并削弱社会合法性(议会制度的渠道)

(iii) 逾越极端暴力的阈限会威胁并削弱社会控制(政府本身)

注释：

a. 随着时间的进展,出现了一种日益明显的趋势:这些事件被推向逾越各个阈限的极端状态。

例如,1966-1970:以社会许可的阈限为主导

1970年至今:以合法性的阈限为主导

1972年至今:以极端暴力的阈限为主导

b.通过强调社会许可行为的违法面或暴力面(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或者强调非法行为的暴力面,向人们暗示这些事件会逾越各种阈限。这样,我们(以上的)有关非暴力游行示威的案例,顶多就是一种“许可的”对社会权威的藐视,现在由于被赋予了暴力的意味,会给人们造成一种心理投射:这次游行示威会逾越合法性和极端暴力的阈限。就这样,通过给某一事件赋予威胁社会控制的意味,官方采取强硬控制措施的行为就被合法化了。

这些注解来自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抢劫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参看Hall et al,1978)。

(胡疆锋 郑寰 译)

第二部分

民族志

3 泰迪男孩的文化回应

托尼·杰斐逊

编者按：托尼·杰斐逊在他对于泰迪男孩文化的讨论当中，处理了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泰迪男孩的“群体感”及其“接近于无业游民”的低下地位，使得他们对各种真实的或想象性的侮辱极其敏感；这种过度敏感使他们首先热衷于自己群体与众不同的服饰和外观；泰迪男孩把他们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那里借用的元素改写成他们自身与众不同的一种风格。杰斐逊认为，对于上层阶级服装款式的这种“无产阶级化”的改写不单单是风格上的炫耀，它既表达了这一群体的实际情况，又表达了他们的**强烈愿望**。该论文的完整版在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油印论文集中可获得（见 Stencilled Paper No.22, CCCS）^①。

考虑到(本文在以上内容中已经指出的)这种日益扩大的结构性的不平等，如果我们把泰迪男孩的文化回应当作他们社会困境的象征性表达，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它们呢？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考察泰迪男孩采取的各种文化回应，问题显然就变成了：我们对它们的破译就成了对一种不断受到威胁的空间和一种不断衰落的地位进行象征性保卫的努力。

^① 该论文完整版已被译成中文，名为《无赖青年：一种政治复兴》，见陶东风、胡疆锋主编《亚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144页。此处译文有改动。——校注

(a)“群体思想”(group-mindedness)

在一定程度上,泰迪男孩的“群体思想”可以看作是对传统大亲属网络的社会内聚力在战后遭受的剧变和毁坏而做出的一种反应。泰迪男孩的团体生活和强烈的忠诚意识,可以看作是对传统贫民区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和“强烈的地盘感”的重申(Downes,1966:119),可以看作是泰迪男孩保有和控制地盘的一种渴望——只是这种控制是想象性的。开发商们在两个层面上征用了泰迪男孩的地盘:

(1)对土地的实际征用;

(2)对附着于这片土地之上的那种文化的无形征用,即科恩所说的那种对亲属关系网络(kinship networks)和“共享空间接合体”的剥夺(Cohen,1972:16)。

(b)对于真实的或想象性的侮辱的极端敏感

如果考虑一下泰迪男孩对于真实的或想象性的侮辱所持的极端敏感的态度,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的事件都围绕着对他们自身、对他们的外表、对他们很特别的服饰的侮辱。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看一个容易找到的富有戏剧性的事例。第一个“泰迪男孩”杀人案,即1953年伦敦克莱芬公园(Clapham Common)谋杀案,就是因为一场斗殴引起的。一个泰迪男孩被一个青年骂为“大傻逼”(a flash cunt),于是一群泰迪男孩就与三个青年人打了起来[这个事件的详细描述及随后的审判情况,参看托尼·帕克(Tony Parker)1969年所写的《耕地男孩》(*The Plough Boy*)]。

我的观点是:对于传统上本来就缺乏地位的那些小伙子来说,他们又被剥夺了自己拥有的那一丁点的东西(对于泰迪男孩的这种衰落的社会地位,该论文完整版在前面有论述),仅存的就只有他们自己、他们自己的文化拓展(服饰,个人形象)以及他们自己的社会扩展(群体)。这些领域是他们所能控制的唯一的“现实”或“空间”,一旦感觉到这些领域中存在威胁,那么为保卫这一空间而进行的斗殴就变得可以理解,就成为一些意味深长的现象。

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一看泰迪男孩争斗的对象,我相信这种保卫他们空间的观念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扩充。打群架,也就是与其他泰迪男孩群体斗殴,从保卫自我的社会扩展——群体——这一点来说,是可以解释的(因此,群体思想很重要)。从**保卫自我及保卫以服装、外表所象征的自我文化延伸**这一点来说,如果有人侮辱泰迪男孩就会引起打架,这也是可以解释的。在这里,泰迪男孩对有关服装的侮辱很敏感,这一点尤其重要。我在下面有关“服装”的部分将做详细阐述。

虽然很多斗殴是由于泰迪男孩对(自身所受到的)侮辱的极端敏感造成的,但是他们对塞浦路斯人(Cypriots)咖啡馆老板和黑人的攻击,(表面上看未受到什么侮辱,)仍然可以解读为是对地位的保卫。“无业游民”青年的地位日益恶化,其实与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英联邦移民潮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由于他们对社会现实缺乏连贯而清晰的理解,他们也许会不可避免地觉得移民潮是造成他们社会地位日益恶化的原因而不是一种巧合。于是,他们就以为(rationalize)自己的社会地位总归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移民造成的,并把自己的挫败感移置到移民头上。另外,许多泰迪男孩感觉到移民们竟然成功了,这刺激他们做出如下的推理:移民的成功是“以牺牲泰迪男孩为代价”的。咖啡店老板塞浦路斯人就是典型的“成功者”之一,其他成功者还有那些有色人种店主和诈骗者。许多泰迪男孩生活在荒废了的、计划要重建的内城区,接触到少数的有色人种。由于肤色和工人阶级地位的缘故,这些有色人种对他们的社会地位不抱任何期望,他们被迫选择非常有限的差事(小诈骗和拉皮条或许是比较容易找到的、比较有吸引力的两件差事)。因此,有色人种的移民,不是当皮条客、店主就是参与诈骗,但是关于他们(成功)的神话却在泰迪男孩中很流行,(并在许多白人工人阶级成年人当中)开始传播。令人遗憾的是对所有这些情况的反应,比如1958年在诺丁汉和伦敦诺丁山爆发的那些人们很熟知的“种族骚乱”。这些骚乱是由泰迪男孩挑起的,这一点增加了我论文的分量。大量工人阶级成年人参与其中,也以他们的方式做出了反应,这表明并不是只有“无业游民”青年这个群体感受到了日益恶化的社会经济地

位。但是,在“丰裕”时代,(主流社会)不承认这些真正的结构性原因的存在,并且预先断定它们就不存在。相反,9个发起诺丁山暴动、缺乏技能的工人阶级青少年却都被野蛮地判了4年监禁。正如所有相似的替罪羊式惩罚一样,这种明显的替罪羊式惩罚过去是、现在仍旧是一项骗人的把戏,很明显是统治阶级为了防止它的真正利益被太过暴露而采取的一套自我保护的伪装。

如果我们还能记得许多青年俱乐部纯粹出于“名声”问题而禁止所有泰迪男孩进入的话,我们也许就非常容易理解泰迪男孩对青年俱乐部发起的各种攻击。单纯的报复变成了一些攻击的根源。另外,由于公共设施长期缺乏,而且完全跟不上青少年休闲活动的快速增长(比如可参看Fyvel,1963:120-3),人们因此对于社会提供的东西有更多的期待,而且有非常多的期待。如果这些期待像以前一样总是得不到满足,失望就一定会越来越多。因此,不无讽刺的是,现有的青年俱乐部远远不能缓解青少年的休闲问题,而实际上加剧了这个问题。(关于在这一领域经历的艰难困苦,以及为了给孩子提供他们所渴望的东西而进行的英勇而短暂的尝试,雷·戈斯林[Ray Gosling]有引人入胜的描述,参看Ray Gosling,*Sum Total*,1962)。最后我们看一下那些对公共汽车售票员的攻击。由于这些攻击通常发生在深夜的公交线路上,这说明匿名的机会和可能饮酒的状态相结合,会使得泰迪青年先前对于想象性的侮辱就持有的很高的敏感性进一步升级。

(c) 服装和外表

尽管面临周期性的失业,尽管从事没有技能的工作,泰迪男孩和这个时期参加工作的其他青少年一样,还是相对富裕的。从1945-1950年,青少年的实际平均工资增长速度是成人的两倍(参看Abrams,1959)。泰迪男孩当然有钱花,实际上钱是他们仅有的东西,所以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事。他们把大部分的钱花在了衣服——泰迪男孩的“行头”(uniform)——上。但在“解码”这种特殊的文化表达(cultural articulation)之前,有必要对这种“风格”及其历史做一些概括的描述。

最初，爱德华七世时代式样的套装是由一群萨维尔街(Savile Row)^①的裁缝在1950年引进的，他们试图开创一种新的时装风格。这套服装起初是为了满足年轻的贵族纨绔子弟而设计的。它本来包括狭长的翻领掐腰夹克衫、紧身裤(但没有“瘦裤腿”)、鞋尖有装饰的普通鞋子和花哨的马甲。白衬衣的领子是切角圆领(Cutaway Collars)，领带被打成“温莎”结；有的人头上会戴一顶软毡帽。不同于传统服装的本质变化是夹克的款式和华丽的背心。此外，理发店开始剪出一种富有个性化的风格化的发型，它普遍要比传统的盖头短发长一些。(这些描述是从一张“正宗的”爱德华式服装图片中采集的，此图片刊登在《裁缝和裁剪者》[*Tailor and Cutter*]上，并被1953年11月14日出版的《每日见闻报》[*Daily Sketch*]翻印过；这种描述是为了把“正宗的”款式与工人阶级所采用的款式分离开来。)

这种服装在1953年的某一天开始被工人阶级的青年采用，而且在早期通常是被不加选择地全部接受了。(1953年10月23日的《每日镜报》展示的一张迈克尔·戴维斯[Michael Davies]的照片，就证明了这一点。戴维斯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第一个因杀人被判刑的“泰迪男孩”。事实上，照片显示他穿着三件相配的套装，也就是说，并没有穿花哨的马甲)。

泰迪男孩后来对爱德华式风格做了如下一些改造：鞋带式领带；厚皱胶底、绒面革软皮鞋(伊顿[Eton]俱乐部会员那种高帮样式)；紧身瘦腿裤(没有翻边)；更笔挺、更掐腰的夹克；斜纹厚棉布或绸缎夹克领子；增添各种亮丽的颜色。早期灰暗的套装颜色有时让位于鲜绿色、红色、粉色和其他“原始的”颜色(参看Sandilands,1968)。他们也穿“猫王”埃尔维斯以来(post-Elvis)流行的蓝色绒面革软皮鞋。发型也经历了一个转变：通常是长发，梳成那种留有波士顿领圈线的“D-A”发型(直线切削式)，涂上一些油，并留有络腮胡子和额发。发型方面的变体还有“大象鼻子”型，或者更极端的“阿帕切”(apache)型(顶上短，边上长)。

在我看来，最初选择这样的制服是一种购买地位的尝试(因为所

① 萨维尔街(Savile Row)是英国一条古街，以专门为名门皇室贵族定做套装而出名。

——译注

选的衣服最初是上层阶级的花花公子们所穿),但这种尝试由于产生了一种不和谐的社会反应,很快就夭折了(1954年,一些旧的爱德华式套装在各种市场开始出售,因为爱德华式的服装一旦被泰迪男孩接管过来,上层阶级的花花公子们很快就不穿它了。参看Rock and Cohen, 1970)。这一尝试后面紧跟着另一个尝试;试图通过上述的各种改造来创造他们自己的风格。

对萨维尔街裁缝们所引进的那种爱德华套装的采用以及随后对其进行的个人改造,是泰迪男孩对文化的一种贡献。但是它们还体现出比这种文化贡献更重要的东西;由于文化只有变换成社会范畴才有意义,因此他们的服装体现了一种象征性的方式,以此表达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并与之进行交涉(negotiate),给他们所处的社会困境赋以文化意义。正因为这一点,他们对于衣着方面所受侮辱的过度敏感,就变得不仅是可理解的(情感方面),而且是合乎理性的了(理智方面)。

但是泰迪男孩的这身“行头”到底要“表达”什么样的“社会现实”,要与什么样的“社会现实”进行“交涉”(“协商”)。遗憾的是,现在还没有一种“语法”可以解码服装等物品的文化符号意义,以下所述大都是推测性的。然而,如果考察文化符号被提取时可能依赖的语境——即一种可能可以系统阐明这种语法某一方面的方式——那么,像泰迪男孩采用鞋带式领带这种行为,就开始获得了社会意义。鞋带式领带也许是从当时看到的许多美国西部电影当中借用的,在我的记忆中,这种领带是那些狡诈的城市赌徒普遍穿戴的;而这些人社会地位勉强称得上是较高的,因为他们有靠机智生存的能力,后者超出了传统工人阶级社会习俗的范围(与都市的、享乐主义的生活习惯截然对立,工人阶级的生活习惯基本上带有乡村风格和勤勉色彩)。因此,我认为对泰迪男孩来说,服装的文化象征意义可以解释为是对他们的社会现实处境(基本上是被主流排斥的局外人,被迫靠机智生存)和社会“抱负”(主要是努力获得一个即便是很勉强的、高一点的社会地位,有能力在城市环境中靠机智过上一种潇洒而享乐的生活)的双重表达。

(胡疆锋 高秀雪 译)

4 摩登族的意义

迪克·赫伯迪格

编者按:《摩登族的意义》摘自迪克·赫伯迪格关于20世纪60年代亚文化风格的研究论文的第二部分。^①与赫伯迪格对黑人文化(这里的背景不太熟悉)的研究相比,他在这里并没有花很多时间描述“摩登”风格,而更多关注摩登族亚文化中的风格生成模式。他考察了摩登族从消费品领域借用物品和用品的方式,还考察了因它们被改装进一种新的风格组合而产生的转换意义。这涉及不但要剥夺主流消费文化给物品赋予的各种意义,而且要通过表达亚文化价值观而不是主流价值观的方式来收编它们。这一研究也表明,摩登族是如何将消费、商品和风格本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即一种对风格的“顶礼膜拜”,这产生了那种通常被描述为“自我陶醉”的效果。这一分析为如下论点——亚文化群体在生活中把他们与自身真实处境的关系处理成了一种“想象性的”关系——提供了实证根据。

摩登族的外观

像大部分原始的词汇一样,密歇根州人(Wolverine)所用的每一个

① 此篇研究论文的完整版《摩登族的风格》(*the Style of Mods*)已被译成中文,见陶东风、胡疆锋主编《亚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128页。此处译文有改动。

——校注

单词^①,每一句通用的通俗官腔(Pop Newspeak),都是一个原始符号,它可以提供十几种或上百种交际功能。因此“mod”(摩登)一词用来指好几种不同的风格,它本来是一个概括性的术语,涵盖了所有可以促成最近推出的“摇摆伦敦”(Swinging London)^②神话的事物。

一群艺术学院的学生效仿玛丽官(Mary Quant),^③开发出一种惊人耳目的服饰品味,成了工艺上的“摩登族”。^④当斯诺登伯爵(Lord Snowdon)^⑤穿着圆高翻领的毛衣出现,并且急切地与约翰·贝利(John Bailey)和特伦斯·斯坦普(Terrence Stamp)^⑥这样的“新生代重要人物”——他们对某些垂死的惯例表现出一种“肆意的”轻视——掺和在一起时,他也赢得了摩登族这个绰号。但考虑到本文的论述目标,我们必须把摩登的定义限定在一些特殊的工人阶级青少年群体——这些青少年主要生活在伦敦和南方的一些新市镇,很容易认同有独特个性的发型和服饰等时尚。根据乔治·梅利(George Melly,1972)的研究,这种风格的最先推动者似乎是一群工人阶级的花花公子,他们可能是意大利风格热衷者的继承人;通过世界贸易网络,热衷于服饰并生活在

① 这里引用了汤姆·沃尔夫(Tom Wolfe,1931—)的语言。可参看他的代表作(Wolfe, 1966,1969a;1969b;1971)。——原注1。汤姆·沃尔夫是美国记者、作家,“新新闻主义”的鼻祖。他的报道风格大胆,善用俚语、新造词和异端的标点表达当代美国人微妙的心态。——校注

② “摇摆伦敦”(Swinging London):指20世纪60年代在伦敦青年人当中兴起的那种被广泛宣扬的自由任性、惊人耳目的时尚,男生最流行穿着剪裁贴身的意大利西装、驾意大利式黄蜂牌小摩托车(Vespa)扮酷;女生的最爱则是迷你裙配细高跟鞋。——校注

③ 玛莉官(Mary Quant,1934—):又译“玛丽·匡特”,英国服装设计师,设计了第一条超短裙(1960年)和超短裤(约1970年)。——校注

④ 当前流行的露营摇滚(camp rock)时尚就从这群人的极端自恋和自视文雅中汲取了许多创造动力。大卫·鲍伊和马克·波兰(Marc Bolan)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成员。——原注2

⑤ 斯诺登伯爵(Lord Snowdon,1930—),原名安东尼·阿姆斯特朗-琼斯(Antony Armstrong-Jones),人像摄影师,英国皇室成员。他是20世纪60年代《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图像编辑和艺术顾问。——校注

⑥ 约翰·贝利(John Bailey,1912-1989)和特伦斯·斯坦普(Terrence Stamp,1938—)都是英国著名男演员。——校注

伦敦的摩登族开始为世人所熟知。摩登族逐渐为人所知并且开始普及之后,又叠加了其他一些独特的身份符号(如踏板车、兴奋剂和音乐)。到了1963年,那些节奏布鲁斯夜总会(R&B clubs)^①把这群人紧紧地吸引到了伦敦的索霍区(Soho)^②和中心区;与此同时,在伦敦的城市环线,飙车男孩们(Ton up boys)仍然在泰然自若地、轰隆隆地开动他们的摩托车上路,怀旧式地坚守着摇滚和坚强的工人阶级价值观。

摩登族/摇滚派的二分法对双方的自我界定是否真的很重要,目前还不能确定。所有现象表明,两类人有着完全相异的生活模式和生活目标,这几乎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可以互动的空间。在1964年克拉克顿^③圣灵降临节骚乱——摩登族和摇滚派的冲突在其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令人不满意的、不完善的娱乐设施和小商店老板)——之后,媒体突出强调并且固化了这两个群体的对立关系,这为复活节周末发生在马尔盖特(Margate)和布赖顿(Brighton)码头的冲突,还有8月银行休假日期间发生在黑斯廷斯(Hastings)的冲突创造好了条件。^④我怀疑,摩登族在摄像头前与摇滚派冲突的事实,可能是摩登族虚荣心的显现,而并非这两个群体之间真的有什么深仇大恨。摩登族强烈排斥摇滚派粗鲁的男子汉观念、排斥他们表达动机的直白、排斥他们的笨拙粗陋,而欣然接受一种不甚明显的风格,后者反而不大容易受到父辈文化的嘲笑和反驳。使得1964年银行休假日不同

① R&B是Rhythm and Blues的缩写,被译为“节奏布鲁斯”或“节奏蓝调”,非裔美国人于20世纪4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融合了爵士乐、福音音乐和布鲁斯音乐的音乐,节奏分明有力,充满动感,对摇滚乐的发展有重大贡献。最初得名于唱片公司1947年推销唱片时所做的广告语,20世纪60年代以后,指那些与电子布鲁斯和黑人灵歌相关的音乐风格。英国的R&B音乐是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美国R&B音乐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校注

② 索霍区(Soho):英格兰伦敦中部的一个区,在17世纪居住的主要是移民,现在因其饭店、剧院和夜总会而闻名。——校注

③ 克拉克顿(Clacton):英国东南部北海边的一个城市行政区,为度假胜地。下文所涉及的马尔盖特、布赖顿和黑斯廷斯三地,均是英国东南部港口城市。——校注

④ 对于媒体角色、“社会反应”的其他因素以及制造摩登族/摇滚派二分法的全面分析,参看Cohen,1973。——原注3

于其他假日的东西,并不是暴力(这是一个相当常见的特征),而是这种风格在海岸集会地的第一次登台亮相。在马尔盖特、布赖顿码头和黑斯廷斯,来自伦敦及周边地区的成千上万的受到吸引的普通青少年(甚至一些时髦青少年)这回一下子全展现在人们眼前,这种外观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对老一辈人(那些控制着南方海岸政务理事会的退伍上校和喜好旅游的商人)构成了一种威胁。用戴夫·莱恩(Dave Laing)^①的话说,摩登族“看起来还行,但他们的行动方式当中所包含的有些内容是成人们所无法理解的”(1969)。他们似乎在有意识地转换与时髦穿着相关的价值观,在故意挑战那些预设的责任担当,在篡改那些源于这些物品资源的期望。就像斯坦利·科恩(1973)所指出的,他们愈发因他们给人们留下的“演员”印象——“一群没有完全扮演好自身角色的人”——而让人感到不安。

我现在应该继续尝试去戳穿和破译摩登族的神话,从摩登族自身的经验来分析这种风格的本源。最后,我想对如下问题——为什么一种明显没有恶意的风格最终会在成人的观念中投射出如此强有力的威胁——提供一种解释。

乘皮卡迪利线到达去天堂的中途^②

摩登族之所以采用一种时髦但又整洁、视觉上相对素朴的风格,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成是他对摇滚派夸张表现的回应。另外,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成是他的某种渴望——以他自身的风范充分展现大都市神奇的复杂性;渴望自身能接近黑人,因为黑人文化的更新已经融入了城市的更新过程并且总是能跟得上城市更新的速度。还有,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成是他对自己平时消费使用的商品所持的一种独特

① 戴夫·莱恩(Dave Laing, 1947-)：英国作家和播音员，对流行音乐史有专门研究。1972-1973年曾担任英国音乐月刊《尽情摇滚》(Let It Rock)的编辑。——校注

② 皮卡迪利线(Piccadilly line)是英国伦敦地铁的一条行车路线,1906年启用,是整个伦敦地铁系统中最繁忙的一条路线。该线路穿越繁华的皮卡迪利大街,这条街上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商店和酒店,并有一个四通八达的皮卡迪利广场。——校注

的、颠覆性的态度(关于这一点后面还有更详细的论述)。

摩登族理念上向往的生活方式总是围绕夜总会和城区中心而展开,而这些地方要求穿戴某种精致的服饰。摩登族为了应付每时每刻都会遇到的那些不可避免的烦扰,应付那些对活跃的都市夜生活有妨碍的、高速多变的互动琐细之事,就必须始终保持机警,充分调动自己的情感和智慧,使它们足以觉察并理解最细微的冒犯、笑话、挑战或者机会,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那个宝贵的夜晚。因此兴奋剂^①是必须谨记的,而且人的意识要与身体保持完美的同步。摩登族这种完美风格的理想的模型导师,应该是意大利黑手党那种类型的人,他们的形象经常出现于在纽约拍摄的犯罪电影当中(在摩登族的等级秩序中纽约要比伦敦高一级)。纽约布鲁克林区(Brooklyn)的时尚小子被战时的黑市商人、“小流氓”和战后的“骗子”所模仿,这种风格很常见而且容易接近,也比较容易建立起来。还有一种选择,一种同样合乎期待甚至可能更令人满意的形象则是由牙买加裔的骗子(后来被称为“牙买加小混混”)树立的,10年来摩登族在每一个可见的街角日益频繁地看见这些人在施展那些令人羡慕的“才干”。因此套叠平顶窄边帽(Pork Pie Hat)和黑眼镜在一段时期成为摩登族的必备配饰。如果说白人(压迫和限制着摩登族和黑人)垄断着白天的商业活动,那么黑人则更多分享着夜晚的活动。^②

另一个可能更普遍的影响因素是英国本土的黑帮风格,其进化过程几乎与摩登族的风格发展过程完全一致。随着1963年赌博法令的引入,伦敦变成了欧洲的拉斯维加斯,为英国更多充满野心的罪犯提供了丰厚的奖赏和以前未敢想象的地位。^③著名的克雷兄弟帮和理查森

① 我用speed这个词来涵盖“the blues”、“purple-hearts”、“black bombers”、dezedrine、benzedrine、enzedrine(以上都是兴奋剂的药名),这些都是摩登族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可以接触到的。——原注4

② “硬派摩登族”(Hard mods)特别喜欢模仿黑人,这种模仿体现在他们的直系后裔——光头党的风格上。——原注5

③ 随着1969年克雷兄弟(Krays)的定罪和新的更严格的禁赌法案在同年引入,这种风格被大大削弱了。——原文注6

派(分别来自伦敦东区和南区,都哺育了产生摩登族的土壤)开始在西区聚集,而很多工人阶级青年跟随他们的先辈,进入到索霍区和威斯敏斯特区(Westminster)^①这类先前神圣不可亵渎的要地,都想去试试运气。城中心区被新的夜生活改观并更新了,还为冒险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为富足的工人阶级青年提供了令人兴奋的东西。还有那些帮会之间暗中发生的冲突、无所不在的恐怖威胁,都给摩登族的理想生活方式提供了一个更适合的背景。歹徒们迷恋于经典的好莱坞剧情,身穿酷酷的西装,摆出黑社会老大艾尔·卡蓬(Al Capone)^②的经典姿势,彼此使用短管双筒霰弹枪,用汽油弹炸毁对方的房屋,与戴眼镜的“参谋”低声私语,这使得索霍区变成了孕育惊悚小说幻想和滋生地下阴谋的理想土壤;而这种环境正是摩登族生活及其文化浸淫的原料。^③1965年,伦敦中部的整个地下犯罪社会似乎都浮出了水面,并且带来了以流行小说、性和暴力等方面的幻想所构成的地下社会。由于它获得了权力,它就探究实现这些幻想的各种可能性——结果往往是很离

① 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伦敦市的一个行政区,英国议会所在地。——译注

② 艾尔·卡蓬(Al Capone),全名为Alphonse Gabriel Capone(1899-1947),意大利裔美籍匪徒,曾在1925-1931年间统领芝加哥黑社会,因逃税而被判监禁(1931-1939),后因染梅毒狱外服刑并病死。卡蓬时代的黑手党党徒在风衣下藏着冲锋枪,火拼时会用手榴弹开路,其强硬残忍的作风令其他黑帮胆寒。——校注

③ 这并不是到目前为止看起来第一次出现的事情。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强盗行为”(gangsterism)是一场游戏,一场严肃的、高度危险、高盈利的游戏,但是它仍然不过是一场游戏;游戏的规则很久之前已经在好莱坞-芝加哥神话中被固定下来了。一场敲诈勒索的效果,主要取决于其博取公众关注的感召能力,取决于其能否连贯地展现变态人物的角色特征(理查德·韦马克 [Richard Widmark] 扮演的那种类型的),还取决于对真实但根本无法指明的威胁能否做出令人信服的展现。它在所有那些在流行的幻觉中接触到它、沉迷于它的人身上起作用,并严格坚守那种幻觉的惯例。一句话,这是一场活生生的电影。对于这一点我的研究或许过于夸大或简单化,但对其进行的细致考察可参见我的论文(stencilled paper No. 25., CCC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原注7 理查德·韦马克(Richard Widmark, 1914-2008),美国著名影星,1947年因出演《死亡之吻》中的一个冷酷的、反主流社会的精神变态者而成名,随后多年以成功扮演此类人物而著称。——校者补注

奇的、令人恐怖的。伦敦东区和南区的犯罪文化与西区的高品质生活以及切尔西市(Chelsea)的富豪阶层达成了空前的结合,孕育出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成果;索霍区的摩登族就是这些成果当中最讲究修饰的一类人。

完美摩登族的大头照

1964年4月,《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了一个17岁大的摩登族青年登齐尔(Denzil),他比较合乎完美的摩登族角色,“在所有的照片中显得极其醒目,并显现了一个完美的伦敦摩登族在普通一周的生活”。

周一晚上打算在麦加(Mecca)、汉姆斯密斯舞厅(Hammersmith Palais)、帕里果园(Purley Orchard)或者斯特里汉姆·洛迦诺(Streathen Locarno)^①跳舞。

周二打算在索霍区和场景俱乐部(the Scene club)。

周三晚上去马奎斯(Marquee)。

周四晚上照例要留出时间去洗头。

周五晚上打算再去场景俱乐部一趟。

周六下午通常打算买衣服和唱片,周六晚上跳舞,很少在周日上午9点或10点之前结束。

周日晚上打算去弗拉明戈(Flamingo),假如有人撑不住,这个晚上他可以休息。

即使允许我们可以夸大能够过这种生活的摩登族的数量,我想也不会超过几百人,或许最多也就几千人。事实上可能没有几个人能有如此超人的精力(即使吃了兴奋剂),更不用说一个摩登族要执行完这样的日程安排表需要花上多少现金,但事实是,登齐尔从来没有让朋友们失望过(即,严格执行了这张日程表)。他努力推动群体幻想,将每个人需要的这种不可能实现的美好生活图景,彻底投射在那些令人难忘的印刷品(出版物)上。与此同时,每一个摩登族在心理上都做好

① 这些都是伦敦南区有名的娱乐地点。——译注

准备，以便一旦有了机会，一旦有了金钱，一旦韦林花园城(Welwyn Garden City)^①变成了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 Circus)，他们就可以随时狂欢。每一个摩登族都生活在一个充满犯罪、豪华俱乐部和漂亮女人的幽灵世界当中，尽管现实中只有透风的帕克牌防寒服，残破的蜜蜂牌小型摩托车，以及从油腻腻的袋子中掏出的炸鱼和薯条。

标准摩登族的生活快照

现实的摩登族生活其实并没有那么光鲜亮丽。根据巴克(Barker)和利特(Little)1964年对43名监禁在马尔盖特的罪犯的抽样访谈，一般的摩登族，15岁从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后就成为半熟练的或者比较标准的办公室职员，他一个星期大概挣11英镑。其他大部分摩登族则被雇用为商店职员、邮差，或者在伦敦西区的各种服务行业做下等工。摩登族经常被描述为在积极探索上进的道路，但现在看起来这只不过是摩登族过分热衷外表，以及在受毒品或安非他明的诱导下容易进行自夸等外在方面得出的错误推论。正如登齐尔所言：“当你每星期出去被一群女孩堵住时，你就开始撒谎，比如会说你的西装值多少钱之类的话……”我认为，标准的摩登族可能更像巴克-利特抽样中受访的一个18岁的青年，他唯一的明确抱负是成为伦敦上流社会饮酒夜总会的老板，这个目标大大超出他目前作为运肉工的职业现实，导致他不能再认真地接纳这个职业；而是心有不甘地接受了社会对他的价值评价（“差不多就是体力劳动——那就是我唯一能做的事”），他干这个职业纯粹是为了赚取他的闲暇时间并且依靠闲暇时间而生活。皮特·汤森德(Pete Townshend)^②表现摩登族体验的新摇滚音乐剧《四重人格》(Quadrophenia)当中，有一个服务员(bell-boy)的角色，显然在白天同样只能承担一种无意义的卑屈角色，而在夜晚则越发想下决心弥补一下。就像汤姆·伍尔夫在他的文章《正午的下层社会》(The Noonday

① 韦林花园城(Welwyn Garden City):位于英国东南部的一个美丽幽静的小镇。——译注

② 皮特·汤森德(Pete Townshend,1945-)：英国摇滚吉他手、歌手、歌曲作家、作曲家和作家。——译注

Underworld, Wolfe, 1969 b) 中所描绘的那个15岁的办公室勤杂工(*office boy*), 他的服装剪裁得比老板们的还要考究, 这也表明摩登族通过对他的私人财产——外表和对休闲活动的选择权——实施全面控制, 下决心来补偿自己在白天的地位博弈(*status-stakes*)中所处的那种他自己无法控制的、相对低下的地位。

在一切皆由自爱(*self-love*)所控制、遏制和激发的内心世界与敌对的、让人生畏的、负荷着“他们”喜好的外在世界之间, 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而弥合这一鸿沟的是安非他明(一种兴奋剂)。^①凭借“兴奋剂”的魔力, 摩登族获得了一种神奇的无限能力, 由此, 他的运转动力被放大了, 行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多了, 他们的目标被照亮了。安非他明让生活变得可以容忍, “阻塞”了人的感觉通道以至于任何行动、冒险和刺激都可能出现, 让人不停地进入无止境的消费循环, 把人的注意力限制在追寻、理想和目标上而不是目标的达成上, 也就是说, 限制在宽慰舒解(*relief*)而不是解放(*release*)上。“谁人”乐队(*The Who's*)^②唱的那首名叫《追寻》(*The Search*)的歌, 强调的正是“探求行为自身作为目的”的重要意义:

我永远也得不到我追寻的,
直到我死的那一天。

当一个人的追寻必然失败, 且找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的时候, 兴奋剂暂时缓解了这种失望, 并且赋予他活力, 帮他重新振作起来, 再次启动。它往往也会阻碍精神和情感的发展(会产生药物依赖, 会牺牲

① 要确认兴奋剂在摩登族生活风格中的核心作用, 我们只要看看踏板车(*scooter*)被赋予的文化含义就行了。踏板车是由英国青年亚文化群体引入的第一个创新性的交通工具(“摩托车是从美国借来的”)。动词“to go”(走吧)被列入到摩登族的两项计划——“Ready Steady Go”(准备出发)和“Whole Scene Going”(全场景出发)——当中, 这证明了移动对于他们的重要意义。——原注8

② “谁人”乐队(*The Who's*): 英国20世纪后半期最有影响力的摇滚乐队之一。——译注

听觉活动来阻止那些激发连贯声音的交流),同时加速了体质的下降。摩登族目前在充分享受人生乐趣,肯定以后还得自己来买单。由于摩登族被60年代那种无望的尝试——通过无休止地不断更换物品来扩展自我——所显现的光亮的外表完全给吸引住了,他就会在某一时刻认识到:他的青春(或许是那种未明言的、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绝不可能永驻。汤米(Tommy),一个弹珠奇才(pinball wizard),最终也得极不情愿地要勇敢面对这么一个现实:游戏是有时间限制的,而且再不会有重新比赛的机会了。因此,在60年代中期,因衰老过程带来的困扰明显地出现在“谁人”乐队和滚石乐队(他们都是摩登族的超级偶像)的歌曲当中。

在1964年的“战场”主题曲中,“谁人”乐队的《我这代人》(*My Generation*)这样唱道:

他们的所作所为相当冷酷,
希望在我变老之前死去。

滚石乐队的专辑《妈妈的小帮手》(*Mother's Little Helper*),针对的是中年的安非他明瘾君子,以及一个可以理解的预言性的摩登族噩梦:

真讨厌!它在让我变老。

因此,我们最后来讨论摩登族精细的消费仪式,他们对于自身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抱有的那种显然永不满足的欲望,以及他们在那个社会内部受到的根本性的、无法逃脱的限制。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摩登族的风格已经在资本主义这个庞然大物中偶然发现了某种严重的缺陷,我现在只是想试图说明:它是如何用一种独特的、颠覆性的方式来处理它自身喜爱的那些日用品的。如果它没有发现任何缺陷,它至少也遇到了一些毛细裂纹。它至少敲中了牢狱的铁窗。

炫耀性消费和转换过的商品

摩登族经常受到那些自封的流行音乐评论家的指控,这些评论家认为他们有一种使人衰弱的倾向,会让人沾染上多种不良嗜好。这种论断大致可以这么说:摩登族作为典型的带有疏离色彩的(alienated)消费者,急切地吞食了最新的兴奋剂,以便借来足够的精力让他们有最大限额的时间来消费最大限额的商品,反过来说,这些商品也只有在兴奋剂的影响下才可以享用。然而,尽管摩登族有势不可当的消费需求,但他绝不是一个被动的消费者,并不像他的那些追求享乐主义的中产阶级后裔通常表现出的样子。^①对于摩登族来说,风格的重要性决不能被过度强调——摩登是纯粹的和纯净的大写的“STYLE”(风格),是风格中的精华。为了展现风格,首先必须挪用商品,然后重新定义

① 这两种风格之间的区别,比较一下摩登族团结一致——银行休假日聚集——的主要符号展现方式与嬉皮士文化中的对应情形——音乐节,就能很好地显示出来。在海岸边,摩登族迫不及待地反对群众的被动性;每一个摩登族都是富有创造力的主体,有能力使一个没有想象力的成人观众感到快乐,傲慢地向一群毫无特色的观光者们展示他的身份标记。另一方面,嬉皮士的节庆则刻意避免同其他文化接触(当这种接触出现时,就像在阿尔塔蒙特[Altamont],往往会变成一种灾难),把举行的地点选择在那些弥散着彼此自得自满情绪的偏远之地,主要让人们被动地消费一些遥不可及的明星精英制作的音乐(参看爱森[Eisen]编辑的《阿尔塔蒙特》[Altamont, 1970]一书,其中描述了为何几千名观光者面对几个得手的摩托车歹徒毫无对策)。如果这种比较显得不公平,我们只需要看看摩登族在俱乐部里消费R&B音乐和摩城唱片(Tamla Motown)的情形就明白了。摩登族从来都不会静态地沉迷于他们的音乐(而嬉皮士通常都安静地坐观),而是把音乐作为他们在舞池中推陈出新的催化剂,甚至有需要的还会独自一个人跳起来。或许他们之间的区分可以概括为如下两条公式:

(1) 工人阶级+摩登族+兴奋剂=行动;

(2) 中产阶级+嬉皮士+大麻=不抵抗。——原注9。

补注:阿尔塔蒙特(Altamont)音乐节是1969年在北加利福尼亚的一个赛车场举行的。主办方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s)错误地选择了加利福尼亚的摩托车党“地狱天使”来维护音乐节的秩序,但这些人只知道喝酒,殴打他们看着不顺眼的或跳舞的观众,甚至殴打杰斐逊飞机乐队(Jefferson Airplane)的成员,最后竟然在滚石乐队演出时刺死了一个黑人。这次音乐会被认为预示了20世纪70年代的暴力倾向。——校注

商品的用途和价值，最后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中重新定位商品的含义。这种模式，相当于对摩登族风格必需的那些物质世界的部件从语义学上重新进行排列，它在摩登族经验的每一个层面都被重复，并被用来保存至少局部的摩登族私人维度，抗拒它在稍后的阶段似乎准备接受的那种被动的消费者角色……

因此，踏板车——以前非常体面的交通工具——就被挪用并转变成一种武器和团结的象征。那些医学上用来治疗神经衰弱的药物（兴奋剂）被他们挪用过来作为自我了结的药物，而且，学校和工厂对他们的能力所强加的消极评价，被他们在游戏世界中对自身履历的积极评定所取代了（也就是说，被白天的控制者们给予负面评价的同一种品质——比如懒惰、自大和空虚等——在空闲时间却得到了他们自己和他们同龄人的正面肯定）。

因此，摩登族学会了用间接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批评意见，已经从（在学校和工厂的）经验中学会了在这些地方——在那儿年龄、经验、经济水平和公民权利都免不了对他们不利——如何避免直接冲突。所以，他们创造的风格就对他们所处的消费社会构成了一种戏仿（parody）。摩登族发起了自己的冲击，采用的方法是对他们的雇主和父母所珍爱的（整洁的、短发的）形象进行反转和歪曲，并创造出一种风格，这种风格虽然表面上接近主流正直社会（the straight world），但实际上却让主流社会感觉无法理解。

摩登族取得了象征性的胜利，并且掌控着一种戏剧化的但最终很神秘的姿态。银行休假日骚乱事件（Bank Holiday riots），还有1966年11月5日白金汉宫踏板车控告事件（一起对相关的摩登族来说很重要但几乎没有人记得和报道过的事件），虽然对于社会历史学家来说具有某种追溯的魅力，并且能唤起那些参加过这些活动的人的自豪感——类似于参加过阿金库尔战役（Agincourt）^①者的自豪感，但却不能给我们留下此事为永久重要事件的印象，而一个18岁的老摩登族还可以这

① 阿金库尔战役（Agincourt）：1415年，英王亨利五世（Henry V，1387—1422）在法国北部阿金库尔村重创兵力数倍于己的法军。——校注

样回忆马尔盖特的事件：“对，我当时在那儿……就好像我们正在颠覆这个国家。”（引自Booker, 1969）^①。

风格的基础是依据物质世界中的某些元素的主题而进行的借用和重组，而物质世界在某些方面支配和约束着摩登族。以上所引证的摩登族的胜利欢呼，是庆祝一种空想的胜利，一种想象的胜利；最终是庆祝一种虚构的胜利。摩登族结合了那些之前互不相干的元素，把自己创造成一种隐喻，但这种隐喻显然只对他本人是适合的。但是摩登族低估了主导文化吸收颠覆性影像和承受无政府主义空想冲击的能力。对于商品的各种神奇转换一直都很神秘，中立的旁观者往往很难看见，但是再多的风格化魔法也不可能影响它们产生于其中的这种压迫性的经济模式。不论女王陛下的彩色绶带遭到了怎样的污损，甚至被披在了那些骨瘦如柴的瘾君子们大幅截切的夹克衫的肩头上，国家依旧在完全正常地运转。

对于一位白种黑人^②死者的验尸报告

我已经强调了摩登族相对排他性的积极价值，强调了他对于支持他的整体环境的创造，这个环境不仅给他提供了与众不同的服饰、音乐等，也给他提供了一整套的意义。我想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应该注意到，正是这种神秘主义，这种逃避主义，导致摩登族作为一场运动最终不可避免地衰落了。摩登族是与梅勒(Mailer)的文章^③中所写的美国白种黑人相对应的、最早的纯英国白种黑人：靠当下时代的脉动生活，仅仅靠下班后狂热献身闲暇时间来恢复活力，并通过自己的人格（更确切地说是通过这一群体的集体人格）所产生的动力来创造，一种完整的风格被武装起来，尽管不很充分，但也可以用来抵抗那种不可一世

① 布克(Booker)是一个英国记者兼作家，1969年出版了《追新族》(*The Neophiliac*)一书。

——校注

② 白种黑人(White negro):指受了黑人文化影响,认为自己是黑人的白种人。——校注

③ 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 1923-2007):美国作家,1957年在《异议》(*Dissent*)发表了《白种黑人》(*The White Negro*)一文,广受关注。——校注

的父辈文化,而且这种风格只需留意自身的理据和伦理观。正是这种自负最终导致了摩登族的自我暴露。摩登族下定决心去接近“正午的下层社会”和烟雾缭绕的俱乐部并想得到它们的接纳,下决心去接近美好生活,而从来没有承认他自身的疏离所隐含的意义,只是留意他自身创造的、日益商业化的(因此是人造的、程式化的)影像,他对音乐着迷,被药物搞得愚笨迟钝。因此,摩登族最终注定要被压垮;他在各个层面都会受到欺骗和剥削。迅猛扩张的流行产业把他们的消费仪式变得优雅了,并无限地扩张了这种模式,而且开始涉入摩登族市场,明确地引导商品的用途。服饰不再具有创新性——没有人再会“发现”像利维牛仔裤(Levi Jeans)或暇步士(Hush Puppies)这样的服装品牌。风格是从上至下制造出来的,而不是从内部自发创造出来的。如果有一本摩登族杂志权威性地宣布说,又有一种“新的摩登时装台步(NEW-MODWALK)——脚朝外、头朝上、手插在夹克衣袋里”——登场了,那我们只能无奈地承认,这个特殊的白种黑人,在沿着这条线路走的时候,已经在某个地方跌倒并死去了。

(胡疆锋 林孝杰 译)

5 光头党与社群的神奇恢复

约翰·克拉克

编者按：此文摘自约翰·克拉克研究“光头党文化”的长篇文章，主要描述了这种亚文化群体关注“社群”(community)^①和“领地”(territory)观念的方式。光头党文化有选择性地重申了传统工人阶级的某些核心价值观，这种肯定既表现在服饰、风格和外表上，也表现在行动上。这种重申是一种象征性的而不是“真实的”重现“父辈”文化某些方面的企图。因此，光头党文化对于领地、足球、“粉丝资格”(fanship)以及某种独特的男性气概的关注，体现了克拉克所说的“对于他们的社群的神奇恢复”。也可参看克拉克的硕士学位论文《重新界定青年文化》(Reconceptualising Youth Culture, CCCS, Birmingham) 和另一篇文章《光头党和青年文化》(Skinheads and Youth Culture, CCCS Stencilled Paper No.23) 对这个例子的运用和讨论。

我们有关光头党的主要观点以社群这一概念为中心。我们认为，光头党的风格体现了一种试图通过“一个团伙”(mob)来重新创造传统工人阶级社群的努力，以此来替代后者的现实衰落。就此而论，这一风格的潜在社会动力，是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以来工人阶级处境的相对

① “community”一般译为“社群”、“共同体”或“社区”，它既指群体，又指群体所共享的空间。译者根据具体语境作适当调整。——校注

恶化,尤其是下层工人阶级(及其青年)的处境日益迅速恶化。这种情况,与青年人感觉自己被当前“青年文化”(在公共场合被那些源于“地下社会”的音乐和时尚所支配)所排斥的那种感受相类似,在下层工人阶级青年中导致了一种日益强烈的向“我们—他们”意识的回归,引发了一种从不同角度遭受排斥和攻击的感觉。而应对这种被排斥感的所有办法,在各类青年亚文化群体自然显现或包含的成分中都找不到,只有在强调更传统的集体团结形式的那些形象和行为当中才能找到。《涂料房》(*The Paint House*)一书所用的材料就阐明了这种压抑的感受:

到处都是他妈的老板,他们总是试图告诉你该干什么……不管你在干什么,你在哪里,他们永远在你身边。权威人士,就是那些告诉你该干什么并且确保你必须干那种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居住于其中的现行秩序,也是统治秩序。

你上过的学校,不是吗?教师和校长,他们都是权威,不是吗?他们告诉你该做什么,但你很高兴能逃脱并且离开学校,不是吗?他们认为,因为你年轻,他们就适合你,他们就可以用他们喜欢的方式来对待你,可以说他们想说的话。于是就出现了“警察局”和法庭……他们就是权威的全部构成要素。

官员和各行各业穿制服的人们。任何戴徽章的人,交通警察和交通委员会成员……是啊,甚至还有公寓管理员,他们也是冲着你来的。当你完成了工作或学业,你就去夜总会,而青年领袖也是权威体系的一部分。

(Daniel and Mc Guire, eds., 1972:67)

但是光头党所感觉到的压迫感不只来自于显在的权威结构;他们也厌恶那些试图出人头地并“装腔作势”的人,那些出身于邻里街坊并自以为占有社会优势的自命不凡的人;他们厌恶那些“压迫我们的人”(people on our backs):

所有这些学校里的傻瓜(dummoes),通常做的都是别人叫他们去做的事情……他们最终会成为那种告密同伙以获得减刑的人。我讨厌那些空想的社会改良者,他们来“贫民窟帮助穷人……”他们都很友好、亲切、和蔼,他们假装支持你,通过友好的交谈弄清你的情况,但是像这样的社会工作者和人们,他们不会真正支持你的。他们以为他们知道你应该怎样生活。他们实际上是权威,只不过假装成你的朋友。他们试图让你做事情,如果你不做那些事,他们会让法律支持他们。有这么一批人来对付我们,我们更容易获得犹太佬(yids)、巴基佬(Pakis)、中东佬(wogs)和嬉皮士这类带有贬损意味的称号。

(ibid:68)

这种“身处”各种各样压迫性的和剥削性的暴力“当中”的感觉,促成了一种对于群体团结的需要;尽管这种需要本来是防卫性的,但是光头党给它结合了一种攻击性的内容,即通过侵袭那些被当作替罪羊的外来者来表达自己的挫败和不满。正像我们对光头党风格的构成要素进行考察的时候所发现的,这种团结的内容源自传统工人阶级社群的内容——工人阶级社群是具有这种防卫性的、有组织的集体的最典型的例证。

然而,光头党的风格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复兴工人阶级社群;支持这个社群的基础在战后不断衰落,使得它已经无法充当社群团结的真正来源;光头党成员不得不用这一社群曾经所是的一种形象作为他们风格的基础。他们是一群“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后继者”;他们获得了一种已经被剥夺了真实社会基础的传统。主题和形象还持续存在,但实际上却处于日渐衰落和消失的状态。我们认为,光头党与传统社群的这种脱节性的关系,正好可以解释这种被夸大、被强化的形式——他们只能以光头风格来接受这一社群的价值观和关注点。丹尼尔(Daniel)和麦圭尔(McGuire)指出:

科林伍德帮派(the Collinwood gang)并不是一种团体精神,它

常常与东伦敦人(the East Enders)的形象有密切的关联,他们强壮、幽默而且有他们自己的文化……这一帮派将自己视为是这一地区工人阶级传统的自然延续,他们与他们的父母、祖父母有着共同的态度和行为。他们认为,他们与他们的父母一样,对移民和外国人有一种相同的、固定不变的歧视,但是他们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已经超出了他们父辈所亲历的那种社群的语境……

(ibid:21 - 22.着重号为我们所标)

这些观察结果在光头党自身对于帮派与自身在地性(locality)的说明当中得到了强化:

当人们不断地说光头党,当他们纷纷议论我们成长于伦敦东区的背景之时,这一点恰好与上一辈人、过去的人们碰上了……我的意思是光头是从哪儿继承的?它是一个社群,一个帮派,不是吗?它只是表示社群、孩子(kids)或暴徒(thugs)之类事物的另一个词语……

(ibid:21;31)

这些孩子从父辈文化那里继承了这一地区的口头传统,尤其继承了那些涉及社群自我形象、集体团结、男性气概的观念和对待“外来者”的态度取向等方面的内容。这就不难理解,与光头党联系最密切的区域应该是伦敦东区,从社会学的立场来看,这一地区一直是一个典型的工人阶级社区。其内部的自我形象一直都是特别坚强的一种形象,而且被其作为“强硬”地区的公众声誉不断强化,这种声誉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被克雷孛生兄弟那些充满冒险性的谋生之道给进一步强化了。

最后,我们想用光头风格的一些核心的要素为例,来说明光头党与社群形象的关系。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强调光头党的地域性关联——这些“团伙”是按区域组织起来的,他们通过一种特定的地域性(比如,“斯梅西克帮”[Smethwick Mob],等等)来确立自身的认同。

这包括一个团伙对于他们特有的“小地盘”的划定和防卫,他们用油漆刷的一些口号(比如,“此地属昆顿帮管辖”[Quinton Mob rules here])来划界,而且坚守这些边界以防其他群体的侵害。这种领地性(territoriality)就像社群一样,有它自身的聚焦点,各种交往活动围绕这些聚焦点——街角会面处、小酒馆以及足球场——接合起来。尽管足球场未必都与这些团伙的小地盘一一对应,但它自身的本地认同与先前就有的各种涉及东区(the Ends)的活动,都给团伙的组织活动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聚焦点。

足球,尤其是围绕它接合起来的暴力,也给光头党提供了一个表现的舞台,用以表达他们那种特殊的、集体的、男人味的自我观念,包括对体魄强健的男性气概的认同,以及在“烦恼”面前不愿退却的精神。^①这种暴力也包括这些团伙对于在“需要”的时候应该集体团结并相互支持的强调。这种对于体魄强健的关注,也涉及光头党最为公众所熟知的其他两种活动——“殴打巴基斯坦裔人”(Paki-Bashing)和“殴打同性恋者”(Queer-Bashing)。殴打巴基斯坦裔人的行为,涉及对于这一社群的社会、文化同质性进行的仪式性的、进攻性的捍卫,打击那些最明显的被当作替罪羊的外来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与西印度裔的人相比,巴基斯坦裔(从商店所有权形态方面来看)在他们的邻里社区中显得特别醒目(particular visibility),另一方面是因为与西印度裔的青年相比,(尤其是从他们不愿意捍卫自身等方面看)巴基斯坦裔有一些不同的文化形态。

“殴打同性恋者”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于侵蚀传统男子汉稳固形象的行为(尤其是嬉皮士们)的强烈反感。光头党对于“同性恋”的操作性定义,其外延似乎已经扩及所有那些依他们的标准看起来有些“古怪的”男人,一位斯梅西克城(Smethwick)的光头党这样来谈他的看法:

① 战后时期足球领域出现的这些变化,已经对光头党关于这一特殊领地的选择产生了一些影响,有关这方面更为全面的阐释,参见Taylor(1971a and 1971b)以及Citcher(1975)。——原注1

通常就是我们一群人发现我们认为有些古怪的某个人——就像这个晚上,我们在沃利森林公园(Warley Woods)熬夜,然后看见了这个看起来怪怪的家伙——他留着长发,穿着饰边的裤子。

我们可以将领地性、集体团结和“男性气概”这三种相互关联的因素,看作是一种存在方式——在与日俱增的压迫体验需要各种相互组织方式和防卫方式的年代,光头党通过这种方式试图重新创造自己所继承的社群形象。而且,我们最终可以把这种与风格相联系的强烈的暴力,视为“重新创造一个社群”的征兆,但这一“社群”实际上是“神秘性的”或“想象性的”;这种“重新创造”缺乏社群需要的物质和组织基础,因而很少受制于那些带有这些社群社会控制特征的非正式规则。在光头党的风格中,我们既可以(从它的内容方面)看见连续性的因素,又可以(从它的形式方面)看见父辈文化与青年文化之间不连续的因素。

(孟登迎译)

6 无所事事

保罗·科里根

编者按：保罗·科里根对于桑德兰(Sunderland)街角文化的研究《砸东西的街头少年儿童》(*The Smash Street Kids*),1979年由Paladin出版社发行。它证实了“无所事事”的平庸追求中所包含的激烈活动,也说明了如下事实:被大多数成人视为纯粹浪费时间、缺乏目标的事情,在这些少年儿童看来却充满故事,而且经常满含“各种奇思妙想”。科里根指出——并且在这篇摘录中证明——大多数工人阶级少年儿童所从事的许多最常见的、最强烈的活动,是一种简单的、但引人入胜的“消磨时光”的活动。

对于大多数少年儿童来说,他们所待的地方是街道;他们不是以浪漫行动去装饰贫民聚居区的街道,而是拥挤在威根(Wigan)、谢泼兹布什(Shepherds Bush)和桑德兰等城市潮湿的人行道上。在这个地点的主要活动,即英国亚文化群体的主要行动,实际上是“无所事事”。

你和你的同伴在做什么事情?

邓肯(DUNCAN):只是坐着闲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和事。

你还做其他的事吗?

邓肯:开玩笑、鬼混、胡闹。只做我感觉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都指什么?

邓肯:只做一些事情。上个周六有人开始扔瓶子,于是我们都参与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邓肯:实际上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所有这些活动都被归入“无所事事”这一标签之下,而且它们体现了最广泛的、最复杂的青年亚文化。无所事事的主要构成元素是谈话。这种谈话不是对于电视访谈节目进行的那种晦涩难解的讨论,而是要详述、交流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并不需要一定是真的或实际存在,但要求尽可能有趣味。相互之间聊足球,聊并不是为了交流思想,而是为了交流对于聊天的体验。聊天可以打发时间,并且可以彰显男孩们消磨时光的不同方式所具有的群体本性。搞了大量的嬉闹活动。正是在聊天、开玩笑和胡闹的范围中间出现了一些事情,男孩们把这些事情称为“奇思妙想”。

你曾经外出与那些小伙子闲逛吗?

艾伯特(ALBERT):我愿意的时候会去。

你们都做些什么事?

艾伯特:有时候我们搞恶作剧。

恶作剧?

艾伯特:某个人头脑里有了一个奇思妙想,他们就开始付诸行动,其他人参与其中。

奇思妙想?

艾伯特:比如……四处去粉碎奶瓶。

正是这种“奇思妙想”代表了在“无所事事”的时候所做的主要事情。为了战胜无聊(boredom),这些少年儿童并不是把街道选定为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而将它看作是一个将会有许多事情发生的地方。在街上无所事事必须与其他可供选择的活动相比较着来看:例如,知道在客厅与爸爸和妈妈无话可说;差不多可以确定在青年俱乐部里也充

满无聊。这使得街道成为会发生某些事情的地方,即使不在这个星期六,那么肯定会在下一个星期六发生。

因而,这些奇思妙想产生于无聊,产生于对未来的期待以及持续的无聊,而且这一点影响到奇思妙想所属的类别。一种好的想法必须包含促成持续变化的种子,同时必须包含令人兴奋和让人可以参与的事情。粉碎奶瓶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因为它代表了他们将思想付诸实施的一种方式。问少年儿童们为什么他们要粉碎奶瓶,其实是在问一个无意义的问题。

你们站在街角干什么?

迪克(DICK):警察决不会发现我们在干什么坏事,因此他们不该老是挑剔我们。但我们通常只是胡闹,砸碎一些东西。

哪些东西?

迪克:实际上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是一些想法。

比如,对于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从男孩们自己这一方面看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它超出了对于时间的整个体验。因为我们并不是在谈论男孩们周六晚上外出找奶瓶并把它们砸碎这件事,相反,我们谈论的是发生了一件只是让人感觉有趣的事情。

当你们只是在街上闲逛时会做些什么?

理查德(RICHARD):有时我们去打架,或者遇到麻烦,但大部分时间没什么事。

请给我们一个例子。

理查德:哦……上个周六我们正好在街上闲逛,有人顺脚踢起了一只瓶子,然后这个瓶子就摔碎了。于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开始粉碎瓶子。

为了避免有人就砸碎奶瓶这件事去建立一种放大偏常行为的模

式,他们就将其他被砸碎的物体也包含在这些奇思妙想当中。

爱德华(EDWARD):我最近有了麻烦,因为我的朋友最近砸碎了一个商店的橱窗,事情就是这样。

斯蒂文(STEVEN):咳,你知道那儿有国际汽车大奖赛。咳,我们猛砸那些机械然后跑掉了,接着再砸。咳,你知道那些公司的客车司机,他们平时总喜欢去喝杯茶,我们就去打开车门在里面乱踢。

“无所事事”的其他主要构成内容就是打架。在这种背景下打架是一种重要而令人激动的机会——打架很容易创造有趣的事件,而且它们本身就是有趣的事件;它们不带有太多的风险。对于一些男孩来说,打架代表着一种偶然事件;对另外一些男孩来说,打架是每周六晚上的重要事件——在他们看来打架是构成无所事事的最重要元素。

你们一般在周六晚上都干什么?

戴夫(DAVE):周六晚上,哎呀,哦,我们通常会到一家外卖酒的商店,买一些酒来喝,一些果酒或一些啤酒。我们经常到我老兄住的地方四处走动,听听唱片、看看电视,然后就只有闲逛。

你们闲逛时都干些啥?

戴夫:就只是到处游荡,踢踢足球什么的,在街上搞一点恶作剧。

恶作剧?

戴夫:咳,我们只是好像在街上经常搞这些玩意儿。

你们参加过一些打架吗?

戴夫:没有……咳,参加的不是很多。

看来试图解释这些打架发生的原因是没有意义的。鉴于闲着没事,就要搞一些事情出来,哪怕这种事情只是打一个哈欠;或者某人

侵犯了他人；某人回忆起自己很早以前所受过的、一次侮辱；正是这一点引发了打架。一些在“无所事事”之外乏味的、被遗忘的事情，成了这一套行为当中至关重要的事情。

另外还采访了其他几个少年儿童，在他们那儿更容易出现打架。

你一般在周六晚上都干什么？

弗雷德(FRED)：我去车站，你知道在市中心，再匆匆前往纽西(Newcy)，我们整个一大帮人。然后我们在纽西四处走动，准备应对任何麻烦。我们发现几个新的马吉(Maggie)追随者，就开始踢他们。我们确实打了一场漂亮仗。

什么样的打架？

弗雷德：咳，并不是真正的打架，因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是相当友好的，但是当你能踢上一脚的时候，你依然要踢上一脚，不过在这之后我们还是很友好的。

你一般在周六晚上都干什么？

保罗(PAUL)：我在一帮人当中闲逛，然后我们打架，吵嘴……你应该知道……

什么样的打架？

保罗：咳，我们偶遇另一帮人，开始向他们扔奶瓶。他们主要是来自桑德兰郊区南海顿(South Hylton)的团伙。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保罗：这样做他们就无法接近我们。

他们接近你们时情况会怎样？

保罗：我们会吵嘴打架。这好好玩。

有人受伤吗？

保罗：没有。

这些打架虽然比其他的打架多了一点有意为之的味道，但它们仍然产生于周六的“无所事事”，而不是产生于某种独立的领地因素或群

体因素。这些打架发生的背景说明了打架的本质。如果这些打架是真实的,那么英国城市的街道将会尸横遍野。它们只不过是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发生的某些事情。

(孟登迎译)

7 吸毒的文化意义

保罗·E·威利斯

编者按：保罗·威利斯对吸毒在大工业城市嬉皮士亚文化群体中所起作用的研究，是他的一项长期研究的一部分。这项研究对两个亚文化群体——嬉皮士群体和摩托车男孩(Motorbike Boys)群体——的生活方式、观点和音乐偏好进行了比较。这篇论文考察了这些群体的人生和价值观，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对于物品、机器和毒品的使用以及所表现出的音乐偏好等诸多因素之间的“契合”关系(the ‘fit’)。从根本上说，保罗·威利斯认为，在一个群体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主观经验与其采用的音乐形式之间应该存在一种“同源关系”(homology)。一个群体所偏好的音乐，至少在它的形式结构上，具有一种潜力，可以表达那些与该群体生活其他方面产生共鸣的意义。至于一个亚文化群体所使用的某些用品与该群体之间的那种更紧密的“契合”关系，威利斯称之为整体构成的(integral)关系，而不是同源的关系。他在他的研究中指出，摩托车本身与摩托车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构成关系，毒品与嬉皮士文化也同样不可分割：“毒品大量地介入到嬉皮士生活的很多领域”，包括该群体与音乐的关系。威利斯有一篇对于摩托车文化的研究摘要，已经发表在《文化研究工作论文集》第2卷(WPCS 2)。这一完整的比较分析，可参见他未公开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流行音乐与青年群体》(Pop Music and Youth Group)(CCC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1972

and in Willis, 1978)。

本篇中所有人物的姓名都做了改动。

有充分的材料证明,嬉皮士习惯性地使用过毒品。一个地方教区牧师的调查显示,吸毒行为曾在当地被广泛接受;而另一份由英国国教会(C. of E.)工作人员撰写、但未公开出版的调查报告《吸毒现场的精神潜流》(Spiritual Undercurrents on the Drug Scene),毫无疑问把嬉皮士当成了吸毒者的原型和范例。缉毒队(drug squad)把嬉皮士的现场看作整个城市进行毒品吸食和非法交易的主要中心。缉毒队还估计,吸毒场所的人数“大约每18个月增加一倍”。毒品也对日常的社会交往(social interaction)产生了冲击:各种毒品几乎成了嬉皮士现场谈论的核心话题,并且嬉皮士们非常重视有关各种类型毒品的知识。人们对警察和社会对待毒品的态度存在着普遍的不满。比较方便采用的一种可以证明这种文化“独有性”(cultural ‘in-ness’)的方式,就是写一篇长篇演说来反击不吸毒人士(straights)对于毒品的“臆想症”(paranoia)。然而,这一切都没能抓住嬉皮士吸食毒品的特殊性。那些我曾经与之共过事的、来自所有不同群体背景的人,他们谈论毒品、拥有毒品、反对警察,并且展现出吸毒者具有的那些清晰的行为标志。罗恩(Ron)对这些团伙中每个人使用的毒品都有最为详尽的了解,可是在“头领的现场”(head-scene)却没有他的地位?在吸毒现场进行试验的每一组大学生,都表现出类似的特征,因此我们无法通过这个原子式的编目(atomistic cataloguing)去发现毒品对于嬉皮士文化的真正意义。

莱斯(Les)就此问题发表的一种意见,长期以来一直让我感到很难理解,但是它提供了一条有助于理解嬉皮士吸毒活动特殊性的线索。他说过,“有可能吃了迷幻药而不产生‘幻觉’(trip),同时有可能在没有吃迷幻药的情况下却产生了‘幻觉’;在‘不吸毒的’社群中会有很多的‘头领’(heads)”。实际上,毒品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们直接产生的生理效应(physical effects),而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途径,帮助吸食者去穿越一个在“正统的”社会正对面矗立的、极具象征性的屏障(symbolic

barrier)。“头”(head)是嬉皮士获得的一个较新的称号,源自一个较为特定的术语“嗜用迷幻药的人”(acid head,字面意思是“迷幻药武装的头脑”),后者更为准确地表现出该文化当中的毒品体验元素。嬉皮士不是单纯用吸毒来界定的,而是由他在这个象征性屏障另一端的**存在性的在场(existential presence)**来界定的。这种在场是**象征性的而不是现实的**,所以,怀有一种“越过障碍的意识”的那些个体,有可能是“真正”的“头领”,即使他们并没有吸过毒。另一方面,那些虽然吸毒却意识不到毒品象征意义的人,并不是“头领”:他们只是试验者。这一屏障“正统的”一面是个人责任、阴郁外表、不善社交和缺乏个性的世界,另一面则是自由、缺乏责任、追逐时髦——“时髦嬉皮”(the hip)——的世界。毒品本质上并不包含这里所说的第二个世界:它们不应被当作经验的缩微胶片秘密地滑进心灵的深层投影仪。它们只不过是一个控制开关,引领人们进入那些本质上自我创造的领域。经过多次解释我才明白,对于早前时期的体验其实是一种“对幻觉的构想”(blue-print for the trip):

瓦尔(VAL):嗯,你必须自己做好准备,我的意思是,可能是你不得不自己做好准备,也许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但是瑜伽(yogas,修行)需要一生的时间,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生。

诺曼(NORMAN):你的“幻觉”充斥着几周前所做的事和你在那个特定时刻的思想状态。

在某种程度上,毒品可被看作是文化上的安慰剂——它是开启体验的钥匙而并非体验本身。但是这并不是说大麻(hash)和迷幻药(acid)没有特别明显的化学效果。它们确实有,主体所能感知到的意识上的变化或许为他的存在性转变(existential passage)奠定了基础——他感觉到**某件事**已经发生了,并为这件事提供了内容。这种变化的生理学基础,同样能够以千百种不同的文化形式体现出来,而且,促成意识发生改变的客观的化学基础,与通过非肉体的(non-physical)方式达

到存在意识的类似状态的可能性,两者并不矛盾。^①就像莱斯在一个讨论中所说的:

莱斯:(提到有关增强和加重意识的体验)可以独自或者使用迷幻药获得这种意识,可以使用任何一种毒品或者在没有任何毒品的情况下获得这种意识,这就是整个事情的关键。你知道,毒品给了你改变自身意识的机会,换言之,它给了你新的洞察力。它们只是提供了机会,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原因、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它们,这就是一大群在现场的乱七八糟的人们所做的事情。“不吸毒者”用喝酒来清除或遮盖意识——

诺曼:——来减弱意识——

莱斯:来降低意识的程度,他们用吸烟来减轻由于他们自身的臆想症所造成的神经官能症的程度;而且,你知道,毒品(shit)常被用来增强某人根据他的感官对他周围环境的感知力(perception)。换句话说,视觉感知或许会增强,但听觉感知肯定是增强了。

尽管毒品只是开启体验的钥匙,但在“头文化”(head culture)当中它们仍然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的位置。它们的使用被仪式和敬畏所环绕。这些仪式通常增加了毒品实际上被吸食的数量,而这些毒品又为特定的文化阐释提供了一种更为强烈的生理反应。这就是毒品与文化之间辩证关系的存在方式。对于“头”来说,任何毒品,尤其是迷幻药,都是一把象征性的钥匙,可以开启那种一直存在的内在体验,但是这种体验只有在象征性屏障的另一面才会完全显现出来。与其说这种象征性的锁钥容许意识进入到陌生之地,不如说它使得罪疚感(guilt)得以从熟悉之地脱离:场景并没有改变。在某种程度上,人们认为一个人使用毒品是在为他自身的意识状态承担责罚,吊诡的是(paradoxical-

^① 参阅Young(1972),他认为,必须从社交和药理学两个方面来理解吸毒行为,这一成果为该领域大量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推进的基础。但他似乎暗示这两者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我的论点是,社会文化因素远比药理学因素重要。——原注1

ly),人们因此又认为使用毒品可以增强意识的自由度。这种信条——“是毒品而非我自己”——让个体暂时看清了在自由和限定之间存在的矛盾和辩证法。从一些很细小的方面看,这种意识在喝酒当中是清楚的;比如,莱斯所说的“当你喝醉酒的时候”,在某个复杂的争论焦点上“往往是很执拗的”,还有下面这段对话中对于缺失自主性的传统刻板印象的调侃和讽刺性认知,都说明了这一点:

托尼(TONY):(提到一个经过长时间争论之后他被迫收回的之前的评论)。你知道这只是,这只是我头脑中最初的原始冲击,我说出来了,并且——

莱斯:你知道那就是你吸毒时惹下的麻烦,伙计,我想要出去马上强奸一个人(大笑)。

托尼:让我们出去强奸一位街边的老太太吧。

比这些局部的例子更为重要的是普遍的象征性领悟——人是由他周围的各种结构决定的。毒品象征着一种根本的存在论的(ontological)变革,即从感觉自我是一个可以自主决定的行动者(agent),到感觉自我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这个世界中一个被决定的变量这种意识的改变。而且,对于文化意义上的吸毒者来说,这种感觉并不仅仅只限于吸毒体验。经济、政治、社会、工业、污染、警察、教育,所有这一切在个体意识中都成为各种决定性的变量。这导致了自我独自感受的责任感的减弱,以及与之相应的内疚感的减弱。但吊诡的是,按照存在主义的说法,对“头”来说,这些洞见的辩证对应物(dialectical counterpart)却是一种急剧增强的个人自由感。他终于可以从那场无休止的个人奋斗中得到休息,去抑制空虚感,去把这个由日常经验得来的常识世界联成一体,他从那些对于常识的一直有限制性的需求中解脱出来了。他已经看透了现实的不确定本性及其表面上的自由,看到了它的真正的社会决定因素。按照嬉皮士经常使用的精神病学(psychiatric)的说法,既存在一种自我迷失(ego-loss),也存在一种对于元自我(meta-egoic)状态的体验。“头”可以驾驭并体验这些力量,而警觉的有自主性

的头脑应该会紧张不安地阻止这些力量。他可以从经验方面上获得自由,因为他个人不再承担把世界联成一体的任务。

你可以不用阻抗的力量,而完全可以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做出反应。你可以放松下来并让它在你身上发生作用;这是一种体验。所有的体验都有其独特的风味让你可以充分地品尝。以这种方式判断,对于那些拼命要躲避这种体验的人,以及那些因在老远的地方就阻止体验的强迫性冲动并使得感受力日趋下降的人来说,即使被毁掉(being busted)也只是一件不幸的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当感受很“爽”(high)时,就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到“头”了;他已经超越了公众世界的强迫。因为他已经看到了生命最终的强制性,并且发现它是自由的,任何东西对他都不能再起作用。当然,当“头”再“清醒过来”的时候,他确实并不感到十分安全,但是这些感觉或多或少都始终存在;甚至对于这个观点的简单理解会将他置于象征性屏障“时髦”(hip)的一面。

对于“头”来说,“正统的”意识和对自主性的日常假设,最终实际上意味着在包含各种潜在的意识状态的全部范围内将意识限定到一粒微型迷幻药丸(microdot)上。这个促成一次历史偶然转向的小圆点药丸(dot)——系数技术(ratio-technical)分析的发现——已经放大了整个已知的观念世界。如果你期望自己离开那个表面上很确定的刻板的循环(tight circle),那么你将自由地进入到一些广阔而崭新的经验领域。毒品被认为是解除现实之表面牢固性的最佳方式,无论你喜欢与否,它们似乎都已经开始瓦解真实的世界。“头”确实喜欢这一点,并把它当作进一步探进的暗示线索,他穿过了这道象征性的屏障。而“正统的”吸毒者并不喜欢这一点,他们一直等待这些线索(the threads)把他们本人再次纳入其中。

毒品,尤其是迷幻药,具有打开被封锁的经验领域的能力,我们的访谈小组经常会对这一点进行评述:

莱斯:实际上你可以看到音乐,而且我已经看见了。我看到它正从扬声器里汨汨涌出来。

瓦尔:你瞧,你被你的全部感官束缚住了,你被触觉、嗅觉、味

觉、视觉和听觉束缚住了,但是你可以吸食迷幻药,通过这个跨越(the crossover),你将不再被你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所限制。

莱斯:通过迷幻药,你走向一种解放全部感官(尤其是视觉)的整体体验。你能够看到其他的感觉,我还没有看到气味,但是我已经看到了声音,听到了色彩……我已经,呃,我曾经通过吃迷幻药“孵出了一个小鸡”,那是我认为我有过的最难以置信的经历,因为全身达到了完全的高潮,呃……,不仅是大脑的神经中枢给了你一种愉悦感,不仅是在龟头,而且遍及整个身体,伙计,在我的指尖,我一次又一次达到高潮。那是一种我一直想要达到的近乎极乐的状态……完全的不可思议,唯一阻止我停止高潮的就是我的体力,我肢体的能量渐渐枯竭。这是最难以置信的经历,因为我正好能感觉到精力渐渐枯竭。我意识到我的肌肉正在逐渐消耗越来越少的氧……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头”与处在象征性屏障“正统派”一面的吸毒者截然不同,他在不断地评述(虽然可能会离题)、同时也吸引别人去关注普通情境下的不寻常之处。尽管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但即使不使用毒品,他总是能够比一个“正统派”在其中看到更多的面相,从中看到更多的光的折射。“头”在“凝视”现实世界,而“正统派”则“控制”现实世界。

这种对体验、对以体验方式控制决定性的做法(the experiential riding of determination)的让步,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当前”的完全贯注(preoccupation)。如果体验就是一切,那么存在(presence)也是一切,而且衡量存在的主要特征就是“当前性”(nowness)。

罗宾(ROBIN):毒品(Dope)意味着一定量的自由,由此……更加意识到现在是什么,你知道……现在是什么(what is)而非过去是什么(what was)或将来是什么(what will be)。你知道……呃……我相信一个人肯定是生活在当下,你知道,这种刹那间的、对于现在的当下体验,我们不管它是真是假,只因为它就是这种体验,而没有其他的原因。我设想我已经进了一所修道院并且沉思

冥想,或许,在大约50年之后发现了与此相同的事情,我已经找到了如何去做,迷幻药只不过加速了这一进程,你知道,相当大的程度上。

由“当下”产生的这种时间压缩(encapsulation),以及这种“随处走走并感受瞬间”的自由感,都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时间观念。工业的、以工作为定向的(job-oriented)时间与秩序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在别的事情完成以前需要做什么——一条规模巨大的、至关重要的意识途径。如果没有这种相当确定的、被广泛接受的时间结构,复杂的线性任务,尤其是那些需依赖不同专业领域加以整合的任务,是无法完成的。时间体验的外部强制在这一方面并不总是有人情味的,正像我们从工厂车间非常普遍的厌倦和沮丧感当中所看到的情况——工人们感觉到在他们自身与工厂的汽笛声之间存在距离的荒漠,汽笛声拉响时有一种让人感到生疏而冷淡的随意性。“头们”非常强烈地感觉到,在生产“幻觉”的过程中传统时间根本是不相宜的。

诺曼:你认识到时间只是人造的,根本不存在“时间”这种东西,它是一大堆的旋塞阀(cock),是人造出来的、对他自身进行计算机化管理的东西。

来自当地教会工作者最常见的一种批评,就是“嬉皮士们”是“如此的不可靠”。尽管出于同样的原因,但如果你偶然遇见了一个“头”而且他对某件事感兴趣,那么他会一直待在那儿不停地讨论,直到把这件事完全搞清楚才肯罢休。没有人会说“我现在必须赶紧走了”或者“我只能稍停一会儿”,以回避一次实际会面的危险。在吸毒体验中感受到的这种对于时间的主观感觉、各种感官的最大的开放性以及自主性的根本缺乏,可以驱散各种常规的厌恶感:客观上令人反胃的处境变得令人愉快甚至令人陶醉。

罗宾:哦,比如我曾经和一个“少女”一起,她呕吐得满地都

是,伙计,我们都真的有几分飘飘然,房间在旋转,我不知道我从哪里开始的或任何别的东西,但是我打起精神要把这些呕吐的东西打扫干净。我当时甚至没有因此而恶心,而通常情况下我会的;你知道,一般来说,其他人若和我处在同一间房子里,肯定会呕吐,我也会想呕吐。但当时我却能赤着双手不停把呕吐物掏起来放到碗里去。

……

莱斯:在巴思(Bath)^①他们有这样一个室外厕所,它肯定有一个足球场那么长,它就像波状钢(corrugated iron)以V字截面呈现的双重弯曲,就像顺着这一边走下去就可以到达另一个边上。

德里克(DEREK):你必须是一个很高的家伙,站在一头。

莱斯:每个人都在撒尿什么的,人们都在做着这种事,只是我处在小的一头,真他妈像一条河一样,“幻觉中”我像在性交,你知道这样很美妙,我真的全神贯注于撒尿了。

德里克:所有的烟头和火柴漂浮着流下去。

莱斯:妙极了,臭味真他妈的糟糕。

自我的丧失、防御反射(protective reflex)的丧失以及对陌生事物的开放,逐渐使另一个禁区——他自身的精神病——向“头”打开了。对产生深度“幻觉”的“头”来说,平时被彻底抑制在我们常规意识中的那些体验的阴暗面,变得与常规体验一样方便可用,而且有时候他们很难把这两种体验区分开来。通常一个人产生“幻觉”似乎就被认为具有临床上的精神病特征,当然,迷幻剂(LSD)最初是在实验室条件下使用的,旨在再现精神分裂症的状态。现在很难确定迷幻药的体验与精神分裂症的体验是否完全相同,^②但几乎无可置疑的是,对很多人而

① 巴思(Bath),英格兰西南部的一座市镇,在布里斯托尔港的东南面,以乔治王朝的建筑和温泉而著名。——译注

② 参看伦敦爱德华国王医院的有关“赖药性讨论单元”的会议记录(King Edward's Hospital, London, 1972:3)。——原注2

言,“幻觉”体验是一次进入“他们天性中的阴暗面”的旅程。

的确,在毒品使用和人们通常熟知的精神崩溃(psychiatric breakdown)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清晰的联系。缉毒队以悲观的方式证明了这一关系。

B:很多时候我们会责备一个在吸毒场所的孩子,他正在讨论着毒品,我们突然意识到不是毒品正在影响这个孩子,而是有一种更根深蒂固的东西在影响他们,于是我们把他们中的多数人送到医院治疗。在医院我们发现,尽管他们避开了毒品,但他们已经患上了一种精神疾病,当然并不严重。你能抓到一个孩子,他会说“你知道,我对‘大麻’(pot)上瘾”。有些医生会把它当作所谓的大麻制品精神错乱病(cannabis psychosis),但是我知道,呃,某些医生的处理方式是这样的:如果有个人到了他们那里,如果他是被送交的,而且是从其他推荐人中被举荐的,医生们会完全忘掉毒品并开始把他作为一个精神病人加以诊断;沿着这条线索,他们也许会发现他有某种程度的轻微精神错乱;你要知道,他就会成为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或者……

然而,尽管在这一时刻我们效仿“头”的能力受到了限制,但我们不应该将毒品使用的各种精神病学面相仅仅归为病理学(pathological)面相了事。那些关于我们正常意识中幽暗而神秘的方面的知识和认识,已经被现代医学知识过度缩减了,而且被它抹黑为病态的东西。我认为,正是在与精神病本身相对峙这一意义上,莱斯最充分地表达了“有些人不吃迷幻药也能产生‘幻觉’”的意义。如果你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这些幽冥地带(nether regions)的存在,就有可能在不接触毒品的情况下进入象征性屏障的“时髦”一面。

这里存在着一种与嬉皮士场景的发展——从远离毒品到走向宗教——相关的联系。^①由于表面上与毒品脱离了关系,这种发展从外表

^① 加利福尼亚州的“耶稣—怪胎”运动(Jesus-Freak movement),现在已蔓延到英格兰,就是

上可以被看作一种“健康的”发展,但其实它在象征意义上与吸毒体验非常接近。这与每个人试图更加充分了解自己有很大关系。因此,对于毒品的使用和感觉并不受限于直接的吸毒行为,也不受限于与吸毒相关的行为因素。吸毒的真正意义,在于让人走到了一个巨大的象征世界的入口处。一旦进入到这个世界,毒品的实际存在就不是人们首先要关注的对象了。

一个人不使用毒品也可以获得“快感”(high),而且若没有吸毒的体验,常规体验的性质也可能被改变。在某些方面来说,那条穿越象征性屏障、把“正统”面与“时髦”面分离开来的通道,给我们呈现出一个经典的信仰悖论。无论你是否理解,我们无法用逻辑论证来填补这一鸿沟。同样,我们也无法向一个怀疑者——尤其是一个已经认定你“有病”的怀疑者——证明这个象征性世界的存在。“正统的”局外人或许想到的这类问题,在圈内就显得毫无关联,甚至询问某些事情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这位发问者永远不可能领会这些答案的意义。对心怀善意的机构和富有同情心的群体来说,毒品文化的这种“第22条军规”因素是一种特殊的烦恼之源。它构成了从外部领会这种文化的最大障碍之一。对各种“起因”、他们的隔离以及他们最终的改变的关注,还有对从软性(不会致瘾的)毒品逐步过渡到烈性致瘾性毒品的升级过程的关注,都构成了绝大多数试图理解毒品文化的努力的基础。它们都旨在让吸毒者重申他自己在这一因果链条中的自主性。这些办法根本不会达到“头”体验毒品的真实状态。在“头”看来,当你明白了你自身的决定因素所具有的辩证性质时,同时吊诡地发现,当你知道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受外部因素决定时,你才能最自由地去体会意识的完整丰富性。你那被扩充了的意识,以其包纳一切的无限威力,可以将常态意识(*normal consciousness*)看作一件极其不重要的、世俗的、受到腐蚀的、无足轻重的平庸小事(*world-work-soiled-mean-little-affair*)。回归

这一事态发展最明显的例子。——原注3 补注:“耶稣—怪胎”运动是20世纪60至70年代在美国西海岸发生的基督教运动,它将基督教元素引入嬉皮士反文化运动,该运动的成员被贬称为“耶稣怪胎”,但他们给该词赋予了积极的自我定义。——校注

这个社会的劝诫仅仅证实了“头”的新体验计划。劝诫者仅仅是那个“无足轻重的平庸小事”的构成要素,而且支撑他的这些意见的工作/职责基础表明,这件事仍然与从前一样“无足轻重”。

从他们各自的方面看,吸毒者对社会工作者的了解程度远远超过了后者对他们的了解程度。对毒品现象进行客观的、因果关系的理解,与沉溺于吸毒行为获得真实的体验特性之间,存在的最大的分歧点就在于这种对于自由的相互矛盾的看法。对于“客观的”群体来说,自由是自我负责任;对于“主观的”群体来说,只有当你不再为自己负责时你才真正获得自由。“头”不愿意真正试图去反驳外界对于吸毒的各种界定,这又加重了形势的复杂性。劝诫者感觉毒品通过某种神秘的方式获得了对吸食者的更深层的控制,并且超出了吸食者正常的交流能力。劝诫者会加倍努力,诉诸那个原本有自主性的自我所留下的东西,让它去赶走那个邪恶的入侵者。反过来,“头”只会更加确信这一点:劝诫者永远无法明白“真相”。

这种“信仰理解”的意识,或者把理解当作一种直接感知印象的意识,很明显地波及到了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他们无法容忍那些随意的和外部的解释,他们渴望对某件事进行体验,而且对体验-解释(experience-explanation)的外在框架都感到腻烦。这一点与“头”文化中所激活的这些感觉有很明显的一致性:与系数技术的理解形成鲜明对比的体验,或许是整个运动最主要、最普遍的共享原则。这并不意味着语言是多余的,恰恰相反,嬉皮士文化是高度言语化的(verbal),但是他们使用语言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真相”或者对于过程的客观共识。通过一些得体的、复杂的、不时带点恶作剧意味的暗示、反向暗示、对比、悖论和惊奇手法,语言被当作一种激励情感和领悟状态的手段来使用。很多东西没有说出来,以待人们去猜度。言语仿佛用这种氛围中的原料雕刻出了多种形态,而不是要试图客观地再现这种氛围。

这些感觉,加上对当下的超常专注、转变日常体验的能力特别是面对精神病患者的勇气,一起使“头们”成了产生神秘体验的沃土。这种体验很可能发生,尤其是通过一种由迷幻药产生的“幻觉”,最终把个体推放到象征性屏障的“时髦”一面。一般的人很难搞清楚这种体验

的实际本质,它是为这些“头们”准备的,尽管他们喜欢谈及它,但这是他们所有人最难以说清的体验;除了它本身谁都不能把它明确地呈现出来。在“头”的毒品世界里,这种神秘体验是体现核心价值观的最典范的象征和标志。它将最终让个人无法达及日常世界及其对于自主性的坚持。如果你是宇宙意识的一部分,是上帝的一部分(实际上你是上帝),那么,关于因果关系和个人自主的一些观念就是你对生活中一些很细小的片断的误解,你已经完全超越和吞没了这些生活片断。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是构成你的元素,因此,你怎么能自己对自己开战呢?

在“头”的吸毒场景与东方的宗教和文化之间,有一个交汇点。我们对于这些宗教几乎没有什么详细的了解,一种博学的(knowing)外表下面常常掩盖着深深的无知。东方世界因其地理位置被我们更多看作是一种隐喻,而不是确实实的对应物。我想要说的是,关于东方世界客观知识的缺乏,并不会削弱那种指向东方隐喻的体验的真诚性(genuineness)。下面就有几个例子,是从一些自然组合的群体对于迷幻药神秘体验的叙述录音带中选取的:

莱斯:我相信存在神性,而且我相信生命的纯粹活力(pure energy),通过迷幻药我已经发现了很多这种东西。它一度曾是我生活中非常虔诚的一件事情。

德里克:是的,但是我相信有一个精神头领(figurehead)吗?

莱斯:是,在我现在的头脑中,我把《易经》当作我的《圣经》,不管你怎么称呼它,就是中国的那本谈变化的《易经》。

诺曼:你认为你现在正在做的、正在体验的以及你所获得的知识对你有帮助吗?

莱斯:当然了。

德里克:体验就是生活。

莱斯:它将成为最大的收益,这不仅是对我自己而言,我希望对我的伙伴也如此。我相信当我认真翻阅《易经》的时候,我看到了《易经》展现给我的卦象。在某个特殊的时刻我不仅设法按照这些线索去过日子,而且我相信,我按照《易经》、按照我自己对人性

的看法,按照我对神性、对纯粹的生命活力的观点所做的一切,都将使其他人——包括紧邻在我身边的人和我所认识的人——的情形变得更好。我欠社会的债(如果你愿意那样表达的话)就是我欠同伴的东西、我欠自己的东西。

……

莱斯:是的,因为东方人的宗教观念与迷幻药或者宗教的迷幻观念有很多共同之处。

瓦尔:西方人的观点认为上帝是先验的存在,换句话说他是从这个世界分离出来的,如果你今生是个好人,你将会进天国。

(大笑)

你们都知道你可能与上帝成为一体,但是东方人认为上帝是内在的(immanent),我们是上帝内的上帝(God in God),你知道,上帝就在我们的内心里,这正是迷幻药所给予你的。

迷幻药引发的超凡体验在其中的介入,并不像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毫无意义的。首先,整篇论文的中心论点是,毒品的至关重要性不在于它们的药理学特性,而在于它们可以转入一个更大的象征系统(世界)。尽管毒品开启了进入这个世界的通道,但是象征世界本身却具体地呈现于并完成于共同的、日常的人类生活过程当中。这种超凡的体验更多是栖息于这个世界的结果,而不是某种作用于大脑的化学药品所带来的产物。其次,即使暂时假定化学因素比文化因素在决定意识的时候起的作用更大,它仍然不能证明神秘事件的经验完整性是无效的。无论构成它的原因是什么,它依然被体验为真实的东西。不能依据成因来评判体验;只能根据它的性质和对生活产生的效果来进行评判。

一种亚文化的药理学

尽管我一直在用一个巨大的象征性分界线来描述“头”的吸毒场景,但这些“头”本人确实已经在不同类型的毒品之间做出了更复杂的区分。大麻(hash)是所有毒品中最基本的共通品,是最普遍被用的毒

品。以正确的方式使用它,并给它赋以适当的象征意义归属,是构成“头”体验的一个真实的要素。但是很多的其他群体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该毒品,也是被认可的。迷幻药(*acid*, 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完全被看作是一种效力更强大的、在文化上更为积极的毒品。尽管有可能吃了迷幻药而不出现幻觉,这是一种非文化的使用,但是人们一般认为,“不吸毒的人”很可能仅仅吸食一次毒品,然后就会被“吓跑”了。很多现场的嬉皮士成员也惧怕这种毒品,而且大家普遍认可这种毒品具有很大的潜在危险。那些害怕这种毒品的嬉皮士成员并不是外群体的人物(*out-group figures*);他们是更广泛的象征性世界的组成部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明白有规律地产生幻觉是什么滋味。但是他们不使用迷幻药这一事实,使得他们永远不能被视为“真正的”“头”。真正的“头”也不会不加选择地使用迷幻药,他们明白有成为“迷幻药上瘾者”的危险。他们定期地、谨慎地使用它,一丝不苟地为这种体验做好准备,或者精心地调整自己的兴致,让迷幻药在其中能够顺利产生效果。

正如迷幻药的效力比大麻强,海洛因(*heroin*)的药效比迷幻药强,但是它在文化上缺乏相应的方式。海洛因的各种危险人们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但是对那些完全对海洛因或可卡因(*cocaine*)上瘾的人,我们没有真正的怜悯;人们的态度是平静的,完全取决于他自己,如果他接触海洛因了,海洛因肯定对他很重要,这是他的幻觉体验。过去我没有和任何重度毒品上瘾者一起工作过,按照缉毒队在60年代中期登记的人数,该城市有毒瘾的人数已经下降到了个位数。海洛因是一种在现场不被过多提及的毒品,如果你正在吸食它,即使是偶尔吸食,那么只有你最亲密的同伴会知道。一个我非常了解的“头”确实告诉过我,他过去偶尔吸食过海洛因,只要你谨慎地核实吸食的数量,控制吸食的频率,并且能固守“皮下注射”(skin-popping)而不是“长期服用一定剂量”(maintaining)的话,你就能避免药物依赖以及所有随之而来的恐怖。的确,尽管毒品的危险已经广为所知,但是这种恐惧与人们在“正统”社会所遇见的那种对毒品的恐惧并不一样。它仅仅被看作一个强有力的中介(*agency*)而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adversary*),在通常情

况下需要避开它,但在极端的情形下却要欢迎它。我认为,在现场会有很多克制的海洛因吸食和谨慎的皮下注射,这种情况比大多数管理机构了解到的要多很多,尽管对于这一点我没有相对可靠的证据。

海洛因的文化意义,似乎主要在于对假定的身体不可逆性的象征性延伸当中。转向海洛因并不只是穿越那道将“正统”面与“时髦”面分开的象征性屏障,还是对那些与正统社会相关的各种交往的不容争辩的关闭(unanswerable closure)。在有些方面,通过海洛因穿越的这一通道(passage)与通过迷幻药穿越的通道在文化意义上是相似的,但是通过海洛因,你不仅让这一通道通向了极端的程度,而且你已经破釜沉舟,永不能回头。在某种意义上,这使得海洛因成为毒品文化意义的极致表现。它表达出对于超越这一屏障的各种意义的归属感,而正统派从来不会去理解这一点,正统社会也根本不能把你从这里带回来。另一方面,由于海洛因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承认了象征状态比真实的生理状态更有优势;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可信的。它的意义必定是死寂之前的最后一次,你将会死亡——这是一条多么无懈可击的、反正统的、占优势的、“剩下可走的”时髦道路——但是你仍然会走下去,而且那就是你要付出的高昂代价。在这个意义上,海洛因的文化意义与“头”场景中使用的所有毒品在药理学基础方面最为接近;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文化的还是药理学的方法都只有承认使用它(海洛因)的最终代价就是死亡,尽管在每一种情况下有关通道的意义很不相同。

安非他明(amphetamines)和巴比妥酸盐(barbiturates)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有点超出了主流毒品的范围。它们不像兴奋剂(dope)和迷幻药那样在“头”场景占有中心的位置。它们通常与其他文化群体有更多联系。在嬉皮士场景中,它们似乎更多是临时被使用,用来保持意识清醒,或者是为某一项或另一项任务的完成提供可能。当它们以适当的象征形式被使用时,它们产生的效果在文化方面与大麻体验的强度大致是相宜的,但是在我看来,这两种药丸似乎并没有以这种方式被广泛使用。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更容易接受只“吸”(blow)一次,除非存在某种特殊原因要迫使一个人长时间保持活跃状态。由于存在毒品供给上的问题,当没有其他东西可用时,这两种药丸就会被使用。在一种

带有牢固的符号结构的毒品文化中，所有的毒品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任何一种毒品都能产生相应的效果。该文化的核心成员们差不多已经试用了一个人所能想到的所有毒品，而且，碾碎的巴比妥酸盐偶尔也被当作海洛因的替代品用于静脉注射，也是有可能的，但这是一种我个人还没有遇到的做法。

这种按照“头们”的看法对于不同毒品等级的描述，不应该被当作传统理论意义上所认为的那种毒品吸食会“逐步升级”的证据，好像对（不会上瘾的）软性毒品的使用必然会导致对（让人上瘾的）烈性毒品的使用。尽管在现场所用的各种毒品之间存在认知上的差别，但是从使用这种毒品到使用另一种毒品的移动步骤却取决于各种意识状态；而对于这些意识状态，从文化意义的角度去理解要远远好于从毒品固有特性的角度去理解。的确，只有在海洛因这一种毒品身上，归结于毒品的文化意义与毒品的客观药理学效果之间存在明确的联系。从一种毒品到另一种毒品的文化移动，相对独立于它们的药理学特性；有可能在不使用毒品的情况下逐步上升到了另一种意识，也可能使用了毒品却没有带来这样的意识提升。与那些外部当事者相比，吸毒者更熟知从大麻向迷幻药转变的本质，尤其熟知从迷幻药向海洛因转变的本质。一个个体或群体一旦进入到了毒品的象征世界，仅仅消除毒品将收效甚微，“头”很快会找到另一种将他自己置于非吸毒者之上的方式，或许让传统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在海洛因层面，文化意义与药理学意义出现的这种大范围的一致性，意味着传统的逐步升级观念在此刻也有一定的道理。

（郑寰 郭成功 译）

8 穿越镜像的民族志研究

杰弗里·皮尔森 约翰·托劳治

编者按：保罗·威利斯对于嬉皮士文化群体中的吸毒行为所做的研究(本页下文摘录),坚定地继承了符号交互论和民族志等传统,这些传统与霍华德·贝克尔、戴维·马茨阿(David Matza,或译“大卫·马札”)以及其他在越轨社会学(sociology of deviance)领域有共同研究取向的作家有关联(进一步的阐述,见本书最后一部分由布莱恩·罗伯茨和史蒂夫·巴特斯所做的评论)。也就是说,接续贝克尔在《局外人》(Becker, 1963)中研究大麻的论文,威利斯更多强调了从社交方面构造、从文化方面界定吸毒体验以及在亚文化使用环境中了解吸毒体验的途径,而较少强调各种不同的毒品所具有的生理和药理特性。因此,威利斯在建构他的吸毒类型学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演员”来界定他们体验的方式,也是以他自己的民族志观察为支撑的。严格说来,威利斯认可不同的毒品都有生理效应,因此各种文化界定必须被视为是“让这些效应在社交方面富有深意”。这接近于乔克·扬(Jock Young)在《吸毒者》(The Drugtakers)中的观点(Young, 1972),扬在此书中论及“药理学和文化之间的匹配”和“毒品效用的文化构造”。皮尔森和托劳治对于吸毒现象的研究(下文摘录),则强调了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毒品使用的亚文化环境对于吸毒体验的影响,要小于各种不同的毒品性能和吸食方式——他们称之为“摄取技术”——对于吸毒体验的影响。根据这种更“唯物主义的”——有人会

说,更生物决定论色彩的——解读,皮尔森和托劳治对贝克尔的整个“意义社会建构”方法及其依赖的民族志研究根基展开了批判;他们指出,后者容易变成被普遍接受的社会学教条,变成没有物质和实践基础的意义社会学。

对越轨亚文化群体的民族志研究,沿着文化的内部代码进行并且“实话实说”。至少它说要这样做。那么,当我们把民族志学者的文本拿给越轨亚文化群体的成员们看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他们会不会从民族志学者对他们经验的言说中认出自己?他们的想法(对于民族志学者所认为的他们的想法)是不是对民族志成果的最终检验?或者,民族志除了毫无保留地反映(研究者的)理解(*verstehen*)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一些隐蔽的功能(某种貌似可信、时髦并引人注目的东西)?

我们的方法是一种笨拙的、有点平淡无奇的方法,要对民族志提供的东西进行质询(Pearson and Twohig,未标日期)。我们问吸毒者对于霍华德·贝克尔的“现象论”——解释吸毒者如何从内心体验吸大麻的感觉——的看法,我们还尝试比照我们在越轨亚文化群体内部发现的差异来对应他们的意见。我们现在不会用这种方式处理问题。不过,我们这种笨拙的方法提出了一些严重质疑霍华德·贝克尔的民族志研究的问题,质疑社会学家们把他的研究成果当作教义问答书进行世代相传的行事方式。

首先,我们将复述贝克尔的论点。然后,将对我们自己的民族志材料作简短的展示,这些材料包括越轨群体是如何回应贝克尔的民族志成果的。最后,试图得出一些结论。

对毒品诱发的体验的社会建构

霍华德·贝克尔的《成为一名大麻吸食者》和《大麻使用和社会控制》这两篇文章是他对于越轨行为社会学(the sociology deviant conduct)的基本贡献(in Becker, 1963)。这两篇文章与他后来对于迷幻剂(LSD)精神病的考察文章——《历史、文化与主观体验》(in Becker,

1971),都一同变成了社会学的至理名言。贝克尔认为,毒品的体验效应并不是直接的化学效应。相反,它们被那些附属于吸毒行为的文化意义所调节。最关键的一点,“一个人如何体验毒品的药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人为他界定那些效果的方式”(ibid:311)。

贝克尔认为,期待、估价和文化界定等因素产生的效果(总而言之,即对于由毒品诱发的体验的社会建构)非常重要,以致某个吸食了毒品的人“甚至在这些毒品已经产生很明显的生理效应时候,他可能还完全意识不到毒品的一些药效”(ibid:310)。一个人“处于陶醉状态”,从贝克尔的观点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人受到毒品之外的某种东西的影响。贝克尔对于吸毒行为所持的这种现象论,因此在生物学(或药理学)与文化的交叉点上起作用。

贝克尔探询了大麻吸食者的吸食生涯——从新手直到可以从吸食中获得极致快感体验(或像贝克尔所说的“乐趣”)的经验老到者。他认为“成功的”大麻吸食行为并不是由毒品的药理性质确保的,而一定是学会的。这种学习发生在三个阶段。

1.学会独到的技术:“初学者在第一次吸食大麻的时候往往感觉不到快感,要达到这种状态通常必须经过数次尝试。对这一点所做的一种解释就是,毒品没有被‘正确地’吸食,也就是说,没有能确保有足够的剂量来引发真正中毒的症状。”(Becker,1963:46)贝克尔认为,在缺乏这种技术诀窍的情况下,毒品不能被视为潜在愉悦感的东西,“大麻吸食被认为毫无意义且不会持续”(ibid:48)。

2.学会去感知效果:“甚至在学会正确的吸食技术之后,新手依旧不能感受到快感,因此无法形成一种把毒品当作可用来获得极致快感的观念。”(ibid)贝克尔认为,问题在于初学者需要学习辨别毒品的效果。这些效果并不是不言自明的,也不是不言自明地与毒品的摄入相关联的。因此,对于这些效果的感知,必须通过对毒品文化的参考来指明,也必须通过对毒品文化的参与才能获悉;也就是说,新手是从那些有经验、有影响力的亚文化成员那里获悉什么是“陶醉状态”的。在这儿我们可以指出,药理学的重要性在贝克尔的社会学中开始消退了。

3.学会去享受效果：“如果一个使用者现在已经知道获得极致快感的方法就是持续使用,那么还有一个步骤是必需的。他必须学着去享受这些他刚刚学会体验的效果。”(ibid:53)贝克尔说,化学方面导致的效果是难以分辨的;处于“极致快感”状态并不是不言自明地令人愉悦的,因此,大麻使用者应当真正搞清楚,只有在毒品使用的过程中(而且在毒品开始起效时)寻求快感的动机才促使吸毒者去使用毒品。依照贝克尔的观点,知道“让人产生快感的”事情是什么,并且知道它是以何种方式“让人产生快感的”,这些行为会再次受到由老练的吸毒者形成的亚文化的调节。

总之,贝克尔要说的是,在理解有关对于毒品诱发效应的主观体验时,应当把药理学放在次要的位置来考虑。主观体验将取决于各种预期、环境以及文化上的限定意义等因素,毒品的药效并不是直接的;它们受文化的调节(和支配)。

“霍华德·贝克尔,更换你的考察对象!”

再重复一遍:贝克尔的文章已经被现象社会学(phenomenological-sociology)当作理论信条接受了。戴维·马茨阿以自己的权威地位来阐述这一立场,他指出:

在《成为一名大麻吸食者》一文中,人的社会学概念变得非常富有人情味(human)……(该篇文章)可以被视为一剂“处方”,准确地总结了应当如何去做那些人们一直有点不经意在做的事……也许用“如何抽大麻”做标题更合适。

(1969:109 - 110)

马茨阿详细地发展了这条权威性的建议;它被尊奉为一种新的社会学正统观念。比如,一位英国作家最近还在响应贝克尔-马茨阿公式:

成为一名(大麻)吸食者的过程……包含获得一种既能识别、

又能学会享受毒品药效的能力。这些药效既不是自明的,也不是本质上就令人愉悦的。的确,有日渐增多的一批观点认为,从药理学方面来看毒品差不多相当于安慰剂罢了。

(Auld, 1973: 569)

而下列所述,则是对一些挑战这一正统观念的证据的简要概括。

我们想问一些问题:是哪种关于吸毒的“现象学”忽略(或消除)了药理学?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结果——社会学家们愿意轻信这种对于毒品毒性效应所做的去毒性的(de-toxified)解释?但我们首先要问:毒品吸食者(与社会学家完全不同)为了养成他们的习惯是如何回应这个“处方”(解释)的?

有一个富有吸毒经验的人,向我们概括了其中一个核心问题。贝克尔曾经指出,新手需要学会感受毒品的药效。那么这个人自己的体验如何?“感受毒品的药效???噢!(他长笑一声)药效正好像……轰轰(WHAAM)!!!……就像木槌敲击后脑勺……贝克尔那家伙应当更换他的考察对象(dealer)!”他最初是与他的哥哥和一群朋友学会吸食毒品的。从他所说的话来判断,他已经吸食了大量卷进大批烟草“烟卷”中的大麻脂。他说,他受“毒品影响”,就像长时间处于迷醉状态,最后听着音乐睡着的样子。他这种强烈表述的体验——大麻的药理作用强加到他身上(并没有亚文化的调节)——代表了一大群吸毒者的想法,他们并不承认自己可被归于贝克尔所说的现象论。对于贝克尔的社会学解释的愚蠢及固执,有许多粗鲁的评论;有几种观点取笑说,如果贝克尔所说的(吸毒)主体需要学会发现药效,那么他们已经受到了一种“虚假的对待”(bum deal)。

我们可以把这第一种技术称之为老练的技术(*heavy technology*)。这种体验并不是普遍的,(我们访谈的)第二个人可以代表另一个亚群体(sub-group)的看法,这些人使用大麻的方法有所不同,包括不同的吸食技术和显然不同的药效。在一次聚会场所,当一个朋友传给他烟卷时,他最先吸到的就是大麻(1967-1968年在英国)。他盼望“鲜艳的颜色……就像我以为迷幻剂(LSD)会产生那种……有几分迷幻效

果”，但是他获得的是一阵咯咯的笑声。“我们中的一些人讲了许多乏味的笑话……我已经喝了很多烈酒，葡萄酒，啤酒，而且我或许已经有点喝醉了。”他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参加聚会时，为了好玩偶尔也会吸大麻。他说，毒品并不总是能起作用。

在很多方面，这些第二种的吸食者——为了追求刺激在聚会和聚集时使用毒品，它的药效一般能够识破酒精造成的迷糊——更符合和接近贝克尔有关毒品使用经历的看法。毒品的药效据说是相当不明确的。它通常看起来并不一定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就起效，而且有些人在那个阶段还会停用。“爽的快感”究竟代表什么，几乎很难辨识。我们把这第二种吸毒方式称为**聚会社交技术**(*party technology*)。

我们的看法是，这两种亚群体的重大差别就在于吸食技术(毒品如何摄入)和不同技术所产生的不同药效。预期、文化和环境似乎并不重要。仪式有时围绕着毒品使用，但它是广泛变化的，并没有显著的形态。在所有情况下，把不同药效模式、不同亚文化生活方式和不同吸毒模式连接在一起的东西就是技术。为了简洁起见，我们在这里只提到了两种技术。

有些吸食者在这两种不同的技术之间自如地移动，而且体验着不同的药效。例如，一位女性偶尔会在聚会上吸食(并且享受)大麻——也是在饮酒之后。她随后结识了一群有老练吸食技术的“头”：“感觉太不一样了。有点强烈并让你慢下来，或者看起来好像让你慢下来，而且你可以真正地享受音乐，始终不想傻笑和说话……几乎没有任何交谈。”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在此所谈议题并不是在描述“环境”的影响，而是在描述不同技术产生的不同效果。虽然我们并不想否定“环境”影响的可能性，但是这类证据只能作为一种修正，补充那些只强调“环境”的片面的社会学观点。

同样，说技术(因此说药理学)是决定毒品效果之主观体验的主要因素，并不否定单个的吸毒者的意图(哪些东西会吸引他们去吸毒，或者哪些意识形态会环绕吸毒过程)或选择(或者放弃吸大麻，或者觉得这是一种技术而更愉悦)。例如，这位女性会这样说“头们”：“他们无所事事，大量吸毒，的确恍恍惚惚，闲坐在一起听音乐——软机器乐队

(Soft Machine)^①或平克·弗洛伊德乐队(Pink Floyd)^②或者类似的音乐……真的恍恍惚惚……但仅仅是四处闲坐而已。那根本不是我感兴趣的東西,只是太被动了,太厌烦了。”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她在此处排斥的并不仅仅是生活方式(即文化),而是技术。

社会学帝国主义,盲点和陶醉(ecstasies)

我们的证据有助于深化对因毒品诱发的体验和吸毒亚文化群体的理解,但它依然是老旧的。但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目的过去是、现在依然是质询最近流行起来的“交互论的”、“现象学的”和“内幕人”的社会学。回到我们的问题:首先,如何解释民族志学者关于吸毒的著作与吸毒者的体验之间存在的差异?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并不让人感到有什么奇怪的。(我推测)贝克尔所抽取的调查样本,是20世纪50年代在爵士乐、爵士乐俱乐部和日益勃兴的比波普爵士乐**前卫**风格(bebop)的环境中生活的美国亚文化人群。(实际上,他并未向我们太多提及他所描述的场景的其他文化方面,而这是他关于吸毒的民族志研究最大的缺陷。)我们的考察对象选择的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后-“花儿”权力(post-flower power)^③和嬉皮士的一代,主要是英国白人中产阶级的青年。这两类亚文化人群(以及他们的宏观文化语境)是截然不同的,而且他们的体验也是很不一样的;也许贝克尔是正确的,而我们的研究仅仅显示了文化价值和“环境”是如何影响人们对于毒品药效的感知的。

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证明贝克尔的研究是正确还是虚假(就像你怎么能证明表意性的观察结果?),而是要理解他的民族志研究是如

① 软机器乐队(Soft Machine)于1966年在英国坎特伯雷(Canterbury)成立的乐队,名取自美国垮掉派小说家William S. Burroughs同名小说。早期与晚期的作品相当不同,特色在于以实验精神将摇滚乐不同探索时的创作变成融合爵士乐倾向的过程。——校注

② 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摇滚乐队1965年成立于英国伦敦,最初以迷幻与太空摇滚音乐赢得知名度,而后逐渐发展为前卫摇滚音乐。——校注

③ flower power,字面意思是“花儿权力”,其实指“爱情与和平”的权力,爱的权力。“花儿权力”是嬉皮士的口号,仿黑人权力(black power)一词构成。——校注

何被社会学家们作为信条承传的。换句话说,一种包含着某些令人迷惑的假设的特定研究,是如何通过社会学家们的行业规则变为具体化的信条的(并被奉若神明的)。我们关心的是民族志研究的意识形态内容及其背景假设。我们的支持者已经在别的地方充分地发展了那些在现代越轨社会学当中被遗忘的意识形态主题——我们所谓的“理论味”(Pearson,1975:Part1)。我们在这里仅提出几条简单的结论性意见。

1. 吸毒者告诉我们,在霍华德·贝克尔的研究中毒品所起的效用一定是微弱的;我们说在他的理论中药理学是一个弱项。他的理论的背景假设声称:生物学并不见得有那么重要。

对专业的社会学家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便利的假设,它说明这个世界需要专业的社会学:从字面意义看,社会学被认为超越并绝对决定着(over-determine)生物学和药理学。因此它激励了社会学帝国主义(在这里要做的重要之事,并不是从事批判性的研究,而是去捍卫社会学的方法和原则)和抽象的社会学奇想的盲点:正如在这种有关吸毒的民族志学当中忘记了毒品一样,(例如)在围绕药物社会学的民族志研究中,完全忽略了研究对象应该是医疗保健和为人民服务。相反,我们不知不觉掉入了一个去政治化的(de-politicised)和去道德化的(de-moralised)现象学的世外桃源(幻想之地)。

2. 对于毒品毒性的低估,也很符合左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张“软”毒品合法化的潮流。这种意识形态的背景假设再次明确地简化毒品控制中的道德-政治难题。理论上的假激进主义充当了面对人类实践困境的借口。

3. 那种认为个人经验中最亲密的那些方面也被社会建构的论点,反映了(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持久存在的)那种担忧,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覆盖了私人生活的各个角落;现代性以及现代社会的“一体化”侵犯到(并威胁到)人类主体性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在缺乏主体的大众社会,民族志研究给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满怀希望的娱乐资源。因为,这种研究本身对于隐私的侵犯(它被称为研究)看起来似乎在重建和赞美日常生活中的微观细节。这样,民族志的流行并不仅仅显示了一种担忧;它还提供了一种解决他们所

担心的问题的神奇的方案。

民族志因此加入了疯狂的竞争,要将我们受到威胁的主体性解救出来(c.f. Jacoby, 1973:37 - 49)。对于我们生活中那些隐藏的深度甚至有可能也被充分定额化(well-normed)并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人们感觉欣喜若狂。但是,如果主体性隐私受到威胁,那么民族志研究是不是一种反对这种威胁的方式?科林·弗莱彻(Colin Fletcher)做出的一种恰当的评论概括地总结了民族志的脆弱美学:“定性研究是……在战争的间隙……得到实践和发展的。”(1974:140)

(孟登迎 译)

9 群居公社

科林·韦伯斯特

编者按：探寻某种不同于核心家庭的集体的或群体的社会生活安排，一直是中产阶级“反主流文化”的中心主题。像科林·韦伯斯特在此揭示的那样，虽然公社“运动”关注的是一些非常不同的主题，但它体现了青年人对另类生活方式的积极探索：即使许多其他并不主动把“公社”当作完美理想的年轻人，也会花时间通过其他各种行动去尝试某种公社生活的风格。公社因此为反主流文化运动提供了一种关键的“另类选择机制”。在本文中，科林·韦伯斯特（由伯明翰理工学院安排到本中心来做一年研究）对公社运动的主要演变提供了一份粗略的“主题类型学”成果。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爵士喜好一语双关，他所说的乌托邦(Utopia)既是乌有之乡(Outopia)的代称，意味着并不存在的地方；又是优托邦(Eutopia)的代称，指一个美好的地方。

(Mumford, 1922)^①

据估计，1970年在美国约有2000个乡村公社(rural communes)、数

① 此段话引自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1922年发表的著作《乌托邦的来历》(*The Story of Utopia*)，芒福德主张科技社会同个人发展及地区文化上的企望应该协调一致。——校注

千个城市团体(urban groups),在英国也有将近50种不同类型的、正式的公社试验组织(communal ventures)。^①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大城市里基本上都有公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德国青年1967年在柏林建立的两个广为人知的“公社”——“一号公社”(Kommunes 1)和“二号公社”(Kommunes 2)——的影响。

我们在此只想通过草拟一份主题类型学描述,来对1965年到1975年间、在一些对主流社会不抱幻想的(disenchanted)青年当中开展的社会运动进行考察。这种类型学描述主要依据的是社会学家们的实证性田野调查、公社社员的出版物以及对于个人经历的各种记载。

乡村田园的主题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回归乡土”(back-to-the-land)运动中形成的一些公社当中,这一主题得到了实际的体现。这种体现方式内部包含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张力,即在支撑这场运动的思想基础,也就是人们对于大自然(nature)的各种理想化的或预想的看法(如把大自然视为荒原还是天堂、沙漠还是花园、恐惧之源还是救赎之源)之间、在这些理想化的思维与实现它们的经验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在参与这场运动的各种仪式化的、表达化的活动当中,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些矛盾获得符号(象征)形式的一些途径。因此,以最广为人知的乡村公社为例,在同样的总体发展轮廓之内,它既可以呈现为肯·凯西(Ken Kesey)和普朗克斯特斯(Pranksters)所代表的那种高度介入的、积极活跃的,甚至有狂欢舞蹈和吸毒行为的躁动风格(参看Wolfe, 1969a),也可以呈现为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和他的追随者在纽约米尔布鲁克区(Millbrook)所代表的那种沉思的、反省的、消极的、“冷静的”(cool)、身穿白袍的、超凡的风格(参看Leary, 1970)。

公社运动的主要参加者是城市中产阶级青年,这场运动的合法化是通过自然、隐喻、期望和对一种自然体验的怀旧感而实现的,尽管他们本人或他们的父辈实际上并没有经历过这种有关自然的体验。由于

^① 对比性的估计见Rigby(1974a)和Melville(1972)。——原注1

人们在美国历史上寻求到了各种重返本源的原型,重返本源的行动从历史上就被合法化了,并且在这一时代就被付诸实践,这些行动在“当下”呈现为一种尚古风气、自甘贫苦(选择性贫困)、反技术的倾向以及性放纵。这些行为有时呈现出极端的表现形式,如“末世论裸体主义”以及性自由的形式,充当了“天堂”的仪式性预言。乡村主题的末世论原理也呈现为一种“世界末日审判”的形式,既呈现为某种经验性的感受(他或她从都市中产阶级世界终结中自觉隐退的体验),也呈现为环境污染、生态灾难、种族冲突及战争的意象以及支撑这一意象的“恶魔化的”技术官僚制度。群居公社这时候就变成了一块“救赎残存之地”,以仪式性的、实用的方式预先享用了天堂,认为紧随衰朽的“恶魔现实”逝去之后,天堂就将到来——弥赛亚式的“千禧年”观念在此成了主导性的思想。与此紧密关联的是,通过对迷幻药的广泛使用(尽管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唤起了一种重新扩张领地(re-territorialising)和人的整体潜能意识。这些“指向内心景观的回访”,与对各种自然喻象的无限制的空间探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然空间在这里被体验为某种边界或阻隔,对它的克服开启了一系列的选择项,并预示了一些实验的可能性(在乡村里);而都市生活方式(urbanism)则被认为无法通往实验空间。

这些合法化的理据完全足以保证各种严肃的选择在乡村公社得以实现,因为这些公社建基在后农业体验的基础之上;由此产生的日常生活结构的隔离和剧变,以及对新技术的学习,对身份认同的深度挑战,都使得这种乡村试验组织成为一种较为纯粹的运动形式。^①

优托邦的主题

在“从主流社会隐退者”(dropouts)的“生活史”当中,有一个反复回溯的转折时刻,这一时刻是乌托邦式的(utopian),或者更准确地说,

^① 有关反主流文化运动中乡村田园主题的研究资料,可参阅McDermott(1971)和Kaufman(1971)。更多讨论自然神秘主义/千禧年主义的一般性参考资料,参看Cohn(1971)和Roszak(1972)。——原注2

是“带有乌有色彩的”(outopian)。由于无处可去,隐退者成了寄生于福利国家夹缝当中的“托钵僧”。在对主流社会不抱幻想的中产阶级青年积极加入的越轨亚文化群体当中,吸毒(在其他中介领域当中)导致了当代新教伦理观的衰退。这种不再受缚于支配性意识形态(意志、算计、工具主义、延迟享乐)的松动,可能会导致一种对于“优托邦”的追求,后者呈现为一种依靠现有可用资源加入或建设公社的方式。或者,这一转折阶段可能会寻求其他“解决方案”,其中一种便是回到“正经的”工作当中(逃避社会也被包含其中)。无论在这一过渡时刻采用什么样的解决办法,都要重新评估应优先考虑的事情,这一时期通常被隐退者援引为“开始觉醒”的阶段。^①

一夫一妻制的主题

公社关系的要害就在于它们的脆弱性,当它们或假如它们出现问题的时候,相对缺乏结构性的基础来维持它们的继续存在。这里相对缺乏合法的婚姻或稳定的工作,也缺乏对周边地域环境的投入。这些情侣关系的“当下状态”,是靠一种勉强相信未来或阶段性单配偶关系的想法,以及一种普遍想保持“多样态的天真状”的期望来支撑的。支持这种脆弱关系的补偿因素,则是一种浪漫的想象(并不期待后者能实现),以及公社的团结和休戚与共。

自相矛盾的是,一夫一妻制的、异性恋的配偶成了大多数公社的普遍形态。在这个方面,表达性的公社(expressive communes)与工具主义的公社(instrumental communes)有所不同,后者通常由中产阶级的“时髦青年”组成,他们把滥交视为正常行为。在表达性的公社里,由于情侣关系的脆弱性通常会出现一种转向群体婚姻的趋势,而且这一点有助于减轻在生活中每时每刻不断发生的关系紧张。下面这些情况可

^① 优托邦主题是贯穿所有描写公社运动的文献的一条线索,但是,一般来说,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对历史上的“乌托邦思想”进行了分析(1972),而(从根源上来说),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进行了最充分、最激进的分析(1970 and 1971)。——原注3

以证明这种关系紧张的典型后果：公社社员(男)不经意间得到一个女人,她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小孩,他将她带回家,在家里把“他的女人”这一暧昧的地位授予她。他可能再次离开并且不再回来,或者独自回来,或者带着另一个女人归来。这种现象在城市公社(urban communes)当中更为明显,由于男人在那里有更多机会成为别人的情人,容易产生这种“离婚”现象。而且,没有任何规范能优先于个体(尤其是男性)对自我的追寻。有孩子的女人频繁接纳一连串的男人,会被认为更不容易造成关系破裂(由于她提供福利所得,这种关系还会更可靠些)。因此,通常出现的情况是,我们称之为公社中的**坚定的妇女**,她们为自己的孩子(“顾家”规范)而选择稳定的关系,这与男人们那种形而上的“发现之旅”(实现个人规范)构成了鲜明的对立。这一点在城市公社中被削弱了,那里经常强调对妇女地位的关注,自立的情况更加明显。^①

抚养孩子(childrearing)的主题

对平等的表面承诺和恪守,在公社的社会生活领域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赋予孩子们与成人一样的自治权,是公社生活的主要倾向。但我们在这里又一次发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情况,由于孩子的分娩仪式获得了一致确认的本质(把集体财产作为家庭的象征,把诸位个体作为独户家庭成员的象征),这一点便与公社独特的“有关儿童的理论”产生了冲突,因为这种理论往往将孩子视为自主和独立的个人。尽管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孩子的“所有权”范围似乎也在随之缩小,但主导的模式仍然是母亲带着孩子,而且,公共抚养儿童今天仍然经常被认为太过激进了。随着更进一步的发展,呈现出对“女性”和“儿童”的地位进行分配的形式,把他们都压缩到平等主义的“人民”概念当中,当然,“人民”将分享更高级别的各种宇宙联合体(“我们都是一体的”)。在成人—儿童的人际关系当中产生的一些不确定的发展,通常会以占星术

① 专门提及公社之中发生之事的著作,参见R. and Della Roy(1972)以及J. and H. Ogilvy(1971)。有关一夫一妻制的性别斗争和讨论,在所有描述妇女解放运动的文献中通常都能看到,但特别提及城市公社中的相关情况,参见R. Reiche(1968)。——原注4

的方式被理解,特别是儿童更容易被贴上“宇宙守卫”的标签——他们有自己的**因缘**(*karmas*)或命运,而这些东西一定要他们自己去领悟。因此,儿童的这种社会化过程迥异于中产阶级的规范;但它的重要性到底怎样,仍需进行进一步的探究。^①

宗教的主题

在这个主题之下,我们指的是那些明显具有宗教特征的公社,它们不同于我们在乡村田园主题中讨论的那些被提及的公社,后者是从那些嵌入文化的宗教隐喻之中不自觉地演变而来的,并且没有明显的教义特征。恪守教义的、高度倾向于宗教的公社,通常依靠一种“匮乏”而存在,由一种外在的上帝或者神圣的力量来象征,并由一名富有独裁色彩和超凡魅力的领袖或者“神圣导师”来实施,他们可能会出现在公社或“嬉皮士群居村”(原文为 *ashran*,疑为“*ashram*”排印之误——译注)。这类公社的例子,包括国际奎师那知觉协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rishna Consciousness)^②的“庙宇”,圣光使命团(The Divine Light Mission)^③的“圣地”,以及上帝之子会(the Children of God)^④的“社区”。我们可以将这类有组织的企划称之为“禁欲的—宗教性的”公

① 有关抚养孩子主题的讨论,参见Berger, Hackett and Millar (1972),Bookhagen et. al. (1973)以及Zicklin(1973)。——原注5

② 国际奎师那知觉协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rishna Consciousness)是由印度托钵僧圣恩A.C. 巴克提维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A. C. Bhaktivedanta Swami Prabhupada, 1896-1977)于1966年在美国纽约建立的一个宗教组织,现在已经成为拥有百座庙宇和附属农庄农社和灵师学校的全球性组织。——校注

③ 圣光使命团(The Divine Light Mission)是印度灵修导师汉士·马荷罗基先生(Shri Hans Ji Maharaj)于1960年为他的追随者建立的一个组织,20世纪70年代因其小儿子普仁罗华(Prem Rawat, 1957-)的杰出传播而在西方社会产生强烈影响。另可参看本书第1章“美国反主流文化年表”相关注释。——校注

④ 上帝之子会(the Children of God),1968-1978年在美国出现的一个信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教派和运动。由前基督教传教联盟牧师大卫·勃兰特·伯格(David Brandt Berg, 1919-1994)创立,主要通过上街发放传教小册子劝诱青年人入教,或者鼓动老年人劝导

社。作为一种选择,这种“宗教—神秘主义的”公社相信普遍存在一种神圣的力量,并且有一种与整体合而为一的渴望(又一次“我们是一体的”)。这一点与乡村田园主题的公社很接近,即很少把世界作为外部存在而去试图改变,而更加关注各种自我解放的技巧,差不多都是以反省的方式进行实践。^①

城市行动主义者的主题

相对于乡村公社,城市公社普遍强调理论上的自我认知,这一点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以“个性化实践”(individuation as Praxis)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政治,以及包含这种公社运动在内的各种政治实践。但是城市公社似乎无法维持公社的生活方式。德国的一号和二号公社提供了城市行动主义者感兴趣的理想的公社模型,那里集中关注的是性解放和孩子抚养的话题,同时关注更多公开的政治问题。1968年以来,反独裁主义运动的特征得到了强化,这两个公社追随赖希(Reimut Reiche, 1968)共同去关注性格形塑的过程,追随马尔库塞(Marcuse, 1970)去关注如何与“压抑性的去升华作用”所造成的后果进行斗争。他们认为,人的内在性格是被现代资本主义对于迅速扩张的消费函数(变量)的需要所构建和形塑而成的;家庭既被视为消费的起因,也被视为“文化工业”(广告、传媒等)向儿童性格结构当中渗透所依赖的途径。这种消费函数(变量)要求对性本能进行压抑和操控,但恰恰是家庭,它主要通过其主导性的抚养儿童的实践,最终代表现行秩序去完成这项压抑的“工作”。家庭在自由主义时代曾经被认为是

青少年人教。伯格用自己所写的3000封信确立了自己的精神权威地位,到1972年年底共发放宣传册子达4200份。1978年该组织因各种原因分裂,继续留存的成员继续开展有组织组织的运动,后又更名为“爱之家”(Family of Love)、“家”(the Family)等名称,现在的名称为“国际之家”(The Family International)。——校注

① 参见Rigby(1974a and b)和《复活》(*Resurgence*)杂志。这方面出版的研究很少。关于宗教—乌托邦传统参看Cohn(1971),Roszak(1972),更深的理解,再次参看Bloch(1970 and 1971)。有关对青年反主流文化神秘主义和宗教的当代影响,参看Needleman(1971)的综述。也可参看各个教派在运动中的出版物。——原注6

保护其家庭成员的地方,而在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今天,它既提供了一种从社群中的退却(个人的私有化与个体的消解得以同时完成),又提供了一种对于维持现状的社会-经济需要的再生产。它引导本能需要去遵照占支配地位的规范行事。公社的宗旨是对“当下”本能和潜力的合理解放,并将解放性的儿童抚养行为当作革命性转变的先决条件,当作对人际关系的一种“解决”。这种对于“压抑性去升华”的防御,既避免了混乱的各种对象关系(object-relationships),也避免了消费主义的虚假满足。从较浅的思考层面来看,城市公社通常被视为“节点”,感情的源泉,城市紧张生活的解构。

其他类型的城市公社,尽管也与上述城市公社有一些关联,但都表现为政治-经济斗争的形式,比如由罗恩·贝利(Ron Bailey)那样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在伦敦鼓动的非法占房运动。这包括在住房短缺的背景下在空置建筑物里设立公社的活动,这种短缺是由房地产市场带来的资源不合理配置造成的。像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的青年无政府主义者(*Provos*)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嬉皮士掘地派(*Diggers*)这类群体,就创立了社区自助项目,在生活方式政治运动内部表现出公开的政治方式。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城市公社都是作为城市行动主义的活动中心而创建起来的,通常都开展一些带有“草根”性和革命风格的政治活动。^①

构造人类生存基础的主题

有证据表明,有一套更科学的知识可以解释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这套知识就出现在“替代技术”(alternative technology)运动当中。诸如《潜流》(*Undercurrents*)、《为人民的科学》(*Science for People*)、《全球概览》(*The Whole Earth Catalog*)这类广泛发行的学术刊物,就在提倡传统和未来技术的一种独特的混合,这些思想源于巴克敏斯特·富

① 有关一号公社和二号公社的研究,参看Bookhagen等人(1973)和Reiche(1968)的著作。有关非法占房运动,参看Bailey(1973),与此相关研究欧洲学生运动的成果,可参看Stat-
era(1975)。——原注7

勒(Buckminster Fuller)^①和其他一些科学家,已经生成了一种新科学和新知识,并以实践-技术的方式生动地呈现在我们所说的构造人类生存基础的公社当中。这个主题体现在一套复杂的理论和技术规范当中,而且在推广“替代技术”的公共中心(尤其在苏格兰和威尔士)那里被付诸实施。这一主题与在乡村主题中讨论过的那些非理性主义思潮有一系列复杂的同源关系。从事生产的公社/社群被认为树立了新的社会组织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因此克服了在生产过程与社会关系、工作和游戏之间存在的传统的二元分裂(dichotomies)。在有关乌托邦的/实际的争论当中,出现了一种在人与自然之间存在共生关系的假设,它与那种通过把这种关系“神秘化”而臆造出来的生态灾难的说法是对立的。素食主义和神秘主义(人与生态系统及宇宙同一)与对自然的榨取式的对待也是对立的。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组织与生态组织有一致性,因此就抛出来如下一些主题,涉及佛教经济学、使用非化石燃料、实现生产的多样化和分散化、反城市生活方式(anti-urbanism)和自给自足等思想。这些爱好产生的那些非理性主义契机,通常都被纳入到一些内含冲突的同源关系——比如在未来主义的科技、自动控制同各种科幻小说梦想和尚古主义之间——当中。这些契机具体呈现于悲观主义—末世论—天启(大灾难)之间结成的同源关系当中。^②

治疗的主题

一种“疗法”可能源自一种物理的和文化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通常被主导性文化贴上病态或变态标签的某些特殊人群,可以受

① 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 1895—1983),美国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工程师、发明家、系统理论家、作家和未来学家。他是最早提出建筑应体现低碳环保理念的建筑学家和设计师之一,认为人类能够通过有计划地、聪明地使用自然资源来满足自己的食和住。——校注

② 参见本文引用的这些学刊和杂志。这里面发表的研究成果几乎都脱离不了前面引用过的末世论千禧年主义的影响,但可以参看Schumacher(1974)和Bookchin(1971)。——原注8

到关照,被鼓励拥有自主性,并能得到帮助去进一步成长,最终能够过上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治疗主题的公社,包含了从作为(心理治疗)交友小组的公社到那些开启“疯狂之旅”的共享空间,就像有些人在伦敦金斯威社区(Kingsway Community)所做的那样。有关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家R.D. 莱恩(R.D.Laing, 1927-1989)和大卫·库伯(David Cooper, 1931-1986)对这类公社产生的影响,尤其是他们在英国的影响,女权主义思想家朱丽叶·米切尔是这样记录的:

到20世纪60年代,战后出生的孩子,已经由他(她)的居家母亲(home-bound mother)培养成一名青少年……在母子崇拜关系机械延续的同时,孩子们进入了青春期,他(她)要么逃入无缘无故反叛的空想当中,要么愈发有根有据地去反叛,反叛的目标就是自己的父母。20世纪50年代后期或60年代早期标志着青年政治的崛起——核裁军运动、新左派运动、百人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One Hundred)^①等运动都是由青年人主导的。青少年当中流行精神分裂症——这是否也是反叛幽闭恐惧症型家庭的一种症候?莱恩从这一问题当中获得领悟并帮助确立了观察的契机。

(1975:230,重点号为我们所标)

基于以上的事实,我们就不会对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②在其《四门之城》(*The Four-Gated City*, 1969)一书中所暗示的如下观念感到惊讶了,这就是,在(作为“重生?”的)疯狂(c.f. Laing, 1967)、科幻小说和神秘主义(c.f. Laing, op. cit.)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源关系。^①

① 百人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One Hundred)是1960年成立于英国的反战组织,因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其秘书拉尔夫·舒曼(Ralph Schoenman, 1935-)以及迈克尔·司各特牧师(Michael Scott, 1907-1983)等100位社会公众人物共同签署反战宣言而得名。其支持者使用群众性非暴力抗议和不合作主义达及他们的目标。——校注

②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 1919-2013),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校注

总 结

总之，我们注意到了遍布于公社运动当中的各种冲突和矛盾：在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主题和实践之间；在自然神秘主义与作为生态系统的自然之间；在宗教的世界末日论哲学与生态灾难的观念之间；在神秘主义的、神秘学的和占星术的合法化承认与科技手段之间；在作为“大地之母”的有孩子的妇女与作为自主个体的妇女和孩子之间；在疯狂与重生、个人与政治、社群与社会、个体与集体、都市主义与乡村主义之间；最终，在乌有之乡与优托邦之间，全都充满着矛盾和冲突。

(孟登迎 郑寰 译)

① 参见Rigby(1974a and b)、Cooper(1967,1972 and 1974)以及Laing(1967)。还有关于治疗交友运动(the Encounter movement)的杂志：《自我与社会》(*Self and Society*)。——原注9

10 雷鬼乐、拉斯塔法里教信徒 和牙买加小混混

迪克·赫伯迪格

编者按：本文摘自迪克·赫伯迪格所著长篇研究《雷鬼乐、拉斯塔法里教信徒和牙买加小混混：风格和形式的颠覆》，是他的硕士论文《20世纪60年代越轨亚文化群体的风格面面观》的一部分。从该篇论文中选取的未删节过的章节和其他论文，可参见CCCS出版的油印论文集(Stencilled Paper)第20、21、24和25期(也可参见Hebdige, 1979)。本节摘要主要涉及牙买加的文化背景，拉斯塔法里教信仰的构成，它在音乐形式特别是斯卡乐(ska)和雷鬼乐方面的包装，音乐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它在英国的传播；白人光头党对它的部分收编，以及黑人“小混混”利用它来对这种收编进行的颠覆和抵抗。本摘要删除了对斯塔法理教信仰及其作为一种运动的近期历史所做的更全面的分析；对“小混混文化”(rude boy culture)从好莱坞黑帮电影中借用某些元素的价值和作用的讨论；对英国“伦敦东区文化”和“黑人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以及关于方法的一节——所有这些内容在这一章的完整版中都可以找到。

1 比斯顿(Beeston)街上歧视黑人的巴比伦社会(Babylon)

铁窗控制不住我。
高墙阻挡不了我。

——摘自哭泣者乐队(The Wailer)^①的
《恶鬼征服者》(Duppy Conqueror)

英语是我的母语,但事实却证明它是我的敌人。

——詹姆斯·鲍德温^②(访谈)

革命很快就要来了。

——托马斯文中引述一个名叫“恶犬”
(Bulldog)的青年人的话^③

受奴役的感受在牙买加黑人的日常交往中不断地再现。它首先造成了不稳定的家庭结构(瓦解了至今仍在西非地区还幸存的传统的、稳固的亲属关系),而且显然仍继续带有权威性地决定着人们的工作模式和关系。它仍然是一种隐形的塑形鬼怪,经常光顾“鬼城”(Ghost Town)中的贫民窟,甚至到现在还总是让驱魔仪式落空。事实上,它已经融入在每个牙买加贫民窟周边街道上进行的每一段口头交流语当中。正如希洛(Hiro, 1973)所指出的:“克利奥尔语(creole language)的进化与奴隶制结构有着直接的关联。”由于白人监工把来自不同部落

① “哭泣者”乐队(The Wailers)是牙买加青年巴布·马利(Bob Marley, 1945-1981)于1964年发起组建的一个乐队,最初名为“哭泣着的哭泣者”(Wailing Wailers),1968年正式改为此名。他们的歌曲歌颂和解、宽容和同情,在欧美流行音乐及摇滚乐领域产生巨大影响,马利被尊称为“雷鬼乐之父”。马利致力于反种族主义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被牙买加人民视为民族英雄。1974年该乐队在英国巡演中首次演唱经典之作《不,女人,不要哭泣》(No Woman No Cry)。——校注

② 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 1924-1987),美国当代靠自学成才的著名黑人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社会评论家和民权活动家。作为黑人和同性恋者,他的作品集中关注20世纪中叶美国的种族问题和性解放运动,《向苍天呼吁》(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1953)是其小说代表作。——校注

③ 出自美国作家迈克尔·托马斯(Michael Thomas)1973年发表在《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7月19日)上的文章:《天堂的狂野面》(The Wild Side of Paradise)。——校注

的黑人奴隶聚集在各个种植园里，从而有计划地阻碍他们之间的交流，因此有效地切断了奴隶与非洲的文化联系。各种禁止给奴隶教授英语的法律，意味着奴隶只能在私下（以大致近似和唇语等方式）使用和口头传输这种新的语言。17世纪统治阶级讲的英语口语折射在黑人可以采用的非法的交流渠道当中，并被用来表达一种在直接违抗统治阶级命令的行动中形成的新生文化的秘密语义。发生语义扭曲是必然的，甚至可能是有意为之的。

后来，这种语言发展出了自己的词汇、句子结构以及语法；但是，它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影子语言，以更为夸张和戏剧化的方式来满足那些在正常情况下，可以通过劳动阶级的地方口音和群体暗语来满足的要求。形式含蓄地规定了内容，意义的极点永恒地固定在一种痛苦的、不可逆转的感受当中，并在每天的交流中默默地重现这种感受。正如我们在后面所见到的，某些西印度裔亚文化群体的成员直观地领悟到了这一事实，他们就把语言当作一种特别有效的工具，来抵抗统治阶级群体的成员对他们的同化，阻止统治阶级群体的成员对他们的渗透。实践证明，语言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筛选工具；邦戈语（Bongo talk）和“小混混们”的黑话都在刻意强调它们的颠覆性节奏，以至于它变成了对种族身份和阶级身份的一种勇敢的声明。克里奥尔语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语言，它作为一项生动的指数，显示出黑人与那些在社会结构中占据更高地位的人的文化标准和目标的疏离程度。

黑人被排除在更广泛的语言社群之外，这意味着有一套完整的文化体系是通过一种秘密的、被禁止的渗透作用逐渐形成的。由于被剥夺了合法的文化交流机会，奴隶们便发展出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和一系列的文化人工制品，这两者共同体现了奴隶在奴隶制与自由之间、物质条件与精神生活之间、对牙买加的感受与对非洲的记忆之间不得不进行的至关重要的、符号性的转换。在某种意义上，牙买加黑人从未圆满地完成这种转换，他们始终不安地徘徊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无法完全认同其中任何一个世界。由于无法修复这种文化上和心理上的缺口，他们容易剧烈地从一个世界向另一个世界摇摆，并且最终对两个世界都予以理想化的描述。他们最终甚至被从牙买加、非洲、英国和伦

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区(Brixton)等地点放逐出去,奉献出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以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内在尺度去占据一个更高尚的位置。在这里,行动退化成存在,运动也在条件最有利的时刻失效并陷入困境,在这里,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宗教式的,而不是革命式的。

事实上,奴隶制最初的合理化采取了一种明显的宗教形式。由于禁止奴隶们进入白人的教堂,他们只能间接地学到基督教的教义,并将其嫁接到他们从非洲带来的异教徒的信仰中,这种嫁接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他们表面的基督教信仰下至今仍残留着一些迷信成分(如伏都教、巫术等),这些迷信还时不时地在牙买加的山区和乡村重现,在较为隐秘的城市乐队的音乐里复苏。^①牙买加本土的基督教宗派仍然保留着催眠、神灵附体和“舌语”;这些教派(圣灵降临节教派[the Pentecostal Church]^②、基督上帝教派[the Church of God in Christ]^③等)仍能吸引大批教众。作为加强群体联系、表达对奴隶制的群体反应的一种方式,这些非正统的基督教教派事实上被证明是很重要的。通过同时吸引个人(通过接受个人“受上帝恩惠”的教义)和群体(通过许诺集体救赎),这些教派提供了一种不可抗拒的解决方案——一种不是填平鸿沟而是完全超越鸿沟的方法。《圣经》为即兴创作和解释提供了无尽的空间。摩西

① 例如埃克苏马(Exuma)乐队,歌颂奥比巫师(Obeahman)、恶鬼(鬼怪)和蛇神(还魂术)。

——原注1

② 圣灵降临节教派(the Pentecostal Churches),通常译为“五旬节派教会”,是一种基督教新教派别。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后成为一种遍布全世界的宗教运动,1985年信众达2400多万。主张继承基督门徒在圣灵降临节(Whit Monday)接受“圣灵”的传统,故名。该派沿用大部分传统的基督教教义和基要派教会信条,信仰一种自称为“在(与)圣灵中(一起)受浸礼”的经验。该派认为信徒“成圣”是上帝恩宠所致,强调灵洗、说方言、圣经灵感、立即成圣和神医等。——校注

③ 基督上帝教派(the Church of God in Christ),1897年由一群被开除的浸礼宗教徒——如著名的查尔斯·普赖斯·琼斯(Charles Price Jones,1865—1949)和查尔斯·哈里森·梅森(Charles Harrison Mason,1866—1961)——创办,主要成员是非裔美国人,据说有500万左右,世界60多个国家有传播。该教派信仰圣经的启示,认为《圣经》是决定正确教义和行为的至高权威。——校注

带领受难的以色列人逃离囚禁的故事立刻得到应用，并在牙买加黑人的神话中赢得了一个永恒的空间。各种各样的教派正是沿着历史学家诺曼·科恩(Norman Cohn, 1970)在别处描绘出的道路，追寻着充满歧义的天启(apocalypse)，在不同的时期宣扬那些神授的革命和死后的(postmortem)启示。每当上帝看起来似乎要拖延的时候，乡村里相信千禧年说的信徒总会随时准备好让事情尽快完成。即使是在现在，当“波克曼尼亚”(Pocomania, 字面意思是“有点疯狂”)在山区的城镇里短暂但极具有效地传播时，复活也一定总是可以被唤醒。以月、以天、以分钟计算的一百万个千禧年来了又走了，上帝仍然在梦中对那些狂热的人们讲话。最后的审判日，转折日决不会再遥远了：它永远在明天的明天。最后的审判日受到了每一个拉斯塔法里教徒和牙买加混混由衷的敬爱；因为对这些人而言，这一天意味着对一项专有的世俗权力的重新分配。

当然，这种将物质方面的问题转移到精神层面的做法，对于牙买加黑人而言一点也不稀奇。这些把本质上有宗教色彩的观点转变成乌托邦—存在主义观念的方法，对于我们在这里研究的现象来说可能更为特别，也更为贴切。基督教教义仍然渗透在西印度群岛人的想象当中，圣经神话依旧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社会结构的某些既定点（即在失业的青年和离经叛道的成人当中）上，这个神话已经陷入了自相矛盾，以至于（强调工作和压抑的）犹太—基督教文化被公认的优势地位可以得到认真而细致的审视，并且最终遭到了抵制。促成这种象征性逆转的，正是拉斯塔法里教信徒。

拉斯塔法里教信徒认为遭放逐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就是上帝，他的加冕实现了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①的预言：“看非洲啊，当一位黑人君主加冕的时候，解救的日子就

① 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 1887-1940)，牙买加黑人民族主义者，宣扬黑人优越论，提倡外地非裔黑人返回非洲重建黑人的统一国家。1914年创建世界黑人促进协会，开创了第一次世界性的黑人群众运动。1916年赴美国发展大量会员，20世纪20年代早期拥有了几百万追随者。尽管他所发起的运动并没有取得持久的成效，但他的信条后来成为黑人反歧视斗争的重要驱动力。——校注

快到了。”但是,拉斯塔法里教形成所依赖的宗教环境需要一个特定的圣经神话,而且这一神话必定会被重新征用,并被用来服务于不同的文化需要,就像“新教伦理”在西欧实现了自身对于原初的犹太伦理形式的重新利用一样。通过重新定义的辩证过程,圣经经文不断吸收和转移牙买加黑人的革命潜力,被用来确定这种潜力的存在,也被用来否定犹太—基督教文化。或者,用牙买加裔街头男孩们更简洁的土话,《圣经》被拿来、读过,再被“粗鲁地扔回去”。

因此,海尔·塞拉西不仅是塔法里的拉斯(王子)、埃塞俄比亚皇帝、王中之王、活的上帝,尤其还是征服犹大部落(Tribe of Judah,新近几年使用的是“Jah”这个简称)的雄狮。在这些陈述中,几百年来盘踞在牙买加黑人心头的种族和宗教问题汇集在一起,并找到了直接的、同步的解决方法。可以预见的是,拉斯塔法里教主要从金斯敦的贫民窟中获得支持。1960年牙买加西印度大学学院(U.C.W.I., University College of the West Indies的缩写)推出的研究报告《牙买加金斯敦的拉斯塔法里运动》(The Ras Tafari Movement in Kingston, Jamaica)提供了研究这一运动的第一手资料,它试图阐明所有拉斯塔法里教信徒所共有的广泛的信仰基础(M. G. Smith et al., 1960)。四点宣言如下:

1. 拉斯塔法里是活的上帝。
2. 埃塞俄比亚是黑人的家。
3. 归国是解救黑人的方式。这一点已经被预言,而且很快就会实现。
4. 白人的行事方式是罪恶的,尤其对黑人来说。

拉斯塔法里教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于,《圣经》中的各种隐喻是如何被精心地阐释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一套领悟的准则——的,同时又是如何被灵活、全面而又普遍地付诸实施,并且得到横向扩展的。黑人被认为是真正的犹太人,所罗门和示巴女王(Sheba)是海尔·塞拉西的黑人祖先,是黑人的神。歧视黑人的(白人)巴比伦社会(Babylon)

确实覆盖了西方世界(尽管很多该教派成员[locksmen]把俄罗斯排除在外,后者被认为是长着三根肋骨的熊,“会踏灭那里的遗迹,因此巴比伦将成为众国之中的一片废墟”——《启示录》[*Revelation*]第18章)。警察、教堂、政府(特别是像巴斯塔曼特^①和老曼利^②那样的老一代政治领导人)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将与白人压迫者拥有同样可怕的命运。埃塞俄比亚是整个非洲的真正名字。自1655年起,白人和他们的褐色同盟者就一直在奴役黑人;尽管身体上的奴役在1838年被废除了,但是这种奴役仍然以一种伪装的形式存在着。所有的黑人都是埃塞俄比亚人,牙买加政府不是他们的政府。牙买加政府臣属于英国,而英国也仍然把牙买加视为殖民地。唯一真正的政府是海尔·塞拉西皇帝的神权政体,尽管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即歧视黑人的巴比伦(欧美)社会实施的制度——更值得人们期待。在教堂里结婚是罪恶的,而真正的埃塞俄比亚人只应该承认一位黑人“女王”,并且应该对她怀有最崇高的敬意。(就她而言,她永远不能拉直头发。)饮酒和赌博是被禁止的。牙买加人对非洲黑人巫术、魔术和魔法的信仰都是迷信的胡话,没有实证检验效度。信仰复兴主义加重了(compound)精神奴役。大麻被认为是神圣的。在牙买加,世俗世界的财产不是必需的,人们不赞成个人财产所有权。工作是好的,但是异化的工作就只能是永远的奴役。所有的教友都是古老奴隶的再生;再生就是对一种已经丧失的文化和传统的重新肯定。所有的教友都把拉斯塔法里当作上帝,

① 巴斯塔曼特的全名是Sir William Alexander Clarke Bustamante(1884-1977),是牙买加著名的政治家,被誉为该国民族英雄。1938年参与创建牙买加人民国家党,1943年创建牙买加工党(Jamaica Labour Party)并担任首任党魁,1962年在牙买加获得完全独立时出任首任总理。英国女王曾授予他“下级勋位爵士”(Knight Bachelor)称号。——校注

② 老曼利的全名是Norman Washington Manley(1893-1969),是巴斯塔曼特的表弟,20世纪20年代做过律师,后一同参与建立牙买加人民国家党等政治活动,努力推进牙买加民权运动。1955-1959年担任殖民地首席部长,1959-1962年担任过牙买加总理。他的儿子迈克尔·曼利(Michael Manley)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1972年当选牙买加总理。——校注

都把“人”当作上帝。“人们”是终有一死的罪人和压迫者。这些“人”是那些认识“活上帝”和教友的人,他们是永生的,是永远活在所有教友的血肉之中的同一个人(一个拉斯塔法里教成员会称另一个为“兄弟”[bra],会重复使用第一人称,说“我和我”——而不是“你和我”——这样的句法结构)。

除了这些依然相对稳定的“必然之事”而外,拉斯塔法里教的成员常常利用圣经的修辞模式——谜语、悖论、寓言——来显示他掌握了“真正的词汇”。迈克尔·托马斯(Michael Thomas, 1973)引用了一个名叫坎齐曼(Cunchyman)的拉斯塔法里教隐居成员的话,来描述他是如何通过“夺取”了一把斧子(它可以杀死13个一生都用它劈柴的人)并把它挂在墙上,来战胜工作的专制的。1973年,鲍勃·马利(Bob Marley)——“哭泣者”乐队(可能是第一支真正拥有国际乐迷的雷鬼乐队)的拉斯塔法里教领导人——在接受《滚石》杂志的一次采访中,用他的吉他作为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吉他可以演奏美妙的音乐,但是在漏电的时候也可以杀人),来展示“毁灭是怎样来自于物质之外的事物的”。这种融合的、关联性的思维模式,顿时使所有知识马上(即神奇般地)变得可以理解了。因此,迈克尔·托马斯(1973)认为,当拉斯塔法里教成员充分进入迷醉状态的时候,他几乎会用耶稣会牧师所有的诡辩和信念来谈论任何事情(例如:雷电和电力,谁的威力更大;鲨鱼和海豚,谁游得更快)。最终,技术屈从于信仰,信仰服从于学识(knowledge);继而真正感知思想。在这个时刻,就有可能构建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和谐关系,“兄弟”的“头脑”据说“就归耶和华(上帝)指导了”。这种对于神性的明确认同,自然要求否定线性渐进体系并终结所有的区别;这必然导致一种极端主观主义。神秘主义当然意味着停滞,以及一场从根本上经受了寂静主义立场并转向其自然延伸

① 内特尔福德(Nettleford, 1970)认为,雷德丘陵(Red Hills)和珊瑚花园(Coral Gardens)地区太多的纷争使得很多拉斯塔法里教成员厌烦了暴力解决方法,加快了向寂静主义的转变。——原注2

方向的运动。^①把科学转变成诗歌,并没有带来对真实权力的预期的重新分配(即使这种权力不过是“表面上的”;在拉斯塔法里教的神话中,这是巴比伦人的“虚荣心”产生的“臆造之物”)。^①但是,这种关键性的信仰行动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挪用技巧,后者通过为上帝的存在提供基础而脱离了传统的宗教情感移置;它要求对牙买加黑人的潜能进行彻底的重估,也促使拉斯塔法里教成员去重新审视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如果所有这一切听起来有点太深奥,我们只需要转向对牙买加小混混的讨论,以此来证实拉斯塔法里教视角的有效性。原因就在于,拉斯塔法里教的神性的世俗化与被弃置的牙买加小混混的政治化是一致的,而且,这种引导拉斯塔法里成员的认知观念并使之系统化的新美学,在雷鬼乐中找到了最佳的表现方式。

2 音乐和形式的翻转

一个饥饿的人变成了一个愤怒的人。

——怀特(White, 1967)引用一名牙买加小混混的话

神父说伟大的上帝将从天而降,
让每个人都感到幸福,让每个人都感到高尚,
但是如果你懂得生活的价值,
你将会寻找你自己的生活到底有何价值,
所以,既然我看见了光亮,

① 这可能是20世纪60年代最令人失望的事情。[嬉皮士运动和1968年巴黎学生运动的终结,以及莱恩的“元旅程”(meta-journey)未能取得任何成绩——参见Juliet Mitchell, 1975:225-292]。内特尔福德(1970)批评牙买加新兴的黑人意识运动未能给非洲研究提供一种较为严谨的分析方法。——原注3

补注:莱恩(Laing)通常被称为R. D. Laing,全名为Ronald David Laing(1927-1989),英国著名精神病学家。其思想受到存在主义哲学影响,推动反-精神病学运动,对正统的精神病理解释和治疗方式提出挑战,成为20世纪60年代反叛精神的代表性思想家之一。——校者

我就会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奋战。

——摘自哭泣者乐队的《起来，争取你的权利》

(*Get up, Stand up for Your Rights*)

雷鬼乐自身是形态多样的——如果只集中于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不计其他，就会陷入对复杂的文化进程过度简化的困境。因此，雷鬼乐是美国“灵魂”(soul)音乐的变形，在被拯救的非洲节奏的外表之下，潜藏着一种纯粹的牙买加人的反叛情感。雷鬼乐是移植过来的圣灵降临节教派。雷鬼乐是拉斯塔法里教信徒的赞美诗，是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城小混混们的内心呐喊，也是新生的牙买加政府的本土化的国家颂歌。音乐是所有这一切和更多的东西——是融合了所有牙买加黑人文化构成元素的万花筒；圣灵降临节教派的召唤和回应，牙买加街头闲谈的那种绕来绕去的韵律节奏，美国节奏布鲁斯的色情与超然(cool)，拉斯塔法里教成员即兴音乐演奏会上的那些持续的敲打，全都在雷鬼乐中得到了体现。

甚至“雷鬼乐”一词的词源也引发了争论。在迈克尔·托马斯1973年所写的书当中，一个在西金斯敦获得了成功、名叫“恶犬”(Bulldog)的小混混就认为，“雷鬼乐”(reggae)源自ragga(雷盖乐)一词，是“城市住宅区的人”对“衣衫褴褛、仪表邈邈的街头男孩”(raggamuffin)^①的蔑称，这种称谓隐藏的蔑视意味却受到了喜欢这种音乐的人们的欢迎。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文献强调它与拉格(raga，印度传统音乐)的相似之处，还有人认为“雷鬼乐”不过就是雷科(Reco)的变形，雷科(全名为Reco Rodriguez)与唐·德拉蒙德(Don Drummond)一样，是一位最早精于“斯卡”

① 译者在各种权威的英文词典中未能找到raggamuffin一词，只找到ragamuffin一词，意思是“衣衫褴褛的街童”，国外一些介绍雷鬼乐发展史的网站也未区分这两个词，因此可能是拼写错误或印刷错误所致。不少论者推测，Ragga所隐含的反叛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上层成人社会先给街头贫穷儿童贴标签，而贫穷阶层的青少年群体(雷鬼乐的创作和欣赏主体)随后又对此标签进行语义颠覆的结果。——校注

音乐的音乐家。关于这种音乐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甚至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人们对于这种音乐的反应取决于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音乐是从一个群体的经历中自发产生的,还是通过贯彻从(牙买加政府)上面颁布的有意识的“本土化”政策而产生的?帕特森(Patterson, 1964)倾向于贬低雷鬼乐的民间来源要素,并且对拉斯塔法里教持有一种相对中性的(unsympathetic)解释(他解释为依靠“群体幻想”的神秘化),而卡雷笛尔(Kallyndyr)和达尔林普尔(Dalrymple, 时间不详)只提到了那些民间来源要素,并倾向于不做批判性的分析。依据麦格拉申(Mc Glashan, 1973)的说法,“金”(the King, 英国黑人社群中音响设备的引领者)提供了一种典型的非经验主义的、隐喻性的解释,这种解释又提供了另一个展现拉斯塔法里教“逻辑”的基本例证。

雷鬼乐是抗议,是在苦难中产生的……你需要有那种强烈的感情……那种感情来自母亲的乳汁。是的,从母亲乳房里流出的自然的乳汁。它给你身体那种黏黏的感觉,那感觉能创造出应该被创造的东西。

尽管我承认这种修辞上的过度有些不可靠,但我会支持“金”而反对帕特森,原因就在于,控制新唱片工业的企业家们的商业利益阻挠了中央政府任何形式的干预。此外,非洲化的动力不需要任何来自上面的鼓励——拉斯塔法里教运动的发展和失业青年幻想破灭后的离职,已经显示了这种动力。拉斯塔法里教成员并不仅仅是拉斯塔法里运动中的核心激进分子;他们还提供了一个核心,围绕这个核心一些不太清晰的抗议形式得以聚集起来,而它们之间随后发生的对话,最终在雷鬼乐中找到了歌剧风格的表达方式。

在“斯卡”音乐(雷鬼乐的前身)出现之前,牙买加几乎没有自己特有的音乐。牙买加“门特”(Mento)是一种非常柔弱的音乐形式,融合了当地方言“民歌”和对非洲节奏的一种适度的改写——实际上是从一种本来很有力度的原节奏中衍生出来的节奏。除了这种音乐形式和哈

里·贝拉方提(Harry Belafonte)^①的音乐之外,北部海岸则使桑巴舞来适合威利·洛佩兹(Willy Lopez)的音乐旋律和他时尚的拉丁管弦乐队。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从美国输入的节奏布鲁斯在西金斯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像杜克·里德(Duke Reid, 1915 - 1975)这些人很快就意识到了从中获利的潜能,开始把他们自己打造成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DJ),在棚户区的贫民窟营造出一个华丽的上流社会;音响设备的时代开始了。作为音乐节目主持人,要想在后院迪斯科舞厅的激烈竞争中生存下来,需要机警、灵活和进取心,因为在那里音乐节目主持人们都为获得“最佳音效”的称号而相互竞争;当美国的节奏布鲁斯在50年代后期丧失了其最初的动力之时,一些更有抱负的主持人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应急方法,他们自身开始涉足唱片录制业。通常,在器械方面追求完美的录音效果是必需的,而且主持人可以在“现场”的表演中即兴创作歌词(通常较为简单刻板,例如“处理得很好、处理得很好”等)。这些早期的录音活动确立了一些重要的惯例。首先,乐师一般要从广大的失业劳动者中选择;用一段时间,给一点工资,然后又回到街上。在当地唱片业的某些部门,这种对青年人才的无情剥削有增无减。其次,直到现在,音乐仍然与迪斯科紧密相连,而且主要是为舞蹈创作的。再次,“拟乐器声哼唱”(scatting)穿插一种即兴的歌词的简单重复的伴唱,这一音乐传统仍能创作出一些更吸引人、更让人激动的雷鬼乐。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斯卡”音乐的节拍在这些没有标记的早期唱片上首次亮相了。“斯卡”音乐是一种用电吉他演奏出来的急促的跳曳步舞曲,此时吉他被径直调高到最高声部。重音落在一小节最后的一拍上(upbeat),而不是像节奏布鲁斯那样落在弱拍(offbeat)上,并且通过低音乐器、鼓乐以及铜管乐器(长号是早期“斯卡”音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得到加强。就结构方面来说,“斯卡”音乐是“节奏

① 哈里·贝拉方提(Harry Belafonte, 1927-),美国黑人歌手、流行歌曲作者、演员和社会活动家。生于纽约,童年在其父亲出生地牙买加有一段贫苦的生活,后以勤工俭学方式在纽约学习戏剧,1952年开始唱民歌,最终成功将加勒比地区音乐风格普及全球听众当中,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有名的黑人明星之一。——校注

布鲁斯”的结构前后颠倒的(back-to-front)版本。

像语言和宗教一样,又一次出现了对原初形式的曲解,这种曲解似乎是有意为之的,而且是必然的;这种意义翻转似乎意味着挪用,表明文化交易已经发生了。然而,那种把心灵转向“斯卡”音乐的点金术决不简单。从外国引入的音乐与牙买加已有的地下音乐形式产生了互动。卡米纳(the Cumina)、大鼓(Big Drum)以及巴拉(burra)等舞曲早已复兴了非洲的节奏,这些音乐形式的形成背景直接决定了它们的形式和内容。它们在关于“斯卡”音乐的语义学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标记。巴拉舞曲尤其重要;由低音乐器、中音鼓和高音鼓(funde and repeater drums)演奏出来的巴拉音乐,造成了一种对于犯罪行为的公开颂扬。自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西金斯敦贫民窟的居民就有了用“巴拉”舞曲欢迎释放囚犯回归社区的习俗。音乐加强了本地的忠诚感和犯罪同盟,丧失了对贫民窟外面更大的社会的责任认同。当20世纪40年代后期拉斯塔法里教成员与警察经常性地发生冲突之时,他们就同那些不知悔改的犯罪分子建立起了联系。拉斯塔法里教成员“骇人”的长发辮(dreadlocks),被纳入呈现社会弃儿(out cast)的神秘图像当中,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公开欣然接受了当局似乎下决心要强加给他们的那种不法分子的身份。更何况很多人在因吸食大麻而服刑期间,依旧与牙买加的黑社会保持着持久的接触。警察试图通过把所有成员标注为潜在罪犯来诋毁这一运动,认为他们不过是把神秘主义作为开展破坏活动的幌子而已,但这种做法反倒推动这些人开始转向有意识的反社会立场和无政府主义立场。正如在其他地方经常看到的那样,这些预言很有可能就变成了现实,而且,像后来因谋杀和强奸被判死刑的伍皮·金(Woppy King)那样的罪犯也加入了拉斯塔法里兄弟会,并且影响到一些教派成员的挥霍放纵的生活方式。拉斯塔法里教成员及时全面地接管了巴拉舞,他们把巴拉鼓称作“阿凯蒂鼓”(akete drums)。环绕在音乐周围的犯罪气氛,必然会在这种转移中留存下来,而替代了巴拉舞曲的纳亚冰吉(Niyabingji)舞曲,将最初对犯罪价值观的认同转化为对恐怖主义暴力的公开信奉。因此西金斯敦的犯罪和音乐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持久的共生关系;即使在灵魂音乐渗入牙买加之后,它们之间

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且,拉斯塔法里教成员继续引领新音乐的发展,充满创意地投入到音乐的创作中。与此同时,1957年的调查表明当时18%的劳动力没有工作,而且12年后的《多克西报告》(Doxey Report)也指出,现在可以料到的情况是:“很多年轻人在他一生中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根本没有固定的工作”(Doxey,1969)。这些住在西金斯敦的年轻人被宣称会服务于他们的社会所抛弃,他们满怀怨恨,乐意去拉斯塔法里教成员那儿寻求解释,乐意去听他们的音乐,模仿他们的退隐姿态。因此,我们会毫不奇怪地发现,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小混混音乐来说,支撑其展现傲慢、色情、暴力和超然外表的后援,正是那些充满幻想的拉斯塔法里教成员及其信手拈来的辞藻、包罗万象的比喻。

因此,“斯卡”音乐是充满弹性的、全副武装的音乐,在很多方面都显得“粗鲁而强悍”。它的起源保证了它可以免受来自上层的严重干扰以及在意义层面的操控。牙买加官方有关纯正品味的裁决者最初赋予“斯卡”的污名,直接与“巴拉”舞曲的犯罪含义有关联,而且,政府方面在早些时候试图建立一个国家唱片公司(national sound)的企图,老实说已经失败了。最早创立牙买加唱片公司(西印度唱片公司[West Indian Record])的艾迪·西加(Eddie Seaga)是一位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企业家,他致力于把“斯卡”作为有代表性的(因此,也是令人尊敬的)“本土”音乐形式向世界推广。他后来成为工党内阁的一员,这更加激励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他试图把西金斯敦打造成一个政治选区,此外,他还招募了拜伦·李和龙人乐队(Byron Lee and Dragonaires),一个当时在北部海岸进行演出的“一流乐队”,并派他们先去西金斯敦学习这种新音乐,然后再去纽约展示他们的学习成果。音乐在转化过程中遭受了一定的损失。拜伦·李太优雅了,无法恰当地表现“斯卡”;但是,原汁原味的“斯卡”又太“粗鲁”了,不可能吸引当时的世界市场。

因此,或多或少就任由“斯卡”自由发展了。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唱片业在西印度唱片公司的艾迪·西加、联合工作室(Federal Studios)的肯·库利(Ken Khouri)和岛屿唱片公司(Island Records)的克里斯·布莱克韦尔(Chris Blackwell)——他是白人并且是农场主的儿子——等

人的支持下发展起来了。但是,布莱克韦尔并不把自己的市场仅限于西印度群岛;他不久继续到英国开拓市场,在英国卖给思乡的牙买加混混们的唱片比卖给牙买加本土人的还要多。^①布莱克韦尔在基尔本路(Kilbourn Road)置了产业,开始挑战“蓝色节拍”(Bluebeat)品牌对于英国西印度音乐市场进行垄断的企图。

1964年,布莱克韦尔发行了第一张全国流行的斯卡乐唱片《我的棒棒糖男孩》(*My Boy Lollipop*,该曲由16岁的米莉·斯莫尔[Millie Small]演唱,带有一种惹人喜爱的紧促的鼻音),此时人们普遍认为他在与蓝色节拍的这场较量中取得了胜利。他还创建了另外一个品牌“特洛伊”(Trojan),英国绝大多数的唱片发行由它经营,李·戈普斯尔(Lee Gopthal)负责监管南部伦敦地区的销售。后来,在1966年夏天的某个时候,音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斯卡”转成了慢拍摇滚(rocksteady)。号音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甚至被完全放弃了,音乐慢了下来,更多充满梦游和情欲色彩。低音贝斯开始主导音乐,当慢拍摇滚的节奏逐渐变得更强烈的时候,它就被称之为雷鬼乐。随着时间的流逝,雷鬼乐吸引了一大批乐迷,其中迈克尔·曼利(Michael Manley)(现任牙买加总理)在他1972年的大选中就用到了—首雷鬼乐歌曲《更好的生活一定会到来》(*Better Must Come*)。^②他的人民国家党(*People's National Party*)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音乐就缓和下来了;因为就在同时,小混混们发展出了一种可以充分发挥“斯卡”镶嵌结构的视觉风格。那种自以为是的举止,抢眼俗艳的衣着,受街头男孩影响的装腔作势的走路方式,都非常明显地体现出美国灵魂乐的元素。贫民窟皮条客的政治策略进入了牙

① 例如:在布林克斯顿区(Brixton),80%的黑人来自牙买加,这一地区的唱片店随即就开始专卖蓝色节拍(bluebeat,60年代初流行的西印度群岛风格的舞蹈音乐)和斯卡乐。

——原注4

② 迈克尔·曼利在圣灵降临派(Holy Roller)狂热型宗教仍然残存的农村地区也获得了支持。他主要是在公共场合手持他称之为“矫正棒”的木棍,凭借这一木棍,他承诺能够驱除所有魔鬼和不公。——原注5

买加棚户区的街头闲谈,每一个刚从贫穷内地进城的小混混,很快就能像最熟练的老手一样开始在“鬼城”和墙后区(Back O'Wall)随处可见的酒吧里独立做交易了。小混混们玩着多米诺游戏(dominoes)^①,一心想着那闪光的时刻,好像他们的生命都取决于这种不假思索的结局——一群城市骗子,无所事事,整天靠着慢拍摇滚、斯卡乐和雷鬼乐毫不费力地迁移。酷(超然),那种遥远而模糊的品质,几乎变得抽象而玄妙,显示着一种时髦的斯多葛寡欲主义——残存物以及其他更多形式。

当然,他们与警察也发生冲突。大麻、枪支和“穷困”造就出来一批又一批的小混混,他们迫切地想检测他们对抗法律的力量,而法官们却用更长的刑期来回应他们。用迈克尔·托马斯(1973)的话来说,每一个小混混都是在“黑暗中跳舞”,野心勃勃地想成为“比斯顿街上最酷的恶人约翰尼(Johnny-too-bad)”^②。这是“斯卡”乐很混乱的一段时期,普林斯·巴斯特(Prince Buster)讽刺法官的身份,演唱“可怕的法官”,指出法官一方面判处哭泣的小混混(“秩序!秩序!混混们不要叫嚷!”)500年监禁和10000下鞭打,另一方面又赦免他们,为他们的释放开宴会庆祝。这种令人沮丧的犯罪与惩罚、污蔑与收编的组合,在这些早期的唱片中不停地重复着一幕幕悲喜剧,“斯卡”的经典唱片就像以前的“巴拉”音乐一样,通常只不过是对越轨和暴力行为的庆祝。音响设备的竞争、街头打架^③、性接触^④、拳击赛^⑤、赛马^⑥和狱中经历^⑦都直接被

① 在牙买加劳工阶层里流行的一种游戏。——原注6

② 《恶人约翰尼》(*Johnny-too-bad*)是活跃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早期的“骗子乐队”(The Slickers)演出的一首歌曲的名称。——校注

③ 见《地震》(*Earthquake*),里面描述普林斯·巴斯特在橘街(Orange Street)上向对手挑战并与之打架。——原注7

④ 参见这一阶段所有其他唱片。——原注8

⑤ 参见尼内(Niney)的《暴躁的工头遇上愤怒的乔·弗雷泽》(*Fiery Foreman meets Smokey Joe Frazier*)。——原注9

⑥ 参见拓荒者乐队(The Pioneers)的《大风险的赌注泡汤了》(*Long Shot Kick the Bucket*)中关于一匹所有人都压上了钱的马的死亡。——原注10

⑦ 再次参见梅特尔(the Maysals)的歌曲《54-46》(这是图特斯[Toots]因被指控吸食大麻入

转化成民谣,并被标配上斯卡的节奏。那些在早期“斯卡”音乐中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公爵、伯爵、教皇和王子们,看起来就像是音乐厅里的一群匪徒,普林斯·巴斯特半开玩笑却又一本正经地警告说:“艾尔·卡蓬(Al Capone)的枪可是不同人讲道理的。”^①

但是,在“007”^②的世界里,小混混们“缓刑期间”在外面“抢劫”、“杀人”、“悲号”,随着时间的推移,“警察和士兵变得更加高大”;而且在最后的对抗中,官方一定获得胜利。因此注定要再多一轮的对抗,当然也总有更高级别的权威,那就是最后审判日回归雷鬼乐的地方,当“可怕的法官”被自己点燃的烈火烧死的时候,拉斯塔法里教成员将庆贺“痛苦的终结”。从唐·德拉蒙德和雷科·罗德里格斯(Reco Rodriguez)最初为接受能力强的听众演奏《东方之父》(*Father East*)、《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致马库斯·加维》(*Tribute to Marcus Garvey*)和《再生》(*Reincarnation*)开始,拉斯塔法里教对雷鬼乐一直就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即使是普林斯·巴斯特,这个“工头”、男主角、典型的个人主义者,在小混混们的无政府状态达到高潮的时期,也只能用他的《自由爱情》(*Free Love*)来告诫他的追随者,要“做真事”、“讲真话”、“学会互相爱护”,劝告持不同政见的小混混们“真理是最好的武器”,“我们的团结最终将胜利”。在讽刺性的《十诫》(*Ten Commandments*)中,普林斯·巴斯特是非常自相矛盾的,一面诱劝人改宗和说教,同时又在嘲弄这事情;但是对上帝的内化作为拉斯塔法里教信条的标志,却支持更为狂暴的男性沙文主义(*Chauvinism*)。

这些是我,普林斯·巴斯特,通过我的灵感想到的男性给子女

狱时的号码)。——原注11

① 出自普林斯·巴斯特所写的《艾尔·卡蓬》一歌的歌词。——原注12 补注:艾尔·卡蓬是20世纪20—30年代芝加哥黑帮教父,详见本书第4章《摩登族的意义》中相关注释。——校注

② 摘自德斯蒙德·德克尔(Desmond Dekker, 1941—2006)《棚户区》(*Shanty Town*)。——原注13

性的十诫。

随着岁月流逝,音乐由美国转向埃塞俄比亚,小混混们也随着音乐一起移居。对于种族和阶级的忠诚感加强了,而且随着音乐日渐成熟,取得了对节奏布鲁斯——其最初的催化剂——的关键性突破。音乐变得更有“种族特征”,更少狂暴色彩^①,更有思想性,同时,各种政治隐喻和拉斯塔法里教深奥难懂的神话也开始更莽撞地潜入到歌词当中。出现了一些像哭泣者(Wailers)、打翻者(the Upsetters)、旋律派(the Melodians)和狮人(the Lionaires)这些带有新元素的乐队,这些新元素通常具有革命性,而且始终保持着牙买加的本土特色。一些小混混们开始蓄起长发辮,很多人喜欢戴羊毛绒线帽,后者通常是埃塞俄比亚国旗的绿色、金色和红色,以表明他们同西方的疏离。这种转变(如果他们在衣着方面所做的这种微妙的调整也称得上这种启示录式的术语的话)已经超出了风格的范围,开始改造和引导他们的阶级意识和肤色意识了。显而易见的是,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他们开始从20世纪60年代漫无目的的暴力、虚张声势和好斗竞争的个人主义转向了一种更明确、更明智的愤怒;而且如果说犯罪仍然提供了唯一可用的解决办法,那么这种犯罪也显现了新的不同。内特尔福德(Nettleford, 1970)所引述的一个小混混评论暴力的话,显示出他有了“更高的意识”:

你真正应该抢劫的不应该是那些同你一样受苦的弟兄,而应该是那些拥有所有这12间商店……有着一大堆不同的奢侈设施的大商人……我们真正想要的就是这种平等的权利和公正。如果每个人都有好的生活条件,接受好的教育,那么我就感觉生活会变得更好。

^① 坎齐曼(Cunchyman)说美国人“不知道如何行动舒缓一点”,参见托马斯(1973)。——

原注14

我想说的是,由于拉斯塔法里教成员自身开始抛弃暴力解决方式,转而引导新的美学,那些沉浸于“斯卡”乐当中的小混混们,也很快学会了拉斯塔法里教成员所用的术语,并成为拉斯塔法里教运动的激进分子。因此,随着音乐的发展和拉斯塔法里教成员取得了音乐的掌控,在西印度群岛的社群中相应地出现了一种日益普遍的阶级意识和肤色意识。毫无疑问,我不会将一种“更强的意识”的出现与其在贫民区和美国校园中的更大规模的发展相脱离。当然,我也不会忽略牙买加黑人权力运动所产生的激发作用——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这一运动一直由中产阶级学生领导,紧紧环绕在西印度群岛大学的周围。^①但是,我更愿意强调这些外部发展因素同(布林克斯顿及墙后地区)小混混们进行调和的独特方式,以及它们是如何被那些处于雷鬼乐核心、无所不知的拉斯塔法里教的逻辑所吸收、解释和重组的。尽管有曼利和西加,但是雷鬼乐自身还是没受什么影响。由于雷鬼乐受到了语言、肤色和文化的保护,所以人们从来没能操纵它,而且这种文化从一开始就被迫秘密发展以提高抵御统治阶级侵扰的能力。

此外,雷鬼乐自身的形式也妨碍了外来的干涉,确保了一定程度的自治。雷鬼乐通过对强烈的、重复的低音器乐和声(bassline)的强调,颠覆了流行音乐已经确立的模式,^②这种低音和声可以直接传达到身体上,使得演唱者可以跨过节奏的起伏波面去“模仿器乐声拟唱以替换那些无意义的音节”。在优秀的雷鬼乐作品中,音乐和歌词在一定的层面上是同步和协调的,这就避开了固定的解释。语言模式成了音乐

① 牙买加黑人权力运动机关报《阿彭》(Abeng),就将拉斯塔法里教的“各种隐喻”直接翻译成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这份报纸的专栏里,经济分析不无焦虑地冲击着个体“受害者”的那些强烈的个人陈述。在另外一些事件中,大学对于黑人权力历史学家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的禁令促使这一运动去明确政治方向。参见Rodney(1969)。——原注15

② 尽管“重摇滚乐”(heavy rock)也有一种显著的、令人催眠的低音和声,但是没有与雷鬼摇滚中的这种“模仿器乐声拟唱”完全对等的成分。一些现代爵士乐也在这个层面上用语言演奏,但是这种爵士乐主要也是由黑人音乐家创造的(例如Albert Ayler,Roland Kirk,Pharoah Saunders和John Coltrane等)。——原注16

模式；两者融入了新陈代谢的过程，直至声音变得很抽象，意义变得很模糊。因此，在“沉重的”雷鬼乐一边，除了“哭泣者乐队”明晰但如实的谴责外，拉斯塔法里教的“康特·奥西乐队”(Count Ossie)和“神秘启示乐队”(the Mystic Revelation)也含蓄地谴责了巴比伦(欧美歧视黑人的主流白人社会)的诸多手段，这些音乐人把雷鬼乐直接带回到了非洲，而小混混们的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像Big Youth, Niney, J-Roy和U-Roy)，甚至威胁要用词中省略的克里奥尔语的韵律诵读节奏以及一种对难以表达的东西的判断力来削弱语言。语言让位于肢体语言、信念和直觉；在形式和定义上，雷鬼乐都抵制界定。^①因此，形式具有内在的颠覆性；牙买加街头男孩正是在形式领域完成了他们最重要的创新。

3 光头党的穿插表演——跺脚舞步不得不停止的时候

此刻我们把黑人当英雄来膜拜——他们会跳舞、会唱歌……

我们跟着快速韵律摇摆和移动，但我们将会恢复到跳贴面舞——因为黑人这么做。

——汉布利特和德弗森编写的书中所引用的一个19岁摩登派青年的话

(Hamblett & Deverson, 1964: 22)

现在我要谈一下在英国西印度裔社群里出现的一种对应的文化形式，谈一下雷鬼乐在伦敦南部地区被接受的文化语境。我将尽力揭示：黑人青年是如何利用雷鬼乐将一种极端的文化依赖状态改变为差不多自治的状态的。

在这里没有必要再重述雷鬼乐在英国的早期发展史。我已经介绍

① 同样，“重”灵魂音乐的句法也排除了词汇的意义。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考察了《用石头打到骨头里》(*Stoned to the Bone*)里“发音和领悟”的关系，列出了各种用于表达“心灵力量”的词汇：“与超感官的知觉产生共鸣”，“积极思考”，等等，但是他却通过抛弃语言本身而抛弃了所有这些词汇：“它是什么，它是什么，我就叫它什么。”这种同义反复句的等式一再被重复，直到它与强烈的伴唱音乐同步，并最终被吸收。——原注17

过克里斯·布莱克韦尔和李·戈普斯尔在新音乐输入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随着“特洛伊”唱片开始在市场上泛滥，“斯卡”音乐逐渐取代了蓝色节拍，成为决定英国黑人夜生活节奏的稳定脉冲。当牙买加的骗子、皮条客和交易商进入全盛期的时候，科林·麦克因斯(Colin MacInnes,1957)所描写的非洲“海滨男孩”的时代显然已经走向衰落了，比利·惠斯泼斯(Billy Whispers)所剩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音乐通过布里克斯顿区、佩克汉姆区(Peckham)和拉德布鲁克街(Ladbroke Grove)的地下酒吧(家庭聚会)、黑人俱乐部、唱片店的网络来传播，这些地方几乎是专门为迎合西印度裔客户的。当然几乎是，而不完全是为西印度裔客户服务的。由于早期的音乐调动起一种不明确的好斗情绪，并且引发了对极端个人主义的膜拜，那么它的吸引力就不仅仅局限于黑人社群了。它很快成为“硬派摩登族”(hard mods)的主题音乐，这些人也住在伦敦南部移民聚集的经济萧条地区，他们开始仿效小混混分队的风格。因此，他们戴着“窄边”帽(套叠式平顶帽)和牙买加皮条客的大墨镜，甚至特意接受移民们通常认为无法避免的、最有可能令人不快的那些贫穷的标志。因此，不合身的时髦裸裤(ankle-swinger trousers)——通常显示出穿着者是被迫接受了这种劣质的衣服，与超短的李维牛仔裤相“呼应”，显示出“硬派摩登族”偏爱的衣着风格。甚至1964年，在马尔盖特(Margate)和布莱顿(Brighton)地区，人们还发现“摩登派青年”扎着背带穿着靴子，抚弄着一头短发，在刻意模仿黑人短发型的纹理和外观，这种发型当时很受西印度裔黑人的青睐。1965年，普林斯·巴斯特的《疯狂》(*Madness*)在“摩登派”的圈子里引起了一阵狂热，成为伦敦南部摩登派青年经常光顾的大舞厅固定点播的曲子。黑人小混混文化和白人小混混文化之间的这种联系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而且使得评论者们对于青年文化产生了一种非常困惑的反应，并促使他们开始郑重其事地讨论青年文化。

“斯卡”音乐显然满足了主流的流行音乐不能提供的那些需求。它是一种地下音乐，躲过了全国范围的商业炒作和利用，仍然为最初拥护它的亚文化群体“所拥有”。它用一种尽可能令人愉悦的方式暗中攻击别人，用一种处于工人阶级文化边缘的准青少年犯一听就懂的语言

来谈论色情和暴力的简单易行(simplicities)。这种处在发展中的“先进的”白人音乐已经变得过于理智,过于指向毒品,以至于无法同“硬派摩登族”产生任何联系,他们的生活与新的嬉皮士文化正在萌生时所依赖的那种关于表达的、有文化教养的环境完全隔绝了。当然,英国广播公司(B.B.C.)算不上是理想的媒体——在晶体管收音机里播放的“斯卡”乐是零乱的,而且完全丧失了冲击力——因为没有足够的低音。此外,像普林斯·巴斯特的《十戒》和马克斯·罗密欧(Max Romeo)的《梦遗》(*Wet Dream*)这类唱片的歌词都很难让人接受,大多数新唱片刚一发行就都被归为不合适的作品。因此,音乐依旧是秘密的,只能在带有共济会氛围的密切的社群交流和亚文化群体交流当中才得以传播。布林克斯顿的“拉姆·杰姆”(Ram Jam)酒吧是伦敦第一批白人青年和黑人青年混处的酒吧之一;但是围绕这种新音乐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声名不佳的、与暴力有关的观念联想。在“拉姆·杰姆”有不少关于刀子和大麻的故事,对于任何一个想要掌握自己命运的白人小混混来说,走进布林克斯顿来证明他自己充装的(pilled-up)男子汉气概都太过危险了。

到了1967年,光头党已经从这种萌芽状态中浮现出来,而且被新闻界打发到“暴力威胁”的领域,而主流的流行文化则显示出越来越不情愿关注这一领域。这年夏天,当旧金山的动植物乐队(flora and fauna)在国王大街进行他们轰动一时的首次演出时,英国首位雷鬼乐明星丹迪·莱文斯通(Dandy Livingstone),为了获得全国范围的认可正在伦敦南部一些不太繁华的市镇为听众演唱《鲁迪,给你一则消息》(*Rudy, a Message to You*),他以一套不同的标准把他的乐迷们聚集在一起。这种将“硬派摩登族”与小混混亚文化群体联结在一起的联系,在光头党这里变得更加紧密了。一些西印度裔人穿的敞开的长外套被光头党改成了“克龙比式大衣”(crombie),一种在一些比较偏好雷鬼乐的群体中流行的服装[也就是说,把自己定义为午夜游荡者,而不是阿森纳足球队(Arsenal)的午后支持者]。充满渴望的“白种黑人”甚至(不太标准地)模仿西印度裔街头男孩所特有的那种笔直的姿态和松松垮垮走路的样子。在像A-Train、Sloopy's和Mr. B's这样的酒吧间里,光头

党和西印度裔青年混在一起,相互称对方为“rass”和“pussy clot”,^①他们就像纯种的牙买加人那样打着响指,尽力耍派头,尽力不显示出丝毫的畏缩相,说着“orsers”和“pum-pum”^②,尽力调动他们最大限度所能聚拢来的做作的酷劲。

这种自发的指向文化融合(当然只与西印度裔融合;不用说,并不与巴基斯坦裔和印度裔的移民融合)的运动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对于伦敦南部工人社群的种族关系并没有产生持续有益的影响。因为从事实上看,尽管光头党为追求一定程度的时髦可以来跳“曳步舞”和“雷鬼”,尽管他们能说一些随意的方言词汇,而且说的时候必然会蔑视一些英语句法,但是这一切都有点假——甚至太做作了,以至于让人无法信服。尽管有这一切,但光头党绝不可能完全促成文化的转型。当他们发现他们跟不上浓重的方言和密集的圣经典故——这是后期雷鬼乐的标志——之时,他们很可能会感觉到一种更为绝望的疏离感。甚至这个处在被排斥之列的阶层也把他们排除在外,他们被遗弃在冰冷的世界,他们被宣判要在(罪恶的)巴比伦度过余生,因为天国(Zion,或译“锡安山”)的观念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即使他们能够实现从诺丁山到亚的斯亚贝巴的那种意气相投的过渡,能够实现从没有多少价值的白人特征到可能还有其他更多价值的黑人特征的转变,但是他们最后仅仅发现自身已经更深地陷入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因为牙买加小混混们已经长大成人,外观被宣判为终生的青春期,尽管德斯蒙德·德克尔(Desmond Dekker)以一曲《以色列人》(*Israelite*,为埃塞俄比亚哭泣)荣登1969年英国流行音乐排行榜榜首,但60年代短暂的种族混合还是走向了终结。^③

① 牙买加人骂人时用的脏话,确实无法翻译。——原注18

② 也就是赌博和女人。——原注19

③ 当然,光头风格还有持续,尤其是在中部地区和北部工业城镇持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但是并没有保持自己早期与黑人文化的紧密联系。伯明翰的光头党(那里的种族关系留下了许多被期待的东西)经常公开敌视西印度裔人,而且足球往往取代了雷鬼乐,成为光头党群体重点关注的事情。——原注20

我在前面讨论牙买加的部分强调过“非洲化”(或“拉斯塔法里教化”),它非常有碍于黑人和白人青年文化之间开展持久密切的接触。而且,那个寻求种族身份认同的确切“时刻”,造成了与之前那些可以用神话方式表达的行为模式的重大断裂。在吉尔曼(Gillman)1973年所写的一篇讨论霍洛威路(Holloway Road)实施“哈拉比计划”(Harambee project)^①的论文中,一个为伦敦南区听众服务的、年轻的西印度裔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描述了唱片《有天赋的黑人青年》(*Young, Gifted and Black*)对观众——包括黑人和白人小混混们——的影响:

就是那首由麦克(Mike)和玛西亚(Marcia)演唱的《有天赋的黑人青年》,我们播放它时,所有的光头党经常唱成“有天赋的白人青年”,并且经常会剪断扬声器的电线,我们为此发生了一些争执,自那以后经常来的白人就少了。^②

这种分道扬镳在舞厅之外、在学校和工作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准备了多年。首先,正如迪利普·希洛(Dilip Hiro)所指出的,黑人和白人儿童在学校里所处的紧密关系,往往会打破那些露骨的种族神话。由于在西印度群岛接受英国化的教育,黑人的父辈培养成那种白人优越的错觉,几乎无法得到他们孩子的支持,因为孩子们与他们假想的那些占优势者比邻而居,而在他们的行为或潜力当中并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差别。但是一旦离开学校,黑人青年就会碰到其未来雇主的公然

① “哈拉比”(Harambee)一词是肯尼亚斯瓦希里语,意为“同心协力”,肯尼亚政府将其用作同心协力振兴国家的口号。此处所谓“哈拉比计划”,大概是在伦敦霍洛威路西印度裔聚居区推广的一项涉及非裔黑人族性特征的活动。——校注

② 在这篇文章的后面部分,两名住在青年旅行社的男孩被告发在讨论“行凶抢劫”的细节。他们的解释表明,他们准备对种族差异进行区分,而且屡次提及“受难”;“受难”是拉斯塔法里教的核心概念,似乎被他们用作一种指数,标示信徒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审判获得拯救的资格;第一个男孩说:我们没有去接触我们自己的人民。我从未想到要为一个黑人去受难。第二个男孩:一个黑人知道我们所有人都蒙受着同样的痛苦。——原注21

歧视。由于对非技术劳动力需求的萎缩,黑人和白人毕业生就会为工作岗位进行激烈的竞争,而白人青年经常会被优先录用。如果黑人毕业生有更大的抱负而寻求技术性工作,那么他容易受到更多残酷的打击。来自《观察家报》(Observer)的通讯记者指出(1968年7月14日),在“缺少教育的”黑人聚集区,如帕丁顿(Paddington)和诺丁山,白人青年获得技术工作的几率大致是有色人种青年的五倍。迈克尔·班顿(Michael Banton, 1967)估计,到1974年,内伦敦区的毕业生中有六分之一是有色人种,由此竞争将明显加剧。黑人青年毕业生面临的这些困境,迫使他们用比其父辈更具批判性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位置。对于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第一代移民,英格兰已经许诺了一个金色的未来,而如果该许诺没有实现,另寻别的出路似乎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实际上,这样做将等于认可了挫折和失败,因此老一代的移民继续在公交车上工作或去排队领取救济,并用他们漫不经心的微笑隐藏痛苦。但年轻的英国黑人对此却不愿意听之任之,不愿耸耸肩忍耐忍耐了事,而且时下在牙买加和美国进行的对非洲遗产的重新评价,也肯定为他们提供了发泄愤怒和重拾自尊的途径。这样,拉斯塔法里教为非洲拯救而发出的呐喊,受到了那些居住在南伦敦区、饱受挫折的海外侨民的欢迎。他们首先从非洲流亡,然后从西印度群岛流亡到寒冷而荒凉的英伦诸岛上,再到伦敦谢泼德·布什区(Shepherds Bush)和布里克斯顿区,这些无依无靠的牙买加小混混们,都有一种愈合伤口(Healing of the Breach)的强烈渴望,只不过小混混们在感受这种渴望的时候带有一种更强烈的辛酸感。

希洛以1958年出生于伦敦的诺埃尔·格林(Noel Green)为例,对英国有色人种青年的新黑人意识与他们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父辈的那种更清醒的态度进行了对比。格林的父亲安东尼(Anthony)抱怨说:

年幼时,他希望自己被称为英国人。但如今(1969年)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西印度群岛人,一个黑人。(1973)

这些(观念上的)进展被翻译成专门的牙买加术语,而留着长发辮

的男人们开始再次邪恶地出现在大都市灰色的街道上。直到1973年,麦格拉申(McGlashan)还可以描述非洲和英国伊灵市(Ealing)在西伦敦大拉斯塔法里舞会(Grand Rastafarian Ball)上所产生的奇怪结合,两次离开神话家园的拉斯塔法里教信徒,在这里看到傻笑的白人女孩也随着雷鬼乐起舞时,他们一致渴望结束这“苦难”。对海尔·塞拉西一世的狂热崇拜,对于英国黑人青年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与对他们生活在牙买加的同辈亲戚的吸引力一样强烈。要说它表明了什么更具吸引力的东西,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它既给予这个受困的社群一个名字,又给予他们一个未来;许诺那些被流放数百年的、失散的以色列部落(Lost Tribes of Israel)^①将获得公正的报偿,将摆脱奴役之苦;培育一种回收的艺术(the art of withdrawal),以便被排斥的东西可以通过排斥得到补偿。所有这些都反映在音乐中,并通过音乐得到传播,它在英国的受众规模甚至比在它的母国还要大,还要狂热。当然,当光头党听到拉斯塔法里教成员唱到“穷人们”在寻求“和谐”时,听到那些使用拟声唱法的流行歌曲节目主持人在劝告他们的黑人兄弟要“与邻为善”时,他们就满怀狐疑地走开了。对于光头党来说,更为可憎的是,拉斯塔法里教成员欢迎“和平与爱”,而许多年轻的混混们接受了这一点(排队与拉斯塔法里成员握手)。风水轮流转,光头党当年曾经试图从性格内向的黑人违法青年的小圈子中寻求避难,以躲避吸毒嬉皮士的那种装腔作势的福乐样,如今又碰上了当初致使他们退出的那种态度。由于小混混们已经团结起来,看起来他们真的已经改变了立场,而困惑的光头党只有被双重地拒之于门外了。

我们只要回到我已经尝试解释过的拉斯塔法里教的神话,就会发现这种结局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早晚而已。西印度裔移民的语言、节奏、风格以及他们那种转置的宗教都决定了,他们的文化不可能

① 失落的以色列部落,指《圣经》中记载的历史和传说。据称公元前722年亚述人攻占了以色列,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占领了犹太(南以色列),以色列王国的10个部落遭到流放,犹太人从此流离失所,散落到世界各个地方,因此称为“失落的部落”。拉斯塔法里教认为,非洲黑人就是遭到流放的以色列人的真正后裔。——校注

受到同类白人群体的深度渗透。同时,对于被放逐和疏离的神圣化颂扬,使他们能够维持自己的社会边缘位置而不会丝毫感觉到文化迷失,使他们能与社会保持足够的距离,从而能对社会——对这个社会他们缺乏所谓的忠诚——做出高度批判性的分析。至于其他情况,圣经术语、火焰、水闸、海尔·塞拉西及其他人等,也被用来复兴政治活动,提供那些包裹经济结构骨架的神话外衣,以便可以用拉斯塔法里教所推崇的传统方式来揭示剥削并抵抗它。由此创造的元体系(metasytem)围绕那些准确但又模棱两可的参考术语建立起来,同时,由于它仍然植根于遭受巴比伦和压迫奴役之苦的物质世界,它就可能在接到信号的那一“瞬间”逃入到那个超越了主流意识形态时限指标的理想领域。采取这种间接的交流形式可以获得一些实际的好处,因为如果选择一种直截了当的反叛语言,更容易受到它所对抗的统治阶级的对付和同化。吊诡的是,只要“恐惧”对于它预期的受害者来说依然显得高深莫测,它就正好可以传播,这意味着一种永不满足的复仇所采用的那些不可言表的仪式。拉斯塔法里教的异国情调提供了一些令人迷惑的屏障,在其背后小混混文化可以继续追求它那些纵横自如的、未被发现的迂回技巧。

附录:失业,街头男孩文化的社会背景

雷切尔·鲍威尔

1943年,牙买加的失业率是25.6%,到1945年由于牙买加退役军人和战争期间在英国工作的人员回国,失业率增高(Richmond, 1954: 140)。西迈(Simey)(1946:136)分析了先前调查团的报告,并且注意到存在一个矛盾——一方面为了拨款改善社会福利事业(西金斯敦急需)需要进一步提高国家生产力,另一方面又要给那些因对更高生活水平的渴望而激发的更高的个体生产力提供更多机会——这一矛盾进一步加剧了工作机会的短缺。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牙买加实现了世界人均生产率的最高

增幅(Lowenthal, 1972: 297), 而且工业, 主要是采矿业和旅游业, 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铝土矿开采, 主要是由加拿大的利益集团开发的, 给“一些人”提供了报酬相对丰厚的工作——人均415英镑, 将近全国人均工资的四倍——但是, 这“一些人”不足总劳动力的2%, 而且还包括了数量不等的外籍职员(Francis, 1963)。同样, 1958年的数字(来自金斯敦的社会与经济研究院)显示了对旅游贸易扩展带来的收益进行分配的情况——纳税一百万英镑, 约占总支出的6%; 大约27%用于与旅游业相关的工资支出; 39%随即就汇到牙买加境外的机构和个人。就国内而言, 这种发展意味着牙买加同时创下了目前收入分配最不平衡的世界纪录, 占人口5%的最富有的人拥有国家收入的30%, 占人口20%的最贫穷的人仅拥有2%的国家收入(Ahiram, 1966)。《牙买加观察者周刊》(*Jamaica Weekly Gleaner*)的报道(1971-10-11)反映了外界对于这一动荡的形势的关注: 在加拿大和牙买加政府签订的协议中写道, 保险范围将覆盖“商业保险公司通常不予投保的一些风险, 包括没收财产(即国有化)导致无法把收益或资本遣返回国, 以及因叛乱、革命或战争而造成的损失”。

对于个人而言, 战后发展也就意味着改变。M.G. 史密斯(M. G. Smith)发现, 在农村地区1955年只有16%的人(选取的是25岁以下的男性)在调查的前一周拥有全职工作; 44%的人只能工作半天或者更少的时间; 15%的人根本没有工作(M. G. Smith, 1965: 197)。调查中所选取的所有年龄段的农民家庭平均大概有5个成员, 每周总的消费大约是2英镑(M. G. Smith, 1956)。有关“必需”消费和“选择”消费的比较表明, 在同一时期的牙买加和英国, 只有每周收入大约14英镑的家庭才真正拥有有效的消费选择。人们也许不会觉得奇怪, 1960年的牙买加人口普查记录下的如下事实: 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大城市地区, 而且大城市此时40%的居民出生在牙买加的其他地方(Francis, 1963)。

该年度的人口普查表明, 46%的大城市男性居民每周的收入低于4英镑, 将近8%的人不足1英镑。就业统计表给出的城市失业率是11.9%, 相对于牙买加全国6%的失业率来说, 这一数字是很惊人的。批评者们注意到人口普查所选择的那周, 即4月1日至7日, 刚好是收割季

节,这一周几乎无法反映那些只能工作半年的人的情形。城市工人失业率为13%,而农村地区,即使是在收割季节,平均失业率也在30%。茹斯科(Rusco, 1963:67)引用了《每日拾穗报》(*Daily Gleaner*)的估计数字(1962-02-07),后者表明有10万人长期失业,占可用劳动力的15%,加上还有数量不等的处在半失业状态的人,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政府把就业数字当成机密来看管。但是到1972年4月,继任的人民国家党政府却相当坦率,在一次BBC的采访节目中,把失业率问题纳入到了他们所接手的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当中,认为在金斯敦,成人的失业率是15%—20%,高达30%的青年人正在找第一份工作。

(王蕙译)

11 一种生存策略

伊恩·钱伯斯

编者按：伊恩·钱伯斯致力于批判用于文化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的符号学方法存在的形式主义和非历史主义问题。他对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著作的评价发表在《文化研究工作论文集》(WPCS)第6期上。到目前为止,他的著作主要应用于电影和视觉文本领域。他在此提出的问题是:在对于黑人音乐的研究中,政治学和历史学分析如何才能与形式主义分析相结合(见Chambers,1985)。他认为,美国黑人的历史体验和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对美国白人文化霸权的附属地位,既被用来解释黑人音乐的典型特征,也被用来解释为什么黑人音乐会接受和改写,并被用来表达美国(和英国)白人青年的不同体验。

黑人的解放将来自非裔美国黑人革命性的文化、意识和体验之中。

——厄尔·欧非(Earl Ofari)^①

在绛紫色的傍晚,我漫步在丹佛黑人区第27街和威尔顿大街上。华灯初上,我的每一块肌肉都痛得要命。我多么希望自己是一个黑人,我感到白人世界能给予我的那些最好的东西还不够让我

^① 厄尔·欧非(Earl Ofari),全名为Earl Ofari Hutchinson(1945-):美国记者、作家和广播员,写过关于美国黑人生活经验的九本书。——校注

心醉神迷。白人世界缺乏生气、快乐、刺激、隐秘和音乐,甚至没有让人感觉够味的夜晚。

——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58)^①

摇滚的根基深深地扎根于美国黑种男人和女人的历史经验之中,而那段历史必不可少的内容便是黑人走向新大陆的迁移过程。这种迁移起因于西欧在15世纪末开始的扩张,并由殖民主义和奴隶贸易向西推进,横跨了整个大西洋。因此,西非本土黑人男女的被迫移民,同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相伴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脱离不了干系:出于追求利润的需要,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对一些社会阶层所遭受的剥削和非人化待遇进行了合法化的辩护。黑人音乐与美国黑人对自己处在一个陌生世界(alien world)中的这段历史的意识,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与社会阶级分化一同产生了新增的种族文化划分维度。

在这种情况下,黑人把他(她)们对于过去和现在的体验注入音乐之中,这种音乐虽然体现了非洲和欧洲、黑人和白人的相互渗透,但主要还是围绕黑人对于经济和社会剥夺、对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持续奴役的感受和觉醒意识而展开的。黑人把这样产生的音乐描述成“自主的”(autonomous)音乐,是为了强调黑人音乐的政治根基:它相对于白人霸权而独立存在,尽管白人文化——从斯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②的说唱艺术和“扮演黑人剧”,到拉格泰姆音乐(rag-time)^③以及大型摇摆舞乐队(swing bands),还有“白人”布鲁斯歌唱

① 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1969),美国著名作家,“垮掉的一代”的代表性人物,代表作有《在路上》(1957年)和《孤独天使》(1965年)。此段话出自他的《在路上》。——校注

② 斯蒂芬·科林斯·福斯特(Stephen Collins Foster,1826-1864),美国作曲家,他的一些流行作品如《哦,苏珊娜!》(1848年)和《家园故老》(1851年)都反映了内战前美国人的普遍情绪。——译注

③ 拉格泰姆音乐(rag-time):1890-1915年在美国流行的一种音乐。——译注

家——总是尝试着去挪用(appropriate)和抵消它。在美国黑人表达文化的历史中,最重要的是音乐依然还扎根于黑人的经验之中。我们只需考虑一下其他一些对黑人文化进行了比较成功收编的表达形式——如文学、娱乐和体育,就会发现,在这些形式中,他们的黑人特征(blackness)要么被轻易地忽略了,要么被物化或具体化了(reified),他们自己成了“隐身人”。尝试通过这些表达形式来实现黑人的目标就会遭到强烈的指责,如“拳王”穆罕穆德·阿里(Muhammad Ali)^①的职业生涯,还有1968年(原文为1972年,概为作者误记——校注)墨西哥奥运会上(两名黑人运动员上台领奖时)向黑人权力致敬(Black Power salute)的举动引起了白人的“激愤咆哮”,都是很明显的例证。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②

——卡尔·马克思(1951)

黑人音乐由以前奴隶的子孙们创作出来,通过摇滚乐这种混合形式,又被美国另一部分工人阶级——白人、乡下人还有南方的穷人——重新创作。这种挪用的经验实例在摇滚乐的早期历史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是这种联系的深刻含义需要得到清晰的阐明,因为大多数评论家都将它简化为风格上的挪用,并对它进行了非政治化(depolicitise)的处理,且削弱了其包含的深远的意义。

① 穆罕穆德·阿里 (Muhammad Ali, 1942—), 原名卡修斯·马塞勒斯·克莱 (Cassius Marcellu Clay Jr.), 美国职业拳击手。1960年, 18岁的克莱摘取了罗马奥运会轻量级拳击赛金牌, 由于对美国民间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怒不可遏, 遂将这块金牌扔进了俄亥俄河的急流之中。1964年2月26日克莱首次获得世界重量级拳王荣誉, 公开宣布抛弃原名, 认为那是奴隶的名字, 从此改名为穆罕默德·阿里, 强调自己是一个黑色穆斯林。他说, “我不必成为你们希望我变成的那个人!” 因此而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的反叛者。他积极参与反越战争, 支持古巴等第三世界的反美斗争。他于1974年和1978年又两次获得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 成为名副其实的“拳王”。——校注

② 出自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此处采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的中译文,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585页。——译注

1877年北方资产阶级和南方贵族签订的合约终结了南部各州的重建时代,自此之后,美国的阶级问题便转变成了种族问题。这种转变导致的后果,是工人阶级自身出现了内讧,并使得劳动者在与资方的关系中陷入弱势。最初组织美国劳工的重要尝试——19世纪70-80年代的“劳工骑士”(the Knights of labour)组织——就拒绝与黑人工人打任何的交道。20世纪早期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在种族之间出现了一种紧张关系,白人认为黑人是他们工作保障的潜在威胁;而这些分歧在美国经历的30年之久的严重的经济衰退时期(从19世纪晚期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进一步加剧了。

到20世纪20年代之前,已经有一些黑人知识分子为了给黑人争取部分的基本权利,进行了一些最初的实验性努力(比如“美国有色人种联合促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ured People]),这些努力随后被牙买加裔黑人马库斯·加维领导的黑人运动所接替,而加维转而强调美国黑人的非洲血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运动达到了革命性的高潮,并持续到了20世纪20年代;“加维运动”在美国黑人当中奠定了运动的群众基础。

啊,他们叫它暴风星期一
但星期二也一样的糟糕……

——摘自一首传统的布鲁斯

内战刚一结束,黑人就沿着密西西比河谷迁移到了底特律、加里(Gary)和匹兹堡之类的北方工业城市,但这种迁移却在热切期望和严酷现实之间造成了冲突——这一冲突在20世纪30年代最终剧烈爆发了。在冲突爆发的那10年当中,虽然很多黑人处在失业状态并且接受救济,但他们仍然在极端激进的普通民众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该运动1937年达到高峰时有50万人参与了静坐罢工示威。这次斗争取得的一项成果,就是促成了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I.O.,全称为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的形成。但是,实际上直到20世纪30年代结束并在随后转向战时经济的时候,黑人(至少是黑人男性)才

有机会提出和赢得更多的经济权力。这不仅为刚起步的黑人中产阶级,也为呼吁促进黑人社会和政治权利的活动创造了条件。

尽管一些黑人可以利用帝国主义社会的诸多矛盾,但美国资本家已经从1929年吸取了教训。20世纪30年代,美国资本家通过实施新凯恩斯主义的(neo-Keynesian)策略和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①,着手在白人工业区推进阶级斗争的制度化进程;与此类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面对在军营或者北方城市中出现的诸多黑人暴动,美国资本家力图从政治上去遏制黑人斗争意识的高涨。对于这种遏制政策(containment)的讨论,主要来自于民主党。1948年,杜鲁门在总统选举中因不断强调保护公民权利的口号而赢得了竞选的胜利。到1954年,最高法院做出了反对在学校中实行种族隔离的著名裁决,但却遭到了南方白人的坚决反对:在整整20多年之后,黑人才等到了对于这条法案的完整实施。但就是这点有限的进步,在50年代对“赤色分子”扣帽子进行政治迫害的“冷战”时期,也被冰封凝滞了。自解冻以来,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黑人聚居区开始出现各种反叛活动,大多数发展态势都一直在说明,美国社会已经通过资本的方式把种族主义成功地整合进了社会的各个方面。

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资本的成功扩张一直维持着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状态,后者不仅按照种族,还按照性别、国籍和技能来分化阶级。这种扩张已经从工厂移出,扩散到了整个社会(“社会工厂”),并且确保了资本的继续扩充和相对稳定。这些分化被彻底呈现在那些分裂工人阶级的日常的矛盾对抗之中:比如白人和黑人之间为争夺工作、住房、教育和社会政治权力而进行的争斗。这些分化继续折磨着60年代的美国社会,并在政治层面产生了特殊的“影响”。黑人民族主义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和黑人分离主义政治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勃兴,便是对这种通过阶级和种族实行双重剥削的事实的回应。

非洲国家的黑人民族解放斗争,为这十年中日益增强的黑人斗争精

^① 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颁布实行的一系列旨在恢复经济和改革社会的政策。——校注

神提供了重要的鼓舞,表现在午餐静坐示威、民权游行、洛杉矶沃茨骚乱等方面,还有黑人穆斯林组织(Black Muslims)和黑豹党的形成。但是尼克松政府对于黑豹党进行了残暴而成功的镇压,表明了一种未能锻造好群众基础的、不成熟的局部的政治活动所存在的弱点。工人阶级斗争仍然是局部的:黑人、妇女、学生、反战等。这样就导致了一种“激进”的局部政治,而不是一种社会主义政治:这一系列的“反对”运动——反对种族主义、反对性别歧视、反对帝国主义——经常也来反对工人阶级自身。

就好像这样一种场景:一辆无人驾驶的汽车在深夜里加速行驶在美国没有路灯的街道上,直朝着石墙撞去,这时候一个表情激动淫邪、鬼鬼祟祟的魔鬼飞速地登上了这辆车;就在要发生紊乱事故之前的最后一个转弯处,魔鬼把汽车东倒西歪地疾驶到一条通往未来和生活的平坦的高速公路上。我们要这些美国人明白他们就是这辆无人驾驶的汽车上的乘客,而那个淫荡的魔鬼就是周六晚上狂跳扭摆舞(the Twist)^①后出的一身臭汗,或者是“披头士乐队”从雷·查尔斯(Ray Charles)^②那里窃取的“Yeah, Yeah, Yeah”的咏叹;还要让这些加尔文教派的享乐者们认识到:这些合乎逻辑的相互联系,比那种希望把偷窃约翰·克尔特林(John Coltrane)^③的录音设备的乡巴佬音乐迷(Okie Music buff)处死的

① “扭摆舞”(The Twist)最初是因汉克·马拉德(Hank Ballard, 1927-2003)1959年首创并演唱的一首名为《扭摆》的歌曲所催生的一股扭摆舞狂热。1960年,由于著名黑人歌手邱比·却克(Chubby Checker, 1941-)的重新演绎,此歌曲和舞蹈曾经风靡一时,数周荣登百强歌曲排行榜榜首位置。——校注

② 雷·查尔斯(Ray Charles, 1930-2004),双目失明的美国黑人音乐家和作曲家,被誉为美国“灵魂乐之父”。他能够将福音音乐、布鲁斯、爵士乐、乡村音乐和流行音乐等各种音乐风格融为一体,为流行和灵魂乐坛划出了新的面向,是欧美乐坛最具影响力、最受尊重的音乐家之一。——译注

③ 约翰·克尔特林·威廉(John Coltrane, 1926-1967),美国爵士乐萨克斯管演奏家和作曲家,其音乐创作使爵士乐的即兴演奏突破了传统的旋律及和声的束缚,对20世纪60-70年代的爵士乐坛有巨大影响。——译注

愿望还要残忍得多。

——埃尔德里奇·克里夫(Eldridge Cleaver, 1970)^①

让我们回到音乐,考察为什么黑人音乐,特别是布鲁斯和节奏布鲁斯能够被另一部分工人阶级——本来是显然应该反对它们的工人阶级——所接受和改编。以上所述已经指明这两部分人其实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也指明由于资本家对于种族主义的利用在他们之间造成的分化。结果使得白人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比黑人工人阶级占有更多的优势地位。这便让白人有了重新界定音乐——这些音乐是客观上与白人处于同一阶级、但在文化上从属于白人霸权的黑人工人阶级创作的——的权力。

另一方面,这些“局外人”——黑人工人阶级,相较于同一阶级的白人,有更有利的位置去创作那种表达他们所受压迫的明确连贯的作品。从种植园到黑人聚居区,黑人文化,特别是黑人音乐提供了一种最强有力的生存方式——一种秘密的协作语言,一种有力地阐述所受压迫的方式,一种文化抵抗的手段,一种对于希望的呼号。毫不奇怪,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政治是由黑人文化和黑人意识的大规模高涨所引导的。黑人对于压迫的反抗,主要采用了文化的方式而不是公开的政治方式,这一事实的出现也可以归因于白人社会的文化权力,它决定了黑人文化经验中哪些方面是可以被“接受”的,哪些方面是不能被接受的。虽然黑人的“文娱演出”和黑人“艺术”开始被接受,但黑人的政治几乎肯定不会被接受。一旦黑人把他们文化所隐含的政治意义挑明了,黑人文化自身就会遭到猛烈抨击。

20世纪50年代,黑人音乐主要被年轻人和南方白人工人阶级所采用。他们通过音乐来寻求自己与大萧条时期那几代人的区别,因为在这一时期,即使是美国经济最落后的部门——南方的农业——也在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政策和“冷战”经济的刺激下开始复兴。50年代早期

^① 埃尔德里奇·克里夫(Eldridge Cleaver, 1935-1998),美国著名民权运动领袖、作家,黑豹党早期主要领导人。——译注

由美国白人青年建立起来的这种区别,这种新的身份认同,由于南方白人对于黑人音乐的强烈抗议——例如,对年轻的猫王埃尔维斯·普莱斯利演唱“黑鬼音乐”(Nigger music)的抗议——而被强化了。而这是随后出现的一些大型现场演出的预演,他的发型、衣着、舞蹈、音乐和行为举止全都组合在一起,形成所谓“猫王的风格”,后者让他成为梅森-迪克松分界线(Mason-Dixon line)南北一带家长们愤怒的出气筒(the rallyingpoint)。

她给我带来丝绸衫
她把行李放在我手上
我飞跃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①
前往那梦想的地方。

——摘自查克·贝里(Chuck Berry)^②《梦想的地方》

在白人青年亚文化群体与黑人音乐之间形成的这种矛盾性的关系,获得了美国广告业的认可证书。贵族与平民通婚被合法化了,日用品的商标被创造出来了;“美国青少年”(American teenager)从这种邪恶的联盟中走上了历史的前台。一些“贫穷的乡下男孩”——猫王、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③、罗伊·奥比森(Roy Orbison)^④、杰瑞·李·刘易斯(Jerry

① 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格兰德河上游的一个城市,1706年建市,是著名的疗养胜地。——译注

② 查克·贝里(Chuck Berry),原名查尔斯·贝里·爱德华·安德森(Charles Berry Edward Anderson, 1926—),美国音乐家和歌手,被认为是最早的和最有影响的摇滚乐表演者之一,他的音乐混合了布鲁斯和乡村音乐,还表现了年轻人那种目中无人的外表,常用诙谐幽默的表演方式。——译注

③ 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 1932-2003),美国乡村及西部歌手及作曲家,以其表现贫穷及压抑的歌曲而为人所熟知。——译注

④ 罗伊·奥比森(Roy Orbison, 1936-1988),美国歌手兼词曲作者,以其圆润的男高音闻名,他的许多叙事曲为后来的音乐家所用并广为流行。——译注

Lee Lewis)^①——恰好赶上了这个“大时代”，并在这一进程中逐渐远离了自己农村出身和阶级出身的残存。在这一过程中，一切可以被用来满足和扩展年轻人成功梦的因素，全都被吸纳了进来。巡回表演的布鲁斯音乐人在城市的街头与牛仔碰面，黑人的表达方式已经被吸纳进带有存在主义外壳的白人都市浪漫主义之中。健壮的黑人男青年变成了都市的午夜牛仔（midnight cowboy）；密西西比的约翰·胡特（John Hurt）的《糖果男人》（*Candy man*）^②变成了滚石乐队的《午夜漫步者》（*Midnight Rambler*）^③。

黑人音乐在这种被收编和被阉割的进程之外依然坚持着自身的发展；在美国黑人的经验中牢固地创造并确立了一种富有感情的表达方式。支撑这种经验的各种维度仍然完整，没什么改变：受奴役；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被剥夺；种族主义；生活在贫民聚居区等。这种音乐继续以大规模的、地下的、“隐形的”方式生存着。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黑人音乐给白人摇滚和流行歌曲输入了持续的生命和能量——它为成千上万的变体和仿制品提供了无言的、无声的源泉。但最后却是白人模仿者们收获了吸引公众的魅力和名声，还有金钱。黑人音乐家们仅限于在贫民区聚会、小型夜总会、演播室研讨会（the studio sessions）之类的场合演出，或者被排在演出海报的最后一个节目，进行那种漫无目的的一夜巡演。然而，尽管存在这种残酷的剥削，黑人音乐仍然依据自己独立的根源和形式，在茁壮地成长、发展和变化。

像所有的民间音乐一样，黑人音乐是一种颇具感染力的音乐，不同于追求更强理性和“精确”逻辑（或者非逻辑）的当代西方古典音乐。

① 杰瑞·李·刘易斯（Jerry Lee Lewis, 1935—），出生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康克迪亚县（Concordia Parish），是一位白人摇滚乐手、作曲家和钢琴家。——译注

② 约翰·胡特（John Smith Hurt, 1892或1893—1966），美国著名的乡村布鲁斯歌手和吉他手，生于密西西比州卡洛尔郡（Carroll County），《糖果男人》（*Candy man*）这首歌首唱于1928年。——译注

③ 《午夜漫步者》最初发布于滚石乐队1969年出版的唱片专辑《任血流淌》（*Let It Bleed*）。——译注

与大多数欧洲民歌一样,孕育黑人音乐的西非音乐也是建立在五声音阶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欧洲的管笛乐——例如苏格兰音乐、西西里岛音乐等——更接近于布鲁斯音乐而不是欧洲古典音乐。)当被白人受众欣赏、被白人音乐师重新创作时,黑人音乐在被改写进一种全新语境的过程中经历了一种转变。在这方面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基本的十二小节布鲁斯形式(twelve bar blue pattern)虽然很简单,却包含着可以促成发展和即兴演出的惊人的潜力。它是一种基础原理极易把握的音乐,而且可以为一些音乐探索提供基础,无论是对于一首基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①还是约翰·柯尔川(John Coltrane)^②的歌。(1955年,在最复杂、前卫的爵士音乐家查理·帕克^③临终之际,“当他看到年轻人又重新玩起布鲁斯音乐时”,他对阿特·布莱基^④的影响力深表惊叹和疑惑。参看Halland Whannel,1964:89。)在英国,正是呈现在“噪音爵士乐”(skiffle)^⑤当中的这种十二小节布鲁斯形式,在演奏复古派爵士乐的高难技艺与音乐创作的民主化之间建立了联系,这种民主化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出现的数百个噪音爵士乐团体所引领的。但噪音爵士乐本身就是从黑人音乐中借鉴来的——它可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新奥尔良的“痉挛”乐队(‘spasm’ bands)和20世纪40年代纽约哈莱姆区(Harlem)^⑥的“跳”乐队(‘jump’ bands)。

① 基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1942-1970),美国音乐家,经他改新的电吉他对摇滚乐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译注

② 约翰·柯尔川(John Coltrane,1926-1967),美国爵士乐萨克斯管演奏家和作曲家,其音乐创作改革使爵士乐的即兴演奏冲破了传统的旋律及和声的束缚。——译注

③ 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1920-1955),美国音乐家和作曲家,爵士波普运动的领导人,以其流畅感人的即兴演奏而受人们怀念。——译注

④ 阿特·布莱基(Art Blakey,1919-1990),美国爵士乐鼓手,最早使用交叉节奏的打鼓方式,将鼓乐融入小乐团改编剧目。——译注

⑤ “噪音”爵士乐(skiffle):也称“早期爵士乐”,是用自制乐器,例如小笛、敲击板或罐子演奏的爵士乐、民间音乐或乡村音乐。——译注

⑥ 哈莱姆区(Harlem)位于纽约曼哈顿北部,傍倚哈莱姆河和东河。1658年荷兰人从印第安人手中抢得此块土地,并在此建立起荷兰人寄居地——新哈莱姆区。1910年以来,迅速

黑人音乐不仅是各种文化决定因素给黑人工人阶级施加影响的产物,同时也是直接源自那种特定生存状态的物质条件的一种表达形式:“呼唤-应答”模式和田野劳作的劳动号子还深深地铭刻在当今的黑人音乐——无论是在节奏布鲁斯、灵魂音乐还是爵士乐——当中。人们通常认为,表现布鲁斯典型特征的发音含糊的音符,起因于要让在五个音符范围内创作的音乐去适应那些为十二均分律的八个音符所设计的乐器。但是就所有这些风格特点而言,更重要的倒是:它们不仅体现了自己是如何展现特定文化语境的,而且体现了这种特定语境是如何把这种音乐巩固成为观众和表演者共享的经验的一种抗争和幸存的文化、一种特定的境遇以及因种族主义所强化的阶级力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这种形势(situation)。这种复合体导致了一种一定会在音乐中进行明确表达的敏锐的自我意识。

黑人音乐依靠其灵活反映和适应黑人生活各种不同经验和处境——如作为奴隶、农场工人、摘棉花者、酒吧表演者、妓女、女仆和女服务员等——的能力而得以流传。随着黑人移民到北部一些城市,更进一步的音乐发展线路也打开了,并为白人青年亚文化对它的挪用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工人阶级集中的地带,黑人音乐得到了进一步的提炼,用以描绘市区贫民生活的感受。吉他换成了电子吉他,并增加了节奏乐器,把黑人贫民区的噪音变成布鲁斯音乐。渐渐地,布鲁斯又变成了节奏布鲁斯。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城市变成了黑人的领地”(詹姆·博格斯^①),而那里创作的音乐回响在世界各地的哈莱姆区(即黑人聚居区)。正如吉米·华斯林(Jimmy Rushing)曾经预言的那样,布鲁斯音乐已经成了“与每个人相关的事”。

从厨房出来吧

增多的黑人居民使该地成为美国最大的黑人聚居地,20世纪20年代黑人艺术及文学的兴起被称为哈莱姆文艺复兴。20世纪50-60年代,这里也以犯罪率和吸毒率居高不下而闻名。——校注

① 詹姆·博格斯(Jame Boggs,1919-1993),美国黑人政治活动家、汽车工人和作家。——译注

弄响那些罐子和盘子
——来自歌曲《震颤、作响与摇滚》(Shake, Rattle 'n' Roll)

《震颤、作响与摇滚》这首歌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摇滚乐的早期,我想通过考察它的两个版本来论证:黑人音乐在被白人挪用的过程中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这首歌最流行的版本是比尔·哈利(Bill Haley)和他的彗星乐队(the Comets)^①(这一例外证明:哈利是早期摇滚音乐家中非常罕见的非南方人和非年轻人)演唱的,是胖子乔·特纳(Big Joe Turner)^②演唱的节奏布鲁斯版的翻唱版。一些评论家已经注意到,哈利删除了原歌词中明显带有性暗示的内容,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版本在声乐和器乐之间的动态关系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别。

在哈利的版本中,人声处于最突出的位置,而器乐是背景。这种处理源于美国白人音乐创作史上出现的几条线索。在成为摇滚演出乐队之前,比尔·哈利和彗星乐队有好几年曾经是“乡村和西部乐队”。乡村和西部音乐尽管有其复杂的关系,但基本上是布鲁斯和欧洲民间音乐的混合物。乡村和西部音乐中有一种明显的重音来强调它作为舞蹈音乐的特征,它同样也伴随着许多布鲁斯和节奏布鲁斯的元素,并且有人在大声地呼喊舞步。在哈利的《震颤、作响与摇滚》中,这个传统并没有丧失:因为唱的歌词少于喊叫的歌词。这种对人声的强调符合并适应了锡盘巷流行歌曲(Tin Pan Alley)^③的惯例;在那里,最重要的是歌手——克劳斯比(Crosby)、辛纳特拉(Sinatra)、科摩(Como)——而不是歌曲,而且歌手也是商业炒作的主要媒介。

-
- ① 1954年美国歌手比尔·哈利(Bill Haley, 1925-1981)同他的“彗星”乐队(the Comets)一起录制了《绕着钟表摇滚》、《震颤、作响与摇滚》等有影响力的早期摇滚歌曲。——译注
- ② 乔·特纳(Big Joe Turner, 1911-1985),美国爵士乐和节奏布鲁斯歌手,以类似于喊叫的唱歌方式脱颖而出,极大地推动了节奏布鲁斯和早期摇滚乐的发展。——译注
- ③ 锡盘巷流行歌曲(Tin Pan Alley):锡盘巷是位于纽约第28街(第五大道与百老汇街之间)的一个小巷,由于那里集中了很多音乐出版公司,巷子里交织着的琴声宛如敲击锡盘而得此名。锡盘巷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美国流行音乐出版中心,也成为流行音乐史上一个时代的象征、一种风格的代表。——校注

我们在此应当考虑到,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唱片业的急剧扩张,音乐制造业会进一步牵涉到一连串的中介因素。在扩张的过程中,关注的重点从录制好的表演(*recorded performance*)转向对表演的录制(*performance recording*);与此相关联,这使得音乐生产业也必须从对歌手的关注转向对录音明星的关注。摇滚乐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头一次!它是第一种主要通过录音而获得广泛欢迎的音乐。它经历了这样的生产流程:策划者、词曲作者、制作人和录音师,然后由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广播电台和现场表演来“提供服务”(serviced)。基本上只有在20世纪50年代的黑人流行音乐当中,录制好的表演依然还很重要。(说早期“猫王”和杰瑞·李·刘易斯的唱片不在这一类似的范畴,这多少有些不公平;但这些都很快被大规模的音乐生产流水线——就猫王而言——和电影生产流水线给吞没了。)

在乔·特纳演唱的原初的《震颤、作响与摇滚》版本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声和乐器之间的紧密结合,人声作为一种平等的参与元素,并不比乐器有特权。而哈利的叫喊式的歌词则是白人制作的产物,因此在特纳的版本中,随着乐器和人声的紧密结合,我们发现了另一种文化传统的成果:在这个传统中,布鲁斯吉他手和钢琴手经常要作曲、填词并要表演歌曲。与此类似,在爵士乐中,所用的“基准曲”只是为真正的音乐创作——即兴创作——建构这种和弦基序(*chordal base-sequence*)的。(与查理·帕克及其后面的“激进爵士乐”相关联的“比波普爵士乐”[*be-bop*]^①时期,跨越“标准的”和弦进行(*chord progression*)直至极限值来开展即兴表演。)由此产生的音乐,是在观众和表演者的共同文化和社会语境紧密结合和具体化以后产生的一种表达,其中的原因,我希望自己上文中已经比较清楚地阐明了。换言之,这种音乐是在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和文化语境激发出来的,这种语境随后可以在唱片上被“捕捉”到。这种早期田野劳动号子中“领头者”与参与者互相应和

① 比波普(Be-bop):一种爵士乐风格,以节奏快、器乐技艺精湛而著称,可依据有和声感的旋律和结构的结合来即兴演出。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最终成为现代爵士乐,到20世纪60年代达到一定的成熟状态。——译注

的关系,依然在即兴表演中得到了保留和再现,成为更高级的“表演”爵士乐的显著特征。

即使白人音乐家在黑人音乐的直接影响下,这时也有意识地尝试将人声和乐器结合起来——如滚石乐队(the Stones)、电子迪伦乐队(electric Dylan)和披头士乐队,后者在他们第一张密纹唱片(L.P.)录制中尝试在录音棚中达到一种“现场”的感觉——但声乐的重要性却几乎不容反对了,除非有时采用滚石乐队那种极其严格的方式:《滚动的骰子》(*Tumbling Dice*)^①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如果只是为了强调音乐风格是如何被各种社会和文化的决定因素定位的,那么可以比较一下查克·贝里1957年录制的歌曲《66号航道》(*Route 66*)与滚石乐队1963年新录的版本,他们对于声乐与器乐孰轻孰重的不同强调也表现得相当清楚。我们会再次发现,在滚石乐队演唱的版本中,米克·贾格尔“在前边”主唱,而其他乐队成员则“在后边”进行伴唱。而在查克·贝里的版本中,人声和吉他是互相交替的。

我确实非常喜欢你们以一首歌开始这个会议。它让我想起自己还是一个年轻工人在华盛顿西区伐木营地工作的时候,我偶尔会去西雅图,沿着木材滑送道(skid road)直走到世界产业工人会堂(Wobbly Hall),那时我们的大会总是以一首歌开始的。歌曲是伟大的事物,它把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团结在一起。

——哈维·欧·康纳(Harvey O'Connor),
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成员

我已经尝试将黑人音乐定位为是由一部分特殊的工人阶级创作

① 《滚动的骰子》(*Tumbling Dice*)是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和基思·理查兹1972年所写的一首摇滚歌曲,收入唱片集《在主街流放》(*Exile on Main St.*)。歌曲讲述一个赌徒无法相信任何女人的故事,运用了布鲁斯布吉伍吉舞(boogie-woogie)的节奏。这首歌的录制地点选择在法国滨海自由城(Villefranche-sur-Mer)附近一个城堡的地下室,并且让歌手白天睡觉,任何人在晚上露面时就会录音,而且对录音过程有严格的记录。——译注

的,他们的表达在主流的社会界定中一直被视为非常次要的东西。我已经说过,这种情况赋予了音乐一种张力;它撬开了一个裂缝,这个裂缝揭示了黑人音乐的历史记录与它的意义表现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这一点反过来使我们能够从它的生产和它随后被多重挪用这两个方面,来断定它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它表明了音乐在美国黑人工人阶级文化中处于深层位置。正如一位作家指出的,对于黑人来说,灵魂乐这一意识形态就是“其生存策略中一项强有力的武器”。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了为什么白人对于黑人音乐的挪用总是显得那么肤浅。一旦将这种音乐从其原初的语境中分离出来,它就被改写成一种风格性的面相了。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我们可以看到光头党会把“黑人骄傲”(Black pride)的歌词改写成“白人骄傲”。当白人青年群体挪用这种以其特有形式同白人霸权做斗争的黑人音乐,又试图抹消这种挪用存在的各种矛盾的时候,由此产生的紧张关系无疑强化了这种显而易见的浅薄表现。

在这篇文章中,我并无意于把黑人、年轻人放在一边,把白人、父母放在另一边来进行拙劣的比较。显然,英国青年,尤其是工人阶级青年,对于黑人音乐的间接挪用,满足和表达了一些不同的具体的需要。然而,内嵌于黑人文化和黑人音乐当中的是一些对抗性的价值观,在一种新语境中可被用来象征和表现英国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所释放的各种矛盾和张力。

(胡疆锋 林孝杰 译)

12 (社会)结构、文化群和个人经历

查斯·克里彻

编者按:本文是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员撰写的一本关于“行凶抢劫”的小册子中节选的,这本小册子名为《二十年》(20 Years),由“保罗、吉米和穆斯塔法声援委员会”(Paul, Jimmy and Mustafa Support Committee)出版。这本小册子讨论了在汉兹沃思(Handsworth)发生的一例抢劫案,三名年轻人(保罗、吉米和穆斯塔法)因抢劫一名爱尔兰工人被判长期监禁,以儆效尤。尽管“抢劫”并不是黑人所专有的犯罪行为,但在媒体和公众眼里,这种事却与黑人青年密切相关。在1972-1973年间,由于抢劫案件的增多,社会上出现了严重的“道德恐慌”;这本小册子指出,如果不能充分理解黑人青年的现实境遇,不能理解那种促使那些深陷种族歧视之害的黑人孩子把“抢劫”作为一种合理选项的思维“逻辑”,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一现象。为了把社会环境如何使得某些个体成为主流文化所定义的罪犯这一观念阐述得更为详尽,本摘要使用了三个相关的概念:(社会)结构、文化群和个人经历。尽管此处将这三个概念特别运用于黑人青年,但是本摘要对于理解一般青年群体的地位也有极为广泛的参考意义。对于中心有关“抢劫”的研究所做的更充分的阐述,可参见:托尼·杰斐逊的硕士论文《探寻一种越轨社会理论:1972-1973年间的抢劫案》(For a Social Theory of Deviance: The Case of Mugging, 1972-1973);杰斐逊和克拉克1974年所写的论文,见CCCS油印版论文集第17期;以及本

中心关于1972-1973年间的抢劫恐慌所完成的研究著作《监控危机》(Hall et al.,1978)。

对保罗·斯托里(Paul Storey)、詹姆斯·杜格南(James Duignan)、穆斯塔法·福阿特(Mustafa Fuat)的判决标志着“道德恐慌”达到了高潮,它以三位青少年的受迫害来满足自己的复仇需求。这些判决与我们所理解的罪行的本质完全不相称,也没有反映这三个男孩非常有限的、完全无暴力倾向的前记录(previous records)。即使没有对“抢劫”的恐慌,我们也会怀疑现有的解释犯罪、对待犯罪的思维方式能否产生出一种不同的判决结果。判决可能只会有程度上的不同,而不会有性质上的区别。现有的司法和刑罚制度极端僵化,这意味着一种犯罪越难理解,人们就越容易把一些所谓本质野蛮凶残(basic savagery)的观念当作最简单的解释,而这一点又为野蛮的判决提供了合法依据。正是由于在理解个体犯罪或系列犯罪方面缺乏灵活性,不但导致了这些判决的出现,而且导致人们无法理解所有犯罪活动的本质,无法依据作为社会成员的罪犯的生活来叙述犯罪行为。

因此,我们希望提供一个理解犯罪的(理论)框架,如果这个框架被用于理解这起特定的案件,就会揭示出:各种传统的解释犯罪和惩罚犯罪的方法,其实是无法正确地理解和“处理”像这起案件一样复杂的犯罪的。我们要甄别一下在每个人的生活境遇中促使他(她)可能参与犯罪的三个因素:(社会)结构、文化群和个人经历。(社会)结构指的是每个人的生活境遇中那些似乎超出个人掌控能力的“客观”因素,这些因素源于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分配状况。这些结构性的因素合在一起,将单个的个人和家庭与其他个人和家庭联系起来。工作、收入、住房和教育一直担当这个社会的基础结构,但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其他的一些结构因素可能会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例如,在我们很多大城市的内城区,种族因素就成为歧视链条上决定性的一环。首先,一个个体或一个关系密切的社会群体的地位,与社会的基本结构有关联:这些基本结构不仅限定了当下的体验,而且限定了所有可预见的未来的界限。我们并不是说,生活在这些结构中不好的(wrong)一

端——如住着简陋的房子,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干着枯燥乏味的工作,挣着微薄的工资——就一定会导致犯罪,也不是说一旦消除了这些结构限制,犯罪就会极大地消除。的确,人们不会如此简单地对自己的周边环境做出反应。相反,人们已经为自己创造了,并且仍在创造着各种包含观念、信仰、价值观、是非观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我们把这些东西就称为文化群(*cultures*)。

我暂时接受现状是因为我目前对它无能为力。等到有机会出现我必须去抓住它。那时候我可以干掉某个人,拿回欠我的东西。但现在机会还没有到来,需要等很长一段时间。等机会来的时候我会看到它的。这个国家老一辈的黑人只会逆来顺受,只要周围有这些人存在,我们就无法团结在一起。我们脑子里都应该这么想:我们必须干掉这帮人,拿回欠我们的所有东西。

(一位18岁英国黑人青年的话,引自Gillman,1973)

因为我身无分文,我才不得不多次去偷盗。我闯进了贝克大街(Baker Street)的一间公寓……但我没拿到一分钱。因为我流落街头,所以我很累——像个老人似的。我不大在乎我变成了什么样。我现在吸毒。我现在服药。

(一位22岁英国黑人青年的话,引自Hines,1973:39)

我已经五次被定罪。其中有两次很愚蠢——说我是领取冰激凌的嫌疑犯。另外三次被判定为抢劫,但是我一次也没干。其中一次,在少年拘留所就关了我6个月,随后我去了伦敦的中央刑事法庭,法官认为我有罪,罚了我10先令。10先令,而且还让我在里面待6个月,法官居然厚着脸皮问我是不是现在身上就有10先令。……我以前从来不恨白人。我现在仍然不恨所有的白人。但是,正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去恨……我总共在里面待了15个月,因为那些我从来没做过的事而被关起来。我怎么能喜欢那些把我关起来的人?

(一位18岁的牙买加裔青年的话,引自Gillman,1973)

当你做这件事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为了钱……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得到一英镑,就算是很多的钱了……你今天晚上想出去,但你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挣到钱,你就在马路上边走边想怎么能弄点钱,突然间你看到了这个人,然后你说,喂……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黑人青年的话,引自Gillman,1973)

社会中不是只有一种文化,就像不仅仅有一套是非观念一样。对于人们不愿接受和不容许的行为,社会可能会有一种大家一致认可的、最低限度的界定,这种界定可能包含在法律的某些规定当中;但是很多法律对于严重犯罪的界定,却在复制当权者所认可的文化价值观。在一种文化中被视为正常的东西,很可能在另一种文化中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这可能包括家庭模式、财产观念,甚至包括对暴力的容忍限度。在许多时候,一个在法庭上被指控犯了罪的人,在他所属的文化群落看来,也只不过是做了一些他们一直认为是自然和正常的事情。

在这里,个体所能进入的文化群提供给他文化选项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文化群可能源自于青年、阶级、种族方面的组合,或者源自单纯的区域性的分组:个体或许只能接触到一种或几种文化群,而且每一种文化群所提供的道德价值观可能是清楚的,也可能是模糊的。再次申明一下,我们并不是想说,仅用个人所处的文化环境就能解释所有的犯罪行为,而只是想说,在解释青年人的犯罪行为时,应该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特别是在有些个体几乎接触不到那些遵纪守法的文化群的情况下,这一因素更应该受到重视。

(社会)结构和文化群在判决政策中很少受到重视,只是含糊地提及“交友不慎”或“处于不良环境”。而受到更多重视的是个体的私人生活,包括他的学校成绩单、精神状态,特别是家庭环境。尽管也有一些试图去回答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的尝试,但是总的看法还是认为:个体在非常有限的社会环境内,经由几个传播道德观的基本途径与社会产生关联,然而这种联系是脆弱的,这些传播途径很容易因为个体反应的失灵或缺乏而无法完成任务。因此,把“家庭破裂”作为犯罪起因的

常识性看法现在非常流行。但这种常识是有局限性的和缺乏可信度的。之所以有局限性的,是因为它从来无法全面地解释像暴力犯罪这样的极端犯罪形式。对于一些更“出格”的犯罪行为,人们更容易回溯到用野蛮凶残和道德败坏之类观念来解释它们。之所以缺乏可信度,是因为并非所有破裂的家庭都会引发犯罪,因此家庭破裂本身永远不可能成为一种理由充分的解释。

解释上出现的这种不确定性源自于解释者不能正确地理解个人经历在个体的全部生活境遇中所起的作用。这种常识性的看法由于没有(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概念,因此缺乏可以给个体的特殊经历进行定位的背景。事实上,它隐含了一种对社会如何运转的相当奇妙的想象:我们看起来或多或少都是在孤军奋战,和自己的心魔在做斗争,只能用家庭、朋友或老师的责难和热情来获得拯救。站在这样一个立场,是永远无法理解犯罪的整体社会背景的。

对我们而言,个人经历是一个网络,包含了个人境况、决定、幸运和不幸等因素,而这些因素都出现在已经被高度结构化了的的环境之中,并且只有数量有限的、可供选择的文化选项。

一天晚上当我们走出位于贝斯沃特(Bayswater)街上的一家酒吧时,雨下得很大。我们本希望能到地铁里睡觉,但地铁已经关了。于是,我们就沿着道路向前走,走到一栋非常豪华的公寓门口,就是大厅里铺着地毯的那种。

我们走进大厅,坐在长椅上,虽然关上了前门,但还是有点透风。于是我们想我们应该坐电梯到顶层去。之后,我们又下来了,坐在大厅我们坐过的长椅上。我们坐了大约半个小时后,两个警察路过,看到了我们。他们走了进来。

他们说要搜查我们。因为我们什么也没做,所以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我们逛荡着想偷东西。他们搜查了我们但什么也没找到。后来,我们进了第一个警察叫来的警车里。当我们坐在警车里的时候,另外两个警察上楼检查。他们待了一会,然后回来说他们看见一个电话亭上面有划痕。他们说那表明我们企图闯入。

我们告诉他们我们甚至根本不知道那里有电话亭。后来，他们把我们带到帕丁顿街格林警察局(Paddington Green Police Station)，起诉了我们。

第二天早上，我们上了法庭，被他们还押候审(Remand)。我们被送到阿什福德青少年拘留所(Ashford Remand Centre)。两周后，我们再次被还押候审，所以我们再次上了法庭。最后，案件由于缺少证据撤销了。没有任何原因，我们就在里面待了一个多月。

我朋友的父母出庭了，那时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即他们的儿子曾经在公园过夜)，后来他回去和父母住在一起。在法庭上，我没有获得陈述的机会。我的意思是尽管我获得了法律援助，但是我父母没有到场。

当案件撤销后，就剩了我自己。我的福利官给我找了个地方。她说那是一个青年旅社，我说我可不想再住进另外一个青年旅社里了。她说这是她目前唯一能为我做的事。

她和我一起去了那家青年旅社。我在那儿待了几个小时，然后就出来了。我刚出来的时候并没有打算不再回来了。我去了西区。我看了个朋友，他给了我一些钱，我就去了一个酒吧，在那儿待了一晚上。那之后，大约有4天我一直没回青年旅社。后来当我再回到旅社的时候，我再也不愿意在那儿待下去了。

我又自己一个人了。我想：“我打算干点什么呢？”

我不是真的想偷东西。就我来说，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回到青年旅社，要么待在外面弄点钱。

我决定待在外面。我开始到处偷东西。我过去常常抢手提包。我常去东区的拉德布罗克丛林路(Ladbroke Grove)，看他们干什么。当他们抢手提包时，我也抢。

(摘自一名尼日利亚裔、出生在伦敦的黑人青年的个人经历，
现年22岁，引自Hines, 1973:33 - 35)

很可能最终是那些个人经历方面的因素(包括某些有意识的选择)在推动犯罪行为到最后关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犯罪行为所

“展现出来”的诸多问题,却是那些加之于犯罪个体的社会结构因素和文化群已经设置好了的。

那么,这样一个(理论)框架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个体的犯罪行为或像抢劫“潮”这样一连串的犯罪行为呢?首先,我们要看是否有与众不同的社会群体参与其中。很多所谓的抢劫案都是青少年犯下的,他们均来自城市灰色地带、中心区或新建的、空着的住宅区,这绝非巧合。对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居民施加的结构限制是非常苛刻的:对于那些基本上一无所所有的人来说,要依照维持现状的指示去行动就会显得非常荒谬。如果青年人身边的文化群给他们提供了可以实现的身份界定,比如职业罪犯或者是帮派团伙,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在某些文化环境中,有一些很便捷的“解决方案”,它们拒绝在“正常”社会占有一席之地,但也不会直接违反基本法律。例如,嬉皮士就可以展现这种选择的典型样态。这并不是说,嬉皮士几乎就等同于罪犯,或者罪犯能像嬉皮士那样一针见血地批判社会。这不过是要人们承认,不管是成为嬉皮士还是成为罪犯,都是个体对自身生活处境所设置的各种问题的行动应对。至于选择哪一种“解决方案”,则取决于是否拥有朋友、亲戚以及其他的了解这种文化群之适用性和可行性的知识资源。这并不是说,人们通常会有意识地做出这些选择。没有人会坐下来深思熟虑,然后做出决定:“如果我成了劫匪,我所有的烦恼就都解决了。”但是,对于那些在内城区没有工作、没有地位的青年人而言,“抢劫”就成了既能获得些许物质报酬,又能获得些许地位的现成的手段。而这种地位既可以从朋友处获得,也可以用一种反向的方式从一些有地位的社会机构处获得。如果媒体判定把土豆填塞到猫耳朵里是一种新的青少年变态行为,而且能够找到这样做的例证,那么毫无疑问这种事情就很可能发生;原因就在于,对于某些环境中的青少年来说,他们很愿意效仿任何形式的越轨(犯罪)行为。要是那样的话,某些媒体的处理方式就会促成像“抢劫”这类行为的出现:对那些被排除在正统行为模式之外的青少年来说,“抢劫”就成了最容易可学的行为模式。

当然,造成这类行为的诱因必须被呈现出来。毫无疑问,一些纯粹个人经历方面的因素,比如一个稳定的父亲形象的缺失,在某些情

境中可能确实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另外一些运用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条件的情境当中,父亲形象的缺失未必会对孩子的未来产生太大的影响。(在我们这样一个崇尚核心家庭的社会里,父亲的缺失总是一个很棘手的难题。)确切地说,我们在此恰恰要强调的是,只有把犯罪参与者置于整体社会情境当中,我们才能真正把犯罪理解为一种社会活动,而整体的社会情境要求我们不能仅仅考虑罪犯在哪生活,在学校表现如何,是否有工作,与父亲的关系怎样,而是要把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更多的因素都一同包含在一个人整体的生活境遇当中。当然,期待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要对犯罪有全新的理解,而这正是现在的当权者所不具备的,也是他们很可能会抵制的。如果我们审视一下那些从我们以上勾画的现有理解框架所衍生出的种种惩罚政策,就能对这一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

支持汉兹沃思案判决的那些人经常会这样质问反对此案判决的那些人:如果不如此,那应该如何处置那三个犯了如此恶劣罪行的男孩?这个问题看起来像一种公平的辩论,但是我们认为它的根本前提使得这个问题本身变成了一个另有用意的问题。这个问题仍然是从一个孤立的行为提出的,它不但使个体的行为孤立于不同个体所犯下的相似的行为,也使它孤立于这些个体在不同情形下所犯下的其他行为。暴力犯罪既不会凭空而降,也不会萌生于每个人内心深处隐藏的恶魔深渊当中。它们通常(“冲动犯罪”除外,这一点是重要的)都是那些对自己的犯罪意图已经发出郑重警告的罪犯所为。如果一个社会一直坚持那种以幼稚的家庭个案调查观念为浅薄的虚饰、本质上却有报复性惩罚意味的刑罚政策,那么这个社会就会为此小事付出大代价,就将看不到人的生活环境中那些导致他们犯罪的关键因素。如果我们不努力去辨别和应对那些潜在的起因,犯罪行为就会逐渐升级,直至社会的耐心被最终耗尽,犯过错的责任人被监禁。到了这个时候,事情往往就会容易走向极端化,个体已经顽固地执迷于犯罪,并将犯罪当成了一种生存之道。这不仅仅是要呼吁及早建立预警系统的事情,因为如果缺乏全面认识犯罪的努力,这套预警系统也将发挥不了作用。而这样一种努力是不大可能完成的,因为对社会结构和文化群的考虑

会让人质疑现存社会秩序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例如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住房和就业市场不平等的准入机会。

因此,我们对于“哪些事情早就该做但还未做”这一问题的回答,就必然是:许多不同的事情早就该做了,而且,任何不去努力改变个人整体生活环境的事情都很可能失败。那些指责这种回答不切实际、不能应对当下问题的观点,其实并未理解问题的关键之所在。这里的争论不仅仅事关一次具体的判刑或一种拘泥字句的刑罚政策;它也关系到把犯罪设定为一个问题的整套思维方式,关系到有关社会稳定、人性动机、正当惩罚的观念,这些观念确立了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反应。在一个依据完全错误的犯罪理念建立起来的刑罚制度的框架之内,我们不可能提供一种“正确的”判决。我们可以提供一种关于社会变迁和文化变革的复杂策略——旨在开放而不是封锁个人经历的选项,这一策略可以将诉诸犯罪的行为归纳为一种文化解决方法,但这种革命蓝图恐怕在此还显得不合时宜,我们相信从上文的论述中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张蓝图的内容。我们所能说的就是,在这起案件中,主流思维模式甚至从一开始就一直无法理解这起犯罪的本质,这种无能导致法官做出了这样一种无法解决任何问题的判决——不管是对于相关的个人来说,还是对于那些想阻止此类行为反复发生的人们来说,都是如此。“拘禁”的判决实际上是主流社会应对犯罪的一种典型范式:既是一种规避矛盾的、伪善的,说到底,更是一种野蛮的范式。

(王蕙译)

第三部分

理论 II

13 风格

约翰·克拉克

风格的产生

1. 休闲和工人阶级

我们在这本书里主要讨论的各种亚文化风格,并不仅仅局限于休闲领域,但它们确实主要是在休闲领域变成了非常令人注目的对象。虽然这一点看起来好像是显而易见的,但实际上也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的阐释。休闲经常被描绘为“自由时间”,被描绘为一个可提供“各种自由选择”的领域。但事实上,工人阶级的休闲时间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不受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决定因素约束的。然而,人们往往会有一种观念,认为休闲代表了(至少从19世纪后半期现代工人阶级文化形成以来,它就在历史上代表了)一个相对自由的领域。我们认为,产生这种观念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作中有严格的纪律,后者不仅通过技术化的组织和管理者的监督,而且因为各项工作任务物理架构以及这些任务之间的协作关系而得以维持,而在工作场合之外,这些纪律就不可能再以同样的形式维持下去了。这一观念也可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人阶级与休闲的关系“受制”(disciplined)于金钱关系。每周的娱乐开支预算限制了工人阶级的娱乐;工人阶级消费者可以抑制他们给提供休闲服务的商人所支付的钱款,因此有一种可以在各式各样的替代性服务中做选择的相对自由。特别是在他们与那些专门靠给工人阶级顾客提供服务的商人(小店主、酒吧业主等)的关系中,情况更

是如此。福斯特 (Foster, 1974) 在他对19世纪中期英国奥尔德姆市 (Oldham) 的研究中, 把这称之为“独占交易”(exclusive dealing) 的权力: 在1837年的选举中, 工人们用这种不再去惠顾的威胁来说服那些店主们不要给激进的候选人投票。一个工人阶级的客户除了有选择那些主要由别人提供的服务项目的“惠顾权”(customary rights) 之外, 他还可以使用那些由工人阶级社区自身所提供的休闲设施——会社、俱乐部、协会等, 特别是工人俱乐部 (Working Men's Clubs, 19世纪60年代以后陆续在英国各地出现, 1884年被来自工业金融界的顾客所接管)。足球休闲在一定程度上是介于以上这两者之间的一个例子, 尽管这项活动有着非工人阶级的财务和管理结构, 但自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 它就是由众多的工人阶级支持者所构成的。

对休闲中“相对自由”的争夺已经遍及社会各个方面: 事实上, 对工人阶级休闲领域的控制, 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斗争。在这一领域, 那些旨在控制、规训和“促进”工人阶级的活动经常会产生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强制呈现为各种不同的方式: 19世纪初期试图压制大众足球活动,^① 或者是非常成功地让工人阶级酒吧“升格”、“更适合消费”的现代努力;^② 一直到为了给工人阶级青年提供“一些可做的、有教育意义的事情”而广泛推行的一些法定的和志愿的活动方式(如当代青年服务^③)

① 参看Walvin(1975)。—原注1

② 参看Hutt(1973)。—原注2

③ 此处所说的服务组织大概包括基督教青年会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简称YMCA), 该组织1844年6月6日由出身英国乡村的青年乔治·威廉 (George Williams, 1821-1905) 在伦敦创立, 他当时是一家布料商铺的雇员。该组织将基督教价值观融入青年人的人格培养, 努力使其在服务弱势群体的实践中完善自己在德 (Spirit)、智 (Mind)、体 (Body) 三方面的修养, 为当时处在工业革命浪潮中、处境堪忧的一代迷惘从业青年提供精神抚慰和支持。目前这一组织的服务人群不分性别、年龄、国籍、种族和宗教信仰, 服务工作有平民教育、体育康乐、营地服务、社区服务、青少年工作、难民工作、就业服务等。一些青年会还开设有价格低廉的旅舍和宾馆。目前会员来自125个国家, 逾5800万人。——校注

或准军事化的“青年旅”[youth brigades]^①)。这些强制方式一直很有限:既受制于人力资源的不足,因为需要有人去监控“非法的”休闲活动;也受制于那些更具教育意义的休闲追求必然具有的志愿性质。

这样,从19世纪中期开始,工人阶级文化的主体形态就围绕着休闲领域——比如足球、酒吧、工人俱乐部、街头活动等——逐渐形成了。这些文化形态不仅仅是在各种特定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各种惯例乃至价值观,而且包括表达这一阶级整体经验的各种方式。当人们开始沉溺于休闲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工作的艰辛。但是休闲的“相对自由”,使得在工作中发展起来的核心的阶级关注和价值观更容易被休闲领域的符号活动所取代。例如,要理解足球文化中追求“男子汉气概”的风气,就必须理解足球文化与很多工业生产部门中的男性中心和组织之间的同源性关系(homologous):一个“男子汉”就像一个足球运动员一样,必须能够“承受得住严厉的责备,一次次奋起并坚持到底”……在这些表面上看起来自由的休闲活动中,既有对工作节奏的摆脱,同时又有对工作节奏的复制,二者混杂在一起;工人阶级娱乐和体育运动中最复杂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充分地理解这种混杂性。

工人阶级青年对于休闲的关注,放在这一框架中就变得完全可以理

① 此处的青年旅(youth brigades)指的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西欧发展起来的一些带有军事和体能训练的青少年组织。首先,应该包括威廉·亚历山大·史密斯(William Alexander Smith, 1854-1914)爵士于1883年10月4日在英国格拉斯哥(Glasgow)创建的少年旅(The Boys' Brigade),该组织通过准军事化的训练和纪律、体育、夏令营以及宗教服务和课程来培养基督徒的男子汉气概。目前发展到60多个国家,2000年会员约50万。其次,应该包括童子军协会(The Boy Scouts Association)。1903年担任少年旅副主席的英国陆军中将罗伯特·贝登堡(Robert Baden-Powell, 1857-1941),在1907年主持了第一次白浪岛童子军露营(Brownsea Island Scout camp),而这次露营被视为童子军运动的起源。童子军迄今已成为全世界影响最广泛的青少年组织之一,到1922年全球32个国家有100万的童子军会员;到1939年正式超越330万人,据称2010年注册会员达3200万,分布在216个国家和地区。童子军采用童军运动方法,此方法强调以实际的户外活动作为非正式的教育训练方式,内容包括露营、森林知识、水上活动、徒步旅行、野外旅行和运动等。——校注

解了。正如我们早前所指出的,这一关注被工人阶级有关青年(特别是男孩们)的看法给强化了:青春期在这里被视为一段在成人责任未到之前相对放纵和自由的时光,因此,也是一段绝佳的休闲时光。反过来,战后对于“青年市场”的拓展和投资,也大大地强化和重塑了这种看法。

对于战后的青年来说,休闲领域占据了优先的位置,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个质的区别,这就是,青年不仅建构了许多以休闲为中心的活动和关注点,而且还利用这一领域去积极地建构那些非常独特的亚文化风格。我们认为,要观察风格,不能脱离群体的结构、地位、关系、习惯和自我意识。而且,我们要优先关注风格化创造的“时机”。在这一时刻,围绕着某些有限的、连贯的表达方式,各种行动、实践和观点得到了具体显现。因此,接下来我们会把一种亚文化当作已然存在的事情,转而要观察它是如何引导这一群体从“可能性的领域”有选择性地挪用符号对象的,要观察这一群体随后是如何依照这些“碎片”被构筑成一片风格丛林的方式,把它的各种关系和实践逐渐固定下来的。

2. 生成风格

在对风格生成的过程进行描述时,我们局部地或者说有点不拘一格地使用了列维-斯特劳斯的拼贴(*bricolage*)概念:即在一套完整的意义系统——这一系统已经包含了那些委派于这些被用物品的、先在的和沉积的意义——之内,对这些物品进行重组和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sation*),并以此来传播新的意义(Levi-Strauss, 1966; 1969)。物品和意义共同构成了一个符号,在任何一种文化中,这些符号被反复地组合,形成各种独特的话语形式。然而,当这种拼贴将一个表意的物品重新置于那套话语内部一个不同的位置,并且使用相同的符号总资源库(*overall repertoire*)之时,或者当这一物品被置于一种不同的符号组合总体系(*total ensemble*)之时,一种新的话语形式就构成了,一种不同的信息也就传达出来了。

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原初符号(*original sign*)的确切性质以及原初意义与新兴意义之间关系的表述,当然适合于对他所选取的原始物料

(primary material)的分析需求。这些物体主要来源于小范围的社会群体,“意识形态性的”交流在那里已经被制度化了,显现为神话或图腾体系的方式。在那里,神话是最典型的话语,它作为神话存在,是因为它已经被传统化并被全社会接受了;尽管它有众多的变体,但它的基本形式已经成为X代人的神话。不过,我们现在思考的是当前流行的各种“非正式”的风格,在那里,风格的核心(如果存在的话)可以被定位在一种对抗性的表达上——这种表达对外界社会的价值观持有几分协商性的**对抗立场**(partly-negotiated opposition)。^①

然而,如果要沟通信息,我们就需要保留一种可供这种亚文化**拼贴**(subcultural bricoleur)参照的基本话语形式。假设是这样的话,这种话语就是关于**时尚**(fashion)的话语。就像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拼贴(myth-bricoleur)一样,亚文化**拼贴**的从事者也会受限于符号在一种话语内部的现有意义——那些被用来装配一种新的亚文化风格的物品和“装备”,不但必须是已经存在的,还必须能将组织起来的各种意义传达到一个系统当中,这个系统要有充分的连贯性,足以保证它们的重新定位和转换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转换**。如果新的组合看起来酷似以前的信息,并且传达着与以前存在的信息完全相同的内容,那也就没有拼贴的必要了。

其次,神话-拼贴的元素主要是自然物品,自然很容易适合拼贴的意图,而亚文化**拼贴**所采用的那些物品是物理意义上被挪用过(被穿戴过和使用过)的物品,而且它们是**商品**,最初是为各种特定的市场生产的。这就是说,它们被转换之前的实存状态是依照**其他**群体的存在状态而假定出来的,而这些群体常常是一小部分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后者最初通过这些物品-符号(object-signs)来购买、使用和表达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因此,我们对大量亚文化拼贴所具有的对抗意义——有别于列

① 与图腾体系相较,这种对比是非常强烈的。图腾体系通过符号,既对自然界也对社会界提供了一个支配性的、条理清楚的分类型框架,它跨越了年龄群体的分类,同时也进入各个年龄群体的阶层。在部落社会内部,这些图腾体系会得到正式确认。——原注3

维-斯特劳斯理解的传统意义——应该不会感到有什么迷惑。鉴于资本主义和阶级冲突是我们当今社会特有的问题——在部落社会中通常并不是这样,对抗性的意义就会通过两条转换的路径出现,这两条路径并不相互排斥。第一条,那些可替换主导文化(dominant culture)首选意义的另类意义——是从一个被压迫社会群体的体验和意识中生成的——可能会被公开采用,这就使得原初的话语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取决于敌对阶级的存在。或者(即第二条),这些商品本身的形式也可以生成一些新的、对抗性的意义。这些商品必须存在于市场中。在它们可以被使用之前,就应当在经济上处于风格创造者所能承受的支出幅度之内。由于它们是为了特定的市场而(在别处)被制造出来的,因此它们已经传播了一些意义和信息,并且涉及人们对于商品的不平等使用权,涉及获得不同评价的诸多生活方式。有关那种秩序的信息已经被“写入”到那儿,即“写入”到那些商品之中:原初的物品-符号被置于一个充满分歧的社会之中,然而它们首选的大部分意义却都在试图掩盖这种现实。由于这个原因,就能够对这些物品-符号进行转换和重新赋义(re-signification)了,重新评价先前那些被认为不够格的(disqualified)生活方式,或者去表达阶级的冲突。

因此,亚文化风格的生成涉及要从现存的(物品)母体当中做出不同的选择。这里发生的事情,不是从一无所有中去创造物品和意义,而是要把给定的(和“借用的”)物品转换和重置成一个传达崭新意义的形式,并能体现向新语境的转化和它的适用性。如泰迪男孩借用的“爱德华式外表”(一种上层阶级和大学生风采的复兴),重新组合了一些不相干的东西,如靴带式领结和小山羊皮软底男鞋等,呈现出一种崭新的、之前并不显著的(uncharacteristic)意义。迪克·赫伯迪格讨论摩登族风格的论文(在本书民族志部分),描述了一种显然与原初模式中的阶级对抗之声很不合拍的风格转换,但是其中对于物品进行的精心重排,深刻地改变了由此产生的符号组合系统(symbolic ensemble)的意义。

3. 选择的语义学

从总体上讨论了风格的创生之后,我们现在有必要提出一个问

题：为什么一个特定的群体采用了一套特定的象征性物品 (symbolic objects), 而不是其他的物品?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这个群体必须在这些特定的象征性物品有点被压抑的潜在意义当中去辨认出它自己 (*recognise itself*)。这要求上述物品必须具有一种“客观的可能性”, 可以将上述群体特有的价值观和关切点显示出来, 当作该物品所能容纳的一系列潜在意义中的一种意义。这也要求该群体能在其成员中充分培育起一种群体的自我意识, 从而主动去关心如何在一系列可用的符号物品中辨认出他们自己。这种被培育出来的自我意识——既关涉其包含的内容 (他们的自我评价 [*self-image*], 等等), 也关涉其面向符号物品的态度取向——正是风格从中得以生成的途径。因此, 这种使风格得以生成的对物品的选择行为, 事实上就是在群体自我意识与可用物品的那些可能的意义之间寻找各种同源关系 (*homologies*)。对于可用物品与群体之间的这种同源相应关系最有见地的描述, 可能要数乔治·梅利 (George Melly) 对于摇滚乐的著名分析, 他把早期摇滚乐描述为适合于泰迪男孩“旋转和撞击” (*screw and smash*) 的音乐 (1972:36)。

保罗·威利斯认为, 尽管早期摇滚乐和“美国西海岸摇滚乐”在形式方面具有传达和表现各种不同意义的潜力, 但是, 在强烈的行动主义、突显身体特征 (*physicality*)、将态度外化于行为、对内心自省的忌讳与他所说的“摩托车男孩”对于速度、机器的热爱以及他们格外喜爱的早期摇滚乐之间, 有一种明显的同源或相宜 (*fit*) 关系; 就像他所说的“嬉皮士”群体的“无结构性”、内心沉思和松散的群体关系与他们所偏爱的音乐之间也存在同源关系一样。正是这种文化形式 (例如在这里是音乐) 的客观潜力和它符合该群体主观取向的这种适宜性, 为后者挪用前者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有时) 也促成了物品与群体之间的一种风格上的融合。然而, 最终被制造出的风格, 决不仅仅是对所有单独元素的简单混合——它特有的象征特性源于对一个完整的组合系统里的所有元素一起进行的整编, 体现着和表达着这一群体的自我意识。

4. 风格差异的基础

我们还必须要强调每一种风格的特性。这意味着不仅要敏锐地发

现每种风格的客观变体,能感觉到每一个以有形方式构成的物品之间存在的差异,还要敏锐地发现这些风格的生成所依赖的不同的物质和文化条件。因此,一种独特风格的象征意义(symbolic aspects),是从一组由特定的群体关切点组成的模型中构造出来的,围绕着一系列独特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又是在一套独特的机构中发生的。这种特殊的群体联系,产生于由工人阶级社群的物质和文化环境所构成的那个更广泛的关系网络当中;正如我们在理论综述部分所看到的那样,这种关系网络既是由整个社会推动的更广泛的社会运动通过它们特有的在地影响力所构成和重建的,又是对这些运动的回应。因此,泰迪风格服装的象征意义,只是这个特定群体对他们所处的经过复杂调解的社会地位的局部回应。为了更为全面地解释风格,我们首先必须结合这一群体对于战后伦敦南部地区社会重组的本土体验,来分析他们的物质和文化地位。因此,在我们最后思考如下问题——这一群体在构造一种风格的可见外观时所用的物品,是如何具体显现他们的交往和意识的——之前,必须先考察一下这些交往和意识的基本性质。这种分析还必须解释这些被选用的特殊物品和群体之间的关系,解释这些特殊的物品是如何被用来具体展现这一群体的自我评价的(对有关泰迪族的此类分析所做的评论,可参见托尼·杰斐逊在本书“民族志部分”提供的文稿)。

5. 风格和群体认同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在一种风格的生成过程中所涉及的那些选择和挪用各类象征物品的内部程序。现在我们必须扩展一下关注点,思考思考在处理与其他群组的关系时,一种风格对于该群体有什么作用。我们已经说过,一种风格具体展现一个群体的自我评价。我们现在必须强调,群体自我认同的产生,不仅要经由这一群体的内部程序,还要依靠这一群体对照它的处境——这一处境涵盖了一些重要的他者群体——所取得的发展。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既要归功于对其他群体、事件和观念等的“否定的”反应,也同样要归功于对一些特定倾向的肯定性的回应。一种有特色的亚文化风格的一项

主要功能,就是对照其他群体来界定自身群体成员资格的界限。这通常被认为是对青年和亚文化活动场所内部其他群体做出的反应(例如,摩登族相对于摇滚派;光头党相对于嬉皮士和摩托派小痞子;等等)。尽管讨论这种独特的衡量维度非常重要,但是参与群体的范围,至少从潜在的意义讲,要远大于其他各种仅仅“对抗的”青年亚文化群体。讨论参与群体的变动范围——亚文化群体参照它来对自身进行界定——的最好实例,可以从一张摘录于《涂料房》(*The Paint House*)一书的图表当中看得到;一系列的群体在这里被分门别类,分属于下面的一种群体:“主管者系统”(The governor System)、“支持我们的人”或“背叛者”;每一种立场都带有一种看待那个特定群体与本地社区形象之间联系的观念,而这种形象正是光头党亚文化群体最基本的构成性关联点之一。这不但给光头党所感受到的那种对于社区——“领地”——的感觉,也给他们感受到的那种“压迫感”提供了一种**有形的衡量维度**。它揭示出了光头党所经受的攻击和压迫的**来源**,也揭示了光头党对于社区形象的象征性集体“保卫”这一目标。这个例子进一步指明,亚文化与各种不同的外围群体的联系——他们对某个群体的对抗,不一定**首先**会在风格的符号外观方面(服装、音乐等)显现出来,而必须到那些共同构成了风格组合系统的一整套行动、语境和物品当中去寻找。这样,光头党对于嬉皮士的对抗不仅仅显现在他们那些相反的服装款式和发型上,而且显现在他们对于嬉皮士的身体攻击当中(经常打着“殴打同性恋者”或“入侵”海德公园免费音乐会的幌子)。同样,光头党“对社区的保卫”也不仅仅显现在一系列的符号现象(“工作服”、涂写的标语等)上面,而且也再一次显现在身体的、暴力的行动(如殴打巴基斯坦裔移民和“帮派”格斗等)当中,同时还显现在对工人阶级休闲的传统机构——酒吧和足球场地——的“收复”当中。

6. 风格区分的影响

但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在这些独特风格的形成中起重要作用的一部分元素,似乎是在与另一种独特的亚文化“外部群体”的关联中逐渐成形的。摩登族和摇滚派最好地佐证了这种直

接对抗性的发展结果。对马尔盖特(Margate)一地的犯罪者进行的巴克-利特尔(Barker-Little)调查,举例分析了这两个群体是如何界定他们自己的形象的,认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参照其他群体来理解自身的不同之处的:

摩登族和摇滚派有他们自己的肯定形象和否定形象:肯定的形象显示出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否定的形象是他们如何看待对手的依据。两者都是主要根据服装辨别出自己人,要么是摩登族那身人所熟知的光鲜齐整的装扮,要么是摇滚派那身皮夹克和褪色的蓝色牛仔服。

否定的形象却是有差异的。摩登族在摇滚派眼里就是女里女气。“只要我不把他们其中的某个人当成姑娘,他们想穿裙子就去穿吧”:这还是好听的说法。摩登族则认为摇滚派既邋遢又肮脏,“长长的头发油乎乎的,他们使用的是机油,散发着汽油味”。

(1964:121)

类似的观点,反复出现在对于摩登族和摇滚派的有趣事件的所有评论当中:摩登族奚落摇滚派装扮的那种粗鲁的、传统的男子汉自我形象,并对那种粗鲁模样摆出一副“酷酷的”、老练文雅的样子;摇滚派则对摩登族风格带有的“女人气”反唇相讥。然而,斯坦利·科恩对于摩登族和摇滚派引发的社会反应的分析(1973)则提醒我们:不要把这种“相互对抗的”形象创造方式看得太过简单了。科恩认为,起初海边的“战斗”并不是源于摩登族和摇滚派之间的分歧,而是源于当地人和伦敦来的人之间存在的矛盾(尽管表面上可能是:摩登族和摇滚派的成员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把自己分配到这些分歧当中去)。然而,随后的新闻报道却依据歌舞剧《西区故事》(*West Side Story*)^①中两个“地下帮派”相互对抗的故事情节来处理这场“战斗”,因此基本上把这种分歧

① 《西区故事》(*West Side Story*)是一部美国戏剧作品,最早以音乐剧形式在百老汇和伦敦西区剧院上演,1961年经过改编拍成电影,并获得多项奥斯卡金像奖殊荣,成为最著名

定位为一场“风格间的战斗”。默多克对这种结果作这样的评价：

……毫无疑问,这种两极化的形象描绘渗透进了群体成员的自我认知当中,产生的结果是:以前属于中性的风格元素,现在成了群体之间对抗和矛盾的焦点。这种冲突反过来又确认和进一步放大了最初的(媒介)形象。

(1974:217)

科恩的分析给予我们两条基本的警告:第一,不要把漫长而复杂的风格形成过程压缩为过于狭窄的分析时刻,就此忽视了风格的某些方面在某些特定时刻是如何被吸纳、被灌输到一种与某些特殊事件相关的特殊意义当中去的。第二,风格的形成过程一旦启动,我们就不能把它只看成是一个主要发生在该群体内部的事情。各种外部关系和建构原则把该群体置于一种特定的处境之中,它们不会在群体风格形成后就立马销声匿迹;相反,它们作为限定性环境的构成要素还会继续存在,为该群体的行动和行为提供条件。

在这一节的最后部分,我们必须注意到风格的形成对于该群体产生的影响。对于一种独特风格的创造,决不仅仅是在简单地显现亚文化群体的自我认同和自我评价。它还履行了一种功能,即比照该群体的成员和所有的局外人更清晰地来给该群体划定边界,为群体的持续存在产生独特的影响。例如,杰斐逊的分析表明:一种独特的泰迪男孩风格的创造,如何向泰迪男孩呈现了一种非常难得的、能让他们获得一种特殊地位和行使某些控制的手段。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使得外表成为一个对群体成员来说特别敏感的话题。杰斐逊认为,以此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对他人的冒犯(真实的或想象的)有那么过敏和“过度的反应”。弗莱彻(Fletcher)则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了一个以“打击”音乐为中心的默西赛德郡帮(Merseyside gang)的形成情况(1966)。

的歌舞片之一。该剧以纽约当时的移民社群为背景,描述两位相互爱恋却身处敌对团体的少男少女如何跨出两者之间的鸿沟,却又不幸失败的故事。——校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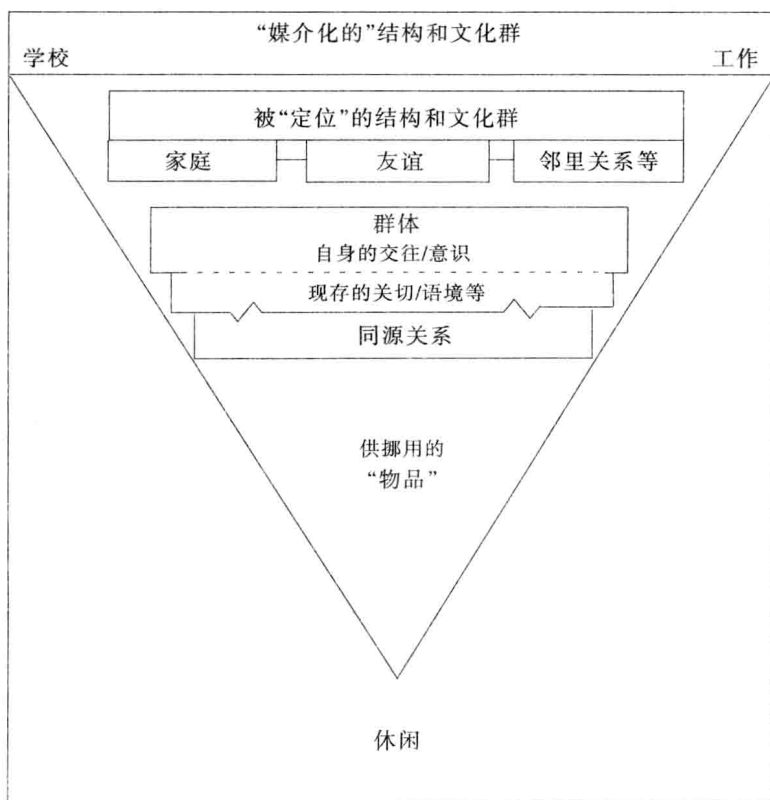
他的研究阐明了,这一群体不断变化的关注点及其将这种音乐作为群体生活的核心关注点而展开的日益强烈的信奉行为,是如何改变了这一群体的交往关系(导致了一些成员的离开),如何改变了这一群体经常开展的那些活动,如何改变了群体活动定期举行时所围绕的各种语境。相当重要的一点是,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格的原创不仅确认了这个群体的身份,也使得他们更容易受到各种社会反应的干涉和攻击。因此,洛克和科恩(Rock and Cohen,1970)举例说,一些舞厅和电影院禁止所有身穿爱德华式服装的人使用它们的设施;而且科恩对于摩登族的研究,也说明了警察是如何把“摩登族”(也就是所有那些看起来符合摩登族的公众形象的人)从海滨度假区带走的,而与此同时,当地的店主和娱乐场所也在阻拦那些看起来像摩登族和摇滚派的青年人入内。20世纪60年代末,警察在对足球流氓采取应对阻止行动的时候,那些穿戴光头党服饰的青年人就容易遭受警察的骚扰,包括被警察要求脱掉鞋子、撤掉吊带和腰带,把它们放到球场外边;所有这些都是惯用的监控手段——比如驱逐和逮捕球场里的球迷,护送他们往返于足球“特场”——之外附加的。我们也有一些证据表明,警察向一些迪斯科舞厅的主办者施压,即使这些迪斯科舞厅在当时就是以雷鬼乐和“灵魂乐”的保留曲目而闻名于世,也不准他们接纳那些穿戴某些独特的“牙买加小混混”时装的黑人青年。

总而言之,一种风格的演变,不仅会对这个群体,也会对其他入将会如何看待、界定和“回应”这一群体产生一些影响。亚文化风格已经成为大众媒体报道青年和显现青年的基本方式。各种亚文化风格已经成为大众传媒报道或想象(显现)“青年”的主要途径。法官、警察和社会工作者将会利用那些建基于外表和服装之上的刻板化印象,给一些群体贴标签,并把他们与某种富有特色的行为联系起来。因此,服装、风格和外表诸方面,在群体的被污名化以及社会反应的起动的升级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尽管这已经超出了我们在本节内容里的考察范围,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因为一种可识别的风格的出现而在不同群体中间产生的这些反应,必定会对这一群体自身对于他们发展出来的风格的态度产生一些影响。这是否会强化他们对于更稳固的群体团结的

认同,是否会将这种认同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或者,社会方面的反应是否最后能成功地劝阻那些被认定的成员放弃他们的打算,这还是一个亟待更准确地予以确认的经验性的问题。然而,杰斐逊对泰迪族的评述表明,他们最初对于爱德华式套装的挪用所引发的公众反应,有助于他们去发展出他们自己对这款基本套装(the basic suit)的独特强调和改造。他认为,对制服的选择起初是“试图去购买身份(因为这种服装原来是上层纨绔子弟穿过的),后来很快又被一种严厉的社会反应给中止了……一种创造他们自己风格的尝试也就接踵而来了……”

表13.1 媒介化与风格的创生

真实的关系——隐藏在每个人的身后



风格的扩散和拆解

1. 扩散

讨论风格的扩散容易掉进各种各样的陷阱；唾手可得的形象，对它如何运作所做的万能的解释——这些“解释”只依据传媒广告或商业操作，或者只依据自然的流行病式的扩散来进行。我们希望首先强调风格挪用过程的相对公开性，其次要强调各种在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内部进行的、旨在利用各种本土亚文化风格的尝试本身固有的矛盾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商业开发中的矛盾是明显的，这表现在市场的要求（新奇性、时尚的快速更新，时髦和不连续性）与生产的要求（标准化和便捷性，经济的持续性和生产的规模）是不一致的。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对亚文化风格的利用也存在着两个对立的方面；积极的一面是，这是社会对代表时尚和潮流的青年人进行的超大规模的商业投资，而消极的一面是，会把风格特性（style-characterisations）作为便利的刻板化印象加以持续利用，并以此去确定甚至满怀希望地去孤立那些基本上被视为“反社会”的群体。在后一种操作中，过程的“公开性”变得尤其重要，因为这些被利用的、有选择的特征表达（characterizations，例如，摩登族=暴力/毒品；嬉皮士=毒品/不道德；光头党=粗鲁的暴力）本身就是符号化的显现（symbolisations），因此在对信息的主导性“编码”与接受者实施的“解码”之间容易出现潜在的交流中断。^①

我们可以考虑把光头党风格的扩散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复杂过程的展开情况。光头党风格的传播首先显现为面对面的扩散机制。因为在光头党风格出现之前，足球场的“两端”（ends）已经被有序地“组织起来”，同时因为光头党热衷于把足球运动选定为他们的主要社会表现行为，因此，在一种结构化的框架中不同群体之间就会出现

^① 虽然我们在这里不能探究媒体程序的全部复杂性，但读者可以参看其中一人，尤其是霍尔的文章（1973）。——原注4

频繁的、地盘上的广泛会合(meetings)。即使这些会聚是短暂的,并且有比较明显的暴力性,但是这种风格也能从它的创始者那里传导到其他群体那里去——后者至少也可以从中确认出某些共通的意义。但是我们在哪里必须再次关注:在那些借用和改编光头党原初风格的人们当中,这种接触是怎样促成了他们对于这种原初风格的选择性“欣赏”的。

其次,新闻媒体依照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对光头党风格所含意义的看法,来选择这一风格要被公开的那些面相。就光头党来说(其他例子也一样),他们被(新闻媒体)呈现到公众眼前的形象,带有完全负面的含义。对于那些持有主导文化观念的人来说,或许可以在不出现严重变形的情况下对这种“编码操作”进行“解码”和阅读。但是,那些已经卷入到足球比赛中的“流氓行为”的青少年群体,则可能对这种“编码”进行“离经叛道式”的解读。尽管对于这个群体进行的媒体报道都很类似,但都根据这个群体所穿的衣服和采用的发型来对他们进行辨别,这就为“非风格化的”(unstyled)足球支持者们提供了一条可以加入完整的亚文化风格的途径。他们自身的一些相关的结构形式(足球/暴力/成员资格),让他们从正面去解释那些报道光头党帮派的新闻条目,去理解这种风格与他们自己的行为之间存在的潜在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依然还是潜在的联系。如果我们容许存在一种“文化空间”,原先那些非风格化的支持者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重新处理那些已经双重加工过的符号呈现(“原初的”光头党群体形象+媒体转播的形象),并将其融入他们自己的群体生活风格,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好地解释这一风格在不同区域呈现的不同的变异形态。

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已经考虑到了新闻性的(news-oriented)媒介再现,也注意到了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挪用亚文化风格的消极一面。但在这种分析中,至少在一点上与我们对于那种积极的、商业的和“娱乐”的挪用形式的讨论是同等重要的。在这一点上,新闻媒介为了实现它们自己的符号的(和诋毁的)传播,拆散并打乱(dis-locate)了亚文化固有的风格,它们实际上可能拓宽了“文化空间”,从而允许处在不同地域的群体有选择地重新处理和重新挪用这种风格。同样,市场

动机也激发了对原初的亚文化风格的推广和拆解；那些符号元素失去了它们最初与一种特定生活情境形成的完整的联系，从而更加包容其他群体对它们再次进行精心挪用时出现的变异——确切地说，其他群体的行为、自我形象和焦点关切与原初的亚文化风格群体其实并不相同。

有必要强调在商业机制本身之外进行“自发性”重构的自由度，因为这一点很容易被那些由于生产需求和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类似的表现形式所遮蔽。出于大规模商业生产的考虑，那种牵引经济产品追求标准化和畅销新奇性的对立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一种习惯性的做法——为某种特殊的潮流制定一个“准则”，然后不遗余力地盘剥利用它——所减弱。例如，在披头士乐队成功之后，商业公司就匆匆忙忙、竭尽全力去搜寻尽可能多的与利物浦有关联的亚文化群体。^①但是，这一解决办法依然要受到生产需求的支配，对一种潮流的标准化生产与市场对于潮流生产推陈出新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尽管它是在这一方向上的勇敢的（至少从经济上看并非是不盈利的）尝试，但是音乐和时尚产业在整体上已经被限制去生产“一个主题的变体”；而且，对于真实的亚文化变体来说，它们有点太容易去适应一种包含了各种行动和解释的、特定的在地复杂情形，太容易被归入这种方便商业谋利的过程之中了。

而且，商业性的“青年文化”所取得的重大发展，来自那些从商业世界之外的地方、从“草根”层面上发源的创新动力。在能够吸引大规模的商业投资之前，为了获得成功，这种动力必须从当地的语境和相互交流中才能生成，并且必须满足当地的“需求”（比较一下赫曼[Herman]对“默西之声音乐”[Mersey Sound]所做的分析，1971）。这里再次出现了一系列复杂的相互对应和相互渗透的现象。就“青年工业”（Youth Industry）的关注点来说，这些风格只要能被充分地普及化并能以此来满足其更大规模的消费者们的类似“需求”，在青年市场上就能作为一种潜在的交换价值而存在。但青年人自身在这种扩散过程中所

^① 也可参看Laing(1969)对复制“猫王”普莱斯利形象的那些尝试的评论。——原注5

起的作用,也不能被忽视。唱片公司一度曾经从那些已经解散的群体里定期雇用青年音乐家,并资助他们去界定、预测和提前享用(如果可能的话)新的音乐潮流——乃至有时还徒劳地试着去创造一些新潮流。在服装、时尚和化妆品以及“生产”和营销独特“青年外观”(Youth Looks)等领域,那些了解他们市场情况的青年企业家们已经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这样的时尚企业以及像小唱片公司之类的企业的发展,就是在批量生产的公司涉足这一市场之前,经常以较小的规模、较低的投资来预测潮流并探索市场。

因此,青年风格从亚文化群体向时尚市场的扩散和传播,不单单是一个“文化过程”,而且是一个由各种新兴的商业和经济机构组成的真实的网络或基础结构。那些小规模的小唱片商店、唱片公司、精品时装小店,以及那些只有一两名女工的小型加工企业——是所有这些小企业构成的工匠资本主义(artisan capitalism)图景,而不是那些更概括化的和笼统的现象,在定位商业“操作”的逻辑。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期“摇摆伦敦”潮流的爆发,就建基于对原初本质上属于摩登族的各种风格所做的大规模商业推广之上,这些风格经由这样的网络得以传播,最后融入一种“大众”(mass)文化和商业现象之中。披头士时代是体现这种转变方式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披头士最初只是一种亚文化风格,后来通过日益增多的商业窃取和时尚侵占,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市场”或“消费”的风格。

2. 拆解

因此,(在风格的传播中)除了可以对亚文化进行持续的“重新界定”和“再次挪用”之外,还有两个“大众普及的”(mass)过程也是清晰可辨的。一个与草根群体真实的重新挪用刚好相反,即对某种独特的风格进行商品化的拆解,以便让它具有更广的销路。另一个则是一种专门针对代际的“青年文化”观念的共同出现。这两个过程都设法回避阶级的具体现实。

我们的意思是说,通过“拆解”,一种独特的风格就被迫脱离了产生它的那种语境和群体,并被用来强调那些使它成为“一个商业主题”

的元素——尤其要强调这些元素的新奇性。从产生这一风格的亚文化的角度看,风格是作为一种整体的生活风格而存在的;经过与商业的关联,它被转换为一种新奇的消费风格。通常,更“适合接受”的元素被强调,其他的元素则被消除。赫曼(Herman)对《各就位,预备,跑!》(*Ready, Steady, Go!*)和摩登族风格的分析,就是体现这一过程的一个最好的例证:

《各就位,预备,跑!》是一档庞大的流行歌曲节目,酷似以前的《6.5特刊》(*6.5 Special*),让一个现场录音室的听众和一些小组配合他们本人的唱歌录音去做手势模拟动作。这是那个巨大的宣传机器的一部分,它确保了摩登族风格商品生产者的利润。听众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收到了一封措辞委婉的信件,提醒他或她要穿得有风格,跳出他或她最好的舞蹈,不要吸烟,在面对英国青年进行表演的时候举止一般要像有声望的人那样得体……最重要的是,它要广泛宣传那些现存的潮流……事实上,《各就位,预备,跑!》不止一次显示自己赞同一种被阉割的摩登族形象,不带药丸,不喧闹不打架,只是漂亮的乖乖仔。这个节目就是“摩登族通过部分收编而被约束住”的一个演示场所,这种场所其实很多;如果允许摩登族在摄像机面前跳舞,媒体就不得不忽略他们那些比较令人不快的方面。(1971:54)

这些符号性的元素,尤其是服饰和音乐方面的元素,已经脱离了它们赖以形成的社会关系的语境,成为最乐于“促进”青年市场广泛基础的因素。而这种商业性的构想(*commercial formulation*)恰恰是一种独特的世代文化(*generational culture*)赖以设定的主要维度。引导消费风格的市场被想象成一个世代的市場——所售物品的身份要通过它们展现的“年轻态”来界定;人们并不认为这种“年轻态”有什么阶级基础。与其说这一过程是制造者和销售商的共谋行为,不如说它是资产阶级商品生产和意识形态生产的程序所产生的一种“天然”的功能。专门针对青年市场的生产,是依据一种趋向“无阶级差别”的社

会图景来设定的；这种界定尤其体现在关于“代沟”(generation gap)和青年人财富日益增加这种观念当中。这些市场界定支持了一整套“青年生产”的工艺流程，后者被整个资产阶级商品生产所特有的“推广”本性给强化了。这种生产通过提供这些被认为可以划分自身与“成人文化”相异之处的人工制品，反过来又为存在一种普遍的(generic)、代际性的“青年文化”的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无论这些商业性的风格是用什么方式获得的，都被用来界定“青年文化”不断变化的内容，而并不顾及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所呈现出的不同的风格模式。

风格的局限

菲尔·科恩认为，亚文化在尝试一种解决阶级矛盾的“神奇性的方案”(1972年)。我们想通过把风格的界限置于一种霸权文化与一种从属文化的相互关系之中，以此为背景来思考并充实这种“神奇性的解决方案”的观念。通过“神奇性的解决方案”，我们不仅理解了一种致力于处理阶级矛盾所引发的诸多问题的努力，而且理解了其他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从根本上说，这些努力并没有把它们解决方案真正贯彻到产生阶级矛盾的真实领域中去，因此也就提不出一套可供选择的、潜在地对抗霸权的替代性解决方案。霸权恰恰意味着要通过对主要社会机构的控制，并依照统治阶级的形象对各社会阶层的文化进行形塑，从而控制社会的主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向这种控制(支配)发起的挑战，只是一些依然残存于葛兰西所说的“社团群体”(corporate)当中的一部分构成要素或层面。

就工人阶级亚文化群体来说，造成他们局限性的一个总的根源，是他们变本加厉地接受了其父辈文化内含的难题(problematic)——把休闲视为一个包含着“相对的阶级自由”、有重大意义的活动场所。这些亚文化运动仅仅在休闲领域内部提出它们的“解决方案”，它们尝试着用一种“神奇的”方式来解决自身所面临的矛盾，因为这种转向休闲的移置行为，带来的只是对产生这些矛盾的其他那些关键领域的抑制(suppression)，而不是超越。这种抑制对工作和家庭领域就采取了一种

完全神奇的超越形式。

而就摩登族来说,面对在工作中感受到的沉闷和惯例化,他们采用的尝试性的解决方案是:通过不断强化对休闲时间的利用,强化对休闲中所使用的商品的“颠覆”,以此来化解这种沉闷和乏味。正如赫伯迪格所强调的那样,这种风格之所以不能生成一种可供替代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应当理解为是因为它自身的内在矛盾造成的,同时也应理解为是反对它的各种社会势力造成的。例如,摩登族专注于将他们自己显现为“风格”,显现为“形象”,这使得他们恰恰容易被商业部门和媒体以这些表达方式给收编掉,这是一种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的立场所进行的收编。与此类似,他们对于商品的颠覆,也仅仅只发生在消费这个点上;他们为了追求颠覆性的休闲时间而在工作中忍受的压抑仍然存在,完全没有触动商品形式“归根结底”要依赖的生产模式。

光头党在他们自己的实践中重建了工人阶级社群的形象,这种重建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反应;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对“领地”的象征性的认定,掩盖了他们试图重建的传统社区在现实物质基础方面出现的颓势。对于社区的“重写”仅仅发生在休闲场所,并且缺乏那些以真实形式将社区领域与工作领域连接起来的各种关系。由纯粹建基于休闲之上的解决方案所带来的这些局限,可能会导致亚文化群体的自我解体。菲尔·科恩指出:

在家庭/学校关系与融入工作过程(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种过程标志着父辈文化模式的重新启动)这两者之间结成的这条社会化的链条中,亚文化装点了其中那些薄弱的环节。

(1972:25-26)

恰恰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薄弱环节”,使得休闲可以被工人阶级青年当作一种主导性的生活领域来体验,并且为体验休闲的这种形式——亚文化——提供了发展“空间”。为了说明这些薄弱环节的短暂性,我们选择了光头党风格的一个特殊方面。光头党亚文化群体生活

风格的一个外在特点,就是强调传统的“男子汉气概”行为的形象,而这一形象所呈现的一种形式,就是对于光头党亚文化群体外围的女孩所采取的“集体大男子主义”(collective chauvinism)。这些女孩属于这一群体的集体世界,“容易成为”集体的或个人的性冲动试验的对象,并被称为“妓女”(slags)或“娼妓”(scrubbers)——这是她们与“好女孩”的区别。^①只有当休闲场所和它所依存的亚文化形式依然是该群体成员生活的主要关注点的时候,这种集体大男子主义才能够维持下去。与某个“好女孩”进行“定期”约会,必然需要与群体生活的集体常规脱离关系,转向更适应个人情况的性行为形式。这两个过程是相互排斥的——要求向不同的方向投入稀缺资源(时间和金钱)。结果,随着个人化的“求婚”模式开始启动,群体生活和群体参与就衰落了,由于这种另类的亚文化风格自身无法树立起一种可以替代主流的、长久的性行为模式的生活方式,最终就会“瓦解”。

只要集体的休闲模式可以作为针对其他领域的主导模式得到保持,迷恋休闲的亚文化就能够独立生存下来。当工作或家庭的需求开始占据更重要的地位时,这种集体休闲的风格,恰恰因为提供不出针对这些领域的解决方案或另类解决方案,就只能作为个人经历的一些构成要素而消散了……如科恩所说的那样,“在亚文化群体当中……没有真正的职业前景……”(Cohen, 1972:26)

工人阶级亚文化群体的这些局限,与中产阶级嬉皮士亚文化相对较长的存在时限相比,也许会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些情况源于以下事实:尽管从表面上看休闲也呈现为嬉皮士亚文化群体的主要关注点,但他们同时还做了一些尝试(无论多么有限),试图创造一些可以取代工作、生产和性行为的替代策略。这并不是说,嬉皮士亚文化没有自身的矛盾和局限性,^②而只是说,它作为一种另类的文化形式,由于尝试

① 关于光头仔所说的“妓女”(slags)或“娼妓”(scrubbers)的研究,参看Daniel和Mcguire编辑《油漆房》(*The Paint House*, Penguin, 1972:35-36;52-53)。不过,并不是只有光头党群体采用这种划分,例如可参看Wilmot(1969)和Parker(1974)。——原注6

② 以于嬉皮士这方面情况的分析,可以参看Young(1973)。——原注7

创造各种可以跨越广阔生活领域的另类选择,为其自身提供了更强大的生存能力。

(补注:与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雷切尔·鲍威尔和布莱恩·罗伯茨合写。)

(胡疆锋译)

14 阶级意识与世代意识

格雷厄姆·默多克 罗宾·迈克农

阶级背景中的青年：社会主义的幽灵

我们关于青年和青少年(adolescence)的各种现代形象(images),基本上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创造的。尽管构成这些形象的大部分基本元素在此前已经存在,但直到19世纪50年代,这些元素才开始汇合到关于分离(separation)和依赖(dependence)之类的常见主题上。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其他意识形态一样,新出现的所谓青年的精神特质(ethos)也是在“新的”公立学校中被铸造出来,并且公开出现在当时出版的大量的杂志与小说当中。这些杂志和小说是随着1855年成功上市的《男孩特刊》(*Boys' Own Magazine*)和一年后出版的《汤姆·布朗的校园岁月》(*Tom Brown Schooldays*)而出现的。最初,这种新的青年定义被限制在中产阶级的子女身上。然而在随后的时代,这一定义日益脱离了最初的社会基础,被普遍化为一种对个人普遍成长阶段的描述,以致到20世纪之交,中产阶级的社会规范已经被尊奉为青年本身的“自然”(natural)属性了。^①从此,这种青年形象开始负载一种特别强烈的文化责任(charge),并且同中产阶级在对抗国内外威胁和守卫自身的斗争中所怀有的种种希冀和恐惧有了紧密的关联。

^① 约翰·R.吉利斯(John R. Gillis)在《青年与历史》(*Youth and History*)(1974)的第3章和第4章对青少年的“民主化进程”有精辟的分析。——原注1

德国海军力量的成长被普遍视为是对英帝国的诸多领地以及它们的安全赖以维系的海路的严峻威胁,另外,损失惨重的南非之战不仅暴露了英国军队羸弱的体格状况,而且也暴露了军事指挥的无能,这一切几乎无力支撑起英国人维持帝国的自信心。在这种情境下,爱国主义和那种对超越阶级诉求的“国家利益”的崇高感就显得非常珍贵。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日益强大的影响和有组织的劳工在工业和政治领域逐渐成长起来的力量,都预示着国内的阶级冲突将会更加激烈而不是逐渐减弱。英国资产阶级因此感到自身遭受着两方面敌人的威胁:境外的德国和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因此,巩固国家统一的问题就可以被看作几乎等同于牵制工人阶级战斗性的问题。

随着公民选举权在1867年和1884年的扩大,牵制政策的轴心已经由强制转向意识形态。为了维持一个由选举自由权支配的、施行自由民主制的国家形象,各种收编(incorporation)策略就不得不主要通过诱导和说服,而不是通过强制和暴力来施行,尽管后者并没有被完全排除。例如在1893年罢工期间,矿工们在西约克郡的费瑟斯通镇(Featherstone)被射杀,炮艇也曾出现在赫尔港(Hull)的码头;这一态势在1911年再次出现,当局在南威尔士的托尼潘帝镇(Tony-pandy)射杀煤矿工人,还把炮艇停泊在默西河(Mersey)岸边。然而,国家暴力周期性的显现毕竟是例外而不是惯例。与之相比,更重要的事情是日益普遍的、持续的、试图确立支配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而在这一斗争当中,俘获年轻一代的内心和精神的企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青年问题和青年意识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与阶级意识和阶级冲突的话题纠缠在一起。

争取对于青年的领导权的斗争,集中围绕于紧随1870年贫民免费学校法案确立起来的国家资助(state-sponsored)学校制度上。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校教育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直到1918年,学生离校的年龄被确定为14岁时,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的青少年在还不到这一年龄之前就离开了学校。因此,他们在其心理和道德成长的关键阶段(舆论一般都这么认为)避开了学校教育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要尽力影响这些“逃脱者”的努力当中,种种代理机构

(agencies)开始逐步进入和组织工人阶级青少年的闲暇生活。这些机构(组织)包括基督少年旅(Boys' Brigade)、教会少年旅(the Church Lads' Brigade)、基督教青年会(YMCA)等,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贝登堡(Baden Powell)创立的童子军(Boy Scouts)。

提起童子军的活动,人们通常首先会想到它对于健康、清洁和节俭的关注;实际上,在这些关注的背后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关注:即为了国家和帝国防卫的利益,需要培养阶级之间的团结。就像贝登堡在他1908年出版的畅销书《童军警探手册》(*Scouting For Boys*)中所说的:

如果一个强大的敌人想要我们富足的商业和领地,发现我们不列颠内部相互分离,它会突袭并夺取这些东西。正因为这一点,年轻的孩子们,你们不要将其他阶级的男孩子们看作你们的敌人。记住,无论你贫困还是富有,无论你出身于城堡还是贫民窟,你们都首先是不列颠人,你们必须要保证不列颠可以面对国外的敌人。

([1908]1930:280)

这种对于爱国主义和国家统一的劝诫,同时伴随着对社会主义的攻击。贝登堡认为,“许多人会盲从于一些有偏激思想的新政治家……偏激思想很少有什么好处……靠节俭而不是通过改变政府将金钱带给所有的人。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帝国将会给我们带来权力、安宁和富裕,而社会主义者的梦想带不来这些东西”(转引自P. Wilkinson, 1969: 11)。尽管童子军无疑是爱德华七世时代最大的青年组织,但它的成员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和稍低于中产阶级的阶层,从未打算在工人阶级青年中获得广泛的支持。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童子军活动中所体现的、青年杂志和连环画所宣扬的那种精神特质,广泛地渗入了大众的思想并有助于在青年中构造出“一种持续的爱国主义情绪,导致了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一下子涌现出大量的志愿兵”(Springhall, 1971: 151)。随着战争的停息,而后又出现了一个反军国主义的高潮,而贝登堡又很快适应了这一新变化。他随后于1918年出版了《重建童子军》(*Scouting Toward Reconstruction*),从以前强调帝国的防卫转向呼吁国际的友爱

与合作。然而,与此同时俄国革命的成功,再次激活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这一对幽灵,致使贝登堡不得不重新焕发自己对于青年的吸引力,以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各种提议(overtures):

有人通过他们的演讲家和他们的文学,鼓吹阶级仇恨并打倒一切东西……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这种幼稚的疯狂不仅会导致资本家的毁灭,还会毁灭一大批安分守己的公民和工薪阶层。

(转引自P.Wilkinson,1969:16)

新出现的这些有关青年的形象纵然充满了对社会主义和阶级冲突的恐惧,但它们同时也带有中产阶级自身对于资本主义现状的怀疑。这些不安全感在斯坦利·霍尔于1908年出版的那本原创性的教材《青春期》(*Adolescence*)当中被系统化了,并被授予了科学认证的大印。在霍尔看来,个体的成熟是人类发展的重演,个体从童年向成熟期的转变对应于人类从野蛮向文明的飞跃。因此,人类文明的未来取决于在青春期——关键性的过渡阶段——发生的事情。因此,青年的状态提供了一个可以衡量资本主义社会是进步还是衰退的标准。霍尔认为“只有在这儿我们通常才有希望找到抗拒文明趋势的确切规范”([1904]1905:viii)。在霍尔的引领下,其他人迅速跟随并树立起一种新的青年形象:他们是再生和复兴的力量,在四处盛行的物质主义的阴暗之中,胸中怀有理想主义和神圣精神(spirituality)的火炬。这里有一位富有代表性的人物——美国著名的社会改革家简·亚当斯(Jane Addams)^①,她在1909年有一段激情洋溢的表述:

……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下,我们在青年时期难道要同老年时

① 简·亚当斯(Jane Addams,1860-1935):美国社会活动家,在芝加哥创立了全美最负盛名的社会福利机构“赫尔馆”(Hull House)。促成了美国全国性的童工和妇幼保护法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起妇女反战组织,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31),为美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译注

期一样只能够发现商业价值？就好像我们的双眼已经被神秘的美景所牵引，青年人将为我们邈远的城镇带来救赎的欣喜。

我们会听到年轻的声音在工业主义的轰鸣声中、在精明的商业理事会上响亮起来，或者我们会着迷于那些突然新出现的对于财产和权力的强调，而忘记了精神力量在人类事务当中所起的至高无上的作用。

（[1909]1972:9;161）

这种作为再生力量的青年形象，从1918年停战之后重建的热情当中获得了更新的能量。人们觉得青年可以带来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既能消除阶级不平等和阶级剥削又不会带来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正如1919年有一份报纸的社论中所说的：

我们正在发起的这场社会革命并不是与阶级有关的事件。它具有更深的根基。它是青年人对于老年人的反叛……深受其害的是那些还没有看到这一点的人们……那些占有大片土地的富人们，那些依靠大众的流汗和辛劳，享受了外国香水却鄙视大众的傲慢的妇人们，那些腰包鼓鼓、大腹便便的粗俗的奸商们……那些擅自组织和驱动体力劳工的受过一些教育的、极度亢奋的煽动者们……^①

这种流行的大众修辞在一种相对保守的历史理论当中确立了它的学术性表达，（西班牙自由主义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 1883—1955）是这种历史理论的主要倡导者。

如果俄国革命成功了，德国的企图就落空了；在奥尔特加看来，这种失败标志着“革命”在欧洲的“衰落”，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貌似可信的社会变革理论在欧洲的死亡。他认为“工业或政治本质的变

① “新英格兰：由那些从战场上回来的青年人引导的社会改革”，*Daily Chronicle* (Monday, June 16th1919:4)。——原注2

革只是表面性的”，这种变革从根本上取决于那些嵌入到一个时代“充满生气的感受力”(vital sensibility)当中的各种复杂的观念。而且，他认为这些“对历史起决定性作用的充满生气的感受力的变革”，将以一代人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使“世代”(The Generation)成为“历史学最重要的概念”并“对历史进化运动负有重大的责任”([1920-1921]1931: 15)。在奥尔特加的思想框架当中，青年取代了无产阶级并成了最重要的历史主体，世代的演替取代了阶级斗争并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除了对“有机的能力”有含糊的表述之外，奥尔特加本人根本没有讲清楚下一个重大的问题：即同龄群体(age group)究竟是如何产生出一种共通的意识并开始作为连贯一致的历史力量担当社会责任的。这一问题留给了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他在1927年所写的那篇著名的《世代问题》一文当中探讨了这一问题。

世代、阶级和社会学家：隐蔽的争论

在曼海姆看来，世代意识源于那些意气相投的“特定群体”在应对它们共处的社会状况时所形成的诸种态度和反应。他认为，“这些态度和习得倾向”一旦形成，“就会脱离于它们源出的那些特定的群体”，就会对处于相似社会状况的一代人“产生吸引力和联合力”，他们“在这些态度中可以发现对于他们自身处境的完满表达”([1927]1952:307)。因此，曼海姆指出，在这些处境相似的同时代的“代群体”(generation units)当中，“所有人都被他们共通的经验(简言之，共有的意识)所感动、所培养，通过这一方式在他们当中形成了一种响应的认同(identity)和确定的共鸣(affinity)”(ibid:306)。这种“代群体”意识一旦定形，就会进一步扩展它的基础，形成新的“代风格”(generation style)核心，脱离成人群体的主流时尚，甚至与后者产生对立。曼海姆在此处提到的时尚模型源于漂鸟运动(Wandervogel movement)^①；此运动1901年首先在柏林的一个很小的

① 漂鸟运动(Wandervogel movement):19世纪末由德国青年发起的青年运动，号召青年学习候鸟精神，在漫游于自然中追寻生活的真理，在自然中历练生活的能力，创造属于青年的新文化。——译注

青少年团体当中产生，^①到1914年之前就很快获得了众多德国中产阶级青年的支持。如果说这些“漂鸟们”证明了曼海姆的论点，同时也显示了其论点存在的诸多局限。尤其是这一运动对工人阶级青年几乎毫无影响这一事实，引发了世代意识和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曼海姆虽未明说，但他也承认这是一个问题；他对自己的论点作了限制，指出：“在每一代当中会有一些有各不相同的、相互对抗的代群体。”(ibid:306)但与此同时，他对差异和对抗的基础并未作出明确的解释，因此也未对年龄与阶级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然而，曼海姆的阐释至少超越了“世代”一词直到他那个时代还在被使用的不精确的含义，并且开始确立了剖析这一概念的最基本的层面。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细心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被后来的研究者们忽视了。

曼海姆的论文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才被译成英文，因此，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的论文一直不为英美社会学家所了解，甚至在译本出版后很多人也并不知道。然而，这篇论文提出的问题却没有被忽略。相反，自20世纪中期以来，大西洋两岸的社会学家越来越多地关注世代意识及其与社会变革的关系问题。这些新出现的社会学文献倾向于在关于青年的流行解释所确立的青年定义内部，而不是在与其相反的意义上去讨论青年问题。而且这里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尽管大多数早期的社会学家都毫不隐讳如下事实——即他们认为青年问题和青年意识是与更为广泛的阶级分层和阶级斗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但由于社会学家们越来越强烈地信赖“科学”方法论和价值中立(value-freedom)观念，他们因此会去掩盖或贬抑他们的研究所带有的政治维度。对于马克思的幽灵(ghost)的争论，对于更为具体的(substantial)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幻象(spectre)的讨论，当然都在继续，但都是在偷偷摸摸地进行。因此，在许多主流的青年社会学著作当中，直到最近，阶级要么被完全排除掉，要么被当作相对不重要的东西。^②

① 一般认为漂鸟运动源于1896年，1901年建立了正式的组织。——译注

② 关于英美两国主流青年社会学讨论阶级问题的更为完善的讨论，见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即将发表的著作。——原注3

曼海姆的文章在德国发表的同一年，在美国出版了弗雷德里克·思拉舍（Frederic Thrasher）那本很有影响的著作——《帮派》（*The Gang*, 1927）。思拉舍在这本书中指出，芝加哥城市中心区的青少年在应对贫民区的社会失序时采取了如下的方式：创造出一种分离的、自足的帮派社会网络，并凭借一种独特的文化维系自身的存在。因此，这些帮派活动在各种传统组织（institutions）已经破败时出现的社会无主地带（no-man's-land）。这本书出版两年后，当华尔街破产、经济萧条开始来临之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感觉，认为社会失序已经越出了内城，成了既普遍又在一定区域流行（endemic）的事情。因此，人们对如下的观点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即社会学家应该把代际关系的衰落和自足的同辈文化的崛起不仅仅看作是贫民区生活的特征，而且应看作是普遍状态的特征。接下来，帕森斯（Parsons）于1942年又指出，这些正在发展中的同辈群体文化实际上具体表达了有更宽泛基础的世代意识，这种世代意识周围萦绕着一种特有的、以享乐消费为核心的“青年文化”。帕森斯的“青年文化”是一代只消费不生产的人的文化，有明确年龄划分的教育机构拉长了这代人被限制的年限；因此，学者们认为他们不仅避开了生产制度（productive system），而且避开了扎根于这一生产制度的阶级关系。这种强调年龄区分日益重要而阶级不平等仅仅是枝节问题的观点，与那种强调消费和休闲是青年意识的核心的论断结合在一起，注定在随后的30年里将主宰青年社会学的发展。

1945年之后，这类论断被进一步充实，并被再次赋予了一种被广泛接受的预设——即战后时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轴已经由工作转向了休闲，新的消费关系正在迅速取代旧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生活当中的核心位置。从迅速成长的、以青年为导向的娱乐工业所促成的休闲时尚当中生成的“青年文化”日益广泛的兴起，就正好体现了这种转变。在男孩俱乐部和童子军衰落的地方，接着就出现了披头士乐队和玛丽官（Mary Quant）设计的迷你裙时装。新兴一代处在超越阶级但同时维护资本主义的过程当中。名义上进入新的休闲时尚的平等似乎抵消了生活机会当中依然残存的阶级不平等。作为富裕社会的继承人，战后的青年因此成为即将来临的“休闲社会”的先锋，紧随他们的是那

些拥有电视机和一瓶一瓶薄若莱红葡萄酒(Beaujolais)的“新”工人阶级。广告的意象所装扮的,正是这种无须革命的陈旧的革新观。

尽管阶级的作用被贬低,但它并没有完全从对于青年的分析中消失。相反,无论是对于学校制度还是越轨行为的研究,都多次证明工人阶级青少年的生活机会和生活时尚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构成的。然而与此同时,有关教育不平等和青少年犯罪的问题日益被界定为一些自足的“问题”,并认为通过专业化的研究和补救改革,就可以充分理解和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因此,这些研究所隐含的更为广泛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弃而不问,关于青年的主流著述依旧安心地坚持无阶级差别(classlessness)的神话。

将青年视为社会变革先锋的观念,到60年代后期“反主流文化”兴起之时达到了极点。这种发展以其出人意料的表现几乎彻底吸引住了大多数的评论家,由于缺乏连贯的阶级分析,绝大多数评论家都转向了唯心主义理论。查尔斯·赖希(Charles Reich)那本在大西洋两岸畅销一时的书《美国的青春化》(*The Greening of America*),典型地体现了这种论断中起主导作用的思路(dominant train)。

在以前,青年人通常会感觉自己受当下处境的约束要多于受“世代”的约束。但是在今天,整个的文化——包括音乐、服饰和毒品,开始成了辨认青年的东西。这种文化一起作用,随之就出现了有关意识的预言(message)。

意识能够改变和消灭公司式的国家(Corporate State),并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夺取政治权力,不需要推翻任何现存的集团……

(1972:189;253)

看起来,青年人被认为处在变成“自为”的、有独特意识和时尚的一代人的过程中,而嬉皮士作为一群前卫的先锋派,“预演了在机体内可以解决未来社会所提出的各种重要的生活问题的文化方法”(Davis, 1970:330),这个未来社会是富裕而休闲的社会。

60年代后期标示着一个转折点,但这场意义重大的运动并不是一

种旨向富裕的推进,而是一种朝向朴素的回归。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的恶化,可以日益明显地看到,未来的主要冲突不会是每个世代关于意识模式和文化时尚的争论,而是各阶级及各阶级派别之间围绕经济资源和基本生活机会的斗争。战后发生的复杂的社会变革可能还无法消除阶级结构,但确实改变了人们体验和对待阶级结构的很多方式。因此,承认阶级之中心性的社会学家面临一个问题:即要发展出一种足够敏锐的分析来应对当代形势的复杂性。这依然是我们的基本任务。

青年提出了一个有待分析的特别困难的问题。一般认为,战后时期建立了普遍的中等学校教育体系,出现了专门针对青年的一整套休闲和娱乐设施,见证了青少年最终被机构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过程。这些机构虽然并未像某些“青年文化”理论家所说的那样将青少年从阶级制度中排除掉,但它们把青年放在一种与阶级结构有特殊关系的位置上。(尤其对妇女来说)年龄因此变成了日益重要的阶级协调中介(*mediation*),后者既建构阶级体验的形态,又建构经历这些体验的各种方式。与此同时,那些支撑各种新的青年管理机构的意识形态——机会平等、消费自主,最重要的还有,青少年是一个特殊的、特别重要的成长阶段——继续掩盖阶级不平等的中心地位,继续强调年龄区分的优先性。代际分离和青年平等的修辞依然很流行,为常识性地理解社会结构和社会变革提供着持续的思想框架。因此,年龄非常重要,它不仅是阶级体验的协调中介,而且是阶级意识的协调中介。

因此,世代意识与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有待研究的重要话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不只因为它对于一种重建的青年社会学必不可少,还因为它对于完整进行如下分析——阶级意识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意识构成是如何被阻碍、被阻止的——也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目前对于这种关系的探究,在两条主要的方向上有进展;第一条源于对曼海姆社会学模型所关注的青年问题的复兴,第二条源于在亚文化分析方面取得的进展。

图绘意识：曼海姆及其以后

对于“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兴起持欢迎态度的社会学思考，在经历了最初一阵骚动之后，很快出现了一大批对于嬉皮士和巴黎公社支持者(communard)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所体现的意识形态所做的经验主义探寻。这些研究证实了那些更为敏锐的评论者一直坚持的观点，即“反主流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青年的运动。这反过来又促成了曼海姆的社会学模型，特别是他的“代群体”概念的复兴。因而，“反主流文化”越来越多地被描述成由一个特定的“代群体”所呈现的独特“时尚”，而不是明确的青年意识。

曼海姆的社会学模型不仅仅被再次激活了，而且还得到了扩展，正像研究者们所承认的，当代青年不仅包括“一些有差异的、相互对抗的代群体”，而且这些不同的群体划分(divisions)还植根于更广泛的阶级不平等结构当中。正如两位美国“新”社会学家最近所指出的：

世代分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尚未得到发展，这一方面涉及阶级归类对于扩展那些由世代引发的(generation-based)各种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对于考察上层阶级的各种分组与下层阶级的各种分组如何**相互协调同龄人体验**的必要性。

(Laufer & Bemngtson, 1974:181, **着重强调处**为笔者所标)

虽然这些评论者承认阶级的重要性，但他们依然将年龄当作分析关注的首要焦点。阶级因此成了一个次要的变量，它首先作为对世代体验的一种协调因素而产生关联。因此，从这种阐释模式中产生的经验主义著作，肯定会避开阶级意识问题，相反会更关注处于不同阶级地位的青年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共享那些显现在“反主流文化”当中的意识与时尚。^①尽管如此，这种研究与弗兰克·马斯格罗夫(Frank Musgrove)最近出版的著作相比，还显示出明显的推进性；马斯格罗夫

① 如Patricia Kasschau, Edward Ransford and Vern Bengtson(1974)。——原注4

还继续贬低阶级的重要意义,并坚持认为“反主流文化是新一代的普遍精神”(1974a:35)。①然而,近年来对于青少年内部的阶级意识的研究,同样也存在偏颇,因为这些研究又完全忽视世代意识。②

下一步我们要走向更全面的分析,要探讨阶级意识和世代意识的关系,以及这两者与青少年的全部社会阶层观念之间的关系。在探讨开始时,我们需要细致描绘那些被不同阶级的青少年用来描述和阐释阶层制度的常识性概念和理论。就这一点来说,一些关注阶级意识的社会学家在描绘人们对于阶层的日常理解方面做出了最为持续的和富有成效的努力。因此,在这一领域最近出现的研究成果,为批判地考察通行的方法论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开端。

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在最近的一项成果当中,有效地区分了阶级意识的四个层面:(1)认同(*identity*)——把自己定义为对一种特殊的阶级地位的分享;(2)认为阶级结构的核心是劳资双方永久的矛盾对立;(3)总体性(*totality*)——认以上两层意义是描述个体自身社会处境和整个社会状况的根本特征;(4)最后一点,希望通过阶级斗争去建立一种另类的(*alternative*)社会秩序(1973:13)。总的说来,最近英国有关阶级意识的研究成果集中讨论了前两个层面,更多关注人们的阶级认同和阶级结构的整体形象。

这些研究依据的方法,几乎都是通过问卷或访谈方式对一组几乎标准化的问题进行回答。打眼一看,这些问题似乎非常简单,比如,“许多人在谈论英国不同的社会阶级。那么你认为‘社会阶级’这一术语意味着什么?到底有多少个社会阶级?”(Stradling and Zuriek,1973:298)。但是,诸如此类的问题建立在一个重要但未证实的假设之上,即被问者有一个清晰的“阶级”定义,后者构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阶级结构形象的基础。这种假设是非常成问题的。

最近的研究,包括我们正在开展的研究,都显示出关于阶级的各种观念与许多人对于阶层化(stratification)的理解没有太多联系或者

① 还可参照Frank Musgrove(1974b)。——原注5

② 参照Robert Stradling and Elia Zuriek(1973)。——原注6

根本没有关联。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意识到根深蒂固的社会分化和对抗,而只是表明这种意识并不是围绕阶级观念明确起来的。正像两位英国社会学家最近提醒我们的,“对屈从、歧视、不平等和敌视的种种感觉是阶级冲突的本质……这些感觉可能源自社会生活的一些方面,也可能从来没有用‘阶级’这一词语来表达过”(Moorhouse & Chamberlain, 1974:390)。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新奇的观点。正像维多利亚时代伦敦一所破旧的学校里有位令人厌烦的校长所说的:

……对于他们来说,一个人的外套在这里就是阶级的标记——因为虽然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个词的意义,但他们肯定知道,或者至少感觉到,我们是他们曾经认为的那些会同他们产生斗争的人的代表。

(quoted in Carpenter, 1968:60)

民族志方法学家(ethnomethodologists)宣称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社会学家,这也许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像社会学家那样思考和言说。同样,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阶级成了人们日常用语中的一个核心范畴。相反,这件事在多大程度上已是事实还需要实证调查,同时我们必须特别关注那些用别的词语描述阶级地位的事例。我们实际上需要把“虚假意识”这一范畴还原到分析的核心位置上去。

然而,即使在使用“阶级”这一术语的地方,也可能呈现出各种共鸣现象,从而避开了严格的社会学分类。比如,最近澳大利亚有一项研究发现,相当多的回答者在理解阶级时,首先想到的是阶级对两类人群——自命不凡的、离群索居的人与容易同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混杂相处的人——的区分意义(Hillier, 1975)。就像这位作者所指出的,自命不凡或许现在成了在澳大利亚人当中非常有共鸣感的概念,但是它也会相当频繁地出现在英国人的语境当中。比如,从《涂料房》(*The Paint House*)中节选的这段:

……我在学校的时候,你知道我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我告

诉我妈妈“我们是中产阶级”，而她说：“你知道你小兔崽子不是；中产阶级是自以为是的人。”我于是无从知晓了。我认为你是，是因为你不是流浪汉(tramp)，你是中产阶级。我认为你是，是因为通常在学校有一些比你更穷的人……因此你的地位要高一些。

(Daniel & McGuire, eds.1972:73)

用诸如此类的标准定位的各种阶级概念，实际上更像是一种惯例(rule)而不是一种例外(exception)，就像大卫·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非常雄辩地指出的：

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从他们自身独有的社会背景的有利位置去想象他们社会的阶级结构……他们对于更大规模的社会认识，往往依据他们在自己日常生活的较小社群当中所感受到的社会不平等而变化。

(1966:249)

因此，详尽了解各种具体的社会语境，是对社会意识进行充分分析的必备前提。这意味着要充分超越阶级地位的粗糙指标(crude indicators)，要考察阶级结构在日常生活层面实际上被体验和理解的种种途径。

然而，与此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忽略以下事实：局部化的(localized)阶级观念是在占据领导权的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整个框架内部发展起来的。因此，这些阶级观念不仅是人们给自己所经历的不平等和屈从等现实经验不断施加意义的结果，而且是对大众传媒和教育制度所提供的地位概念进行挪用和重写的结果。这种特殊的成果是一种由个人经验推断构成的不稳定的混合物，它的构成要素来自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①实际上，“一种能够让人产生连贯的社群想象

① 这一点在西奥·尼科尔斯(Theo Nichols)的著作中有明确的讨论(1974)。——原注7

(image of society) 的社会处境,很可能是一个例外而不是惯例”(Cousins & Brown, 1972:3)。因而,那些掩盖这些不一致之处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掩盖社会意识的复杂性。

阶级意识方面的分离(disjunctions)和不一致很可能是青少年特有的表现特征,因为他们陷入到了那些明显贬低和掩饰阶级不平等之重要性的体制当中,这些体制还提供了一种强调年龄差异之重要性的替代性的观念。对于青年和年龄的持续褒扬(celebration),会对青少年的阶级意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依然是未来要研究的中心话题。最近一些学者——如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吉姆·卡津斯(Jim Cousins)和西奥·尼科尔斯(Theo Nichols)等人——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指出,由于访谈和窃听(eavesdropping)容易被操纵,因此还要需要提供更多的内容。即使这些技术被用到最佳状态,也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它们只关注意识的种种言语表现,而忽视了其他可以表达和具体呈现社会意识的社会、文化行为。^①最终,分析有必要“超越那些特定的日常观念……去展现这些阐释成果及其应用于行动的情况”(Hillier, 1975:22)。发展这样一种分析的努力,构成了近年来研究青年亚文化的主要思想路径,包括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也是如此。

解读风格:亚文化分析的行动指南

我们此处提到的这种独特的亚文化分析观念,主要关注以下问题:处在不同阶级位置的青少年们所共有的社会经验,是如何通过对各种独特的休闲风格的建构(construction),被集体性地表达和协调出来的。各种亚文化风格是由各种元素混杂而成的东西构成的,而这些元素有两个主要的来源:嵌入到家庭和当地街坊当中的“境遇化的”(situated)阶级文化;由那些面向青年的娱乐工业所引发的“中介性的”(mediated)符号表征体系。然而,这些元素并不是被天然地拿过来用的。相反,各种亚文化风格都是**选择和转换**的累积过程产生的成果;通

^① 对于依靠冗长言说技巧带来的局限性的敏锐讨论,见Paul Willis(1974)。——原注8

过这个选择和转换的过程,那些随手可用的实物、符号和行动,脱离了它们原来正常的社会背景,被部分地或全部地剥夺了它们惯常的含义,被“一些团体的成员”改造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新的、一致的整体”(Clarke & Jefferson, 1974: 15)。这一过程的核心环节,包含挪用那些表面上没有阶级性的“青少年文化”工业(‘teenage culture’ industry)生产的人工制品和商品,并给它们赋予阶级的意义和共鸣。亚文化分析因此可以被视为是对转移到青年人具体语境当中的阶级意识的编码化表达,是对年龄作为协调阶级体验和阶级意识的中介如何发挥合成作用的思考。

由于亚文化风格是意识的编码化表达,分析的首要工作就是去解码。因此,“解读”风格,很大程度上就是对附加在风格的各种构成元素及其关系之上的意义进行揭示;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解读”是在提供一种方法,后者可以把青年的阶级意识描绘成一个综合的、有具体连贯背景的(contextualised)整体。比如,吉恩·莫诺(Jean Monod)通过对巴黎北区工人阶级男孩群体所推崇的风格所做的敏锐的、详尽的“解读”,对他们潜在的社会阶层观念提出了条理分明的解释。但是到目前为止,在“解读”风格方面所做的最全面的尝试来自英国的工人阶级青年研究,最著名的就是菲尔·科恩对伦敦东区亚文化现象所做的开创性的解释(1972),以及随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于泰迪族、摩登派和光头党等风格所做的研究工作。^①这些研究合在一起,提供了一套研究阶级、年龄和意识之间关系的原创性的方法,任何一位对能否发展出更为充分的、探讨当代青年的社会学这一问题真正感兴趣的人,都无法忽视这套方法。然而与此同时,在这些研究中的展现的这套方法也受制于几个重要的局限。

当代的亚文化分析发源于青少年犯罪研究,而且依旧反映出这一领域的优先存在。因此,近年的研究继续仿效早期那些著作,这些著作更多关注越轨行为而不是惯常行为,更多关注工人阶级青少年而不是

^① 比如,参见John Clarke, Dick Hebdige和Tony Jefferson(1974)。——原注9

出身于中间和中产阶级的青少年,最重要的一点,更多关注男孩而不是女孩。这些不平衡和缺陷使得近年的研究范围依然相当有限。对于成人的忽视也是目前的研究成果存在的另一个重大空白。

与“青年文化”理论家们对于代际之间成长“鸿沟”的过度简单化的强调相比,亚文化分析的支持者遵循的是戴维·马茨阿(David Matza)的观点,即强调青年亚文化群体与他们嵌入的成人文化群落之间有着复杂的连续模式和分离模式(Matza & Skyes, 1961)。比如,菲利普·科恩认为“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或解决,尽管是‘想象性的’解决,父辈文化当中依然隐藏的或未解决的种种矛盾”(1972:23)。与此类似,约翰·克拉克和他的合作者指出,“光头党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复兴如下文化的企图,这种文化作为对已经改变了的社会结构地位的反应,正在发生改变并着手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展开新的谈判”(1974:155)。尽管这些研究给父辈文化赋予了理论价值,但它们并没有进行经验的考察,因此代际之间最重要的文化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理论断言的水平。所以,下一步要推进一种更对称的(*symmetrical*)分析,将青少年和成人放在同样基本的阶级位置上,详细考察他们在各自的阶级体验、阶级意识和文化行为模式方面的一致性和种种变化。如果我们想要获得对年龄状况作为阶级地位的协调中介如何发挥作用这一点有更完善、更“切实的”(grounded)的理解,这样的分析就是必不可少的。

亚文化研究建立在一种非常合理的假设之上,即由于青少年的行动选择权很容易被严格限制在工作境况之内,他们对自身阶级地位的回应将会在消费和休闲领域得到最充分的表达。总的说来,这种假设有现行的证据可资验证。但与此同时,对休闲重要性的强调,也使得一些研究者几乎将他们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在这一领域,几乎不关注青少年的工作体验。这就导致了一种两难的(*paradoxical*)处境:一种明确宣称要追寻阶级地位与阶级意识之间的因果联系的方法,却缺乏对最强大、最有力的阶级立场的协调中介——工作环境——的完整分析。如果没有从生产视角对体验和协调阶级不平等的各种方式所做的详细了解,那么,任何试图将意识的独特形式与对独特的阶级地位的文化

反应联系起来的努力,都必然是不完整的。

很显然,填补这些空白是未来的研究首先应该考虑的事情,但这又不仅仅是增加更多的研究而已。这里还有一些必须面对和完成的重要的方法问题。

亚文化研究是通过选取一些与众不同的风格和参与这些风格的那些群体来开始的,然后再回过头去揭示它们的阶级基础。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对文化风格与阶级结构状况(structural situation)之间的同源关系做出了一种精致的、看起来似乎合理的(plausible)解释。然而,如果这一顺序被颠倒过来,分析从阶级处境而不是从文化反应开始,就会出现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会马上变得很明显,即相同的阶级结构状况可以产生和支持各种各样的文化反应和调节模式。

比如说,近年来对于工人阶级领域的研究,表明有几类独特的青年亚文化可以在同一区域共存,每一种亚文化都从基本上处在相同阶级处境中的男孩当中吸引来了自己的承载者(bearer)和支持者。比如,斯蒂芬·巴夫(Stephen Buff)对芝加哥的研究(1970)表明,虽然在此地区的多数男孩支持主流的“摩托车族”,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派被吸引到了从中产阶级当中产生的“嬉皮”风格当中。因此,问题不仅仅是解释为什么像泰迪男孩、摩托派小痞子和光头党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工人阶级青年群体中成长起来的,还要解释为什么有着相同阶级地位的青少年会被吸引到由其他阶级派别发展起来的风格当中。要解释亚文化从属关系和潜在意识当中这些微妙的变化,我们需要想办法超越种种通常用于描述阶级地位的相对粗糙的指标——如父母的职业、学校的地位等,而应去考察在实际的日常生活层面体验和理解阶级不平等的各种具体的中介。

威尔莫特(Willmott)和巴夫的研究也引发了亚文化分析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我们在自己最近对于莱斯特郡(Leicester)的研究中更加强烈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就是关于“墨守成规的”(conventional)青年的问题。

亚文化理论最初提供了一个主要的理论研究纲领。因此,我们开始期待各种亚文化风格给青少年提供那种用以阐明他们的自我界定

和社会处境的主要渠道,这种期待似乎也得到了早期初步研究成果的支持(Murdock & McCron, 1973)。随着主要的实地调查工作开始展开,有一点日趋明朗:一些调查对象并没有参与这个城镇上的任何一种流行的亚文化群体。相反,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调向官方青年机构或主流少年娱乐工业所倡导或赞助的各种风格。与各种亚文化形态相比,这些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重造的(re-made)或改编的(adapted),而差不多完全是从官方机构或娱乐工业那里接管而来的。它们根本不挑战、不对抗那个占支配地位的意义体系,实际上还是这种意义体系的表达和扩展。然而,对于青年的综合分析,必须不仅要能适应和解释离经叛道(deviancy)和拒绝(refusal),还要能适应和解释墨守成规(convention)和服从(compliance)。依照定义,各种亚文化形式显然只能主导文化的支配下存在;它们无法在主导文化内部存在,因此,亚文化分析无法解释各种“墨守成规的”青年风格。这并不是说要抛弃亚文化分析,而是说要认识到它的局限性。

结 论

阶级位置、年龄立场以及社会意识之间复杂而微妙的相互影响(interplay),现在已经开始引起大西洋两岸社会学家们的关注,也已经产生了几种独特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圆其说的分析路线。如果说当今的这些研究还未形成一套适合这一领域的连贯的、统一的方法,那么它们至少以默认的方式显示了这一方法所必需的一些要素。

首先,它必须是全面的(*comprehensive*),必须包括这些被现今的解释所忽视或贬低到外围的青年群体。其次,它必须是对称的(*symmetrical*),不单单研究青少年也研究成人,还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第三,它必须扎根于一种对各种真实的工作和非工作(non-work)的背景所做的细致的经验考察,因为阶级不平等实际上通过这些背景被传递到日常生活的体验当中。但是与此同时,还必须能够说明,在这些背景之内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和行为,是如何嵌入到更为普遍的结构形态和意识形态结构当中并被后者塑造的。这需要以下两个方面——青年在社会和文化地位方面的变化与阶级关系结构和以阶级为基础

的意义体系的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结构的和历史的分析。如果没有这种更宏观的层面分析,这种方法的阐释力将被严重削弱。因而,在具体的事实和普遍的社会与文化进程之间发掘出一些概念的和经验的联系,就成为一个核心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因为从根本上讲,此处勾勒的这种方法的充分程度,取决于它对个人经历和历史之间关系的阐释能力。显然,这种方法不能建立在任何单一的方法论之上。实际上,迷信某些特殊的程序和实证技术,差不多就是用一种最快的方式去破坏一种有前景的分析思路。亚文化分析、思维敏锐的访谈和“新”社会史,假如它们的局限性都被认识和考虑到了,都有可以贡献的独特之处。

沿着这里所勾勒的思路去重建青年社会学并不容易,但我们认为值得去努力。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提供了一种对当今青年进行更全面分析的美好展望,还在于它对更充分地理解现代英国阶级意识的形成和“虚假”意识的产生机理,也是必不可少的。正像早期的青年形象被社会主义的幽灵所萦绕,当代社会主义也被占主导地位的代际神话(mythology of generations)所萦绕。因此,去神秘化成了驱魔行动必须迈出的第一步。

(孟登迎译)

15 女孩和亚文化群体

安吉拉·默克罗比 詹妮·嘉柏

这部书前面的多篇文章已经表明,亚文化群体“为一部分工人阶级青年——主要是男孩——提供了一种处理他们具体的集体存在状态的策略”(着重号是我们所加)。很明显,女孩在这一领域的整个研究文献中是缺位的,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总体来说,有关女孩在青年文化组群中所扮角色的著述似乎少之又少。在经典的亚文化民族志研究、“热门的”历史记录(像Nuttall,1970)、个人记述(像Daniel and McGuire, eds., 1972)以及各种新闻调查(像Fyvel, 1963)当中,女孩都是缺席的。而当女孩子们真的出现的时候,她们要么呈现为我们非常熟悉的那种不加辨别地被强化的女性刻板形象——例如,法伊弗尔(Fyvel)在他对泰迪男孩的研究中提到的“那些浅薄地涂脂抹粉的、沉默而被动的男孩”(1963);要么被蜻蜓点水般做些边缘化描写:

好像一切正好与我们相关的事情都只能出现在正文的脚注里,只配作为零碎的参考引文。我们只是在讨论“青年”与“任何其他议题”之间关系的某个地方才被正式提到。当我们在男性文化群落中遭遇我们自身时,也只是作为“附带提提”和次要的因素而存在。依照所有这些记述,我们似乎真的就不存在。

(Rowbotham, 1973: 35)

问题的难点在于,我们如何去理解这种不可见性(invisibility)?

从我们所能找到的原因来看,女孩真的就没有在各种青年亚文化群体当中活动和出现过吗?或者,是某种东西阻碍了研究,从而使她们被隐匿起来了?

当文献中认可女孩存在的时候,作者们往往谈到的只是她们的性吸引力。但是,这一点也很难让人理解。例如,保罗·威利斯就对那些混迹于他所研究的摩托车亚文化群体中的未婚女孩做出过如下的评论:

将她们联系起来的,是一种希望依恋一个男人的普遍渴望,以及一种普遍的无能为力——无法吸引一个男人建立起长久的关系。与那些已经有了对象的女孩相比,她们往往形容邈邈,也缺乏吸引力。

(1972)

这种对待女孩的典型的蔑视态度,是否直接反映了男性研究者与其男性调查对象之间天然的契合关系呢?或者是不是这样:那个实际上研究摩托车男孩的研究者发现,在当下研究现状的语境当中,很难做到不采取男孩对女孩的态度和评价,并在他的描述语言中反映这种态度和评价,甚至将这种态度和评价当成了他自己的一种理论视角?威利斯特地评论了女孩面对他的提问时的一些反应——咯咯地傻笑,不愿吱声,退缩到她们的小团体当中去,等等。这些反应再一次让人感到相当复杂和难以理解。她们这些针对一位男性研究者做出的典型反应,是否就是因为受到他是一个男人这一事实或者他的个人仪表和魅力等因素的影响呢?或者,这些反应是否还受到如下事实——女孩们认为他与“男孩们混在一起”、研究他们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他们对于女孩的评价态度——的影响?或者,这些反应是否体现了女孩们在一种由男性主宰和界定的文化之中,对提供给她们的空间进行习惯性处理的各种方式所具有的特征?在我们能够理解那些经由这些格外复杂的反应所传达出来的体验和立场之前,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探析和说明。例如,女孩——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可能会从那些由男性界定

的情境当中（在那儿她们只是在性的方面被贴上标签并且受到评估）退回到一种“组群状态”（groupiness）或小集团中去，“咯咯傻笑”就是成了这种状态的一种公开的标记。在其他的场所（比如在教室），女孩之间的群体团结推动她们产生了一种比较好斗的反应，她们在这些地方会利用她们的性征去开辟一些接近年轻男教师的手段，或者让他陷入困窘或者削弱他的权威。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防守的反应还是挑衅的反应，都是在对抗男性的界定（因此出现了性标签，等等）占支配地位的情境中构成的。因此，在我们能够对女孩们真正发生影响的这些领地和她们以性或社交方式所寓居的这些空间进行恰当的界定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对这些反应做出解释。

接下来的只是一种基本的、试探性的尝试，旨在勾勒某些我们可以思考和研究女孩与亚文化群体之间关系的方法、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纳了本书其他章节概述过的一些理论视角：例如，阶级的中心性；学校、工作、休闲和家庭诸领域的重要性；亚文化群体兴起的总体社会背景；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各类亚文化群体之范围的战后英国社会的某些结构性变迁。然而，我们还必须增添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关于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的建构问题。那么，问题就成了：这一维度如何从总体上来重塑这种分析？有人认为，在限定中产阶级男孩和工人阶级男孩不同的亚文化选项时，阶级是一个关键性的变量。例如，中产阶级男性亚文化群体可以提供更多的全职“职业”（careers），而工人阶级亚文化群体往往仅被限制在休闲领域。这种通过阶级来对需求和选项进行的建构，肯定也对女孩们起作用。因此，对于女孩来说，或许更容易在诸如（中产阶级的）嬉皮士或逃避社会现实的亚文化群体中找到替代性的事务，而在（工人阶级的）光头党文化中却很难找到此类事情。不过，从总体上讲，男孩比女孩更容易对亚文化的选项感兴趣。这一分析表明，那些适合男孩亚文化群体的真实存在的东西——比如阶级的结构性影响，同样适用于女孩，而且只会更适合她们的真实情况。这一点表明，各种亚文化形态对男孩和女孩来说大致上是一样的，只是女孩在每一个维度上必定要更边缘一些。

然而，或许女孩所处的边缘性并不能最充分地体现她们在亚文化

群体中的地位。女孩或许并不是处在一个边缘性的位置,而是处在一个在结构上有差异的位置。女孩处在亚文化群体的边缘位置,或许不仅仅是因为她们被男性的权威推到了每一种社会活动的边缘地带,还因为她们被集中地推进到一种不同的、必然处于从属地位的活动范围之内。这种分析依据的不是她们的边缘性而是其被结构化的从属性(secondaryness)。如果女性对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男性工作文化来说是“边缘性的”,那是因为她们在一个从属性的领域——该领域以一种补充和从属的方式反映了“占支配地位的”男性领域——占据着核心而关键的位置。她们在工作中处于“边缘地位”,是因为她们在从属性的、补充性的家庭领域占据着核心的地位。同样,女孩们在这些活跃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工人阶级青年休闲亚文化群体当中所处的“边缘性”,比起她们在那些“补充性的”、更为被动的粉丝和追星俱乐部亚文化群体当中的抢眼地位,所能显现给我们的意义或许要少一些。(我们试图在随后的评论中用粗略的图表形式来展现对这种补充性和从属性的分析。)

头脑里有了这个总的论点,我们现在就可以试着去确认随后的研究可能要处理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1)女孩真的在战后的亚文化群体中是缺席的吗?或者她们存在但却没被发现?(2)在她们存在并露面的场所,她们是否扮演了与男孩相同的角色却更边缘化?抑或她们与男孩完全不同?(3)是否边缘地位和差异地位就是专门提供给女孩的亚文化选项?或者,她们的角色是否反映出女性在主流文化的各个核心领域——家庭、工作、学校和休闲——当中所处的更为普遍的社会从属地位?(4)如果亚文化选项不是女孩轻易可以得到的,那么女孩将用哪些与众不同但互为补充的方式来组织她们的文化生活呢?而且,这些方式就其自身来说,是不是就呈现为亚文化的形式?(由于“亚文化”这一术语长期以来获得了太过强烈的男性意味,女孩亚文化群体或许才变成了看不见的存在。)

女孩们真的在亚文化群体当中缺席吗?

使得这个问题难以回答的一个最明显的因素是,“社会学”研究

(和大多数学术领域一样)由男性掌控。具有悖论意味的是,这种号称“激进的”或充满怀疑的新的越轨行为理论,同传统的犯罪学一样,都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特征:将妇女排除在外。《批判犯罪学》(*Critical Criminology*)的编者认为,“新近的越轨行为理论”通常意味着“一种对于越轨形式的颂扬,而不是对它的分析,越轨行为理论家们可以与它产生替代性的共鸣——无权的知识分子对那些在控制事态方面显得更为成功的越轨者产生的一种认同”(Taylor, Walton and Young, 1975)。在那些激进的和批判的理论家们看来,除了性偏差这种例外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以外,妇女们构成了一种不为人知的社会类别。这种普遍的不可见性,无疑会被青年亚文化群体那些更极端的表现引发的社会反应所强化。通俗报刊和传媒集中关注的是与每个亚文化群体相关联的那些耸人听闻的轰动事件(例如,泰迪男孩的谋杀事件、摩登派与摇滚派之间的马尔盖特冲突)。这一事实——一种现象的暴力方面总是被认为具有报道价值——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这些有亚文化活动的区域当中,妇女们恰恰容易被排除在外。经由媒体的编码和描述,一个亚文化群体呈现出的那种客观的和流行的形象,往往可能会强调男性的成员资格、男性的“焦点关切”和男性价值观。或者,就像在嬉皮士亚文化群体中的那种情况一样,当女性呈现为新出现的道德恐慌的构成因素之时,通常充当了一种相对无伤大雅的角色——例如,作为性放纵的形象。

由于种种的原因,女性在青年亚文化群体中的不可见问题,变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一种循环论证。人们不妨认为,女孩/妇女在这些群体中并不起什么关键作用。但另一方面,在有关这些现象的文献当中,对于男性和男子汉气质的强调却强化和放大了我们认为亚文化群体主要是由男性主导的这一观念。我们要“进入”女孩与亚文化群体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其实并不容易。比如,文本和形象等辅助性证据显示,有一小群女孩认为自己就是泰迪女孩(Teddy Girls),她们认同泰迪男孩文化,与他们在大象堡酒店(the Elephant and Castle)一起跳舞,与他们一起看电影,而且显然也从泰迪男孩所煽动的暴力事件中

感受到了某种共鸣式的快感。^①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出身工人阶级的女孩不会把这种行为作为自己的选项。

尽管女孩们也分享了20世纪50年代青年人获得的支配性收入普遍增长的好处,但是女孩的工资没有男孩高。更重要的是,社会给女孩们强行构建了一套在取向上迥异于男孩的消费模式。工人阶级的女孩,尽管暂时也干着工作,但是与她们的兄弟及其男性同辈相比,依然更多地关注家庭、妈妈和婚姻。她们更多的时间是在家庭里度过的。而泰迪男孩的文化则是一种从家庭的逃离,转向了大街和咖啡馆,还有那些夜晚和周末的“进城”旅行。女孩们当然愿意穿上盛装,或者单独与男朋友,或者结成一群,同一群男孩结伴外出。但她们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在外面闲逛”或涉入街角事务。在工人阶级父母的价值观系统当中,男孩们被认为“可以在能玩的时候尽情玩乐”(尽管许多工人阶级父母认为泰迪男孩的那些“玩”法相当奇特);但女孩们却要遭受双重的训诫——“可以玩乐”但不能“让自己陷入麻烦事当中”。性的禁忌以及道德体制和“规则”中所体现的东西,依然对女孩更为不利,而对男孩的影响则较弱。当男孩们可以花大量时间在他们的领地上“闲逛”的时候,对于女孩来说,其行为模式却有可能被更为严格地构建于以下两种行动之间——要么待在家里、(通常与其他女孩)准备出去约会,要么外出参加交往。在性或社交方面曾经“放荡不羁”的男孩们,可以“改过自新”并定下心来过日子;而对于女孩们来说,如果在整个街坊被大家知道是个曾经被人“搞过”的“放荡女”,那么后果就非常严重,而且不可挽回。

再说,与“二战”前相比,人们确实更加关注那些针对青少年休闲市场的青年文化,更加关注随之出现的各种表现形式(演唱会、唱片、偶像照、杂志),而且女孩可以与男孩共同分享这些东西。但是许多这些活动可能会被轻易地挪用到传统界定的、由家庭或以同辈为核心的女孩“文化”所构成的文化空间当中,比如主要在家里活动,或者到女

^① 关于女孩“帮派”成员在如下行动——向男性成员运输武器到舞厅,并且在事后支持他们对抗警察——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可参见帕特里克(Patrick,1972)。——原注1

性朋友的家里做客,或者参加聚会,而不参与诸如在街上或咖啡馆闲逛之类比较危险的、容易令人不满的行动。在“卧室文化”内部,就有为大量新兴的青少年消费文化所提供的空间(尽管还是比较拘束地与姐姐共享这一空间),比如试用化妆品,听唱片,读杂志,揣度、评估男朋友,闲聊,跳摇摆舞:这一点更多取决于女孩对家庭内部(而不是外部)的房间和空间的一些享用权。

这可以引导我们提出如下的判断:在泰迪男孩亚文化群体当中,女孩是在场的,但是以边缘化的或者至少是以高度模式化的方式出现的;依照本文以上所述立场,她们的“参加”是凭借一种补充性的、有差异的亚文化模式得以持续进行的。我们可以通过以下表述把这一点说得更详细一些,这就是:许多男孩对于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摇滚乐的反应是让他们自己成为活跃的、即使是高度业余的表演者(噪音爵士乐群体[skiffle groups]的出现),与之相反,参与这种文化的女孩要么成了摇滚乐的粉丝,要么成了摇滚唱片的收藏者,成了“青少年-英雄”(teenage-hero)杂志和爱情漫画的读者。对于男孩们来说,没有专门针对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爱情漫画”的青少年摇滚明星(尽管有些男孩可能偷偷地看过他们姊妹的漫画!)。同样,也没有一条有关女孩噪音爵士乐群体的记录。

如果我们考虑到20年后出现的一个同等“狂暴的”、以男性为主导的工人阶级亚文化群体——20世纪70年代的光头党群体,这幅图景就可以被合成起来了。从媒介所造成的流行性的轰动效应来判断,基于上述评论,光头党文化的媒介形象基本上是男性化的。事实上,确实有一小群“光头党女孩”,而且,尽管她们在人数上不能与男孩相比,但她们以一种积极、主动的角色出现在足球比赛当中,的确应该值得注意——从传统上来看,足球比赛是一个完全由男性主导的运动和场合。而且,泰迪男孩的“女朋友们”在外表和穿着上与她们要约会的男孩显得很不一样,与之相反,有些光头党女孩的确在外表、穿着和行为上与她们的光头党男朋友相当类似,并带有支持他们的意味。一些少量的证据表明,有几个女孩群体更大规模地直接参加了20世纪70年代这种由男性界定的、以工人阶级为主的亚文化群体,可能比20世纪

50年代直接参加泰迪男孩群体的女孩规模要大一些。但是,这并不是以证明可以靠它来创立某种了不起的假设。当然,现在的新闻报道就女孩卷入帮派和群体活动(包括暴力活动)之事所提的问题,确实要比泰迪男孩那个时期多一些。但这也许仅仅反映了当今文化之中(相较于过去而言)妇女普遍的、日益增长的可见性以及对于女性地位问题的日益广泛的关注。此外,我们很难断定女孩在亚文化群体中担当的角色是否已在实际上发生了改变,也很难断定她们的角色是否只是变得公开可见了。当然,下面这段暗示暴力与妇女运动的兴起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话,恐怕在20世纪50年代是不会出现的:

为什么传统上更为温和优雅的女性那么容易诉诸暴力?难道仅仅是因为社会本身变得更为暴力了,抑或它就是争取平等的斗争(那种号称“男人们能做的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做得更好”)的一部分?

(Berry,1974)

如果我们想开始尝试性地、粗略地描述那些在如下两种情况——女孩在泰迪男孩文化中的相对缺席(不把“从属性”考虑在内)与女孩在光头党文化中呈现出的微弱“出场”迹象——之间构成了某种联系纽带的事情,我们就需要至少谈及以下四种中介性的(inter-mediate)特征。首先,女孩的确比较公开、直接地参加过一个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的“相对温和的”工人阶级亚文化群体(尽管她们依然肯定是从属于男孩的)。这个亚文化群体就是摩登派亚文化群体(前文已经充分讨论过),在这个群体当中(a)显然不但有摩登男孩,也有摩登女孩;而且(b)男孩和女孩们在摩登派风格方面看起来彼此差不多,一定程度上都基于如下事实:(c)各种摩登派风格以及对风格和外表的摩登式专注,甚至使得摩登男孩在他们的摇滚派对手以及他们自身的眼里都显得很“女里女气”(feminine)。其次,从外表上看,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现的嬉皮士群体——一个中产阶级亚文化群体——当中,一些女孩和妇女发挥了一种积极的、可见的作用(尽管,我们依然认为,她们

仍然处于从属地位)。第三,出现了更多“男女通用的中性”(unisex)风格——这很可能与摩登风格和嬉皮士风格有关,这些风格通过时装业和商业形象广告逐渐得以普及,其挑战性被削弱;服装在此被设计成男孩和女孩同样可以穿的款式,随之带来了有性别区分特征的(sexually-distinct)时尚形象的模糊化。第四,在流行文化产业内部,出现了故意打扮得“女里女气”、说话忸怩作态的阵营或双性恋的、变性的歌手和明星。这些人在女孩的显现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之间的亚文化群体当中,从整体上的隐形到相对的“可见”——中构成了某些重要的中介位置。此外,这是一些非常困难而复杂的文化素材,需要得到正确的记述或者解释。在任何相对现实一点的解释中,强调以下两点似乎都很重要:既要注意到女孩们在相关亚文化发展趋势中的能见度有相对的移动性,又要注意到如下事实——无论一小群女孩变得如何的可见和活跃,以及基于性别基础上的形象变得如何的模糊不清,女孩们在亚文化群体中所处的相对从属地位依然如故。正如米克·贾格尔、加里·格利特(Garry Glitter, 1944—)或大卫·鲍伊的所有形象学研究所显示的,男明星有可能在同一个形象中同时显示出两重特征:一方面显示出“更浓郁的阴柔气质”,另一方面又显得“有强烈的大男子主义风格”。男性形象的女性化或许丝毫也不表明女性从女性形象的束缚中获得了补充性的解放。

这一事实——尽管既有文化中出现了这些表面上的移动,但对亚文化群体中女孩的地位所持的根本态度在这20年里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在《涂料房》(Daniel and McGuire, eds., 1972)一书所引述的光头党男孩对于性的态度当中得到了验证。在此书所用的各种对于女孩的粗鲁归类——比如在“吉莉·克朗,被认证的妓女”(Jilly Crown, the Certified Whore)一章引用的男孩们的话——当中,我们看不到任何新鲜的东西。我们并不知道,女孩们自己是如何回应这种贴标签的行为的——再一次富有象征意味的是,没有一位光头党女孩对《涂料房》产生过影响。

总之,对于女孩在战后的一些主要的亚文化群体当中是如何活跃和存在的证据,依据我们目前所知的情况,无论如何也很难做出一种

一劳永逸的解释。当然,我们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大多数女孩把她们的社交生活差不多都当成了一种替代性的选择,以取代其直接进入男孩文化(从属的或主流的)所要具备的“资格条件”、所要承担的各种风险。尽管女孩们知道男孩在性方面“比她们的处境要好”,但是她们与那些跻身于男孩之列的女孩并没有休戚与共的感觉,因为她们认为后者已经“自贬了身价”。就像下面这段引文所显示的:

你知道情况总是如此——这是不公平的,但是你不得不注意你打算与之为一伍的那个人。是的,俱乐部旁边有一个人,我不想说出她的姓名,但她是一个正派的人;她步行经过时说,“蒂娜(Tina),你没事吧?”但她是一个我不愿意与之为一伍的人,因为你希望为你自己获取名声。

(‘Tina’, teenage girl)^①

那么,这或许不是一个关于女孩在亚文化群体中是缺席还是存在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一个包含各种回应和活动的整体的替代性网络的问题——女孩通过这个网络处理她们与亚文化群体的关系,乃至自信地抛弃亚文化的选项。

女孩在哪里是可见的,她们的角色是什么?

这些是否反映了女性在文化中所处的普遍的从属地位?

这儿挑选了三种形象^②——女孩们在这里显然存在,而她们的存在方式却表明她们的文化从属地位是如何被延续和复制的。首先是摩托车女孩(Motorbike girl)的形象。一身皮衣的摩托车女孩,是一种亚文化代言人的形象,当其出现在报刊上的时候,是一种新的、带有进攻性情欲(aggressive sexuality)的危险物。在各类新闻媒介当中,这种形象

① 这段引文摘自我们目前在伯明翰青年中心对一些14岁少女所做的一系列访谈。——原注2

② 即摩托车女孩、摩登派女孩和泰迪女孩——译注

常常被用来预示那种新出现的性放纵状态。但要注意的是,新闻媒介完全用一种性的方式(固然是新的、现代的、大胆的方式)对这种形象进行了编码:亚光的(pan stick)^①唇色,画着黑眼线的眼睛,麻木冷傲的表情,上身穿一件微微拉开拉链的皮夹克。这种亚文化形象一方面非常接近于广告业和现代时装业推出的新性感形象,另一方面又非常类似色情行业里经典的恋物癖形象。在这种表面上新潮的性放纵状态之下,摩托车亚文化群体当中真正存在的性从属关系被遮蔽了。在一般的摩托车文化群体中,女孩依然被排除在该文化的核心位置之外:她依靠的是男孩骑手提供的一个后座的位置,这一位置能让她去分享那些特殊的亚文化快感——“飙摩托车”或周末去远方。很少有女孩能进入到亚文化的象征核心(symbolic core)——摩托车本身,能洞悉那种关于机械以及其局限性和性能的专业技术知识。一个女孩的群体成员资格取决于她是谁的女朋友——这种资格总是暂时性的,而且很容易被该群体开除,这一切取决于她与男孩们的关系状态。在那些更为严格的摩托车文化展现形态——例如,在“地狱天使”团体(Hell's Angels groups)——当中,团体的整个关注焦点带有极其强烈的男性气质:强悍男(hardmen)的大男子主义文化。只有极少数能与男玩友同等强悍的女性可以加入此类群体——而且总的来说,只有在她成为某个头儿的女人或所谓的“妈妈”(Mama)^②之时,才可以加入该团体。亨特·汤普森(Hunter Thompson)在《地狱天使》(1967)当中指出,那些天使们常常把大多数女性当作性对象来对待:她们不是坐飞车摩托车的“妈妈”,就是群交的对象。这种亚文化群体中的人际关系所呈现出的内容和形象,或许是新出现的,也是非常偏离常规的(deviant);但是“地狱天使”倾向于把女性世界划分为两类——有金子般心肠、照顾他们的女人与妓女——的方法,是一种与山丘一样悠久而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

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摩登派文化群体以及女孩在其中的高

① pan stick,字面意为“遮瑕无痕粉涂抹的”。——译注

② Mama,有资格坐飞车摩托车的女孩。——译注

能见度,或许更切合我们的观点。在学校和婚姻之间的这段短暂的时间间隔期当中,女孩们往往会全身心地投入某种工作;但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可能有更多年龄接近20岁的女孩在上班,而且社会上的确也开发出了某些新的职业,尤其是精品店、美容业和服装业以及秘书岗位所提供的那些“光鲜亮丽的”工作——这些工作尽管实际上最终也是日常工作并且没有多少发展前景,但却可以接触一些化妆打扮,可以到她们附近的“伦敦”(in town)去上班,至少可以到一些大城市去上班。在精品时装行业当中,魅力和地位通常补偿了低微的薪水。不断变化的经济和职业结构,或许已经帮助从事这些工作的女孩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摩登派文化的消费主义当中。但是这种更大规模的参与,也从文化方面被构建起来。个人“扮酷”的时髦风气,更容易在家庭、学校或工作中通过女孩们而得以维持,与更具挑衅性和粗暴性的亚文化风格相比,这种风气不会激起父母和成人的直接反应。父母和老师们知道“现今”女孩们化了妆的白脸和修剪过的头发看起来“很怪异”,但是,正如戴夫·莱恩对于摩登派的评论所言,“他们的变动方式当中所包含的有些内容是成人们无法理解的”(Laing, 1969)。文化的这种相对的流动性和含混性,意味着一个女孩可以“四处闲逛”,并不见得非要直接与某个摩登男孩结对成双;她可能以摩登派情侣的方式,以同其他摩登派女孩结群的方式,甚至以单独一个人的方式,“成为一名摩登派”。女孩能否加入这个群体与她们穿戴什么样的服饰,呈现什么样的外表和风格化的神态有很大的关系——和她们的男性摩登同伴一样,摩登派女孩表现出对衣服细节的高度挑剔和对外表的过分关注。由于摩登派男孩和女孩在这些亚文化群体中看起来更为相像,摩登派女孩可能就变得更显眼了——或许正是因为摩登风格的这种扩散,使得时装业趋向采取男女皆宜的中性策略。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或许还有一个:总的说来,摩登派亚文化群体与泰迪男孩或摩托车文化群体相比,普遍显得更“女人气”一些——这种形象于是通过摩登派的整洁优雅(smartness)及其对于风格、消费、容貌和自己整体的时尚感(stylishness)的高度投入而被强化了。在现阶段很难说清:在其他亚文化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粗暴的大男子主义态度,为什

么在摩登派群体中似乎并不那么盛行——但这肯定是较为普遍的总体印象。摩登派文化的位置在亚文化光谱中更趋向于女性气质的一端,可以坦白地反映他们对于自身周围其他那些“更强悍”、更有男子汉气概的亚文化群体的反对态度(这是摩登派与摇滚派之间发生的许多争斗的根源)。它也可能反映了该亚文化群体整体上追求上进的品格和取向。这可能与那些参与该团体的女孩具有比较强的自信心有一定关系——这种自信心必然受到过大约在这一时期发生的一些事件的影响:布鲁克诊所(the Brooke clinics)的出现(1964),^①以及16岁以上的未婚女孩可以更加方便地获取到口服避孕药。当然,我们无法确切地说清是哪个群体最初开始利用这些便利设施和条件的,但它们的便利性肯定增强了一种对于性的信心,至少增强了那些使用它们的人的自信心;而且,正如我们曾经指出的,对于那些出现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亚文化群体内部或外围的女孩来说,性方面的自信被认为影响到对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信心。

在注意到女孩在各类摩登派亚文化群体中变得更加显著和相对自主这一总趋势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基本物质和社会结构的持续控制,预先决定着女孩的生活并限制和限定了这种相对的可见性/自主性/空间。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摩登派亚文化群体或许能够让某些参与者去实现自己与那些约束条件之间的某些“想象性的关系”,而不是去超越它们。摩登派女孩的“相对自主性”反映了她们短期的富裕,但是提供多余现金的工作只能负担得起短期的满足感,超过20岁以后,她们几乎没有什么职业前景,没有拿加班工资的机会,也没有工资等级的大幅增加。年龄稍长一些,如果没有受到较好的教育,她仍然可能会被迫接受纽森(Newsom)的那种看法——意在“让女孩们参与”成

① 布鲁克诊所(the Brooke clinics)是英国境内最大的一家专门为青年人(25岁以下)提供性健康服务、支持和建议的慈善机构,1964年由英国医生海伦·布鲁克(Helen Brook, 1918-1997)女士创办于伦敦。该诊所首开为未婚女孩提供避孕和性健康服务的先例,近50年来接受咨询和避孕服务的青年有140万之众,目前每年还与28万的青年人保持服务联络。——译注

为“早期退学者”课程体系的一部分；学习家政方面的或者富有女人味的科目，学习儿童看护，在人际关系、商业和文书操作等方面接受培训……(see Newsom, 1948; 1963)。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参与摩登派亚文化群体会大幅松动母亲与女儿之间的联系纽带，或者会显著地削弱女孩的自我观念和建立婚姻和家庭的倾向。

“嬉皮士”(Hippy, 也称Hippie)这个词当然是一个总括性的术语，它涵盖了各种不同的群体和倾向。与此处所论问题最直接相关的一点，就是大多数女孩会经由中产阶级大学生文化进入或者被卷入到这种无组织的文化的一个或其他分支当中去。对中产阶级女孩来说，可以获得一个较为明显的松散但合法的空间，这一空间处在实际存在的嬉皮士亚文化范围与主流的中产阶级文化（中学高年级或大学生文化）之间的某些地方。因此，对于中产阶级出身的中小学女生或大学一年级学生来说，公寓——无论是住在里面还是逗留其间——象征着她们在协商性的领地取得的收获——父母的影响无法渗透到这里来，学生生活的相对松散性也不能被禁止。中产阶级女学生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更为灵活的作息时间表，有3-4年的时间被明确不许谈婚姻之事，最终，她们有了一种更宽松的环境，一份不是那么严格地被划分成工作和休闲的更为完整的经验，这为个人风格的发展留下了余地。

另一方面，鉴于这种灵活性，似乎可以公正地说，在这种边缘文化(peripheral culture)和嬉皮士亚文化主体的内部，女性的传统角色其实并没有出现多大的改变。一提起嬉皮士文化，我们最容易联想到的那些刻板的形象，常常是“大地母亲”的形象、给婴儿哺乳的母亲形象或拉斐尔前派^①画作中的虚弱女士形象。当然，我们必须再次意识到不加鉴别地接受这些形象所带来的各种危险，“她们”出现在新闻报道当

① 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 又译为“前拉斐尔派”, 是1848年在英国兴起的美术改革运动。最初是由3名年轻的英国画家所发起, 他们的目的是改变当时的艺术潮流, 反对那些在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的时代之后在他们看来偏向于机械论的风格主义(Mannerist)画家。主张回归到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画出大量细节并运用强烈色彩的画风。——译注

中,并成了道德恐慌的一部分,尽管很可能这种恐慌本身体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窘境——与母性身份相关的性解放可能要比好斗的女权主义(aggressive feminism)更让人能够接受。当然,如同在更传统的音乐领域一样,“嬉皮士”妇女几乎总是以歌手形象来设法显现自身,而且这很可能应归因于女性声音的独特性。有鉴于此,普遍可利用、可接受的形象类型似乎非常有限;极少数在这一领域取得成功的女性,通常要么符合琼尼·米歇尔(Joni Mitchell)那种温和的/抒情的/内省的形象,要么符合那种与詹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或玛吉·贝尔(Maggie Bell)相关的好斗的/男性化的/浑身浸透着威士忌酒气的(whisky-sodden)形象。

然而,这种展现形象的方式会误导我们,让我们无法确认地下社会给另类职业/生活方式提供的空间——而女性在这个空间中已经非常惹人注意了。《排骨》(*Spare Rib*)作为一份“另类”出版物,能够被牢牢地置于这种语境之中,创立“解放”(Release)机构的卡罗琳·库恩(Caroline Coon)^①则是在各种信息/援助/联系中心工作的众多女性中的一位,而这些中心是作为反主流文化的构成元素涌现出来的。

女孩有没有组织她们文化生活的另类方式?

以上的一些推测可以引导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大多数女孩找到了可以替代加入男孩亚文化群体的各种策略。那么,重要的问题可能并不是女孩在男性亚文化之中的缺席或存在,而是女孩们的这些补充性的方法,女孩将其运用到她们之中或在彼此之间产生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一种属于她们自己的独特文化。在女孩当中出现的一种最显著的另类“文化”形式,就是少女流行音乐迷(Teeny Bopper)文化。虽然这种

① 卡罗琳·库恩(Caroline Coon, 1945—)英国女权主义画家、记者和政治活动家。1967年与人共同创建一家名为“解放”(Release)的机构,专门为被那些指控迷恋毒品的青年人提供法律建议和法律代表等“福利服务”。她设计了“解放胸卡”(RELEASE BUST CARD)——世界上第一张“了解你的权利”的胸卡,并为“解放”机构设计了“和平鸽”形状的徽标,后者一直从1967年用至2008年。——译注

文化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新现象(这种女孩 / 流行偶像的关系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存在),但它是一种经过高度加工的、便于获得的青年文化形式——它几乎完全是一种被包装好的文化日用品。在流行音乐的整个发展轨迹当中,这样的论据随处可见;但20世纪70年代的少女流行音乐迷综合征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明确针对更为年轻的市场,即10-15岁的女孩,她们太小甚至还没有听过“披头士乐队”的歌,连她们的哥哥姐姐曾经非常热衷收听的新重摇滚(比如E.L.P.、Yes、Led Zeppelin或Deep Purple等乐队)也激不起她们的热情。这种带有快速周转潜能(这一星期流行Mark Bolan,下星期又流行David Cassidy了)的市场吸引力,也为境况不佳的美国电影和广告公司——尤其是银幕宝石(Screengems)和米高梅(M.G.M.)这两家公司——提供了提高利润的机遇。

甚至在涉及一个如此产业化的流行文化网络时,我们也可以探明那些在女孩中间运转的、各种各样的协商过程。

(a)对于10-15岁的女孩来说,少女流行音乐迷文化能够很容易地获得——在家里,她们只需要一个卧室、一台电唱机以及父母对于自己邀请朋友的许可就可以了;但是在这种权限中,这种文化可能给女孩们提供一次参与到准性欲仪式(quasi-sexual ritual)中来的机会(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女孩们没有机会去接触那种在男孩中间常见的淫荡的习惯)。这种文化还为私人 and 公共空间层面的展现——贴有招贴画的卧室或摇滚音乐会——提供了机会。

(b)少女流行音乐迷文化十分灵活,它允许任何人来参加;它没有实行任何的排除规则或准入限制,因此非常不同于女孩所处的校园环境,在校园环境中参加某些活动需要相当程度的资格、能力和金钱。

(c)在这里没有陷入个人蒙羞或受辱的风险,也不会被爽约或被灌醉。与我们谈过话的一些少女流行音乐迷,显示出对如下事实——即男孩们为了达成“某一个目标”全力以赴,而女孩们在这场游戏中自始至终处于迷失目标的状态——的非凡警觉。因此,加入少女流行音乐迷文化,可以被视为是一种防御性的撤退——免得被人从性的方面贴上标签,同时也可视为是各种小型女性群体内部的一种高度自足感

的显现——“我们可以与女孩畅快地大笑”。

(d)对于某些明星(比如唐尼·奥斯蒙德[Donny Osmond]等人)的迷恋,可以被视为是对学校里面那些控制女孩生活的精选的权威结构的有意义的对抗。也就是说,“这些迷恋”可以成为一种疏远教师的手段,而且,如果女孩们都共享这些迷恋,它们可以提供一种自卫式的团结,对于那些意识到自己在学业上是个失败者的女孩来说,尤其如此。

在少女流行音乐迷文化当中,肯定会有一些因素有助于女孩们去协商、经营一块属于她们自己的空间,但是我们也必须说,女孩们与其头脑中想象的偶像人物之间的关系(据目前的判断,是互为酬答的关系)充满了幻想的(情感转移)因素,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少女流行音乐迷市场上的那些明显具有商业性和性操纵色彩的(sexually-manipulative)偶像人物有去性化(de-sexualising)的作用。在这里,幻想和崇拜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始终存在于男孩和女孩对商业流行文化所呈现的形象的强烈沉迷之中——被提到一种特别高的、强有力的程度。毋庸置疑,这些体现抵抗特征的幻想关系,依靠的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充满敬慕心的女性对于男性的顶礼膜拜。这种文化也倾向于期待未来的“真实”关系,迄今为止这些关系在杂志文章和故事中被明确地表达出来,指导女孩们满怀希望地走向浪漫爱情并最终达成理想化的婚姻图景。因此,贯穿于少女流行音乐迷光谱全程的辩证关系,似乎是更紧密了。那个可以供10-15岁少女用于创建一个个人和自主区域的小型的结构化的和高度人造化的空间,似乎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即这些策略同样也象征了一种在未来与目前同样普遍存在的主从关系——才能被提供出来。

结 论

我们在这一章中对女孩亚文化的关注,已经成了一种倾向于抛弃“亚文化”聚群现象的关注。个中原因,就在于我们认为亚文化群体可能并不是对那些对应的仪式、反应和协商进行探究的最合适的地方。我们认为,当我们把性的维度纳入到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研究之中时,

女孩可以被视为正在协商一个不同的空间,正在提供一种不同形式的抵抗,抵抗那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她们的性从属地位(*sexual subordination*)的东西。所以,尽管事实上女性青年文化可能不是在活动内容上而是在形式上符合非亚文化的(*non-subcultural*)男性组群——即形式上由5-10名“一起闲逛的”男孩构成,我们也会倾向于同意朱尔斯·亨利(Jules Henry)的观点。他对美国青少年的体验做出了如下的描述:

当她们长到青春期的时候,女孩们并不需要团体,事实上对于她们所做的许多事情来说,超过2个人就会成为一种障碍。男孩们结群而行;女孩们很少有4人以上的聚集,而对于男孩来说,4人结成的小团体简直毫无作用。男孩依靠的是在一个相对大的群体内部结成的男性的团结。在男孩团体中,重点在于男性化的统一;而在女孩的小圈子里,目标在于将其他的女孩排除在外。

(1963)

我们要补充的是,从我们初步的调查来看,女孩文化具有非常强的绝缘性,以至于其在运作时不但能有效地排除其他那些“不良的”女孩,而且能够排除男孩、成人、老师和研究者们。^①

(宓瑞新译)

① 与我们在伯明翰青年中心谈过话的女孩,时常会在她们自己中间开玩笑,唯一的目的是要迷惑或误导有可能会侵犯到她们地盘的研究者——后者常向她们提各种涉及个人的问题,或者迷惑或误导那些出现在每周迪斯科舞厅、令她们厌恶的人。例如,一个由3个14岁少女结成的小群体向我们解释说,她们的第4位“入伙”成员有男性生殖器。这个“玩笑”以极其严肃的方式持续了10分钟之久,以至于我们基本上都相信了,直到其中的一个女孩说“迪基”(Dickie)来自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为止。这几个女孩狂笑不止,访谈在此只能停止。——原注3

16 关于边缘性的一则注释

雷切尔·鲍威尔 约翰·克拉克

上篇文章所论述的全部内容都清楚地表明,对于女孩们参与(或不参与)亚文化群体的诸种形式的分析,向我们提出了一些至今还没有完全回答的理论问题。在这篇注释文章中,我们将集中讨论一个概念,这一概念甚至被那些主张对年轻女孩的状况进行对等化解释(symmetrical account)的人所采用。我们暂且将这个概念称之为边缘性(marginality),它一直以一种含蓄和模糊的方式被使用着。边缘性这个概念既适用于一些准分析(quasi-analytical)方式的理论结构(theoretical constructions),也适用于那些对“现实”的感知和理解。在前一种模式中,似乎社会整体以及置身于其中的亚文化活动都可以按照男人的所作所为来解释,然后女孩们的活动就可以通过一种更深层的、更精细的范畴细分来解释。在后一种(倾向于感知的)模式中,女人们参与的真实活动被认为发生在与男人们相同的文化结构关系当中,但实际上在每一个场合当中,相较于那些构成了一种特定阶级状况的主要矛盾、冲突和协商活动,女人们的参与总被认为是相对次要的。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模型(如果它确实内容充足到能够被称之为一种模型的话)是不充分的。

下列图(图16.1)显示了一连串的同心圆:某个圆所处的位置越远,居于其中的人相较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的中心地带——中产阶级成年男性世界——的边缘化程度就越严重。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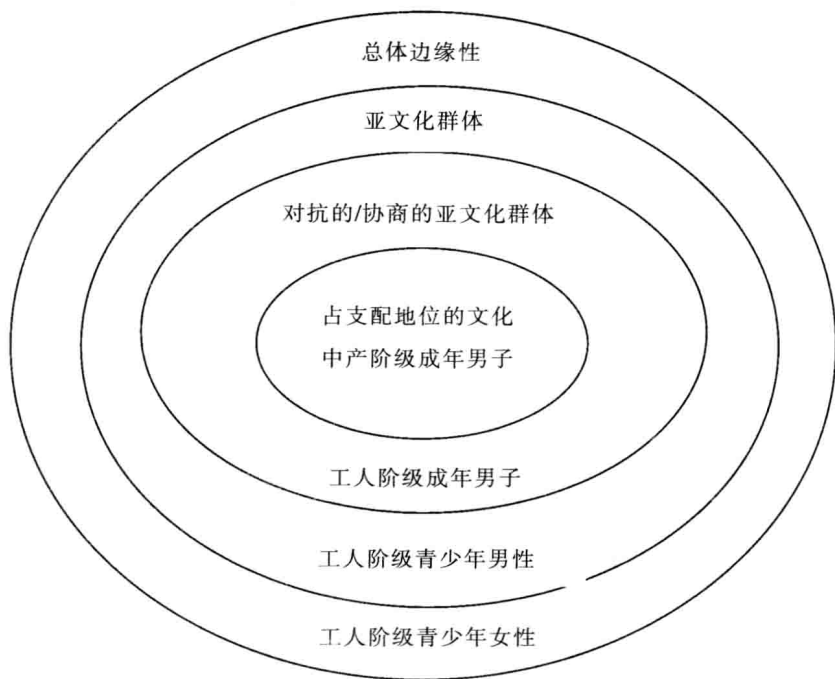


图 16.1

图16.1对于内容的展示和选择依据的是一种理论关注——关注那些有可能离经叛道的(deviant)女孩的活动。它似乎试图从对光头党的研究中精心建构出一个涵盖整个社会的模型。但是如果我们问一下：**其他**的女人会在哪儿？这种模型的缺陷就会变得更加明显了。例如，是不是中产阶级的成年女性就比无产阶级的成年男性更接近中心，就比他们的边缘化程度更轻一些？这类问题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然而它的确削弱了这一模型的有效性。这个模型确实有一定的描述力，这源自对家庭的**中心性**(*centrality*)和**私有性**(*private nature*)的假设，家庭在其中被设想为**最适合女性**的领域。

这些假设并没有考虑把“其他女人”应该放置何处的问题——我们知道她们在哪儿，她们不在**那里**，她们被妥帖地安置在私人化的、在社交领域看不见的家庭生活当中。她们站在权力、竞争和冲突的领域之外，因此只有那些处在家庭之外的女孩们(以及新近出现的那些“狂

与工作场所之间的薄弱点上。对于女孩的对等分析,引导我们去关注上述转变的本质(去关注她们是否与男孩们一样,在制度关系中处于同样的边缘位置),并去关注那些可以让她们经历上述转变过程的可用形式(availableforms)。以此为起点,我们希望用图16.3来极其简明地表示这两种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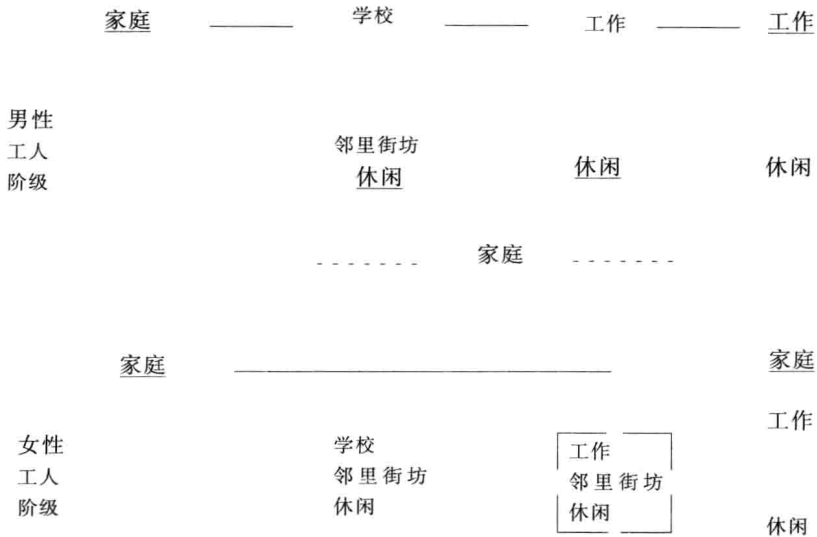


图16.3

图16.3注释:

1. 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对女孩们施加的控制,要比施加给男孩们的控制更严格、更持久,这种控制既根据她们对于家庭内部经济的职能,也根据她们向一个阶段转变所需要的实践培训来进行。

2. 其他制度领域强化了(学校——工作机会和女性“职业”训练等的减少;休闲——可消费的女性气质,浪漫故事,等等)对作为“妻子/母亲”角色的女孩的再生产。

3. 工作成为获得相对自由(经济方面,等等)的一种潜在资源,但这点自由被以下两种因素给抵消了:(a)主流观念认为,在

立足于主导职业的家庭中,工作是一种干扰;和(b)工作女孩的家居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不得受制于女性的薪金水平。

那么,我们的观点是,妇女并不是处在社会结构中那些被隔绝的和看不见的部位,而是与男人共同参与到了完全相同的制度结构当中,只不过是不同的关系方式参与的。正是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家庭和工作所进行的这种划分,建构了妇女在工作中的这种不可见性,而不是她们真的离开了工作领域。她们仅仅被等同于“私有化的”家庭世界,这首先掩盖了将工作从家庭当中排除出去的历史过程(不是自然过程——长久以来都是很不公正的),其次也掩盖了工作妇女是一直存在的这一真相。(它也掩盖了男人在家庭事务中也是存在的这一事实。)男人和女人并不处在两个在经验上被分离的世界里,而是在不同的关系中、沿着不同的轨道穿越这些相同的机构。我们将在图16.4中粗略地表示这一连锁式的(interlocking)结构:

图16.4注释:

1. 正如该图表所试图说明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青年人还是成年人,“社会空间”的建构严重受到阶级因素的影响。

2. 除了这种基本的划分,在年龄、性别以及一定程度上在阶级之间形成的各种社会壁垒,表明渗透性的变化程度都取决于这些因素在这个结构内部的实际定位情况。相对渗透率(relative permeability)依据基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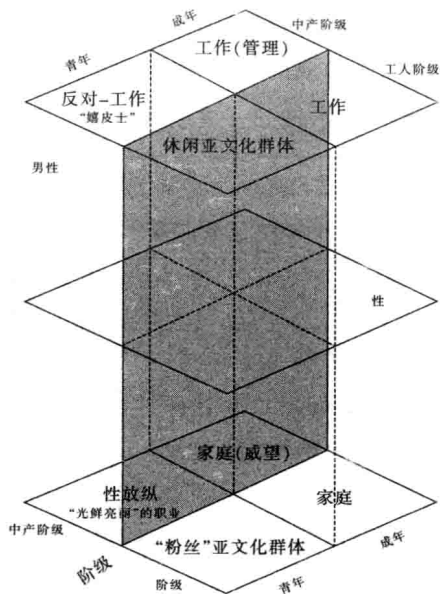


图 16.4

经济形式和意识形态形式来界定,但主要是被当作一种履历境况 (biographi calcircumstance)来体验的(参见本书前面收录的克里彻 [Cricher]所写的那篇文章)。

3. 两性可能参与的活动的范围,都是围绕一些对立因素建构起来的。但是对男人来说,这里的主导性对立是工作 / 反对工作、管理工作 / 体力劳动和工作 / 休闲,女人们对于这些相同的对立因素的感受,却被那种对于家庭 / 非家庭对立关系的强调严重遮盖了。

4. 因此,对女孩而言,亚文化活动的实际“空间”并不是边缘性的,与男孩可利用的活动空间相较,这种空间更具严密建构的特征。它受限于一种双重建构的从属关系,而且亚文化拼贴可利用的元素(参见前面讨论“风格”的论文)承载着一种含有事先确立之意的、更为沉重的负担。

最后,我们想对女孩们在走向“成熟”阶段的转型期可能寄身于其中的各种形式做出一种尝试性的概括,同时也对她们在女性角色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作一些评论。对于工人阶级女孩来说,由这些存在形式所构成的一个粗略的清单——并不详尽,而且不包括那些个别的、随机的事件——可以展开为如下的情形:

“照顾弟妹 的小妈妈”	“卧室 文化”	“稳固的情 侣关系”	迪斯科 “群体”	“职场 女孩”	“妓女”(Slags) “乱交者”(Scrubbers)
----------------	------------	---------------	-------------	------------	---------------------------------

这些形式(或许还包括“职场女孩”的形式,她们的人生轨迹可被视为是在家庭 / 非家庭的对立关系中达成的一种和解,但我们在这里先不讨论她们的休闲活动)都围绕着对于女性气质 (*femininity*) 的那些特殊的界定而展开——它们要么包含实际的 (“稳固的情侣关系”) 要么包含潜在的 / 想象的跨性别 (*cross-sexual*) 关系,甚至从经验上看并没有男性出现的地方,它们也能通过各种方式来复制出这样或那样的女性性征和女性从属关系。它们也许打破了以家庭为本位的、主流的女性行为观念(例如,“乱交的女人”),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依然在

强化另一种涉及男性的性关系观念,它们复制了主从关系。它们涉及对于构成它们自身认同的主要元素的认可或协商。这些协商又涉及对于那些关于女性性征的定义所存在的诸多矛盾的考察。这些形式越是得到更广泛的宣传和赞许,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越会呈现得更清楚——新潮少女与年少轻狂(juniority)观念产生的性观念冲突(在什么时候涉足性行为合适?);狂热仰慕者与距离观念产生的性观念冲突(性在哪里发生,在头脑中还是在身体上?);少女追星歌迷与家庭观念产生的性观念冲突(性的目的何为?)。

但是女孩们也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怂恿,将自己的性别身份(sexual identity)视为进入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一条途径——不论这条途径被界定为(就像一般对于男孩那样)一段跨越各种阶级界限的过渡通道,还是被界定为一段提前进入成熟状态、成为她“自身”所在家庭母亲身份(Mother)的人生历程。通过图16.4可以看出,对于中产阶级青年而言,年龄界限可以被认为有相对强的可渗透性,而对于工人阶级女孩来说,可能会出现其他形式的渗透性——虽是半幻想式的(semi-fantatised),当然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有真正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相较于工人阶级男孩的经历,女孩们的娱乐休闲活动本身或许可以提供一种“职业生涯”的元素。某些转变形式,跨越了那些连锁的界线,显然将这种元素降低到了最小的限度——转而进入到男性工人阶级青年占据的地带,就像一些强悍的光头党女孩(tough Skinhead girls)和一些强悍的摩登派女孩(Hard Mod girls)一样。然而,其他的一些人,就像工人阶级嬉皮士女孩(Hippy girls)和十分成功地注册起公司的摩登派“明星们”(Incorporated Mod ‘stars’)一样,在转入中产阶级青年的领地以后,就可能带来一个相当广阔的“职业”前景。坦诚地、“持续地”加入这些转变——跨越年龄界线进入早婚和母亲身份,进入工人阶级成人的领地,就会带来最受人认可的“职业生涯”。

当然,这些注释还只是概要性的,我们现在需要开展精细的民族志学研究,以此来验证我们的模型是否成立。

(郑寰译)

17 青年文化的政治

保罗·科里根 西蒙·弗里斯

由于我们关注的是青年文化的政治含义,我们必须首先强调我们的评论是尝试性的,在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否定性的——它们最初源于对现存的种种说明英国青年的假设和结论的批评。我们的分析遵循了菲尔·科恩(Phil Cohen,1972)将青年亚文化置于阶级背景当中的思想路线——我们的关注点是工人阶级青年的政治,^①但我们的策略与他的有很大差异:我们想指出的是,分析青年的专家所犯的错误与分析英国工人阶级的专家们通常所犯的错误尤其有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对工人阶级青年文化的政治含义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整个工人阶级文化的理解之上。

目前有关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文献——无论是学术的社会学文献还是行动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均受缚于一个共同的思路,即意识形态收编(ideological incorporation)的概念。无论右派理论家和左派理论家在语言上有多大的差异,他们的逻辑是非常相似的:问题——英

① 对于青年文化的政治分析,已经被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资产阶级青年“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发展严重地搞混了。把学生和嬉皮士作为分析对象的那类分析,并不适合分析工人阶级青少年(即使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别也不像一些作家——如格雷厄姆·默多克——所说得那么绝对),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不讨论这类分析,如布莱克本和科伯恩(Blackburn & Cockburn,ed.,1969)和内维尔的著作(Neville,1971)。对于各类青年团体之间关系的分析,还依然有待于人们去做。——原注1

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是不革命的 / 平静的 / 顺从的 ; 原因——工人阶级文化植根于不革命的 / 平静的 / 顺从的价值 ; 解释——工人阶级已经在意识形态上被收编了 , 他们的价值观反映出他们完全接受了资产阶级文化。在各类社会学家 (Marshall, 1963, Runciman, 1966, Goldthorpe et al., 1969) 和马克思主义者 (尤其那些 1971 年后遵从葛兰西路线为《新左派评论》写文章的人) 那里可以看到这类论断。甚至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批评这种方法的人 (Frank Parkin, 1971 与 John Westergaard e.g., 1974, 另一方面还有 Edward Thompson, e.g. 1965) 也无法明确揭示这种方法存在的过度简单化的致命缺陷。我们特别要指出两点 : 第一 , 这种观点将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 , 但没有将意识形态放在结构的、制度性的背景当中去考察 ; 第二 , 这种观点将工人阶级当作他们文化的被动接受者 , 无法描绘出可以从物质体验 (material experience) 创造文化的积极的进程。总之 , 工人阶级的政治可以参照一种学术的、观念的 , 而且没有冲突的过程来解释。

对于工人阶级青年文化的分析完全 (或者说 , 太过明显地) 建立在同样过度简单化的思路。青年文化社会学曾经主要是越轨理论家们 (deviance theorists) 的特权 , 而且 , 它从表面上关注那些看起来违反资产阶级价值观的青年人。尽管显得有点自相矛盾 (paradoxical) , 青年文化社会学对于越轨行为的解释依据的是强调越轨群体赞同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论断 (对于单个的越轨者来说) , 越轨行为是这些价值观与真正实现这些价值观的现实可能性之间的冲突 ; 从艾伯特·科恩 (Cohen, 1955) , 经过克罗沃德和奥林 (Cloward & Ohlin, 1960) 再到大卫·唐斯 (David Downes, 1966) 等人使用的以亚文化方式研究青少年犯罪的方法 , 是一种有点误入歧途的意识形态收编理论。甚至斯坦利·科恩 (Stan Cohen, 1973) 将强调点转向 (越轨行为被旁观者创造的过程) , 也留下了一个未被触及的基本观点——只能参照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才可以理解越轨青年。对于社会学家来说 , 青年文化只具有消极的政治含义 : 有过失的青少年是被收编的有问题的孩子 , 而正常的孩子 , 理所

当然是被收编的没有问题的孩子。^①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同这一结论几乎没有分歧,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把工人阶级少年的日常体验解释为对这些人的完全(完全成功的)操纵,即把一个有潜力的无产阶级变成一个资本主义消费者的模范。此处对青年和对工人阶级文化有一个相同的假设,即把二者都看作是一个整体:这里没有对青年人对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制度(*institutional*)背景做出解释;也没有对青少年如何从他们的经验中创造他们自身的文化做出说明。

我们从现存的有关青年文化的文献中得出的结论是:根本无法谈论青年文化的政治含义,因为政治从未被准许进入这种讨论。如果将各种制度排除在这种分析之外,如果不关注青年人在他们文化当中的主动角色,那么也根本无法谈论青年人可能(或不可能)参与的各种具体的斗争;青年文化是非政治的,因为它一直就是被这样界定的。从我们自己对于青年文化的研究中,^②出现了对那些确实不是资产阶级的行为和观念(甚至也不是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反应结构[*reaction formation*]”)的描述;但问题是如何从政治上评估这种现实,如何发展出一种可以将政治置于分析核心的研究青年文化的方法。

我们又一次从一个更宽泛的问题——即如何分析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文化——中提出了我们的思想线索。如果我们历史地看这种文化,我们显然看到的是一个反抗各种资产阶级制度(市场、工厂、教育、政治制度、法律等)并从中求得生存的阶级斗争的历史。不参照这些制度,我们就无法理解工人阶级文化;如果不参照其中所牵涉的种种斗争——工人阶级在理念层面上一直没有(也不可能,即使在物质基础上)被温顺地、完全地收编——我们同样无法理解工人阶级文

① 关于规矩守纪的(non-delinquent)工人阶级孩子的社会学文献非常缺乏,而且这些文献往往只关注他们生活的一些特定的方面(比如,在学校还是从学校过渡到工作,还是在玩乐)。我们能够想到的唯一在普遍分析上做出过努力的著作是威尔莫特的著作(Willmott,1969);这本书很重要,它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日常的”工人阶级青年文化不是资产阶级文化。——原注2

② 参见科里根(Corrigan)或弗里斯(Frith)即将出版的著作。——原注3

化。依照葛兰西的思路,我们认为要理解工人阶级文化的历史,必须参照国家政体的历史,参照再创造和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各种制度的历史,正是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试图从意识形态上或制度上收编工人阶级。国家既有物质的又有意识形态的力量,收编既意味着制度的摧毁又意味着制度的创造,它牵涉到除去观念之外的各种斗争。工人阶级文化的政治只能参照工人阶级参与过的全部斗争来理解。我们通过对教育历史的参照就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

教育:处在资产阶级体制中的工人阶级

“将操场圈起来的栅栏的本性和高度是什么?”

(对1840-1841年度皇家督学提交报告的质疑)

粗略看一下教育事务委员会(及随后的教育部)1840-1870年的会议备忘录,就会发现政府是如何通过设立一套结构复杂的国家机器来管制工人阶级的教育的。通过巡视员制度、培训和认证教师制度、学校赠金扣交制度等制度,一种对于教育的特殊的定义占据了优势。在许多研究中都有对这一过程的概述,所有的材料都显示出资产阶级在确立自己对于教育体系的支配权方面所获得的成功(参看,Johnson, 1970;Hurt, 1972;Frith, 即出)。这一过程可以(而且一直)被孤立地看作是国家教育的发展(*growth*);但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一种来自上面的强加的教育,而同样有着针对各种教育方式的斗争;尤其是反对由工人阶级自身组织的那些教育组织的斗争。

国家教育所干的事,不单单是为了给一个在智力上或道德上比较贫乏的阶级提供基本的教育;它更是为了给一个有其他可选择的學習方式(尽管不系统)的阶级提供一种特定的教育形式。

(Frith, 1977)

国家教育的发展不单单是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干预的增多;同时还是一个涉及摧毁各种组织的复杂过程。可选择的教育方式被认为同发

展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教育方式是对立的。例如：

锡安山教会学校 (Zion school) 的教育与利兹国民学校 (Leeds National School) 同时开展的国家教育有重大的差别。它没有明确的年龄要求——孩子们和成年人同上周日和晚上的课,图书馆和读书室在一起。它不要求全日制到校——它是一种为全日制工作的人所设计的教育。这里没有必修课程,但有各种教育活动和内容(如“读写算”教学[three R's teaching]、相互提高法、宗教训导、报纸阅读等)。总之,锡安山学校提供的教育不仅仅和教师有关——强调相互提高,强调从老学生向年轻教师的自然进步,模糊了这些区分……

(Frith, 1977)

这样一种在社群之上建立起来的课程和组织(实际上,是教育的体验),是国家学校督学经常会碰到的:

一般说来,矿工往往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由他们自己阶级的男人所管理的老式走读学校去……少数教师看起来还能胜任教学,他们都自称以他们自己的方法教学生们阅读、写作和计算;但大多数教师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低。他们用的书是家长们选送来的那些书。因此没有任何正规的讲授课程。学生读的是《圣经》或《圣约书》,几乎不进行解释。每个孩子受到的教育就是“教义问答手册”带给他们的东西。

(Tremenheere, 1844)

人们可以在这位督学的描述中感受到恐惧:这种教育是无政府——他们想读的是这些书!没有合适的教师!没有组织!没有道德建构!

在所有的相关知识——对他周围的世界、对社会运转的了解,以及对许多肯定每天会强迫他们关注工人意图的社会、经济

问题的了解——当中,成长中的青年的心智留给他自己来寻找方向,因此容易把事实和原则拿来作为机会可以控制的东西。他们通常会引起错误,并坚持这种错误,因为他们希望知识能够让他们看到他们在什么地方错了。

(Tremenheere,1844)

尽管有这些批评,这些机构无疑提供了一种“教育”,就像国家和政府拨款的学校提供“教育”一样。关键的一点在于两种制度形式是对立的,而且其中一种形式背后有政府权力作后盾,而另一种形式则只有那些特殊的、在地的社群的压力。19世纪中叶以来,政府的权力被用于创建各种提供资产阶级教育定义的机构,被用来诽谤和破坏另一种选择;这是工人阶级的心灵和精神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俘获”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工人阶级被“收编了”。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读到这个故事时会发出如下感叹:资产阶级的统治被确立起来,工人阶级没有能力去抵抗或重建他们自身的机构;如果工人缺乏他们自己的机构,必然会成为资产阶级教育观的分享者——他们会去上资产阶级的学校,学习资产阶级的事实和理论,接受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但在这种观点中有一种无根据的假设——教育史描述的东西就是从体制上收编的过程。显然,这一过程涉及意识形态斗争,但这种斗争的解决取决于各种机构;一种教育体验被另一种所代替。工人阶级肯定被卷入到资产阶级的教育当中——19世纪局部化的自我教育(self-education)可以被看作英国工人阶级反抗自身被收编的最后一次徒劳的表示(gesture)^①;工人阶级文化现在肯定必须考虑

① 这种语义相当模糊的判断,是汤普森和安德森(Thompson / Anderson)争论中出现的一种观点所提到的。汤普森在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所做的说明中使用的许多证据,实际上证明的是工人争取不让自己成为无产阶级(比如,被驯服的、受制于市场的[market-bound]的劳动力)的权力斗争。这种(英勇的)斗争必然会注入英国无产阶级随后发展起来的文化当中,但重要的一点是要强调这个工人阶级并不创造自身,而是在资本主义的要求与工人对这些要求的回应这二者之间的斗争中被“制造”(用汤普森发明的重要词)

这种受资产阶级决定的经验；但是“考虑”一种体制并不意味着必然要接受它。换一种方式表达这一观点：体制收编（这是英国工人阶级在最近150多年来的经验）并不必然是意识形态收编，我们之所以对工人阶级文化分析者（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有异议，就是因为他们混淆了这一差别。他们把制度（机构）的历史看作文化史的直接证据；他们掩盖了这种关系的真正复杂性；他们的政治结论因此是可疑的。

在这一方面来看，一种“精确分析”所面临的诸多困难，非常明显地呈现在教育经验成了青年文化的构成要素这一点上。我们如何从政治上理解工人阶级学校的孩子？他们上的是资产阶级的学校；他们关于什么是教育、教育是为了什么以及如何组织教育等方面的理念，是在他们学校体现出的理念；没有可供选择的、工人阶级的“教育”机构；没有将抵抗教育作为教育的观念。然而，有证据表明：工人阶级的孩子们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抵制过学校制度中的某些方面——否则怎么解释那些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所有的教师都可以证实）：学校是一个战场，学生使用的反抗武器从对纪律的冷漠到直接缺席，可谓五花八门。在这个战场上，学校通常都是失败者（确切地说在意识形态方面）。对正规的、镇压的权力的每一次应用，都强化了工人阶级把教育当作一种强迫接受的体验（而不是一种可以扩展我的视野并让我成为一个高素质的人的体验）；每一次（定期的）失败体验都让他们确认了这样一个现实：“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毫无意义。”（Corrigan，即出）

这种状况（为许多分析者所忽视）的讽刺意味在于，孩子们对于资产阶级教育的意识形态抵抗（即他们对于一系列规范和价值观的反

出来的。在汤普森与《新左派评论》的争论中，几位主角经常站在只能代表辩证法一方的立场上（汤普森强调工人的自我创造，安德森和奈恩[Nairn]强调工人对资产阶级的依赖性）。教育史学家如果单单从过度强调资产阶级在教育中的角色转向过度强调工人自助自立，也会犯类似的错误。让劳动力接受适当的教育本来就是资本主义逻辑的一部分，但是，抵抗因此（在那一方面）无效这一事实，并不是说这种斗争对于工人阶级文化以后的发展并不很重要。有关汤普森 / 安德森争论的主要参考材料有：Thompson, E.P., 1963; Anderson, 1964; Narin, 1964 a, b and c; Anderson, 1965a; Thompson, E.P., 1965; Anderson, 1965b; Poulantzas, 1966。——原注4

对),正好发生在资产阶级机构对他们进行收编这一背景之下并且是这种收编带来的结果。^①有一点实际上非常明显:工人阶级甚至对于资产阶级机构的体验都不是资产阶级的体验;工人阶级甚至在资产阶级机构中的处境,也不是资产阶级的处境——这就是(在每一个生活领域)阶级冲突的实际情况,后者似乎已经从功能主义者的分析当中消失了。联系青年文化总结这一讨论(有许多针对教育的其他问题我们无法在此讨论):青年文化必须被理解为是对资产阶级机构的框架所引起的各种问题的反应,但这种反应来自工人阶级对于那些机构的体验。问题在于,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来确定这种反应就是抵抗,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种抵抗具有政治的含义。

目前我们正好没有能够清晰回答这些问题的知识,因此,我希望为现在必须进行的研究提一些指导方针,以此来进行一些推断。首先,对于青年文化的政治分析必须更多关注文化的“工人阶级性”而不是它的“青年性”(正像教育的政治必须关注阶级关系而不仅仅关注教室的关系一样)。这并不是要否定青年人处在一个“特殊的”处境(主要是因为他们相对——而且仅仅是相对——脱离了家庭和职业的束缚),而是要强调这一点并不能保证政治分析的进行。它首先意味着夸大了青年文化和它的阶级背景之间的差异而忽视了二者之间的连续性。“代沟”的概念(源于中产阶级青年理论)对工人阶级的青少年是不适合和不适宜的;即使他们进入到各种不同于他们父母的机构(学校等)当中,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他们对于这些机构的反应都基于相似的价值观:如果青少年以“非成人”的方式行事,成人的反应依旧是容忍和鼓励——“男孩终将是男孩”,“在你可以玩的时候就玩个痛快”,“我希望

① 这种处境存在的明显矛盾,体现在左派关于教育的政治思考所呈现的混乱状态当中。一方面,我们有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或类似于非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引导着近一百多年来的增强国家教育的运动(但他们的孩子每天却在抗拒这种教育);另一方面,我们又有组织不善的、以孩子为中心的和“放任自由主义的”(libertarian)左派处理办法,后者把学校看作是直接进行压制的场所,把逃学者看作是革命英雄,并力图将工人阶级的孩子从他们的教育中“解放”出来。——原注5

我能有你那样的机会”。^①关注青年文化的青年特性,意味着关注青年人的心理特征——他们的青春期,萌发的性欲,个体的不确定性,等等,而忽视了他们的社会特征,即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位置。

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讲,工人阶级青年是现实的和潜在的劳动力,而且正是这一点(而不是他们的青春)决定着他们的社会地位、构建着他们在体制中的各种关系(也正是这一点统合了他们的各种体验,将他们与他们的长辈连接起来,并给他们的文化提供了政治潜能)。我们对研究者提出的第二条原则是,进行社会学分析时必须连接所有的相关机构,因为它们存在于工人阶级的体验当中。青少年的现实世界是家庭、学校、学徒期、工作、警察、法庭、青年俱乐部、社会工作者、商业以及大众传媒的联合,青年文化正是对这种联合的一种反应——我们不要再试图只从商业休闲、学校或法律方面孤立地看待青年文化。青年文化的这些机构合成要素类似于阿尔都塞列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清单(Althusser, 1971),这一点绝非偶然。青年人的体验正是对国家努力确保他们有助于资本主义再生产(比对年长者显得更尖锐,因为青年人的地位还不可靠)这一企图的体验。正是在这种语境中抵抗的概念才是可行的:问题不是工人阶级的孩子是否能够继续独立于各种资产阶级机构(他们不能),而是他们这种“依附”的本质是什么,这种依附一方面会对各个特定机构的工作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另一方面会对普遍的再生产过程产生什么作用。我们此处强调的是,正是青年文化的这种“多重决定性”(青年人接受的国家挤压的强度和多样性)决定了抵抗的可能性——比如,我们可以把孩子们使用流行文化的符号当作他们与学校和警察做斗争的集体力量的资源。

这又促使我们(特别为左派理论家)归结出最后一个观点。毫无疑问,商业休闲的种种符号(流行音乐,时尚)在青年文化内部扮演着极

① 1972年,我在约克郡基思利市(Keighley, Yorks)对十五六岁青少年做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工人阶级的孩子(不像他们的中产阶级同代人)无法理解青年文化和代沟的概念,并不认为他们与自己的父母有重大的差别。——原注6

其重要的角色,^①左派已经用“纯洁者的堕落”这一主题的许多变体来回应这种现象了。我们已经指出,青年人在这一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天真无知的——他们已被嵌入到了资本主义的体制结构之中;我们现在要来质询的是这种关于堕落的观念。各种流行文化机构(录音公司、青少年杂志、服装店等)肯定会剥削青年人(仅仅是资本主义令人震惊的一个方面);问题是青年人被它们操纵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左派提供的是青少年作为完全被动的消费者的图景,他们就像商业指示的那样去行事,买东西、玩乐,接受传媒表达的价值观,被剥夺了能够自主地进行娱乐、创造或反抗的所有资源——这些被流行文化搞堕落的青少年到了快要长大成人的年龄,他(她)们几乎和迟钝的绵羊差不多了。^②这样的图景,《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③杂志里的文字已经描述得非常生动了,但在西汉姆联队北端区(West Ham's North End)球迷骚乱和(剃光头的)斯雷德乐队摇滚音乐会(Slade concert)等事件发生之前开始就有点褪色了。这些充满活力的、生气蓬勃的、好斗的孩子们真的可以被看作纯粹的消费者吗?他们是没有头脑的商业动物吗?我们必须再次区分体制收编和意识形态收编之间的差异——事实上,青年人被深深地卷入商业机构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回应就完全是受商业支配的;我们要知道青年受众对于媒体的使用的更多反应,我们不能将我们的论断完全建立在剥削者的意图之上。

总结一下我的论点:对于青年文化的任何政治判断,必须首先建立在将其看作工人阶级文化的基础之上,其次将它看作是对由各种机构形成的组合体的文化回应,再次将其看作是在受支配的同时也有创

① 尤其是流行歌曲的重要性,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已经得到了所有关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的承认(但从未进行分析),而马克·艾布拉姆(Mark Abram)对青少年消费者的经典描述(1959)从未得到修正。——原注7

② 这种视青年为强制文化的被动参与者的观点,甚至派生出了一种更复杂的关于“过失放大”(deviancy amplification)理论——参考斯坦利·科恩对于摩登派的解释(Stan Cohen, 1973)。——原注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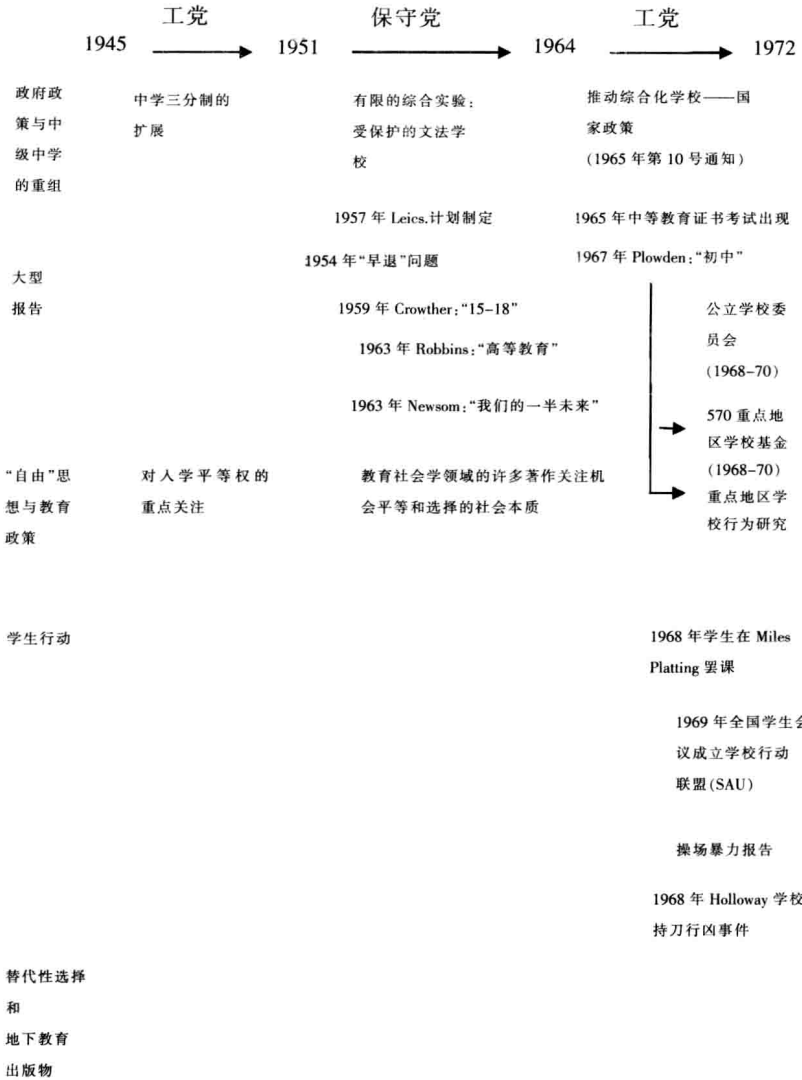
③ 这一方法最生动的例子,是约翰·博伊德(John Boyd)投给《今日马克思主义》的一篇关于青年文化争论的文章(1973)。——原注9

造性的回应。我们自身得出的一个不成体系的判断是,即使青年文化的政治在阶级意识上还不足以成为针对国家权力的斗争的构成部分,但它确实提供了开展这种斗争必需的先在条件。考虑到工人阶级的孩子在结构上处于无力状态,而且他们还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国家压力,我们只能惊叹于那种赞成他们完全像任何一种团体那样生存的那种文化所具有的乐趣和力量。如果最终的问题是如何建立那种文化、如何组织那种文化,如何将抵制转变成反抗,那么这个问题就会让我们从青年文化当中走出来,转入到对工人阶级政治的普遍分析当中。^①

(孟登迎译)

①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和几乎所有讨论青年文化的其他作者一样,忽略了妇女——我们的“工人阶级的孩子”这一概念是一个男性概念。我们没有理由忽视——我们几乎不了解青少年女孩,但我们不想掩盖工人阶级的男性至上主义(成人和青年)这个严峻的政治问题。——原注10

教育年表



教师和家长
采取的行动

“持放任自由主义论的教师” →

“阻止” →

“哪里” →

“教育咨询中心”(ACE) 教育机构 →

左派教师呼吁
发放薪水活动 政府
付清
薪水 “普通
成员”
形成 1969年 ILTA
教师发起
半天罢工 全国
运动 →

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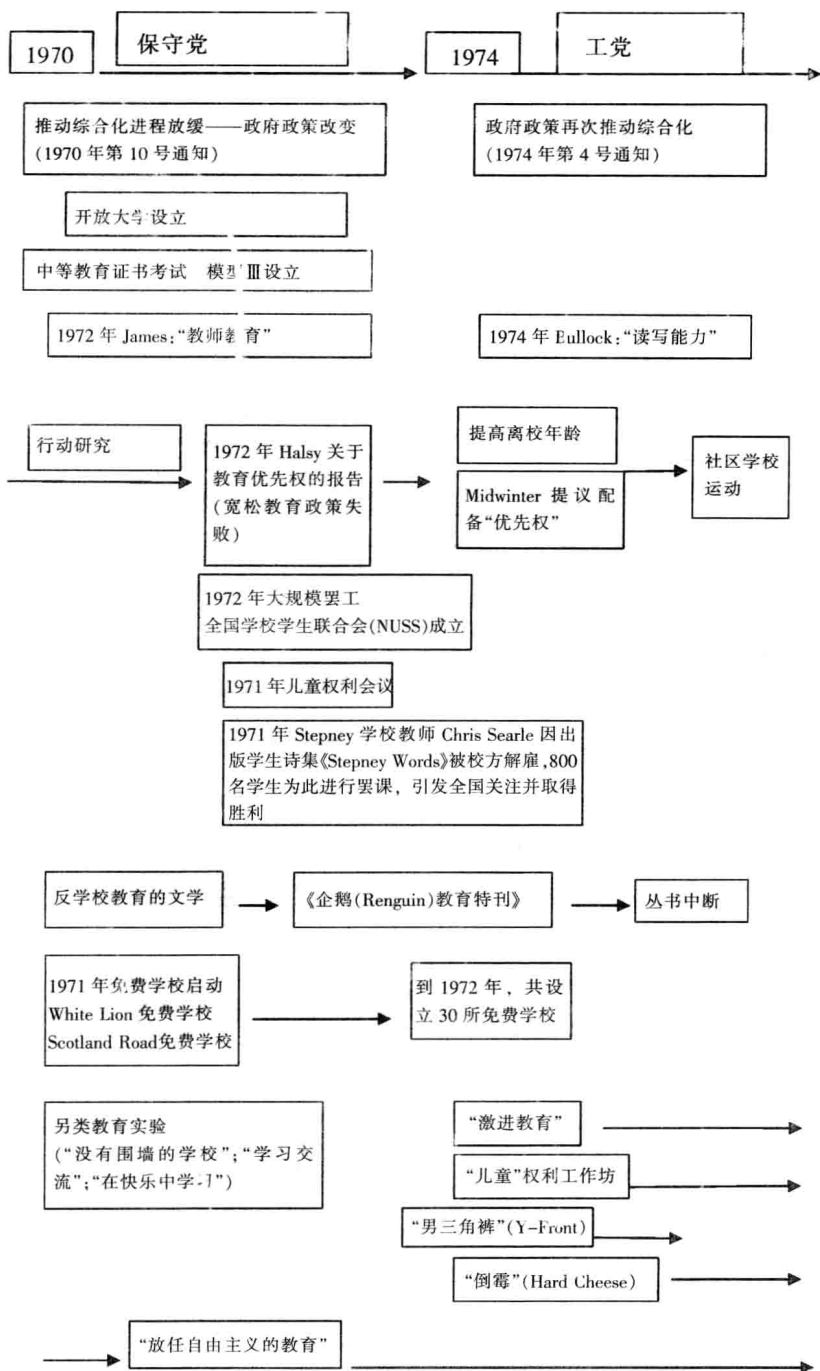
1965年, 倡导
反权威教育
的 Risinghill
学校关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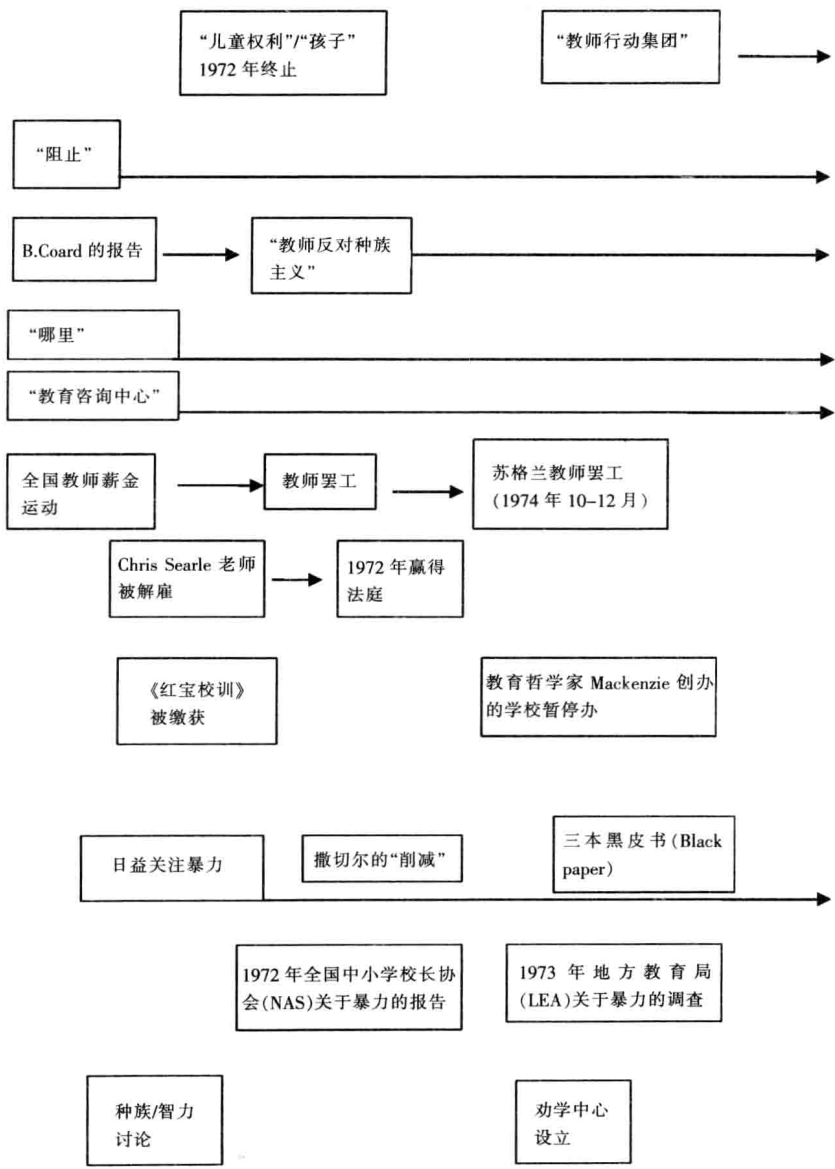
关注“标准”

“拯救我们的方法
学校”运动

1969年“黑皮书”

伦敦 Haringey 区
的学校按成绩对学生
分班引争议





第四部分

方 法

18 研究亚文化群体和越轨行为的 自然观察法

布莱恩·罗伯茨

除了新闻报道之外,对于亚文化群体的研究一直主要是在社会学调查(sociological inquiry)的框架内而不是在社会史的框架中进行的。由于一些很容易理解的原因,在主流社会学看来,有关“越轨亚文化群体”的社会学研究(像它的研究主题一样)本身也是“离经叛道的越轨者”。社会学的“主流”传统是实证主义的,它旨在获取一种客观的、科学的完整性——“科学”在这里的意思,不是德语中所指的那种对于一个领域或现象进行的严肃的、严谨的和系统的研究,而是指一种较为狭义的探究方式,与那些孤陋寡闻的社会科学家们信任的所谓“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极为近似。事实上这种关于自然科学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观点已经过时了,它是19世纪而不是20世纪的概念,但这一点并未能阻止社会学追求它自身认为的那个正确的、甚至有点让人莫名其妙的“终极目标”。依赖量化手段、采用分析方法、采取非历史的立场、探索“客观的因果关系”,都是这种有着更深层哲学探求的研究活动的构成要素。这种哲学探求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为了获得某种独特的确定性。有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各社会团体(societies)都是以结构方式发挥作用的“整体”,会围绕一个“核心价值体系”去整合某种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这种观念也一直是这种哲学探求的构成要素,尽管它主要是在最近这段时期里才变得引人注目,且带有一种势不可当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采用实证主义方法来研究那些被认为有整体协调功能的社会团体,自然会感觉那些偏离于主导规范和社会秩序的矛盾和

“越轨行为”特别令人费解，尽管我们不应该忘记罗伯特·K. 默顿 (Robert K. Merton, 1910–2003) 为了将这一领域限制在结构功能主义而做的诸多努力 (Merton, 1968: 175–248)。

因此，对“越轨行为”的研究一直涉及一种相当不同的社会学传统和视角——它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民族志人类学而不是实证社会学的调研方法。美国有大量的对于亚文化群体的研究，它们所采纳的视角一直被定义为自然主义 (Matza, 1969)；而且，它们采取的研究实践大部分都与各种“参与式观察法”的形式和策略有关联。“自然主义”是芝加哥学派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率先倡导的方法 (see Faris, 1967)；尽管在帕森斯和默顿主导社会学领域的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它的影响力已经没有那么显著了，但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又显然复兴了，特别是在越轨行为、犯罪、违法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方面。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参与式观察法”就像其自身名字所隐含的意义，是指社会研究者进入“现场”，近距离地观察“现场是怎样运作的”。研究者会定期回到自己的研究基地，记下自己的观察和对话，并从中总结出他一直所研究的现象的本质。正如乔治·麦考尔 (George McCall) 和 J. L. 西蒙斯 (J. L. Simmons) 所承认的 (eds., 1969)，参与式观察在很多方面近似于老练的新闻记者的实践；事实上，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新闻报道和“揭发丑闻”的传统，因为几位早期的芝加哥学派成员——如罗伯特·E. 帕克——曾经都当过记者 (Faris, 1967)。这一实践在某些关键的方面有别于一些主流的社会学探求形式，而且其从事者通常也能够意识到这种差别。很多参与式观察法的成果都从同属一个谱系的作家那里获得灵感，这些作家包括格奥尔格·齐美尔 (George Simmel, 1858–1918)、威廉·狄尔泰 (Wilhelm Dilthey, 1833–1911)，约翰·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 和乔治·赫伯特·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①所有这些人都是自由人

① 关于齐美尔，参看 Wolff(ed), 1964；关于狄尔泰，参看 Rickman(ed), 1961, and Habermas, 1972 (chapters 7 and 8)；关于杜威，参看 Mills, 1966 (Part Four)；关于米德，参看 Strauss(ed), 1965。

——原注1

文主义者(liberal humanists),对“人类科学”(the human sciences)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提供了另外一种不太受人尊重的传统,以取代由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弗雷德里克·勒·普莱(Frédéric le Play,1806-1882)、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1858-1943)和锡德尼·韦布(Sidney Webb,1859-1947)以及行为主义社会心理学所开创的那种社会学传统,后者为现有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实证主义方法论。^①但是在社会学里,参与式观察法从来没能完全替代实证主义。同主流的社会学探求方法相比,参与式观察法一直处于守势;而且在有些时候和有些方面,都最终证明它相当尴尬地拘泥于某些相同的立场。有效的观察可能会导致一些不言自明的假设:但是却不会受制于“变量控制”、“设计的可复现性”、假设-检测逻辑、对“客观”因果链的定量跟踪等一整套戒律的约束,而实证方法却要求遵守一整套戒律。参与式观察法从未以自己的方式全面对抗过实证方法。相反,它已经形成了自身的一种社会学的“亚文化”:一个生存于主流社会学内部、更具人文主义色彩和“移情”色彩的小团体。

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来看,研究并不是客观的研究,而是通过观察者与其加入的人群(“主人”)所共享的语言(并非“科学的”变量语言:见Blumer1956)进行的互动交流。这种研究依据是符号互动论的社会心理学,后者主要源自米德(1934),认为行动总是通过意义的给予和获得才被人们所理解的。行动(action)不是行为(behaviour),而是“有意义的行动”,是行为人与人之间富含意味的交流。自然主义的参与式观察法还与社会人类学家的研究方式很近似,即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通过探索、观察和参与,努力去发现这个世界是怎样运转的。但是,人类学家通常会变成本土文化世界里的局外人,与之相比,开展参与式观

① 关于孔德,参看Andreski(ed),1974:137-198。有关对“实证主义传统”有贡献的其他学者的评论,参看伊索普的著作(Easthope,1974),他的书提供了一份非常有用的参考书目。伊索普相当同情“实证主义者”,这使得他论述参与式观察法和生活经历的那一章内容带上了一种局限性的偏见。——原注2

察研究的现代民族志学者进入的“领域”则近在咫尺,不管是熟悉还是不熟悉,这个地方就像他自己城市的一个街区一样。“民族志学”对于参与式观察法的吸收,使观察的焦点从客观性和定量研究转移到“移情性的理解”(站在本地人的角度,从内心来理解)和定性研究。但是在实证主义的各种要求面前,参与式观察法的实际操作表现出一直缺乏勇气的样子。因此,参与式观察法极少以严格的民族志学和定性研究的方式得到贯彻。事实上,参与式观察法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方法,而是所有方法的综合,甚至包括问卷调查法和统计学。^①很多参与型的观察者用其他的、更客观一点的技巧来支持自己的观察。因此,参与式观察法是“各种方法和技巧的混合和综合”(McCall and Simmons, eds, 1969:1),是由它所考察的主题(原始社群、越轨亚文化群体、复杂组织、社会运动、社群、非正式的小团体)的规模、特征和使用的各种方法来共同界定的。

实证研究法有助于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保持距离,抵消研究者对调查现场的影响。参与式观察法则利用研究者与现场之间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互动越亲近越好。观察者不仅必须尽可能地熟悉现场,以便能够按照“本地人”所看到的和体验到的现场状况来重建现场:他还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亲身“体验”这种状况。(在这个意义上,参与观察法就其定义来说在观点上更接近韦伯所说“主观意义”的标准,而远离涂尔干所说“把社会事实当作事物来对待”的训谕:它对于“体验”和

① 追随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对于社会统计调查方法论的攻击(Blumer, 1954 and 1956),霍华德·贝克尔和布兰奇·吉尔(Blanche Geer)盛赞参与式观察法,认为后者为所有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关于社会事件的最完整的解释(Becker and Geer,1957)。他们遭到了马丁·特罗(Martin Trow)有理有据的猛烈批驳,后者是诸多关于工会制度、有法西斯意向的投票者和大学生的大型问卷调查成果的合著者,他批评说,“每个补鞋匠都认为皮革是唯一的事物”(Trow,1957)。贝克尔他们于是作了一些让步,承认调查方法应有一席之地。贝克尔随后开发出一个衡量证据效力(weight of evidence)的程序,以支持参与式观察法的一个前提假设,将用一种经验规则方式在现场内部获得的观察记录称之为“准统计资料”,see Becker et al,1961:43 - 45(重印于McCall and Simmons,eds.,1969:252 ~ 254)。——原注3

“同情性认同”的强调,使得它从根本上具有了现象学的特征——即使不是哲学意义上的现象学。)但是,接近也是有代价的。如果不顾及研究者的“参与”对于现场的影响,人们如何对现场进行描述和定义(也就是说,如何解释他的“霍索因效应”^①)?那些允许他对观察和介入进行区分的道德准则是什么?研究者“入乡随俗”会有什么危险?并且,他的亲近所产生的成果——一种定性的全面描述——能否超越描述而达到“科学”的程度?参与式观察法让研究者担当起灵活使用各种手段和策略的重任:同情但不能认同,理解但不能“被蒙骗”,关系默契但不能妥协。奇怪的是,参与型的观察者和他们进行实证研究的同行们一样,也存在“中立性”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与实证主义关于“科学中立性”的问题不同)。自然主义者把自己比作齐美尔所说的“陌生人”(Stranger):身处一种文化之内,但并不完全属于该文化中的一员(参看 Wolff, ed., 1964: 127)。

参与式观察法的优势,就在于它对现场了解的程度较高。研究者不仅了解“现场”亲密交流的表象,而且了解表象之下的真实世界在如何运转。他既理解“非正式的”文化,也理解正式的文化。他能敏锐地感觉到各个本地成员在经验方面的细微差别。他的研究方法是由一种对于那些产生在他自身之外的生活和体验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的人文主义肯定(humanistic affirmation)——一种对于社会接触的人文信仰——构造出来的。一种比较刻薄的观点认为,他受到了“其他文化群体”的诱惑,对后者产生了一种代偿性的、多情的依恋。这种浪漫的诱惑常常因为研究者采用了某种冷静的表面风格而遭到战术性的偏移(off-set):从表面上看参与型的观察者是用眼睛寻视过“真实生活”的人,是

① 霍索因效应(Hawthorne Effect),又称“霍桑效应”,是心理学上的一种实验者效应,是指当被观察者知道自己成为观察对象而改变行为倾向的反应,比如工人、学生等因受到研究人员的关注而增加产量或提高成绩。这一名称源于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乔治·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1927年至1932年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在美国西方电器公司(Western Electric)位于芝加哥的霍索因工厂(Hawthorne Works)所进行的一系列心理学实验。——校注

“做过实地采访工作的家伙”，是“完全了解一切”的人（这里的“人”显然是典型的男性形象）。大量的参与式观察研究是在芝加哥进行的，这一事实也许造就了这种“私家侦探”的形象。但是，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①的读者不久就会知道，每一位私家侦探在他的挎肩枪套中都隐藏着一颗温暖而浪漫的心。

芝加哥这个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如下的事实：为什么这么多的参与式观察研究工作都是在城市生活的“阴暗面”（under-side）——在各种局外人（罪犯、放荡不羁者、逃避现实者、无业游民、违法者、离经叛道者和歹徒）之间——进行的。观察者因为接触“局外人”，后者身上的某些传奇色彩无疑对他产生了影响。反之亦然。贝克尔对爵士乐音乐人“世界”的深刻理解，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他自己早年当过爵士乐钢琴师的生活经历（Becker, 1963）。波斯基（Polsky）在写他对于“台球厅的皮条客”的研究之前，也曾经是经验丰富的台球手（1971）。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然而，用芝加哥城的背景来解释实际上太简单化，太重视环境因素了。事实上是，当参与观察法要求研究者设身处地地站在“别人”的立场并从这一立场来看待生活的时候，他就获得了参与式观察的最适宜的方法和视角，以此向地上的正统社会（over-ground society）传送有关地下社会的逻辑和那群从“地下社会”审视正统社会的人的生活和世界观的“好消息”。他的研究方法所具有的这种赏识的（*appreciative*）特性，使他成了局外人天生的科学助手——一种打入内部的局外人（*Inside Outsider*）。

自然主义调查的主题常常是独特的；但是对待它的方式却往往是“符合常理的”。科学研究者（从“共同价值观体系”的观点）认为是奇特的、不正常的事情，绝对不会让“自然主义者”感到惊诧或震惊。这是因为，不仅他们的实践是自然主义的（也就是说，走入很多被其他研究者忽视的城市自然环境），而且他们的实践用自然的道理解释了那些奇

① 雷蒙·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 1888-1959），美国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他对现代推理小说有深远的影响，被西方文坛称为“犯罪小说的桂冠诗人”。他的小说的主角成了传统冷硬派私家侦探的同义词，往往看起来很冷酷且愤世嫉俗，但却有一颗软心肠。——校注

怪的和奇异的事情。这一传统中那些最好的著作，非常忠实于书里所描绘的生活，以至于这些书就像是对生活的完全自然主义的“再创造”——甚至有时会激起这样的反应，“你们所发现的就是我们平时已经知道的——为什么还要不嫌麻烦地来为此写一本书呢？”当然，纯粹的自然主义，在社会学中就像在艺术里一样，其实只是一种幻觉。研究者所看到的和理解的是由以下这些问题构成的成果：研究者是谁，他带入到自己研究中的假设是什么，他认为哪些信息重要到必须要选择出来进行描述，他怎样进入调查现场，他在“第一天”碰到了哪些事情，他是否能够幸运地遇到一位特别敏锐和灵敏的受访者，等等。但是，自然主义的理想仍然在如实地描述和描绘，不带有任何的扭曲和偏见：试图获得对一种社会环境的如实反映。

最近一段时间，人们一直在试图更正式地、系统地阐述参与式观察法的流程，展示实践的方案，界定“研究行动”的规则，或者在试图揭示如何从对各种民族志的比较分析中提炼“实据理论”(grounded theory)的事情(参见，例如，Glaser and Strauss, 1968; Denzin, 1970)。但是，这些“高层次”的主题化尝试(thematisations)并未彻底完成如下两项基本的任务：即使研究者的理论框架和假设变得更明晰，或者在更广泛的解释理论的语境中对各种描述和民族志进行定位(毕竟，并不是所有的描述和民族志都需要成为实证主义的东西)。当然，要想同社会人类学一样，在描述充分的民族志与更具结构性、功能性或历史性的理论之间建立一种关联，确实有不少理论上的困难；因为社会人类学做这种事情已经很长时间了，它自然非常了解其中的甘苦。但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自然主义不是不愿意接受主流社会学提供的理论框架，就是不愿意详细阐释任何一种可选择的另类理论框架，总之，它回避了这些重大的问题。这种回避，这种战略上的搁置(bracketing)，甚至在参与式观察法最常用的一些术语中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现场”(见Geer, 1964)一词的隐含概念是指一片有“自然”疆界的区域，一个有明确界限的环境场景(但是，“现场”与城市中其他的区域又是如何交叉的?)。又例如，“世界”一词的隐含概念是指一个实存的自成一体的空间(但是，当警察的“世界”与流浪汉或者瘾君子的“世界”发生交叉时会发生

什么情况?)。当然,自然主义也会将它自己的名称归功于芝加哥学派的理念,即城市被分割和编组成这些界限相当清楚的生态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它自己的“世界”——几乎是天然的社会空间,彼此截然不同(参见 Faris, 1967, Park and Mackenzie, eds, 1967)。不论原因是什么——原因肯定是复杂的,自然主义确实更擅长同情性地调查由某些特定的社会外围人群(outgroups)所构成的那些独特的“世界”,但并不擅长描述那些拥有、支配不同资源和权力的“世界”发生联系和冲突的时候所出现的情况。当然,自然主义的典型主题——越轨行为,犯罪,违法——迫使社会管制的核心问题被提上了自然主义者的议事日程。但是,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在一些与管制文化进行的面对面的、本地化的“相互交流”——街角不法分子与社会工作者;瘾君子与本地巡警;流浪汉与福利机构——之中展开的。仅在最近,自然主义才非常罕见地循着制度权力和信誉等级的范围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或者说,考察了穷人和有权势的人在结构方面以及(或者不如说)在相互交往方面存在的联系。这给整个领域带来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参照:尼古拉斯[Nicolaus, 1969]的评论和贝克尔与古德纳的交流)。它促成了自然主义领域本身的一些关键性调整(如下文所述,从相互影响[interactional]方法转向交互影响[transactional]方法)和一些个人性的转变(例如:Matza, 1969)。这些调整并非仅仅来源于参与式观察法自身逻辑的内在矛盾。美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生的诸多令人震惊的政治事件,使这些调整被列上了参与式观察法的议事日程,而这些事件极其有力地削弱了早期自然主义视角(自认的)那种清白和纯真。

最近10年,我们目睹了一种研究越轨行为的新社会学在自然主义内部的出现和发展,这种新社会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非常重视社会控制实施过程中形成的某种特定的“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各个社会群体并非简单地进行相互交流——他们开展相互交流是为了达到某些目的。最明显的一个“目的”就是实现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控制,而且通过这种控制来维持和捍卫社会秩序。这就将权力维度重新引入到了一个时常看起来没有权力控制的、双向互动的世界当中。现在人们意识到,越轨和违法行为并不是从“局外人”的世界里自

然而地产生的,它作为这一群体被赋予的社会身份的一部分,是在处于权力不平等分配状态的、各群体间的互动之中产生的。一个群体的“越轨行为”不是“天生的”,而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的产物;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机制就是限定他人处境的权力,给他人贴标签的权力——使这些标签牢牢贴在他人身上。尤其是贝克尔(Becker 1963; ed., 1964)、戈夫曼(Goffman, 1961; 1968)、埃里克森(Erikson, 1962)、基特苏斯(Kitsuse, 1962)和莱默特(Lemert, 1967)的著作,都处在自然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交互影响论的”阶段。贴标签被认为是事件进程或事件程序的构成要素。群体和个人都要经受“生活历程”。在这些生活历程当中,群体和个人的身份、自我认识和责任承诺会发生改变。依靠同其他群体的来往和相互影响,越轨者差不多会逐渐坚定地投身于越轨生涯(deviant career)。在最初的行为(初次越轨)与越轨身份一旦通过标签归属被明确化和固定化之后而发生的诸多行为(二次越轨)之间,是有区别的。

标签论或交互影响理论,尽管源于并保持了早期“民族志学”自然主义的精神,但它不再将主要的关注点放在群体或现场的内部世界和程序上,而主要关注群体之间的交互影响(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有权势者对越轨者进行的贴标签和控制,并没有被当作一种“结构的”或行为性的输入性影响,而是被当作一次或一组得到越轨者心领神会地解读和响应的有意义的行动(例如,完全投入到自己被归属于的那种越轨行为),就这一点而言,它仍然残存着互动论的因素。控制被理解为通过制定“规则”来进行运作;越轨行为因而就是违反他人所界定并维持的那些规则的行为。这的确削弱了早期参与式观察研究中公认的那种“现场”的绝对可信性,因为现场如今明显是由那些为它制定的规则(而不是它本身主动制定的规则)构成的,并且要响应这些规则。的确,已经有一些批评家指出过,现在这种对于越轨行为的界定,过多地考虑了其违反规则和对社会控制机构进行“反动”这些方面,而几乎没有关注那些受控制的主体或群体自身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另一些批评者则认为,“贴标签”理论在解释交互影响本身是如何由历史和各种结构形成的这一方面,还探讨得远远不够。弥尔顿·曼考夫(Milton

Mankoff)非常清晰地阐明了“社会反应”理论存在的一些缺陷:

一些理论问题包括:未能考虑到在整个越轨生涯的发展过程中,那些导致最初一次违规行为的社会结构因素和心理因素所产生的持续影响;未能充分注意到某些违规者容易陷入自我标签化的程序,后者可能会削弱客观标签化操作在决定越轨生涯方面的重要性;相应忽略对促成“成功”标签化的、实际的社会制裁的类型和严厉程度的认真分析。

(1971:216)

其他的一些研究者试图进一步说清楚:如何才能让互动影响论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的和历史的框架协调一致,从而在更“广泛”、更“直观”(immediate)的层面具有解释力(例如:Taylor, Walton and Young, 1973; 1975; 同时参见埃克思和吉布斯早前从各种立场所做的评论, Akers, 1967 and Gibbs, 1966)。

社会学自然主义在美国的推行所取得的这些进展,已经在英国有所体现,尤其(但决不不仅仅)体现在全国越轨现象研究联盟(the National Deviancy Conference)^①开展的研究当中(Cohen, eds., 1971; Taylor and Taylor, eds., 1973; Rock and McIntosh, eds., 1974)。这个组织是那些最接近美国自然主义的英国社会学家想要建立的一个堪与美国社会问题研究学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Problems)相媲美的制度基座(institutional base),美国社会问题研究学会已经有力地证明了美国自然主义的存在。在这里,社会学家们不仅在理论层面尝试发展这种“怀疑论革命”,还尝试把参与式观察法和交互影响论实证性地应用到英国的实例当中去。来自美国的灵感是非常直接的,全国越轨现象研究联盟内部对此也是公开承认的,尽管它那时在英国的出现无疑有着更深层的结构原因(英国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规模发展,已经膨胀的福利国家、行政和管理机构对于有社会学和

① 1968年在剑桥大学举行第三届全国犯罪学教学和研究会议时成立,简称NDC。——校注

社会工作“背景”的人才的需求,社会抗议运动——通常涉及社会问题和越轨现象——在20世纪60年代的扩展,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兴起)。全国越轨现象研究联盟是由一批忠实信仰“怀疑”理论的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组成的;它不仅吸引了年轻的大学生和研究者(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而且吸引了在“地下组织”(Underground)诞生后涌现出来的各种“激进的社会工作”组织和另类人群(比如,激进社会工作者建立的“案例反对者”[Case Con],激进心理学家建立的“红鼠”[Red Rat]和激进律师建立的“蠢驴”[Ass]等组织;新囚犯联盟、支持者[PROP]以及古老但重新焕发活力的全国公民自由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for Civil Liberties]等组织开展的运动)。它为各种各样的、众多的“另类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关注的焦点——新-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的(libertarian)视角以及自然主义的、交互影响论的视角。在全国越轨现象研究联盟内部(正如先前在芝加哥学派时期一样),社会学研究与被研究的越轨者的世界之间原有的分界线,再一次变得模糊不清了。乔克·扬(Jock Young)对吸毒亚文化群体的研究,就是这种内外皆通(inside-outside)关系取得丰硕成果的例证,他本人把这种“越轨的/离经叛道的社会学家”戏称为“越轨行为的动物园管理员”(1970)。全国越轨现象研究联盟的几位主要的实践者确实结合了好几个目标:发展对实证主义社会学和犯罪学的批判;使用参与式观察法和交互论方法开展高质量的实证研究;直接接触和参与他们最密切关注的激进运动和团体。斯坦利·科恩(1974)在他对全国越轨现象研究联盟的历史所做的综述中曾经提到,激进的社会学家所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找到“一种既能置身其内而又不出卖自己的方法”。早期的全国越轨现象研究联盟是非常多产并富有激发效应的。它举办的数次会议,即使是那些激进的会议,都有很多人参加——它是各类激进运动和群体的论坛,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业社会学家的会议。这一时期全国越轨现象研究联盟还出版了一些带有“民族志”或“交互论”性质的重要研究成果,并且沿着该机构语境内部的某些思路,还试图发展出一种更全面的、“另类的”犯罪学或社会学理论。然而,该组织内部存在的各种摩擦和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变得更

明显了,而且出现了一些分裂,这些分裂又分离成许多不同的思想线索,从而丧失了方向和动力。

这些都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原因不仅在于这么多研究越轨行为和亚文化群体的重要理论都源于全国越轨现象研究联盟这把“庇护伞”之中;还因为这些矛盾既是理论的和方法论的,也是个人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矛盾,而且涉及如何才能在这一领域有效地推进最有力的深层研究。提供给激进学术和政治介入的选择绝不会简单地呈现出来。如果全国越轨现象研究联盟开辟的那个前哨阵地,是要为其最初的部队提供继续扎实推进的新基地,而不是仅仅要为他们提供战场授衔令(field-commissions),那么这些可供选择的策略就必须面对质询和争论。

对我们而言,这里有三个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第一个是理论问题。能否从越轨行为区域的“局部”发展,或者从其初期的自然主义互动论或交互论的源头,归纳出一种有概括力的、可操作的、有关整体社会形态结构的普遍性理论?随着这一转变——从对越轨行为或社会管控文化的民族志研究转向对整体社会形态的认知水平——的启动,我们会赢得什么,又会失去什么,哪些东西是需要保留但又必须改造的,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改造?现在已经有人沿着这些思路作了一些研究——当然绝对没有到达下结论的阶段,而且“批判犯罪学家们”(critical criminologists)明确希望能从自然主义理论的一些关键点上发展出关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他们的批评者则认为,不破除“符号互动论”的基本原则,这种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我们看来,这一争论对该领域在理论方面的进一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它仍停留在一种不明显的、很大程度上“仅限于个人的”、无条理的状态。全国越轨现象研究联盟把这种状态归因于它自身,也归因于在受它研究影响的人们当中所激起的那种要再次接受这个核心争论的承诺。很明显,这种状况同符号互动论、交互影响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变体之间的对接点有着密切的关联。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方法的问题,该问题将由史蒂夫·巴特斯在下一章做更全面详细的分析。但是,方法从根本上讲也无法与理论观点、

甚至无法与介入(interventions)的问题完全脱离;而介入问题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哪种社会介入和政治介入是由学术实践和理论实践产生的并能与之相符呢?在某种程度上,尽管“激进的社会学”仍然与自然主义观点保持着紧密的关联,但随后必然出现的情况是,它的各种介入策略与那些被研究的团体也有了极其密切的联系——越轨的、违法的、犯罪的亚文化群体被赋予政治功能并受到了支持。激进的自然主义与某种激进-自由主义(radical-libertarian)的介入之间出现了一种密切的“契合”。但是,理论观念和历史氛围都在时刻发生着变化。遵循这些理论和语境的介入形式会有哪些变化呢?当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介入主义者的策略不能“附属”于学术的实践,也就是说,不能就这样跟在学术实践后面,并从外面来实施。相反,理论观点应当源自积极的“政治活动”。

(补注:本文与斯图亚特·霍尔合写而成。)

(王蕙译)

19 参与式观察法的调查逻辑

史蒂夫·巴特斯

引 言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于亚文化群体的研究,并不源于对任何一种社会学“方法论”的正式运用。保罗·威利斯对摩托车男孩的研究(1971)和迪克·赫布迪格对伦敦富勒姆区(Fulham)亚文化潮流的阐述(1974),代表着该中心已经富有原创地完成了对一些实质性问题的深入研究,而不只是增添了一种专业的研究风格。但是,随着“亚文化研究小组”在研究违法犯罪、青年风格和“文化工业”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关于参与式观察研究方法的逻辑状况和逻辑一致性的问题就被提到议事议程上来了。那些来自美国的参与式观察法实践者的著作,通过全国越轨现象研究联盟(NDC)和其他机构的传播,反复向那些研究亚文化群体的学生灌输某种方法论的良知(methodological conscience): 汇聚在一起的一组文本为现场调查的程序和分析提供了某些法规汇编,并结合了霍华德·贝克尔(1971)、诺曼·登森(Norman Denzin, 1970 and ed., 1970)、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 1963 and 1968)、布兰奇·吉尔(Blanche Geer, 1964 and 1970)、巴尼·格拉泽和安塞姆·施特劳斯(Barney Glaser and Anselm Strauss, 1965, 1968 and 1975)以及伦纳德·沙茨曼(Leonard Schatzman, 1973)等人运用参与式观察法取得的实际成就。关于这些法规汇编的规模和局限,麦考尔(Mc Call)和西蒙斯(Simmons)在他们1969年合编的《参与式观察法诸问

题》(*Issues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一书中有篇题为“文本和读者”的颇具权威的文章,给予了举例说明;登森(1971)则指出,参与式观察法的方法论与罗斯(Rose, ed., 1962)、施特劳斯(1959)、布鲁默(Blumer, 1969)以及梅尔策等人(Meltzer et al., 1975)所做的那些系统阐述符号互动论理论的努力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了一种日益自信的意见,认为在符号互动论庇护下开展的参与式观察,树立了一种可与实证主义/功能主义方法相抗衡的理论“范式”和一套方法。本文旨在详细考察为“参与式观察法范式”(Participant Observation Paradigm, 简称POP)所写的“方法论规则手册”,并试图依据布莱恩·罗伯茨的主张(见上文)——实证主义社会学与“参与式观察法范式”的对立是可以调解的,后者当中可以混杂前者的因素——来讨论在贯彻原则和规则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摩擦点。正如本书其他章节所示,“亚文化研究小组”的成员们,除了对“自然主义社会学”,还对现象学、结构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方法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我在此所持的观点,旨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协助大家继续探索那些在文化社会学的新研究方法当中可以将记录文献与参与式观察的各种方法中的最佳特征融合起来的方法,与先前的范式相比,这种方法更不容易受到调查现场“意识形态闭合”(ideological closure)的制约。

1 经验主义与归纳法

(a) 实证主义社会学与自然科学理念

很多社会学教科书都会提供一种对于“经验主义通用规则”的解释,并将此作为它们立论的基础;最近的例子就是克劳兹和米勒的著作(Krausz and Miller, 1974)。这些著作都接受了一种假设:认为存在一种从自然科学成就之中衍生出来的、针对科学程序和科学推理的通用模式;而且文化科学和社会科学必须找到那些能够阐明自身问题的方法,这些方法在其调查结果中也要能够提供具有程序保证确定性的同样的规则。这一点很容易把人引入错误的判断,因为目前学界对于这些显示自然科学家调查逻辑的预设、隐喻和方法的地位,还存在激烈的争论。(近来一些引人关注的文献,可参看Hindess, 1973a: 51—58以

及Lecourt, 1975。)系统论的各种观念立足于一套层级结构,这套层级结构由各种内属于一个建筑学整体的公理和定理以及各种反对经典逻辑准则的检验性假设构成,它们有时候被用来为社会学研究提供合法化辩护,属于一种特别混杂的“科学哲学”——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结合在一起: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适用于那种包括了如下这类命题——像“x越多,y就越常见”、“p和q的结合经常会伴随着y的发生”——的推理方式。大卫·威勒和朱迪斯·威勒(David and Judith Willer, 1973)合写的一本书提供了一些这样的方法,一些具体的方法论谬见(myths)通过它们诱使社会学家们去无端地声明某种知识——这种知识正是庸俗实证主义方法打着“科学经验主义”的旗号生产出来的。这些谬见包括如下几点。

(i)认为“在头脑之外”存在一种客观的社会现实,后者能够将自己直接呈现到一位头脑清醒、工作认真的观察者的感受当中。(只有“呈现”本身会成为问题。)

(ii)认为科学知识是由一位(大写的)主体(科学家)创造的,科学家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到真实存在的(大写的)客体上,针对这一客体明确推断出那种包含这一客体之简便称谓的东西。(更老练的哲学家们,像巴什拉——参见Lecourt, 1975——就认为,科学家在尝试创造某些他想用之来再现现象世界的形式,而不想仅仅登记既有的形式。)

(iii)对“归纳法”作为科学研究和每一类推理所依赖的推理技巧是如何起作用的,有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源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或译“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威勒夫妇在他们所写的书(David Willer and Judith Willer, 1973)当中有一章专门论述穆勒。穆勒所说的“假说—演绎法”(hypothetico-deductive method)既包括演绎(预测那些遵循某种起始条件和规则应该产生的事件)也包括归纳(从那些观察到的事件推断出一种已经被证明或证实、被赋予规则有效性的假设);但他将经验主义探究的大方向还是描述为归纳法。

威勒夫妇揭示出,当社会学家将自己的信念和实践交由这些谬见支配的时候,他们的工作通常就会归结为一种寻找,即寻找那些可以对有关社会组织和文化形式的各种描述进行概括的简便方法;而真正的理论研究则需要一种与他在分析和批评经验主义的“事实”时启用的归纳法不一样的推理模式。布莱恩·罗伯茨在上一章中已经指出,参与式观察法产生于自然主义者对庸俗实证主义的反抗;但参与式观察法的实践者在他们对于如下这种调查逻辑——这一逻辑破除了那些在更深层存在的“经验主义的通用规则”(实证主义社会学仅为它提供了一种实施方式)——的探求中究竟取得了多大的成功,还有待于考察。

(b)社会学调查的其他替代模式

在这篇对适用于定性社会学研究的推理模式所做的简要概述当中,我将集中探讨数据分析这个环节。数据分析与上面列出的第三条谬见是同时并存的,大意是说归纳推理就是(=)科学的方法。当然,那些对于现象和现象领域的界定,以及诸多关于实证调查过程的概念,也应该在对调查逻辑所做的任何彻底的回顾中得到深入的探讨,但是我只能简单地触及一点点。在这儿,我要列出另外四种可供选择的分析策略,并对其中将每一种分析策略调动起来的推理模式进行评述:

第一种:“赏识性理解”(Appreciative understanding)

传统的社会人类学将其推论的基础,建立在以民族志方式所描述的那种对于田野调查数据的初步组织之上,这种描述在一个假定的封闭文化体系之内“图绘”了习俗、角色和社会结构的各种含义。参与式观察研究尽管也产生了很多民族志式的描述;但是它的主旨已经转向了一种更“具现象学色彩的”记录,并在其中突出了符号交换的特征,目的就是要展示个体旨在理解他们自身社会交往的实际承诺。对于亚文化境遇中的“生活意义”进行赏识性理解的追求,并不完全是随意的;布鲁恩(Bruyn,1966)已经阐明了这种归纳形式所涉及的一些技巧。但是,这种推理方式含有很强的“直觉”成分,而且绝不会自行产生出一种理论分析。

第二类:分析归纳法(*Analytic induction*)

阿尔弗雷德·林德史密斯(*Alfred Lindesmith, 1947*)认为,鸦片上瘾是非常“具体化的”(crystallised)一种现象,因此可以通过分析吸毒者的人生经历,对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吸食鸦片行为的特性做出更高层次的概括。他一方面采用了兹纳涅茨基(*Znaniecki*)的分析归纳策略(*1972*),试图从当地环境中提炼出烈性毒品吸食行为的主要模式,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能保留那些重要的亚文化变体,并且希望通过反复试验来详细阐述那些能体现毒瘾文化特征的局部模式。然后他必须协调他所有的局部模式或假设,让它们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所有的数据都能一致:如果有任何反证出现,就必须改变相关的模式来对此做出解释。最终的结果是将他所剩的所有命题黏结在一起,形成一种相当复杂的“总体假设”:这是对于现象的真实特征的一种解释说明,并且充满了各种限定条件的限制和绕行路线。这种归纳策略将对证据的系统编码和图绘与对数据的更有创造性的细察相结合,以探求那些貌似可信的、可测试的子模式。它的缺点在于(特纳1953年对此有明确的探讨)只能适用于有限的社会学问题;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它并不能产生那些可归属于科学理论名下的真正的“共性”(universals),只不过是某些文化形态中广受瞩目的“诸多事实”所进行的一种视角透视(*perspectivisation*)和仿造。

第三类:持续比较法(*The 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

这种分析策略也在探索如何通过对数据的编码和检索去生成一些广泛适用的模式,从而建立一套假设。但是,系统比较的目的在这里得到了更为明晰的阐发,并且同参与式观察法田野调查在收集和编码观察结果时所用的策略相结合。这里有一种假设:完全可以根据在田野调查做记录和思考的同时所产生的、新出现的分析,来精心选择在问题域之内可以找到重要数据的语境。这涉及一个对现场和事件进行“理论抽样”(与统计抽样截然相反)的螺旋式过程;对观察结果的记录和编码;在“分析备忘录”上记下试验假说;通过进一步的、更有社会学见识的抽样来提供更为精细、更为集中的对于数据与数据、数据与概

念或假设的比较。

由此被确认的社会类型、人际互动和意识形态形式等范畴,必须接受交叉比较(cross-compared),并且要结合它们在社会组织既定模式之内所处的位置:正如格拉泽(Glaser, 1965)所阐明的那样,这是持续比较法的任务。考虑到将一种新的分析角度引入到各种小型的事件、人群或社会形态的子群体当中,会横向切割和重组它们之间的关系,持续比较法的焦点通常就集中在由于这种新分析角度的引入而造成的差异上。它的程序及逻辑,与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为了对调查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多元变量分析”(multivariatic analysis)而研发的程序和逻辑非常相似(见Lazarsfeld et al., eds., 1972: 119-217)。但它专门要处理的是定性数据,因为它的创始人格拉泽和施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 1968)关注的就是在进入实地调查之前不要预先选择那些已经确定好的“变量”。这种方法的目标导向,就是要生成前提假设(发现“实据理论”[grounded theory])而不是要检验假设。

在严格受限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这种策略期待要对文化形态确立那些类似于法律的普遍原则。这些普遍原则不是即刻获得的,而是在对一系列的临时假说或局部模型进行修正和分级组织之后才能获得的。它的分析推理模式类似于C. S. 皮尔斯(C. S. Pierce, 1839-1914)所描述的那种小前提无证明的不明推论式(abduction, 见Habermas, 1972: 334):分析者以令人吃惊的结果(一个反常事件)开始,寻找能够解释这一情况(事件和已知的背景)的规则(社会学假设或模式)。但是,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关于这种不明推论式是如何真正运作的,目前还存在很大的疑问。

第四类:渐进-回溯法(*The progressive-regressive method*)

持续比较法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没能认识到既有的理论为分析提供规则框架的那些途径:格拉泽和施特劳斯的理论概括无法独立于语法学和语体学之外。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来应对这一问题(1963)。他注意到,斯大林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研究素材的选取,仅仅依据它们是否具备解释历

史唯物主义辩证规律的(假定的)能力。批判性的探究仅限于思考这些规律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呈现出的各种不同的表达变体形式。他将这种在理论中对现象进行“定位”的做法称作分析的**回溯**(*regressive*)环节;但他承认这是一个必要环节,因为必须在当前理论状态的限度之内、根据理论的倾向性来选择讨论主题。但是,这种分析一旦具体接触到现象,分析者必须让他的感性服从于现象,于是,这一环节就转向了一种**渐进的**(*progressive*)追踪:探究人们的体验与一直支持我们所有人的那个社会进程之间存在的那些因果的和文化的联系(“中介”)。

通过对那些越来越多的、限定一种现象的规定的起源和相关性提出质疑,这种对于中介的追踪就会不断地重新探讨那些被起始理论暂时搁置的问题。随之而来的,首先是对于中介的标准和形态的了解变丰富了,然后在一个新的回溯运动中对理论进行重组。萨特的文化研究规划需要一种推理模式来维持那些在渐进分析与回溯分析之间展开的重复运动:这是他最主要的(未完成的)方法论工作的主题(Sartre, 1960)。他的方法建立在一种“历史主义的”观念之上,这种观念认为各种相互冲突的文化力量是相互影响的,并且强调那些拒绝社会秩序主导意义的环节所具有的启发价值。鉴于持续比较法把这些环节不偏不倚地作为人类组织模式的构成要素来对待,萨特的分析策略就假定文化形态与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不对称的。在本文后面的部分,我会再回来讨论这两种分析模式之间的“断裂”问题。

2 自然主义现场调查(field research)的一些通则

现场调查是由人们考虑研究策略时所用的理论角度和态度所凝结的各种行动的一个“总括”。沙茨曼认为,使用参与式观察法的研究者肯定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由于他不受事先要阐明一种专项技术或一个特定问题的限制,情况就更是如此”(Schatzman, 1973: 14)。这种认为现场调查具有开放特性的观点,比实用主义的权威代言者约翰·杜威的观点(John Dewey, 1938)还要激进,杜威只探究了所有调查都具有的准-实验的(*quasi-experimental*)特征。这种观点承认——并且包含——调查者-受访者关系(*researcher-host relationships*)的心理社会

学动机。它允许观察者可以协助他的研究进程,甚至可以改变进程的方向。它要求研究者通过移情性的理解把受访谈者经验中具有的那些隐蔽的意义挪用到研究者自己的意识里来,从而把它们提炼出来。它劝告研究亚文化群体和越轨行为的学生要让自我的个性服从于对民族志研究进行重新社会化的行动,用他对自己的分析所做的理论阐述来重塑自己。在这儿,我只想在自然主义取向之内强调几条选定的关于方法的“通则”,这些通则从属于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但是请记住,这些阶段并不是以一成不变的序列排定的固定步骤。在本文的剩余部分,我将根据我对参与式观察法范式入门书的重构,来考察一些可以执行这些通则的方法守则。

(a)建立现场调查的人际关系 与受访谈者的关系必须以开放互惠的方式协商展开,在协商中研究者要介绍他自己的身份和目的。但是要不要努力去协商一种特定的关系,将取决于为“理论抽样”制订的计划,取决于对与预期的线人(Informant)接触的预估成果(在数据的质和量这两方面)。

(b)逐步确立研究计划 研究者进入现场时,应当对自己所研究的课题有明确的设想和社会学的关注;但是必须通过探究现场发生事件的特征和模式,通过关注受访谈者对自身处境中存在问题的叙述,来逐步形成现场调查的重点和策略。

(c)管理现场调查的过程 研究者必须掌控他的现场遭遇和人际关系,以便确保在手段方面(利用数据流来帮助自己生成假设)、干预性方面(设置新情境来阐明或促成一个自然情境的进程)和单纯的社交方面(从“受访谈者”当中交朋友)形成一种便于管理的结合:人道主义的准则(the humanistic code)要求在这三方面都做一些尝试。

(d)分析定性数据 分析阶段的目标是生成连贯的、站得住脚的理论;因此它要对参与式观察的现场调查风格带有的实用主义实施某

些有追溯力的(*retroactive*)控制。当研究者从自己的理论角度确信这种新兴的理论是令人信服的、有数据实际内容充分支持的时候,他就会总结自己的分析;并且,只要有可能就会完全发表这些分析,既不害怕也不偏向那些可能希望使用或压制它的群体。

3 进入现场的策略

W.F.怀特给他的《街角社会》(*Street Corner Society, 1955*)一书所写的著名的附录,揭示了第一现场的关系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它要么成就研究要么毁掉研究;而且,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 1968*)也证实了这一环节在参与式观察研究项目中所面临的持续困难。一旦确定了研究主题(我们下文中还要重返这一话题),那么如何顺利地接近到人、地点和信息就决定了研究的很多方面。这种协商能否顺利取决于研究者是否有胜任以下几项工作的能力:(i)事前侦察形势;(ii)承担恰当的专家角色;(iii)预测他需要准备的专家角色的主要变体;(iv)准备一些装门面的故事,在当面认识个体时可以与“受访谈者”的故事进行交流。

(i)沙茨曼(*Schatzman, 1973: 19-21*)告诉我们,侦察形势是为了对以下几个因素做出判断,比如观察地点(在伦敦哪个酒吧是偷听同性恋暗语的最佳场所?);任务的可行性(进入职业舞女陪舞的舞厅[*taxi-dance hall*]的顾客需要有多高的舞技?);进入手法的适宜性(能通过医院的主管来进入该医院吗?或者,能否通过某个宗教派别的领导人来进入该组织?)。侦察形势的技巧主要源自对私家侦探、骗子以及其他相关人员惯用手段的明显类推:最重要的要求是研究者要培养对可用的现场局面的灵敏嗅觉,这些场所要有丰富的信息,并能为解码受访谈者的语言系统提供空间。(现场局面的可用性必须要与我在下面要谈的整体研究策略有关联。)

(ii)布福德·容克(*Buford Junker*)为参与式观察研究描绘出四种“主控角色”(master roles)的形象,而雷蒙德·金(*Raymond Gold, 1958*)对这些角色作了清晰的概括。纯粹的观察者(*pure ob-*

server)置身局外,与观察对象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被动地记录场景。而作为参与者的观察者(*observer-as-participant*)与受访主体要进行短暂的接触,但是由于促成了一种更主动引发感情的、更灵活的谈话/关系,并让他的“采访”发展到不确定的程度,他就背离了“聚焦于访谈”(focussed interviewing)的规则。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participant-as-observer*)更大胆地投入到行动当中。研究者在某些共同的事业中与他的研究对象结合在一起,而且尽力让他们参与他的研究工作。这种角色的极端情况出现在正统社会人类学家的现场调查当中,受访谈者群体的规范、角色、信仰的整体框架限制了研究者的研究范围。可是,他必须与他的受访谈者们的“动机词汇”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避免自己失去对现场调查策略的控制。(阿尔伯特·赖斯 [Albert Reiss]1968年记述了一名在警察分局的观察者,他“入乡随俗”到这种程度,居然要求允许他殴打下一名被带进来审讯的黑人嫌疑犯。)而完全的参与者(*complete participant*)则是秘密的调查者,暗地里悄悄地观察和记录。这一角色伴随着一些重大的困难;而且它明显与另外一种研究模式——涉及从文化研究角度书写自我生活史——有重合的地方。

(iii)各种各样理论的、实践的和伦理的标准都会影响到主控角色的选择;但是一旦某种角色被选定,就要着手准备各种可以扮演这种角色的方式。这些都是从研究者根据他早期的“筹划”工作所构想的线人的类型而推断出来的。约翰·迪安等人(John Dean et al.,1967)提供的一种分类法包括:天真的线人(他会告诉你他所知道的一切,而不管这些信息是否有价值);政治上失意的人(在野的人);老手或内行;做苦工的人;神经质般渴望在谈话中被人赏识的人。能干的参与式观察研究者如果懂得角色扮演的基本原则,他就能够巧妙地影响每一类型的人对他自己的自我展现做出的回应(see E. Goffman 1959,1963 and 1969)。

(iv)必须测试一下各种装门面讲故事的战术:在与那些对主要访谈话题并不重要的受访谈者演练行动规则的时候,最好首先试用一下这些战术。在研究者从他进行互动的气氛中可以推断出在这些

演练中已经建立起“良好关系”的地方,他就会保留他的门面故事(例如:对他履历的种种描述)中那些看起来最能起到积极助推作用的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通情达理的基本能力”。

我们在上文中概述了进入阶段要用的一些技巧,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阶段引发的逻辑问题。这些问题源自“这种准入交易”(access bargain)存在的那种令人困惑的特征:当研究者诱导受访者容许他可以充分接近并探索自己感兴趣的现象的内在联系时,他是用来换取什么?此处面临的主要的实践困境如下:

“现场调查者需要创造那些能引人注目并向其他人披露信息的情境”(Schatzman, 1973),同时需要保留自身角色的不确定性,以便为进一步影响他人向他靠拢留有余地;如果研究者在后续阶段不受缚于这笔“准入交易”所产生的债务的话,那他怎么能够完成这笔关于准入的交易呢?

使得调查者能够走出这一困境的那些规则,是从符号互动论的知识宝库中汲取的。他必须说服他人进入角色扮演的行为,而他自己则在拉尔夫·特纳(Ralph Turner, 1962)所概括的角色发展的四个阶段当中承担角色扮演的任务。这需要致力于将“研究角色”从“生活角色”当中分离的工作,以便保证把自我脱离(ego-detachment)和手段(instrumentality)作为研究者最基本的意识模式:参见奥利森和惠特克的著作(Olesen and Whittaker, 1967)。他必须自由地调动他的自我展现,通过衣着和行为来暗示自己处在一种边缘的社会地位,介于政府公职人员与正式的亚文化群体成员之间(“研究生”通常表现得正好)。他必须指望通过交易在某个时候能进入一个阶段,常常要表现出对受访者感情的关心,以便受访者能逐渐放松对有关他们隐私事件的信息闭锁。最初可以被接受的那些限制条件,必须被理解为是在日后相对适合的时间还可以重新商议的(Schatzman, 1973)。实施这些规则所需要的逻辑技能,涉及一种开展零和游戏(zero-sum-game)的规则。内德·波斯基(Ned Polsky)承认他作为

一个社会学家所具备的职业技能和他所研究的台球厅赌徒的技能有相通的地方,尽管他强烈反对那种认为他沉浸于现场会使他变得更像一个骗子而不是社会学家的说法(Polsky, 1971:115 - 147)。

评 述

考虑到这些规则的来源,它们所暗示的对于能力状况的要求是相当明显的。在这里起主导作用的是工具实用主义。戈夫曼的拟剧理论(dramaturgical perspective)提醒研究者要做好完成角色的准备,要记住“暗室”和各种控制“舞台上”自我展示的策略(参看Messinger, 1962)。雪芙(Scheff)对于专业人员在与他们的当事人协商“关于现实的各种定义”时如何保持主动权的解释,揭示了权力与道德规则 and 认识论规则进行博弈时的针对性(Scheff, 1968)。但是,这些“背景的相关性”,显示出比喻(*metaphor*)对于我们形成对研究者在遵循规则过程中最看重什么——在实践和逻辑两个方面——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对于“进入现场的策略”的解释中,有两个比喻是相互冲突的。策略性互动的比喻(*strategic interaction metaphor*)提醒我们,受访者也有判断权和主动权(否则就不会有各种准入问题),而且他们在扑克牌游戏中凭借准入交涉里的应对策略也会赢几局;相似的情形也会出现在犯罪情景中,在那儿有相当多的恶行未被发现和“告破”。欧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讨论(1969)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条件使得倾向于一套知识-交易协定的一方持续获利,就像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通常在南美所做的那样;但是他的游戏-理论取向只考虑到要临时维持这“一连串的胜利”。另一个盈余分配的比喻(*surplus appropriation metaphor*)则更加完整地解释了如下问题:在一套包含了会面和交易的规范化管理系统中,一方如何可能在没有失败风险的情况下确保“剩余产品”的创造和完成。M.戈德利尔(M. Godelier, 1966)也揭示出,利维-施特劳斯对于通过原始居民的血缘关系制度交换妇女的分析,与马克思对于活的劳动力兑换死的工资-商品劳动的分析在形式上是何等的类似。研究者-受访者关系的确立和调动似乎具有相同的规则,这一规则说明了参与式观察法范式的方法学家为何对调查准入

问题投注了密切的关注；那些应对准入交易（如何从文化符号 / 商品的公平交易中获利）核心困境的规则，对于参与式观察法就像账目登记对于资本主义一样重要。我无意把这当作确定性的道德评判，因为我们很难看得见，人文科学中所有知识的渐进发展如何可以避免通过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交换”来建立自身。我的意思倒是要说，互动论的比喻并不能解释那种支持参与式观察性的准入-交易的深层程序；而且这种解释上的失败启示我们，参与式观察研究对其自身的实践怀有一种令人困惑的意识。

4 开发研究计划的策略

社会文化研究几乎没有什么普遍认可的公理或定理，也没有可用于检验诸多假设——这些假设声称能以库恩的方式解决各种未解理论“难题”——的标准规则。^①参与式观察法范式通过如下的断言来替换“正规科学”（normal science）的这种缺位：

①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1922-1996）对自然科学知识成果的阐释开启了这一事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事业被一套由公理、概念以及方法所构成的、人们一致同意的范式（Paradigm）所控制，这一范式规定了要研究什么以及如何研究。在“正规科学”的这些阶段里，范式的支持者们声称已经解决了有关世界是如何构成的一些关键问题，注意力已经集中到科学知识边缘的一些残留“难题”，在那里一些依据制度原则的实践研究还在继续。

在科学领域第一次转入“正规科学”之前，“前范式”（Pre-paradigm）之间存在着公开竞争，后者成为未来的职业科学家们最青睐的事情。如果我们想尝试把库恩的模型（很大程度上具有讽喻的成分）应用到社会科学里，我们就会将“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社会学当作第一流的“前范式”竞争者。预料到会胜利，自然主义者很可能会详细撰写他们的方法论手册，就像手册里提供了正规科学范式的原则一样。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库恩的论述揭穿了已确立的科学实践的权威性和传奇性：

“没有哪个正规科学的目标是要引发新的现象；实际上，那些不得其所的通常是看不见的。同样地，科学家们通常也不想发明新的理论，只是无法忍受别人发明的理论。相反，正规科学研究针对的是范式已经提供的有关那些现象和理论的接合。”

Kuhn, 1970: 24——原注1

(a)这种由各种貌似可信的、与数据相关的假设构成的看法,更适合于一组同步展现的和相互关联的假设,它比一丝不苟地检验现有观念更值得关注;

(b)通过共同收集、整理和分析定性数据而产生的假设,(在特定条件下)会被认为具有与科学证实过的假设一样高的中肯度和可信度。

基于这些前提,参与式观察法范式规定,系统阐述研究计划细节的场所应该是一场流动的宴会,而且无论如何,应该是一些进入研究道路的路径。只有当研究计划产生于对新的实证领域的探究,并且能够按照新出现的现场调查的洞见来进行自我调整的时候,我们才能获得对于研究现象真实性的自反性敏感(reflexive sensitivity)。因此,研究者在进入现场的最初几天必须做计划演练,以确定计划的决策:去哪里,找什么,与谁联系。格拉泽和施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8)认为,这些决策必须鼓励研究者不断寻找到一些合适的地点,并在此对一些范畴——这些范畴的先在定义框定了研究的主题——的特性和维度进行探究。一些范畴就将取自日常经验——例如乔克·扬(1972)所说的大麻搜捕(marijuana busts)——而其他一些范畴则是从科学话语中获取的(比如“集体臆想狂”[collective paranoia])。由制订的计划所控制的这个程序,被称之为理论抽样,它反过来促成了分析阶段的持续比较法。由于设计、数据收集、编码和分析都是相互渗透的,因此这些从各种事件、个人描述或记录中抽取的新的比较样本,在对于逐步构建起来的分析所做的详细阐述需要确证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被记入这种设计之中。

研究计划面临的主要困境是:

恪守某些敏感化的概念以及关于它们特性运转的直觉假设,决定着寻找参照数据的道路。研究者怎样才能避免用他最初进入现场那几天的感受让他自己确信:他的直觉正在引导他走上正确的轨道?

最初进入现场那几天的一般表象,是它们提供了各种文化冲击并激发了强烈的现象学意识,因此研究者几乎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引,去洞察关于各种互动-事件的一些常识性的或圈内人的解释,并且提出一些关于事情到底如何发生的令人烦心的问题。在一篇经典的文章中,布兰奇·吉尔(Blanch Geer,1964)向读者展示了她最初三周(与她的一些同事)所写的现场笔记,该笔记源自一项用参与式观察法对美国堪萨斯(Kansas)州立大学学生生活开展的研究。该项目始于一种假设,这种假设认为中西部的中产阶级校园应该是由这样的社会传统主导的,即认为大学对于年轻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必要的精神归靠之地,他们只有在静下心来工作的时候才会认真地对待日常生活,但是访谈、参与式观察的记录以及新生联盟的正式简报,却引发了对于在何种程度上认真对待在大学求学这件事的讨论:学业成绩方面的竞争已经成了每一类学生要考虑和讨论的中心话题。这一洞察连同对于方法的那些更进一步的思考(后者形成于忙乱的最初阶段之后的“分析体整阶段”),为其余的研究确定了研究方向。这项研究后来变成了一种对于大学校内学术分层制度及其影响的批判性解释,得出的结论是一项政策建议:全面取消成绩评定制度。

看来应对我们所处困境的基本规则应该是:(1)通常把进入现场最初几天的体验用作一种资源,来精细地检查那些关于研究问题本身的初步构想,以及数据的本质和可能来源;(2)通过发展进一步的假设,采用理论采样的手段以确保概念范畴与其显示的经验形式的证据能够吻合,并且与其相关范畴能够吻合。明确的编码是第二个步骤的重要辅助手段。当研究者发现了他的概念的新特质,发现了现象之间的新联系的时候,他就完成了他的现场记录,并为作进一步的抽样而去仔细检查那些观察笔记和理论摘记。因此,笔记中的条目就会被编码和再编码,整个编码机制就会随着新出现的分析框架而发展:显而易见最重要的工作,是让最初阶段所做的笔记能够得到充分的扩展以便进行更精密的编码。

评 述

但是,格拉泽与施特劳斯(1968)、贝克尔(1958)和吉尔(1964)的阐述留下了一些疑问,比如:研究计划促成了对最初研究问题领域的理论观点的改变,在这方面到底受到过多大程度的批评?大多数给亚文化群体越轨行为贴标签的研究,都没有超越贝克尔早期的“道德倡导者”(moral entrepreneur)观念,都没有找到对这些标签的来源的解释,更不用说能提出解释了。设计研究计划和持续比较的任务,可能被参与式研究范式的实践者暗中理解为会严格受限于一相沿成习的观点和意象体系。当然,一旦吉尔对于学生的研究的重点转到了学业和成绩评定方面,就会产生一种非常有预见性的分析。在这种分析中,只是从一种允许学者保持首创精神的制度内部关于任务和标准的协商这一角度,来解释教师给学生贴标签的行为;而没有涉及社会学关于学术知识和知识体验的一些更重大的问题。

5 管理现场调查过程

采用参与式观察法进行现场调查,对研究者提出了以下三方面的要求:

(1)研究者必须保持视野的敏感性和洞察力的可达性,坚决反对将已确立的参与式观察研究惯例化(routinise)的倾向。他只有通过投注孩子般“瞪大眼睛”式的关注;或者通过不断变化观察地点;或者通过抓住每一个机会去想象性地“扮演”自己所遇到的他者“角色”,才可以做到这一点。

(2)研究者必须不断夯实他的“观察基础”,以观察自己正致力于研究的问题,发现其内部更多的或与之相关的信息。他可以通过定期思考以下几个问题来做到这一点:(a)是否需要通过花更多时间去寻找概念的特性来充实这些概念;(b)是否遇到了某个人或某个情境,因此需要追溯到以前的一些观察;(c)研究者在用那种有助于描绘各种事件特征的、恰当的理论视角考察这些事

件时,是否具有清晰的基本原理;(d)是否需要通过变换参与式观察的重点和目标来加强“理论的引导”;(e)是否需要迅速转向对假设或模式的精确阐述,然后终止其他有助于系统地寻找确凿证据(和可能的驳斥性证据)的工作。沙茨曼(1973:53-58)清晰地说明了在现场调查的各个阶段这些观察基点从一个转换到另一个的原因;但他指出,知道在何时转换强调点最终事关研究者的判断力。

(3)研究者必须找到能够实现自己作为基本主控角色的“策略”。例如:在既是参与者又是观察者的角色中,研究者可以选择“有限的互动”,耐心等待被邀请参与更深入的交谈活动;或者可以使用他的“被接纳的”地位让受访者参与一场受到严格控制的采访。尝试哪一种策略则取决于研究者根据总体计划对一种情境的潜在可能性做出的判断:唐纳德·罗伊(Donald Roy, 1970)描述了他在对工会招募活动进行的参与式观察研究当中,是如何从一种策略转换到另一种策略的。

尽管有经验的现场调查者对何时变换节奏、何时调动自身的想象力以便把迥然不同的观察研究碎片整合到一起有自觉的意识,但是所有的现场调查管理工作仍然面临着一个主要的困境:

当研究者被封闭在自己的研究策略和观点当中时,他将如何检验和判断自己的“局部模型”或假设的正确性和原创性?

这一困境暗示了很多的意义。观察者的在场是对受访者产生的若干种干扰因素之一:观察者(在受访者们看来)可以被当成有用的小配角;也可能被等同于不能信任的讨厌鬼(但因此适用于那些孤独的、不友好的人);也可能成为被动的刺激因素促使先前受抑制的对话进行下去;也可能充当了一个干涉者的角色,引发新的行动;还可能成为引发异议和冲突的风暴中心,对研究的科学目标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些教科书几乎没有提供可以处理这些曾经出现的各种“干扰”的建议:

它们仅仅要求现场调查者应该自己承担他们所做事物的后果。“关于改变和不改变的悖论问题……不应该预先占据我们或我们的模范现场调查者的全部注意力。现场调查者……除了像他们被期待的那样行动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诉求……”(Schatzman, 1973:64)。但是即使这是真的,研究者也必须用自身对现场不确定性因素的了解,来指导其关于研究者对行动现场的影响所做的内部预测,既要判断事情在未受干扰的情况下会是怎样的,而且要使用自己的干涉所带来的观察成果,似乎把它们当成了实验研究的数据。这种预测的逻辑对于数据收集、编码和分析过程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自从韦伯探讨了历史学家们可能用来评价马拉松战役影响的逻辑之后,在这一方法论领域似乎未取得什么进步(Weber, 1949:171 - 174)。

在记录实地观察和反思以及整理现场调查笔记方面,运用了一些程序性的方法,后者明确被用来与现场调查的解释喧嚣保持某种批判性的距离。现场调查笔记是一种媒介,包含和分离的辩证法借助它得以保持下去。笔记记得越多,通过随后对观察结果和编码结果进行的审视和检查所获得的分离的机会也就越多。在一个集体项目中,对日常的现场调查笔记的交流和批判构成了研究策略发展的主要基础。广泛的实地调研总是被“方法论的暂时休整”所打断,在此期间研究者参加会议,交换和讨论“分析备忘录”,回顾能够将他们的假设和数据-模式联系起来的其他程序。沙兹曼举例说明了三种现场调查笔记——观察型、方法论型和理论型——的不同观点,并揭示了每一种是如何有助于随后的分析工作的。格拉泽和施特劳斯(1975)最近发表了关于如何写分析备忘录及如何利用备忘录来重塑现场调查活动的详细指导说明。

评 述

对现场经验进行“客观化”的过程中存在的症结,就是要解构在对现场会面的综合磋商中所实现的那种角色扮演和意义交换。研究者必须从这些经验中提炼出关于社会过程的知识(或者关于如何表达它们外观形式的知识)。研究者往往以社会科学家的角色和严格的措辞,将

他们与受访者交往中获得的信息“包装起来”做到这一点。沙茨曼说：“这种包装是精心准备好的，便于日后一眼就能搜索出来并理解它……记录者训练自己用信息单元来思考，而不论它们的内容是什么”。（1973）尽管记录、编码和搜索的逻辑仍然未被详尽说明，但我们现在还是可以看出它的基本运转条件：现场见面具有的这种模棱两可的、发人深思的特征，必须被归纳到那些带有具体内容的、对研究计划的持续比较有方向性意义的信息单位当中去。在参与式观察法范式开展的研究当中，这就是米德和杜威的那种不受拘束的人本实用主义不得不跟19世纪自然科学传统的理性主义算账的地方。正是在这一点上，归纳推理的逻辑得到了巩固以切合J.S. 米尔（J.S. Mill）所说的假设-演绎推论法的标准，这一标准牢牢扎根于演绎推理演示和实验证明的各个步骤当中（见Willer & Willer, 1973: ch.4）。

6 分析定性数据

分析总是涉及对一些命题的重新组织，而这些命题本身已经包含了对各种社会现实形式的解释和重新呈现（re-presentation）；因为，在社会文化研究领域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和扩展那些带比喻色彩的表述“观察方式”的普遍说法。那么，我们在这里探讨的是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是，一种用于分析参与式观察数据的独特策略，是否有可能产生出一种理论解释，这种解释可为读者提供关于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或受其潜在影响的关系的看法——在这些文化形式当中，比喻性的话语要么被听取了，要么被有把握地挪用到严格的推理语言中去了。我们在第一部分确认的四种分析推理类型，提供了对这个问题的三种不同的回答。第一，赏识性的理解明显是为了保存文化形式的比喻结构原有的品质，尽可能地反映主体实践这些文化形式的方式。分析法在这里也是必要的，但是它把自己的目标限制到构建数据模型的方面，这使得研究者通过参与式观察所得的材料可以被展现在一种具有民族志说服力的形式当中：受访者（host）文化（或亚文化）中的比喻和形象被重新归类，但依然未被编码。第二，研究者可能试图将一个主控者的喻象（master metaphor）强加在他的材料固有的那些事物身上：

这就是**构建模型**的策略，分析归纳法和持续比较法都附属于这种策略。分析归纳法致力于构建一种封闭的、单一的模型，用它解释一种文化现象据称具有的普遍特征，这种努力使它的策略成为一种我在此暂不考虑的极限状态（根据特纳1953年的评论）。我要考察的是持续比较法的策略，想说明这种模型构建过程的主要步骤，并分析和评价它所产生的“实据理论”模型与这一模型的“解释范围”之间的任意的关系。第三，我会指出对萨特的渐进-回溯法的一种可能的解释，需要寻找结构的/历史的中介，一种能够帮助我们超越持续比较法内在矛盾的分析模式。

以上四种分析策略都面临着同样的主要困境；尽管第一种否认它的前提，而且拒绝承认与社会现实中无法观察的因素的关系（见H. S. Becker, 1971:v-vi）。这一困境如下：

假定分析者必须把观察报告归入到那些对文化形式内在关系提供理论解释的前置命题(prepositions)之内，那么他将如何保留和显示他对于他的数据里刻画的社会情境的那些具体特性的理解？

a. 持续比较法

格拉泽和施特劳斯在196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到了他们的策略(Glaser,1965)。该文强调了研究可以穿越群体比较(这些群体是专门选择出来的，旨在为构建特定的模型提供范畴)的速度，强调了持续的比较给那些假设——产生于对数据的共同收集、编码和分析——提供的“可靠性”。他们后来的著作(1968)对有关群体和事件进行理论抽样的合理性提出了更充分的解释；而且试图整理分析阶段的主要任务。他们最近发表的后续文章(1975)，又揭示了现场调查和备忘录撰写的实际操作是如何被它们的分析策略提出的各种要求所支配的。在他们的解释中，有两个关键术语：“特性”和“联系”。在最初进行现场关注的几天当中，对于敏感性概念的研究会引导研究者去假定某些**范畴**的预期存在状态。这些范畴是社会文化的综合表征，后者的

特性必须通过比较调查来发现；只有当一组被认为与某一范畴相关的材料中所有的零星数据得到分类和相互关联之时，研究者才可以想当然地认为：他的各种范畴凭借自身的特性实现了“理论饱和”(theoretical saturation)。在寻找特性的过程中，研究者提出各种假设，以期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主题联系，这种联系能够帮助他去构建一种针对所研究现象的社会学模型。因此，对持续-比较探索所开放的空间就会逐渐变小甚至关闭了；正如沙兹曼(1973:111)所说：“一旦分析者获得了一种关键的联系(Key Linkage)——也就是说，一个比喻、模型、总体方案、统率性的模式或故事线索——他就会对他所要应对的(人或者事件的)类别更为挑剔。”最终，所有可保留的假设都将在这个比喻或模型里以分层方式被组织起来，并且所谓的范畴的理论饱和也将会得到一种对于所获数据模型的饱和的补充。由此产生的“有实据的实质理论”(grounded substantive theory)就会被染上数据的色彩，后者的组合明确地表达出诸多建筑学的音调，后者包含了一种数据对概念、概念对模型的双重符合。四个分析阶段带领我们从早期的现场研究走向模型完备化：对事件进行比较是一种阐明和详述范畴的手段；将已经发现的特性融入范畴的定义里(从分析归纳法中借来的一个子程序)；通过联系和合并假设来划定理论界限以降低复杂性；在最后从现场调查撤出时，在记录中撰文突出有完善组织的理论/模型，以期在美学上和社会学上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格拉泽和施特劳斯通过考察护士职业亚文化群体对于濒死病人护理过程中的各种意外事件的处理方式，就研究程序的实际操作过程提供了一个步步推进的、有用的例证(1968:105 - 114)。

评 述

根据持续比较法的各种规则而对职业亚文化群或有组织的私生活(organisational underlife)所做的各种研究，均显示出明显的说服力和可靠性(参见，例如；Strauss et al., 1964; Glaser and Strauss, 1965; Becker et al., 1968)。但这不过是回避了如下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构成了对于我们在分析策略中所面临困境的一次成功的协调。我相信

可靠性的取得取决于理论知识批评所需的理性标准的简化。格拉泽和施特劳斯断言：

逐步进行的系统分析相当明确地允许现场调查者去给出指导,以便其他的局外人在观察到的生活领域和行动领域里能够勉强生活……人们依据自己对于陌生社群(alien societies)的解释,往往可以成功地抵押他们的金钱、名誉甚至生命,也能抵押他人的命运。现场调查者所做的事情,就是要使反思者的这种**常规策略**转变成成功的**研究策略**。

(1968:226-227)

这种关于模型构建的规范效用的实用观念认为,实据理论将得到那些擅长编码(既带有模型又带有模型的分析子程序)的读者的关注:这种断定了“认知地图”的推测,自身并不适于接受批评性的考查。这样,就避开了关于理性论证和论据的各种准则:为了理解模型,读者就必须把自己限制在模型阐述的范围之内。(此外,巴里·海因兹[Barry Hindess]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1973b:242-247],社会学的模型构建无法通过一套严谨的语义规则与普通的社会理论建立起联系,正如数学模型可以与它们的形式系统进行对比一样:实据理论更多事关风格的问题而不是语法的问题。)持续比较法自我确认的特权能够得以保持,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把其阐释范围分配到实体问题领域来实现的,而这些实体问题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受制于研究者调动整个社会学市场来观察的某种特定现象。科林·弗莱彻(1974)指出,“面向每一个人类学家自身部族”的传统已经损害了支持真正的批判性推理的能力。他本应该被贝克尔等人(1968)在中西部的一所大学所做的关于学业评定的研究引作证据——这项研究最终建议废除整个评分体系。他们呼吁终止一种**局外性的贴标签**的实践,但这种诉求表达得太过抽象,以至于不会产生丝毫的社会影响,不可能被解释成一种对文化分类斗争战场的真正的政治干预。

b. 探寻结构的/历史的中介

萨特的策略尝试了一条往返的通道：从关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假定理论，到经过协商的、个人在其中可以获得和感受自身体验的文化连接点的层面，然后再返回到总体状态，并在此时带来某种批判原初阐述的方法。这种策略能否充分应对我们面临的困境？对于这一问题的任何评判，都必须评估研究者在分析中对于回溯和渐进这两个环节的处理情况。对于研究主题的构想和简明阐述从一开始就认为，现象应该被置于一种关于整个社会中心结构和动力系统的、明确的观念之中（回溯环节）。对研究主题的探究则需要一种持续的详尽描述，需要重新加工那些根据经验摹写的各种过程之间的联系，这些过程隶属于人生经历、家庭和邻里环境、社区、经济和民族国家的各个“层面”（渐进环节）。这些经验性的联系通常意味着，这些运转于社会实体范围（展现出对这些层面的歪曲）之中的程序存在，就如同各种“越轨违法的”青年风格在某种强化治安的话语当中存在的情形。在对“行凶抢劫现象”的有关材料进行分析时，就遇到了这一点（参见Clarke et al., 1975）。在这里，各种遵照参与观察范式的方法——通过加入一个社区建议和行动中心来获得对于当地社区的了解；对报纸上的故事和其他档案的分析；干预上诉法院的活动——可能被视为渐进-回溯研究当中所用的一种“必要的抑制剂”（necessary poison），该研究旨在揭露和重组战后英国社会公认的那种关于垄断资本主义霸权的解释，为的是适应一段新的充满对抗的社会史——从60年代中期的危机向70年代中期的危机这段时间里，宣扬法治与“越轨违法”在意识形态舞台和政治舞台上一直处于对抗状态。

当大量丰富的材料突然变为一套新的中介要素的陪衬之时，一种研究框架的很多内容就会遭到质疑，而且那种在研究策略失效之前想完成一种新的理论整体化的努力，也会充满风险。这种“解构性的”契机引发一些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斯图亚特·霍尔最近对马克思的方法观的探讨，清楚地揭示了这些问题的重心之所在：历史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在研究整体社会形态时在方法上存在激烈的冲突（Hall, 1974b: 150-160）。首先，一个特定社会进程与另一个进程之间的关系，

被认为与一种承载这两个进程的关于整体历史运动的起源性的解释有关联:在我们的例子中,对“行凶抢劫”事件及其所引发的反应的引申陈述,就被置于对英国20世纪60年代后期“共识”意识形态和政治不断加深的危机的阐述当中。其次,对于中介的揭示带来了一种对于“结构上占主导地位的”矛盾复合体的结构性解释的详细阐述:司法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意识形态层面被显现为与青年文化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交叉状态,以便“在结构上”形成对彼此话语的相互干涉。那么,核心的问题就是找到一种记录青年文化(等等)的意识形态实践的方法,引向一种对于有其自身矛盾限定的矛盾复合体的“结构效能”(structural effectivity)的理解,同时开辟出一条确认历史运动进程——这种效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各种要素并发的环节(conjunctural moment)——的道路。

评 述

萨特对他的分析策略的阐述,强调需要将历史运动的特性描述置于统领地位,以便在对文化现象的解释中顾及一种具有真正批判力的整体化思考(genuinely critical totalisation),并去揭示那些可以超越现状的可能性。但是,他在如何通过程序和理论控制对这些解释进行建构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表述得相当含糊。这些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逻辑问题,尽管逻辑原则作为一个有关社会和文化形式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通过这些社会和文化形式,我们能够理解阶级社会最深层的那些结构——生产方式、处于领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及其结合的常备节目,政治权力“模式”——之间的运转关系。“行凶抢劫现象”研究项目以及“亚文化研究小组”通常所做的研究,还有待去寻找一些可以将意识形态-批判扎根于一种充分的经济-批判成果之中的方法(以此来改造两者);甚至,还必须使这种完整的解释进入到对于各种政治局势的更深层的分析当中——这种分析能够对照那些可以真正介入群体(最终是阶级同盟)之间的现实斗争的可能性。在此期间,当专业的社会学家试图“发现”一种对当地的亚文化群体和越轨者进行严格界定的实据理论的时候,即使用历史类推和比喻来处理这

些维度,总比不考虑它们要好一些。

7 结论

像一些指导方法论的文本中所描述的那样,我指明了“参与式观察法范式”的调查逻辑存在的一些缺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缺陷正好暴露在这些文本为应对程序的、理论的困境而提出规则的地方。我曾经说过,对于文化形态的批判性研究或许可以有效地采纳萨特渐进-回溯法的一种形式——为了用一种包括历史方法和结构方法的更完整的综合形式来替代萨特那种不精确的,甚至有点空想色彩的历史相对论,需要对萨特所说的方法进行改造。但是,我在这里还不能对这种研究方法提出一种可以超越“亚文化研究小组”近年研究成果的解释,这些成果的水平参差不齐,本书前面“第一部分”对此都有记录。此处最要害的地方不是社会学调查的通用“逻辑”,而是各种不同方法的那些特定的逻辑,正是凭借这些不同的方法,批判性的文化研究才能抓住社会历史构成中的各种不同因素与这些因素的接合(社会历史构成依靠这种接合获得其复杂结构的确定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发展研究方法的工作,不可能在抽象观念中取得推进,但却可以在以下的情形中取得成效:这就是,我们要找到一些能够充分应对我们社会中的矛盾所造成的诸多理论和政治问题并能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方法。^①

(王蕙译)

① 我是通过伯明翰大学吉·巴代莫斯(Gi Baldamus)教授的研究才接触到社会学方法的调查逻辑这个论题的,他的研究指明了很多社会学实践在逻辑的严谨与理论的输入之间存在的矛盾。这篇文章还得益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雷切尔·鲍威尔(Rachel Powell)的很多批评和建议。

参考书目

- Abrams, M. 1959. *The Teenage Consumer*. London Press Exchange Ltd.
- Abrams, M. 1969. *Must Labour Lose?* Penguin Special.
- Addams, J. [1909] 1972. *The Spirit of Youth and the City Street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Ahiram, E. 1966.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Trinidad-Tobago and Comparison with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Jamaic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 vol.15. Institut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 Akers, R.L. 1967. 'Problem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Social Definitions and Behaviour.' *Social Forces*, 46.
- Althusser, L. 1969. *For Marx*. Allen Lane, Penguin Press.
- Althusser, L.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Left Books.
- Anderson, P. 1964.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New Left Review*, 23. Reprinted in P. Anderson and R. Blackburn, eds. (1965).
- Anderson, P. 1965a. 'The Left and the 50's'. *New Left Review*, 29.
- Anderson, P. 1965b. 'Socialism and Pseudo-Empiricism.' *New Left Review*, 35.
- Anderson, P. and Blackburn, R. (eds.) 1965. *Towards Socialism*. Fontana.
- Andreski, S. (ed.) 1974. *The Essential Comte*. Croom Helm.
- Armistead, N. (ed.) 1974. *Reconstructing Social Psychology*. Penguin.
- Arnold, D.O. (ed.) 1970. *The Sociology of Sub-Cultures*. Glendessary Press.
- Auld, J. 1973. 'Cannabis: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Use' *New Society* (6th September).
- Auletta, K. 1982. *The Underclass*. Random House.
- Back, L. 1996. *New Ethnicities and Urban Culture*. UCL Press.
- Back, L., Cohen, P. and Keith, M. 1999. 'Between Home and Belonging: Critical Ethnographies of Race, Place and Identity.' *Finding the Way Home Working Paper 2*. Centre for New Ethnicities Research, University of East London.
- Bacrach, P. and Baratz, M. 1962. 'The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56.
- Baden-Powell, R. [1908] 1930. *Scouting for Boys*. C. Arthur Pearson Ltd.
- Bailey, R. 1973. *The Squatters*. Penguin.
- Bailey, R. and Young, J. (eds.) 1973. *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 in Britain*. Saxon

- House.
- Banton, M. 1967. 'Integration into what Society?' *New Society* (9th November).
- Barker, P. and Little, A. 1964. 'The Margate Offenders: a Survey.' *New Society* (30th July). Reprinted in T. Raison, ed. (1966).
- Barthes, R. 1971. 'Rhetoric of The Im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No.1 (Spring). CCC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 Becker, H.S. 1958. 'Problems of Inference and Proof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3 (December).
- Becker, H.S. 1963.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Free Press.
- Becker, H.S. 1967. 'Whose side are we on?' *Social Problems*, 14. Reprinted in J. D. Douglas, ed. (1972).
- Becker, H.S. 1971. *Sociological Work: Method and Substance*. Allen Lane.
- Becker, H.S. (ed.) 1964. *The Other Side: Perspectives on Deviance*. Free Press.
- S. and Geer, B. 1957.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ing: a Comparison.' *Human Organisation*, 16, 3. Reprinted in G. J. McCall and J. L. Simmons, eds. (1969).
- Becker, H.S., Geer, B. and Hughes, E. C. 1968. *Making the Grade*. John Wiley.
- Becker, H.S., Geer, B., Hughes, E. C. and Strauss, A. L. 1961. *Boys in Whit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cker, H.S., Geer, B., Riesman, D. and Weiss, R. S. (eds.) 1968. *Institutions and the Person*. Aldine.
- Bennett, A. 1999. 'Subcultures or Neo-Tribes?' *Sociology* 33(3): 599-617.
- Berger, B.M., Hackett, B.M. and Millar, R.M. 1972. 'Childrearing Practices in the Communal Family'. In H. P. Dreitzel, ed. (1972).
- Berry, Lynda. 1974. 'Women in Society - I. A Discussion on Female Violence.' *The Listener* (7th November)
- Beynon, H. 1973. *Working For Ford*. Penguin.
- Blackburn, R. (ed.) 1972. *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 Readings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Fontana.
- Blackburn, R. and Cockburn, P. (eds.) 1969. *Student Power*. Penguin.
- Bloch, E. 1970. *A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 Herder and Herder.
- Bloch, E. 1971. *Man on his own*. Herder and Herder.
- Blumer, H. 1954. 'What is Wrong with Social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 Reprinted in N. K. Denzin, ed. (1970).
- Blumer, H. 1956. 'Sociological Analysis and the Variab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1. Reprinted in P.F. Lazarsfeld et al., eds. (1972).
- Blumer, H.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rentice-Hall.
- Bobbitt, P. 2002. *The Shield of Achilles*. Penguin.
- Bogdanor, V. and Skidelsky, R. (eds.) 1970. *The Age of Affluence*. Macmillan Papermac.
- Bookchin, M. 1971. *Post-Scarcity Anarchism*. Ramparts Press.
- Booker, C. 1969. *The Neophiliacs: a Study of the Revolution in the English in the Fifties and Sixties*. Collins.
- Bookhagen, C., Hemmer, E., Raspe, J. and Schultz, E. 1973. 'Kommune 2: Childrearing in the Commune.' In H. P. Dreitzel, ed. (1973).
- Boyd, J. 1973. 'Discussion contribution on Trends in Youth Culture'. *Marxism Today* (December).
- Brake, M. 1973. 'Cultural Revolution or Alternative Delinquency.' In R. Bailey and J. Young, eds. (1973).
- Bruyn, S. 1966. *The Human Perspective in Sociology*. Prentice-Hall.
- Buff, Stephen. 1970. 'Greasers, Dupers and Hippies: Three responses to the Adult World.' In L.K. Howe, ed. (1970).

- Campbell, A. 1986. *The Girls in the Gang*. Blackwell.
- Carpenter, M. [1851] 1968. *Reformatory Schools for the Children of the Dangerous and Perishing Classes and Juvenile Offenders*. Woburn Press of London.
- Cashmore, E. and McLaughlin, E. (eds.) 1991. *Out of Order?* Routledge.
- Chamberlain, C. and Moorhouse, H. 1974. 'Lower Class Attitudes to The British Political System'. *Sociological Review*, 22, No.4 NS (November).
- Chamber, I. 1974. 'Roland Barthes: Structuralism/semiotics.'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No.6 (Autumn). CCC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 Chambers, I. 1985. *Urban Rhythms*. Macmillan.
- Clarke, G. [1981] 2005. 'Defending Ski-Jumpers'. In K. Gelder, ed. (2005).
- Clarke, J. 1973. 'Skinheads and Youth Culture'. *Stencilled Paper*, No.23, CCC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 Clarke, J. 1974. 'Reconceptualising Youth Culture.' Unpublished MA Thesis, CCCS, Birmingham University.
- Clarke, J., Critcher, C., Hall, S., Jefferson, T. and Roberts, B. 1975. 'Mugging and Law'n' Order.' Paper presented at National Deviancy Conference, University College, Cardiff. (April.) Also available as CCCS Stencilled Paper No. 35.
- Clarke, J., Hebdige, D. & Jefferson, T. 1974. 'British Youth Cultures 1950-1970'. *In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Annali, Sezione Germanica, Anglistica XVII* (i) and (ii). Also available as CCCS *Stencilled Papers*, Nos. 14, 22, 20 and 23.
- Clarke, J. and Jefferson, T. 1974. 'Working Class Youth Cultures.' CCCS *Stencilled Paper*, No. 18. Reprinted in G. Mungham and G. Pearson, eds. (1976).
- Cleaver, E. 1970. *Soul on Ice*. Panther.
- Coward, R. and Ohlin, L. 1960. *Delinquency and Opportunity: A Theory of Delinquent Gangs*. Free Press.
- Cohen, A. 1955. *Delinquent Boys: The Culture of The Gang*. Free Press.
- Cohen, P. 1972. 'Sub-Cultural Conflict and Working Class Community'.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No.2 (Spring). CCC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 Cohen, S. 1973.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Paladin.
- Cohen, S. 1974. 'Criminology and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in Britain.' In P. Rock and M. McIntosh, eds. (1974).
- Cohen, S. [1980] 2005. 'Symbols of Trouble.' In K. Gelder, ed. (2005).
- Cohen, S. (ed.) 1971. *Images of Deviance*. Penguin.
- Cohn, N. 1970. *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ium*. Paladin.
- Coleman, A. 1961. *The Adolescent Society*. Free Press.
- Collison, M. 1996. 'In Search of the High Life: Drugs, Crime, Masculinity and Consumption.'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6(3): 428-44.
- Connell, R. W. 1987. *Gender and Power*. Polity.
- Connell, R. W. 1995. *Masculinities*. Polity.
- Cooper, D. 1967. *Psychiatry and Anti-Psychiatry*. Paladin.
- Cooper, D. 1972. *The Death of the Family*. Pelican.
- Cooper, D. 1974. *The Grammar of Living*. Allen Lane.
- Corrigan, P. 1979. *The Smash Street Kids*. Macmillan.
- Cousins, J. and Brown, R. 1972. 'Patterns of Paradox: Shipbuilding Workers' Images of Society.' Paper presented to SSRC Conference on the Occupational Community of the Traditional Worker, University of Durham.
- Coward, R. 1977. 'Class, "Culture" and the Social Formation.' *Screen* 18 (1): 75-105.
- Critcher, C. 1975. 'Football Since the War: a Study in Social Change and Popular Culture.' CCCS, *Stencilled Paper*, No. 29,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 Dahrendorf, R. 1985. *Law and Order*. The Hamlyn Lectures, Thirty Seventh Series. Stevens & Sons.

- Daniel, S. and McGuire, P. (eds.) 1972. *The Paint House*. Penguin.
- Davis, F. 1970. 'Focus on the Flower Children: why all of us may be Hippies some day.' In J. Douglas, ed. (1970).
- Dean, John P. et al. 1967.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ing'. In John Doby, ed. (1967).
- Denzin, N.K. 1970. *The Research Act in Sociology*. Butterworths.
- Denzin, N.K. 1971. 'The Logic of Naturalistic Enquiry'. *Social Forces*, L.2.
- Denzin, N.K. (ed.) 1970. *Sociological Methods: a Sourcebook*. Butterworths.
- Dewey, J. 1938. *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Dobey, John (ed.) 1967.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Research*. Meredith Publishing Company.
- Dorn, N. and South, N. [1983] 1999. 'Youth, the Family and the Regulation of the "Informal".' In N. South, ed. (1999).
- Douglas, J.D. (ed.) 1970. *Observations of Deviance*. Random House.
- Douglas, J.D. (ed.) 1972. *The Relevance of Sociology*. Appleton-Century-Crofts.
- Downes, D. 1966. *The Delinquent Soluti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Doxey, G.V. 1969. *Survey of the Jamaican Economy* (Govt. Report)
- Dreitzel, H.P. (ed.) 1972. *Recent Sociology No.4: Family, Marriage, and the Struggle of the Sexes*. Collier-Macmillan.
- Dreitzel, H.P. (ed.) 1973. *Recent Sociology No.5: Childhood and Socialization*. Collier-Macmillan.
- Dunning, E. (ed.) 1971. *The Sociology of Sport: a Selection of Readings*. Cass.
- Easthope, G. 1974. *History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Longman.
- Eco, U. 1972. 'Toward a Semiotic Inquiry into the Television Mess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3: 103-21.
- Eisen, J. (ed.) 1970. *Altamont*. Avon Books.
- Epstein, J.S. (ed.) 1998. *Youth Culture: Identity in a Postmodern World*. Balckwell.
- Erikson, K. 1962. 'Notes o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Social Problems*, 9 (Spring). Reprinted in H.S. Becker, ed. (1964).
- Erikson, K. 1966. *Wayward Puritans*. John Wiley.
- Eve, M. and Musson, D. (eds.) 1982.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82*. Merlin Press.
- Faris, R.E. 1967. *Chicago Sociology: 1920-1932*.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letcher, C.L. 1966. 'Beats and Gangs on Merseyside.' In T. Raison, ed. (1966).
- Fletcher, C.L. 1974. *Beneath the Surface*.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Foster, J. 1974. *Class Struggle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 Francis, O.C. 1963. *The People of Modern Jamaica*.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Kingston, Jamaica.
- Frith, S. 1976. 'Slade: Cum on Feel the Noize!' In M. Gold, ed. (1976).
- Frith, S. 1977. 'Socialisation and Rational Schooling: Elementary Education in Leeds, 1800-1870.' In P. McCann, ed. (1977).
- Fyvel, T.R. 1963. *The Insecure Offenders*. Chatto and Windus.
- Gans, H. 1963. *The Urban Villagers*. Free Press.
- Gans, H. 1968. 'The Participant Observer as a Human Being: Observations on the Personal Aspects of Fieldwork.' In H.S. Becker et al. eds. (1968).
- Geer, B. 1964. 'First Days in the Field'. In P. Hammond, ed. (1964). Reprinted in G.J. McCall and J.L. Simmons, eds. (1969).
- Geer, B. 1970. 'Studying a College'. In R. Habenstein, ed. (1970).
-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Hutchinson.
- Gelder, K. (ed.) 2005. *The Subcultures Reader*, 2nd edn. Routledge.
- Gelder, K. and Thornton, S. (eds.) 1997. *The Subcultures Reader*. Routledge.
- Gelsthorpe, L. R. (ed.) 1992. *Ethnic Minority Group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Cropwood Conference Series No 21.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 Gibbs, J. 1966. 'Conceptions of Deviant Behavior: the old and the New.'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9 (Spring).
- Gillis, John R. 1974. *Youth and History: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European Age Relations 1770 - Present*. Academic Press.
- Gillman, P. 1973. 'I Blame England.' *Sunday Times Magazine* (30th September).
- Gilroy, P. 1982. 'The Myth of Black Criminality.' In M. Eve and D. Musson, eds. (1982)
- Gilroy, P. 1987. '*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 Unwin Hyman.
- Gilroy, P. 1997. "'After the Love has Gone": Bio-politics and Etho-poetics in the Black Public Sphere.' In A. McRobbie, ed. (1997).
- Gilroy, P. 2000. *Between Camps*. Penguin.
- Glaser, B. 1965. 'The 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 of Qualitative Analysis.' *Social Problems*, Vol.12. Reprinted in G.J. McCall and J.L. Simmons, eds. (1969).
- Glaser, B. and Strauss, A. 1965. *Awareness of Dying*. Aldine.
- Glaser, B. and Strauss, A. 1968.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 Glaser, B. and Strauss, A. 1975. *Theoretical Sampling*. Aldine.
- Glyn, A. and Sutcliffe, B. 1972. *British Capitalism, Workers, and the Profit Squeeze*. Penguin.
- Godelier, M. 1972.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Capital*'. In R. Blackburn, ed. (1972).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Doubleday. (Penguin edition, 1971.)
- Goffman, E. 1961. *Asylums*. Doubleday. (Penguin edition, 1968.)
- Goffman, E. 1963. *Behaviour in Public Places*. Free Press.
- Goffman, E. 1968. *Stigma*. Penguin.
- Goffman, E. 1969. *Strategic Interaction*. Basil Blackwell.
- Gold, M. (ed.) 1976. *Rock on the Road*. Futura.
- Gold, R. 1958. 'Roles in Sociological Field Observations.' *Social Forces*, 36 (March). Reprinted in N. Denzin, ed. (1970).
- Goldthorpe, J.H. and Lockwood, D. 1963. 'Affluence and the British Class Structur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11, No.2.
- Goldthorpe, J.H., Lockwood, D., Bechhofer, F. and Platt, J. 1968. *The Affluent Worker: Industrial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ldthorpe, J.H., Lockwood, D., Bechhofer, F. and Platt, J. 1969. *The Affluent Worker in the Class Struc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rman, G. 1972. *Making Communes*. Whole Earth Tools.
- Gosling, R. 1962. *Sum Total*. Faber.
- Gottlieb, J. and Wald, G. 1994.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In A. Ross and T. Rose, eds. (1994).
- Gouldner, A. 1968. 'The Sociologist as Partisan: Sociology and the Welfare State.'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May). Reprinted in J.D. Douglas, ed. (1972).
-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awrence and Wishart.
- Griffin, C. 1984. *Typical Girls?* Routledge & Kegan Paul.
- Grossberg, L. 1997. 'Cultural Studies, Modern Logics and Globalisation.' In A. McRobbie, ed. (1997).
- Habenstein, R. (ed.) 1970. *Pathways to Data*. Aldine.
- Habermas, J. 1972.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Heinemann.
- Hall, S. 1973.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Media Discourse.' *Stencilled Paper*, No. 7, CCCS, Birmingham University.
- Hall, S. 1974a. 'Education and the Crisis of the Urban School.' In J. Raynor, ed. (1974).

- Hall, S. 1974b. 'Marx's Notes on Method.'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No.6 (Autumn), CCCS, Birmingham University.
- Hall, S. 1998. 'Aspiration and Attitude: Reflections on Black Culture in the Nineties.' *New Formations* 33.
- Hall, S. 2003. 'New Labour's Double-Shuffle.' *Soundings* 24: 10–24.
- Hall, S., Critcher, C., Jefferson, T., Clarke, J. and Roberts, B.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Macmillan.
- Hall, S. and Whannel, P. 1964. *The Popular Arts*. Hutchinson.
- Hall, Stanley. [1904] 1905. *Adolescence: its Psychology and its Relations to Physiology, Anthropology, Sociology, Sex, Crime, Religion and Education*. Sidney Appleton.
- Hamblett, C. and Deverson, J. 1964. *Generation X*. Tandem Books.
- Hammond, P. (ed.) 1964. *Sociologists at Work*. Basic Books.
- Hargreaves, D. 1967. *Social Relations in a Secondary School*. Routledge & Kegan Paul.
- Hayward, K. 2006. 'The "Chav" Phenomenon: Consumption, Medi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Underclass.' *Crime, Media, Culture* 2(1): 9–28.
- Hebdige, D. 1974. 'Aspects of Style in the Deviant Sub-Cultures of the 1960's'. Unpublished MA Thesis, CCCS, Birmingham University. Available as CCCS *Stencilled Papers*, Nos. 20, 21, 24 and 25.
- Hebdige, D. 1979.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Methuen.
- Heddig, D. [1983] 2005. 'Posing ... Threats, Striking ... Poses: Youth, Surveillance and Display.' In K. Gelder, ed. (2005).
- Hebdige, D. 1987. *Cut 'N' Mix*. Comedia.
- Heinlein, R. 1965. *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 New English Library.
- Henry, Jules. 1963. *Culture Against Man*. Random House. (Penguin edition, 1973.)
- Herman, G. 1971. *The Who*. Studio Vista.
- Hillier, P. 1975. 'The Nature and Social Location of Everyday Conceptions of Class.' *Sociology*, 9(1).
- Hindess, B. 1973a. *The Use of Official Statistics in Sociology*. MacMillan.
- Hindess, B. 1973b. 'Models and Masks.'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2, No.1 (February).
- Hines, V. 1973. *Black Youth and the Survival Game in Britain*. Zulu Publications.
- Hiro, D. 1973. *Black British, White British*. Pelican.
- Hodkinson, P. 2002. *Goth: Identity, Style and Subculture*. Berg.
- Hoggart, R. 1958. *The Uses of Literacy*. Pelican.
- Houriet, R. 1971. *Getting Back Together*. Abacus.
- Howe, L.K. (ed.) 1970. *The White Majority: Between Poverty and Affluence*. Vintage Books.
- Hurt, J. 1972. *Education in Evolution*. Paladin.
- Hutt, C. 1973. *The Death of the English Pub*. Arrow.
- Jacoby, R. 1973. 'The Politics of Subjectivity.' *New Left Review*, 79.
- Jameson, F. 1984.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46: 53–92.
- Jefferson, T. 1973. 'The Teds: a Political Resurrection.' CCCS *Stencilled Paper*, No. 22.
- Jefferson, T. 1974. 'For a Social Theory of Deviance: the Case of Mugging, 1972–3.' Unpublished MA Thesis, CCC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 Jefferson, T. 1988. 'Race, Crime and Polic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w* 16: 521–39.
- Jefferson, T. 1991. 'Discrimination, Disadvantage and Policework.' In E. Cashmore and E. McLaughlin, eds. (1991).
- Jefferson, T. 1992. 'The Racism of Criminalization.' In L. R. Gelsthorpe, ed. (1992).

- Jefferson, T. 1994. 'Theorising Masculine Subjectivity.' In T. Newburn and E Stanko, eds. (1994).
- Jefferson, T. 2002. 'Subordinating Hegemonic Masculinity.'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6 (1): 63-88.
- Jefferson, T. and Clarke, J. 1974. 'Down these Mean Streets: the Meaning of Mugging.' *Howard Journal*, Vol.XIV, No.1. Available as CCCS *Stencilled Paper*, No. 17.
- Jenks, C. 2005. *Subculture: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Social*. Sage.
- Johnson, P. 1964. 'The Menace of Beatlism.' *New Statesman* (28th February).
- Johnson, R. 1970. 'Educational Policy and Social Control in Mid-Victorian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 vol. 49.
- Kallyndyr, R. and Dalrymple, H. undated. *Reggae, A Peoples' Music*. Carib - Arawak Publications. (From 109 Deacon Road, Willesden, London NW2.)
- Kasschau, P., Ransford, E. & Bengtson, V. 1974. 'Gener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Youth Movement Participation: Contrasts in Blue Collar and White Collar Youth.'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0(3).
- Kaufman, M. 1971. 'The New Homesteading Movement.' In S. Teselle, ed. (1971).
- Kearney, M.C. 1998. "'Don't Need You": Rethinking Identity Politics and Separatism From a Grrrl Perspective.' In J. S. Epstein, ed. (1998).
- Kerouac, J. 1958. *On the Road*. Andre Deutsch.
- Kerr, M. 1958. *The People of Ship Street*.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 Kitsuse, J.I. 1962. 'Societal Reaction to Deviant Behaviour: Problems of Theory and Method.' *Social Problems*, 9 (Winter). Reprinted in H.S. Becker, ed. (1964).
- Krausz, E. and Miller, S. 1974. *Social Research Design*. Longman.
- Kuhn, T.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ing, D. 1969. *The Sound of Our Time*. Sheed and Ward.
- Laing, R.D. 1967. *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 and The Bird of Paradise*. Penguin.
- Lane, T. 1974. *The Union Makes Us Strong*. Arrow.
- Laufer, R. & Bengtson, V. 1974. 'Generations, Aging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tional Unit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0(3).
- Lazarsfeld, P.F. et al. (eds.) 1972. *Continuities in the Language of Social Research*. Free Press.
- Leary, T. 1970. *The Politics of Ecstasy*. Paladin.
- Lecourt, Dominique. 1975. *Marxism and Epistemology*. New Left Books.
- Lemert, E.M. 1967. *Human Deviance*, Social Problems and Social Control. Prentice-Hall.
- Lessing, D. 1969. *The Four Gated City*. Panther.
- Levi-Strauss, C. 1966. *The Savage Mind*.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 Levi-Strauss, C. 1969. *Totemism*. Penguin.
- Lindesmith, A. 1947. *Opiate Addiction*. Principia Press.
- Lockwood, D. 1966. 'Sources of Variation in Working Class Images of Society.' *Sociological Review* 14(3).
- Lowenthal, D. 1972. *West Indian Socie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ukes, S. 1974. *Power: a Radical View*. MacMillan Papermac.
- MacInnes, C. 1957. *City of Spades*. MacGibbon and Kee.
- MacInnes, C. 1961. *England, Half-English*. McGibbon and Kee.
- Mailer, N. 1968. 'The White Negro' in *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 Panther.
- Mankoff, M. 1971. 'Societal Reaction and Career Deviance: a Critical Analysis.'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2 (Spring).
- Mann, M. 1973. *Consciousness and Action among the Western Working Class*. Macmillan.
- Mannheim, K. 1972. *Ideology and Utopia*.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Mannheim, Karl. [1927] 1952.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In *Essays in the Soci-*

- ology of Knowledge*.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Marcuse, H. 1964. *One Dimensional Ma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Marcuse, H. 1969. *An Essay on Liberation*. Allen Lane, Penguin Press.
- Marcuse, H. 1970. *Eros and Civilization*. Sphere.
- Marshall, T.H. 1963.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In *Sociology at the Cross Roads*.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Martin, G. 2002. 'Conceptualizing Cultural Politics in Subcultural and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1): 73–87.
- Marx, K. 1951.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In *Marx–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I. Lawrence and Wishart.
- Marx, K. 1964.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Lawrence and Wishart.
- Marx, K. 1970. *The German Ideology*. Lawrence and Wishart.
- Matza, D. 1961. 'Subterranean Traditions of Youth.'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38.
- Matza, D. 1969. *Becoming Deviant*. Prentice–Hall.
- Matza, D. and Sykes, G. 1961.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Subterranean Valu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
- Mays, J.B. 1954. *Growing up in the City*.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 McCall, G.J. and Simmons, J.L. (eds.) 1969. *Issues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ddison–Wesley.
- McCann, P. (ed.) 1977. *Popular Education and Socialis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ethuen.
- McDermott, J.J. 1971. 'Nature, Nostalgia and the City: an American Dilemma'. In S. Teselle, ed. (1971).
- McDowell, L. 2003. *Redundant Masculinities?* Blackwell.
- McGlashan, C. 1973. 'Reggae, Reggae, Reggae.' *Sunday Times Magazine* (4th February).
- McGuigan, J. 1992. *Cultural Populism*. Routledge.
- McLean, G. 2005. 'In the Hood.' *The Guardian G2*. May 13: 1–3.
- McRobbie, A. [1980] 1991a. 'Setting Accounts With Subcultures: a Feminist Critique.' In A. McRobbie (1991c).
- McRobbie, A. 1984. 'Dance and Social Fantasy.' In A. McRobbie and M. Nava, eds. (1984)
- McRobbie, A. 1989a. 'Second–hand Dresses and the Role of the Ragmarket.' In A. McRobbie, ed. (1989b)
- McRobbie, A. 1991b. 'Jackie Magazine: Romantic Individualism and the Teenage Girl.' In A. McRobbie (1991c).
- McRobbie, A. 1991c. *Feminism and Youth Culture*. Macmillan.
- McRobbie, A. 1994. *Postmodernism and Popular Culture*. Routledge.
- McRobbie, A. 1997. 'New Sexualities in Girls' and Women's Magazines.' In A. McRobbie, ed. (1997).
- McRobbie, A. 1998. *British Fashion Design*. Routledge.
- McRobbie, A. 2007a. 'Feminism and Consumer Culture Revisited.' In A. McRobbie (2007b)
- McRobbie, A. 2007b. *Displacement Feminism*. Sage.
- McRobbie, A. (ed.) 1989b. *Zoot Suits and Second–hand Dresses*. Macmillan
- McRobbie, A. (ed.) 1997. *Back to Realit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cRobbie, A. and Nava, M. (eds.) 1984. *Gender and Generation*. Macmillan.
- Mead, G.H.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elly, G. 1972. *Revolt into Style*. Penguin.
- Meltzer, B.N., Petras, J.W. and Reynolds, L.T. 1975.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Genesis,*

- Varieties and Criticisms*. Routledge and Keagan Paul.
- Melville, K. 1972. *Communes in the Counter Culture*. Morrow Paperback.
- Merton, R.K.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Free Press.
- Messerschmidt, J. 2002. 'On Gang Girls, Gender and a Structured Action Theory: a Reply to Miller.'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6(4):461-75.
- Messenger, S. 1962. 'Life as Theater: Some Notes on the Dramaturgic Approach to Social Reality'. *Sociometry*, 25. Reprinted in M. Truzzi, ed. (1968).
- Miliband, R. 1961 *Parliamentary Socialism*. Allen and Unwin.
- Miliband, R. and Saville, J. (eds.) 1965.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65. Merlin Press.
- Miller, J. 2001. *One of the Guys: Girls, Gangs and Gen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ler, J. 2002a. 'The Strengths and Limits of "Doing Gender" for Understanding Street Crime.'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6(4): 433-60.
- Miller, J. 2002b. 'Reply to Messerschmidt.'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6(4): 477-80.
- Miller, W. 1958. 'Lower-class Culture As a Generating Milieu of Gang Delinquenc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5. Reprinted in D.O. Arnold, ed. (1970).
- Mills, C.W. 1966. *Sociology and Pragmatism*. Galaxy Books.
- Mitchell, J. 1971. *Woman's Estate*. Pelican.
- Mitchell, J. 1975.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Penguin.
- Monod, J. 1967. 'Juvenile Gangs in Paris: Towards a Structural Analysi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Crime and Delinquency*, vol. 4.
- Moore, D. 1994. *The Lads in Action*. Arena.
- Moorhouse, H.F. and Chamberlain, C.W. 1974. 'Lower class attitudes to Property: Aspects of the Counter Ideology.' *Sociology*, 8(3).
- Moran, Ld. 1968. *Winston Churchill*. Sphere.
- Morris, L. 1994. *Dangerous Classes*. Routledge.
- Morris, M. 1997. 'A Question of Cultural Studies.' In A. McRobbie, ed. (1997).
- Morris, T. 1957. *The Criminal Area*.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Muggleton, D. 1997. 'The Post-subculturalist.' S. Redhead, D. Wynne and J. O'Connor, eds. (1997).
- Muggleton, D. 2000. *Inside Subculture: the Postmodern Meaning of Style*. Berg.
- Muggleton, D. and Weinzierl, R. (eds.) 2003. *The Post-Subcultures Reader*. Berg.
- Mumford, L. 1922. *The Story of Utopias*. Boni and Liveright.
- Mungham, G. and Pearson, G. (eds.) 1976. *British Working Class Youth Cultures*.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Murdock, G. and McCron, R. 1973. 'Scoobies, Skins and Contemporary Pop.' *New Society*. No. 547.
- Murdock, G. 1973. 'Culture and Classlessness: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 Contemporary Myth'. Paper delivered to *Symposium on Work and Leisure*, University of Salford.
- Murdock, G. 1974.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In N. Armistead, ed. (1974).
- Murdock, G. 1976. 'Youth and Class: the Career of a Confusion.' In G. Mungham and G. Pearson, eds. (1976).
- Murray, C. 1984. *Losing Ground*. New York: Basic Books.
- Murray, C. 1990. *The Emerging British Underclass*. Choice in Welfare Series No. 2. London: Health and Welfare Unit,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 Musgrove, F. 1968. *Youth and the Social Order*.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Musgrove, F. 1974a. 'The Curriculum for a World of Change.' In: P.H. Taylor and J. Walton, eds. (1974).
- Musgrove, F. 1974b. *Ecstasy and Holiness: Counter Culture and Open Society*. Methuen.
- Nairn, T. 1964a. 'The British Political Elite.' *New Left Review*, 23.

- Nairn, T. 1964b.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Left Review*, 24. Reprinted in R. Blackburn, ed. (1972).
- Nairn, T. 1964c. 'Anatomy of the Labour Party' Pts. 1 and 2. *New Left Review*, 27 and 28.
- Nairn T. and Quattrocchi, A. 1968.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Panther.
- Needleman, J. 1971. *The New Religious*. Doubleday.
- Nettleford, R. 1970. *Mirror. Mirror*. William Collins and Sangster (Jamaica), Ltd.
- Neville, R. 1971. *Play Power*. Paladin.
- Newburn, T. and Stanko, E. (eds.) 1994. *Just Boys Doing Business?* Routledge.
- Newsom, Sir J.H. 1948. *The Education of Girls*. Faber.
- Newsom, Sir J.H. 1963. *Half Our Future: a Report*. HMSO.
- Nichols, T. 1974. 'Labourism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he "Class Ideology" of some Northern Foremen.' *Sociological Review*, 22(4).
- Nicolaus, M. 1969. 'The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of Sociology: a View from Below.' *Antioch Review* (Fall). Reprinted in R. Blackburn, ed. (1972).
- Nuttall, J. 1970. *Bomb Culture*. Paladin.
- Ogilvy, H and Ogilvy, J. 1971. 'Commune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Reality.' In S. Teselle, ed. (1971).
- Olesen, V and Whittaker, E. 1967. 'Role-making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Processes in the Researcher-actor Relationship.' *Human Organisation* 26. Reprinted in N. K. Denzin, ed. (1970).
- Ortega Y Gasset, José [1920-1] 1931. *The Modern Theme*. C. W. Daniel Company.
- Park, R.E. and Mackenzie, R.D. (eds.) 1967. *The C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arker, H.J. 1974. *View from the Boys*. David and Charles.
- Parker, T. 1969. *The Plough Boy*. Arrow.
- Parkin, F. 1971. *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 McGibbon and Kee.
- Parsons, T. 1942. 'Age and Sex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printed in 1964 in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Free Press.
- Patrick, J. 1973. *A Glasgow Gang Observed*. Eyre-Methuen.
- Patterson, O. 1964. 'Ras Tafari: Cult of Outcasts.' *New Society* (12th November).
- Paul, Jimmy and Musty Support Committee. 1973. *20 years*. The Action Centre.
- Pearson, G. & Twohig, J. Undated. *Becker, Marijuana and the Sociology of Fun*. Unpublished ms., University of Cardiff.
- Pearson, G. 1975. *The Deviant Imagination*. MacMillan.
- Pearson, J. 1973. *The Profession of Violence*. Panther.
- Piano, D. 2003. 'Resisting Subjects.' In D. Muggleton and R. Weinzierl, eds. (2003).
- Pinto-Duschinsky, M. 1970. 'Bread and Circuses: the Conservatives in Office, 1951-64.' In V. Bogdanor and R. Skidelsky, eds. (1970).
- Polsky, N. 1971. *Hustlers, Beats and Others*. Penguin.
- Pool, H. 2005. 'Whiteout.' *The Guardian Weekend*. January 28: 35-37.
- Poulantzas, N. 1966. 'Marxist Political Theory in Great Britain.' *Les Temps Modernes* (March). Translated in 1967 in *New Left Review*, 43.
- Poulantzas, N. 1973.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New Left Books and Sheed & Ward.
- Powell, R. 1972 *The Background of West Indian Children*. Unpublished Report to the Schools Council.
- Raison, T. (ed.) 1966. *Youth in New Society*. Hart-Davis.
- Raynor, J. (ed.) 1974. *Issues in Urban Educati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Urban Education Block 1).
- Redhead, S. 1993a. *Rave Off*. Avebury.
- Redhead, S. 1993b. *The Passion and the Fashion*. Avebury.
- Redhead, S. 1995. *Unpopular Culture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Redhead, S. 1997a. 'Introduction.' In S. Redhead, D. Wynne and J. O'Connor, eds. (1997).
- Redhead, S. 1997b. *Subculture to Clubcultures*. Blackwell.
- Redhead, S., Wynne, D. and O'Connor, J. (eds.) 1997. *The Clubcultures Reader*. Blackwell.
- Reich, Charles, A. 1972. *The Greening of America*. Penguin.
- Reiche, R. 1968. *Sexuality and Class Struggle*. New Left Books.
- Reiss, A.J. 1968. 'Stuff and Nonsense about Social Surveys and Observation'. In H.S. Becker et al., eds. (1968).
- Rex, J. (ed.) 1974. *Approaches to Sociolog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Richmond, A.H. 1954. *Colour Prejudice in Britain: a Study of West Indian Workers in Liverpool, 1941 - 1957*.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Rickman, H.P. (ed.) 1961. *Pattern and Meaning in History*. Allen and Unwin.
- Rigby, A. 1974a. *Alternative Realities*.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Rigby, A. 1974b. *Communes in Britai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Roberts, M. 2005. 'Notes on the Global Underground.' In K. Gelder, ed. (2005).
- Roberts, R. 1971. *The Classic Slu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Robins, D. and Cohen, P. 1978. *Knuckle Sandwich: Growing Up in the Working Class City*. Penguin.
- Rock, P. and Cohen, S. 1970. 'The Teddy Boy'. In V. Bogdanor and R. Skidelsky, eds. (1970).
- Rock, P. and McIntosh, M. (eds.) 1974. *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Tavistock.
- Rodney, W. 1969. *The Groundings with my Brothers*. Bogle-L'Ouverture Publications.
- Rose, A. (ed.) 1962. *Human Behaviour and Social Processes*.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aperback, 1971).
- Ross, A. and Rose, T. (eds.) 1994. *Microfiends: Youth Music and Youth Culture*. Routledge.
- Rozsak, T. 1972. *Where the Wasteland Ends*. Faber.
- Rowbotham, S. 1973. *Woman's Consciousness, Man's World*. Pelican.
- Rowntree, J. and Rowntree, M. 1968. 'Youth as Clas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Youth.' *Our Generation*, Vol. 6, Nos. 1 - 2 (May/July).
- Roy, Della and Roy, R. 1972. 'Is Monogamy Outdated?' In H.P. Dreitzel, ed. (1972).
- Roy, Donald. 1970. 'The Study of Southern Labor Union Organizing Campaigns.' In R. Habenstein, ed. (1970).
- Runciman, W.G. 1966.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Ruscoe, G.C. 1963. *Dysfunctionality in Jamaican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chool of Education.
- Sandilands, J. 1968.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Teddy Boys?' *Daily Telegraph Magazine*, No.217 (29th November).
- Sartre, J.-P. 1960.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Gallimard. Translation by A. Sheridan-Smith, edited by J. Réé, 1976, New Left Books.
- Sartre, J.-P. 1963. *The Question of Method*. Methuen. Reprinted in 1968 as *Search for a Method*, Vintage Books.
- Schatzman, L. 1973. *Field Research: Strategies for a Natural Sociology*. Prentice-Hall.
- Scheff, T. 1968. 'Negotiating Reality.' *Social Problems*, 16.
- Schumacher, E.F. 1974. *Small is Beautiful*. Abacus.
- Silber, I. 1970.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Marxist Analysis*. Times-Change Press.
- Sim, J. 1982. 'Scarman: the Police Counterattack.' In M. Eve and D. Musson, eds. (1982).
- Simey, T.S. 1946. *Welfare and Planning in the West Indies*. Clarendon Press.
- Skeggs, B. 1997. *Formations of Class and Gender*. Sage.

- Smith, A.C., Blackwell, T. and Immirzi, E. 1975. *Paper Voices*. Chatto and Windus.
- Smith, M.G. 1956. *Labour Supply in Rural Jamaica*.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U.C.W.I.
- Smith, M.G. 1965.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Choice in Rural Jamaica'. In *The Plural Society in the West In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mith, M.G., Angier, R. and Nettleford, R. 1960. *The Ras Tafari Movement in Kingston*, Jamaica.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U.C.W.I.
- South, N. (ed.) 1999. *Youth Crime, Deviance and Delinquency Volume 1*. Ashgate/Dartmouth.
- Sparks, C. 1977. 'The Evolution of Cultural Studies.' *Screen Education* 22: 16 - 30.
- Springhall, J.O. 1971. 'The Boy Scouts, Class and Militarism in relation to British Youth Movements 1908 - 1930.'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XVI.
- Statera, G. 1975. *Death of a Utop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radling, R. and Zuriek, E. 1973. 'Emergence of Political Thought among Young Englishmen: a Conflict Perspective.' *Political Studies*, XXI(3).
- Strauss, A. 1959. *Mirrors and Masks: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Free Press.
- Strauss, A., Schatzman, L., Bucher, R., Ehrlich, D. and Sabshin, M. 1964. *Psychiatric 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 Free Press.
- Strauss, A. (ed.) 1965. *George Herbert Mead on Social Psych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Phoenix Books
- Taylor, I. 1971a. 'Soccer Consciousness and Soccer Hooliganism'. In S. Cohen, ed. (1971).
- Taylor, I. 1971b. "'Football Mad" - a Speculative Sociology of Soccer Hooliganism'. In E. Dunning, ed. (1971).
- Taylor, I., Walton, P. and Young, J. 1973. *The New Criminolog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Taylor, I., Walton, P. and Young, J. (eds.) 1975. *Critical Criminolog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Taylor, L. and Taylor, I. (eds.) 1973. *Politics and Deviance*. Penguin.
- Taylor, P.H. and Walton, J. (eds.) 1974. *The Curriculum: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Change*. Ward Lock Educational.
- Teselle, S. (ed.) 1971. *The Family, Communes, and Utopian Societies*. Harper Torchbooks.
- Thomas, M. 1973. 'The Wild Side of Paradise.' *Rolling Stone* (July 19th).
- Thompson, E.P. 1960.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9 and 10.
- Thompson, E.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Victor Gollancz. (Revised Pelican edn., 1968).
- Thompson, E.P. 1965.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In R. Miliband and J. Saville, eds. (1965).
- Thompson, Hunter, S. 1967. *Hell's Angels*. Penguin.
- Thornton, S. 1995. *Club Cultures*. Polity.
- Thrasher, Frederic. 1927. *The Ga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itmuss, R.M. 1962.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Change*. Allen & Unwin.
- Tolson, A. 1977. *The Limits of Masculinity*. Tavistock.
- Tremenheere, H.S. 1844. *Report on the Disturbances in the Mining Districts*. Parliamentary Papers Cmd. 592.
- Trow, M. 1957. 'A Comment on "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ing: a Comparison".' *Human Organisation*, 16,3. Reprinted in G.J. McCall and J.L. Simmons, eds. (1969) - followed by Becker & Geer's Rejoinder.
- Truzzi, M. (ed.) 1968. *Sociology and Everyday Life*. Prentice-Hall.
- Turner, R.H. 1953. 'The Quest for Universals in Sociological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8 (June). Reprinted in N.K. Denzin, ed. (1970).

- Turner, R.H. 1962. 'Role-taking: Process versus Conformity'. In A. Rose, ed. (1962).
- Wacquant, L. 2002. 'Review Symposium: Scrutinizing the Stree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7(6): 1468 - 1532.
- Walvin, J. 1975. *The People's Game*. Allen Lane.
- Weber, M. 1949.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Free Press, New York. (Edited by E. Shils.)
- Westergaard, J. 1965. 'The Withering Away of Class'. In P. Anderson and R. Blackburn, eds. (1965).
- Westergaard, J. 1974. 'Some Aspects of The Study of Modern British Society'. In J. Rex, ed. (1974).
- White, G. 1967. 'Rudie, oh Rudie'. *Caribbean Quarterly*, Vol. 13, No. 3. Univ. of West Indies, Extra-Mural Dept.
- Whitehead, S. 2002. *Men and Masculinities*. Polity.
- Whyte, W.F. 1955. *Street Corner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 Wilkinson, P. 1969. 'English Youth Movements: 1908 - 1930.'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2).
- Willer, D. and Willer, J. 1973. *Systematic Empiricism: Critique of a Pseudoscience*. Prentice-Hall.
- Williams, R. 1958.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 - 1950*. Chatto & Windus.
- Williams, R. 1973.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New Left Review*, 82.
- Willis, P.E. 1971. *Non-Participation in Elite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Young Participation in the Culture of Popular Music*. A report to UNESCO social sciences division.
- Willis, P.E. 1972. *Pop Music and Youth Groups*. Unpublished Ph.D., CCC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 Willis, P.E. 1974. 'Symbolism and Practice: a Theory for the Social Meaning of Pop Music.' CCCS *Stencilled Paper*, No. 13.
- Willis, P.E. 1977. *Learning to Labour*. Saxon House.
- Willis, P.E. 1978. *Profane Culture*. Chatto and Windus.
- Willmott, P. 1969. *Adolescent Boys of East London*. Penguin.
- Wilson, W.J. 1978. *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lson, W.J.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olfe, T. 1966. *The Kandy-Kolored Tangerine Flake Steamline Baby*. Jonathan Cape.
- Wolfe, T. 1969a. *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 Bantam.
- Wolfe, T. 1969b. *The Pump House Gang*. Bantam.
- Wolfe, T. 1971. *Radical Chic and Mau-Mauing the Flak-Catchers*. Bantam.
- Wolff, K.H. (ed.) 1964.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Free Press.
- Young, J. 1970. 'The Zookeepers of Deviance'. *Catalyst*, 5.
- Young, J. 1972. *The Drugtakers: the Social Meaning of Drug Use*. Paladin.
- Young, J. 1973. 'The Hippies: an Essay in the Politics of Leisure.' In L. Taylor and I. Taylor, eds. (1973).
- Zicklin, G. 1973. 'Communal Childrearing: a Report on Three Cases'. In H.P. Dretzel, ed. (1973).
- Znanięcki, F. 1972. *Florian Znanięcki on Humanistic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Phoenix Books.
- Zweig, F. 1961. *The Worker in An Affluent Society*. Heinemann.

索引

- Abduction 不明推论式 403
Abrams, Mark 马克·艾布拉姆斯 89,101
Abstraction 提炼 285
Access bargain 准入交易 408,410
Acid 迷幻药 210,212,214-218,220-225,237
Addams, Jane 简·亚当斯 326
Affluence 丰裕 89,93-95,97-98,100,102,106,112-113,116-117,132,154,167,180
Age 年龄 84-85,91-94,106,126,130,194,302,324,329-330,332-333,337-339,341,354-355,365-369,372,377,381
另参看 generation 世代
American research 美国的研究
Amphetamines 安非他命 190-192,224
Analytic induction 分析归纳法 402,417-418
Appreciative understanding 赏识性理解 401
Astrology 占星术 239,245
Avant-garde 先锋派 82,331
- Baden-Powell, Robert 罗伯特·贝登堡 303
Bank Holiday riots (1964) 银行假日骚乱 194
Barbiturates 巴比妥酸盐 224-225
Becker, Howard 霍华德·贝克尔 226-227,229,233,388,398
Berry, Chuck 查克·贝里 282,288
Bible, The 《圣经》 221,249,251,271,372
Biographies 个人经历 135-136,236,290-291,294-296,298,321,342
Black people 黑人 93,134-135,143-148,150-151,164,166,179,183,185-187,193,195-196,246-248,250-252,254-257,260,264-295,312
Blackwell, Chris 克里斯·布莱克韦尔 259,266
Boredom 无聊 204-205
Boundaries 界限 84,117,158-159,173,291,309,319,367,391-392,418
Bourgeois culture 资产阶级文化 83,369-370

- 'Bread and Circuses' policy “小恩小惠”政策 95
- Bricolage 拼贴 304-305, 366
- Buff, Stephen 斯蒂芬·巴夫 340
- Burra dances 巴拉舞 258
- Butters, Steve 史蒂夫·巴特斯
- Byron Lee and the Dragonaires 拜伦·李和龙人乐队 259
- C. and W. music 乡村和西部音乐 286
另参见 Country and Western music
-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80, 96, 98, 100, 116-118, 143, 153-154, 156-157, 160, 192, 233, 241-242, 252, 276, 287, 306, 326, 330, 332, 370-374, 376-377, 410, 420
- Careers 职业生涯 124, 126, 277, 367
- Chambers, Iain 伊恩·钱伯斯 275
- Chauvinism 男性沙文主义(大男子主义) 262, 321, 351, 353
- Chicago School 芝加哥学派 386, 392, 395
- Childrearing 抚养孩子 239-240
- Christianity 基督教 146, 155, 165, 219, 240, 249-251, 302
- Churchill, 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 95
- Clarke, John 约翰·克拉克 197, 301, 339, 361
- Class consciousness 阶级意识 122, 130, 138, 263-264, 323-324, 329, 332-334, 337-338, 342, 370, 373, 378
- Class relations 阶级关系 86, 102-104, 110, 115-116, 123, 163, 330, 341, 375
- Cleaver, Eldridge 埃尔德里奇·克里夫 281
- Cohen, Albert 艾伯特·科恩 102, 369
- Cohen, Phil 菲尔·科恩 88, 104, 132, 319-320, 338, 368
- Cohen, Stan 斯坦利·科恩 186, 310, 369, 377, 395
- Commodities 商品 123, 128, 132-134, 154-155, 183, 186, 192-196, 305-306, 317-320, 342, 370
- Communes 公社 139, 159, 235, 373
- Community 社群(区) 93, 99, 101, 104-106, 110, 121, 126, 137, 139, 143, 145-146, 150, 159-160, 166, 197, 199-202, 210, 240, 242-245, 248, 256, 258, 264-268, 271, 302, 308-309, 336, 311, 320, 372-373, 381, 388, 419-420
- Consciousness 意识
black music 黑人音乐 275-277, 281-286, 288-189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80, 96, 98, 100, 116-118, 143, 153-154, 156-157, 160, 192, 233, 241-242, 252, 276, 287, 306, 326, 330, 332, 370-374, 376-377, 410, 420
class 阶级 79-87, 90, 93-134, 136-139, 148-164, 167, 177-182, 184-185, 188, 193, 197-200, 203, 232-233, 235, 240, 248, 259, 264-266, 272, 276-281, 283, 285, 288-289, 293, 301-306, 308-309, 317-321, 323-343, 345-346, 349-350, 356, 361-378, 412, 421
drug use 吸毒 120-121, 136, 139-140, 142, 146, 149, 161, 165, 209-216, 218-223, 225-233, 236, 238, 271, 285, 292, 395, 402
generational 世代的 318, 328
- Consensus 共识 93-96, 98-100, 102, 106, 114, 159, 220, 421
- Conservative Party 保守党 95-96, 119, 123, 166, 168, 379, 381
- 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 持续比较法 402-404, 411, 417-419
- Consumption 消费 85-86, 89, 93-95, 101, 107, 110, 112-113, 119, 125, 128, 132-134, 153-155, 157, 161, 163, 183, 186, 191-194, 196, 241-242, 273, 301-302, 316-318, 320, 330, 332, 339, 348-349, 354, 364, 370, 377
另参见 leisure 休闲
- Control culture 控制文化 135, 138, 151, 160, 165-166, 169-171
- 'Conventional' youth “墨守成规的”青年 340-341

- Convergence 会合 159-160
- Corrigan, Paul 保罗·科里根 87, 203, 368
- Counter-cultures 反主流文化(群体) 121, 136-143, 145-147, 149, 151-154, 156-162, 165, 167, 235, 237, 240-241, 331, 333-334, 357, 368, 395
- Country and Western (C. and W.) music 乡村和西部音乐 286
- Criminality 犯罪 83, 87, 91, 101, 120, 122-123, 142, 146, 164, 167, 173, 258-259, 261, 263, 285, 290-298, 310, 331, 338, 347, 369, 386, 390, 392, 394-398, 409
另参见 delinquency (青少年)违法犯罪 deviance 越轨行为
- Crisis in authority 权威危机 151-152
- Critcher, Chas 查斯·克里彻 290
- 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革命 160
- Cultures 文化群(落) 80, 82-87, 103-104, 107, 109, 123-124, 130-132, 134-139, 151-152, 157, 163-164, 183, 191, 197-198, 203, 209, 224, 226-227, 232, 238, 248, 266-267, 282, 290-293, 296-297, 309, 311, 313, 316-317, 319-320, 339, 341, 343-347, 349-357, 359, 361-363, 365, 385-386, 388-389, 395-398, 405, 408, 413, 418, 421
- Cypriots 塞浦路斯人 179
- Dalrymple, H. H. 达尔林普尔 256
- Data analysis 数据分析 401
- Dean, John 约翰·迪安 407
- Defences 防御 111-113, 115, 117-118, 217, 242, 324, 358
- Denzil (Mod) 登齐尔(摩登族) 189-196, 262, 306, 309-310, 312, 314, 317-318, 320
- Desublimation 去升华作用 152, 155, 157-158, 241
- Deviance 越轨行为 227, 331, 338, 347, 369, 385-386, 392-393, 395-396, 404, 413
另参见 criminality 犯罪; delinquency (青少年)违法犯罪
- Dewey, John 约翰·杜威 386, 404
- Diffusion of power 权力扩散 99
- Disaffiliation 疏离(脱离) 84, 128-129, 135, 137, 151-152, 158-159, 164, 167, 193, 196, 212, 218, 243, 248, 254, 263-264, 268, 272, 276, 304, 317-318, 321, 323, 328, 338, 375, 397, 408
- Discourse 话语 304-306, 411, 416, 420-421
- Division of labour 劳动分工 86, 110, 153
- Doing nothing 无所事事 87, 123, 203-204, 206-208, 231, 261
- Dominant cultures 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主导文化) 81-86, 109, 113-114, 117-118, 121, 129-131, 133-134, 137, 153, 156-158, 161-162, 167, 177, 195, 306, 314-315, 320, 339, 341, 361-363
- Downes, D. 大卫·唐斯 20
- Dreadlocks 长发辮 258, 263, 270
- Dress 服饰 92, 157, 177-178, 184, 187, 195-197, 312, 318, 331, 354
另参见 style 风格
- Drug use 吸毒 121, 140, 142, 146, 149, 165, 209-213, 216, 219-222, 226, 228, 230-233, 236, 238, 292
- Economic contexts 经济环境 106
- Education 教育 83, 91-94, 103, 120, 124, 126-127, 129, 143, 151-153, 155, 161, 165, 173, 213, 263, 269-270, 279, 291-292, 302-303, 324, 327, 330-333, 336, 355, 370-375, 329-382
另参见 schools 学校
- Embourgeoisement 资产阶级化 93-94, 96-98, 100-102, 106, 109, 111

- Empiricism 经验主义 256, 333, 399-401
 Entering the field 进入实地调查 403
 Eschatological movements 末世论运动
 Ethnography 民族志 132, 175, 226-227, 233-234, 306, 367, 386, 388, 391, 393, 395-396, 401, 416
 Exclusion 排斥 182, 185, 198, 232, 268, 271, 306, 321
 Experience 经验 78, 80, 85, 90, 97-98, 101, 104, 106, 112, 120, 124-126, 129-130, 135-136, 186, 194, 209, 211, 213-214, 222, 227-228, 230, 233, 236, 249, 275-277, 281, 283, 285, 303, 328, 336-337, 339, 341-342, 356, 365-366, 370, 374, 388-390, 405, 411-412, 414-415, 420
 False consciousness 虚假意识 123, 154, 335
 Families 家庭 83-84, 97, 105-107, 112, 115, 119, 125-127, 129, 137, 146, 152-155, 161, 164, 235, 239, 241, 244, 273, 291, 294, 297, 313, 320-321, 345-346, 348, 354, 356, 362-367, 375-376, 420
 Fashion 时尚 85, 87, 121, 143, 154-155, 161, 167, 184, 187, 198, 257, 305, 314, 316-317, 328, 330-333, 351, 376
 Father 父亲 91, 257, 270, 296-297
 Femininity 女性气质 161, 355, 364, 366
 Fetishisation 迷恋 125, 134, 188, 321, 357, 359
 Fieldwork 实地调查(田野调查) 236, 341, 401-404
 notes 记录 244, 273, 288-291, 343, 349, 388, 399, 401-102, 407, 411-412, 416, 418, 421-422
 processes 过程 77, 82, 89, 93, 97, 107, 115, 117, 119, 125, 130, 135, 147, 149, 152, 156, 158-160, 163, 170-171, 186-187, 192, 216, 219, 220, 222, 229, 232, 240-243, 251, 259, 265-266, 276, 283-284, 286, 287-288, 304, 308, 311, 314, 316-318, 320-321, 330-332, 337-338, 358, 363-365, 369, 371, 373, 376, 392-394, 399, 401-402, 405, 409, 413, 415, 417-418, 420-421
 relationships 关系 29, 80-83, 85-86, 97, 102-108, 110-113, 115-117, 119-121, 123-126, 130, 134-136, 152-156, 158-159, 162-164, 166, 169, 178-179, 183, 185, 199, 200, 209, 212, 218-221, 238-244, 247, 253, 258, 265, 268-269, 278, 282, 286, 288-289, 291, 297-298, 301, 303-304, 307-308, 311-313, 318-321, 329-330, 332, 334, 338-342, 344-345, 347, 350, 352-356, 358-361, 363-368, 371, 374-376, 385, 389, 395, 403-409, 416-417, 420-422
 Fighting 打架(争斗) 179, 205-208, 261, 279, 318, 355
 Fletcher, Colin 科林·弗莱彻 234, 419
 Focal concerns 焦点关切 82, 84, 102, 123, 131, 134, 316, 347
 Football 足球 120, 125-126, 129, 131, 137, 164-165, 197, 201, 204, 206, 217, 268, 302, 309, 312, 314-315, 349
 Freedom 自由 89, 95, 128, 137, 139-140, 142, 145, 147-149, 152, 154-155, 158-161, 164, 173, 184, 211, 213-216, 219-220, 233, 237, 241-242, 248, 259, 262, 288, 301-304, 316, 319, 324, 364, 375, 379-381, 386, 395, 397, 408
 Frith, Simon 西蒙·弗里斯 368
 Gangs 帮派 83, 88, 120, 137, 164, 199-200, 296, 309-310, 315, 330, 348, 350
 Gangster style 黑帮风格 187
 Garber, Jenny 詹妮·嘉柏 343
 Garvey, Marcus 马库斯·加维 250, 262, 278
 Geer, Blanch 布兰奇·吉尔 388, 398, 412
 'Generation gap' 代沟 91, 94, 100, 163, 319, 375-376
 Generational consciousness 世代意识 323, 328-330, 332, 334

- Generational specificity 代际特性 126,129
- Ghettos 贫民聚居区 167,203,283
- Girls 女孩 84,120,155,158,190,271,321,339,343-367,378
另参见 women 妇女
- Group identity 群体认同 131,308
- Group-mindedness 群体思想 178-179
- Haley, Bill 比尔·哈利 286
- Hall, Stanley 斯坦利·霍尔 326
- Hall, Stuart 斯图亚特·霍尔 77,322,397,420
- Hard mods 硬派摩登族 187,266-267
- Hash 大麻 121,140,142,145,150,193,211,218,222-231,252,258,261,267,411
- Hawthorne effect 霍索因效应 389
- Hebdige, Dick 迪克·赫伯迪格 134,183,246,306
- Hegemony 领导权(霸权) 80-82,113-119,122,152,162,168,275-276,281,289,319,324,336,420
- Henry, Jules 朱尔斯·亨利 360
- Heroin 海洛因 223-225
- Hindess, Barry 巴里·海因兹 419
- Hippies 嬉皮士
counter-cultures 反主流文化(群体) 121,136-143,145-147,149,151-154,156-162,165,167,235,237,240-241,331,333-334,357,368,395
drug use 吸毒 121,140,142,146,149,165,209-213,216,219-222,226,228,230-233,236,238,292
generational consciousness 世代意识 323,328-330,332,334
girls 女孩 84,120,155,158,190,271,321,339,343-367,378
style 风格 84-88,92,94,103-104,107,124-125,130-132,134-135,138-139,141,150,157,161,167,177,180-187,191-197,199-200,202,232,235-236,242,246,256-257,260,263,266,268,271,277,280,282,285-289,301,304-321,328,337-338,340-341,350-351,354,356,366,389,398,405,419-420
- Historical contexts 历史背景 104,403
- Housing 住房 93,111,242,279,291,298
- Hypothetico-deductive method 假说—演绎法 400
- Ideology 意识形态
counter-culture 反主流文化 121,136-143,145-147,149,151-154,156-162,165,167,235,237,240-241,331,333-334,357,368,395
hegemony 领导权(霸权) 80-82,113-119,122,152,162,168,275-276,281,289,319,324,336,420
socialism 社会主义 140-141,145-146,280,323-327,329,342
subcultures 亚文化群体 77,82-87,103-104,107,109,123-124,130-132,134,136-139,151,163-164,183,191,197-198,203,209,227,232,238,248,266-267,282,309,311,316-317,319-321,339,341,343-347,349-357,359,361-363,365,385-386,388,395-398,405,408,413,418,421
working class politics 工人阶级政治 122,159,378
- Imitation 模仿 90,167,187,259,264,266-267,283
- Inductive methods 归纳法 399-402,417-418
- Inequalities 不平等 80,98-99,112,177,298,306,327,330-333,335-337,339-341,393,410
- Informants 线人 405,407

- Infrastructural communes 构造生存基础的公社
 Institutions 制度(机制、机构、惯例) 78-79, 82, 91-100, 106, 112, 114-115, 117-120, 123, 125-131, 136-143, 146, 151-154, 156-159, 164, 171, 173, 184, 188, 219, 224, 235, 237, 252, 257, 279, 286, 291, 296, 298, 303, 305, 308-309, 314, 316-317, 319-320, 324-326, 330-332, 340-341, 336-337, 355, 357, 363-365, 369-371, 373-377, 380, 388, 392-395, 398, 409-410, 412-413
 Insults 侮辱 177-180, 182, 207

 Jamaican culture 牙买加文化
 Jazz music 爵士乐 121, 185, 232, 264, 280-288, 349, 390
 Jefferson, Tony 托尼·杰斐逊 77, 134, 177, 290, 308, 322
 Johnson, Paul 保罗·约翰逊 90
 'Joint casing' 侦察形势 406

 Kinship networks 亲属关系网络 178
 Kommunes 公社 139, 159, 235-245, 333
 Kray twins 克雷孪生兄弟 83, 200

 Labour force 劳动力 105
 Labour Party 工党 95-96, 99, 113, 123, 142, 252, 259, 378, 381
 Language 语言 120-121, 124, 126, 133-135, 155, 165, 170, 184, 220, 248, 258, 264-266, 271-272, 281, 344, 368, 387, 406, 416
 Law and Order campaigns 社会治安运动 169, 171
 Leisure 休闲
 girls 女孩 84, 120, 155, 158, 190, 271, 321, 339, 343-367, 378
 subcultural analysis 亚文化分析 108, 332, 337-342
 Teddy Boys 泰迪男孩 84, 91-92, 101, 124, 131-132, 134, 163-164, 167, 177-281, 306-307, 311, 340, 343, 347-350, 354
 working classes 工人阶级 81, 83-87, 90, 93-94, 96-102, 109-113, 116-120, 122-126, 128-134, 136-138, 151-152, 156, 159-164, 167, 178-182, 184-185, 188, 193, 197-200, 203, 266, 277-281, 285, 288-289, 301-304, 308-309, 319-321, 324-325, 329, 331, 338, 340, 343, 345-346, 348-350, 362, 365-371, 373-378
 youth culture 青年文化 77-78, 85-93, 100, 102, 104, 128-129, 136, 149, 156, 197-198, 202, 266, 269, 316-317, 319, 330, 332, 339, 343, 348, 358, 360, 368-370, 374-378, 421
 另参见 consumption 消费
 Levi-Strauss, C. C.列维-斯特劳斯
 Life-chances 生活机会 98, 125-126, 330-332
 Lindesmith, Alfred 阿尔弗雷德·林德史密斯 402
 Locksmen 教派成员 252, 258
 Lockwood, David 大卫·洛克伍德 336
 Logic-of-enquiry 调查逻辑 398-399, 401, 422
 LSD 迷幻剂(药) 121, 142-143, 149, 217, 227, 230
 Lukes, S. S. 卢克斯

 MacInnes, Colin 科林·麦克因斯 100, 266
 McRobbie, Angela 安吉拉·默克罗比 343
 Manipulation 操纵 86, 264, 337, 359, 370, 377
 Mankoff, Milton 弥尔顿·曼考夫 393
 Mann, Michael 迈克尔·曼 252, 260, 334
 Mannheim, Karl 卡尔·曼海姆 238
 Maps of meaning 意义地图 79-80

- Marcuse, H. 赫伯特·马尔库塞 141
- Marginality 边缘性 345-346, 361-363, 366
- Marijuana 大麻 121, 140, 142, 145, 150, 193, 211, 218, 222-231, 252, 258, 261, 267, 411
- Marketing 市场化 153
- Marley, Bob 鲍勃·马利 253
-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277
- Masculinity 男性气质 161, 353
- Mass culture 大众文化 89-90, 161
- Matza, David 戴维·马茨阿 226, 229, 339
- Media 媒体(传媒) 77-78, 101, 113, 121, 140, 149, 152, 155, 165-167, 169-172, 185, 241, 267, 290, 296, 312, 314-315, 318-320, 336, 347, 376-377
- Melly, George 乔治·梅利 184, 307
- Mental production 精神生产 80, 154
- Metaphors 比喻(隐喻) 195, 221, 236, 240, 251, 253, 256, 259, 263-264, 399, 409-410, 416, 418, 421,
- Middle classes 中产阶级 82-84, 86, 93, 97-99, 101-102, 112, 133, 136-139, 151-156, 159-162, 164, 193, 232, 235-238, 240, 259, 264, 279, 321, 323, 325-326, 329, 333, 335-336, 339-340, 345-346, 350, 356, 361-365, 375, 412
- Milieux 环境氛围 84
- Mill, John Stuart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400
- Mitchell, Juliet 朱丽叶·米切尔 152, 244
- Mobs 团伙 197, 200-201, 207, 210, 296
- Model-building 模型构建 417, 419
- Mods 摩登族 189-196, 262, 306, 309-310, 312, 314, 317-318, 320
 control culture 控制文化 135, 138, 151, 160, 165-166, 169-171
 girls 女孩 84, 120, 155, 158, 190, 271, 321, 339, 343-367, 378
 hard mods 硬派摩登族 187, 266-267
 problematic 问题框架 108
 style 风格 84-88, 92, 94, 103-104, 107, 124-125, 130-132, 134-135, 138-139, 141, 150, 157, 161, 167, 177, 180-187, 191-197, 199-200, 202, 232, 235-236, 242, 246, 256-257, 260, 263, 266, 268, 271, 277, 280, 282, 285-289, 301, 304-321, 328, 337-338, 340-341, 350-351, 354, 356, 366, 389, 398, 405, 419-420
- Monod, Jean 吉恩·莫诺 338
- Moral panics 道德恐慌 163-166, 171, 290-291, 347, 357
- Morality 道德 115, 118, 135, 154-157, 163-167, 171, 173, 233, 290-294, 314, 324, 347-348, 357, 371-372, 385, 389, 409-413
- Motorbike culture 摩托车文化 209, 353-354
- Mugging 行凶抢劫 166, 169, 171, 269, 290, 420-421
- Murdock, Graham 格雷厄姆·默多克 83, 87, 323, 329, 368
- Musgrove, Frank 弗兰克·马斯格罗夫 333,
- Music 音乐 85, 87, 90, 92, 94, 107, 121, 131-133, 135, 138-142, 145, 147-150, 157, 167, 185, 190, 193, 195-196, 198, 209, 214, 230-232, 246-247, 249, 253-269, 271, 275-277, 280-290, 307, 309-312, 316-318, 331, 357-359, 377, 390
- Mystification 神秘化 243, 256, 342
- National Deviancy Conference (NDC) 全国越轨现象研究联盟 394-396, 398
- NDC 参见 National Deviancy Conference
- Negation 否定 149, 152-153, 157, 161, 231, 251, 253, 308, 310, 368, 375
- Negotiations 协商 104, 111, 117-124, 126, 128, 182, 305, 356, 358-362, 367, 405-406, 409, 413, 420

- Neighbourhoods 邻里关系 102, 104-105, 107, 111-112, 119-120, 123, 125-126, 313
- Neutrality 中立性 389
- Notting Hill riots 诺丁山种族骚乱 164
- Objects 对象(客体) 132, 155, 163, 179, 219, 229-230, 232-233, 242, 301, 304, 321, 341, 344, 353, 368, 388-389, 400, 407
- Occupations 职业 94, 98-99, 106, 109-112, 120, 124-129, 153, 155, 160-161, 190, 277, 296, 321, 340, 345, 354-357, 364-367, 375, 406, 409-410, 418
- Oppression 压迫(压抑) 153-155, 158-160, 187, 195, 198-199, 202, 241-242, 250, 252-253, 272, 281, 282, 306-307, 309, 320, 419
- Ortega y Gasset, Jose 奥尔特加·伊·加塞特 327
- Paint House, The (Daniel and McGuire) 《涂料房》(丹尼尔和麦圭尔) 198, 309, 335, 351
- 'Paki-Bashing' 殴打巴基斯坦裔移民 309
- Parent cultures 父辈文化 83-86, 104, 107-108, 113, 128, 130-131, 185, 200, 202, 319-320, 339
- Parker, Howard 霍华德·帕克 86, 126
- Parsons, T. 塔尔科特·帕森斯 167
-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PO) 参与式观察(PO) 386, 390, 393, 398-399, 401, 405-407, 410, 412-414, 416
-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paradigm (POP) 参与式观察法范式(POP) 399, 405, 409-411, 416, 422
- Permissiveness 放纵 92, 139, 154-157, 164-165, 237, 258, 304, 347, 353, 365
- PO 见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参与式观察 386, 390, 393, 398-399, 401, 405-407, 410, 412-414, 416
- Politics 政治 77-78, 89, 91, 93, 95-97, 99, 113-114, 119, 122-123, 137-143, 145-146, 149, 154-155, 159, 168, 177, 213, 233, 241-245, 247, 252, 254, 259, 260, 263-264, 272, 275-281, 283, 285, 324-325, 327, 329, 331, 357, 368-371, 374-378, 392, 396-397, 407, 419-422
- black Americans 美国黑人 143, 146, 150, 257, 275-278, 280, 283, 285, 289
- class relations 阶级关系 86, 102-104, 110, 115-116, 123, 163, 330, 341, 375
- consensus 共识 93-96, 98-100, 102, 106, 114, 159, 220, 421
- counter-cultures 反主流文化(群体) 121, 136-143, 145-147, 149, 151-154, 156-162, 165, 167, 235, 237, 240-241, 331, 333-334, 357, 368, 395
- urban communes 城市公社 239, 241-242
- youth culture 青年文化 77-78, 85-93, 100, 102, 104, 128-129, 136, 149, 156, 197-198, 202, 266, 269, 316-317, 319, 330, 332, 339, 343, 348, 358, 360, 368-370, 374-378, 421
- Polsky, Ned 内德·波斯基 408
- POP 见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paradigm 参与式观察法范式 399, 405, 409-411, 416, 422
- Pop culture 流行文化 92, 136, 267, 351, 358-359, 376-377
- Positivistic research 实证研究 388-389, 395
- Poverty 贫困 95, 98, 237, 325
- Powell, Rachel 雷切尔·鲍威尔 272, 322, 361, 422
- Power 权力 80-83, 95, 99, 113-123, 140, 143-144, 146, 159, 167, 188, 232, 250, 254, 264, 277, 279, 281, 291, 298, 302, 325, 327, 331, 362-363, 373-374, 378, 392-393
- Prince Buster 普林斯·巴斯特 261-262, 266-267
- Problematics 问题框架 108

Production 生产 79-80, 90, 110, 115, 126, 132, 154, 157, 162, 171, 243, 289, 314, 316-321, 330, 338-400
 Progressive-regressive method 渐进-回溯法 403, 417, 422
 Protestant ethic 新教伦理 217-218, 220, 227, 254
 Psychoses 精神病 403, 405, 411, 416

 Qualitative data 定性数据 158
 Quasi-religion 准宗教 201, 309
 'Queer-Bashing' "殴打同性恋者" 83
 Questionnaire research 问卷调查 388

 R. and B. music 节奏布鲁斯 见Rhythm and Blues music 185, 255, 257, 263, 281, 285-286
 Rationalisation 合理化重组(改革) 98, 105, 110-111
 Ready, Steady, Go! (TV programme) 《各就位, 预备, 跑》(电视节目) 318
 Redevelopment 再开发 105, 109
 Reggae music 雷鬼乐 246-247, 253-257, 260-268, 271, 312
 Religion 宗教 146, 158, 218, 221-222, 240-245, 249-251, 254, 258, 260, 271
 另参看 quasi-religion 准宗教
 Reproduction 再生产 115-117, 124-126, 137, 152, 154, 158, 162, 242, 363-364, 366, 376
 Research design 研究计划 405, 410-411, 413, 416
 Resistance 抵抗(抵制) 81-82, 90, 99, 110, 115-116, 120-122, 124, 131, 156-157, 165, 195, 246, 248, 280, 265, 272, 281, 297, 359-360, 373-376
 Responses 反应(回应) 84-86, 95, 106, 108-113, 117, 122-123, 125, 130-131, 135-138, 150, 156-157, 162-167, 177-179, 182, 185-186, 212, 214, 227, 230, 249, 255-256, 261, 266, 279, 292-293, 298, 308-313, 320, 328, 339-340, 344-349, 351-352, 354, 359, 370, 373, 375-378, 380, 389, 391, 394, 407, 421
 Rhythm and Blues (R. and B.) music 节奏布鲁斯音乐(节奏蓝调) 185
 Roberts, Brian 布莱恩·罗伯茨 77, 226, 322, 385, 399, 401
 Rock 'n' roll music 摇滚乐 92, 141, 149-150, 167, 185, 191, 232, 247, 264, 277, 282-284, 286-287, 307, 349
 Rockers 摇滚派 84, 164, 167, 171, 185-186, 309-310, 312, 347, 350, 355
 Rolling Stones 滚石乐队 140-141, 148, 167, 192-193, 283, 288
 Roy, Donald 唐纳德·罗伊 414
 Rude Boys 牙买加混混 134, 187, 246, 254, 268, 270, 312
 Rural communes 乡村田园公社

 Sartre, Jean - Paul 让-保罗·萨特 93, 403
 Scape-goating 替罪羊式 180
 Schools 学校 84, 87-88, 91, 103, 115, 120, 126-130, 136-137, 146, 148, 151, 153, 161, 164-165, 190, 194, 198-199, 240, 269, 279, 293, 297, 313, 320, 323-324, 331-332, 335-336, 340, 345-346, 354, 359, 363-364, 370-382, 412
 另参见education 教育
 Scouting 童子军(活动) 303, 325, 330
 Seaga, Eddie 艾迪·西加 259
 Sexuality 性活动(性征) 345, 366-367
 Signification spiral 意指的螺旋式上升 171
 Signs 符号 124, 132-133, 135, 142, 182, 184-185, 193, 225-226, 236, 248, 275, 303-309, 314-318, 337-338, 376, 387, 396, 399, 401, 408, 410
 Silber, Irwin 欧文·西尔伯 160
 Skiffle 噪音爵士乐 284, 349

- Skinheads 光头党
- black music 黑人音乐 275-277, 281-286, 288-189
- community 社群(区) 93, 99, 101, 104-106, 110, 121, 126, 137, 139, 143, 145-146, 150, 159-160, 166, 197, 199-202, 210, 240, 242-245, 248, 256, 258, 264-268, 271, 302, 308-309, 336, 311, 320, 372-373, 381, 388, 419-420
- consciousness 意识 78, 128-129, 154, 158, 186-187, 198, 211-225, 228, 231, 256-258, 263, 275, 288, 295-296, 306, 308, 313, 324, 328, 340, 363, 386, 405, 410
- cultural integration 文化融合 286
- girls 女孩 84, 120, 155, 158, 190, 271, 321, 339, 343-367, 378
- ideology 意识形态 81, 85, 91, 95, 97-98, 106-117, 123-125, 138, 152-162, 172-173, 231, 233, 238, 272, 275-276, 289, 305, 318, 323-324, 332-333, 336, 341, 363, 365-377, 385, 399, 403, 420-421
- social reactions 社会反应 164-165, 167, 182, 185, 298, 310, 312-313, 347, 394
- style 风格 84-88, 92, 94, 103-104, 107, 124-125, 130-132, 134-135, 138-139, 141, 150, 157, 161, 167, 177, 180-187, 191-197, 199-200, 202, 232, 235-236, 242, 246, 256-257, 260, 263, 266, 268, 271, 277, 280, 282, 285-289, 301, 304-321, 328, 337-338, 340-341, 350-351, 354, 356, 366, 389, 398, 405, 419-420
- Slavery 奴隶制(身份) 247-249
- Smith, M.G. M.G.史密斯 273
- Social change 社会变革(变迁) 77-78, 87, 89, 93-94, 98, 100, 106, 111, 154, 163, 298, 327, 329, 331-331
- Social class 社会阶级 82, 84-85, 101-102, 108, 116, 276, 334
另参见 class 阶级
- Social constructions 社会建构 227-228, 233
- Social mobility 社会流动 91, 106-107, 367
- Social myths 社会神话 93, 98, 113
- Social stratification 社会阶层(分层) 94, 122, 276, 319, 334, 338
- Socialisation 社会化 104, 125, 136, 156, 240, 320, 405
- Socialism 社会主义 140-141, 145-146, 280, 323-327, 329, 342
- Solidarity 团结 93, 104, 114, 140-141, 146, 159, 194, 198-202, 238, 262, 271, 288, 292, 312, 325, 345, 359-360
- Soul music 灵魂乐 140-141, 145-146, 280, 323-327, 329, 342
- Speed 速度 180, 186, 307, 417
- State education 国家教育 371-372, 375
- Stereotyping 刻板化定型 135
- Structures 结构 78-86, 88, 93-94, 98, 100, 102-105, 108, 127, 130, 134-139, 146, 153-161, 167, 169, 177, 180, 198, 209, 213, 216, 225, 237-238, 241, 247-248, 250, 253, 257-258, 260, 272, 287, 290-297, 301-302, 304, 307, 313-317, 332-334, 336, 339-342, 345-346, 355, 359, 361, 363, 365, 369-371, 376-378, 385-386, 391-394, 396, 399-401, 410, 416-417, 420-422
- Struggles 斗争 81-82, 86, 96, 99, 104, 114-115, 117, 119, 121-123, 139, 145-146, 148, 155, 159, 163, 166, 239, 241-242, 250, 277-280, 284, 294, 302, 323, 324, 326-329, 332, 334-335, 350, 370-374, 376, 378, 419, 421
- Style 风格 84-88, 92, 94, 103-104, 107, 124-125, 130-132, 134-135, 138-139, 141, 150, 157, 161, 167, 177, 180-187, 191-197, 199-200, 202, 232, 235-236, 242, 246, 256-257, 260, 263, 266, 268, 271, 277, 280, 282, 285-289, 301, 304-321, 328, 337-338, 340-341, 350-351, 354, 356, 366, 389, 398, 405, 419-420
- Subcultures 亚文化群体 77, 82-87, 103-104, 107, 109, 123-124, 130-132, 134, 136-139, 151, 163-164, 183, 191, 197-198, 203, 209, 227, 232, 238, 248, 266-267, 282, 309, 311, 316-317, 319-321, 339, 341, 343-347, 349-357, 359, 361-363, 365, 385-386, 388, 395-398, 405, 408, 413, 418, 421

- analysis 分析 77-78, 83, 85, 88, 90, 100-104, 106-108, 110, 113, 115, 126, 131, 135, 162, 183, 185-186, 209, 214, 238, 244, 246, 254, 256, 264, 272, 305, 307-308, 310-311, 315-316, 318, 321, 323, 331-347, 361, 363-364, 368-370, 374-378, 385, 391, 394, 396, 398, 404-406, 409, 411-421
- characteristics 特征 77, 83-84, 88, 93, 96-98, 100-101, 114, 116, 119, 125, 128, 130, 136-138, 153, 159, 161, 186, 188, 202, 210, 215, 217, 240-241, 263, 268-269, 275, 277-278, 285-286, 288, 307, 314, 330, 334, 337, 344-345, 347, 350-351, 359, 366, 376, 388-389, 399, 401-402, 404-405, 408, 413, 416-417
- definitions 定义(界定) 77-78, 82, 84-85, 102, 106, 112, 114-116, 118-119, 123, 130-131, 134-135, 138-139, 155, 157, 169-171, 184-185, 193, 197, 201, 211, 219, 220, 226, 228, 251, 265, 267, 281, 289-290, 293, 296, 309-310, 312, 317-319, 323, 329, 331, 334, 340, 341, 344-345, 348-349, 366-367, 370-371, 373, 386, 388-389, 391, 393, 401, 409, 411, 418, 421
- ideology 意识形态 81, 85, 91, 95, 97-98, 106-117, 123-125, 138, 152-162, 172-173, 231, 233, 238, 272, 275-276, 289, 305, 318, 323-324, 332-333, 336, 341, 363, 365-377, 385, 399, 403, 420-421
- membership 成员资格 309, 315, 347, 353
- Subjectivity 主体性 233-234
- Subordinate cultures 处于从属地位的文化(从属文化) 81, 86, 117, 121, 130, 319
另参见 working classes 工人阶级
- Talking 谈话 131, 204, 407
- Teddy Boys 泰迪男孩 84, 91-92, 101, 124, 131-132, 134, 163-164, 167, 177-182, 307, 311, 340, 343, 347-350, 354
- cultural responses 文化反应 84, 130, 340
- delinquency 青少年违法 164
- girls 女孩 84, 120, 155, 158, 190, 271, 321, 339, 343-367, 378
- problematic 问题框架 108
- social class 社会阶级 82, 84-85, 101-102, 108, 116, 276, 334
- style 风格 84-88, 92, 94, 103-104, 107, 124-125, 130-132, 134-135, 138-139, 141, 150, 157, 161, 167, 177, 180-187, 191-197, 199-200, 202, 232, 235-236, 242, 246, 256-257, 260, 263, 266, 268, 271, 277, 280, 282, 285-289, 301, 304-321, 328, 337-338, 340-341, 350-351, 354, 356, 366, 389, 398, 405, 419-420
- 'Teenage consumer' "青少年消费者" 89, 101, 128
- Teeny Boppers 少女流行音乐迷 357-359
- Territory 地盘(领地) 119, 130-131, 164, 178, 197, 201-202, 207, 285, 309, 315-316, 320, 324-325, 345, 348, 356, 360, 367
- Therapeutic communes 治疗主题公社
- Thomas, Michael 迈克尔·托马斯 247, 253, 255, 261
- Thompson, Hunter 亨特·汤普森 353
- Thrasher, Frederic 弗雷德里克·思拉舍 330
- Tolerance 容忍 120, 191, 220, 293, 375
- Trade unions 工会 99, 113, 118-119, 123, 161, 166, 278, 388, 414
- Transactional theory 交互影响理论 393, 396
- Twohig, John 约翰·托劳治 226
- Unemployment 失业率 127, 272-274
- Unisex styles (男女通用的)中性风格 351
- Urban communes 城市公社 239, 241-242
- Victorian era 维多利亚时代 323, 335
- Violence 暴力 91, 102, 119, 140-141, 144-148, 150-151, 159, 164-166, 173-

174, 186, 188, 193, 199, 201–202, 253, 258–259, 261, 263–264, 267, 291, 293–294, 297, 309, 314–315, 324, 331, 347, 350, 379, 382

Wandervogel movement 漂鸟运动 328–329

War 战争 91, 94–95, 101, 110, 147, 234, 237, 272–273, 325

Webster, Colin 科林·韦伯斯特 235

West African music 西非音乐 284

West Kingston, Jamaica 牙买加西金斯敦

Westergaard, J. J. 韦斯特加德

The Who “谁人”乐队 191–192

Willer, David 大卫·威勒 400

Willer, Judith 朱迪斯·威勒 400

Wolverine 密歇根州人 183

Women 妇女 152, 155, 158–159, 239, 245, 280, 326, 332, 347, 350, 353, 357, 365, 378, 409

另参见 girls 女孩

Work 工作 84, 86–87, 94–95, 98–99, 101, 103–106, 111, 113, 117, 119, 123–128, 130–131, 133, 135, 137, 139, 142–143, 153–154, 160–161, 164, 166, 180, 198–199, 209–210, 216, 220, 223, 234, 238, 241, 243, 247, 250, 252–253, 259, 269–270, 272–275, 278–279, 288, 291–292, 296–297, 301–303, 309, 312–313, 319–321, 330, 337–339, 341, 345–346, 348, 354–357, 363–366, 370, 372, 376, 381, 390, 392, 394–395, 400–401, 404, 406–408, 412, 414–415, 422

Working classes 工人阶级

black Americans 美国黑人 143, 146, 150, 257, 275–278, 280, 283, 285, 289

girls 女孩 84, 120, 155, 158, 190, 271, 321, 339, 343–367, 378

leisure 休闲 85, 88, 94, 119, 123, 126–128, 130, 137, 161, 301–304, 309, 313, 319–321, 330–332, 345–346, 356, 364, 366

politics 政治 93, 99, 114, 140, 145, 149, 159–160, 162, 165, 213, 241, 244–245, 279–281, 368–371, 374–375, 378, 396, 407, 421

social change 社会变革(变迁) 77–78, 87, 89, 93–94, 98, 100, 106, 111, 154, 163, 298, 327, 329, 331–331

subculture membership 亚文化成员资格

另参见 subordinate cultures 处于从属地位的文化(从属文化)

Young, Jock 乔克·扬 226, 395, 411

Youth 青年 77–78, 82, 85–88, 94, 100–104, 123, 125, 128–132, 135, 139, 155–156, 162–167, 178–179, 190, 198, 201, 236, 250, 293, 302, 304, 312, 326–328, 330–333, 337–343, 355, 368, 370, 377

Youth clubs 青年俱乐部 128, 180, 204, 376

Youth Culture 青年文化

commercial developments 商业开发 314

crisis in authority 权威危机 151–152

definitions 定义(界定) 77–78, 82, 84–85, 102, 106, 112, 114–116, 118–119, 123, 130–131, 134–135, 138–139, 155, 157, 169–171, 184–185, 193, 197, 201, 211, 219, 220, 226, 228, 251, 265, 267, 281, 289–290, 293, 296, 309–310, 312, 317–319, 323, 329, 331, 334, 340, 341, 344–345, 348–349, 366–367, 370–371, 373, 386, 388–389, 391, 393, 401, 409, 411, 418, 421

generational consciousness 世代意识 323, 328–330, 332, 334

leisure 休闲 85, 88, 94, 119, 123, 126–128, 130, 137, 161, 301–304, 309, 313, 319–321, 330–332, 345–346, 356, 364, 366

politics 政治 93, 99, 114, 140, 145, 149, 159–160, 162, 165, 213, 241, 244–245, 279–281, 368–371, 374–375, 378, 396, 407, 421

Youth subcultures 青年亚文化群体 84-85, 87, 103, 107, 130-132, 191, 198, 282, 309, 339, 344, 347, 359

Zweig, Ferdinand 斐迪南·茨威格

译后记

此书是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之一,也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文化译介小组”组织翻译的第二本学术著作。与两年前出版的《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相比,此书讨论的问题大都集中于20世纪60-70年代,涉及较多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因此需要做较多的注释。加之各位译者和校注者的教学和研究任务繁重,拖沓了近两年的时间。

本书各章节的翻译分工如下:孟登迎(“新版序言”、“序言”、第5章、第6章、第8章、第9章、第14章、第17章、“索引”);胡疆锋(第1章、第2章、第3章、第4章、第5章、第11章、第13章);王蕙(第10章、第12章、第18章、第19章);郑寰(第2章、第7章、第9章、第16章);宓瑞新(第15章)。另外,高秀雪对第3章、林孝杰对第4章和第11章、郭成功对第7章的初译稿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两年多来,作为校注者,面对各位译者断断续续提供的初稿,我开始了一个漫长的充电学习的过程。为了提高效率和减少误断,我曾经邀请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王行坤博士对部分章节进行初校,在此首先向他表示衷心感谢。我在随后统一进行了校对和注释,没想到又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在翻译全书的过程中,我发现本书中使用的cultures、subcultures、youth subcultures这几个复数形式的词,一般都具有双重意涵:既可以指一种风格或文化现象的概称,又可以指一群因某种共通的风格或要

素而结成群体的人。因此,为了读者易于理解,我会结合上下文对这几个核心术语及相关用词的译法做如下处理。

1. 考虑到本书作者对culture一词的复数形式cultures进行的多次辨析,本书将cultures一词译成“文化群”或“文化群落”,而将sub-cultures一词译为“亚-文化群落”;

2. subculture一词以单数形式出现时,本书一般译为“亚文化”,而以复数形式subcultures出现时译为“各种亚文化”或“各种亚文化群体”;

3. youth subculture的单数形式译为“青年亚文化”;而复数形式youth subcultures译为“各种青年亚文化”或“各种青年亚文化群体”;

4. 另外,将书中以普通字体出现的youth culture译为“青年文化”,以大写字体的Youth Culture也译成“青年文化”,但以**粗体**标出。

为了推定某些译文的表述,我数次向台湾政治大学冯建三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马海良教授和清华大学陈永国教授请教。这些师友及时给予了回应和帮助,我在此要特别致谢。

另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外语系王蕙副教授积极承接和组织此书的翻译工作,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计算机教学中心的宿培成、盖赆老师帮我绘制此书的一些图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2006级学生陈辉曾帮我录入参考书目和索引。可以说,本书的翻译凝聚了不少“中青人”的心血。对他们的真诚付出,在此再表谢意。

当然,最后必须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王钦仁先生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王先生和出版社充分理解在当今学术评价制度下从事译介工作的不易,允许我们为了保证译文质量数次拖延交稿的时间。

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科研专项经费资助,对多年来支持我们开展这项译介工作的领导和同事们也深表感谢。

在此书译稿即将付印之际,本书主笔、英国杰出的左翼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先生已经于2月10日不幸离世了。很遗憾没能让他看到此书中文版的出版,更无缘与这位令人尊敬的文化研究大师进行直接的交流了。这本书中译本的出版,也可以算是对他的一种精神上的

纪念吧。

由于国内青年文化研究方面可参照的译作较少,而且青年文化研究又属跨学科领域,从事译介者大都出自语言文学专业背景,译文难免会出现错讹或不精确之处。作为最终的校注者,本人自当对本译本的翻译质量承担全部责任。因此,诚望各位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坦诚提出批评指正意见。凡有任何反馈,务请直接发送至以下电子邮箱:mdengying@163.com,以帮助我们及时补正。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文化译介小组 孟登迎

2014年3月5日 北京